

觀

瀾

2013年·立秋

观澜学社《观察报告》第一期

前言

“观澜学社”是一个自发、独立、非商业的网络社群。我们关注当代中国历史的展开，试图对几项可能会影响中国命运的因素进行观察，进而分析和评估其未来走向；我们无意于介入学术界的对话，更无意于鼓动任何政治势力；我们追求中国社会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建构“重叠的共识”。我们的名称来自《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我们的观察涉及当今中国的六大场域，分别是法政、经济、阶级、社会组织与互联网、边疆、本土/国际。在每个场域中选择某项或某几项关键因素进行观察，例如法政场域中的“中共高层观察”、阶级场域中的“新工人观察”等等。随着学社发展，关键因素的选项也许将逐步拓宽。我们计划每两个月公开发布一份《观察报告》，第一期《观察报告》的编号是“2013年·立秋”，以后也将逐次按照中国农历的节气编号。

观察必然伴随着命名，但是我们会警惕各种大而化之的命名所孕育的风险；观察必然隐含着诠释，但是我们会谨慎地给诠释设定边界。

本报告所有文章均可根据“署名完整—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原则在互联网上传播，商业使用务必征求原作者同意。■

目录

法政篇 中共高层观察

李靖云：从陈希同下台到习李新政
——试论中共政治转型路径和困境 4

经济篇 资本观察

唐啸聚：观察当今中国资本因素的若干关键角度 17

阶级篇 新工人观察

巩高兴：关于罢工/一个大龄女工人 21

社会组织与互联网篇 非官方教会观察

李晋、马丽：“做山上之城”
——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中改革宗的兴起和信仰公开化 23

边疆篇 西藏观察

李永峰：藏人流亡社区政治分裂的公开化 28

新疆观察

热依莱：公开言说新疆问题的困难 31

本土/国际篇 33 (本期暂缺稿件)

法政篇

中共高层观察

从陈希同下台到习李新政 ——试论中共政治转型路径和困境

作者：李靖云

陈希同就这样仓促地离开了世界。中国官方在宣布他的死讯时，使用了“病亡”一词，连“病故”都舍不得用。这一待遇可能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失败者最冷的结果，不过这一词汇在未来可能会被经常使用。

陈希同的个人经历对于中国政治而言，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政治斗争方式的一次彻底变化，以及中共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

“高层权争与群众政治联动”模式的兴起与终结

在陈希同事件之前，中共有过非常多的党内斗争，每次党内政治恶斗都会伴随着相应的群众斗争。一般来说，高层政治斗争都反映社会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斗争。毛对于这一点非常清楚。“反右”是建国的政协大联盟内部的政治斗争，草根出身的共产党和精英知识分子出身的民主党派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涉及到掌权并且在财富重新分配中得到好处的一般工农和传统精英之间的斗争。毛泽东果断地把上层斗争推动到下层，一点交易的可能都不让对方获得。这种手段在“三反”时已经有了雏形。而在“高饶事件”中，由于毛自己并不愿意打击高饶，故而让其以权争的形式结束。

这种手法的进一步运用是在“文革”时期，当时，在党内的路线斗争中，毛处于相对不利的局面。对他而言，彻底掌握全局的办法是借助社会运动，通过向中央开炮，搬掉了既是压抑多种群体矛盾、也是维护国家基本运转的压舱石。更进一步，毛对于系统中最被压抑的群体施以个人的道义支持，并且发出最高指示，将矛盾激化到内战状态。

然而，这种以高层权争带动社会运动的模式，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卡里斯玛领袖本人是否能维持平衡，能否将高层的政治斗争掩盖住。权争必须体现为路线、道德和理念之争，惟其如此，领袖的权威才不会受到冲击。“文革”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林彪出逃事件，直接将权争摆到台面上，虽然毛很快做出反应，但是仍然无法避免领袖权威受损。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出某种妥协，将已打到的当权派再拉起来，同时扶植高层的“文革派”。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邓小平无形中成为了“文革”中另一个高层和社会运动的集中代表。虽然毛总是说反对我们的大概也就

是百分之五，但事实上，反复被打到的人累加起来已经占了大多数，而邓又成为这一力量在上层的代表。很自然的结果就是“反击右倾翻案”未果，然后就是“四五”运动，高层政治翻转。“文革派”成为惟一从“文革”中受益的派别，被孤立并敌视。

毛的去世给了邓等人以权术斗争、通过政变方式解决上层路线斗争的机会。政变的结果是邓成为中共的实际领导者，国家的最高决策者。但是邓的权威确立更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他本人并不是毛的合法继承人。他只是反对“文革派”的政治精英和一般民众的代表人而已，他不是也不可能成为这个群体的领袖。邓本身也没有毛那种卡里斯马的威力，他想依靠官僚体系，这就必然有了对陈云地位的让步，也有了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倚重。在这种情况下，邓和陈云之间的平衡状态，基本是陈云攻，而邓调和维持。

毛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有人能号召发起并且主宰群众运动，社会运动有了自己的取舍，可以和邓联合打到四人帮可以，亦可以将邓作为敌人。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人民是一个类同上帝的词汇，谁能掌握群众，谁就是上帝。这也产生了一种群体的政治幻觉，群众在运动中确实以群体为上帝的感觉，越是人多，就越是能感受到自己作为上帝的存在。

在路线斗争中，邓所依靠的胡赵首先和陈云系统交火，这既有改革前的老官僚体系和改革后的新官僚体系之间的斗争，也有关于未来政治发展方向和路线的斗争。这种情况下，邓有时支持胡赵，有时又向陈妥协，本是既定的格式。但是在相对独立又与高层统治集团保持某种直接关系的大众政治因素参与进来以后，这一策略就完全失效了。

首先是1986年的学潮，对胡而言，借助其发 作用是可取的，但是对于邓陈等被群众政治踏过一脚的人而言是可怕的。这就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平衡，邓陈一条路线，而胡赵处于另一路线。结果是胡被拿下，然后赵被抬到一个高位，事实上造成了赵的孤势。这时对赵紫阳而言，利用群众政治就成为可取的手段。事实上赵紫阳也是最早借助现代的“领袖塑造”手段的人，通过电视、新闻发布会不断塑造自己的形象，从而扩张自己的权威。这种政治领导人的个人需要和当时仍然相当发达的群众政治需求一拍即合。另一方面，路线斗争日趋激烈，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被认为是书生政治的结果。以陈云为主的社会主义老技术官僚派其实乐见这种结果，如此他们可以取得竞争优势。

所有这些矛盾在1989年4月胡耀邦死后通过群众政治爆发，而这种爆发恰恰是党内斗争刺激的结果。在单位制社会之中，胡赵路线的支持者开始大规模动员，通过单位的组织发动了大量人力，使得上层政治斗争变成了全国性的斗争。这种上下联动的状态，是邓陈不能容忍的，不仅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参与群众政治，更重要的是，他们以规避群众政治为目标，这可以说是他们既定的政治安排。在这一基础上，才有了邓陈的一致。赵被拿下是必然的，军队强行戒严，对群众运动施以镇压也是必然的。但是比这些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新的政治平衡。

这就有了江泽民以及“上海帮”的崛起。但是如果江要想坐稳这个位置的话，就必须对政治板块来一个新调整。调整必然带来挤压和冲撞，斗争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开展斗争就成了一个问题。最终结果，江泽民胜利了，不仅仅是权争的胜利，而且是方式的胜利。陈希同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但是他背后的政治势力却守住了底盘。双方实现了政治平衡。这种斗争方式实际上被各方所接受，然后就被广泛使用。陈良宇案是继其后的一个典型，薄熙来案就更更为典型。

薄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毛的手法，利用群众政治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这种运用并非真正发动群众，而只是表演性的群众政治。斗争的双方实际上都恪守把政争限制在统治精英内部的原则。薄曾经几次出手打击极端“毛派”在重庆的活动，这非常清楚地给群众政治设定了一个约束，不能有主动性，只能具备表演性。虽然薄也接受“乌有之乡”等左翼组织献锦旗之类的活

动，但是其秉承的原则就是党的群众来访来信的原则。

即使在王立军出逃，薄异常危险的情况下，他的选择依旧是到北京寻找派系力量的支持，而非发动群众。在胡温出手拿下薄之后，右派一片欢呼，但是中央却紧接着对右派不断打压。保住精英政治的边界，依旧是第一原则。随着陈希同这个标志性人物的“病亡”，中共政治的精英化——或者按照政治学巨擘 S.E.Finer 的术语，“再度宫殿化”——已经完成。

江泽民的政治贡献

与陈希同相关的两个标志事件，一个“六四”，一个“北京帮”案，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跨越。根据 S.E.Finer 对政治统治类型的分类，这一跨越可以表述为中共政治体制从“宫殿+论坛”模式变成“宫殿”模式。这里可以结合中国的政治特殊性做一个修正，因为中国的“宫殿”也是意识形态的掌握者，Finer 政治学中的“教会”在中国实际上也附属于“宫殿”，所以将其称为“庙堂”更为合理。

建国初期的大联盟政体，类似于 Arend Lijphart 所谓“结盟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政体，也就是 Finer 所谓“贵族+论坛”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在 1957 年被毛运用群众政治摧毁，代之而起的是全能主义政体，“庙堂+论坛”模式，其重点在于庙堂和群众政治之间的关系。“六四”之后，群众政治被彻底消灭，中共政治彻底宫殿化、庙堂化，政治斗争不出中南海，成为各方墨守的原则。

正是因为这个原则，在 89 年之后，中国的社会运动突然偃旗息鼓，边缘化，小众化，根源就在于没有高层政治势力的支持。在此之前，中共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政治斗争不出现群众政治的影子，除了“高饶事件”是一个例外。在中共的政治理论逻辑中，人民是上帝，必须请出上帝才能有最后的评判。但是能操纵上帝的领袖去世了，就必须把上帝摁回去，这是整个上世纪 80—90 年代政治的重要主题。如何把这个上帝请回去，并且在没有上帝的情况创造一套新的玩法，这是中共政治转型的核心任务。

应该说，中共基本上成功处理了这个问题，首先是邓隔代指定的交班方式，确定了领导人的更替顺序，这就压服了各个派系；其次，确定了以经济发展作为政治工作的核心，实际给出了新的政治定义。毛的政治定义是阶级斗争，邓的政治定义就是发财致富。邓的技术化处理，保证了党内政治的平衡。但是这仅仅是路线方针和主要政治安排的确立，对于中共的政治转型而言，还有许多重要内容，这不可避免地落到了江泽民身上。

应该说，江确实完成了这项任务。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两件大事，把人民请回去，同时在党内确定新的政治游戏规则，他都做到了。成功处理了上海两次学潮的江泽民，比局外人更清楚党内政治对于群众政治的鼓励和发动作用。这种相关联系，赵鼎新在其杰作《天安门的力量》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中共政治体制讲究集中性，但是又不同于苏联式的集中，而是有着区块分隔。所谓政治区块，重合但不完全等同于利益集团，可以是政党，也可以是派系、宗教、工团。毛曾经讲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对政治区块的承认。党内的政治区块又直接和群众政治结合，这是毛的设计。但是对江而言，他的任务就是要切断这种联系，他的手段就是承认区块利益，允许各种政治区块诉求并发展自己的利益。

中共政治体制在具体行为方式上的联邦主义，其实由来已久，但是这种以地方竞争为主的政治结构，在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还没有被中央主动认可和整合。江正是主动认可和整合了这一结构，朱镕基主持的财政改革，是关键调整，事实上承认了两级税收和财政。同时江还承认了部门利益，这是一种跨地域的区块，超大国企、金融寡头、能源企业、乃至计划生育等特殊部门，都被江接受和整合，允许区块自己根据自己的权力为自己谋利，这种放权方式往往以自

筹资金的文件形式授权，教育、医疗、文化、警察这些最具有群众政治动员能力的政治区块，瞬间变成了现有体制的忠诚拥护者，“六四”能够动员群众的结构基本消失了。但是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麻烦，政治区块对中央的挑战也不可避免地更为强烈。

本来，毛以其自身的政治动员能力，可以打击掉任何他所认为的政治挑战，邓依靠元老地位，一定程度上也能做到，但是仍然遭遇了“六四”的冲击。对江而言，他不具备毛和邓的条件，也没有可以依赖的选举等政治工具来加强自己权威。于是他的手段就是建立自己的政治区块，以各种交易积极联合其他政治区块，同时彻底打击那些敢于挑战的区块。其打击工具就是中纪检和反腐，这成为中共政治斗争中最后的正当性判决基础，陈希同就成为这一全新的政治斗争方式的祭品。

这种新的政治斗争不再诉求群众政治判断，也不再讲地位排序，没有动员会议，有的是所谓的党纪国法。对江而言，整治竞争对手和挑战者是必须的，但是不等于要清除相关政治区块，相反还能合作联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毛和邓对于成为政治挑战者的对手都要彻底消灭其实力基础。但是，陈希同虽然倒下了，“北京帮”日后却成为“江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孙政才作为李锡铭的女婿，一路走到高位，都说明这个政治区块依旧存在并且还在不断扩张。江通过这一手法的变化，完成了中共政治的转型，可以说中共政体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强）庙堂+（弱）贵族”模式。从一个带有无产阶级革命色彩的政党变成了一个精英化政党。

但是，这种庙堂政治的最大危机在于没有群众政治的合法性证明，对于溢出状态的社会抗议还可直接压服，或者利用区块压力，用中国的单位或者行业、家庭来劝服。但是一般的政治区块如何统一，这是一个大问题。江没有其他办法，于是采用了强化党的意识形态认同的模式。通过所谓的理论学习和新的党建运动，要求党内包括各政治区块向中央表示支持。从“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到“三讲”，再到“三个代表”，新的理论可以视为一种路线要求，各个区块必须要在在此基础上和党中央订立一个新的政治契约，完成整合。比如“三个代表”的实际含义就是要让中共成为精英政党，放弃过去革命党的定位，身为太子党的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表示反对，迅速被中纪检调查，然后被排除出核心权力层。太子党政治区块内部实际也将林炎志开除。这是政治结构的一次运作，而这些都是陈希同案之后的事情。

应该说，江完成了邓需要完成的事情，但是他所能做的仅限于既定约束下的结构调整，而这一结构自身的 bug 却难以弥合。其一，各种政治区块直接从原有的结构中成型，而各种利益集团与政治区块之间又有种种缝隙，结果本身就不稳定。从中央看起来应该没有问题的政治区块，往往就会因为利益集团本身的利益取舍导致新的矛盾。其二，由于告别了群众政治，中共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有组织但没有人民的政党，已经成型的政治区块都可以用体制罩住，但是那些形成于社会之中、有人民的组织，特别是秘密组织，就有可能成为党的敌人。这就导致江对特务和警察力量的依赖。“法轮功”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件，其直接结果就是政法委的权力边界大范围扩大。另一方面，以宣讲理论路线压迫各个政治区块服从的办法，又大大提高了宣传系统的地位，使其在实际上行行政部门化。

这就给外界造成了两个错觉，一是中共政治法西斯化，二是中共又要回到过去的意识形态。但事实上，政法委地位的提高并非组织系统以法西斯方式治理，经典的法西斯是社团化，从国家到社会要全面社团化，并且社团之间要有科层。事实上中共并没有如此，社会自生自发的空间已经要大得多，不同的区块都在扩张自身的利益。但是政法委可以以中央名义布置工作，每个政治区块都要担负一定的维稳任务，如果你有办法创新也行，但是前提是不能出现不可控的社会运动。必须注意的是，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警察国家，事实上中国的正规警力一直不足；这也不是通常意义的盖世太保或秘密警察，随时直接介入社会生活；政法委力量的增强意味着其可以参与中央政治交易，并且能从中央层面作出全局规划。而中共不断强调自身的历史和本

质属性的意识形态，其实并非针对核心成员以及区块领袖之外的人士，更不是对人民宣讲，这种理论宣传是目前情况下党内为数不多的政治整合手段，不得不一用再用。而这一切也说明，江费尽心力建立的这一结构本身难以稳定。

后江泽民时代——阶级与等级的两难

陈希同的死实际上也提醒国人，中国告别江泽民时代已经十年了。但是似乎大家都没有这个感觉，江泽民的影子还在笼罩中国，这十年从来没有觉得他离场，反而觉得他无所不在。似乎这十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完全是没有江泽民的江泽民时代。

江对中共的政治体制做了重新的修补和构建。但是从根本而言，这个政治框架缺乏全局整合的机制，这个逻辑上的 bug 是最大的问题。同时，江的离开，也标志了一个革命阶级的告别。生于国家危亡时代、参加革命、有过各种运动经验的一代人终于告别了。其实际意义一时难以判断，但是直接产生了一种祛魅效应。上一代人，不管怎么说是参加革命，对于党总有一种基本的尊敬，但是后来者再无参加革命的身份，顶多是参加工作，这种基本尊敬随着代际隐退而彻底隐退了。而江留下的体系是一个需要领导人不断纵横捭阖的体系，如果没有这点尊敬，整合就很容易造成冲突。

中国政治研究的元勋级人物邹谠先生曾经将中国政治概述为“全输全赢”的逻辑，“全输全赢”看起来跟一般的零和博弈一样，但是还可以更深一步地理解。梁漱溟曾经问过中共领导，为什么中共依靠农民打天下，却说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刘少奇回答说，中共长期军事斗争，战士要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无产阶级较为一致，故而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由此显示中共政治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即战斗序列，如果一个组织体系是战斗序列的体系，那么其构成逻辑也是战斗性的。铁一般的纪律，战斗的压力，都使得中共的政治斗争是以战争逻辑展开的。所谓“全输全赢”，就是战争的基本逻辑。这和一般所谓的政治零和博弈不同。零和博弈更多是在相对熟悉的政治环境中做出肯定否定，大家的负担较少，进入一种政治游戏状态，可以较为轻松地开展。比如英美政治，起点是熟人精英政治，在其中确立零和博弈的规则。但是中共不同，虽然是革命同志，但实际上并非熟人政治，而是山头政治，毛泽东就非常精准地指出过中共政治的这个特点。“谁来当家”的斗争其实是山头斗争，而且是带枪的山头，这里的“全输全赢”基本等同于军事斗争的规则。所以虽然是小范围政治，但是并不能等同于英美的议会政治开端的熟人政治。

江改造中共政治的最大成功，是驱逐了群众政治，但是对“全输全赢”的规则他只能做出一定修改，这个改造未必他不想完成，但是他对北京帮的打击实际贯彻了“全输全赢”的逻辑，他所做的只能是加上一个“挑战—收服”，亦即“挑战—全输全赢—收服”。所谓收服就是在击垮某一个派系的领袖或是派系的带头挑战者之后，收服派系人马。这类似于日本战国时代的诸侯战争，带头挑战者灭掉，但是地盘和队伍不会铲除，而是达成收服。这和毛邓彻底清除某一派系的做法有所不同。挑战者自己需要承担风险，但是整个派系则不必担心被彻底摧毁。江避免了流血，但是避免不了派系持续的挑战。

后江泽民时代，上台的人不再是革命者，而是一批官僚，这是第一个政治变化。胡、吴、温等人都是严格的官僚。他们成长在红旗下，受到严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教育，都是成绩优异的学生，熟练而有手腕的技术官僚。他们不再是革命者，只有接班人的身份，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比江更为严格的遵守既有的框架。但是他们接收的实际上是一个分裂的政治体系，维持这个

体系非常难。

中共建国时建立的社会主义体系是严格的等级制度，但是不同于传统中国的等级制度，其上下的纪律界限分明，精英选拔不再是通过公开考试，而是通过党的忠诚考察。毛借助群众运动，实际上铲平了这种等级分类。“文革”的直接后果，是使得尚未站稳脚跟的社会主义等级制度和已经被打倒的传统中国等级制度都被摧毁了。民众完全均质化，没有了过去的社会分层的依托，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都一致化了。这样的社会基础不可能再建立等级化的制度，却为阶级社会打开了局面。等级社会和阶级社会的根本差别就是社群身份。等级制度的精英可以说是特权精英，比如贵族，天然就有政治特权，传统中国社会的“士”阶层，也属于传统的特权精英，党员先锋队本来也是中共体制之下的特权精英。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被毁灭了。刘少奇和梁漱溟一起被揪斗，这种标志性的事件，不可能再让人有什么社会敬畏。论者经常说中国人没有敬畏，实际上就是没有特权精英概念的敬畏。老子不怕，拼就拼，这依然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心理。在这样的社会里，只能是竞争得胜，大家以能力、贫富来划分社会层级就是非常正常的情况。所谓精英不是凭借特权，而是以能力取胜。

这是邓小平面对的环境，也是江面对的基本约束。邓小平放开经济层面的竞争，同时在政治上一定程度地恢复了对传统特权精英、党员先锋模范和知识分子的特惠措施，这些都是对传统精英系统的重塑。但是这只能部分起作用，无法彻底恢复。江泽民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的处理方式，直接概括为“三个代表”——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群众的利益。这实际接受了一般的阶级社会的精英群体划分规范。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优势必然导致其寻求政治上的主导力。江并没有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而对后来的胡、吴、温而言，他们必须不断面对来自统治集团的内部挑战，同时维持等级制的政治和阶级化的社会。他们都是等级制度教育和选拔出来的产品，要捍卫的社会主义也是这样一个等级制度，对此他们不可能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对于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成型的阶级化的社会，他们只能接受，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对付。当然，除了他们本身的政治态度以外，他们之所以无法做出任何相应调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再拥有当年江享有的代际优势，挑战者会越来越多。而在另一方面，作为党内政治整合的两大基本手段，政法委的监控和宣传系统对路线的统一，使得这两个机构的权能不断扩大，实际上对技术官僚主导的政治平衡造成了风险。这一危险的局面使他们更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

胡锦涛的努力与尴尬

陈希同生前接受访谈的时候，谈到他和胡锦涛的一次直接交流。政治局开会清算陈希同，提到他的一条罪状，就是几年内提拔了一千多人，陈希同申辩的理由是中央精神要提拔年轻干部。这时一直没有讲过话的胡锦涛说了一句，“提拔年轻干部，这是可以的”。于是这条罪状就算过去了。此后胡锦涛也没有讲过话。

这样一个小情节，实际上暗示了一个基本事实，胡锦涛仅仅是作为年轻干部存在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政治中。他身居高位，但是并没有相称的政治实力，唯一的实力就是年轻，是接班人。当2002年成为总书记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足够老了，但是年轻人这个身份仍然存在。他接过老一辈的班，继续为党的事业而工作，这时党的事业已经从共产主义变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种平稳的政治过渡，既是一种幸运，又是一种不幸。过去中共的政治交接都发生在激烈斗争之后，重新洗牌。胡的上台确实风平浪静，但是也意味着全盘接收了既定的政治格局。

前面总结了江所确立的政治结构，各个政治区块的利益被承认，“全输全赢”的政治规变成

了“挑战—全输全赢—收服”，社会变成了一个罩着等级社会外套的阶级社会。江承认社会的阶级化；鼓励竞争，包括无规则、无伦理的竞争；承认改革开放之后，中共政治中各个政治区块的利益，要求这些区块锁住人民，不发动群众政治；通过宣传机构的行政压力，迫使各区块表态认同中央的路线，通过纪检来剥夺挑战中央的区块的实际利益，迫使其让步，并将其收服；通过政法委施压，保证区块和中央一起维持社会控制。

然而，这个政治结构本身就存在不稳定性。首先，阶级社会的竞争会导致新的政治矛盾，引发各种政治观念以及代表各自阶级利益的政治团体的出现。阶级、利益集团和政治区块彼此并不重合，其互相拉扯必然会形成各种政治摩擦。这就迫使中共不断地将新的阶级势力整合到已有的区块之中，诸如全国工商联不断吸纳企业主，政协不断安排一些新的界别，等等。其次，不同的政治区块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不断互相挤压，迫使中央不断调停。再次，纪检、政法委和宣传机构的行政实体化，不合规范地扩大了政府结构，加大财政压力不说，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对财经官员主导政府发展道路的挑战，虽然纪检、政法委和宣传机构的功能事实上是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基本宗旨确立的。

年轻人胡锦涛接过了这个摊子，他出身于已经没落的传统士商特权精英家庭，成长在红旗下，被选拔为新的社会主义的特权精英的储备干部。“文革”打断了他的道路，直到所谓“拨乱反正”，他被作为稀缺的干部资源，一路提拔。“文革”可以简单概括为“当权的被打倒，造反的被镇压”。一般来说，特权精英在享有特权的同时，需要担负起执行社会伦理的责任。打掉特权精英，也就意味着打垮了基本的规范，让民众不再有所敬畏。另一方面，造反派也被反复镇压，长期陷入各种斗争流血之中。中共政治的斗争逻辑实际上变成了全社会的法则。中国人在均质化之后，又迅速个体化，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超乎寻常。

对胡而言，他有序的记忆是社会主义等级制度之下的和睦，党员雷锋化，干部焦裕禄化，人民则是库尔班大叔的形象。他无序的记忆是“文革”中那些不堪回首的恶斗。当他面临江所留下的极不稳定的政治结构的时候，他的手法是重塑中共的纪律，亦即“科学发展观”。科学在共产主义的话语体系里有着极其复杂的政治含义。共产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科学，布尔什维克进一步把这种科学世俗化，也就是党的纪律、党的组织，中共再加上一个党的品德。综合而言，党是一个既有严密纪律、又有道德要求的组织。胡对于全面协调非常在意，他需要彻底整合党，这就意味着纪检、宣传、政法系统的作用必然加强。同时，对于接受了现代化理论的中共而言（必须指出，现代化发展理论是中共改革时代实际的理论源泉，其关联性可以通过“发展型国家 the developmental state”的概念来分析，这里暂时不展开了），科学发展又意味着专业性的加强，需要技术官僚占主体地位。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的组合，党务官僚和政务官僚双双需要加强，奇特地捆绑到一起。而胡又得到了两个特别的机会来贯彻“科学发展观”，这就是“非典”和汶川大地震。

“非典”和汶川大地震都是非常事件，而且都有政治区块的利益牵涉其中。胡的办法就是让党务机构执行技术官僚的方案，同时运用政治区块的党组织来贯彻中央意志。党员干部冲在前头，集中调动一切资源，频繁暂停和干涉日常社会生活，这些已经多年不用的政治动员手段开始复活，但是动员对象是党员而非群众。结果导致党务机构进一步实体化，甚至也技术官僚化。在某种程度上，胡完成了奥威尔在《1984》中所谓的全能的技术官僚化的作用，但这仅仅是表面和局部的。胡执政十年，中共政治区块之间的冲撞是真正的主要问题。

我之前做过政治区块的分析，之所以用政治区块一词，其实也是为了方便。中共搭建的政治体制，其组成部分非常复杂，很难逐一分解。这些政治区块虽然类似朋党，但是和朋党单纯依靠人际关系并不一样，和利益集团仅仅依赖利益结盟也不一致，更不同于阶级政治中的阶级代表。首先，胡温政权就遭遇到了陈良宇的强力挑战。胡并不像江那样，能够从上而下来一次

全面打击，他的手段更像办公室政治，按照江既定的规矩，快速办完。

比陈良宇的挑战更严峻的是薄熙来的挑战，这显示了胡本身路线的矛盾。胡希望重建党的组织特性和道德特性，从而重建特权精英群体。但是，这些特权精英群体在阶级化的社会中会主动运用阶级的政治力量。江推动的改革导致大规模下岗，事实上重塑了国企这一政治板块，造成了新的阶级群体，复活了政治意义上的毛主义。这被薄熙来直接用来树立自己在政治理念上的合法性——注意，仅仅是理念，而非组织行动。这对胡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代表了“科学发展观”路线的实际破产。温则直接遭遇到了国企政治区块的挑战，这一政治区块并不理睬中央的产业政策，而是热衷于扩大自己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作用，实现本身的利益最大化。我们从过去十年的经济转型可以发现，中国能够执行经济战略、甚至实行产业政策的，主要是私企。这一尴尬的结果，说明了胡温努力的失败。未来中国也将因为这一失败而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局面。

习李的麻烦

当今年3月胡离开政坛的时候，全场鞠躬拜谢。中共完成了第二次政权的和平交班。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个职务合体，成为一个基本制度。江泽民说在他之前，这三个职务是分开的，在他之后，三个职务合一，“实践证明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是稳妥的，也是合适的”。不同于毛的卡里斯马领袖集权，也不同于邓时代的大佬协商集权，江开创的这种集权方式是党内派系承认的，有着法理意义上的承认。但是这种法理意义更像是西欧封建政治中的国王推选，政治区块的同意，意味着国王在上任之后也需要认可区块利益。习近平登上了舞台，获得了承认，也要接受政治区块的利益格局。

陈希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死去，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一政治体系从他倒台时开始形成，历经三代，越来越紧密，但是不平衡也越来越严重。继承了江对中共政治的改造，也接受了胡对党重新整合的失败。他接手时，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阶级分化越来越严重，特权精英和普通精英矛盾越来越大；政治局面也有了巨大变化，区块的挑战能力越来越强，收服成本越来越大。

另一个直接变化则是党政关系。1955年，毛做出了一次重大的政治改革，设立了书记处。毛的原话是“就是要党政不分，一切文件进书记处，一切政令出书记处”。书记处成为事实上的政府，国务院仅仅作为政府秘书处存在，各个部委实际相当于司局。这一集权的政治模式在邓时代被打破。政府的独立性加强，特别是在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之后，政府权力得到了极大扩张，总书记、军委主席实际上也政治机构化。这使得中共不得不在三位一体的最高领导之外，还要设置一个具有相当权能的总理，以维持区块平衡。李的双权威位置，基本已经形成了。可以说，过去是领导人在党内的位置决定了其权威，现在则是其本身的职务决定了其权威。这是无论江还是胡都必须承认的现实，也是“发展型国家”的必然结果。

中国遵循东亚各国的“发展型国家”道路，技术官僚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导权。“六四”之后，技术官员的忠诚被各方所认可。事实上，姚依林等保守派就发现技术官僚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只要你能充分支持他，就一定能得到他们充分的支持。姚依林、李鹏很早就开始发展自己的技术官僚体系，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技术专家，这就保证了“六四”之后“发展型国家”的路线得到保护并且加强。到了朱镕基时代，这种主导权从“被赋”转变为完全自主形成，政府权力大大扩张。部委已经不再是遵守党内纪律，而是更多依照公认的发展原则来行事。

这一结果必然带来中共政治的内部分化和竞争，亦即党务官僚体系和政府体系的竞争。被江胡拿来作为政治整合工具的纪检、宣传和政法委三个党内政治区块，自身也有其理性和技

术化的发展进程，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遵守的是党的意识形态原则，而非公认的发展原则，除非发展原则和党的意识形态原则重合，否则就不可能不和政府权力发生冲突。这种情况已经颇为普遍，技术化水平最高的金融系统官僚就多次直接在公开场合和党务系统官僚发生交锋。

更深层次的分裂发生在特权精英和阶级精英之间。邓小平虽然在客观上恢复了特权精英的地位，但是从来不愿意彻底恢复特权精英。江泽民让渡和承认政治区块的利益，这种让渡和承认扩大了特权精英的利益，但并不等于对其特权地位的承认。他的调整导致了一种特殊情况的出现。政治区块实际上按照阶级竞争的法则，运用本身的优势来获利。这些区块中的特权精英接受和熟悉的实际上是竞争的法则，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成特权精英，而是当成一般民众看，以最基本的资本主义竞争原则来行事。对于特权精英而言，这是正常的，但是对阶级化的社会而言，这是无耻的。阶级化的社会必然是同质化的，对于公平的要求远远高于等级社会，对于特殊化本身就不能容忍。

到了胡时代，“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相应恢复了对特权精英的承认。同时胡也要求特权精英按照党的群众政治伦理行事，统一在党的旗帜下。但是，薄熙来的挑战表明了这一策略的破产，特权精英更愿意选择与阶级社会结合，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对党的伦理做自我解释，而非其他。而特权精英的这种路径选择，也会造成阶级精英各自的选择和结盟，反而更加冲击了政体本身的稳定。

“六四”之后，群众政治被彻底清除，阶级没有政党来代表，利益集团又没有相关的政策压力施展手段，官方的办法是将各种力量压服或者整合到政治区块之中去。这就给了政治区块以极大的寻租机会，以国企改革为例，在议会政治中，应该是不同政党谈判，各种社会运动的压力释放。但是在中国就成了各个区块之间的谈判，特权精英和阶级精英的冲突和媾和。这种寻租政治的结果就是区块可能反过来勒索中央。同时政治区块领导人有意无意地保持自己区块内的多阶层精英重叠性，保持利益集团的交叠性，从而保证自己的发展能力，同时也保持勒索能力。

不管李自身能否同舟共济，毫无疑问，他们都必须面对分裂的社会和矛盾不断加剧的政治结构。的选择是以民族复兴的基本旗号来整合协同党内各个政治区块，实现党的意识形态和政府行为原则的一致。但是这个口号的诠释权可能更多地依从于诠释机构，未必就能实现政治的整合。薄所开创的道路，事实上说明了政治区块可以通过跟阶级合作，成为更有力的政治挑战者。随着阶级矛盾的加剧。政治区块很可能不由自主地被阶级政治所驱动，这种风险正越来越大。

“左右不是人”的知识界

观察中国政治必须要观察知识人群体，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陈希同的死总会让人想起“六四”，对“六四”可以有多种解读。前文论述中共的群众政治，是其中之一。从中国的历史特性来看，“六四”也是中国士人政治的结束。

中国古代有过贵族等级，后来演化为士大夫阶级，知识人群体至少目前在主观上自视为这一阶级的继承者。我前面提过，前现代和现代政治的区别，可以简化为等级社会和阶级社会的区别。等级社会政治统治的核心是特权精英群体，其在先验意义上被认定为精英，诸如西方的贵族、日本的武士、阿拉伯的教士和部落贵族，以及中国的士大夫——虽然士大夫需要通过科举来确定身份，但是科举完全是文化导向的选取，所注重的是儒家意识形态，而非其他。

如果对传统的等级划定做个区别的话，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武功取胜，因为武功获得土地，而被划分为贵族，西欧和日本皆是如此。第二种是文化取胜，以文化划定等级，这

是中国方式。士大夫在政治上并没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其地位是依附皇权的。但是因为占据文化评定的地位，因此士大夫有对政治陟罚臧否的特权，其绳度则是儒家伦理。

近代以来，随着传统中国全面失败，士人群体也彻底失败了。近代的知识分子、显士达人是由士人群体分化演变出来的。由于历史的继承，虽然历经革命颠覆，但是依旧维持着特权精英的身份，毛建国的时候，对于这一群体就特别笼络。到了“反右”的时候，党政社会主义伦理与士人伦理发生了冲突，从此这一群体被打击并边缘化，在“文革”中完全被打倒，最后完全失去了特权精英的身份。

“文革”把儒家伦理和社会主义伦理都消灭得干干净净。从此中国人彻底同质化了，谁都不能比谁更有资格来陟罚臧否，利益和实力是基本的衡量标准，这一点即使是在标榜道德高地的“文革”期间也是如此。王绍光的杰作《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对此有过精彩的分析，此不赘述。没人再把士人当回事了。作家王朔曾经说，毛最大的贡献就是彻底灭掉了士，你们这批人瞎唧唧歪歪什么，谁比谁高？这其实是国民心理的充分体现。

“文革”结束之后，邓在恢复党政社会主义特权精英身份的同时，也给了一知识分子一定的安抚。但是从本质上而言，邓并不喜欢特权精英群体，因为他缺乏驾驭能力，相对而言他更喜欢技术官僚。而在这个时代，事实上中国人已经彻底变化了，不再是原来定义上的“人”。很简单，人的定义来自于社会，社会结构彻底变化了，人也就变了。

但是，对于知识群体而言，上世纪 80 年代，他们还没有变。仍然首先将自己定位为启蒙者，实际上仍然是将自己定义为伦理掌握者和陟罚臧否者。虽然标榜自由主义，但是他们的自由主义不是现代法理统治的自由主义。而是先验化的意识形态结构的自由主义。原则是绝对崇高的，掌握原则的人也是绝对崇高。知识分子经济上不如个体户，这是断然不能容忍的。再加上知识群体在党权结构下的不得志，直接刺激了知识群体鼓动街头抗议。胡耀邦作为党政社会主义特权精英并不是很有根基，军功和资历都不够深，他对知识群体特殊优待，他的死就成为了导火索。对此赵鼎新在《天安门的力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六四”结束之后，知识群体一度是认为要有平反的，但是很快就发现民众更多热衷于发财，对其经历的政治苦难丝毫没有反应。事实上 90 年代全民经商，彻底贯彻了“谁能发财谁就是爷”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之后，再度在社会上被边缘化，于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分裂。

迄今为止，论者一般对知识分子是按照“左”“右”划分，似乎一派固守自己的启蒙原则，另一派则发生了变化，更希望和政权打交道。这种分类既肤浅，又不符合现实。对于知识群体的分裂应该从社会大背景来看。固守启蒙，事实上就是固守着传统特权精英的身份。90 年代大众文化商品泛滥之后，传统特权精英的身份及其文化背景，作为一种消费品被广泛消费，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传播。这是这类知识分子得以存活的社会基础。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认同法理化的政权，反对专制统治，反对依仗党政特权精英，但是在其自我定位上，仍然将自己视为类似于传统士人群体的文化特权精英，这既是现实需要，也是群体认同的需要。但是，对于建立法理化政权的接受，并不等同于对这类知识群体的接受。事实上无论是掌权的特权精英还是专业精英（在社会竞争中以专业技能获取优势地位的人）都不会将其视为唯一诠释者，而是仅仅作为自己合作者或者可支配者。

另一个群体，基本上放弃了启蒙原则，因为事实上市场容纳有限，而且并不被广泛接受。所谓中国“新左派”，大多数是留学背景，通常说他们接受了国际新左派思想的影响。这其实并不正确，至多适用于其中一小部分人，而大部分人在海外适逢上世纪 80、90 年代保守主义复兴的时代，更多是接受保守主义的影响，接受西方现代精英统治论的思维，而非 60 年代左翼思想的思维。他们更多是承认目前中国的政治现状，更希望能在既定框架下确立现代化的统治。但

是当今中国的政治结构显然缺乏认受度较高，合法性较高的统治精英群体。于是其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是巩固特权精英的地位，助长恢复等级制度。这自然不可能见容于已经阶级化的当代中国社会。

所以说，当代中国知识群体“左右不是人”。倡导法理化社会的知识群体，本身依旧自视为传统的文化特权精英，其理念虽然为阶级社会所接收，但是群体不被认同。倡导精英统治论思维的知识群体，自己不是统治群体，也没有统治精英可以服务，更不见容于阶级社会。

虚弱的利维坦

陈希同这一代人是中共最后的法定革命者，他们被定性为参加革命，而非参加工作。在“六四”中，他们成为镇压者，成为街头政治（后来利用其投机的人更愿意定义为革命）的斗争对象。马克思曾经总结说，征服者被征服是世界史的惯常现象。革命者的被革命其实也是世界现代史的一个惯常现象，造成这一窘境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就根本而言，可以总结为两条，第一，中国传统政治的革命逻辑依旧存在，第二，现代国家依旧没有建立，统治者仍然有着非法的特权地位，是被革命的对象。这看起来似乎一回事，但是其内在政治逻辑完全不同。

有人类，就有了政治生活，其核心的就是统治与被统治。这一点古今不变，或者只要人类存在就不会变。如果说统治是政治的内涵，那么统治关系的确认方式就是政治的根本内容。这一点也是古代和现代的根本区别。中国传统政治虽然非常特殊，特殊到福山将其称为第一个现代社会。但是其统治的确定方式其实和大多数古代社会没有区别。统治者是典型的特权精英，由获得了伦理解释权和终极权威的特殊群体成为统治者。的确，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体系、建国方式都有很强的现代因素，但是这些统治技术本身并没有成为一个核心的统治逻辑，根本逻辑依旧是通过带有先验色彩的伦理刚性确定的等级结构。士大夫作为特权精英的核心群体，掌握了伦理实践的陟罚臧否的权力，可以判断政权是否失德，亦即所谓的政权正当性判断。在特定的时机，统治者的统治技术能力不够，造成政治失控，又没有了伦理正当性支持，就会有所谓的天命转移。“六四”带有强烈的士人政治色彩，是其最后的余声，依然具备传统政治的革命逻辑。

但是对于正在迈向现代政治的中国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真正的大问题是第二个，现代国家尚未建立，一个足够自立的利维坦尚未建立起来。对于现代政治而言，从霍布斯到托克维尔都非常清楚地说明，平等化是一个基本的标志。所谓自然状态的人，抹平了人的基本差别，按照后天的竞争法则，通过能力比较界定精英群体，继而确认统治关系。这里的统治不再与先验的规则相关，而是与经验的认受性相关。一般而言，所谓政治成熟的国家，就是有一个明确的统治精英阶级，这个阶级纵向横向都和社会各个阶级有直接联系，其政治统治地位通过一定的机制（最广泛的就是议会民主）来确定。而精英身份的获取是依靠在放大的市场竞争规则中胜出。这就是福山所总结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两个普遍性的规范。统治群体的转型本身也有两种经典范式。第一种，也是被各方所称赞的，传统的特权精英主动放弃特殊化，带动政治转型，转变成现代统治精英。第二种，传统的特权精英没能实现转型，被现代新兴精英打垮乃至消灭，后者成为统治精英。但是这两种范式又各有其变化，第一种有两种变化，其一，传统特权精英实现了向统治精英的过渡，自己变成了现代精英群体，然后消灭了特权身份，其二，特权精英依旧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特权身份，这种特权身份形成稳定的新的政治符号，被纳入该国的政治规范之中。第二种转型也有两种变化，其一，特权精英被消灭之后，现代精英群体建立了新的政治统治，实现了统治关系确定方式的变革，其二，消灭特权者本身再次成为特权精英，实际上往回走，在一定程度上复活被其打倒的政治统治关系确定方式。这种情况下还有变化，

但是本文就不再继续往下推演。客观地说，在现代政治中，第二种转型方式的第二种结果是最为普遍的，或者说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也是中国目前最集中的问题。

再回顾一下中国近现代政治变化的过程，首先要对传统中国再做一个定位。传统中国除了统治关系的确认方式缺乏现代特征以外，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形成了一套自我中心的政治体系，排除国家间竞争。一般而言，中国朝代建立，首先就是要有武功，前期要做到四夷宾服，周边的政治实体，在军事上被打败，然后被朝廷授 政治身份，如此建立起一套以中华为中心的政治体系。这其实也是个国家间的利维坦体系，主要目的是排除竞争。

1840年，天朝崩溃了，这一崩溃本身不仅导致了国家间体系的破坏，而且直接影响到了王朝的内部统治。很快中国被迫向更有效率的现代政治转型。但是这个转型失败了。首先是清王朝的瓦解，接着出现了各地传统精英的割据，在北洋军阀这个脱胎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军事政治集团掌权的十年间，整个统治失序，无法实现整合以对抗各种挑战。与之相反，严格现代组织模式的政党政治开始出现，并且依赖较少的资源基础形成组织体系。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非常严密的政党政治。效率成为其基本的政治目标，这彻底改变了传统政治的导向。两党重建秩序都比北洋军阀快而稳定。中国政治很快就变成了国共之争，组织动员半径远远低于国民党的共产党成为最后的胜出者。

1949年，中共联合反国民党的各个政治力量，开始建国。从当时情况来看，中共党政精英群体，准备联合传统的特权精英建立一个“大联盟”政治，其基本方向可以称为结盟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政治学家Arend Lijphart总结这种模式是多元化社会中经常出现的政治模式。当时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多元的等级社会，中共虽然是最大的政治派系，但是传统特权精英仍然占据较大的话语权。中共作为全能性的政党，自然会和传统特权精英发生冲突，而作为领袖的毛，和中共本身的特权干部也有直接的冲突。这两组政治冲突也是建国前三十年政治的主要冲突。最终在“文革”彻底化，传统特权精英被摧毁，这又直接影响了改革开放时代，这在前面曾经反复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客观上说，1989年之后，中共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这种困难。要想维持现政权，就必须重建利维坦。这包含了三重内容，首先是承认党政结构中各组成单位的实际利益，并允许其追求利益，使这些单位成为政治区块。李侃如等人曾经称其为“碎片化威权”，所谓政治“碎片”就是我所说的政治区块，从地方到央企，从纵向的组织系统到横向的政治派系，各个区块互相联系，自我壮大，从而间接实现了党权结构的壮大。其次，确立了纪检、宣传、政法委三种组织机制来进行政权整合，剔除群众政治，路线斗争宫廷化。第三，政权结构改革，1955年，中共曾经确立党政不分的“大中央、小政府”的体系。书记处成为核心权力机构，国务院成为办事机构。这一模式在1992年之后被彻底打破。对建设发展型国家而言，专业化成为核心内容，技术官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技术官员的主导下，形成了一整套技术流程。这种结构变化确立了一套新的国家运行机制，大大提高了中共政治统合能力，增强了国家能力。

但是，这种调整只是统治方式的调整，统治关系的确认方式依旧是个重大问题。政治统治的实现大概有这样几种类型，第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得到确认，这种确认关系通过一种确认机制不断再生产，统治精英内部因此得到整合。第二种，统治精英内部建立高水平的自我认同度，迫使被统治者屈从统治。第三种，统治精英本身无法整合，最终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可能的结果也有两种，通常的一种情况，自我认同度高的群体迅速打垮挑战者，并且强化自己的统治能力。这时候他们一般选择固化自我认同，确定统治确认机制，迫使被统治者接受。另一种，则是双方谁也战胜不了谁，最后陷入长期的动荡，即使出现政治强人，也无法得到全面授权，不能解决政治问题。

这里我使用统治集团这个词，以区分统治精英。统治精英将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的词汇，

专指带有现代政治统治关系的内容。前面指出，中国目前的有两种特权精英，一种是党政特权精英，其获取精英身份完全是因为党的特殊执政地位。一种是传统的特权精英，其主要身份是文化等级，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划定身份的标志。前者强势，后者处于边缘依附状态，“左右不是人”。除了这两种从建国时期的等级制度下产生的精英群体及其继承者，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后，因应阶级社会的基本逻辑，又形成了两种精英，一种是专业精英，一种是胜出精英。前面我也说过了，阶级社会是竞争关系，而中国社会的竞争规则又基本上是中共的“全输全赢”政治逻辑，不同于一般的零和博弈，这种博弈经常出现负和的局面，因为零和博弈参与者仅仅负有限责任，而在“全输全赢”逻辑中，参与者要负无限责任，我活的前提是你必须得死。竞争是所有人都认同的，即使特权精英也是把自己当作竞争者来看的。真正在竞争中产生的这两种精英，专业精英参与的是中国各种竞争中唯一可能有正和结果的竞争，因为通过专业考核比拼，双方毕竟有了专业水平的提高，这是竞争内容所决定的。相反，胜出精英则完全体现了“全输全赢”的博弈规则，是最为残酷的一群人。

在这四组精英之中，传统特权精英是最边缘化的群体，仅仅是被召唤使用的群体，目前网络上许多大V就属于这类人，他们活动的场域是公共舆论。但是作为东亚国家，中国缺乏西方国家以公共舆论决定政治方向的范式，加之阶级社会对通过文化符号来确定等级身份有高度的警惕，所以这组群体可以暂时搁置。剩下三组之中，党政特权精英、专业精英和胜出精英往往会形成合作局面，但是各自的诉求完全不同。党政特权精英寄望于加强深化党权结构；胜出精英则希望重新订立规则，确保自己不会在新的竞争中全部输掉；而专业精英更多希望专业知识成为主导力量。因为阶级社会的状况，每个参与者都以平等的身份来确定各方位置，天然没差别，这种合作不再是过去的“支配—依附”关系，而是“主导—合作”关系。“谁压倒谁”就成为关键问题。由于这种合作关系事实上又依赖于政治区块的参与。利益集团、派系都没有得到承认的政治身份，惟有在政治区块之中，才能得到承认，这事实上造成了一种等级化的政治，不可能得到精英群体的普遍认同。

同时，对党政体系而言，一旦承认你是区块，就意味着对你要负责到底。你所有的利益诉求都要一定程度的满足，对你负无限责任。这就更加造成了体系的刚性和严格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利维坦就非常强大，如果是一个利维坦，一定是有界限的，责任都是有限的，其着眼点是国家的强大，而非是政治统治内在和谐程度。而对中共重新搭建的这个利维坦而言，政治统治内的和谐则成了极端重要的内容。

对于掌握权力的精英群体而言，必须要洗去各自身上的特殊性，成为普遍化的统治精英。如果要做到这一点，至少要具备两个规范性，亦即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的两大制度规范——有一个明确的统治精英阶级，这个阶级纵向横向都和社会各个阶级有直接联系，其政治统治地位通过一定的机制（最广泛的就是议会民主）来确定。而精英身份的获取是依靠在放大的市场竞争规则中胜出。更深层次上，这其实是阶级社会状态下普遍的政治行为规范。“全输全赢”的规则要变化成有限责任的零和或者正和博弈，政治区块也必须成为一个独立负责的政治参与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将政治竞争的活力释放出来。这种竞争关系可以进而制造一种统治确认的机制。其实民主最为稳定的时候，就是在统治实际确定之后的认可。如果在统治存在危机的情况下，希望由民主来支持统治，基本上只能失败。对于中共而言，利维坦之所以虚弱，不是因为缺乏强力，而是因为无尽的刚性责任体系，使它很难维持。■

经济篇

资本观察

观察当今中国资本因素的若干关键角度

作者：唐啸聚

虽然资本因素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影响力都不容小觑，但是在当今中国，其影响力却尤为强烈。原因在于，首先，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投资驱动，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转变为消费驱动，这是林毅夫最近一直强调的观点——也就是说，资本品的生产远比消费品的生产更重要，在国民收入中占比更高。其二，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分层，主要来自资产收入（诸如房产、股票等等）的差异，而非工资差距。其三，在地方政府以GDP为政绩目标，而劳工阶层又缺乏动员能力和话语权的情况下，资本对于劳动几乎拥有独占的定价权。其四，由于政治系统缺乏足够的稳定和制衡机制，权力资本化成为几乎每个当权者必然的理性选择，“权贵资本主义”、“拉美化”也因此成为描述和预测当今中国社会的常用术语。

对于当今中国资本因素的观察、分析和预测，早已成为一项产业，许多大学、智库、投行和媒体人士都以此谋生。但是，不少报告、文章充斥着晦涩的行话、跳跃的逻辑和似是而非的宏大叙事，它们呈现的图景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要想读懂这些报告、文章，并且能够分辨出哪些确实有真知灼见，哪些只是滥竽充数，就先要了解观察当今中国资本因素的若干关键角度。本文拟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以阐述。

上篇 国内因素

一、两类政府，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自从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央政府掌握了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大多数公共产品的支出

责任却仍然由地方政府负担，因此导致地方政府预算内的财政入不敷出，这一缺口在现行制度框架内主要通过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来填补。但事实上，地方政府几乎无不通过卖地等预算外收入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现行制度下，中央政府有权直接在债市发行债券，而地方政府除了少数特例之外，无权直接发债，也无权直接向银行借贷。

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长期以 GDP 为指标。

中国不存在地方政府破产机制，地方政府的亏空，最后总能得到中央政府的救助。

二、四类资本，即国有垄断资本、权贵资本、海外资本、民营资本。

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而言，似乎没有必要把权贵资本单独拎出来作为一个类别，这样处理是出于社会学的考虑，即“权贵”和“民”属于两类人群，不容混淆。

国有垄断资本包含了“国有”和“垄断”两个特征，这来自政府以国有企业控制战略性产业的政策，国有资本在国有企业中处于控股地位。这些战略性产业或是本身就具有自然垄断特性，或是政府为了做大做强，故意造成垄断。国有企业的目标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还包括了保证政府对相关产业的战略控制，以及维持就业水平，后两项目标常常更重要。

国有垄断资本在战略性产业的主导地位，造成了两个重要后果。

一是要素价格市场化不足。所谓要素价格，包括土地、水、电、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价格，也包括资金的价格——利率。人为压低这些价格，可以保证国有企业在低效状态下的生存，但是也助长了各类资源的低效开发和对环境的戕害。而对贷款利率的人为压低，更是导致当今中国诸多金融和经济问题的根源。

二是市场准入壁垒。国有垄断资本和权贵资本基本畅行无阻，海外资本也往往顺风顺水，只有民营资本容易遭受歧视。

三、一类平台，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是市属国有企业，旨在从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在现实中常常投入房地产投资。由于地方政府无权直接发债或借贷，因此平台可以代替地方政府从银行、股市或债市融资，地方政府提供担保，且经常以土地作为抵押物。

由于不存在地方政府破产机制，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绕开《预算法》，从事不负责任的财政行为，而不用担心受到惩罚。银行，尤其是规模较小的本地银行，也乐于向平台提供贷款。

在 GDP 为指标的政绩导向下，对于任何一届地方官员来说，在其任期内都是负债越多发展越快，也越容易升官。

四、两类货币，即央行基础货币和社会融资总量。

社会融资总量是一个比常见的 M2 范围更广的概念，是各个经济体通过“支付承诺”所创造的信用货币量的总和，包括各种票据工具、理财产品、融资形式等等。央行可以直接控制基础货币量，进而间接控制社会融资总量。社会融资总量和基础货币之间的比率称为杠杆。

一般认为，如果杠杆过高，央行就应该抽紧基础货币，使金融体系去杠杆。但这不是绝对的，要看实体经济，有可能高杠杆是因为实体经济需要大量信用货币，而央行创造的基础货币不敷使用，在此情况下就需要追加基础货币。而即使是在有必要去杠杆的情况下，如果央行抽

紧基础货币的幅度过大，也有可能造成通货紧缩和经济硬着陆。

五、两类渠道，即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影子银行）。

中国的正规金融长期出于金融压抑状态，直接融资的股市至今未能发展成熟，就是明显例证。不仅如此，间接融资的银行系统也偏向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这迫使民营资本另辟融资渠道，影子银行应运而生，是资金逐利特征的自然演化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体系的不足。

但是，只要利率尚未充分市场化，任何金融产品的定价都是扭曲的。过多的资金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只能使杠杆越来越高，风险越积越多。尤其是在资产泡沫的环境下，影子银行会剧烈放大泡沫风险的传染度。一个例证就是，温州民营资本将大量从影子银行借来的钱投入房地产，2011年资金链断裂，导致很多老板“跑路”。

六、三类泡沫，即房地产泡沫、基础设施泡沫和产能过剩。

房地产价格高涨直接影响民生，但是一旦房价剧烈下跌，也会引起连锁反应。2010年以来，政府已经试图给其降温，开发商几乎不可能从银行得到贷款，但是影子银行依然为开发商提供了大量资金。

后两类泡沫相对复杂，在项目建设初期，有可能大量吸收信贷，造成资金黑洞。但是到了资金难以为继，需要“挤泡沫”的时候，又往往会导致资产价值的低估，给权贵资本营造空手套白狼的机会。

下篇 国际因素

一、外汇占款与汇率制度互相掣肘。

伴随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央行也向市场上投放了相当数额的外汇占款。外汇占款是中国基础货币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货币乘数作用会产生数倍的货币扩张能力，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引发通胀风险。与央行主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同，外汇占款的投放完全是央行的被动行为。外汇占款的增加将会掣肘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限制货币政策操作空间。

通常，外商直接投资、贸易顺差以及国际热钱流入是一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但是中国外汇储备还有一个特殊的来源，即对汇率的干预。巨额的外汇储备形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中国又长期贯彻“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为了稳定汇率，避免人民币过快升值，中国央行不得不干预外汇市场，即买入美元，卖出人民币，从而增加了外汇占款。

一方面，外汇占款增加形成通胀压力，人民币趋于对内贬值。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增加说明国外对人民币的需求上升，人民币趋于对外升值。随着这一矛盾日益突出，人民币升值问题成为国内外各界人士争论的焦点。不过，2011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增幅明显减缓。今年6月，随着大量资本外流，人民币升值步伐戛然而止，转为小幅震荡，国内银行业普遍出现“钱荒”。

汇率与外汇占款的相互掣肘表明，均衡的汇率水平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任何人为的干预都只能解决一时之渴。合理的做法是在控制汇率放开的风险过程中，逐步减少人为干预。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因素。

目前，中国将进出口贸易结算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试图在进口环节上让人民币有序流出，增加境外人民币存量，从而为人民币在更广泛的国际市场上实现国际化创造初始条件。但是，很多外商持有人民币，并不是为了将其作为一种结算货币，而是出于投机套利的目的，因而人民币很难按照预想的贸易进出口路径继续在国际市场上流转。

资本账户管制也构成了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限制。资本项目自由化和本币一定程度的可自由兑换，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在不可完全兑换的情况下，人民币还远非境外持有者的“便利”货币，也很难被国外居民和非居民广泛接受，这也是外商只是出于套利目的而持有人民币的一大原因。

事实上，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不能快于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当前中国的紧要任务仍然是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否则，大规模资金的流入流出不仅会加剧汇率的波动，也会冲击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中国的 M2 与 GDP 之比一直居高不下，如果此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会方便资本外逃，徒增监管困难。

三、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外逃。

根据“三元悖论”，在[人民币汇率](#)不能随外汇市场供求关系迅速调整的情况下，中国要想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保证国内金融稳定，资本管制仍是最后一道防线。目前只要汇率还无法完全自由浮动，资本项目就难以快速开放。汇率水平不仅仅是由贸易双方的供求决定的，还受资本套息者的影响，并且投机者还会对汇率本身进行投机。因此，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大量短期资本自由出入，必然会造成汇率剧烈波动。届时央行很可能会因无法承受干预外汇市场的成本，而不得不放弃稳定汇率。这种被动放弃，与主动的汇率市场化改革结果有着天壤之别。

就当前中国的国情而言，防止资本外逃要比防止热钱流入更重要。近年来，“裸官”现象日益突出，说灰色收入正在向国外转移，一些国有资产也通过隐蔽的非法形式被转移到国外。中国经济尚处于投资推动阶段，大量的资本外逃会减少国内的资本存量，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央行为了对冲大规模资本外逃对汇率的冲击而损失的外汇储备，实质上也是国民财富的流失。■

阶级篇

新工人观察

关于罢工（外一篇）

作者：巩高兴

在中国大陆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或工厂里，资本方一直在推出各种单方面的措施，损害劳动者的利益，以求自身利润最大化。因为在企业内部，财力雄厚的资方是以组织化的形式面对散沙式的穷苦工人。而且，这是个资本稀缺的时代，更因为政府是以不负责任或不公正的仲裁者形象出现。而在资方或经理阶层眼里工人 懒是对其利益最大的威胁，所以他们想出了计件制、计时定量制、安装摄像头、现场管理的监督、部门外部管理者的不定时巡视、入厕的定次定时规定（我所在的港资厂）。前些天在 QQ 空间看到一个高考后进入工厂打暑假工的女子感慨说：工厂管得比高考都严，再也不会进工厂了。以上所举的我知道的严密监控措施，使工人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损害资本的利益。

资方或经理层推出的损害工人利益的举措并不一定会引起劳资纠纷，这要视措施对劳方利益损害的大小，以及面对的是工人阶层中的哪些群体。比如，一定时间内要求增加产量，报酬却不变或减少，年龄大的工人会选择忍受，一来因为工厂招工有年龄限制，过了四十岁很难找到工作，二来他们等着资方解除合同以获取工龄补偿。女性手巧温顺，可使产量提高并减少管理成本，而年轻男工人会采取离职式的消极反抗措施。技术工人则会选择去找管理层谈判，他们在工厂是收入较高的群体，有利益的牵绊，不会作出离开或罢工的两极化的举动。在西欧工业化时期，激进的共产党的基本盘是体力工人与非熟练工，而社会党的基本盘则是技术工人与熟练工。

而当资方推出的措施极大地损害了工人利益时，因性别或有无组织，将出现不同的反应。不过，工人们多不会选择走漫长繁琐的法律程序。如我所在的港资厂，有一年违背了对大家的承诺，各个部门的员工都有怨言，但只有以男性员工为主的金属部出现了罢工。但如多数罢工一样，活动一天之内就被瓦解，厂方报警，态度激进的工人被公安带走，资方在主要以维稳为

考量的政府的压力下，兑现了被自己破坏的承诺，事后态度激烈者付清工资后被解雇。少数人反抗并利益受损，但使多数人获益。多数的罢工是以上述模式展开并结束的。

还有一种罢工，因工人有组织性，且资方态度强硬，而使罢工活动发展到了厂外。如我在微博上持续观察的因工厂搬迁、老工人要求工龄补偿而引发的纠纷中，持实用主义态度的罢工组织者四面出击，先是阻止设备搬迁并向政府投诉，他们也运用微博这个信息传播工具寻求关照与帮助，政府介入后资本没有妥协的表示，失去耐心的工人选择堵路但被警察武力赶回了工厂，之后资方作出的微小让步无法满足工人的诉求，愤怒的他们作出了去市府请愿的行动，但半路被驱赶了回来，最后持续罢工二十多天的工人，被迫接受了不利于己的方案。在类似的工人行动中，他们对政府暴力驱逐作出反抗，因为他们是为了引起政府关注以使之向资方施压的，他们的行动目标是资方而不是政府。由此想到了学者秦晖的一种美好愿望，在《狐狸分饼 双输单赢》一文里，他希望劳资联合面对政府。现实却是当工人面对强势的资本时，会寻求更强势的政府的介入。

在此次事件中，微博上的媒体以及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是沉默的。媒体的态度大家早以为常，热炒官民矛盾，对劳资矛盾选择性失明。至于以社会良心自居的知识人的态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王江松说：“是因为他们的利益曾被以劳工招牌起家的政府极大地损害过。”我想补充说，工作自主性强的他们感受不到资本的压榨，而且他们把资本当作面对政府时的同盟军，也与他们所持的自由市场活动不应被干涉的观念有关。而左翼青年的举动只是网络围观、语言相助。曾以提供法律援助并举办一些法律知识讲座为主要活动的劳工维权组织，现转为疾呼劳资集体谈判制度，他们中间也有人以劳方代理律师的身份出现。现阶段，中国工人的罢工活动是以经济诉求为主，而且是利益被资本损害后的被动反抗，而不是主动提出高于现状的利益诉求，更不要说政治诉求了。■

一个大龄女工人

在这里，我讲述的是在珠三角一间港资工厂工作了很多年的外来工的故事。从他们的生活、工作及言谈中，观察他们对人对事的看法。

她接近五十岁，来自湖北随州，在此间工厂打工已超过了二十年。从一个花季少女，或妙龄少妇，被生活煎熬成一个皱纹上了额头的中年妇女。对农民身份的打工者而言，多数人的身份、职业、收入、社会地位，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她的职业身份在此厂延续了二十年。在这个群体里，更多的人，是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工作中，延续着他们不变的身份、职业和收入。

她虽已在打工地生活了二十多年，但还是一个外地户籍者，以前要办暂住证，现在要办改名后的居住证。工厂也只给她缴纳了十二年的社保。

她的儿子，也已成长为快二十岁的少年了。父母无力管教，被奶奶娇惯的他，初中毕业后，无心无力继续学业，便来到了父母所在的打工地，边玩边工作，两年多后，也成为其他群体口中的“二代农民工”。他还感受不到生活的压力，生活中不仅是月光族，有时花费超过收入，还要向父母伸手要钱。儿子虽已是少年，但她提及时，总喜欢称其为“我小孩”。

她还喜欢向大家提及年青时的感情经历，喜欢的男人去当兵了，足足等待了四年，复员后终于牵手走到了一起。丈夫在部队学会了开车，俩人同来广东后，他一直做着司机的营生。他们辛苦工作，节支攒钱后，谋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老家的两层小洋楼。她今后的生活打算是，十五年的社保期限缴满后，就回老家生活，在家相夫教子。父子俩人买车后，载客谋生。

除了儿子与丈夫，她最看重的就是钱。她的生活压力并不大，平时却拼命加班，一天上十

四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外加一个钟头的吃饭时间，一天有十五小时在工厂度过。这还是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工人境遇有所改变的情况下，之前上班时间更长。不过，那时是被迫，现在更多是情愿。

十几年非人的工作，已使她放弃或无时间与精力去培养兴趣爱好。有一次，她提到之前一个靓女同事辞工后找到了一个有钱人，表情羡慕惊奇。期许委身于男人改变生活境遇，是这个国度很多女人的选择，底层也不例外。

有一次，她得知一同事的妹妹是同间工厂的职员后，不顾及别人的自尊，说：“你妹比你有本事。”在这里也可以对“本事”这个词做一点引申，网络中的言论，把各种不幸归责于制度；而底层把活得“好”与“坏”，归责于有无本事。还有次，她看到一个拿着数码相机的二十多岁的巡查者经过，当时就吓得不敢说话只顾低头工作，过后她感叹到：“你看人家多有本事，那样年轻就做了领导”，恐惧加羡慕。人生人性的多面性。■

社会组织与互联网篇

非官方教会观察

“做山上之城”

——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中改革宗的兴起和信仰公开化

作者：李晋、马丽

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随着民间组织和士绅阶层的消灭，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开始了一个被急剧压缩的过程，造成国家与个人的直接对立。以基督教信仰为例，政府从 50 年代开始就建立起单位制的官方教会，并将神学教育纳入行政控制范围。更多行政条例将宗教聚会限制在官办教堂之内，取缔此外其他场所的宗教聚会。

经济改革之后的三十年内，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逐渐拓展，由公民个体自发组织的民间团体的数量也逐渐上升，尽管行政限制仍未突破。到 2005 年末，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有 31 万个已注册的民间组织。至于未能注册的非正规民间组织远超过此数目的几倍，甚至被估算为约 200 万个。其中一个庞大的非注册群体是参加非官方基督教会的新教徒群体，即号称“家庭教会”的信仰团体。

中国的家庭教会组织出现于 50 年代的对官方“三自”教会运动的不服从，在“文革”时期并未消失殆尽，并在从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开始了一场大复兴，信徒数量和教会组织数目急剧增加。90 年代中期开始，城市阶层的教会也开始急剧增长，并在 2000 年之后出现更多在居民小区或写字楼半公开或公开聚会的城市新兴教会。随着中国越来越多高教育水平人士和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信仰，也因为神学教育的补充，城市非官方教会组织以社会参与和宣教参与的形式，逐渐成为一群拓展社会公共空间秩序的推动者。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家庭教会的存在本身就形成了对 2008 年后恶化的政治制度的挑战，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转为抗议

者，扩展了公共空间。

“家庭教会”身份作为公民不服从运动

自“抗美援朝”期间对于教会的打压和禁止开始，中国社会中唯一具有合法性教会的是“三自”爱国教会。“三自”爱国运动的口号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毛泽东也亲自指示说，“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从此，教会学校被全面接收。在这类官方教会中，政府完全掌握人事任免，甚至监督牧师的宣讲内容，也登记并审查教堂规模和会众数量。反右运动中号召“基督徒都应该积极参与这一场斗争，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明辨是非，站稳立场，树立社会主义思想，批驳右派谬论，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一位“三自”领袖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要把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插在我的脑子里，要赶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恶鬼.....为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尽一份力，发一份光。”

丁光训回忆说：“朝鲜战争爆发，中外资金冻结，差会的补助突然停止，好些宗派领导管理体制运转不灵，甚至瘫痪。各级三自组织不得不开始承担各宗派领导管理部门的某些职能。随着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整个国家越来越强调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这也影响到教会。在不少地方，教会不少工作的实际领导就无可避免地集中到三自组织。这不是三自组织的初衷。但是，就这样，在不少地方，三自从一个高举爱国旗帜和提倡自治自养自传的信徒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变成了处在教会之旁或之上，像教会又不像教会，像政府又不是政府那样的一个教会领导管理部门。”（丁光训《理顺三自组织和教会的关系——在全国粮会常委联席会议上的发言》，《金陵神学志》1989年6月）

到了文革时期，基督教信仰在中国被定为非法，连“三自”教会官方组织也从1966年开始被终止。这种打压性政策一直延续到1979年，官方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决定恢复“三自”教会及其教会基层组织。1980年，出于政治的考虑，又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来重新确立官方教会的合法性。作为独立的信仰团体存在的教会，在50年代官方压缩公共空间的过程中，被迫成为官方建制的一部分。

在“抗美援朝”期间爱国主义高涨的社会背景下，拒绝加入和认信官方“三自”爱国运动主张的传道人、牧师以及教会，被视为与美国勾结的反动个人和组织，后来更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遭到迫害。尽管如此，非官方教会（也曾经被称为“地下教会”）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教会始终存在。大多数信仰团体以一种家庭聚集的方式得到了保留，基督徒家庭多将信仰以一种私密的家庭传统进行传袭，教会成为一种家庭式的建制。在城市中也有以家庭成员的方式进行信仰活动。

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中国非官方教会也开始复苏，许多经历了迫害的传道人被释放，因信仰而被监禁的岁月成为一种深厚的“属灵”经历，吸引多数信徒重新回归到持守信仰生活和拓展教会的使命中。这一期间，中国非官方教会因为其属灵、历史的传统，以及组织活动范围普遍仍被局限于家庭或小范围的好友家庭网络关系之中。之所以维持“家庭教会”的称谓，既是因为聚会场所受限，更是作为一种区别于官方“三自”教会的信仰立场的表达。尽管在家庭范围内传播，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消解了盲目个人崇拜的力量。即使是在浅显教导的基础之上，圣经中独一神的教义成为消解人间绝对权威的根据。

公共空间的压缩和信仰私人化

在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体制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不允许任何独立于官方的组织出现，因此可以看到，在 80 年代后，中国基督徒都是以个人体验为主，而不是以一个团体和教会的身份出现在公共领域。家庭教会的特殊性在于，在“三自”官方教会和政府立场占主导的环境下，它处于一种与公共领域隔离或半隔离的状态，即隔离型教会（Segregated Church）。

在对待三自教会的立场上，绝大多数的家庭教会所秉承的宗旨是以认信基督作为教会的头，因此任何组织、政党和个人不能成为教会的指导领袖，所以家庭教会不认为官方“三自”教会是教会，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政党机构。在对国家政府的看法上，多数家庭教会秉承政教分离的教义，强调教会和政府是相互独立的机构，但是出于《圣经》中顺服掌权者的训诫，对于政府采取尊重的态度。同时，历史和社会环境也对家庭教会的组织形态和教义诠释上产生了特有的影响，塑造了家庭教会的特点，具体来说有几个方面：

第一，在神学立场上，传统的中国家庭教会极少存在教派划分，唯一凸显的是家庭教会区别于“三自”组织的身份认同。强调自身作为家庭教会的组织性身份，是一种不服从的叙述方式。家庭性建制的教会又加强了一种认识，即宗教信仰是属于私人生活领域的，与社会公共领域无关。这种意识是随处可见的，甚至影响到很多教会领袖的教会论神学立场。而教会的社会服务功能退化，

第二，在家庭教会内部，各地方教会普遍以“福音派”这个广泛的划分对于派别进行自我认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害怕被指责为划分派系，结党。此外，这也是海外教会宣教士在中国宣教的一个印记，使中国本土教会在没有经历“宗派”划分的时候，直接进入了“后宗派时代”，被归为“福音派”的这个包容性比较强的大类别中。

第三，因为高压时期基督教基要主义神学（即强调持守基要真理）的功用显著，之后的中国家庭教会中很多继续秉持这一立场，仍旧依靠家庭中的属灵的传承。又因为长期与普世教会传统的割裂，缺乏引入教会历史文献和属灵经典，中国教会停滞于对基要主义神学的持守，而非深入到神学性的反思，致使“反智主义”盛行。大多数带领者不认为基督信仰应该与社会思潮或意识形态对话，往往以对家庭教会身份的认信，作为反对神学性护教的理由。

第四，这种思想上的封闭性，加上组织形式上的封闭性，使一些信仰团体与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脱节，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团体难以抵御新兴宗教的侵入。所以在这个阶段，各种不同于基督教的隐秘性新兴宗教也大大增长。处于秘密聚会阶段的家庭教会往往为魅力型领袖添加一种个人崇拜的色彩，很多缺乏监管机制的团体会形成一言堂的家长制治理模式，也为教会发展带来很大危机。

在这一时期，家庭教会对于社会的影响几乎没有出现在社会公共领域和话语中，而家庭教会也因为其秉持的教义而对于中国社会刻意的进行分离，多数个人信仰只局限于个人，家庭等范围中。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的中国教会史，相比之下会发现，此后的教会已经失去了参与社会的能力和意识。在公共空间被压缩的过程中，教会不得不讲福音使命和社会关怀使命分离，导致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群体，没有在公共事务上留下应有的声音和作为。

从知识分子犬儒化到文化基督徒现象

对“八九”民主运动的镇压，使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共产党试图通过深化经济改革来缓解其镇压民主运动而导致的合法性危机。知识分子开始分化，整个社会重现一种信仰的虚无主义和犬儒化。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寻求自我体验式的宗教——这种宗教参与的特征是个人

主义的，并没有集体和公共领域的活动。

我们在采集口述历史的过程中，发现 1989 年对于城市教会的复兴（或城市知识分子阶层接受基督信仰）来说，是共产主义理想破灭和寻求终极价值的开始。但从社会大环境来看，这之后的中国社会也转向一个物质至上的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时期。

在一时期，刘小枫提出将基督信仰作为个体自由诉求的基础，以基督教的救赎文化作为中国目前道德和社会危机的化解方法，对于许多知识分子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将基督教作为一种个人体验来对抗集体和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在其倡导中，信仰是作为知识分子对其文化和意义的认同，而不是在一个公共领域的身份认同和属灵传承，因此刘小枫等也被称之为“文化基督徒”，与正统基督信仰者进行了区别。

从 90 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开启了对于西方自由市场和民主、平等的讨论。这一时期对于思想界影响最巨的是经济学家杨小凯。他对于基督教宪政与西方民主社会的反思，已经超过了刘小枫个人体悟式的文化层面，从信仰对于一个社会法律制度发展的作用出发，来对中国社会转型进行反思。杨自己作为在“文革”中最著名的保守派红卫兵思想家的身份以及富于传奇色彩的狱中经历，在其晚年从制度和个人经历两个层面对于基督信仰的体认，使得中国知识界的许多人开始对基督教产生了探索。

90 年代初的城市家庭教会，大多以从监狱释放的老传道人为带领者，聚会形式主要是祷告会、查经和交通，但很多教会并没有建制式的主日敬拜，更谈不上其他功能性团契，如门徒培训、家庭团契等等。行政和财务制度也未建立起来。地方教会（Local church）的边界并不明晰所以信徒可以随意换地方聚会，而教会也不强调委身于一个可见的教会组织。但很多教会已经超出了家庭血缘性和亲友的关系圈子，成为社会各阶层信徒聚集的社会群体。而传统的家长制治理或家族制关系模式，也不再适用于这类社会群体，于是出现了“同工团队”的治理模式。与此同时，随着农村到城市移民的大量涌入，农村家庭教会开始差派传道人到城市来牧养并建立农民工教会，此类教会在 90 年代的增长也是惊人的，但并没有系统的数据。

自 90 年代中期开始，城市教会中高学历信徒比例增加。2000 年左右，各类校园宣教事工也在各大高校开展，很多在大学接受信仰的人，毕业以后就组成了城市职业人士（白领）为主的教会。人数增加使得聚会不再限制在“家庭”里，这些城市教会都普遍租用写字楼或公寓聚会，突破了传统上的“家庭教会”的私密格局。随着“写字楼型教会”的出现，城市家庭教会开始了半公开化的过程。

加尔文主义在中国

传统中国教会在组织结构上是以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作为区分，在信仰上以福音派（基要派）与现代派（自由派）作为二元对立。本土教会受到海外各宗派的影响，也在神学背景上有略微差异。92 年中韩建交之后，韩国教会差派更多宣教士来到城市，如北京守望教会最初就是由韩国宣教士栽培成长起来的。到了 90 年代末期，随着中国教会信徒人数的进一步增长，特别是家庭教会数量的增加，中国教会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一批城市中产阶级组成的教会正开始逐步摆脱“地下化”、“私密化”的信仰生活模式。

秉持改革宗信仰的教会的出现，与城市化进程有一定同步性。正如 Alister McGrath 所说，“欧洲宗教改革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这种宗教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城市现象。”2000 年以后，大批城市知识分子接受基督信仰，而且很多以改革宗或加尔文主义作为信仰告白，以文化使命或教会治理等形式进入公共领域。

改革宗作为一种信仰告白，强调的是基督信仰能够提供一套整全的神学架构，来解决人

与上帝、人与人、人与世界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这样一种系统的神学立场，突出教会作为一个有形组织的内部治理，用“信仰的秩序”使信仰作为生活的中心，全面覆盖到个体行为和公共行为，衍生出对政治、社会生活的责任感，也给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法理建构完全的答案。

归正神学的教会论强调两种秩序的并行：属灵的教会秩序和自然的社会秩序。作为一个有形的教会和社会群体，神通过所设立的政府来维护所设立的自然或社会秩序。这两个秩序的源头都是神，而统治者作为神所设立在这个世上的代表，是自然或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有形教会也是社会团体，而教会可以在法律这个公共平面上来享受它的权利和义务。

80年代末，海外基督教信仰资料通过书籍、碟片形式开始在家庭教会里流通。到九十年代末，中国教会开始受到改革宗特别是以唐崇荣的布道团的影响，唐宣讲的改革宗立场对于许多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之后，大量经典性的改革宗神学著作、信条等被翻译成中文而且传播开来。此外，本土性的改革宗神学作品也开始出现。这些是神学资源对于改革宗教会出现的预备。

持改革宗信仰的城市教会有几个特点。第一，其成员知识结构和社会身份属于知识分子和社会中产阶级，特别是有从事法律背景的信徒。对于改革宗信仰本身，对于神学要求和教会讲道要求高，因此需要较高的专业化知识。在改革宗教会的信众中，因为其人员构成，特别是作为教会的活跃成员，过去通常是社会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王怡，范亚峰），以及维权的法律人士（张凯）。他们在公共领域的知名度和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同时使得教会参与到公共话题之中。

第二，改革宗对于社会文化使命具有强烈的诉求，使得其所属的信徒本身具有一定的自我选择，许多本身就是具有强烈社会参与感的信徒，更容易认同其公开化的理念。特别是在中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中，许多是“八九”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或者在此后的反思者。也是因为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中断，在反思民主化、宪政的过程中，导致许多人出于对自身信仰的选择，趋向改革宗。

第三，改革宗教会在教会建制方面更为成熟化、制度化，有详细的教会规则手册。基于加尔文对公共秩序和家庭伦理的强调，各种建制式的规章制度和功能性团契都出现。礼仪化的公共敬拜和秩序，在后极权主义的政府看来，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强组织形式。

王怡指出，“2000年之后的城市家庭教会走向公开化的历程，经历了四次焦点的转移。2000年到2004年，焦点仍然是‘家庭’。直到年底的《宗教事务条例》出台，其中‘宗教活动一般应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的规定，为家庭教会及其聚会的合法性留下了法律上的余地，各地行政部门对家庭聚会的执法也开始不同程度的缓和。05年到07年，焦点是‘登记’。在私宅聚会的合法性逐渐得到私有产权制度的支持以及政府做出不确定的让步后，加上‘三自会’开始推行家庭聚会点，在各地吸引和要求家庭教会参加，借此淡化家庭教会的概念，因此家庭教会能否透过‘登记’取得合法性，一度成为讨论与尝试的焦点。07到09年，焦点是‘写字楼’，随着部分城市教会的堂会转型，聚会场所开始从封闭和不稳定的私人空间，向着稳定和开放的非住宅空间转移，会众由半公开的‘亲友为主’向着非特定的公众转移，成为一个越来越凸显教会生活之公共性本质的焦点。因着这一焦点转移，城市中隐匿的基督徒才开始形成一个看得见的‘社群’。1949年后，主的教会第一次在中心城市出现了‘非三自’的事实上的会堂。最后，09年到2010年，焦点是‘建堂’。一些在中心城市形成的临时会堂，因为政府对租赁方非法治手段的打压和限制而承受巨大的租房压力。在城市私有房屋产权的间接保护下，选择购房建堂作为不动产的‘教产’，及属乎主耶稣基督的会堂在中国社会的重新出现，成为了城市福音运动的一又一个焦点。……家庭教会曾在会堂被掳的时代，见证了真信仰可以超越一切现实环境的制约而继

续存在于选民的属灵团契中。今天却需要反过来，继续见证这一圣徒的团契，可以进入世界，在成为一座无法被遮掩的山上之城、并被外邦人识别为‘基督徒’的同时，同样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和使徒传承的教训，像安提阿教会一样，在‘分别’和‘彰显’之间持守中道，如光照在人前，叫这个时代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没有‘会堂’对住宅聚会的突破，就无法带来 50—100 人这一规模瓶颈的突破，由此带来较完整的信仰生活形态和教会事工，尤其是儿童事工和宣教事工的成形。也不可能出现‘堂会’及其牧养方式的转型，更不可能在未来出现以堂会为中心的‘城市植堂运动’。”（王怡《看得见的山上之城：会堂之于国度的意义》，《杏花》第 13 期）

在后极权主义国家中，中央政府不允许有任何一个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和体制的组织出现，因此作为改革宗本身教会所具有的开放性必然和官方权力相冲突，官方也会向打压传统家庭教会一样打压改革宗的教会。然而，因为改革宗教会中信徒本身的维权意识，和对于法律和宪法所赋 的权利的诉求，并且作为社会精英阶层更多获得了海外媒体和人权组织的关注。教会的“山化”异象（即“做山上之城”和教会公开化）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边疆篇

西藏观察

藏人流亡社区政治分裂的公开化

作者：李永峰

2011 年 8 月 8 日，在印度出生的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在流亡藏人的“首都”达兰萨拉宣誓就任“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总理），他是继第五世桑东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之后，第二位并非由达赖喇嘛直接指定的“藏人行政中央”最高行政领导人。一年之后，2012 年 9 月 20 日，流亡藏人中的“西藏人民会议”全票通过了《西藏流亡藏人宪章》第十九条的修改，将西藏政治领袖（首席部长）的藏文称谓从“噶伦赤巴”改成“司政”，按照洛桑森格本人在 Twitter 上的解释，“司政——民主选举的图伯特人民的首脑，达赖喇嘛尊者的政治继承人。”至此，达赖喇嘛所追求的政治退休，真正进入了实际操作层面。

目前《西藏流亡藏人宪章》规定，藏人的所有政治行为，依然还是“在神圣的达赖喇嘛所指引之民主制度下”展开，无法到达赖喇嘛在 2011 年 3 月 14 日致函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时所期望的：“使我因具有达赖喇嘛的名号而产生的一切政治或行政的工作或仪式必须全数取消。”但在达赖喇嘛训导之下，藏人流亡政府的政体从“君权神授”向“主权在民”的转变已经开始，新的、哪怕只是称谓上的政治首脑洛桑森格的出现，已经为流亡藏人社区带来了冲击。从目前来看，这种冲击首先将导致流亡藏人政治分裂的公开化。虽然这种公开化是预期中的，也是达赖喇嘛有意提前引爆的，但是其影响范围依然存在极高的不确定性，这在最近几个月的事态发展中已经有所反应。

一、最近发生的几件事

1, “议会”的分裂

对于生活在南亚定居点的近二十万藏人来说，他们之所以愿意历经千辛万苦，从西藏“逃走”，主要就是为了追随宗教中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公开忤逆达赖喇嘛的政治意见。从1960年9月2日第一届十三名代表产生以来，流亡藏人“议会”在迄今的五十多年的运作中，面对达赖喇嘛所首肯的议案，虽然私下或有异议，但在投票中从来都是全票通过。现在，随着达赖喇嘛退休，按照三权分立原则运作的“人民议会”（立法）、噶夏（行政）和最高法院（司法），在从为“神”（达赖喇嘛）服务转向为“民”（选民）服务的过程中，似乎要打破过去那种温情脉脉的关系，而发生正面的冲突。

资深政治家噶玛群培（Karma Chopel）打响了这种正面冲突的第一枪。在2013年3月27日，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五次会议上，噶玛群培发表了一项个人声明，表示他过去虽然不能同意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但出于对达赖喇嘛的尊崇，却也不会再在议会中反对，而现在，由于达赖喇嘛移交了自己的政治权力，流亡藏人政府的政治体制也出现了巨大变化，他没必要再继续顺从“政府”。所以，噶玛群培宣布，他将放弃过去在议会中针对“中间道路”的所有主张，开始投反对票。这揭开了“议会”分裂的序幕。

1949年出生于西藏仲巴县的噶玛群培，从1991年至今，一直担任“议员”，并曾两度出任过“议长”之职，是西藏流亡社区中的资深政治家。最新一次民主选举中，他代表噶举派参选。他也曾担任过流亡藏人中最大的组织“藏青会”的主席。噶玛群培一向反对“中间道路”，是“藏独”的重要推动者。

2, 酝酿中的“反对党”

藏人流亡社区虽然从1991年开始试行民主选举，但却并没有发展出政党政治。上世纪80年代末，达赖喇嘛出于“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我们西藏是否也应该引进政党民主制度”的思考，推动成立了全国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Tibet），上文提及的噶玛群培一直担任该党主席，但这个党只是形式上的，完全是为了满足达赖喇嘛的要求而成立，缺少生命力，并没有发出实际的政党作用。在流亡社区中参与竞选的人，基本依靠个人魅力或同乡会等关系进行动员拉票。在达赖喇嘛一直担任政治领袖的时候，下面即便有反对的声音，也是微小的，单一的，不太可能成为组织性的力量。现在，随着达赖喇嘛辞职，这一局面也开始改变。

2012年3月11至12日，八十多名支持西藏独立的人士，在纽约召开了一个“让赞（独立）圆桌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新组织“西藏国民大会”（Tibetan National Congress）。该组织与“藏青会”又于2012年6月27日，在达兰萨拉的文献档案图书馆（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召集了一次新的会议，参会人士包括了世界各地的藏独领袖，有色拉寺高僧祥萨仁波切、用英文写作的藏人作家嘉央诺布、前首席部长索南多杰、独立活动人士拉桑次仁；十位议员，其中有噶玛群培、格桑坚参等；此外还有公开的藏独组织藏青会、“九、十、三前政治犯组织”等机构的领导人。达兰萨拉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争取独立的联盟组织，在世界各地开展活动。”该联盟组织（西藏独立联盟）不仅旨在反对中国政府，也与“藏人行政中央”抗衡，将会成为流亡政府中的反对党。

此次会议之后，根据议程设置，2013年9月，会再次召开一场关键的会议，选举新联盟的核心领导，届时这一反对党将正式登场。由于流亡社区中支持藏独的议员已经越来越多，而藏独组织，比如藏青会，在选举中又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所以未来的议会和噶厦政府中，支持

藏独的力量很可能会大幅上升。这会令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在流亡藏人内部便遭遇强大抵制。而中国政府在处理西藏问题时，也要面对一个不一样的、自称是代表选民意见的对手。

3. 司政成为多方攻击的靶子

洛桑森格之前，藏人流亡社区的两任民选首席部长第五世桑东仁波切，仍然是一位佛教高僧。这符合藏人政教合一的传统。毕业于哈佛大学，家人都在美国生活的洛桑森格，以学者身份回到达兰萨拉参加选举，成为最高行政长官，同时又继承了达赖喇嘛的“元首”身份。但是，对于藏人来说，是否应当效忠洛桑森格的权威，其实是值得审视的。从上台至今，由于若干举措备受争议，洛桑森格的威信已经备受打击。这既是政治分裂公开化的结果，也是推动这种分裂的重要因素。

洛桑森格最受争议的举措，是他介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的人事斗争。2012年10月1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的主任阿沛·晋美（Jigme Ngabo）突然被解雇。阿沛·晋美是阿沛·阿旺晋美之子。阿沛·阿旺晋美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中，都获得了很高评价，是影响西藏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作为高干子弟的阿沛·晋美，“文革”中曾在内蒙插队，上世纪70年代凭借“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大学，80年代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从事藏学研究，后来留学美国，从1996年开始出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流亡藏人除了通过地下管道与中国境内的藏人建立联系之外，公共媒体也是他们影响境内藏人的重要渠道。拥有几十年历史的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媒体平台。由于阿沛·晋美既不愿意附和中国政府的论述，也不愿意听命于流亡藏人的“行政中央”指挥，展示了独立的媒体立场，长期以来与流亡政府不和。据嘉央诺布披露，阿沛·晋美是因为洛桑森格的公关运作而被解职。洛桑森格干预美国媒体的运作，不止激怒了长期以来对“藏人行政中央”不满的藏人知识分子，连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监督和调查委员会主席 Dana Rohrabacher 也发表公开信，表示愤怒。由于流亡藏人的“行政中央”之所以能够维持，背后主要靠美国的支持，所以此次美国议员的炮轰令很多藏人感到震惊。

如果说自由亚洲电台事件只是一个事关工作方式的争议，那么2013年5月8日，洛桑森格在华盛顿的一个讲话中的声明——“第一、不再争取在图伯特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的统治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图伯特的真正自治可以有一个时间限制；第三、中国在图伯特的军事部署有自由裁量权。”——则激化了关于西藏前途的路线争议。对于洛桑森格的言论，现居北京的藏族知识分子唯色在 Facebook 上说：“如果真的是这么说的，那么，我强烈建议：司政洛桑森格，请您写入党申请书吧！您想当中国的奥巴马，不加入中国共产党怎么行？！121位自焚藏人被垫背了！我就像是心口上挨了一记重拳！！！太痛了！！！”司政权威的弱化，成为流亡藏人中不同政治派别浮出水面的契机。

二，流亡藏人政治分裂的影响

对于一个自称代表全体西藏人的流亡社区来说，内部凝聚的意义非凡。自从1959年出走印度以来，由于达赖喇嘛的“神”性权威，流亡藏人五十多年来在“借来的土地上”所展示的团结令世人惊讶。但是要完成他们“保护和延续西藏的宗教文化与传统 俗”的目的，也必须着眼于后达赖喇嘛时代。所以，达赖喇嘛摆脱历史上终身任职的惯例，提出辞职，并且推动民主选举，是出于长远考量。但是过去一年来的发展表明，藏独的力量已经要冲击达赖喇嘛所推动的“中间道路”，流亡藏人跟中国政府之间仅有的共识可能也会被消解。这给西藏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

现在，达赖喇嘛自己似乎也陷入焦虑之中，6月15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传授佛法时，达赖喇嘛指着身边的“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说他和洛桑森格这两个人都无法代表境内藏人，“西藏境内的藏人依然将他们的信任寄托于我，依然将他们的信仰寄托于我。同样，流亡藏人也将信任寄托于我，将信仰寄托于我。因此，我依然重任在肩”。中国有媒体人将其解读称达赖喇嘛不甘心大权旁落，所以才出来强调自己的领袖地位，显然过于猥琐。流亡藏人的这种分裂，如果无法蜕变升华成为另外一种统一，则自身整体的认同可能要遭到消解，更加难与中国政府主导之下的藏区现代化道路抗衡。

流亡藏人的政治分裂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具有重要影响。中国政府拒绝承认流亡藏人的“行政中央”，所谈判的对象也只是达赖喇嘛的个人代表，而非流亡政府的官员。中国政府的基本策略是只承认有达赖喇嘛问题，而不承认有西藏问题。在达赖喇嘛完全能够代表藏人的时代，这一策略无疑会为中国政府加分。但是当流亡政府的民主实践深化之后，流亡政府的官员和议员挟民意而反对达赖喇嘛路线时，则会对中国政府的处理方式构成挑战。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1993年到2006年，经过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共33,343名。”自从2008年“三·一四”事件之后，境内藏人的这种“离心性”进一步增强。对于境内外藏人来说，流亡社区的存在是无法回避的，对于部分境内藏人始终具有吸引力。中国政府要想实现藏区的稳定，必须要直面流亡藏人“行政中央”的存在，在竞争中超越流亡政府，实现人心回归，这样才能根除分裂思想的威胁。

三，一点判断

西藏问题异常复杂，首先因为藏人存在错综复杂的分化。按照环境，有境内藏人和流亡藏人之分，境内藏人在地域上又有西藏自治区藏人和其他省份藏人之分，由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因，他们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1959年的动荡，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引爆；按照信仰，又有佛教徒藏人和无神论藏人之分，他们对待达赖喇嘛会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或者尊之为“神”，或者斥之为“披着羊皮的狼”。从流亡藏人出走的前后时间差而言，又有印度藏人和“新来者”之分，80年代末以来的流亡藏人，由于已经深受中国流行文化影响，与从小在印度成长的藏人在生活习惯上存在巨大差异。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分化，他们都认可达赖喇嘛是西藏民族的代表。即便对于境内的藏族干部来说，这也是难以否认的。所以，中国政府也才会一直保持与达赖喇嘛的接触、谈判。而现在，当流亡藏人深入民主制之后，“君权神授”向“主权在民”转变之际，达赖喇嘛的代表性很有可能会遭到弱化。到了后达赖喇嘛时代，谁能够代表藏族？恐怕会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未来，流亡藏人中的激进派，失去达赖喇嘛的制衡，走向极端化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境内藏人中间，如果没有了达赖喇嘛当作寄托，绝望的群体中可能会更加绝望。中国政府失去了一个可以整合所有藏人的对手，面对一群分散的、离子式的反对者，也必须付出更大的成本才有可能维持稳定。■

新疆观察

公开言说新疆问题的困难

作者：热依莱

虽然经常与朋友们谈论有关新疆维吾尔的话题。可是，当我要系统地写一篇分析文章时，却不知从哪里开始。或许因为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身份，令我会对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民族所经历的种种，感到痛心、无奈和无力。在展开新疆问题的观察前，我想先以个人经历，讲一下维吾尔人在公开言说新疆问题时所遭遇的困境，算是这个观察系列的开端。

一、不能说

2009年的“七五”事件后，当局把责任一贯地指向了以热比亚·卡迪尔为首的“世界维吾尔大会”（世维会），并利用国家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地宣传热比亚女士的暴力、分裂和阴谋，指责其为恐怖份子。甚至让其在国内的子女“写信”公开批评。2010年年初，我回家一段时间，和一些熟人谈起此事，却听到他们说，当局这一手段实在是适得其反，这样的宣传让很多维吾尔人知道了热比亚和世维会在美国的存在；至于那封信，大家一笑了之，只是在公开场合选择沉默而已。他们也都警告我不要再谈这些“敏感”话题。

在回北京前，当送我去机场的司机知道我在内地上学、工作，便滔滔不绝地说起了维吾尔人在内地的名声，（车上还有其他三人），显然，他们知道维吾尔人在内地的很多违法行为并对其感到愤慨。我并没有回话，因为我想听听他们所听到的而我所不知道的“离奇”故事。在这期间，其中有人顺便插了一句，“热比亚·卡迪尔真是太冤枉了……”。令我惊讶的是，此话一出，全车突然安静了，没有人应他的话，也没有人继续再说下去。在那里，国家利用各类手段进行的“反分裂”、“反恐怖”，很有效地约束了维吾尔人的公共言说。维吾尔人不约而同地知道了有些话是需要避开的，因为“墙也有耳朵”。

二、不敢说

他是我在2008年做记者助理时在喀什认识的朋友，后来我去北京工作后一直有联系。2009年初，有位《凤凰周刊》记者找到我所工作的机构，说想对北京的维吾尔人进行一个特别报道。我便带着这位记者，去了几次我们开展工作的社群，但这个北京的报道终究没有做成。五月底，这位记者去喀什，问我是否可以介绍一个在当地的的朋友认识。我没有想太多，就介绍了这个朋友。《凤凰周刊》记者回京后，告诉我一切都很顺利。六月底，《凤凰周刊》的报道刊出，其中以这个喀什朋友的个人经历谈到了维吾尔年轻人的迷茫。由于之后紧接着便是“七五”事件，所以该报道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但是，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十月中旬，我接到这个朋友父亲从喀什打来的电话，声音带着哽咽：“你介绍我儿子的记者把我儿子给卖了……，他们抓走了我的儿子，并说要判他十年……他的儿子就要出生了……，我们现在不敢对亲朋邻居说他被捕”。我哭了，知道自己说了很多对不起，答应他们，会在北京找律师，并联系《凤凰周刊》记者帮助他。律师要我联系他家人，可是我一直未能再打通他们的电话。今年（2013）年初，外媒对这一事件终于进行了一些报道，并且批评了《凤凰周刊》。或许，最初我不该介绍他……。当维吾尔人的一般性抗议言论被认为具有“分裂”倾向时，很多敢言的维吾尔人变成了“维稳”的无辜牺牲品，其家人由于“株连九族”和被亲朋邻人冷落的恐惧而选择忍气吞声。

三、交流

虽然，以上只是我个人所经历的无数个例子中的两个。但是，我认为这样长久地对公开言说的压制，会为新疆的不稳定埋下众多隐患。“七五”以后，虽然当局试图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来调节新疆的各类矛盾，却并没有给维吾尔人一个表达他们想法的机制和渠道，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维吾尔人寻求平等的夙愿。以至于后来新疆暴力事件不断，最近在吐鲁番、和田以及喀什所发生的系列事件便是明证。当局逮捕、恐吓敢言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极端的宗教领袖只会为失去耐心的维吾尔人传达一个不和平维权的信息。也许，当局会得到维吾尔人表面的服从，却不能维持长久的稳定。当错误地堵住了通过言论来争取平等权利的渠道时，更多绝望的人或许会选择走向暴力。在一切走向更糟之前，交流尤其重要。■

本土/国际（暂缺稿件）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2013·寒露

观澜学社·观察报告·第二期

前言

秋天来了，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中国在大力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似乎也重新回到了“运动型治国”的旧路。下一步将何去何从？各种势力将如何洗牌？中国社会诸领域的游戏规则会不会发生质变？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尚待仔细观察。

“观澜学社”是一个自发、独立、非商业的网络社群。我们关注当代中国历史的展开，试图对几项可能会影响中国命运的因素进行观察，进而分析和评估其未来走向；我们无意于介入学术界的对话，更无意于鼓动任何政治势力；我们追求中国社会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建构“重叠的共识”。我们的名称来自《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继八月上旬推出第一期观察报告“2013年·立秋”之后，我们继续推出新的报告“2013年·寒露”，希望和一切关注当今中国社会变迁的人士交流共勉。

本项目所有文章均可根据“署名完整—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原则在互联网上传播，商业使用务必征求原作者同意。■

目录

法政篇

中共高层观察

李靖云：儒法国家的升级难题 5

王明远：中国保守政治势力的发展脉络（研究提纲） 19

经济篇

资本观察

唐啸聚：从高铁债务说起 24

阶级篇

新工人观察

巩高兴：工人超长时间工作的困境 27

社会组织与互联网篇

非官方教会观察

李晋、马丽：心灵秩序与巫术崇拜

——“中国的信仰转型”研究手札（一） 29

NGO观察

梁雅茜：一份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提纲 35

边疆篇

新疆观察

热依莱：十年后，回顾新疆“内高班” 38

李永峰：左右新疆未来的暗流

——新疆民间经文学校初步观察 41

本土/国际篇

萧敢：印度社会问题三则 47

法政篇

中共高层观察

儒法国家的升级难题

作者：李靖云

军功阶层的没落？

薄熙来案的审判在关切和哗然中告一段落，自从 2008 年执政重庆之后，他似乎挑起了中国人的政治神经。不管是反对他还是支持他的人，都把薄熙来当作一个政治家(stateman)，至少是一个类政治家的角色。认为他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政治路线，自己的政治观念体系。构成了对当局政治合法性的挑战，这是近二十年来没有过的事情。

但是，从整个审判过程来看，薄熙来没有否定当局的合法性，而是非常配合司法程序。之前中共党内政治斗争中被押上法庭的失败者，只有“四人帮”是被认为是政治路线不同。而当时作为首脑人物的张春桥和江青，其第一反应是否定审判的合法性。并不认为自己是犯罪，认为自己仅仅是政治失败而已。薄案和“四人帮”案，被告表现截然不同，由此可以确认，薄熙来根本不是一个既有体制的挑战者和反叛者，而是一个体制的顺从者。

当然，这并不是说薄熙来不是一个有特殊性的政治人物，只是他并非惯常认为的现代政治人物，而是传统政治特有的一种人物——“军功阶层政治人”。中国自秦以后的政治格局是反复的朝代更迭，这种朝代更迭最为核心的内容则是主权意志的转移。这一转移并非是某一家某一姓氏之间的权力转移，而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集团间的权力转移。陈寅恪在隋唐制度研究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关陇集团”这一概念，揭开了社会集团和中国政治之间的隐秘关系。历史学家李开元在分析秦汉政治交替的时候，提出了“军功阶层”这一重要概念，意指在王朝更迭过程中，兴起的一方在军事战争获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军功集团”。王朝建立之后，此军功集团按照军功分配权力与财富，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的“军功阶层”。这一阶层本身具有再生产能力，一般都能长期保持对政治的影响力。

一般而言，军功阶层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惯常出现的社会集团。在军事征服之后，按照军功宰割征服收益，做出政治安排，其实是传统政治的普遍情况。更为普遍的情况是按照军功高低，建立起封建等级秩序和依附关系。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是颇为特殊的。自秦以后，封建制不再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制度，法家的科层行政制度成为国家的核心政治制度。军功阶层获得国家主权，必须要通过这种科层制度来实现，而不再有依军功分封建制的机会。理性的科层政治，则有其本身的理性技术需求，主权者必须具备这样的技术驾驭能力才能成为政治统治者。同时，军功阶层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又面临中国传统政治的另一个特权阶层——儒士阶层的强烈挑战。自隋唐之后，科举制度成为中国选拔官僚的核心制度。严格儒教化的授教内容和理性化选择方式结合在一起，催生了儒士阶层。这一阶层几乎垄断了作为工具理性的“文化符号”。科层制的核心就是文书治国，文书必须要有文化符号组成，故而对于儒生而言，在基本能力上，他们没有任何困难。这也使得中国传统王朝始终存在从“皇帝—军功集团”逐步转移到“皇帝—儒士集团”的主权转移过程。军功集团要么与皇帝本身建立一种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类似清代八旗和皇帝的关系，要么就必须融入儒士集团，否则就必须让渡主权者身份。

现代中国革命，起于军人集团，也成于军人集团。不必讲辛亥革命中的新军集团的作用，即以中共和军队之间的关系而言，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非常明确的讲过，中共实际就是以军队序列组成起来的。军功立政在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中都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从1949年到1959年，中共政权内部分配的核心原则就是按照军功分配。这种政治优势实际上造就了传统意义上的军功阶层。但是对于现代中国的发展需求而言，必须要有现代工业体系和科层制的行政管理。中共从建政开始，就开始了对自身军事集团组织原则的改造。首先是将军事的上下级体系嵌入行政科层关系；其次，通过党的科层体系来安排山头人物的位置，而不是按照实际军功来安排；第三，大量启用工程技术干部。但是随后毛却发现这样处理军功阶层未必有效。首先，军功阶层作为革命团体，一旦彻底转化消失，那么中共政权的政治基础将不再存在；其次，军功阶层本身作为一种特权阶层，并没有因为这些技术化的处理方式而被削弱，相反形成了更强大的党政官僚特权阶层，而这个阶层本身是排斥竞争的。

这里有必要指出，军功阶层在现代政治中也是一个惯常出现的社会阶层。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都曾经出现过军功阶层。英国在克伦威尔护国主时代就是一个军功阶层专政的时代，议会势力通过联合传统王朝清除了这个群体，然后又联合荷兰王室再将詹姆斯二世赶下台，实际上就不再有新型军功阶层发挥政治作用的需求。而克伦威尔海外殖民战争的

策略，实际上也为军功阶层找到了出路，因此英国基本没有军功阶层尾大不掉的问题。美国建国之初，政治上非常潦草，军功阶层还有过“谢斯起义”这类再革命的行为。但是通过制宪法，确立了军功阶层实际的统治地位，这就是建国之初的国父时代。美国宪法非常刚性的确立了一套政治规范，军功阶层通过这套规范从事政治、经济、社会活动，通过规范竞争维持自身地位。法国革命之后，则很快出现了拿破仑军人帝国，实际就是军功阶层宰割革命的收获——整个欧洲，结果导致与其他旧王朝迅速改革，迅速联合起来与之对抗，最后实际上使得这个阶层消失了，也带走了法兰西最后的武功。当然，如果全面分析，拉美的考迪罗政体，土耳其—阿拉伯军政府政体等等都是军功政治的变种。这是由于武装战争在现代政治中起到的竞争塑造作用，军事上的成败是最好的衡量政治组合能力的标准，而且军事竞争实际上是总合竞争，通过军事竞争可以加强现代化组织体系。同时，军事竞争不讲地位，不讲情面，所以对于传统特权阶级的摧毁最强。

军功阶层自身的竞争力来自战争，建政之后，如果不能形成规范的竞争伦理，运用其他方式规范竞争替代战争，一旦竞争压力不再，军功阶层极易蜕变为特权阶层，僵化颓废，逐步丧失竞争能力。而完全的军事竞争体系之下的政治社会体系是完全的积累型社会，不可遏制，所谓极权主义是这种社会模式的极端形式。保持高度紧张的对外战争状态，对于军功阶层而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竞争压力，同时实现对政治统治的垄断权力。这也是现代世界军国主义政治非常强盛和流行的重要原因。而且，必须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存在规范的竞争伦理的国家，冷战中的对抗也能对政治统治起到动员作用。

这就是毛泽东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士阶层的存在和科举选拔机制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式，这其实是一种 *selective society* 形态，军功阶层向儒士阶层转移主权者政治身份，社会保持了一定的竞争更替内容。而且通过儒教选拔标准的确立，整个社会从积累型社会转变成守成型社会，长期维持了特权阶级领导下的社会有序与稳定。革命既然本身就旨在打破这一体系，那么就无法再继续这样的循环。对毛泽东而言，要维持军功阶层的竞争统治能力，又要实现能力更新和更迭，方法就是继续革命，所谓继续革命就是继续以战争状态保持和挑选新的军功阶层。毛泽东对议会政治并无兴趣，他也不希望已有特权阶层在规范政治中保持政治优势。他最为熟悉的方式就是战争，可控制的“全面内战”是他一直考虑的方式，同时他也希望中共的革命精神能够从军事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升格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宗教伦理，以这一标准替代儒教伦理体系。事实上，当时的政治环境也使得他的这一策略有可能付诸实践。结果旧的军功阶层被打到，但是新的军功阶层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虽然毛

泽东选择了张春桥、王洪文等崛起于“文革”的可控制的“全面内战”的胜出者，但是这种胜出基本是建立在毛个人的卡里斯马的权威基础上。据说毛泽东曾经反复要求张春桥学习行政工作，要求王洪文学习基本政治，但是并未见效。客观的政治环境也不允许张、王等人放弃类战争式竞争，去接触比较规范的政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能获得原先的军功阶层以及后来的党政特权精英的地位。毛泽东最后的继承人是华国锋，事实上就已经预示了“文革”失败的不可避免，华国锋本身就是从军功阶层转化为党政特权精英。虽然其军功等级较低，但毫无疑问仍然是这个阶层中的一员，所以他掌权之后很快倒向党政特权阶层和老军功阶层，这实际上是一种必然。

然而，文革之后老军功阶层再次掌权的时候，他们自身的光环实际上也被打掉了。虽然新的军功阶层未能崛起，但是老军功阶层和党政精英可以被打垮而且能够被打垮，则已经是一个经验事实。没有儒教的伦理支撑，也没有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革命宗教伦理来施以涂油礼，这个阶层在文革中实际上已经败得一塌糊涂了，如果没有及时调整，彻底失败是必然的。所以当邓小平—陈云体系建立起来之后，中共的第一件事就是转化竞争方式和内容，将“战争/竞争”转变为“经济/竞争”，将冷战的“军事对抗/国际”转变为“经济体系/国际”，这实际上是把政治取胜（彻底消灭）竞争目标转移为较为实际的经济绩效目标，其直接结果是造成了军功阶层的彻底的分化和转变，也造成了党政官僚体系的巨大变化。军功阶层成为新的社会竞争的一个参与者，他们虽然仍有特权地位，但要保持其地位，必须要在竞争中取胜才行。

同时，对邓小平而言，他必须要解决毛泽东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即统治阶层的更迭和竞争力的维持。建国之初，邓小平被预定授衔元帅，作为军功集团的核心成员，他所熟悉的唯一竞争就是战争，他同样对规范化的政治竞争，对竞争伦理的确定不感兴趣。他唯一重视的是竞争的结果，以及竞争力的保持。这种情况下，他开始确定以新的标准来更迭干部群体，这就是“四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革命化，这四个标准凸显的是具体的实际功能考虑，而不再是宗教性的伦理原则考虑。这里虽然有革命化，但是革命化本身是个忠诚程度的考虑，也是一个实用主义的要求。这实际上就开创了新的选拔模式，而且从根本上建立了一条新型的精英选拔路径。干部的培养开始以学校为基础，一流大学成为一个重要场域，而团委就担负了选拔年轻的精英进入统治阶级的任务。在传统的儒法国家，科举制担负了挑选精英的竞争功能。邓小平当政之后，第一时间恢复了高考，又将统治精英的挑选机制直接对接学校，高考实际上发挥了科举的作用。在专业化成为一个基本标准之后，专业考核标准迅

速建立起来，对于技术官员而言，这相对提供了一个官员考核的客观标准。在这些竞争中的胜出者形成了胜出精英群体，其中相当一部分被吸纳到统治精英之中，成为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军功阶层而言，所有这些竞争都是他们可以参与的，而且是必须要参与获胜的，当然他们可以在竞争中无限制的发挥自己的特权优势。于是，在各种竞争之中，军功阶层成功得很快。这种成功带来了分化，一部分军功阶层开始融入胜出精英，更倾向于这类基本的竞争规则。而另一部分军功阶层则拒绝这类貌似庸俗化的竞争方式，更愿意直接掌握竞争规范的解释与制定权，他们更多以党政干部特权精英的身份出现。但是无论属于哪一部分，都必须参与这些竞争活动，同时在竞争中使用阶层特权。可以说，军功阶层重视的不是如何建立规范的竞争以及竞争伦理，而是或者重视竞争标准的确定，或者重视竞争本身的设计。薄熙来就属于后者，他是一个军功阶层的典型例证。

薄熙来文革中参加“联动”，很快被清算。文革结束后，他运用阶层特权获得学习机会，然后达到考核成绩，迅速被选拔出来。在进入政坛之后，他顺利完成了“基层县—地—省”的履历考核，开始成为最有竞争力的竞争者。他是在这条选拔路径上成长起来的。薄熙来并不属于依靠专业能力的胜出精英，他是军功阶层出身，拥有特权并且善于运用特权，用流行的话语而言，他比较喜欢“折腾”。美国学者史中翰曾经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的一个特殊现象，两种不同的官僚对中国经济有不同的治理方式。第一种是以党务干部为主的“全才”，喜欢搞一些大项目，超前发展，另一种是技术官僚，比较重视按照经济规律调控，防止过热发展。这种官员的不同分类，其实在中共的政治统治精英中是普遍情况，党政干部特权精英更喜欢搞一些新的竞争方式和内容，确定一些新的竞争形式。中共内部有一个术语“开拓性干部”，就是指这类人群。军功阶层由于其本身的政治背景，更敢于做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特别是在胡锦涛执政期间，和谐稳定作为一个量化的政治指标提出来之后，军功阶层更敢在这些方面入手，做一些“逾矩”的事情。薄熙来就敢大规模动用文宣和政法两个党务权力体系，做一些普通技术官僚和党政特权干部不能想象的事情。比如他在大连执政时做服装节，搞生态环保城市，翻新城市设施，拒绝一般的梯度工业发展模式，而非要另辟蹊径，做一些更具眼球效应的事情。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重庆，做出了许多更为大胆的行动。薄的这种外向型竞争行为实际上会破坏很多基本的政治潜规则，压缩了政治体系内的许多灰色地带，给整个体系造成了极度的不安全感，虽然总体上他并没有选择挑战体系。

应该说，薄的这种积极表现，还是来自竞争的政治压力，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铁的政治指标——年龄。和确定技术化标准相似，在年龄方面也逐步确定了许多刚性指标，从江泽民时

代开始，68岁不再有机会进入政治局常委，63岁以上很难有机会进入政治局。这种自上而下的年龄方面的压力，对薄熙来而言，相当于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完规定的考试。所以在未能从商务部长晋升常委，而是到地方执政之后，他就有了更积极的政治表演。一般官僚选择“熬”的办法，循规蹈矩以图突破，薄的选择则是制造眼球效应，他强力地把“稳定和谐”、“经济发展”两个指标推到极致。这就打破了地方的政治和社会的平衡。他确实突破了一般的政治界限，比如频频使用中共轻易不出手的劳教等政法管制手段。他也丝毫不顾忌地方政治本身的平衡，强力清除本地势力。这些活动其实说明了薄缺乏政治能力，无法完全适应目前的政治竞争规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当前中共政治竞争体系本身的漏洞。

周秦之变之后的中国，之所以能长期保持治理形态的稳定，其秘诀在于儒法国家内在的构成逻辑。儒法国家是赵鼎新教授的一个创造性说法，也是对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的一个非常好的概括。科层制的管理体系来自周秦之变过程中长达六百年的战争竞争。这一体系是战争/竞争驱动的，当时的社会环境是高度积累型的，如果没有其他竞争原则和方式的替代，这种政治体系很难长期维持。到了汉武帝时期，首先强化了法家科层制体系，和经济管制能力。接着独尊儒术，通过儒家的礼教体系将这种实用主义的竞争绩效清除，取而代之的是礼教化的德性等内在化的评价体系，并且依靠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构建，形成了一种国家宗教。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官方学校体系，官员的选拔以礼法为标准，政治正当性也建立在这样一套意识形态之上。这就确立了儒法国家的治理形态。我们可以称这种形态是儒法国家 1.0 版本。待到北周苏绰六诏改革，全面对这一国家形态开始进行强化。重新制定文书治理的标准，废除九品中正制度，确立了以儒家典籍为选拔标准，在全国推行以伦理纲常为内容“五书”，从上到下要全面学习。隋唐之后的科举制度是其发展，朱熹强化了儒家体系，并且形成了新的儒教系统，在这些制度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形态，可以称为儒法国家 2.0 版本。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 1.0 版本还是 2.0 版本，竞争模式的扭转都是核心内容，国家必须走向一个守成型社会，军功阶层也必须要消解到这个体系之中。

这种历史逻辑在 1840 年被打断，首先是国际范围内的战争压力，导致了军功阶层前所未有地恢复，和儒士阶层彻底衰亡。竞争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运作逻辑，被广泛确立起来，所以没有可能延续传统的儒法国家治理逻辑。对中国而言，军事上的胜利是国家存在的基本保证，所以军功阶层长期以来是唯一具有竞争力的阶层。但是文革之后，竞争驱动力从战争变成了经济，商业竞争成了主流。但是国家政治对于竞争的定义仍然是在战争驱动状态下形成的，“全输全赢、你死我活”的游戏规则和冷漠的竞争观念并没有多元化，反而被普遍认

同。在这种状态下，政治决断是僵化的，而且是以紧急状态为主的。而另一方面，这种竞争逻辑下的政治，仅仅是在技术标准和年龄标准上有所谓的竞争，但并非真正的政治竞争。仅仅是薄熙来富有个人色彩的政治表演就能够对政治体系造成冲击。由此可见，如果中国未来仍然是机械的官僚主政，政治体系就很有可能受到或是善于表演、或是真正具备实力的竞争者的冲击。

竞争伦理的政治困境

从儒家国家蜕变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不仅是治理模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政治的内核也在改变。深层次问题在于，要建立怎样的一种规范的竞争体系，以及让人认同的竞争伦理。

要讨论这一问题，不妨先来区分一下什么是竞争伦理，什么又是一般的伦理，这里我借助几种比较熟悉的宗教伦理来做分析。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驱动的积累型社会，其核心是积累，理性要求是控制并且实现竞争。与之相对的传统社会则是去竞争的守成性社会，核心是历史遗产的守成、延续和复制，理性要求是保持适应。由此带入一个在中国热度非常高的问题——普世价值，可以说对普世价值的议论也体现了当代中国对社会规范价值的需求，事实上，在当代中国提“普世价值”，就是指向竞争的伦理。

这里我先不讨论普世价值存在与否，也不论其具体内容构成，仅指出一点，所谓普世价值必须是一种竞争积累型社会的规范价值体系，其普世性就在于竞争本身和积累本身的普遍性。如果是循环守成性社会，则很难有所谓的普世性价值。传统社会伦理一般来说都是宗教天启，虽然我们经常说世界性宗教，但是不得不说传统的世界性宗教并非普世宗教。纵览世界各种宗教，都带有世界性和开放性，哪怕是犹太教，也是有其对外开放性的。但是这些依附于传统社会而生的宗教，其核心内容在于构建一个守成的封闭系统，一般而言，这种宗教伦理的推行都是借助政治需要建立起来的。在情况下的宗教宽容，仅仅是在对其他宗教守成目的上的开放和守成方式的容忍，绝非在竞争上的开放。守成型的目的必然是特殊的，方式也是特殊的，所有的宗教都会声称自己是最好的守成方式。要么是一种宗教对政治统治提供技术支持，换取主流社会的认可；要么是帝国形态，统治者无差别运用各种宗教达到守成目的。

在历史上，完全匹配现代竞争积累型社会的宗教，只有基督教新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的那样，加尔文教是专门为资本主义设计的。所谓因信称义，直接摆脱了教会的束缚，而依靠克己积累的后天成功来显示信仰的成功。这已经完全是用宗教话语表达竞争伦理。这里凸显了韦伯研究的经典价值和国内对韦伯的误解。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恰恰就是对竞争性的伦理做出深入研究，通过比较得出新教伦理的特殊性，从而给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简而言之，守成性社会必然是继承性和多样性的，必然是不普世的；而竞争性社会的普世性就在于其竞争性普世。这并不是说竞争性社会不容许你守成，事实上完全是容纳并且支持的，但是它不容忍以守成作为核心伦理，威胁到竞争伦理的核心地位。所以任何将守成性的宗教伦理褒扬为普世伦理，并试图在中国推行之的做法，注定是失败的。比如这几年的传统复兴运动，很多人支持儒学再度儒教化，但是不管如何从哲学角度解释其普遍价值，都是一些特殊群体自己的守成偏好，而且内部迅速分化，无法聚合。再比如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在受西方影响之后，大范围推动基督教，希望借助宗教信仰来确定某一规范的伦理价值。但是，如果伦理是普世性的，必然和其宗教内容没有关系，接受其伦理规范，并不意味着需要接受其宗教内容。

而为了在宗教信仰市场中取胜，各家各派的宗教都积极地诠释教义，迎合普世伦理规范。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美国的教派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其基本的社会伦理规范就是清教伦理。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术语，各种宗教伦理的表达呈现家族相似性，但核心是围绕这一竞争积累性的伦理。

宗教的伦理表达固然可以直接体现这种伦理法则的变更，但是更集中体现这种差别的，则是现在社会逐步发达起来的学院化和经典话的政治哲学体系。

以美国当代的竞争伦理问题的谱系为例。首先，二十世纪美国经济学界的领头人物弗兰克·奈特就曾经提出竞争伦理的概念，并且做过分析。深受其影响的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自己的正义三原则，建立伦理体系，这个体系被认为是对美国二战之后的社会状况进行总结，相对侧重竞争中的公平问题和社会契约问题。诺齐克则与之相对，写出《无政府主义，国家与乌托邦》，构建了另一套被认为偏右的伦理体系，强调竞争中效率问题和自由意志问题。这两本著作建立了美国现代伦理学的左右两个坐标原点，在其之间，就是各种各家的伦理学。而两家所交叠而生的，就是当代美国的竞争伦理。又因为美国的强大地位，这种伦理学表述又成为普世价值的主流表述。事实上这种学术上的谱系和创造，近现代史上非常之多，诸如霍布斯和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康德和黑格尔等等。这种规范性的、逻辑性极强的哲学体系对普世伦理的表达更为充分。甚至可以说，当能够提出这种竞争伦理的哲学坐

标体系的时候，竞争伦理其实已经颇具系统了。

但是，竞争性伦理形成的更重要的标志，还应该是处理与循环守成性伦理的关系。这里借用语义学和语用学方法来做一个分析。普世价值主体上必须要能独立，才能对竞争积累性社会提供支撑。这既要体现为语义学上的逻辑严谨，富有说服力和符号象征力，也要体现在语用学上能激发和支持某种特别的个体目的，将个体守成的目标在社会行为上普遍化成为一个刺激竞争的目的。人类传统社会建立的守成性伦理体系，虽然不具备普遍性价值意义，但是在语用上，作为一种自律法则自洽无伤，并且有很强的延续性。对个体而言，守成也是自身特殊性的一种保持，或者说能让人感到自我认同的高贵性。因而，服务于竞争积累性社会的普世价值体系本身必须要能在具备语义的竞争普世性的同事，接受并安排这种语用的守成特殊性。通过这种安排和运用，令自身愈加丰富和厚重。

当然，我在这里并非要否认宗教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意义。很多时候，通过宗教话语叙述普世价值，具有较强的号召力，方便建立认同。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对普世价值和竞争积累性社会的关系必须要有清楚的了解。以拉美的解放神学为例，这种产生于拉美的特有天主教类型，包涵着反抗不公、争取社会公平平等的内容。但是本身又带有反现代的内容，作为革命动员武器或许有其价值，但是一直被主流社会有效压制和限制，无法成为竞争伦理的建设力量。类似这类宗教信仰，在西方非常之多，在政治上和左右派都有结合，但是总体上并不处于主流，如果以此为手段，必然处于边缘。类似与此的还有社会运动，中国的社会运动从事者很喜欢借鉴欧美一些新的运动手段，这类运动基本是边缘人运动，在中国推行之，无非更边缘。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边缘化的活动，威权政治可以以维护竞争积累性社会原则的目的打压之，而这种打压本身是被主流社会高度认同的，带有极强的正当性。再者就是来自所谓信仰的宗教凝聚能力，但是在非守成性社会，信仰是一个属于私人精神上的事情，属于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对于不可说的东西的一种自我认知。如果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循环守成性社会的话，其凝聚效应也是小众的。

分析了普世价值，竞争积累性社会和循环守成性社会三个概念之后，竞争性伦理的面貌就相对清楚一些了。维护竞争效率和可持续性，这种实用主义的要求是竞争性伦理和传统伦理的根本区别。虽然当前中国并没有较为规范的竞争伦理，但是也并非没有能发挥作用的类似物。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实际就是一种。卡尔·施米特曾经指出，在批判资产阶级的腐朽之后，马克思必须要讲无产阶级的高尚情操。其实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无产阶级道德伦理就是新教伦理的另一种表达，社会主义是一种积累型社会。

这里可以稍微论及斯大林主义（甚至于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的特点。这类国家体系是建立在战争/竞争驱动下的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积累型社会。如果不用极权主义这类已经相当带有修辞性的词汇，这种社会形态实际上是一种超级竞争积累型社会。这类国家体系大多崛起于对外军事不断失败，陷入国家存亡危机的状况。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通过战争动员展开动员，统辖国内所有资源。统治阶级实际是军事序列的特权领导阶层，按照军事序列形成严格的纪律，在内部安排出一套完整的军事序列的劳动生产体系，经济模式高度简化为“生产—积累”。但是，这种体系虽然极度倡导对外竞争，对内却是高度的守成型安排。首先，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念，将马克思的“犹太人问题”中所包含的文化和社会内容驱逐出去，变成了一个严格的意识形态守成体系。其次，先锋模范的突出位置，成为支撑统治集团的基本特殊化的意识形态的法理依据。可以说，这种社会本身就存在着基本的悖论——对外竞争，对内守成。要处理这一基本悖论，就需要依赖普遍化的革命战争这一特殊的竞争形式。

中共建政之后，也建立了类似的制度。不同之处在于，中共更强调国家落后，和从上到下的清教徒道德。中共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伦理道德内容，无不是为了刺激“劳动—竞争—积累”。节俭，勤劳工作，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清华大学所提出的“锻炼身体，为国家工作五十年”，实用主义目的非常强。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服务于战争/竞争的道德要求迅速变为服从于经济目的。国家倡导“振兴中华，勤劳致富”。竞争目标从国家在对外战争中取胜变成了个人发财，这种道德要求很快就与之相适应。成功学在中国的畅销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另外，传统的儒家伦理所倡导的一般社会生活规范，继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发挥作用之后，也同样开始在中国发挥作用了。

但是这种替代作用是有限的，如果说竞争伦理是一个体系的话，上述这些道德要求就仅仅是一些基础性的东西。中共仍然无法避免话语尴尬。毛主义有着丰富的革命战争理论和伦理内容，能深刻影响世界；但是邓小平理论仅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东拼西凑。在宣布自己退出革命战争竞争形式之后，中共事实上接受了普遍化的社会竞争。以经济竞争为主导，带来方方面面的竞争，中共本身还形成了政治治理的锦标赛格局。但无论是竞争内容的设计，竞争的规范，还是如何判定成败的标准，这些问题无不指向一个最后的竞争——政治竞争。谁有资格做出政治安排？谁也不是上帝，上帝已经不管这些了，只有竞争中取胜的人才能管。成功的金融家没有理由不去关心甚至参与制定金融市场竞争相关的规范，而这类规范的制定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了。虽然中共统治集团不断吸纳包容这些在竞争中取胜的胜出精英阶层，以及相关的专业精英。但是终究没有在根本问题搞出一套普遍的竞争规则。统治集团不

能继续面对这些政治挑战。随着竞争所带来的绩效越来越好，胜出精英和专业精英越来越有自信，这种政治挑战也会越来越强烈。

欧洲之所以在近代早期形成这种新的竞争伦理，其基本条件是在竞争中获胜的统治阶级主动推行这套伦理。不同于近现代中国政治上获胜的仅有军功阶层一个群体，近代欧洲实际是多个社会集团在多层次的竞争中取胜。城市工商业者集团在经济上迅速发展壮大，建立了完备的金融手段，成为战争的发动者和主导者；以传统封建君主和现代军人为核心的军功集团不得不依靠并吸纳该阶层，组成政治联盟。宗教教士集团掌握了文化资源，并具有丰富的国家科层治理经验，所以也成为重要的政治参与者。尤为重要的是急于摆脱封建依附关系、破除循环守成性社会的土地贵族群体所长期扮演的政治领导角色。在近代英国和德国的政治史上，他们都是最早的政治阶层，也是基本竞争伦理的规定者。新型土地贵族具备特殊优势，他们拥有土地财富，参与金融期货交易以及海外殖民事业的经营，实际上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重要建立者，懂得布尔乔亚式竞争规则。土地贵族阶层既拥有传统的政治身份和政治经验，而且作为封建领主阶层的历史继承者长期具有军事经验，所以在西欧现代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多阶层赢家，才有了政治上的协商竞争，传统的等级代表议会才变成了区域代表的议会。这一统治群体已经不再是特权阶层，在竞争获胜的原则之下，这一群体是真正意义上的统治精英。在统治精英确定之后，扩大选举权属于策略考虑，并不是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

近现代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军功阶层是唯一的竞争胜利者。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标准的军事政治集团，军事集团是唯一的主导者，而且国际环境正好是列强竞争时代，在战争中取胜是唯一的求存之道。从北洋军阀掌权到国民党南京建政再到1949年中共建政，军事能力都是其统治被认可的基本原因，对于中共而言尤其如此。建立政权之后，中共迅速在军功阶层的基础上形成了党政特权精英。但其构造无疑是基于军功阶层。邓小平能够在文革后复出掌握政权，与其本身的军功以及军功阶层的支持有重要关系。虽然这种关联随着政治的重心转移而逐渐淡化，但是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继承性。

前面已经讲过单一军功阶层所缔造的国家的存在的问题，对外竞争积累，同时对内建立等级化守成性的制度，这一基本运行逻辑就存在严重悖论。现代政治中出现的军功政权存活时间都无法超过一百年，一般仅能维持三到五代。原因除了军功集团本身的僵化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军功阶层的竞争力在于在战争中取胜，一旦没有直接的战争便很难保持竞争力。虽然党政特权精英阶层已经取代了传统军功阶层，但是其政治基因上依旧继承了这一缺陷。

邓小平主政之后，经济发展成为政治重心，但是在经济发展中仍然给出了既定的竞争目标，这一点在中共历来的官方文件上都有清楚的说明。也正是这样一个竞争目标的设计，保持了目前统治集团的稳定。不同于西方现代政治阶层的多元化构成，中国的布尔乔亚阶层很大程度是被军事政治集团保护催生的。中国传统的地主士绅阶层则是传统特权阶层的忠实组成部分，也不具备政治领导能力，在 1949 年以后完全被摧毁。中国更缺少教会势力，以及一般的社会法团。所以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仍然是以军功阶层为核心的党政特权精英为主体做出决策，开放竞争，鼓励经济创造和积累，但是这种竞争方式引入很大意义上还是策略性的。而对于在新的竞争方式中产生的新精英群体，即专业精英群体和胜出精英群体，中共通过一定的遴选机制对其进行吸纳。很多人对新精英群体的政治意向感兴趣，但他们实际上并不具备多少政治能力。这两类精英更愿意在金融市场等具体领域争取主导权，而没有兴趣去争取政治权力。事实上，中国最喜欢就政治发声的企业家群体恰恰是“92 一代”为代表的下海企业家。他们本身就是从党政特权精英中衍生出来的，所以依旧保持一种政治能量。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共依旧会执行既定的策略，在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国际比拼中取得优势地位，这样就可以不受阻挠地调整政治模式，比如邓小平在 1987 年提出 50 年后施行全面的选举政治。也就是说，中共将长期处于这种竞争的伦理困境，并且时时面对政治挑战的危险。

从去年开始，坊间大多喜欢讲薄熙来的挑战，事实上温家宝、秦晓等人的政治挑战远远要比薄的表演更有压迫力。中共一直在策略上运用“普世价值”，同时仍然保持着固有的社会主义伦理的特殊性。这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压力，首先，中共希望保持其最高裁决权，坚决继承既有的军功阶层的衣钵，虽然事实上这一阶层已然衰落。国际上，所谓“普世价值”的话语主导权掌握在全球最强有力的竞争群体，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手中，中共并没有准备也没有能力提出一套系统的“普世价值理论”。一般来说，要使竞争伦理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伦理，必须要做到两点，第一，能够不断规范和刺激竞争，不断催生强者。第二，能够迫使循环守成伦理从挑战性地位变成依附服务性地位，既能吸纳其中积极因素，调整竞争模式，又能迫使极端群体自我边缘化。中共目前仍然是策略上运用这种“竞争伦理”，同时又强调自身的特殊性，来抗拒其普遍性，希图用一种特殊性的东西包涵这种普遍性。且不说其目的和手段并不兼容，显然中共在现实中也基本不具备相应的政治能力。所以当温家宝和秦晓等人提倡普世价值的时候，实际上构成了对中共现有路线的挑战。客观上说，这无异于建议中共放弃目前这种苟安策略，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路线挑战。可以预见，未来这种挑战

会越来越多，而且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战略目标不断实现，在统治集团内部的讨论也会越来越激烈。

在这种既定状况下，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也经常提出许多挑战官方的意见，乃至诉诸行动。不妨按照习惯说法，称之为体制外的政治意见和行动。如果梳理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意见乃至行动的效用都是如此之小，而且非常边缘。这首先是因为这种意见表达往往是建立在否定官方所执行的竞争积累型的社会发展方向上。现代社会是高度竞争积累型社会，其所带来的压迫和不公也是非常多的。（当然，没有哪个社会是完全的竞争积累型社会，必然带有循环守成型社会的特点。但是在我们所说的竞争积累性社会中，是指竞争积累是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循环守成仅仅是依附服务于这一形态。）竞争一旦脱离潘多拉魔盒，实际上就收不回去了。想要再建立一个循环守成性社会，目前是看不到条件的。而且想要让某一守成目标被普遍接受，必然需要依靠强力作后盾。在非传统社会，这很难成功。

其次，从策略方式上看，体制外各方的策略选择不具备有效的挑战性。当前比较流行策略选择，第一是以苏东转型为样板，但是苏东转型实际是两种路径，一种苏联，一种是东欧。苏联转型的直接操纵者是党政官僚群体，其所推动的转型实际是以分赃为目的，掠夺苏联遗产，知识分子仅仅是作为工具被利用。这一过程在中国早已通过改革路径而实现。党政特权精英非但已经无法垄断这一个分赃进程，而且在具体的分赃活动中，与胜出精英和专业精英相比，还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在东欧转型中，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分子之所以能取得领导地位，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欧盟和美国因素。如果没有欧盟托底，美国支持，可以预见其转型仍然将为党政精英群体所掌控。

第二是以新港台为样板。这种策略有两个巨大的问题，首先是忽略了地缘政治的影响和政治单位的体量。新加坡、香港是城市，没有政治借鉴意义，即使台湾也意义不大。这些地区本身人少地狭，内部政治简单，而且因为地缘政治特点，比较容易受到外来影响。而这些条件在中国大陆都不存在。其次，忽略了竞争压力。以台湾为例，台湾转型时期，社会运动很容易得到激发，在西方边缘化的守成性批判思想很容易在台湾立足。“台独”作为一种动力，相当程度是为了保持特殊性，而非对外竞争。目前来看，台湾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日益沦为附庸。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则具有必须挤进全球竞争体系中心位置的实际压力和需求。所以类似的新思潮可能在台湾很有市场，而在中国大陆必然边缘化。而且必须要注意的是，当前中国大陆不断把这类基于循环守成伦理的挑战势力在精神上放逐到香港台湾，彼此惺惺相惜，而把香港台湾的竞争积累性势力吸引过来，甚至香港台湾真正有竞争力

的领域也是依附于中国大陆的发展,可见这些地区非但无法提供力量,自己已经被牵着走了。第三种是儒家主导的儒法国家的复兴,比如蒋庆设计的儒家宪政,和伊朗宪法颇为类似。但是伊朗体制的目的在于维持伊斯兰教士的特权地位,而中国显然早已消灭了儒士的特殊地位。如果以建设循环守成型社会为主,同时吸纳竞争积累型社会的普世价值,这本身就颠倒秩序,难以为继。

即使不采取上述三种策略选择,仅仅宣扬“普世价值”本身,希望建立竞争伦理,实现规范竞争,体制外力量仍然是失败的,并没有给人多少希望。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体制外力量并非是在竞争中取胜的阶级。的确,西欧现代社会萌发的过程中,城市工商阶级作为封建体制之外的力量,曾经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可以说竞争伦理就是服务于城市大小布尔乔亚们的。但是这里有个前提,布尔乔亚阶层是竞争中的胜利者,他们在经济上建立了新的经济体系,迫使封建主依赖于该体系,在军事上建立了新型的军队,而且培育了职业军人。中国当前的体制外力量则完全没有这样的竞争成绩。很多人喜欢把民营企业当作体制外力量来看待,事实上中国的民营经济是完全借体制而生的,和体制处于一种耦合状态。至少从策略上讲,企业家与其选择在体制外政治竞争,倒不如在体制内寻求合作者,现实状况也是如此。政商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在地方锦标赛格局之下,与政府的紧密联系和企业培养竞争力有直接关系。目前在体制外力量中间,能够对体制造成冲击的,基本上是体制的叛逃者。比如所谓的“两头真现象”,基本是政治老人,在其基本不必再和体制打交道的情况下,做出挑战。这反而说明了体制外的弱势。

这种弱势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读,中国的知识阶层近年来突然出现了政治哲学热,几乎所有学者都喜欢讲中国的理论自觉。但是学者们致力于挖掘的,而且喜欢鼓吹的,往往是在西方世界处于边缘的理论体系。所谓理论自觉也不是从当前中国的社会竞争体系中推导出竞争伦理,而是更愿意去否认竞争积累型社会的合法性。比较有趣的是,在中国狭小的思想市场上,西方激进左右派很有市场,右如罗斯巴德、米塞斯,左如齐泽克,乃至各种后现代思潮。西方社会主流的竞争伦理反而不被重视,处于边缘地位。即便是重视主流西方主流思想的学者,在推荐介绍过程中,又往往脱离中国现实,自居启蒙,走回了传统特权士人阶层的路数。

总结而言,如果要在我国彻底实现新型现代国家,必须满足如下条件:首先,统治阶层必须是竞争的胜利者。其次,统治阶层必须倡导竞争伦理,提倡规范竞争。再次,统治阶层还必须要有主权者的能力,或者是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处于危机,通过吸纳“普世价

值”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或者是对自己的政治统治者身份具有强烈的信心，能主动运用“普世价值”确立自己的地位；而且还要能够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争夺“普世价值”的诠释权，并能够迫使对方接受。这不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而且，知识分子可能也很难有效地参与到这一过程中。■

中国保守政治势力的发展脉络（研究提纲）

作者：王明远

2013年并没有像大家期待的那样是新改革元年，相反，今年中国政治最显著的事件是保守势力的公开高调亮剑。这个高调亮剑，有三个表现：

第一，党的舆论宣传部门主动挑起意识形态争论，旗帜鲜明表面政治保守立场。“七不讲”刚刚出现时还被一部分人认为是试探或者新主受人蒙蔽，但是后面《求是》、《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一系列反宪政、反普世价值的文章。这在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那时候，这些话顶多是党内一部分人私底下的想法，不敢公开表达，更不可能成通过党的最权威喉舌发声，而现在做到了。

第二，体制外极左势力与党内保守势力的合流。以前乌有之乡、张宏良、尹国明之流只是政治上的草寇，当局对他们的防范甚至超过了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防范。如今他们却成为国新办、人民日报的座上客，冠上“特约评论员”、“特约专家”的头衔，公开上央视、人民日报做评论，写文章，骂民主。随着极左分子政治地位的改变，他们也急转成为新一代领导集体的积极拥护者。

第三，重拳主动出击，打击民间意见领袖。连薛蛮子这样的红二代、有社会影响力的商人被抓，潘石屹、任志强等纵横政商的大亨被警告，这也是以前任何人没有想到过的。

保守政治势力的亮剑绝非是一阵政治风潮，而将可能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主题，这种政治激荡至少会伴随着这一届领导集体的整个任期。在目前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差距严重的情况下，保守政治势力的发展有其广泛群众基础。未来十年有可能是保守政治势力的成长期，

目前自由派和党内改革派主导社会舆论的局面将会大大改变，中国政治和社会可能会因此出现明显的左右分化。

一、党内保守势力发展脉络

1.虽然社会大变，党内保守势力的基本盘没有改变。总体来讲是80年代保守派元老陈云、王震、邓力群等人的后代和他们提携起来的官员。如朱佳木是陈云的秘书，李慎明是王震的秘书。

2.十四大以后，保守派影响力曾经急剧下降。政治上，元老退休或凋零，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官僚集团迅速代替了他们，改革派官僚不关心政治左右，更注重实效。经济上，中国迈入市场化时代，人们对物质追求越来越狂热，不关心政治，保守派控制的国家媒体对民众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

3.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自由派和党内改革派利用新网络媒体和商业报刊，占据了社会舆论的制高点。保守派的政治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4.中共十七大可以算是一个时间的分水岭。之前是自由派和改革派力量增长，保守派萎缩。在这之后，保守派势力开始反弹。首先是出于对网络及民间力量崛起的恐惧，以及“颜色革命”的教训，官方在网络管控和“维稳”方面控制越来越严格。随之而来的是宣传和政法系统力量的增强。

5.随着市场利益分配格局基本确定，既得利益集团因此逐渐形成，在诸多经济领域出现了反对改革的保守利益集团。

6.随着“红二代”年龄和职位的成长，他们也走向政治前台。虽然薄熙来失势对“红二代”保守派是个打击，但是“十八大”之后，更多“红二代”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二、党内保守官僚的分布及影响力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公务员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内部已经产生很大的政见差异。总体而言，政府人员比较开明，党务人员比较保守。就党内而言，纪检、组织部门比

较开明，宣传、统战部门比较保守。但最常见的保守势力集中在以下几个系统。

1. 宣传部门。除了胡耀邦主持宣传工作的短暂时期，宣传部门一直掌握在保守官僚手中。这个系统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保守惯性。

2. 军队和警察系统。由于长期受意识形态的浸淫，这两个系统的工作人员思想往往很保守，固守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信条。比如今年《解放军报》的诸多社论。

3. 央企系统。一部分人士长期在央企领域经营，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经济利益而保守，未必从思想上抵制西方宪政、民主。另一部分则是中组部和国资委空降的保守派官僚，近年来，为了加强对央企的管控，中央安置了很多保守的政工干部和专业官僚做央企领导。

4. 行政机关、学校、群众团体的党务系统。其存在和获取权力的基础就是“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势必要强化“党的领导”，反对党政分开，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以上是党和政府内部保守势力的基本盘，他们在党政机构内部未必占人数多数，但是控制着“笔杆子”和“枪杆子”，以及中国最优质的物质资源。所以其动向最能主导党的舆论和政策取向。

三、“红二代”

“红二代”也有开明与保守之分，比如胡德平、陶斯亮、马晓力、陈小鲁、秦晓都很开明。但是，多数红二代的政治立场还是偏向保守，并且有“原教旨主义”倾向。

1. 多数红二代倾向于“权威主义”，他们不满江、胡执政二十多年搞得党内纪律败坏，组织涣散，也不满这二十多年党对社会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2. 红二代也有朴素的民本情怀。他们对当今腐败，官僚主义盛行，官员不关心民间疾苦也很不满。

3. 红二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之初曾经淡出政治中心舞台，政坛呈现以上海帮和团派为代表的新生代官僚集团独大局面。但是十六大以后，随着刘延东、王岐山、习近平、薄熙来、胡德平等人上升到部级以上职位，红二代影响力大增。

4. 十七大，习近平被确立为下一届领导人选，极大增强了红二代参与政治的信心。

5. 薄熙来经营重庆，为一部分红二代提供了政治平台，一时山城二代云集，络绎不绝。

6. 现在红二代的核心人物都是六十岁上下，这正是政治家的黄金年龄。未来十年应当是

红二代政治势力最强大的时期。

7. 红二代越来越热心参与政治,也越来越善于利用现代社会的政治习惯参与政治。比如,红二代也学着结社,成立“延安儿女联谊会”;也慢慢学会利用商业媒体发声;也学会召集各派学者,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四、民间极左势力的情况

1. 极左比党内保守派更进一步,不仅反对改革,还主张回归毛时代。

2. 党内少数官僚、个别不得志的“红二代”和一些知识分子是领军人物。官僚有张景全(原中组部部长,此人最近经常参加乌有之乡活动,如此高级别官员加入极左,值得关注)、张德勤(原中央政研室局长)等;“红二代”有黎阳等;知识分子有司马南、孔庆东、左大培、张宏良等。

3. 舆论阵地有乌有之乡、AC 四月社区、红歌会网等。数量和影响力在这两年都有快速增长。

4. 目前来讲,极左势力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城市草根阶层。

五、党内保守势力和民间极左势力的互动

1. 以前党外极左只是“草寇”,是被严格提防的。极左派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敌。

2. 2008 年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后,极左派开始与体制挂钩。乌有之乡大力吹捧重庆,司马南、张宏良私底下也与重庆有互动。重庆方面有限度利用极左为其造势。另外,中央一些拥护薄熙来的保守派官僚,也在私下授意,用极左“挺薄”。

3. 2010 年极左派组成“名博沙龙”,并且找到中央文明办(与中宣部合署办公的部级单位)挂靠,中央文明办也开始重视极左的价值。

4. 进入 2013 年,极左与党内保守势力的互动频率陡然加大,极左马钟成在人民日报发文骂宪政是“吃人政治”,其身份陡然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尹国明(微博名“大众老虎”)的文章《剑指谣言 要敢于亮剑》也被人民网、新华网高调转载,其头衔赫然变为“无锡社会主义学院特约研究员”。周小平也被邀参加国新办

主任鲁炜与网路名人的座谈会，据说是鲁炜亲自点名要他过来的。这些极左不仅可以在官方媒体上说话，还开始具备了官方头衔，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政治信号。

六、保守政治势力突起的未来影响

第一，在党内干部纪律、新闻言论、公民结社等方面将会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前景大打折扣。

第二，保守政治势力的公共应对能力大大增强，将会影响越来越多的民众。比如，过去官方媒体只会事后灭火，现在则会主动利用电视台、网络去造势。过去的极左几乎没有舆论阵地，现在极左分子越来越善于利用网络媒体，他们也开始建立网站，占领论坛，开设微博等。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粉丝页已经到百万。保守政治势力慢慢学会了现代社会的舆论公关和网络技术，其舆论空间已经大大被拓展。

第三，随着体制内保守派身份和观点的逐渐展露，体制内保守和改革的分野将会越来越大，两个阵营的雏形也日渐显现，未来有可能在中共内部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另一种可能是，体制内保守派会成为未来保守政党的雏形。

第四，党内保守派和党外保守派的合流，会使党内保守派的群众基础增强，增加了保守派的力量。

结语

总之，2013 保守政治势力的高调亮剑和体制内外保守派的合流，将会对中国未来政治生态带来深远影响。在保守势力的刺激下，保守与改革的阵营分化也将会越来越明显，双方的对立也会加剧。保守政治势力公开发挥作用，有利于其扩大影响力，中国未来左右分野的政治蓝图轮廓隐约可见。■

经济篇

资本观察

从高铁债务说起

作者：唐啸聚

9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高铁改变中国》（<http://cn.nytimes.com/china/20130925/c25chinarail/>），称中国高铁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成功故事，对于防止中国经济陷入经济低迷起到了重要作用。鉴于《纽约时报》曾经非常贬抑高铁，这篇“平反”文章益发耐人寻味。

同日的《纽约时报》还发表了另一篇文章《中国高铁安全纪录良好，隐患犹存》（<http://cn.nytimes.com/china/20130925/c25railand/>），称“中国高铁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安全的运输系统之一……两年前的列车追尾事故导致40人死亡，把它跟中国高速列车过去几年中没有致人死亡的车次数量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高铁整体来说非常安全”。文章引述了世界航空安全统计权威 Arnold I. Barnett 的话：“中国高铁到目前为止的死亡风险率水平，跟世界上最安全的航空公司一样或者更低。”

安全问题曾经是中国舆论质疑乃至非议高铁的两大理由之一。既然这个理由可以排除，对高铁的质疑主要来自它的巨额债务问题了。确实，铁路系统的负债率据说已经超过百分之六十，甚至超过了以高负债率著称的房地产企业。吴敬琏就多次声称，高铁三万亿债务最终要由人民埋单。

吴敬琏肯定会对央行7月初的一项决定感到愤怒。央行在那份公告中宣布，同意将中国铁路总公司新发行和继承原以铁道部名义发行的各类债券融资工具统一归入政府支持机构债券，有关数据调整上溯至2013年1月1日。（<http://finance.qq.com/a/20130717/018525.htm>）在吴敬琏这类市场原教旨主义人士看来，这意味着铁路系统绑架中央政府的信用，罪莫大焉。

为什么罪莫大焉？

因为中央政府对铁路系统融资的支持，最终要靠印钞票来实现。印钞票导致高通胀，而

高通胀是万恶之源。在绝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那里，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但是且慢，印钞票和高通胀之间真的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吗？

汇信资本董事总经理叶翔，是金融圈里难得的一位有独立思想的人士。他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未必会带来通货膨胀（<http://yexiang.blog.caixin.com/archives/60705>），真正的通胀，即 PPI（生产者物价指数）与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时快速上涨，意味着产能不再过剩、商品不再供大于求，而劳动力工资与租金成本仍然不断上涨。这与货币供应量的松紧关系不大，更多是跟实体经济结构有关。

事实上，高铁改变了中国的区域经济版图，优化了实体经济结构，有利于缓解通胀。

对于高铁债务问题的争议，根本上来自对货币属性的争议。

货币总是一种债务，是央行的负债。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债务不能没有约束，或者是建立制度约束如预算民主、支出透明，或者是利用市场机制，通过“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不外乎这两条道路。以此观之，铁路系统债务这种“预算软约束”，实在不伦不类；与之类似的，还有遍地开花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导致的地方债务。

但以当今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预算软约束”却又是一种“必要的恶”。因为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条条还是块块，都存在严重的错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力事权严重不匹配，地方政府需要提供大多数公共物品，包括具有超前性、生产性和收益外溢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其财力却因为分税制而削弱，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常常难以落实。对于这种情况，无论是预算民主还是市场调节，都只能是隔靴搔痒，治丝愈棼。首要问题是行政体制内部的分权与制衡。

但是，行政体制内部的分权与制衡，又绝不是仅靠“顶层设计”就能解决的，最终还是要靠各地方、各部门的试错和创新。不能只看到铁路系统、地方政府绑架中央政府信用的一面，也应该看到这个权力过于集中、治理意识却相当落后的中央政府，只有在被绑架信用的情况下，才能做出改进——此即所谓“倒逼”。

换言之，正确的思路，不应该是先定好货币政策，把各部门、各地方的“预算软约束”当成整治对象，而应该是在承认“预算软约束”现实合理性的前提下，去设计货币政策。而这就需要看到，货币的属性不仅仅是债务，还有别的。

以提出“金融抑制”概念而著称的经济学家麦金农，很早就将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远超经济增长率、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成功地控制通货膨胀的现象称为“中国超额货币之谜”。而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日本经济学家清泷信宏则发展了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的

观点，指出货币存在的理由是提供流动性。以此而言，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实乃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中国的金融抑制依然非常严重，普通人获取资金的成本依然高昂，因此要通过巨大的货币供应量来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这种状况当然是不正常的，从长远来看，必须改变金融抑制，利率市场化即是重要环节，以此普遍降低获取资金的成本。但是这也意味着，货币供应量的松紧并不是关键，没必要闻债色变。央行将铁路债券归为政府机构支持债券的做法没错，这是央行人士比吴敬琏高明之处。

即使是充满隐患的地方债务问题，也不应完全当作毒瘤，要看到很多地方融资平台确实起到了为当地百姓提供公共物品的作用，如果没有它们，很多底层民众的生活会更加困顿。长期的解决之道在于重新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力和事权的分配，短期而言可以靠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手段。如果一味指责地方政府罔顾收支平衡，未免迂拘。

总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型国家来说，赤字经济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经济、金融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信贷错配，让大量资金流入无效部门和寻租集团。如果一味反对赤字经济，就会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进入另一个误区。 ■

阶级篇

新工人观察

工人超长时间工作的困境

作者：巩高兴

最近几年，实体经济或制造业遭遇到的困境，通过媒体散布出来并被聚焦放大。而在为资本代言的文人笔下，工资增长过快或法定最低工资增长过快，是这类困境的一大主因。但实际上，当资本遭遇困境时，将危机转嫁于劳动者是成本最小的摆脱困境手段。因为在利益相关者中，政府及国外客户是强势的，只有劳方是弱勢的。

当资本通过减少工人的工作时间、工资或福利、定时定人的条件下增加产量、裁员等方式将危机转嫁给工人的时候，在社会与工厂中处于最底层的工人，不可能有转嫁危机的下家。原子化的工人，如果要反抗组织化的资本，成本风险太大，而将危机转嫁于同类（有人发现，对底层人最狠的是底层人）或转嫁给自己（减少支出或寻找兼职），成本要小些。理性人权衡利弊后会选择后一类方式。

很多已婚有子的工人，为了补贴家用，会在工作了 11 至 12 个小时后，寻找各种营生。比如广泛存在于珠三角工业区的电单车载客。我的一个男同事，每天下班后就会去拉客，运气好的话，两个小时内会有三十元左右的收入。他说喜欢雨天，那样坐车的人会多些。他也喜欢半夜去拉客，那样收费会高些。而电动车载客行为是被当地政府禁止的，抓住就会没收载客工具。但他告诉我，他们有破财消灾的方法，每月每人将 20 元钱通过群体中与所谓执法队接近的人，孝敬给某执法队员，此人就会将执法队何时外出抓捕的消息发送过来，然后以短信的方式在群体内传播，以便躲避。还有同事在周末晚上会以给当地村委每晚 10 元钱的代价，去人家规定了地点的夜市摆地摊获取收入。有的女同事，会在工作之余承接以塑胶产品为主的工厂外发货（有人总取散发），在租房加工以获取收入。当工厂因盘点而放长假时，很多女同事不会去休息玩乐，她们会去小型加工厂做临时工获取收入。

有个“80后”的男同事，老婆在家带小孩、务农且打临工，家庭开支主要依靠他的2500至2800的收入来维持，为了省钱，他从来不自己做饭，也很少去饭馆吃饭。不论平时或周末，都在食堂吃廉价味差的大锅饭。

无话语权与代言人的工人，其生存困境只能被漠视、掩盖。资本抱怨最低工资增长太快，但是在珠三角，在现有的1300至1600人民币的最低工资水平下，大家只有通过每天3至5个小时的超长加班，才能维持最基本的家庭开支。大家最怕没班加，而资本与经理人抓住工人的这一软肋，用“不准加班”作为手段，处罚那些违反了他们单方面制定的厂规、却事关工人基本利益的行为。不了解大陆工厂内情的一些境外劳动机构或个体，呼吁减少工人的工作时间，以使其有时间休闲或学习。事实上，不增加工资却减少工作时间的举措，只会使工人生活陷入困境，这是一种无知的善愿。■

社会组织与互联网篇

非官方教会观察

心灵秩序与巫术崇拜

——“中国的信仰转型”研究手札（一）

作者：李晋、马丽

当下中国可谓乱象丛生，很多频繁被媒体曝光、在公共领域被讨论的现象，有的突破伦理底线，令人咋舌，有的则像文革招魂，令人不寒而栗。这些乱象背后是否存在某种一致性的解释？

首先，近两年在中国的新闻中，频繁出现政府官员性侵犯未成年少女普遍评论都认为这是官员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社会道德失丧的结果。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些各地都频繁发生的性侵犯少女的事件归结为权力或制度的失序呢？其次，近些年来，中国曾经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反日游行，无论是作为官方或者民间这种模糊的背景，却成为了中国极少遍及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各地也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唱红运动。再次，2011年，因为日本的核泄漏，中国社会居然出现了一种对于食盐短缺的恐慌，而导致了一种看似集体无理性的抢购风潮。事实上，中国每一天可能都在重复的发生同样的事情，许多研究者将其归咎为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或者制度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将每一个事件割裂来看时，每一种解释最后都流于表面上的权力的无限制、或官方对于舆论的控制等等空泛的“体制”问题。然而，我们必须寻求问题的根源，一种对中国社会转型当下这些问题的根源的解释。究竟是否存在够这样一种一致性的理论呢？我们必须承认，单以后共产主义制度变革社会转型的解释框架为出发点，并不足以提供给我们对于中国现实的理解，那么是否我们可以首先重新思考中国社会政体和社会结构的解释框架，提出新的维度来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呢？这些一连串事件所构成的普遍实在是否能够产生于共同的实在问题之中，而内嵌在这个社会结构的运行当中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将这些问题放在一边，而是从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层结

构和精神实在中寻求其根源。

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者而言,很少有人将我们这个时代所进行的各样的转型和运动归咎为宗教信仰的运动。但我们的发现却有很大不同。从2009年开始,我们以社会学家的视角,对内地的中层组织进行了三年的田野访谈,研究的话题涉及中国人(大多是城市居民)的心灵秩序和宗教信仰、对于公共事务的认知度,转型期社会身份、社会运动的参与程度,以及对于政治制度的理解等等。在这段时间的田野过程中,我们的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许多人对于宗教信仰的皈依,并非是从一种无信仰的状态皈依到一种有信仰的生命状态,事实上许多人是感受到一种个体或者集体性信仰的破灭之后,转而归信到一种宗教信仰上。

访谈1: “六四”事件的枪声,把我们对共产党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就好像股市崩盘了,完全垮完了,觉得没有望了。情绪低到最低点。其实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我们老街坊,市民很不错,很多人很有思维,就在那里讨论这个事情,说共产党太黑了,不会长久的,这个是我们内心的。以前因为对这个政府觉得还有希望,很多人都把这些希望…如果你们愿意把这个社会变变好,我们还是愿意做好工人、做个好良民。这样一搞,把这个社会…把你的希望完全破灭,人是相当痛苦的。我这个时候觉得人该找个归宿、找个信仰。中国几十年没有其他信仰,只有共产党,只能信党。我就看了很多佛教的书,但觉得它太消沉了。我对基督教不了解,只不过从电影里看到教堂的,那种神圣性。因为我在唱诗班,我看电影就观察里面的唱诗班,那种合唱,很感人。(61岁, w, 2011-01-23)

访谈2: “那几年,我只要回到天水,就一定想要到他家,去了就不想走。遇到这个问题,我又去找他。和他说这个事,我问他,李老师,为什么你经历那么多政治运动,遭受那么大的难处,你总是很喜乐?你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他和我说了一句话,“空口袋是立不住的”。我说,李老师你口袋里装了什么?他说,我是基督徒。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去的夹边沟。我听了这话,觉得挺可笑。我说李老师,我毫不在这个事情上歧视你,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我觉得,他是基督徒,和这件事又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这样说,我很尊重你,我绝不是因为这个对你有看法。他说,你没搞懂,基督教信仰是一种世界观,他就给我传福音。那是71年。他说了以后,我才觉得,这才是真理。当时就觉得,那天天喊喊毛泽东思想是真理,哪里是嘛,天天打到这个,打到那个,哪里是真理?他还给我看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我一看,这个话太甘甜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再谈到,要有审判,我说,我

必须信，如果不信，我所犯的罪，将来审判的时候，我无地自容，地下找不到一个洞，找到就好了。一点挣扎都没有，因为共产党的东西，在我里面早就垮了。”(67岁，Z，2011-2-09)

如果我们仅仅将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理解为一种制度上的变革，即从共产极权转变为后共产主义制度或某种资本主义制度，或是一种宪政主义转型，那么我们很难解释中国当下的各样的悖论和困境。这种理论将整个社会统一到世俗领域的理解框架之内，它同时也就将人的精神实在视为外在变化的表象，犹如刺激-反应机制一样，但它形成的不过是一种循环论证，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将整个社会秩序扩展到宗教信仰的层面时，我们会发现，社会转型实际是在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上进行着运动，也就是人们信仰秩序（order of belief）与世俗秩序（order of secular life）两种层面。如果我们将1949年之后的中国政体简单的理解为一种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政体，仅此而已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彻底解释目前的这种状况的转变，最多可能归咎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

然而，在我们的访谈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当信仰者讲述他或她的信仰历程的时候，很多人讲到了从文革、民主墙到八九政治运动对于他们内心的冲击，以及一种身份归属上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的出现恰恰是一种信仰的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缺失所造成的。我们要强调的是，49年之后，中国政体所建立的不单是一种共产主义政体，而是提供了一套较为粗糙的宇宙论和真理标准的“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世俗专政政体的建立，以及对宗教体制性的逐渐改造和消灭并没有使得中共的政治结构成为一种世俗化的机器。相反地，维持这一政体运行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宇宙论和价值观、一种世俗性体制的“创造论”（a secular creationism），需要提供的是一种创世的叙事文体，一种神话，以及各样神圣性和禁忌，以及对于道德形而上的提倡并且将“精神-实在”的二元对立能够互相作为转化的依据。例如，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现象是，在中国政体演化的过程之中，曾经有13次大型的阅兵，这种政治宗教的仪式化，它所需要表达的世俗的神圣性，有例如从1949年到1958年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创世象征意义的再现，然而之后就是通过一种更为广泛的群众性的运动，将这种救赎精神弥漫这种社会实在的各个层次之中，其敬拜的方式也从对于统治偶像的崇拜，转变为一种更为技术性的重生，通过对于固有血统的崇拜转化为一种将生命个体、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转变为一种技术、宣传、单位组织的机器运行当中。我们很容易的发现，其“批评—自我批评”如同脱胎于任何宗教中都会具有的一种忏悔沉思模式，而末世论意识事实上弥漫在毛和整个宣传当中，各样神迹作为新政体合法性的建立，将精神转化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实在也是

在这个政治宗教中也最能留给人深刻的影响。对于圣物和圣徒的崇拜事实上也在文革前期达到一个高潮，人们对于“毛主席的金芒果”的崇拜，各样宣传榜样的兴起，总能够让人发现其明显宗教性的特征。

因此，对于文革后、乃至“六四”之后的中国社会的转型而言，它所经历的不仅仅是在表面物质实在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制度变革，而是一种心灵秩序逐渐瓦解的过程。这种由政治宗教所提供的宇宙论、生命体验、经验性的价值乃至生活方式、家庭婚姻的价值，都首先开始动摇。这样所导致的单位制、组织制度的瓦解，又将社会实在带入了人们的精神状况中。我们看到，中国社会普遍的一种焦虑感，其本身已经不再是对于末世论的一种恐慌，而是对于当下自我的身份、价值和不确定性的恐慌，这一焦虑不是对于如何救赎的恐慌，而是对于本体存在的恐惧。对于整个官僚体制的运行机制而言，它始终能够维持的条件根本不是在于外部的冲击和反抗，而是对于内部所进行的精神联合的瓦解。

尽管对于文革前以及之后十多年时间的历史解释中，如果我们加入宗教维度，从而将世俗政体扩展为政治-社会一体的政治宗教时，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文革乃至“六四”之前，中国政体在内外冲击时，还能进行维持，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作为可朽的利维坦，其能够将政治的合法性在精神-物质两种实在中进行相互的转化：当物质实在不足时，政体所提供的精神实在仍旧能够作为集体性的共同的宗教经验乃至经验作为社会黏合、政体组织运行的动力。然而，随着“六四”前后的精神经验的瓦解，人们缺失的首先是作为共同体的经验性的共享，因而作为强制性或半强制性的单位，集体组织的并非是被市场所瓦解，而是瓦解之后被市场所替代。人们常常将 89 年视为中国政体意识形态的崩溃之年，当我们转而回顾上世纪 80 年代时，展现在眼前的景象实际上是精神性的紊乱和意识形态的瓦解，早在此前就已经发生了。实际上，中国人在上世纪 90 年代对文化的讨论，对神秘主义、特异功能，以及例如气功热的兴起，都是整个官僚体制和政治-社会一体组织精神实在瓦解后才可能出现的现象。韦伯在《中国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中指出，中国的官僚体制所纳入被其所认可为正统的巫术，但是这一政体会对民间兴起的巫术进行压制。政教一体开始瓦解象征它本身在单一宇宙论内部出现了其他的真理，甚至与其相互冲突，但是有些却会以一种现代性的象征进入到政治之中。在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可以认为当时出现了一种“后共产—现象主义”。¹人们也常常将唯物主义和现象主义相互混淆，这种“后

¹ 沃格林在《政治观念史稿·第六卷》将现象主义定义为，它倾向将现象间关系解释为作为一种复合体的情感和观念，这种复合体倾向于将现象的关系解释为科学的主体来作为事物实质秩序。

共产—现象主义”的象征以两条线路在中国社会作为一种精神-物质实在瓦解的替代：一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滥，这种竞争意识充斥了整个政体之中，并且不能够自由转化到任何领域，而只能够被依附在第二种即经济现象主义的运行之中，我们必须承认沃格林对此的洞察：“即使通过那些试图重建社会实质秩序的革命，也不能打破这样的冷酷行为。极权主义的革命，共产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它们的要素中都存在对于打破自由经济痴迷和演化出新的实质秩序的欲求。然而，在不同程度上革命的实质被新的计划的现象主义所遮蔽。“计划”（plan）将会像自由经济的市场机制一样，成为遍及于社会实质秩序之上的经济关系的一个系统。实质秩序的观念将会成为一个前提条件，离开了它，计划的观点就是空谈。然而，在政治实践中，我们发现它们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样的趋势，将计划树立成为绝对的秩序，对待个人视为计划的一个功能，甚至相比现象自由主义对待个人时更为得残忍，在经济行为的互动中这种计划只是将个人视为一个具有功能性的要素。”在经济现象主义的背后，“我们注定目睹了道德意识的衰落，并且自发去接纳罪恶，这些罪恶也就使得随着在短期中的所受的困难通过最终在长期中的收获作为补偿，这种现象关系转变为了一个实质性的义务秩序而产生出来。即人不仅仅是商品的吸收剂，而是人的地位决定于其与整体社会间的关系。所谓的个人商品的那真实的均衡，实际上可能出现，并且和经济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它确实只是一种现象，而实质上那真实的贫困和富裕，这些决定于其他社会成员的贫困和富裕之间的关系，可能根本就不会被改变。对于在社会中人的实质秩序的起源是被忽视了，在原则上，这和生物学的现象主义中那种现象行为的残忍冷酷是一样的”。因此，无论是经济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事实上都是在一种现象主义之上的行为，这些在场域中的权力竞争最后只能再次的转化为权力竞争的另外一种形式，或者转移到另外一种场域。

因此，当我们从精神-物质实在的转化，将中国转型作为政治宗教随着心灵内在秩序的瓦解和外在秩序的错乱转化为世俗现象主义运动的形式的时候，我们能够将前面所提到的一系列的事件找到一种合理的理论框架的解释。

当整个政治政体的宇宙论和真理论在危机中不足以转化为维持政体运行的实在机制时，然而对于真理强制解释性的占有，对于其他制度性宗教的排斥，导致没有任何内在实在给予外在实在提供任何的转化，然而，因为政治宗教的瓦解，人们在其碎片之下需要唤起

无论在任何时候，现象都被当成是实质，我们应当将实质化的结果命名为“现象实在”。一旦科学的象征和关系被作为实质所接受，作为其结果的现象实在能够作为其思考的客体，犹如它是实质的实在（substantial reality）一样。

(evocation) 神秘之灵，无法抑制对于巫术这种非建制性精神实在的诱惑，这种渴求的背后已经不具有任何神圣性的不朽，因此无法寻求和转化为建制性的宗教，无法转化为对于神圣性的崇拜，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在政治宗教瓦解之下，现象主义的一种诡异的形式，将彼岸世界的不朽转化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断的自我复制和否定，经济现象主义开始垄断对于真理的解释权柄，并且成为将不朽转化为短期的箴言，“在长期我们都将死去”。因此，对于性侵犯幼女而言，新闻中透露出来的不是对于性本身贪婪的扭曲，而是一种巫术献祭的方式（许多官员认为这是从处女获得提拔的方式），巫术本身作为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成为这种理性化体制在失去精神神圣化的献祭，在政治宗教本身的信仰存在时所受到的压制，一旦政治宗教本身精神实在的瓦解后，也会依附在任何一个碎片之上，政治宗教中所创造出来的群众运动的高潮，成为集体记忆，在这种集体记忆中，当时去神圣领袖和心灵秩序时，政治崇拜本身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却丧失了本质性的实在，当大型的群众性运动丧失了精神/秩序时，我们所见到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极端化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也不过是这种运动本身的后果，其并非成为政治宗教中群众运动的反面，也不可能否定群众运动，每一个孤立的个体性本身其自身微宇宙的失序，导致的是对于新的偶像化的崇拜运动，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唱红、无论是群体性的事件，无论是反日的游行，任何一种仪式化的象征符号背后，不是集体性的非理性，而是个体在政治宗教精神-秩序失范时，对于新的宗教仪式的寻求，对于一种奥秘体的不朽的渴望，对于肉体转化精神的渴望和恐慌，这种精神的实质，在中国个人性的特征下，我们看到其面向两种方向进行延展，一个融入于制度化宗教所带来的对于永恒和不朽的渴求，另外一种则祈求人类社会中长期被正常秩序下所压制巫术禁忌，并且伴随着试图用现象主义的方式代替永恒的精神实在，将彼岸/此时处境下所具有的张力转化为在当下的恐慌和焦虑，我们在任何一个失序时代中都能够发现这样的现象，群众运动所具有的精神化的特征完全的缺失，这种运动不是指向对于任何不朽和可以朽坏的宗教的敬拜，而是依靠这种运动中两种对立的力量来试图形成新的宗教的方向，时至今日，我们目睹着任何主义的争论本身，都是试图在召唤同一种属灵的实在，事实上并没有任何区别的告诉人活在当下的次级存在之中。

我们将中国 1949 年后的政体/社会理解为一种政治宗教的运动形式，伴随着其宇宙观、真理观、及在精神层面神话符号的瓦解，同时与社会实在层面所进行相互的转化，在这种运动形式的转型中，随着政治宗教的瓦解，其表征的社会实在已经转化为一种现象主义的运动，成为祛精神的次级存在，所表现在个体领域的焦虑和不安，只能召唤政治宗教本身所压制的

巫术。在集体性的层面中，个人性的不安指向一种恐慌性的集体中寻求安全感，所以，任何脱离了心灵或精神实在所召唤的主义和信条都可能会将个人心灵与实在相互隔离，言语的统一性和消费的同质性将所有个体的人放置在一种虚幻的反抗和欢愉之中。任何不具有永恒意义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国家主义、个人主义都侵入到精神的目的领域中，而我们看到各样的恐慌，就是它们本身已成为一种实在，这种实在本身已经成为了可朽坏的政治宗教的替代之物，这就是古代巫术崇拜的复兴。■

NGO 观察

一份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提纲

作者：梁雅茜

背景：1.改革开放 30 年，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公民的形成；2.政府的警惕：2008 开始的寒冬；2011 “公民社会”成为敏感词。

1. 什么是公民社会——超越国家 / 社会的二元框架

常见定义：capacity of a political community to independently organize itself, and resist the illegitimate state intervention。 国家和市场以外的第三空间。

问题：只着眼于与国家的抗争。陷入了国退民进这样的二元陷阱，通过反抗的激烈看中国是否存在公民社会的争论是伪问题。

应该结合后改革（post-reform）时代，中国如何在 non-liberal 的环境下实现治理术的转变。国家并不需要完全 repress 公民社会，而往往是主动地利用和结构化公民行动。

中国已经采用了很多新自由主义理性的治理术，例如通过主动吸纳群体行动，利用公民

组织; i.e. 基层运动, 社区建设; 以及主体建构, i.e. 用“自主性”和“选择”来搞定年轻一代的 professionals (hoffman); 也可以分化, i.e. 中国慈善界的分化。

有学者称之为“远程社会主义” (socialism from afar): 新自由主义理性和新型社会主义理性的混合。这同时提供了公民社会与政府合作达到社会创新的机会。政府部门内的不同派别斗争, 弱势一方往往要利用民间声音的支援达成改变。i.e. 空气污染治理, 可再生能源。

[与新自由主义国家和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比]

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不同的治理方式催生出迥异的公民社会。北京的 NGO 更多与政府部门直接沟通, 上海的是智库+技术官僚, 广州是蓬勃的草根 NGO 和社会创新?

中国城乡的巨大区别. 农村地区有何路径催生出公民社会?

2. 公民社会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和信仰公民

社会不只是制度性空间。

a world of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that generates the capacity for social criticism and democratic 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建立在原则性的同理心上, 一种普世的世俗化的信仰。其实是一个处理多元性的社会原则。中国差序格局, 与他人的关系取决于家庭、地缘、社会关系等 non civil sphere 里。

也不等于志愿, do not project communicative judgement in the wider civil sphere.

中国的公民社会最终要实现这方面的建设, 而不仅仅着眼于单次抗争 / 项目 / 服务具体做了什么, 而是通过每一次的实践, 如何进行 norm 的建设。

public opinion 的重要性。因此公民社会是需要建立在公众意见之上的。大众媒体作为公民社会不可缺的 institutions.

3. 公民社会永远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个状态 / 阶段。反对中国处于前公民社会阶段的说法。

4. 未来发展趋势

不同功能的公益组织们在一个地域空间内可以密切合作和形成联盟, 产生规模效应和集体行动, 这就是集群理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ICS)

的“社会创新实验区”就是一例，它由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培训、中大公益慈善研究中心提供研究支持、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资助。机构相互支持给力，减少交易成本，形成典型的公益联盟。这么做的好处在于，集群规避垄断的风险，又促进合理竞争，保持创新动力。

其中 NGO 主要有 3 梯次：1.国际 NGO 作理念上的倡导，因为政府其实不能拿它们怎么办；2.社区 NGO；3.街头抗争的 NGO。■

边疆篇

新疆观察

十年后，回顾新疆“内高班”

作者：热依莱

第一届新疆内高班（内地高中生班）的学生，毕业马上就要十年了。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机制，内高班的设立，对于新疆会带来什么长远影响，我想现在评判还为时尚早。十年之后，作为其中的一员，回顾那四年，对个人而言，虽然影响深刻，但却也并不十分怀念。

模糊的内高班

2000年，即我上初中的最后一年，在父亲的要求下，我参加了内高班的考试。当时，我们对内高班这一政策没有任何了解，仅仅知道自己如果有幸考上，就会交很少的学费，会去内地教育质量很好的城市上高中四年。至于会去哪个城市，根本不知道。第一年的内高班政策——选拔一千名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去内地上学。比例很大程度上，会对来自农牧民家庭的民考汉及民考民学生倾斜。

记得那一年的暑假，过的异常挣扎。因为担心自己考不上会让父亲很没面子。等一切焦急过去后，我收到了宁波中学的入学通知书，注明我的学费是900元人民币一年，这是按照学生家长的收入决定的，还有一些同学交450元，另有一些人不用交任何费用。至于，家庭收入应该怎么统计，也没有任何公开说明。入学通知书还规定，我们只能两年回一次家，当时因为很高兴，也没太在乎这些。我想，我们之所以激动，是因为觉得这是一个最安全的被国家培养的通道。

不过，妈妈并没有为此高兴，因为我将远远地离开家里人，到很远的地方。只是因为她几乎不能左右父亲的决定，而只能由他。虽然，我对自己离开家人，也心生一丝难过，但对于一个来自偏远团场、从未见过大城市的十几岁初中生来说，对未知的宁波也充满了各种美

好的期盼。

我们被通知到地区市中心集合，然后一起去乌鲁木齐。

我们是半夜到达乌鲁木齐，我依稀记得乌鲁木齐是一个危险的城市，所以千万不能自己一个人出去。我们在乌鲁木齐呆了三天，有好几次集中学习，介绍我们的带队老师。记得，我们开完集体大会后，因为我还戴着头巾，穿着长裙，被宣传这一政策的记者抓到，要我感谢下党的政策……。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如果当时教育厅严格调查我的户籍，估计我根本不能成为他们计划培养的一员，因为我来自兵团，而第一年据说兵团没有名额。

现实的内高班

第一届宁波中学招了 80 名学生，是招收民考汉和汉考汉四个城市中的一个。其余三个城市分别为，深圳、天津、苏州。

宁波是一个很美的城市，但第一年，我们 80 个人被安排到一个离原宁波中学比较远、本来准备做聋哑学校的学校。刚开始的几个月，很多同学对这个安排非常不满。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和别的城市比较后，觉得宁波中学对我们很不公平。

前面几个月，大家都非常想家，几乎每个人都天天打电话回家，然后天天都哭得很厉害。我也是其中一个，直到有一天被父亲狠狠地说了一遍，不要天天打电话……

另外，由于我们的餐厅没有穆斯林厨师，开始几个月，很多同学愤愤不平。但几个月的不平过去以后，一次评估考试把我们拉回了现实。因为，民考汉学生的成绩，和汉考汉学生相比差距实在很大，一次评估考试后老师的单独谈话，让我们突然明白，我们之所以来内高班，是为了学习，而不是为了讲究条件。

而我们很快也都习惯了严格的作息制度。早跑、吃饭、早自习、午休、晚自习……外出还另有规定，必须至少两人一起外出，外出时间不能超过特定时间，如果违反将会记过处分，取消一次外出机会等等。

由于自己一下子从过去的好学生，变成了差等生，情绪变化很大。

内高班的第一年是预科。这一年，听说很多其它城市的学生，由于学习压力而得了精神分裂，被送回新疆，甚至有人想自杀等等。这些都是传言，当时没法证实。到了大学，非常凑巧，我的室友，杭州新疆班的女孩子，说他们学校的确有人有过自杀企图。而另一个学弟

的哥哥，上海新疆班的学生，确实由于精神分裂而被送回。而在宁波，预科结束，由于成绩不合格，四名男生被退回。这些名额到高一很快就被补上了

预科考试结束，大家要求学校送我们回家，因为学校没有收到新疆教育厅通知，让我们在学校无所事事地待了两周，然后才通知我们可以回家……

高一，又有新的预科生来到了我们学校。由于新来的学妹、学弟非常顽皮，老师们一直对我们第一届学生的听话赞不绝口。但是，记忆中最多的就是好好学习，提高自己的排名。

高二，我们终于和宁波中学本部的学生安排到了一个校区，但是，新疆班有自己的一层楼，除了体育课和音乐课，我们和宁波中学本部的学生有些交流外，其余都是新疆班自己玩自己的。

高三，学校为了我们不被打扰，而把我们安排到了最高的一层楼，和其它宁波中学的高三学生同一层。这一年，有几个宁波中学本部的老师也给我们上课，但是，那种无名的压力，有时候几乎让我无法呼吸。

这四年下来，我的视力由 5.2 变成了 2.5。我唯一没有为学习而改变的，就是我的长发，虽然自高一开始，英语老师一直要我把头发剪短，方便学习，但我坚持不。现在想着，觉着自己当时不是固执，而是有些荒谬。

当然，这四年学校也组织我们去很多地方游玩。比如杭州西湖、绍兴等等，而我们去上海的愿望终究未能实现。

十年后的反思

高考前，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郑重地对我们说，等十年之后，你们再想起来这段努力的岁月，你们会感激这一切。但是，现在，我想我不再同意她的看法。十年后，如果再让我选择，我可能不会再选择内高班这样的读书方式。

大学志愿，我们另有名额，所安排的大学和专业都很不错。而且考师范类院校不需要交学费，我想后来如果大家知道毕业后有特岗教师这样的安排，估计师范院校会很热火。当时我们都错误地认为，师范院校是针对考不上大学的学生的安排。据说，大部分同学都考上了第一志愿。然后，大部分同学又都回了新疆。

虽然，我对那几年的学习想来都感到惧怕，但是并不否认，是内高班，让我有机会看见

新疆与内地教育的差别，新疆与内地沿海城市发展程度的差别……。也让我明白，其实内地对新疆少数民族的理解非常有限。我也很难断定，这四年中，那些与我们有过直接接触的当地人，是否会因为我们，而加深了对新疆的理解；或者，是否会因为我们，而加大了对新疆人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偏见……。或许兼而又之吧。起码，在学校里，从预科到高三，就总少不了一两个老师对“帮助”我们而不满。

据教育部发布的信息，开办十几年后，内高班规模已经扩大了很多。现在有 50 多个城市开设，人数也累计达到上万。并且，除了内高班，也出现了内初班、协作计划学院以及内职班学校，专门由自治区教育厅专设的新疆班部来管理。

因为内高班的扩大，有维吾尔知识分子称我们为“被偷走的一代”，即在内地汉族集中地区用全汉语学习，会渐渐淡忘本民族文化。一名有内高班经历的民考汉学生说：“我一直对这一制度充满警惕，不过不可否认，内地大城市的学习确实提高了我的竞争能力。”

我想父亲最终明白，其实进了内高班，并不等于一切就变得顺利了。到了大学，我一样要贷款；毕业后，我一样找不到工作……。■

左右新疆未来的暗流 ——新疆民间经文学校初步观察

作者：李永峰

自从 2009 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新疆的历史发展似乎出现某种转向。主要可以从几个层面判断，一是暴力事件日趋频密，从南疆向整个新疆扩散，而且暴力事件也从以平民为目标转向了以政府部门为目标。今年 6 月 26 日，在东疆的吐鲁番托克逊镇所爆发的暴乱中，“暴徒”有组织地袭击派出所与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典型案例；二是维吾尔社会的宗教氛围日渐加深，对于极端宗教思潮的泛滥，不仅政府担忧，连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维吾尔世俗知识分子也深感不安；三是政府与新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在从“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换，今年 6 月份喀什、吐鲁番、和田多地爆发暴力事件之后，政府“抽调 50 名正厅级领导干部赴全区 50 个敌社情复杂的重点乡镇开展反恐维稳工作”，敌情复杂的乡镇，

已经多达 50 个?! 因为这几个层面的变化, 可以说, 新疆目前正在出现“维稳”压倒“发展”的趋势。

民间经文学校为什么重要?

在新疆历史转向的关口, 另一股暗流也在汹涌, 或许正是这股暗流将左右新疆的未来, 这就是新疆的民间经文学校(也即俗称的地下讲经点)。在新疆传统社会中, 经文学校分三个等级: 高级学校(大学)用于培养学术人才, 主要设在喀什、莎车等有大型清真寺的城市里; 中级学校设在县城或乡镇, 主要用于培养一般的伊斯兰教职人员和教导成年人; 初级学校则设在乡村, 教导儿童学习宗教礼仪、《古兰经》、阿拉伯语等等。其实, 初级经文学校也等于是帮助家长带孩子的托儿所、幼儿园。

经文学校在伊斯兰社会中, 不止传承宗教知识, 也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50 年以后, 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开始严格控制宗教活动, 曾数次命令取消经文学校和经文课。文革以后,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 随着政府控制放宽, 民间很快又出现了大量的经文教学点, 随着他们影响日渐扩大, 政府的政策也从“疏导解散”从严为“查禁取缔”。新疆目前官方认可的高级经文学校只有一所, 就是设在乌鲁木齐的“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 而中级经文学校只有五所, 分别设在喀什、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州、伊犁霍城县。至于初级经文学校, 因为中国政府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教, 所以, 目前散布在各地乡村的经文学校, 可以说都属“非法”, 都是地下讲经点。我们中立一点, 或许更应该称之为“民间经文学校”。

在伊斯兰社会中, 经文学校是一个地方的中心, 是当地民众了解社区事务的公共场所。随着宗教思潮的复兴, 新疆乡村中的各类经文学校不仅没有随着政府的查禁而销声匿迹, 反而大规模扩散, 并在扩散中打破初级与中级的划分, 出现成年人与儿童一起学经的状况。而这种扩散, 又因为经历了从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长达 30 年的无神论洗礼, 宗教人才断档、传统思想难以传承, 所以异端叠出、外来新教派横行。在官方打压的威胁之下, “野蛮生长”的地下讲经点, 充满了无序与混乱。在维吾尔社会全民信教, 而且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情况下, 可以说, 谁能主导新疆的民间经文学校, 谁就具有了影响新疆未来的能力。

外来新教派的影响

目前来看，外来的新教派，意外地影响了众多新疆民间经文学校的方向。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冲击，包括新疆在内的整个中部亚洲地区，都出现过共产主义信仰与伊斯兰信仰的“诸神之争”。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共产主义信仰退潮，传统伊斯兰经学传承也受到几十年的破坏，他们留下了近似真空的环境，给新的教派传入创造了机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解体以来，中亚成为伊斯兰世界各类新教派滋长的温床。而这种新教派的传入，在新疆的情况与当时还属于苏联的中亚五国是一致的。这个过程中，瓦哈比派（Wahhabism）因为主张“回到《古兰经》中去”，注重个人对经典的领悟而非学者的解释，门槛很低，容易接受，而且来自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沙特阿拉伯，更增加了亲近感，所以很快便在中亚立足。

诞生于 18 世纪的瓦哈比派，也是石油富国沙特阿拉伯政府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力扶持与推广的教派。

更重要的是，瓦哈比派可以“凭经立派”，可以衍生出对经典的多样化解释，这为神学理论的本土化创造了机会。根据最近新疆一些地方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反分裂斗争教育宣讲”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将“本土化的瓦哈比”当成了意识形态的头号大敌。在新疆本土瓦哈比思潮影响之下，“年轻妇女蒙面、穿黑长袍和青年男子留大胡须的人增多，日常生活中强调严格遵循伊斯兰教礼仪的现象增多，电子通讯工具中的宗教内容增多，要求朝觐的人员增多，学经人员增多，清真寺等建筑‘阿拉伯化’，以‘阿拉力’和‘哈拉木’即‘清真’和‘不清真’来约束人们行为的现象增多”。（中共特克斯县委宣传部：意识形态反分裂斗争教育宣讲，<http://www.zgtxs.gov.cn/jtbd/ww/xc/2013-07-04/16153.html>）

瓦哈比教派在新疆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莫过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叶城县政协副主席阿不力克木·买合苏力（Ablikim Mehsum）。他因参加主张分裂的“东突党”，在上世纪 50 年代被判刑入狱 20 年，1977 年刑满获释。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因为宗教上的专业水平，阿不力克木·买合苏力成为新疆自治区人大代表、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叶城县政协副主席。从 1987 年开始，在他创办经文学校，追随他学经的“塔里甫”，据说有 800 多人，号称“八百弟子”。尽管新疆武警在 1989 年强行解散了阿不力克木·买合苏力的经文学校，但他的弟子们已将他的思想散布到了新疆各地。

回顾新疆此后的历史演变，无法回避的开端事件就是 1990 年阿克陶县的“巴仁乡暴动”，其骨干成员正是阿不力克木·买合苏力经文学校的学生。一直到今天，被中国政府认定为恐怖分子的疆独成员，大多都受过阿不力克木·买合苏力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阿不力

克木·买合苏力是新疆当前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潮的鼻祖。

除了瓦哈比派之外，更多诞生于中东的新教派，也从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然后又从费尔干纳盆地传到中部亚洲各地，包括新疆。其中，另外一个对新疆深具影响的教派就是“伊扎布特”(Hizbut-Tahrir)。伊扎布特更常见的称呼是“伊斯兰解放党”，由巴勒斯坦人纳布哈尼(Taki al-Din Nabhani al-Falastini)于1953年在约旦创建。纳布哈尼毕业于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本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因与当时的穆兄会有思想分歧而另创伊扎布特。

在阿富汗战争之前，该教派宗教色彩浓厚，坚持“非暴力”理念。但是在美国攻打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时，“伊扎布特”宣布“在美英领导下的反恐战争是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宣战”，在国际社会眼中，开始转型为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组织。2009年，在乌鲁木齐爆发的“七五”事件中，有多股极端宗教和民族分裂势力推动，而“伊扎布特”是其中最关键的一股。目前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多个国家已宣布“伊扎布特”为恐怖组织。

无论是瓦哈比还是伊扎布特，都是通过民间经文学校，在新疆发挥影响。据新疆社科院院长吴福环《“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及对策》一文介绍：“新疆『伊扎布特』组织的骨干人员伊布拉克·奥斯曼是原新疆工学院建工系90级毕业生，1995年毕业后到土耳其上了两年学，归国后在乌鲁木齐市以办学讲课（阿拉伯语等）的方式发展『伊扎布特』组织。该组织规定，凡加入者都要举手宣誓”。这可谓伊扎布特在新疆的开场。

被忽略的教派冲突

民间经文学校自发扩张，纵横交错，令新疆的教派分布出现复杂变化。这期间，普通穆斯林自然也是不同教派激烈争夺的对象。

1996年5月12日，艾提尕尔清真寺的阿訇阿荣汉·阿吉，在准备去清真寺主持当天早晨的第一次祷告时，与他的儿子一起遭到四名刺客，身中21刀，他儿子也被刺13刀。经抢救，阿荣汉·阿吉及其儿子生还。后来，刺客被新疆警方抓获。政府认定是民族分裂主义者所为。

但据新疆兵团干部陈新元介绍，新疆维族上层人士中，颇有人认为阿荣汉被刺是教派之争。“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师党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通报了情况，定性为‘三股势力策动的

严重刑事案件’。会后，我与 E 副政委两人相遇单独交谈。我把此案说得很严重，而他淡淡一句‘这不过是教派之争’。新疆的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的教法学派之一哈乃斐派，该派是正统派。但也有极少数人信奉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在新疆称为依禅派也称‘十二伊玛目派’。在历史上两派争斗，血案不绝。他们认为阿荣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禅派所为。但在公开场合，他们会‘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为这是‘三股势力’所为。”（陈新元《我的两位维吾尔族上级》）

横向比较来看，1949 年之后，同为伊斯兰民族，中国回族内部教派冲突依旧非常激烈。在 1992 年到 1993 年，同属哲合忍耶教派的沙沟门宦回民与陈家沟门宦回民，为了争夺正统性，在宁夏西吉县爆发教派械斗，两派出动数千人次，动用枪支、土炮、炸药等互相攻打，出现几十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的状况。经过四次械斗，“陈方杀死沙方 36 人，杀伤沙方 9 人，沙方杀死陈方 14 人，杀伤 17 人，绑架陈方 2 人生死不明”。“沙陈事件”据说最后是由兰州军区出动才得以平息。如果做纵向比较，那么在新疆历史上，涉及教派之争的案例更是不枚胜举。最著名的莫过于同属苏菲教团的“白山派”与“黑山派”之间的斗争。在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此事也被大书一笔。

1950 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所推动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是新疆历史的一大转折。但此后在新疆所发生的各种斗争，是否都已与历史切割，脱胎换骨，完全变成官方叙事中压迫与反压迫、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恐怕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些教派冲突，特别是瓦哈比、伊扎布特等新教派进来之后，是否因视角不同，而在过去被认定为属于其他性质的冲突，也应该予以重新审视。这对于化解未来矛盾至关重要。

不能确定的未来

政府已将打击地下讲经点视为“维稳”的最主要工作之一，翻看官方报章，涉及新疆的报导，时常会提及“地下讲经点”与恐怖分子的关联。但是，在新疆，伊斯兰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经文学校在生活上的种种作用，无法漠视。或许，未来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对于农村的宗教氛围会有所影响。目前来看，地下经文学校几乎是不可能被取缔的。这是新疆地下讲经点的发展趋势之一。

由于上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的激进无神论运动，导致后来的信仰断层，令中东的新教

派获得机会进入新疆，展开前所未有的大扩张。不同教派对信众的争夺也是必然的。即便王乐泉主政新疆十几年间所建立的极权化统治，对地下讲经点进行持续打压，也没有改变这种扩张趋势。所以，“瓦哈比”、“伊扎布特”以及种种我们目前可能还无法命名的教派都正在新疆扩张，这是新疆地下讲经点的趋势之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硕士生丽扎在《新疆地区非法宗教活动现状浅析》一文中披露，“2008年，南疆三地州查处地下学经人员1320人，其中892人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民族分裂活动。”所以地下讲经点是否会成为对抗政府中心，是所有关心新疆的人都感兴趣的话题。

当今世界最知名的伊斯兰经文学校，莫过于阿富汗人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所领导的阿富汗难民营伊斯兰学校，也就是媒体所讲的阿富汗“塔利班”。奥马尔的经文学校最初也是只有800余名学生，在1995年因为不甘于遭到军阀破坏的阿富汗现状，率学生军发动了“进军喀布尔”，竟然一举荡平除马苏德之外的各派军阀。不讲奥马尔后来收容本·拉登，制造众多挑战文明的恐怖事件，如果只讲最初的理想主义冲动，那么奥马尔的举动或许可以跟中国历史上的两大事件相提并论，远如东汉末年李膺、范滂等人率太学生“登车揽辔，澄清天下”，近如上世纪20年代黄埔学生军的北伐。

塔利班本意只是指伊斯兰教高级经文学校的学生，是“探求者”，是阿拉伯语Talib的音译，中国宗教界更多用的是“塔里甫”。初学经文者或普通阿訇自带的学生一般另称为“满拉”。可以说，目前新疆的地下讲经点并不具备成为阿富汗塔利班式武装集团的机会。但是，地下讲经点是否会成为对抗政府的中心，取决于何种宗教思想主导经文学校的方向。对于政府来说，完全取缔地下讲经点是不可能的，但避免地下讲经点被极端宗教思想所主导，则应是工作的重点。

民间经文学校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因为“非法”状态，始终处于暗处，其影响也可谓之“暗流”。暗流潜藏于地下，积蓄力量，一旦冲出地面，可能会冲毁一切。而当前中国政府，对于新疆问题的研究处处设限，普通研究者要想接触第一手材料极为困难，而享有资源优势的官方学者却又受制于“三股势力”的教条论述束缚，使得当前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间，对新疆维吾尔社会内部的发展趋势，都缺少深入了解。所以，类似地下讲经点这类埋藏巨大能量的事物，未来发展还需更进一步观察。■

本土/国际篇

印度社会问题三则

作者：萧敢

印度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导致了很多令外人震惊的社会现象。这些社会现象往往与“贫困”相联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可能消失。与之相比，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脱贫”工作在整体上比印度要成功得多。但随着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围绕这些贫困现象的“发展理论研究”仍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南印度的弃老现象

南印的泰米尔纳都邦还保留着一种“弃老”的陋习，名为 *thalaikoothal*。简单说就是让老人快速死亡。文明婉转的表述，也可以解释成为安乐死。一般五十岁以上的贫困重病老人，或者罹患重病的年轻人，都适用于这种经典死亡方式。有时老人并不愿意，但也很少会真正反抗，年轻的孩子们总是比老人更有执行力。在法律上，“弃老”从未合法，但也从来没人真正追究过。

这种帮助老人解脱的方法，也是亚洲著名的传统。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弃老窑”，“寄死窟”，“老人洞”等，日本韩国也有所谓“弃老山”之类的地方。传统做法一般是让老人自行饿死，减少道德负担。但饿死的方式往往需要几天至一周时间，而且整个过程较为痛苦。而 *thalaikoothal* 较为主动，子女有多种选择，最多只让老人痛苦一两天，立竿见影。在缺乏社会保障机制，老百姓都无力抚养老人的情况下，这种机制的长期存在并不让人意外。

不妨简单地描述一下南印的“弃老”。一般是子女亲自动手，提前选好日子，让老人有一个心理准备。到了那一天，先给老人“洗油浴”，从头部开始浇冷水和胡麻油。所有南印人对油浴都不陌生，它在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里都很常见。一方面它可以“减少身体热气”而有助于修行。一方面它也具有祝福的象征意义。洗完长时间的油浴后，再给老人喝大量的椰子汁。这样过不了多久，老人可能就开始抽搐，发高烧。幸运的话，老人在当天就会去世，

即使生命力顽强恐也活不过两天。

为何椰子水竟能致人于死地？根据一些医学文献介绍，嫩果椰汁的电解质可与人体血液电解质浓度维持平衡，甚至有“生命之水”的美称。嫩果椰水可增强心肌，可保持体温，因肠胃炎引起的脱水甚至可直接用嫩果椰子水替代生理盐水进行输液。在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孟加拉国霍乱病流行时，很多病人都接受过嫩椰水的静脉注射。当年二战时，日军和英军也都用过嫩椰水进行静脉注射。很多医学专家总结认定，九个月龄的嫩椰水一定可以安全地用于人体静脉注射。

但是南印人如何用这种“生命之水”来杀人？目前存在两种解释。一是认为 *thalaikoothal* 给老人服用的椰水里加了一定的毒药。二是认为过量的椰子水本身就可以杀人。新鲜椰子汁中含有大量的钾离子，过量饮用会摄入更多的钾离子。老人本来就肾弱，或者本来就有肾衰竭倾向，无法有效排出钾离子，积累在肾脏，导致高血钾，随后是心律失常、心脏停搏，很快就有致命效果。而之前进行的油浴会降低体温，也会促进心脏和肾脏的衰竭。这就是 *thalaikoothal* 背后的杀人机制。

南印是著名的胡麻产地，椰子产地。油浴是人们日常采用的清洁方式，而椰子水更是人们的日常饮料。所以南印人很早就总结出这样就地取材，简便易行的杀人方法，延续至今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亲戚邻居知道 *thalaikoothal* 后也不会过于悲伤，都会认为这是印度教里很自然的轮回方式。

不过据说油浴和椰子水的方法已经过时，它也要持续一天，也不见得必定有效。现在的年轻人更倾向于注射死亡。花一点钱找个会扎针的、职业化的医生，就能很方便很保险地送父母归西。这种服务在南印始终拥有广阔的市场。

在缺乏社会保障机制，也缺乏法律保障机制的印度环境下，一个五六十岁退休的老人，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办法积累让自己及妻子生活 20 年（甚至更长）的资本。现在整个印度只有德里，果阿和泰米尔纳都等极少数地方会提供每月 1000-2000 卢比（115-230 人民币）的养老金，勉强糊口。其他地方则只能提供每月 100-200 卢比（12-23 人民币），且领取条件苛刻，这就造成高达 92% 的老年人没有糊口的经济来源。

而对于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来说，更担心的恐怕是女儿的嫁妆或者儿子的前途，老人只能置于一边了。有学者提出建议，老人不妨尽量晚一点把家产分给孩子，这样也许能让孩子也晚一点执行“弃老”。

南印度农民的自杀现象

全世界现在自杀的人群当中，有 20% 是印度人。1997 年以后，印度每年自杀的农民才有一个相对准确的统计。这十多年来，印度自杀的农民已经超过 25 万，每年都有近两万的规模。比起每 20 分钟就有一个妇女被强奸的强奸率，每 4 分钟就有一个印度人自杀，问题更为严重。

自杀是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远不像出生率，结婚率这样相对容易解释和预测。自杀动机也很多，学习不好，婚姻不幸，中年孤独，老病无依，殉夫，抗婚，缺乏嫁妆，作为政治抗议手段等等，不胜枚举。所以研究印度自杀问题要做很多工作。第一，先把自杀率从总体死亡率里剥离出来。第二，不妨尝试把农民自杀率从所有自杀率中剥离出来，研究这类相对简单的自杀现象。

从统计数据来看，印度农民自杀率占总体自杀率 15%，似乎不是特别高。印度多数自杀案例发生在城里，估计与社会冲突以及抑郁症等问题有关。但农民自杀往往直接与经济问题有关（即没钱还债而被逼死），这是非常基础、非常直接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且农民自杀的成功率要显著高于非农民，这也体现出农民的自杀决心。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农民自杀的案例中，85% 是男性。即使在印度总体的自杀率中，男性也占到绝对优势的 62%。与之相比，中国是少数女性自杀率显著超过男性的大国，中国的自杀研究显得更特殊。

印度的自杀率有一个奇怪的分布，南多北少。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拉邦、喀拉拉邦、中央邦和切蒂斯格尔邦是自杀的五大邦，有人称为“Big Five”。印度北方的很多邦，不管旁遮普邦还是阿萨姆邦，农民生活不可谓不艰难，但自杀率就要低得多。喀拉拉邦是印度最富裕的邦之一，自杀率却出奇地高。如果从总体自杀人数来看，西孟加拉也可以排进前五，但说到自杀率，还是低于南部的那些邦。

自杀人群中，印度教徒占据大多数份额。当然南部地区本来就是印度教徒为主，宗教冲突并不很严重，不应是自杀的主要因素。多数研究认为，自杀案例均匀分布在各个种姓之中，所以与种姓关系不大。虽也有少数研究认为落后种姓的农民更有可能自杀，但是落后种姓往往同时也在经济上也更落后，那么种姓与农民自杀之间的关系总体上不是那么明显。而印度农民的自杀以男性为主，那么性别压力也基本可以排除了。

在自杀者的所有特征中，只有经济特征最为突出。有 90% 的自杀农民都有一定规模的

负债，有 30%到 40%都明确面临讨债压力。他们手头几乎没有积蓄保障。虽然平均负债不超过 2 万卢比，相当于不到 2 千人民币，但这些催命的欠债已经足够把每年那么多的农民给逼得自杀了。

南印度是印度主要的农业区，农业人口超过一半，但是他们在经济上非常弱势。印度各邦制定经济规划的时候，极少会将农业置于重要的考虑地位，所以农民收入的保障以及对农民的支持都非常匮乏。同时南印度又是比较典型的靠天吃饭的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用水紧缺，每年雨季的降雨对农业收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惜季风很难准时保量，延迟半个月，或者少下几天雨，那就足以导致成百上千人命了。

总结南印度农民自杀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部的压力。比如这些地区缺乏灌溉设施，土地干旱，降雨不确定，农作物歉收，病虫害，过度使用杀虫剂，还面临国际农作物的需求量和价格的波动。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导致农民的收入产生风险。另一方面则是缺乏内部支撑力。比如这些地区缺乏资产，缺乏耕牛替代人力耕作，缺乏正规信用渠道，缺乏非农业收入机会，缺乏家庭保障等等。在统计上，一个农民拥有耕牛的概率，拥有一个大规模的家族的概率，都与其自杀的概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印度各邦的政府在这些年里也投入了很多资金来缓解农民自杀的压力。但是资金的投入方式遭受到多方质疑。政府显然更愿意把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比如在河流上修筑堤坝，促进当地的农业灌溉，或是促进当地农产品市场的建设和流通等。但这些自上而下的投资，得益者往往是银行和大机构，对底层农民的影响微乎其微。

一些研究者认为，真正应该做的是把这笔钱用于建设正规的微观金融机构，使得农民可以不再借高利贷，真正遇到自然灾害时也不至于被直接逼死。这是减少南印度农民自杀率的最直接方法。可这样的微观补助措施也存在问题。一些高自杀率地区确实已经在推行化肥补贴和灌溉补贴的机制。问题在于，这些举措往往没有提高农民的收入，反而导致土地盐碱化等后果，使得农民更深地陷入到收入危机之中。

南印度是整个印度政治活动最激烈的地区，农民自杀也一直是政治活动的重要议题。部分学者认为，这些农民的自杀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是绝望之下的弱者反抗。但也有学者认为，农民自杀与其说是政治反抗，不如说是政治逃避。自杀的农民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对政治的理念非常有限，他们选择自杀，只是在重重绝望之下选择一个最简单的逃避方式。追踪那些自杀农民的家庭，我们也能收获大量悲惨的故事。家里的男人自杀以后，债务不能自然免除，债主还是天天上门逼债。很多寡妇悲惨地承担起还债的责任。还有很多寡妇随之自杀，留下

孤儿来面对债主的压迫。

我们不妨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南印度的政治活动最激烈，女性的地位也相对较高，对家里的男性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已有一些实证研究表明，随着南印度女性平权意识的觉醒，农民的自杀率随之攀升，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因果关联。而北印度的女性地位较低，与男性相距悬殊，所以男性在家庭内较少感受压力，也就较少采用自杀这样的极端行为。男性在家庭中绝对主导地位的削弱，与传统印度文化之间的张力，也许也是促使南印度农民自杀的一个潜在原因。

从中可以看到，印度农民自杀问题主要与经济有关，但也不全是经济原因。长期的经济压力会转化成为心理压力，在南印度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里被进一步放大。这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举措就能解决，甚至不是中长期的制度建设可以解决。用奈保尔的话说，这是一个“受伤的文明”，农民的自杀还在加剧了它的受伤程度。

印度的代孕现象

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是资源配置，比如资金的配置，商品的配置以及人力的配置。在所有资源里，若不考虑人为设置的壁垒，单纯从自然属性看，当属货币资金的流动最为便捷。尤其是在高度电子化、网络化的今天，金融从业者只要鼠标一点，成千上万的资金就瞬间从一地流向别地。

商品货物的流动则要复杂许多，交通运输业在过去千百年中已有长足进步，但在很多地区，即使是发达国家的一些地区，商品货物的流动也会遭遇困难。举例来说，澳洲中部已经探明存在大量优质铁矿石，但是澳洲政府始终没有表达开采矿山的意愿。其中缘由不难推测。铁矿石所在地区都是人迹罕至的内陆，不要说铁路，就连通向中小城市的公路都没有。在澳洲修建铁路极为昂贵，工期可能长达数十年。等到有一天，铁矿石本身的价值超过修建铁路的成本，那么这些铁矿石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可交易商品。

但人的流动比商品货物的流动更为复杂。人有主动性，有时候流动非常迅速，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大规模人口转移，比如中国每年春节前后进城务工的人群，或者去麦加朝圣的海量人群；有时候，人口的转移又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人对过去生活过的土地有文化依恋，有亲属和子女的牵挂，而接受地也可能对流入人口抱有不同的态度。

所以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劳动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里变成经济学里的显学。很多学者都在研究移民的就业，移民的婚姻，移民的养老，移民子女的教育等问题。这些客观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都有一个前提条件，人口的流动。

前些年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部分改变了人们的想法。这本书着重分析了一个新现象，“外包”（outsourcing）。在发达的通讯技术基础上，美国已经把许多 IT 产业和电话中心外包给了印度。当你购买一台电脑，遇到故障，打热线电话寻求帮助时，电话自动转接到遥远的印度，由印度的工作人员为你提供帮助。凭借这一手段，美国公司可以省下大量的钱。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也免除了人口直接流动所导致的许多深层问题。

随着“外包业”的不断发展，不断有新兴商业模式挑战人们的固有观念，其中冲击最强烈的当属“外包代孕”（outsourcing pregnancy）。简单地说，就是有一些印度公司根据客户的需要，引入不同国家的精子（可以是客户自己的精子，也可以是西方富豪的精子）、卵子（比如东欧美女的卵子），于美国受精后，将胚胎送往印度植入母体，十月怀胎产下混血婴儿，最终交付到客户手里。有些实验室还能定制孩子的性别。定制这样一个“外包代孕”的孩子，总共花费大约 5000 美元，比在美国生一个孩子要便宜许多。

现在印度已经被称戏称为“世界婴儿工厂”，大城市里随处可见大幅的“代孕”广告，各种正规、不正规的代孕公司星罗棋布，数不胜数。因为这个产业没有完全合法化，所以代孕业每年为印度带来的产值难以估算，有研究者认为只是几十亿美元，也有的认为是一百多亿美元。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数字正在飞速地增长，已经成为印度的一个重要产业。

从需求一方看，这个产业前景必然看好。现代人的生育能力普遍下降，不孕不育的比例在不断上升，没有孩子在亚洲许多国家都被认为是“丢人”甚至“受到诅咒”，而怀胎十月对于高收入的都市女性又是一个沉重负担。此外，随着同性恋婚姻的增多，代孕也将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再从供给一方看，在印度的贫困农村，“代孕”是很多妇女改变生活的一次重要机会。她们大多没有受过教育，所以会觉得代孕是一个“美差”。整天躺在床上看电视，吃她们平常绝对负担不起的营养食品，还可以注射维生素，最后更能得到一大笔钱。做一次“代孕”，家里也许就能买得起房子，孩子也能上得起学。

有人拍了一部纪录片，名为“Google Baby”，反响很大。这个题目很吸引眼球，意思是当你想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就跟上淘宝买东西一样，只要在电脑前点点鼠标，再耐心等待一年就可以了。那些印度代孕公司也尽量做到人性化，以良好的安胎环境、营养条件和温顺

有礼的印度代孕女性来取信于客户。同时，他们又以“女性互助”的说辞来安抚代孕母亲：你们没钱买房，没法给孩子高质量的教育，而另一方的可怜女人无法生育孩子。我们公司只是创造条件，让两个女人互相帮助。从这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来看，代孕公司几乎具有了和扶贫 NGO 同样的职能。

如果把女人只是看作拥有子宫的生育机器，那么这个代孕产业无可厚非。现代人的机会成本差异巨大，富人可以把做饭外包给餐馆，把家务外包给钟点工和菲佣，代孕只不过把耗时费力的“怀胎十月”过程也外包给了机会成本很低的印度农村妇女。但是由此牵扯出来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就绝非那么简单。现在印度政府已着手管制这个产业，要求所有经营生育业务的诊所在政府备案，并对捐赠和授孕的各方制定约束细则，还注明代孕母子所拥有的权利。

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商品畅销世界，贴着“印度制造”标签的孩子亦然，只是多承载了一分伦理的负担。

结语

印度的社会问题包括了女性问题，农民问题，老人问题，儿童问题，种姓问题，宗教问题等多个方面，而且相互交织，变得极为复杂，不可能剥离出来谈。但深究这些问题的背后，多少都由经济原因而起。所以从尼赫鲁时代直至今天，印度一直把“脱贫”作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可是今天印度的贫困人群，比当年独立时的总人口还要多。如此巨大的负担，在未来可见的岁月里，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善。

中国在许多方面都与印度不同。比如中国在很多年前就多次实现大一统，尤其是语言文字上的大一统，从而区域分裂现象并不突出；又由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基本破坏了地区势力和男权的文化传统。所以中国社会问题往往只是突出表现为城乡矛盾。直到近年来，城乡矛盾所掩盖的其他维度的矛盾才慢慢凸显。而在这些问题上，印度的惨痛教训都颇值得我们借鉴。■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2013·冬至

观澜学社·观察报告·第三期

前言

这是我们这项尝试的第三期内容，在北半球寒冷的冬天，我们继续追踪着中国的变化，尝试为公共舆论的讨论提供知识的增量与视角的启发。在即将来临的2014年，我们仍会继续我们的使命。

“观澜学社”是一个自发、独立、非商业的网络社群。我们关注当代中国历史的展开，试图对几项可能会影响中国命运的因素进行观察，进而分析和评估其未来走向；我们无意于介入学术界的对话，更无意于鼓动任何政治势力；我们追求中国社会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建构“重叠的共识”。我们的名称来自《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我们计划每两个月公开发布一份《观察报告》，上一期《观察报告》的编号是“2013年·寒露”，以后也将逐次按照中国农历的节气编号。观察必然伴随着命名，但是我们会警惕各种大而化之的命名所孕育的风险；观察必然隐含着诠释，但是我们会谨慎地给诠释设定边界。

本报告所有文章均可根据“署名完整—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原则在互联网上传播，商业使用务必征求原作者同意。 ■

目录

法政篇

中共高层观察

李靖云：“总书记总统”的政治难题 5

王明远：如何看待太子党的影响力？ 12

经济篇

资本观察

樓晟：官办经济的黄昏 18

阶级篇

新工人观察

巩高兴：工人代表吴贵军的抗争 21

社会组织与互联网篇

非官方教会观察

李晋 马丽：信仰公开化和封闭社会（上）

——关于“东方闪电”组织的田野笔记 24

边疆篇

西藏观察

李永峰：格尔登寺的悲剧 31

本土/国际篇

萧敢：一贯道在海外 36

法政篇

中共高层观察

“总书记总统”的政治难题

作者：李靖云

十八大三中全会已然在喧嚣中落幕，各个派系开始了新一轮利益调整，各种解读也纷至沓来。以中国目前的政治体系而论，党的中央全会事实上是最基本的政治决策会议，解读党中央会议乃至解读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已经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但另一方面，今天如此高密度的解读，还是有些异样，是激烈的政治竞争的必然结果。

竞争的激烈，往往能从其失败出局者的詈骂中看出。三中全会之后，FT 中文网发表了在世的政治失败者鲍彤的个人解读“以毛主义走邓道路”，认为整个《决议》就是一个集中权力的方案。鲍彤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但他还是说出一个基本事实，集权确实是三中全会的一个核心政治内容。以至于又有“集权”与“极权”的讨论。

事实上自八十年代来以来，“集权”与“极权”一直都是描述中国政治的两个惯用词汇，且都是舶来品。比如文人用的很多的“极权”一词，totalitarian，作为一个政治哲学词汇本源于德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但是在其《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开宗明义，认为红色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极权主义国家的特征，她相当怀疑是否属于她所定义的“极权主义”。这些不同特征可以归为两点，首先就是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将反帝反殖作为政治的核心目标，其次就是强烈的清教徒道德主义色彩的社会伦理。一般而言，极权主义要在意识形态上确立一个基本政治敌人，把彻底消灭敌人作为根本目标，而对于这一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则不存在任何争论。毛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治国是核心内容，但是对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权的斗争则是持续不断的。即或在文化大革命中，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形式来统一毛主义的解释权，也并没有形成统一，而是出现了不同派系的大规模冲突。阿伦特定义极权主义是一种标准的理性政治，但是这种政治的目标不是保证“个人权利”，而是要强调“一致均等”，这里有着“政治统一”的内在要求。

福柯对这种现代理性的“统一均等”的内在强制特性，有过非常详尽的哲学分析，此不赘述。仅仅强调一点，全面的政治管制确实是现代政治统治的基本特点。如果社会历史学和政治学视野来看，这种均等统一要求的政治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迈克尔·曼所强调的“民主的阴暗面”，即建立政治认同。曼简练地概括为“单一语言同化少数民族，强制政策与教育制度来塑造国民身份”。如果从这样一种“民族”的政治身份延展开来，那么就可以发展、建立起一个比较一致的统一的政治身份，这往往就是现代理性政治的要求，当然也极易产生“阴暗面”。但是反过来说，现代政治如果确定“普遍性”，事实上就必须在基本政治设计上追求“统一”。现代政治理论的开创者霍布斯设计的“利维坦”，就是以一种标准化的“自然权利”为基础，做出统一化的政治安排，如此才能便于理性操作。凡是特殊的“权利”都必须要被规范到这种普遍统一的“自然权利”中来。正是这种政治设计的内在要求，使得如何从政治理性角度处理“异类”成为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在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特殊群体”往往是被当作内部“敌人”对待，至少需要被规训。

中国自清末以来面临的压力，就在于如何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型的统一君主制”的“现代化的统一”政治。近代以来中国的各个政党，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根本上都是要处理这一问题。中国最终借助了列宁主义方式建立了新型国家，但是由于其起点来自反帝反殖，故而其政治建构的核心动力来自外在压力，而非内部形成的法理化制度。因此中国政治的研究权威邹谠先生将其定义为“全能主义国家”，国家不是一个从规范起点出发建立理性政治，而是依赖一种普遍性的政治意识观念，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政治更新。在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建构过程中，法理工具几乎被彻底抛弃，意识形态工具被运用到极致。根据不同的外在压力，不同的政治敌人，建构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推动统一均质化的政治运动。充分体现了全能主义国家的政治运作特点。然而，不同于在“自然权利”的基础上开展政治建构的法理化政治，这种政治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知道下一步谁会是敌人，谁会是朋友。昨日的“我们”，可能就是明日的“他人”。

毛泽东辞世之后，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共元老和少壮派，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最需要做的就是祛除这种政治运动的“魅影”。但是他们的解决之道不是法理制度，而是再度乞灵于一种确定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将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作为头等大事，同时又把国家发展与民族独立组合到一起，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目标，进而形成了一个具体的发展战略，成为中共执政的根本基础。但是，这是以政治统一性的丧失为代价的。虽然以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根基，但是不再有最高领袖；虽然有具体的类似于战斗状态的发展

战略，但是没有统一的战争安排，而是地方竞争格局。委员会和集体领导成为基本的政治统治模式，按照中共的语言，经常概括为“书记领导下的党委集体负责制”。事实上是一种寡头分赃政治。因为没有人能给出意识形态的终极解释，只能因应不同的战略目标作出技术上的调整。由于没有统一的政治安排机制，所以任何一个问题都既是特殊的，又是整体性的。地方竞争的不可遏止，特区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冲击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格局。其结果就是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李侃如和另一位英年早逝的中国问题专家奥森伯格所总结的“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碎片威权主义）。国家不再全能，但是保持了全能的逻辑，政治决策和具体施政已然碎片化。最高领导人虽然有领导地位，但却没有相应的领导权力，其外在合法性在于党的政治特殊身份，其内在合法性在于“党委”的认同接受。这也就意味着，他必须要做到两个基本方面，首先他必须要能体现党的特殊身份，其次他要能获得“党委”认同。而同时，对于最高领导人而言，他能调动多少威权碎片，事实上也就决定了他能拥有多少权力。

应该说邓小平对这一问题是非常清楚，“六四”事件之后，挑选接班人成了他的首要任务。八十年代邓、陈双寡头体制带来的政治分裂也面临修正，所以最终还是做出了一元化的政治安排，1993年正式形成了江泽民以总书记身兼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三位一体的政治安排。但是这一安排仅仅是对八十年代的寡头分割和碎片化威权的修正，或者说是在元老一代死去之后，维持一种形式上的政治统一，并没有触及碎片化威权的政治结构。而且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不断变化，需要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多，碎片化越来越严重。另外，“六四”事件从学生运动扩展为社会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单位制社会的结果，当时很多机关单位作为集体充分参与和支持了整个运动。江对此采取了市场化收买的办法，机关单位作为主体参加市场经济，可以将自己手中的国家资源变成实际收益，从而重新实现了党以及政府对单位的控制。然而，这一举措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碎片化趋向。结果导致碎片化威权的政治结构事实上在不断扩大，中央领导小组的不断增加，就说明了这一点。江泽民曾经希望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却形成了国务院外事办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连同之前的军委、政法委等机构，事实上把国家安全事务进一步碎片化。到了胡锦涛时代，政令不出中南海已经是一个上下都承认的事实了。

这不是说江泽民到胡锦涛就不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首先是重新确立了纪检制度，助推其权力逐步扩大，并借鉴现代党鞭制度，形成了一套约束机制；其次，将宣传机构从意识形态灌输部门变成了意识形态管制部门，通过意识形态管制来保证政治执行；再次，由政

法委统领军警宪特施行统一的管制，敦促和把控单位，从而维持政治统一。当然，这三大制度渠道主要功能是政治管制，但正是这种由上对下的政治管制才能保证中央的政治权威。此外，通过建立全国性的基础设施，诸如高速公路网络、铁路、高速铁路、飞机场系统、电网、煤气和能源管道、信息网络等等，加强了中央调动资源的能力，以及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再有就是通过金融和财政改革，国务院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财政金融手段来管控地方，这是中国中央机构前所未有的一次扩权，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部门也因此全面更新，成为强权部门。国务院作为一个建制政治机构越来越成为碎片化威权中权重最大的机构。

但是这种努力也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这些管控机制和国家能力在中央一级再度碎片寡头化。政治局常委会作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采取了所谓的集体负责制。加强中央政府的政治能力就意味着加强了常委会的政治能力。但是这并不等于政治权力和责任的统一，反而很可能意味着政治的碎片化。国家最高领导人并没有处罚常委的权力，也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子的权力。这就导致了宣传、纪检、政法部门的权力大范围扩张，同时国务院也越来越和党的书记处并列。

这种所谓的集体负责制，导致了胡锦涛之后的政治权力交接的困局。只要具备相当的政治实力，就可以对既定的政治安排提出挑战。薄熙来的挑战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就目前得到的消息而言，周永康作为薄熙来的政治盟友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周永康是大型国企出身，当过地方大员，并且是政法机构的最高领导人。他横跨多个政治区块，拥有的政治实力超出一般常委。这种私人的政治同盟带来的政治挑战，对于“六四”之后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全新的。

因此，习近平所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他必须要击垮这种挑战。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他所拥有的政治优势其实此前是远被低估了。首先，三位一体的政治交班机制已经有了宪法意义，大于“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惯例；其次，随着国家能力建设的深化，特别是国务院权能的增强，他可以调动的资源非常多。周永康加强政法委导致了政法机构的扩权，而贺国强的政治实力偏弱，导致了纪检监察机构能力下降。纪检监察权力作为制度规划中的党鞭权，就党权而言，要高于政法委。而政法委作为党机构，统辖司法机构和部分政府机构，其内部政治逻辑本身就无法一贯。司法机构和政府机构，作为现代理性政治的产物，根本上遵循法理逻辑，趋向非人格化。政法委作为党机构则恰恰相反，有着有鲜明的人格特点。这就造成了内在理路的冲突。政法委书记在十八大上被置于常委会之外，事实上已经说明了政治斗争的结果。

但是，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政治整合，这一结果并不能持久。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意义就在于将这一政治结果宪法化。国家最高领导人过去三位一体的政治身份可以借助这样一个政治机制统一到一体。此前作为虚化政治元首的国家主席职位，至此已经实体化，其权能与现代总统制无异。这也就意味着之前的中央领导小组统统裁撤，书记处权力大幅度缩编。国家安全事务决策统一到一个部门，中央军委下降为执行机构。政法委实际上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由习近平亲自定夺，习近平正好可以借此建立自己的执政班底。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实际上具备责任内阁的职权，过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医改办、农业委员会都归并到这个小组之内，同样起到了统一政治权能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司法体系也开始集权到中央，去地方化，去政法委化，这就意味着司法机构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权力体系。从整个政治布局的动向看，整个三中全会的核心词汇是“统一”，这个词汇在三中全会的最后报告中出现了 28 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中央集权的另一面则是对地方权力的剥夺，而这种剥夺是通过“深化改革”实现的。即或不谈具体措施，仅仅是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就足以重创地方政府。中共作为一个全能党，事实上在中国社会的一切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决定作用。所谓“市场决定”，也就意味着确立“市场”的法律规制权力要统一到中央。有外电透露，目前中央上下都弥漫着要惩罚地方政府的味道，这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只是这种“惩罚”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地方锦标赛格局呢？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意味着什么？很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现代政治就意味着权力的集中，虽然落魄者鲍彤对习近平的政治“统一”持批评态度，但是当他本人还在政治舞台上的时候，他汲汲以求的也就是这样做。所谓分权制衡仅仅是一种统一的政治安排，而不是说政治权力本身要分，这本来就是现代政治权力运作的基础。从自由派到新左派，当今中国文化精英的对于“权力统一”的批评，除了显示自己的边缘化状态之外，没有更多内容。但这并不是说习近平的政治构画就是一个理数合理，非常自洽的方案，事实上这个方案有着极大的不足。

从韦伯的理性政治标准来看，习近平的政治构画，可以称作是“治”的权力集中，“治”的理性化，但并不是“统”的集中，以及“统”的理性化。现代的法理统治，是“统”与“治”全面的法理化，首先是如何在不依靠超凡领袖的卡里斯马魔力的情况下构建一个基本的政治共同体？让·吕克·南希指出，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共通，也就是说达到政治认同，不是要靠卡里斯马，而是靠理性的政治安排，真正在国土疆域之内建立普遍受到认同的权力符号体系。韦伯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依靠民主政治，也就是民主代议制。可以说立法权至上，议

会事实上拥有最高的权力，这是现代政治的基础，因为议会是实现政治统一的基本政治程序。正是代议机构的出现，上下左右才能相通，政治意志才能实现。议会形成政治意志之后，才有按照政治意志“治”的问题，这又是通过理性的官僚制度，行政化的科层体制实现的。正是由于议会的授权，国家领导人在法理上才有承担国家的政治意志的责任。而习近平恰恰缺少这样一个授权，他的权力基础依旧是来自于体现党的特殊身份并得到“党委”认同。但是出于“治”的需要，他实际上已然按照现代政治权力的构建逻辑在重新构画政治，这实际上与其权力基础有着相当大的矛盾，或者说有根本的冲突。习近平作为党的总书记获得政治权力，但是却将要具备总统制下的总统权能，这事实上凌驾于“党委”之上。这也预示着成为总书记仅仅是一个获得授权的过程，而并不意味着将以“总书记”的身份执政。对于中国政治而言，这事实上是一次“修宪”，至少是修改过去三十五年的基本规则。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敢于做出如此缺乏法理依据的决定？答案是他对统治集团的“政治共识”的判断。从目前的反应看，他的判断确实正确。各类舆论中类似“顺民心”，“反应时代大势”的评价非常之多，这并非是官方宣传机器的自说自话。过去的财经官僚，当前金融财经政治区块的重要人物李剑阁，就评价三中全会的《决定》好得大大超出他的意料之外。所以，客观来看，目前中国的各个政治区块，除了文化精英以外，其他精英对习近平的政治“统一”还是持支持态度。过去十年，中国政治实际上是一个磨蹭状态。过去的全能主义的党政统治模式既不能让统治者满意，又不能让被统治者满意。统治精英内部对于“法治”或者“法理治理”具有高度的认同度，习近平的政治判断正是基于此，故而敢于大胆集中权力，推动“法权”的建立。

但是，“法权”本身的合法性并非完全依靠“法理”本身的逻辑，这个实在过于单薄。从现实政治的逻辑看，“法权社会”路径的最大支持者在于统治精英群体，但是他们势必会受到文化精英的挑战，后者在“六四”和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已经相当边缘，事实上被专业精英、胜出精英和党政特权精英等统治精英集团策略性使用。文化精英目前已经开始和社会竞争的失败者相结合，以“自由民主”和“公民社会”作为政治武器——虽然这是两个很虚的概念，但是却有极强的政治正当性。

“法权社会”的共识，其实是一个 implicit consensus。对于法权标准如何确立，统治精英内部是有分歧的，同时“法权社会”也缺少相应的政治话语系统。而且，“法权社会”意味着“全能党”与“全能主义国家”退场，也意味着以中宣部为首的文宣和党务官僚退场，更意味着模糊地带的受益者政治上也要被清退。而要处理这类敌人，政治领袖首先要有卡里

斯马的人格手段，善于运用党鞭制度和军警宪特等现代特殊权利机构。同时对于文宣党务集团而言，“自由民主”、“公民社会”的解释权如果能掌握在自己手里，是最好的施压武器。也就是说，习近平如果要真正能有所成就，那么三个条件必不可少：一，能够具备卡里斯马能力并和法权相结合；二，能够保证特殊力量、党鞭和军警宪特对自己的服从，三，能够操纵“自由民主”、“公民社会”的舆论。而所有这些，肯定不是文字乃至图形模表能论证出来的。对于习近平而言，考验还在后面。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能否成为其坚实后盾，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热衷于读书的王岐山，他领导的中纪委能否从一个“全能主义”政党的内部纪律机构变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党鞭？这是这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键一役。

■

中共高层观察

如何看待太子党的影响力？

作者：王明远

“太子党”算是中国最神秘，大家最好奇的政治群体。王子皇孙，红色公主，孩提时陪毛伯伯、江阿姨游过泳；玩耍时经常碰见去上班的周伯伯；文革初期指挥红卫兵扫荡牛鬼蛇神，自封小将司令，煞是威风。如今，不少人要么执掌国柄，要么动辄控制央企万亿财富。说起他们来，岂不令人关心？

自从 2007 年以来，太子党的政治行情迅速上涨。习近平储位东宫，薄熙来总督重庆，胡木英等组织延安儿女联谊会各处串联，评议朝政。刘晓江、刘源、刘亚洲、张海阳等一干列位部长、上将。再加上外界所言，某些家族有多少多少訾财，富可敌国。海内外关心中国政治的人，无不关心“太子党”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对中国的前途命运会有什么影响？

谁是太子党？

观察中国政治的时候，很多人容易把“太子党”、“红二代”和“官二代”混为一谈。谈起“二代政治”来，薄熙来、刘延东、李小鹏一锅煮。虽然他们都是“二代”，但是他们的出身和利益有很大区别，他们分别属于太子党、红二代、官二代三个群体。

能称得上太子党者，应该是土地革命时代（1937 年前）参加革命的，副国级以上的中共领导人子女。太子党的父亲（或母亲），首先必须是必然是打江山的元勋；并且打下江山后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另外，必须是中共的领导人，这三者缺一不可。

先看级别，既然称“太子”，不是随便一个人的孩子配得上称太子，必须是副国级领导人及其以上的子女才配得上这个帽子。比如刘延东、周小川虽然位高权重，但是他们的父亲不过是列侯部长，列侯的子女自然不佩叫“太子”，他们只不过是个“红二代”罢了。在同学会上互相开骂的秦晓同学和孔丹同学也是“红二代”。

再看资历，李鹏和姚依林虽然是同一届的常委，但是人家姚依林是 1935 年就参加革命

的，所以人们称姚家金龟婿王岐山是“太子党”，李小鹏只能和胡海峰、李天一一起被归纳为“官二代”了。

再看党派。虽然也有不少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后代很有出息，比如李沛瑶、张梅颖、黄孟复，但是他们也不被视为太子党。因为，红色江山是中共一手打下来的，中共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所以只有中共的领导人才是太子。

综合以上的分析，太子党这个政治概念，对应的时下热点人物应该是：习近平、薄熙来、李敏、李讷、毛新宇、朱和平、王岐山、刘源、刘亚洲、李小林（非李小琳）、胡德平、胡德华、刘晓江、邓朴方、邓楠、邓蓉、叶选平、叶选宁、叶选基、邹家华、叶明子、万季飞、王军、王兵、胡木英等等。

施加影响力的路径

按照一般词典解释，影响力是指，能够“影响他人思想和行动的能力”。政治人物的影响力基本上通过以下三个形式体现：权力影响力、财富影响力和思想影响力。

权力影响力体现在通过程序性或非程序性的手段，去改变政策或人事安排；财富影响力表现在通过自己控制的财富来影响国家政治，最明显不过的是坊间所言；思想影响力则是通过思想理念或意识形态对政治施加影响。

一些人会认为太子党是中国最有实力的政治派别。一位颇了解中国政治的学者反复感叹，能改变中国目前状况者，唯有太子党。他认为，太子党有权柄、有钱柄，还有政治魄力，如今中国政治积弊如此严重，也只有太子党能整治的了。很多研究中国政治的人都有类似观点。

还有一个故事，今年年初，海外某权威媒体报道说，汪洋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系因叶家反对，说叶家召集了一个太子党、红二代会议，并向几个元老打报告说汪洋坏话，所以汪洋如今才是个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

那么，太子党是否真有如此影响力？下文将细作分析。

权力影响力

首先说权力上的影响力，作为太子党的习近平当上党、国、军的第一把手位置，王岐山成为中纪委书记，刘源、刘亚洲、张海阳、王光亚、李小林、陈元、刘晓江等成为显赫高官，再加上李铁映、叶选平、邹家华、邓朴方等一干退隐的老太子们，他们在高层政治中蔚然是一个壮观阵营。这是否能代表太子党在政治中呼风唤雨，占有主导权呢？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太子党不是“党”。正如观澜学社观察报告（2013 寒露号）所讨论的那样，太子党只是个身份纽带，而不是一个政治组织。他们只不过都是中共开国领导人后代而已，而他们之间内部的利益差异和矛盾也是很深的。就老一代领导人讲，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矛盾很深，中央红军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从刘志丹阵亡到“习仲勋反党集团”都是斗争的延续。1962年毛泽东、刘少奇曾经表示要和习贾刘斗争一百年）；中央红军内部，这留苏派、朱毛苏区党、刘少奇的白区党也相互不和；文革时你死我活的斗争，又带来新的矛盾。而太子党们的人际圈，基本是沿袭了父辈的格局，凡是父辈有恩怨的，与下一代也不来往。太子党内部是旧怨加新仇，他们也是各走各的路，同床异梦。因此，即便习近平当了党魁，太子党也不认可他做领袖，太子党还是一盘散沙分布在政治地盘上，他们不可能因此聚合起权力资源，以此为契机去“全面接班”的。

第二，习本人也排斥太子党。君不见，习近平上台一年一口气提拔了这么多干部，有哪个是太子党？都是他在浙江、福建、河北和上海的子弟兵。其实，习书记内心很抵触众太子党自恃故旧世交而干预政治，或分享他的政治话语权。

另一方面，习虽然是太子，但是他始终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太子，与太子党主流派，人生没有什么交集纽带。习少时命也蹇也，他既不是生长在中南海大院，也不是四中毕业，跟熙来、源源、毛毛都不是玩伴；九岁父亲就被打倒，从小在小伙伴们中就被边缘化了。所以，习缺乏薄熙来与太子党主流派的那样的渊源和情感，他自然不会像薄熙来一样与太子党主流派走的那么近。

第三，太子党只掌握部分高层权力资源，多数还是官僚集团把持。纵观党政军群团，太子党掌握的部门其实就是那有限几个，最集中在军队。在平时，军队是在国家日常运作不起什么作用，而对国家政治影响最深的党中央四部，国务院二十多部委，三十一个省委书记省长，都是官僚集团在控制，这才是权力运作的骨干。

第四，除了超级元老，退位者很难影响权力运作。中国虽然是人治社会，但是，领导一旦退位就无法直接操纵政治机器，其直接影响力就急速下降，只能通过门生故吏，或者写信发挥一些间接作用了。如果退位久了，门生故吏也纷纷退休，与隔代领导也没有直接关系，

那就基本与权力运作绝缘了。比如，某核心太子党家庭成员曾经抱怨，我现在看不到中央文件，有什么事情他们也不打招呼，现在我们是草民了。这话委实是真相，其父兄退休不到十年，就被权力边缘化这个地步。前面提到的，某报说叶家能阻止入常，那是不懂政治的“专家”、“消息人士”在吹大牛罢了。常委乃国之重器，江湖安排自己的人马都尤不及，岂能几个失意老人决定的？

财富影响力

接着说财富上的影响力。财富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有权支配财富使用或直接拥有财富。太子党支配财富上影响力顶峰是在胡温时代，那时候二代太子党均是壮年，执掌了不少央企，比如王军之于中信，贺平、王小朝、叶选宁之于保利，陈元之于国开行，薄熙永之于光大，傅锐之于中核工业，陈清华、刘湖之于华润，又有关系密切的红二代央企老总孔丹、秦晓等为后援。整个胡温时代央企的财富迅速膨胀，他们的影响力也随之膨胀。但是如今，这些人人都已经退休，央企毕竟是国家财富，不是个人财产，虽然做央企老总都很强势，说一不二，但是退休后对这些央企还有多少影响力，就值得好好深思了。如上面所分析的，人不在其位，对其政的影响力会急剧减退。他们一旦失去了央企的舞台，影响力自然会衰退了。

也有不少人深信那些不从政，也不去央企的太子党商人们凭借各种灰色、黑色的手段聚拢了惊人的财富。大家经常用“权贵资本”来形容他们，甚至认为“权贵资本”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其实，商业太子党们的财富有多少，更多是雾里看花情况下的一种揣测，大家由一推二也，缺乏事实的推断。就像当年大家说“四大家族”多有钱，但现在随着档案解密，宋子文就没有什么钱，都是社会上根据一些线索片段的揣测罢了。事实上，大家都在背后议论的几个家族，他们的财富保自己和子孙锦衣玉食没问题，但是说富可敌国，或控制一方经济命脉，那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是主流，中国特色是支流，你通过巧取豪夺、隐性控股等手段能发财，可是你永远不可能搞大。他们即使有钱，也不敢像宗庆后一样去搞并购，不敢像任正非一样去搞海外扩张，在市场竞争中只能是慢慢落伍、萎缩。这是历史的规律。

有钱的太子党毕竟是少数，多数太子党都没钱。公等岂不知，多数太子党跟北京常人一样，终日奔波也是为了买一所大房子，也是为了给子女凑学费。北京老老小小千百个太子党，

当官的、当央企老总的、闷声发大财的就是经常见报的那几个，多数人不过是被照顾个局级干部、后勤处长，甚至没有任何功名。比如，万里委员长的儿子、万季飞大部长的哥哥、万宝宝名媛的伯伯万伯翱同志，搞了个“中国传记文学协会”、“中国网球协会”，也就是出书、打球赚个辛苦钱。陶思亮去那不知何名堂的“中国市长协会”当副秘书长，似乎也就是为了车马费、咨询费？

思想影响力

再说太子党的思想影响力。太子党的思想影响力大于他们的权力影响力。因为他们是政治“正统”的代表，既然江、胡、习都还奉毛为正朔，那么太子党们就占有“道统”的制高点。虽然，官僚集团掌握着权力，但是“道统”代表者，在社会舆论中更占有主动性和号召力。所以，太子党无论唱什么歌，举什么旗都一呼百应，满座较好。君不见，薄熙来在重庆唱红，一时弄得全国无产者都心向重庆，北京中南海诸公敢怒不敢言；胡木英等一干失意太子党搞个“延安儿女联席会”，也能弄出那么大动静；陈小鲁为文革中行为道歉，引来社会一片叫好。这都是太子党们占据“正统”的独特政治优势，如果太子党中多几个薄熙来这种野心家，全国人民就被牵着往深渊走；如果多几个胡德平、陈小鲁，中国可能就会跟着往好的地方走。

在中国整个讲究政治正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正是因为太子党在大家心目中有如此强大的思想“道统”影响力，让人们形成误判，以为这是他们实际的政治影响力。其实，道统的影响力，不等同于权力的影响力。权力的运作还受人事安排、社会舆论、时事大局的影响。太子党中的某个人掌握了最高权力，也不代表这个政治群体在权力运作中获得优势。这是分析太子党政治的应该弄清的一个重要逻辑。

总而言之，太子党拥有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但是他们能掌握的权力和财富已经不多，在整个社会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他们更不可能将掌握的资源整合。所以，太子党救国论，汪洋失常盖因叶家，这都是一厢情愿的揣测罢了。

太子党政治的未来

如果抛去公平、正义的原则，把太子党政治单纯当作一个历史现象，他们拥有如此影响力，其实与古往今来的经验是一致的。因为，凭借父辈们对权力的垄断优势，他们控制这么多权力、财富和思想资源，并不令人意外。公岂不见，台湾的蒋总统经国先生、陈履安院长、连副总统、郝龙斌市长、马英九总统不都是太子、二代？日本、韩国的当今政治格局，不也有世袭政治的影子？

这世袭政治又遵循一个世代递减的原则，一代不如一代，一般到三代就没有起色了。你看陈履安的公子出家做喇嘛，蒋友柏开广告公司，马唯中去放烟花。无独有偶万宝宝、叶明子也去开服装店，李鹏孙女去拍电影，这都是历史规律，共产党、自民党、国民党都躲不过的。■

经济篇

资本观察

官办经济的黄昏

作者：楼晟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出炉，昭示着在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国内一切相关话题都将围绕着这份决议展开，资本亦不例外。

常言道，冤有头债有主，上梁不正下梁歪。虽然把一切问题归咎于一个根源有偷懒之嫌，但问题的确会有其产生根源上的共性。当下，国内但凡涉及经济金融层面的事情，不论成就建树，还是问题麻烦，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做“东亚模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重演。而在“东亚模式”中，官办经济无疑是最核心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在试图解读这份两万余言，十六大条、六十小条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时，如果想要跳出咬文嚼字的藩篱，用一句话来概括决议内容，那笔者认为，只能用“彻底打破官办经济体系”来形容才恰当。

虽然，在一些之前由特定利益集团进行集中炒作的领域上，决议反而进行了严格限制，开了某些人眼里的“倒车”。但自十八大祭出“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大旗后，国内不论左右，其极端派在改革方向与内容的话语权上就已经出局。尤其对希望重演上一轮改革红利，并再次按图索骥的人和利益集团来说，如果不能及时转换思路，那他们无疑将成为这一轮改革的红利来源之一。

那么，从资本角度看，这将带来什么样的限制，产生什么样的商机呢？

首先，我们不妨从打破官办经济的角度来看。既然是要打破，必然要冲着弊端去。对于官办经济的弊端，我们随手就可以列出钱权交易、权贵资本、裙带关系、政绩工程、重复建设等等。但较少有人认识到，这些弊端很多并非官办经济所独有。虽然它们的表现程度可能随着与官办经济的结合而被放大，但不能作为官办经济核心风险看待——尤其是那种迫使最高当局和决策层必须痛下决心改弦更张的核心风险。这就像，康德认为使婚姻区别于其他

男女关系的实质是夫妻双方相互垄断对方的性器官使用权，而恩格斯认为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功能在于生下并确定财产继承人。这些看似和我们直观认识大相径庭的论断，细想之下，确有其切入角度上的道理。

因此，对于官办经济模式的核心问题，其实只要找准切入点，并不需要多少抽丝剥茧就能找得到。在宏观角度而言，官办经济模式下，社会中所有超过实际融资成本的投资收益，本质上是一种由国家主权信用背书后产生的溢价及其衍生利益链。由这个角度思考，我们或许能对官办经济模式下那些不符合经济学和市场规律的现象，有更直观和透彻的认识。

这种模式的优势，已经在“东亚模式”以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中得到充分体现，此处不做赘述。简而言之，就是能够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扭曲要素价格，减少市场从自由混乱到成熟集约阶段的时间，加快整合各种要素以迅速完成原始积累，特别适合新兴工业化国家建立产业基础与核心竞争力。但是，随着经济体量增大，市场容量饱和，边际投资效率下降，将因为其权责不对等、信息不透明的弊端，导致经济金融宏观面出现大量隐性坏账，使风险集中向中央政府与主权信用堆积并最终引爆。结果轻则导致经济金融危机，发生长期衰退；重则还会引发政治动荡，可能瓦解该模式之前所取得的大部分成就。

因此，只要明白了官办经济的核心风险，就不难理解这次三中全会决议中所表露的，打破官办经济模式的决心以及所采取措施的目的，即政府要从一切经济活动与一切风险的最初发起人与最终背书人的角色中退出，不再为负面清单以外的经济事务风险承担无限责任。这种变化中，首当其冲的显然就是国内多数金融机构赖以生存的各种无风险利差息差业务，今后其获利空间将大大缩减。金融业在业务模式和经营能力上的同质化无法持续，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能力比拼、业务创新并伴随着大范围的洗牌。然后，就是通过放开行政审批和干预，大大降低市场参与的最低门槛，更多的中小资本乃至普通个人，可以自主参加一些之前要通过交出实际控制权才能参与的游戏——比如新三板拟用的 IPO 备案制，会使普通人获得涉足风投业务的资格，而不需要向风投基金与私募交出资金控制权。这同时也将有效减少裙带以及权贵资本的寻租空间，不但可以使市场秩序与行业风气更为透明，也将促使金融机构与他们的客户之间的双向关系更加丰富，而不是过于集中在少数领域与少数对象。

然后，我们要认识到打破官办经济模式不是简单的私有化，而是想整合不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

关于排除私有化这点，在决议的第六小条“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里，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文中在“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之后，

紧跟着就做出“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的进一步阐述。其要表达的明确意思是，在负面清单内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的国企母公司，是不允许其他所有制资本参与的。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即意味着，只有这些企业的子公司、孙公司才可以被其他所有制资本参股。这也再次表明，中共中央的希望是通过决议达到打破利益固化、激发经济活力的目的，其意是提高自由度，而不是再来个“盛宴”，让既得利益者在他们熟悉的环境与规则体系中继续寻租，上下其手。

所以，如果也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明决议中所倡导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那就是“国资守存量，民资搞增量，特混集团军，联手吃四方”。通过为不同所有制的资本制定明确的界限与权责，让它们之间产生更高效有序的组织关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中国的内部经济发展与外部经济势力扩张。这里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限制民资侵吞国有资产，还意在防止过去十年快速做大做强的国有资本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渗透过深，影响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

因此可以看到，在决议所期望的格局中，不论哪种所有制的资本，都应该明白什么是自己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在统一安排下专注在自己所专长和负责的领域。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种方式看起来很像计划经济的一种回归，但却完全不是一回事。决议对各类所有制资本进行这样的安排，更多是现状倒逼——中国虽然整体经济实力空前强大，军事实力大幅增长，政治地位不断上升，但由于缺乏有效整合，难以使出全力，无法有效动员，往往各自为战的弊端已经越发明显。

各类所有制的资本，不管在国内经济活动中发生的摩擦，还是在近几年走向海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表明，在当下这个全球贸易金融、政治经济秩序激变的环境里，它们中不论哪种都不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或实力。决议所倡导的并非是回归过去，而主要是理顺当下，继而让中国的资本有迈向未来的空间。■

阶级篇

新工人观察

工人代表吴贵军的抗争

作者：巩高兴

深圳的工人领袖吴贵军，现在已经被政府关押超过七个月了。

“吴贵军事件”的背后，是一起典型的，因工人不愿随工厂搬迁，与工龄补偿有关的劳资纠纷。事件发生的大背景是：珠三角因地租、人工、水电费用上涨，优惠政策消失，以及环保要求提高，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促使部分企业寻找更低成本的地区，以谋求更高的利润。

不愿随厂搬迁的原因

在众多论述产业转移的文章中，作者们认为，转移的地理大方向指向内陆地区及东南亚。但笔者观察到的情况却是，多数转移并未超出广东省境。至少短时段内是如此。

笔者所在的港资厂，地处莞深交界，因区位优势，陆续将厂房改建为收益更高的酒店休闲娱乐设施，工厂厂房则搬迁至镇内与深圳不接壤的工业村。村内另有一“米亚”大型工厂，却是从深圳搬迁过来的。笔者租住房屋背后的“杰美特”的中型厂，则是从深圳龙华搬迁过来。村内以前有一家名为“毅力”的厂，已搬至清远。一位同事工作过的深圳平湖旭日玩具厂，现已将主体搬至韶关。而吴贵军所在工厂，则要从深圳搬迁至惠州。

工厂的搬迁，不只是资方一家的事，而涉及到全体工人的利益。所以，资方应该征求利益相关的劳方的意见，不能独断专行，不然就是赤裸裸的资本专制。而法律人士的意见是：搬迁涉及更改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而工作地点是合同要件，所以厂方应与工人协商。如不能达成一致，资方应给与工人工龄补偿。

工人之所以不愿随厂搬迁，是因为：工资会减少，她们会失去业已形成的人际关系圈，

有在民工子女学校读书的孩子的转学问题，在附近其他工厂打工的伴侣的去离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新老工人的分化

吴贵军所在的港资厂“深圳石岩迪威信”，五月时要搬厂至惠州。但是，厂方不打算给不随厂搬迁的工人以工龄补偿，遂引发劳资纠纷。纠纷开始后，新老工人即出现分化。做了一年半载的新工人，权衡利弊后，接受资方结清工资即走人的选择。因为这样可以得到最多一月的补偿工资。如果选择抗争，付出了代价，但结果却是不确定的。而做了十多年的老工人，因利益牵绊太深，选择了抗争。

抗争的 300 多名打工者，其行动从阻止设备搬迁开始。他们也到镇劳动部门投诉，并用微博在网络上实时播发事件进展，寻求关注与帮助。吴贵军是发布微博者之一。他的文字显现出的喜怒哀乐，随着资本及政府的反应而变化。

网上关心这件事的人，主要有工人积极分子、劳工 NOG 从业者、劳工类网站（如新工人网、城边村）及草根左翼青年。这些人都属网络边缘人群，所以事件并未掀起多大涟漪。在政府介入后，劳资双方开展了协商。无诚意的资方使谈判破裂。[这种结论是否过分简单？] 失望愤怒的人们选择了堵路，但被警察用武力赶回了工厂。之后的协商中，资方给出的微小让步，与工人的诉求相差太远。工人最后作出了徒步去市府请愿的行动，但行至半道即被截回。

在没有外部强力支援的情况下，打工者能坚持抗争近二十天，实属罕见。在抗争骨干被警方抓捕，且经济窘迫的情况下，没了组织者的工人，无奈接受了资本开出的极不合理的年补偿 400 元的方案（法律规定是最后三个月工资的均数）。此事随之沉寂下去。

网络声援的扩大

沉静了三个月后的九月份，与抗争工人亲近的人发微博称，吴已被关押一百二十多天，且政府打算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而参与抗争的其他 20 多位工人，也被拘留 13 至 37 天。发微博者@所有他能想到的人，以求获得关注，使吴能被政府释放。求助初期情况

与抗争时一样，只获得了劳工圈的关注声援。

直到发微博者喊出，吴的人权与王功权一样重要，获得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江松，及“大V”于建嵘等人关注后，才得以广泛传播。接着，劳工圈的人把举有诉求牌的照片传至微博；大陆、香港的数家劳工团体，向深圳市长发出释放吴的公开信；香港香港职工会联盟到中联办示威；以前基本只替毛及其时代辩护，与自由派辩驳，高喊爱国的大陆左派知识分子[这个判断是否准确？]李北方、宋阳标、李昌平等人，也罕见地给予了象征性的关注。这些活动，使声援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纵观这次群体声援，亲历抗争的发微博者把吴描述为一个阻止其他工人采取激进活动的“和事佬”。吴只提请愿不提堵路，也许是一种获得同情的策略。一名网民为“螺丝钉”的激进草根左翼，斥举牌行为为“行为艺术”，并把乞求关注的行为，视为卑躬曲膝，并因此引发劳工群体内的论战。

期间，数名港籍工运积极分子，也在网络上给予了声援。但是，高潮过后又是沉寂。而吴的辩护律师，也只能以当事人并非抗争活动的主谋，以及群体活动并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为由给予辩护。随后，劳工圈有人发起了募捐及征集签名要求释放吴等活动，但短期内无法再引起广泛关注。

政府应该承担责任

骑虎难下的政府，所选择的可能是不重判但也不会无罪释放的折中方案。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因工龄补偿问题，还将频现劳资冲突。由于以群体示威表达诉求的工人总遭遇政府严厉打压，原本弱势的打工者，面对强势资本的侵害时更显无力。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代工行业的低收益及市场外部依赖性放大并集中表现了出来。而广东省的对策，先是“腾笼换鸟”，以迫使劳动密集型工厂及所谓低素质外来工离开，然后引进高端服务业；引起反弹，并觉不妥后，又改提“转型升级”。

所以，产业转型所引发的问题，不仅有市场原因，更有政府自身的推动。那么，转型中出现了问题，政府应该承担起不可推卸的责任。■

社会组织与互联网篇

非官方教会观察

心信仰公开化和封闭社会（上） ——关于“东方闪电”组织的田野笔记

作者：李晋 马丽

背景

2013年初，新兴宗教“东方闪电”（或称为“全能神”）被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之为“邪教”而进入公共领域而得以被人了解。但是，由于这种私密性组织的田野进入的难度和危险性，研究者对于这种隐秘化组织的起源还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解释。

89之后的社会思想转型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导致各种新兴宗教成立，如法轮功，各种气功组织。与此同时，东方闪电大概也在1993年开始于河南，其吸收了其他被官方定为“邪教”或非官方注册教会的人员。河南本身和温州被认为是中国基督徒人数比例最高的两个地方，但是对于河南也被学者认为是隐秘化宗教组织出现较多的地方，很多组织的发展都是起源于河南、山西、陕西一带的农村，其特点是将基督教元素和民间宗教结合在一起，如三赎派，及最早被官方定为“呼喊派”的李常受所领导的地方召会。在80年代，官方对于地方召会的打压，使其近而分裂为一些新兴宗教教派，其中也包含了东方闪电。随着官方对于非官方注册教会和新兴宗教一同的打压，导致一些教会和新兴宗教组织分化为更多的教派，并且这些组织为了防止官方打压更为隐秘化，也促使“东方闪电”能够更多吸纳其他新兴宗教组织。

在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劳动单位」作为为基本单元的社会制度瓦解。「劳动单位」制度把普通人压制在小群体里，过被指定的生活。这种「单位」结构崩溃后有许多人开始做生意，也大批的朝城市迁移，基督教也传到流动的城市人口中。之前被监禁的家庭教会领袖释放后继续的传讲福音，在小型的团契中教导。一般聚会不在主日而在周间，小组

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成员也不固定。从1990后期起，受过教育的信徒人数增加，校园福音事工把大学生和教授也带进的家庭教会。2004-05左右大学生和教授在许多城市里组成了第一间当地的教会。一间上海市的教会人数在三年内从十人增长到一百人。对空间的需求也因人数而增加，七、八十人挤不进私人的住宅，必须租有三四间卧房的公寓才能容纳所有聚会的人，多过一百人就需要租办公楼或活动室。基督信仰和教会随着聚会地点的演变而趋明显化。

在2000年左右，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基督徒人数也大量下降，而城市基督徒人数的增长成为基督教人数增长的主要部分。此时东方闪电从河南农村开始扩展到中国其他的城市，东方闪电的主要成员发展网络不是靠吸收个体新会员，而是将非官方基督教会带领者通过劝说，暴力等手段转换为成员，而将整个非官方教会吸纳如该组织。在田野访谈中，也有一些非常信徒是自愿，因为私密性，即使成员聚会也处于一种封闭隐秘化状态，而导致对其人数究竟有多少从上千万到几百万的估计差异很大。

信仰文本等特点

在东方闪电的信仰文本中，主要是由其领袖”再来的女基督“言论所组成，但是从文本中，可以发现，其中有很多中共官方的宣传语言也被纳入在其话语体系之中，如”走进新时代“等词，在其分为教义文本的《羔羊展开的书卷》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段这样写到：

“你们现在应学点更现实的功课，没必要谈那些令人欣赏的高谈阔论，比起谈认识一个比一个高，但人仍是没实行的路，有几个有实行？有几个能学到实际的功课？有谁能谈现实？对神的话能谈出认识不算你的真实身量，只能说你天生就聪明有天赋，你指不出路来还是一场空，是没用的废物！谈不出一实际实行的路，这不是伪装吗？不能把个人的实际经历供应给别人，让别人学习功课，让别人有路可行，这不是假冒吗？不是伪劣商品吗？有什么价值？这样的人只能充当「社会主义理论的发明家」，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贡献者」。没实际就是没真理，没实际就是废物，没实际就是行尸走肉，没实际就是「马列主义思想家」，没有参考价值。我劝每一个人还是关闭住理论的嘴来点真的，货真价实的，学点「现代艺术」，谈点现实，贡献点实际，有点奉献精神。说话要面对现实说话，别夸夸其谈，令别人赏心悦

目，令别人对你另有看法，这有何价值？让别人对你热情这有何意义？说话讲点「艺术性」，行事讲点公平，办事有点理智，讲话带点实际，一举一动想着点神家利益，情感出来时讲着点良心，别恩将仇报、忘恩负义，充当伪君子，这样做「影响不好」。吃喝神的话时多联系点实际，交通时多说点现实的，别站高位，神不愿意；为人时多讲点「忍」、多行点「让」，胸怀宽大点，学习点「宰相精神」；有不好的意念时，多实行点背叛肉体；作工时多讲点实际的路，不要讲得太高，人都够不着；少享受点多贡献点，来点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多体贴点神的心意，多讲点良心，神为你们天天苦口婆心地说，多想着点别忘了，多翻翻「老黄历」；多祷告勤交通点，不要再糊涂了，讲点理智长点见识；罪恶的手伸出来的时候缩得短点，别伸那么长，没用！到神这儿得着的都是咒诅，小心点；有点可怜人的心，别总持着武器打人，多供应点谈点生命，讲点帮助别人的精神；多做点少说点；多实行点，少研究少分析点；多得点圣灵的感动，再多给神点成全的机会；再除去点人的成分，人的作法还是太多，虚浮的作法举动还是令人厌憎，再除去些；心理动态还是太令人讨厌，多改着点；心中人的地位还是不少，再给神点地位，别太不讲理了，「殿」本来是神的不该让人占有。总之，多讲点公义少讲点情感，最好还是除去肉体；多讲点实际少谈点认识，最好还是闭口不谈；多讲点实行的路，少谈点没价值的大话，最好还是从现在开始实行。”

除了将官方的话语体系和基督教的话语体系用一种较为粗糙的白话纳入到其文本中，能够被农村信众所接受。在其所用的诗歌中，很多曲调来源于国际歌和其他的流行音乐，从文本和音乐也能够反映出，到目前其成员的文化层次普遍不高。

但是，除了基督教的一些惯常术语之外，还有一些组织内部的特殊话语体系，如“大红龙”在基督教中所代表的敌基督指当下的政权，潜伏进入非官方教会称为“摸底”和“铺路”等等。

隐秘化和民间宗教性

在访谈中，有很多基督徒都提到接触到东方闪电，但很少人能够知道具体的组织模式。

“这种组织的私密化使得一般人很难进入，通常都是异性告诉你有个地方有学习，比你

所在的教会好，有真道，我就去了，他们对于一些基督教的术语很熟悉，但是后来，就会用剪纸剪出个东方闪电或者基督几个字，来告诉你这是神迹”——M，20070109

“我父亲和姑姑都是，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聚会，他们也不会说，家人根本不知道，也不让说。”——LL，20101203

在海城（化名）进行田野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非官方教会的带领人都会谈及到东方闪电，认为上海非官方教会对于来访者都会进行深入的了解（三个月的考察期），才能够被允许进入主日聚会，一个原因是在于2000年初，东方闪电对于非官方教会带领人进行了集体绑架，从而形成的一种传统。

在山城（化名）时，有一位教会的带领人回忆了关于东方闪电与其教会之间的冲突。

“我们回来就和东方闪电面对面打了一场恶战。异端，你如果真的跳出来想，说中国人怎么这么傻，怎么说耶稣来了还是个女的，他还信？你会发现他傻不是傻在理论上，而是他私心太重了。大部分被异端迷惑的人，都是因为被自己的私欲所迷惑。当初侵害我们教会的时候，我最先发现，很多人还有保留，包括我先生，他说你不懂，人家乡下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你难道不觉得他每句话都在捧你吗？她下午就带我们去乡下服侍，我感觉你讲的时候，他不停地在迎合你。我是从很小的事发现她的诡诈。因为异端容易被发现的，就是他们的不诚实。我们中午一起出去吃饭，她就说一定要买单。我们刚回来，paul就觉得他又服侍城市教会，又服侍农村教会，大家都捧着，她还觉得自己都在位主奉献呢。有一天只能我一个人去，她带我去吃饭，她就不买单。就看出这个人，没有连续性，不合逻辑，有目的的。最初我稍微发现就发现他们听道的时候，一边听一边在想别的，不专心。而且他们弄一个东方闪电的在那里，说这个人以前怎么怎么，他们是怎么劝说他回来的。实际上全部都是一台戏，杀伤力非常强。他们会针对每个同工的弱点谈，比如你这个人很直爽，他会拿这个激怒你；或你这个人很软弱或很有爱心，就会用那个…我感觉一天接无数个电话，也带这个骗我们的老姊妹，我就直接告诉她，你行的是恶的，她在我面前痛哭流涕，简直是掏心掏肺地悔改。但过了几天，人家又打电话来说她带着谁谁又去骗人。后来我发现异端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真的是敌基督的灵。这个侵害到我身边的同工，眼睁睁看到一个姐妹，用男色来引诱他，说是一个英国毕业的神学生，要带她到世界各地服侍主。我一听，就……没过几天，就哭着回来说这个人还和其他姐妹有关系。他们的手段很恶劣，还有恐吓的话，她都不

能回来。

“这个和中国的教育有关，人的基本辨识能力都没有。后来我们知道，加入这种团队，一方面就是钱色引诱你，而且恐吓你。后来我知道他们不敢离开，因为他们恐吓你说，离开出门就被车撞死。如果你没有对神的一个坚定的认识，是没有办法离开的。那时和他们打仗，有时同工都不想打了，因为每天这种混乱的电话接太多了。但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必须说，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那个老姊妹，我就一字一句清楚地对她讲清楚，主还没有来，主是谁，然后让她重复我说的话，然后一起祷告。Paul 还觉得我很…因为他一般很 nice，但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因为灵魂都没有了…还干嘛啊。但这场恶战打了很久，包括一些亲戚，你会发现那个东西还在他里面，像毒瘾一样，有的时候他会说，我觉得活在世上真没意思，巴不得到外面被车撞死，怎么怎么的。这时你会怜悯他，但我会很敏感地知道，这是那个灵在和他说话。圣经读给他听，他都不听，说自己这一辈子多么苦，实际上他是恨恶神。争战之后的果子还是很美。为了这个，我还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因为我和她姑姑讲，她觉得我处理得太严厉了，直到她姑姑把很多家人骗去，她才给我写了一封信。所以我都很小心的，有时看很多奇奇怪怪的人，会不会是…”——T 20091104

封闭化？或公开？

东方闪电对于教会的冲击，各地的非官方教会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因为海城非官方教会的经历，还有其他的因素，导致其非官方教会本身也选择了一种封闭性，一些教会带领者一方面认为可以防止政府对于正常基督教的打压，一方面可以防止东方闪电的侵入，被其称之为“牵羊”。

一位海城非官方的带领者说在谈及教会是否应该公开时，说：

“这个很好理解，它作为一个执政党，不希望人民有联合起来的力量，教会恰恰是这样的一种力量，而且教会是不屈服的，所以它想监督，都是很自然的。并且这也是他的职责，如果是良性的监督的，这是好的，我也不希望教会和政府之间是完全隔绝的，这个对教会也不好。在海城或北京这些城市，已经蛮宽松了，不像五六十年代。上海的环境还是蛮好的，反而一放开，我倒是想象一些不好的事情出现，比方说异端，大规模的异端活动。现在这种

看似紧张，时不时宽松的环境，可以给异端一些压力。我们自己经历过，还有一两百人的教会，受到的压力是很少的。抵御异端 最重要的是会众自己有分辨力，还有是服从教会的权柄。就算自己在危险中，但因为顺服长辈的保护而不去犯险。会员制也帮助我们去确认他对教会的顺服、委身，也是有多重好处的。——JuMin 20090902

然而，在我们田野的过程中，这个非官方教会本身就出现了一些金钱以及对于参与者的控制，不允许会员私下的活动和读经，这种隐秘性本身造成的是对于各个非官方教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很少有人能够知道。一些海城的一些非官方教会尽管还没有成为东方闪电这种隐秘化和具有暴力特征的新兴宗教，但是也具有一种对于信徒本身进行人身控制，要求彻底听从带领人的趋势，除了东方闪电外，在海城还有其他类似的组织，并且这些组织成员多以大学和大学毕业刚刚进入工作的人员为主，如夸国际性的耶稣青年会，和本地从学生团契演变而来的 UCC 组织。

一位对于非官方教会进行研究的大学教授这样谈到：

“家庭教会的变化和问题——我个人也跑了很多地方、调研、访谈、资料。有几大问题：第一，由于长期封闭，而新教的传统是不会有统一的组织建构，也不可能，导致内部出现很多异端，这个是对严重的挑战。由于神学上装备不足，导致异端不断出现，部分异端也被政府定为邪教。我们不做这个判断，但这个现象本身来说，教会内部本身也有原因。…但改革开放之后，一开始没有宗派。宗派的原因，是两个：一个是海外宣教士进来，那么多宗派，就把部分宗派影响带过来了，不管有意无意的。谁在这边宣教时间长、投入多，它的影响力就大。第二，家庭教会内部在领受福音信息时，产生宗派。这中间也有很多异端，部分被政府定为邪教的。到 21 世纪，三自还是后宗派，家庭教会进入后后宗派时代 *post-post-denominational age*”。--PL, 20101103

而对于山城的非官方教会而言，因为多种因素，从 2008 年之后，这个城市中的非官方教会采取了一种明确的宗派化和信仰告白的公开，来使得教会公开化，来防止东方闪电这种隐秘化宗教的吞并和侵害。

“但这个过程也使我们社会化、公开化的程度很高了，很多教会都浮出水面。好几个教

会就联手起来，看到原来基督教里面有各种教派，我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怎么基督教里还有灵恩啊，自由派啊，改革宗啊，太多了。异端，东方闪电，到我们教会了，有个姊妹被掳去，一直到到现在，还有一个长老的师母，就很坚强，回来以后和我们讲，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要特别警惕异端。而且他们特别攻击热心奉献的人。”——w, 20110406

“最近一两年没有了，之前有东方闪电想进来，几年他们一直在我们当中。后来有一个人，尾巴露出来了，我们在全教会公开宣布他是闪电。他追求一个姊妹，后来又追求另外一个姊妹。从交流中，慢慢发现他说的一些东西，还有他接触的人。现在有没有不清楚，因为教会是开放的，但组长会承担很多牧羊的工作，有什么事他们会向组长反映。”—S, 20100112

在持续了三年多的田野访谈中，我们比较了山城和海城的信仰公开化和教会私密化的程度，将在下篇中对于东方闪电和教会的起源进行详细的分析，来回答为什么在两种城市中，教会会发展出不同的类型，公开化的程度非常不同，其中的一些因素也正是东方闪电在当下社会起源的重要原因。■

边疆篇

西藏观察

格尔登寺的悲剧

作者：李永峰

最近几年，在藏区所出现的自焚事件，其情状之惨烈，其人数之庞大，即便放诸世界史范围内，也难以找到先例。这场悲剧，无疑也将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道阴影。从2009年开始，这场已经达到129人自焚的悲剧，到现在依旧没有停止。探究其原因，显然任何单一解释都无法成立，政治的压力、身份的焦虑、经济的困苦、宗教的追求、对未来的绝望，抑或阴谋家的煽动？本文无力探究这场悲剧，本文只是试图观察一下引爆这场悲剧的原点，即格尔登寺，以求为理解这场悲剧以及中国更为广泛的民族问题，提供点背景资料。

格尔登寺的历史传承

因为自焚事件，虽然国际媒体对于格尔登寺已经有了广泛报道，但由于藏传佛教寺院系统的复杂性，很多报道并没有意识到，尽管名称都是“格尔登寺”，但所指向的具体寺院却有可能截然不同。冠以“格尔登寺”之名的寺院，是一组，而非一个，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遵奉格尔登活佛（Kirti Rinpoche）为最高导师。同时，它们的母寺也只有一座，那就是位于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的达仓纳摩格尔登寺（有些书中写作拉莫寺、郎木格尔底寺，或者郎木格德寺），这里也是历代格尔登活佛的正寺，现在流亡印度的第十一世格尔登活佛洛桑丹增晋美·益西嘉措（Lobsang Tenzin Jigme Yeshe Gyamtso）也是于1947年在这里坐床，正式成为活佛。

格尔登寺在几百年的历史里，在四川、青海、甘肃交界地区，通过建立分寺、拉拢土官、管辖部分部落，而成为当地一个政教合一的中心。这除了与历任格尔登活佛的经营有关之外，也与其创建者有一定关系。格尔登寺院系统的创建者，也就是第一世格尔登活佛格尔登茸青·

更登坚赞，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亲传弟子。他受宗喀巴指派，回到阿坝地区建格鲁派寺院，于一四一三年创立达仓纳摩格尔登寺。因其创始人与宗巴喀的关系，格尔登寺在后世也时常受到特别的尊敬。

在 1949 年之前，达仓纳摩格尔登寺有十八个分寺，分别是格尔登茸贡寺（四川阿坝县下阿坝）、巴马寺（四川若尔盖县崇尔乡）、卡郎寺（四川若尔盖县卡机刚）、热尔寺（四川若尔盖县热盖）、森多寺（四川若尔盖县占哇乡）、罗格寺（四川若尔盖县热尔乡）、尼益寺（四川若尔盖县阿西乡）、甲格寺（四川若尔盖县隆扎乡）、若尔寺（四川若尔盖县崇尔乡）、鲁浪乡（四川若尔盖县占哇乡）、纳所寺（甘肃迭部县）、俄学寺（甘肃迭部县）、俄且寺（甘肃迭部县）、色尔堂寺（甘肃迭部县）、莫日寺（甘肃碌曲县）、霍仓寺（甘肃碌曲县）、草登寺（四川马尔康县）、格尔登寺（四川阿坝县中阿坝）。（资料来源：燕松柏、雀丹《阿坝地区宗教史要》）。

到目前为止，按照第十一世格尔登活佛的说法，格尔登寺在海内外，一共已经有了三十到四十座分寺（李江琳：《阿坝自焚事件的背景》）。这些分寺中，最重要的是位于阿坝县中阿坝的“格尔登寺”（我们在下文称之为阿坝县格尔登寺），这座分寺位置在人来人往的阿坝县县城中，消息容易传播扩散，所以也是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且，这座寺院因其规模，在整个格尔登寺系统中，一向地位特殊。阿坝县格尔登寺是由第八世格尔登活佛于一八八零年创建，在 1949 年之前曾拥有四大扎仓，多时据说有三千僧人，它还曾发展出了自己的子寺系统，有卡西寺、河支寺等分寺。但该寺在文革中曾遭巨大破坏。

藏传佛教中，同一寺院系统，母寺会向分寺派遣“堪布”（大致相当于汉传佛寺中的住持），然后实行“堪布”负责制，对于分寺的具体事务干涉的并不多，甚至能够容忍分寺发展不同的神学主张。2012 年，在纪念格尔登寺创建六百周年之际，据正在印度达兰萨拉的十一世格尔登活佛介绍，格尔登寺的母寺虽然是格鲁派，“但其分寺弘扬宁玛、觉囊、萨迦、噶举和苯波等各教派传承，一直以来，各教派都很和睦相处”。（西藏之声：西藏阿坝格德主寺创立 600 周年纪念活动在达萨举行）

国内外的分途发展

除了分寺众多，地处多民族杂居的藏区边缘地带，当下审视格尔登寺，还需要注意另一

个重要的背景，这就是格尔登寺中国境内分寺与境外分寺的不同发展路径。其实，不止格尔登寺，整个藏传佛教，因为达赖喇嘛的流亡，而出现了分化。1959年，西藏最高领袖达赖喇嘛，带领众多高僧一起流亡印度，并在印度重建了各宗派重要的寺院；而中国大陆则在共产党主导之下，对宗教进行了系统改革，这开启了藏传佛教内外歧异的分途发展。

跟随达赖喇嘛流亡的宗教领袖，包括了各大派别的法王，比如萨迦派的第四十一任萨迦法王、噶玛噶举派的第十六世大宝法王等等；另外还有各个寺院系统的大活佛，比如拉萨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比如格尔登寺。1942年出生的格尔登活佛，流亡印度后，继续完成藏传佛教的佛学训练，于1986年获得拉让巴格西学位，并于1987年开始在达兰萨拉重建格尔登寺。1990年建成的达兰萨拉格尔登寺，成为格尔登寺院系统在中国境外发展的中心。

藏人流亡者，因为寄居于印度国土，十几万人只有四十几个定居点，以前的统治体系被迫改变，寺院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也受到挑战。作为因应，过去政教合一的宗教，开始转向内心。从六十年代开始，作为一种个人化的修炼模式，也做为庞杂和神秘的宗教文化资源，藏传佛教开始在西方大众中获得流传，而达赖喇嘛更成为举世闻名的精神导师。

而在中国国内，宗教改革，不仅推翻了僧侣的统治阶级地位，将其列为被“改造”的对象，一度更禁绝宗教、毁坏寺院。留在中国大陆藏传佛教最重要的领袖十世班禅喇嘛，从1966年开始，经历了十年的囚禁生涯，1979年更打破戒律娶妻生子，整个藏传佛教的生态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在八十年代，因班禅等人的努力，藏传佛教的传承，又开始延续，在底层民众中，也出现了宗教回潮。但随着众多高僧大德故去，寺院和信众虽在境内，掌握密宗传承的众多大活佛却在境外，这构成了国内藏传佛教发展的一种困境。

不过，内外分途的发展，在八十年代，也曾有过短暂的交汇。从1979年8月开始，受北京邀请，达赖喇嘛曾先后派出了四支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其中，在1985年的代表团中，有很受达赖喇嘛信任的十一世格尔登活佛。那一次回国的格尔登活佛，还曾到达仓纳摩格尔登寺停留了五天。

格尔登活佛的回归，等于重新衔接起了国内外格尔登寺的共同信仰桥梁。此后，邀请格尔登活佛回来，成为国内格尔登寺僧侣与政府之间冲突的中心。一如要不要达赖喇嘛回来，是西藏问题的中心一样。而新的流亡者，也追求去境外格尔登寺学习。据藏学家次仁夏迦(Tsering Shakya)介绍，“在达兰萨拉的流亡格尔登寺里，150位僧人中有127位来自阿坝，仅一人出身于印度（其余的来自国内其他藏区或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

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因为在认证十一世班禅活佛问题上的对立，北京和达兰萨拉之间再也没有重建信任。而且中国政府也开始加强对宗教控制。九十年代末期，中国大陆新成长起来的一批高僧，也选择了出走之路，最典型比如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和曾经担任过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阿嘉活佛。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不在场，引发了宗教秩序的失衡，一方面是各种自认的“仁波切”，以宗教之名行商业之实；另一方面，是寺院内的中下级僧侣，自行解释佛法和教义，出现了激进化趋向。

格尔登寺与政府的冲突

据现有的公开资料检索，国内格尔登寺系统与政府之间冲突，主要是从九十年代开始激化。在这些冲突的背后，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虽然受到了全能型政府的干预，但是格尔登寺在当地信众中，还是能够发挥巨大影响力。首先格尔登寺仍然是当地的一个教育中心，而且在教育中的影响受到了政府的忌弹；其次，格尔登寺依旧具有动员能力，可以发动居民连署邀请格尔登活佛回来。而政府的应对，一方面是强力打压，另一方面则是分化和拉拢。

阿坝县格尔登寺在创建时，合并了当地旧有的洞沟寺，但洞沟寺活佛转世系统依然自成体系。目前，洞沟活佛在阿坝县格尔登寺内具有很高地位。在十一世格尔登活佛及其信众与当前中国政府激烈冲突的时候，洞沟活佛似乎就成了政府拉拢的对象。2012年，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到阿坝县格尔登寺调研，官方媒体特别强调，听说省委书记要来，“洞沟活佛以及索朗降木措等寺管会成员手捧洁白的哈达，早早地站在寺庙大门外迎候”。

不过，政府的这些手段，并没有消弥矛盾，因为更严重的危机已经来了。以下是我根据公开报道所检索到的，从九十年代以来，格尔登寺与政府之间的一些冲突。

90年代初，格尔登活佛“写了一本包含十三条内容的小册子，从达兰萨拉寄到达仓纳摩格尔登寺和阿坝县格尔登寺。被当地政府发现后，他们说这十三条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逮捕了几名年轻僧人。”

1992年4月，阿坝格尔登寺附近，张贴了不少西藏独立的标语，中国政府因此抓捕了七名僧人。

2002年，若尔盖地区的居民联署签名，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邀请居住在印度达兰萨

拉的格尔登活佛能回到家乡访问，希望能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中国政府驳回了请求，并且严格监控达仓纳摩格尔登寺。

2003年8月20日，政府强制关闭格尔登佛学院。开学时，不准学生到格尔登佛学院上学，学院教师必须返回格尔登寺。

2004年，据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报告，7月29日，当局关闭了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阿坝格德寺院所属学校（Ngaba Kirti Monastic School），并将其主要赞助人索巴那格（Soepa Nagur）传唤到省会成都。这所于1994年用民间资金建立起来的学校向农村居民传授藏语和佛学知识，它在1998年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当局强行让学校改名，要求在教学大纲中包含非宗教课程，并最终将该校与附近另一所学校合并。

2008年3月16日，继拉萨3·14骚乱之后，在阿坝也出现了骚乱。中国政府指控是境外的十一世格尔登活佛操控了这一骚乱。据达兰萨拉的介绍，3月28日，全副武装的军警开始进入阿坝县格尔登寺，逮捕百余名僧人。4月8日，若尔盖县达仓纳摩格尔登寺的学校被当局关闭，当地73名藏人游街示众。

2009年2月27日，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扎白，在县城中的塘西街自焚，成为了此后多达129起自焚悲剧的开端。

显然，所有的冲突，都不及目前还在上演的自焚悲剧严重。按照藏人作家维色的统计，到目前为止，自焚人数达到129人，已经遍及四川、青海、甘肃、西藏和海外。但是，2009年到2011年，最初的十五起自焚事件中，有八起与格尔登寺有直接关系。所以，海内外的媒体都将格尔登寺当作自焚事件的风暴中心，我们或许可以说，这里是引爆自焚浪潮的原点。

自焚者中既有大量的牧民，超过五十六人，他们正在经历“牧民定居”工程所导致的巨变中；也涉及不同教派的信众，比如萨迦派寺院阿坝德普寺19岁的僧人桑达、道孚县的宁玛派尼姑旺青卓玛，当然最多的还是格鲁派信众；有些自焚者的遗言直接指向政治，比如要求达赖喇嘛回来，有些遗言则似乎与经济纠纷有关，比如青海的房屋拆迁案例。

从格尔登寺僧人所开启的这种惨烈的自焚悲剧，现在已经超越了当初格尔登寺僧人的诉求，而变成了藏人表达态度的一种极端手段。这些态度，未必都与政治有关，其中可能也包含了一些纯粹个人性的选择。但无论什么样的原因，129位自焚者，已经成为盛世中国的伤疤。藏区的矛盾与冲突需要更多的人去关注，或许才能规避更大的悲剧。■

本土/国际篇

一贯道在海外

作者：萧敢

一贯道是清末光绪年间在山东兴起的宗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北方风靡一时。北京市长彭真曾说：“一贯道是北平第一大党。”建国之初，中国开展惩治反革命运动，清除“反动会道门”。一贯道首当其冲，两个月内有三百多个坛主被抓，上千个佛坛被关闭，其中许多坛主被枪毙。1951年底，中国宣布已完全消灭一贯道组织。1951年上映的宣传电影《一贯害人道》，让群众对一贯道的形式有了更多了解。回头来看，这倒也是一份难得的资料，保留了许多一贯道当时的仪轨和组织模式。

一贯道在鼎革之前就已传到台湾和南方各省。鼎革之际，包括师母孙慧明在内，很多一贯道领袖都去了台湾。少数在云南的堂口，后来也转移到缅甸、泰国等地。虽然台湾在“解严”之前也对一贯道加以管制，其他宗教更是对其加以排挤，但总体环境还算宽容，默许它开枝散叶，慢慢成为台湾重要的宗教势力。目前，一贯道信徒（教内又称为“道亲”）数量已经超过百万。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宗教管制，一贯道合法注册。2012年，马英九更是以总统的名义，对一贯道过去遭受的委屈表示“抱歉”，显示出一贯道在台湾社会的巨大影响力。

一贯道在台湾发展的同时，很早就注意进一步在海外开拓。它在新加坡和缅甸等地，都已经建立起宏大的道场，在澳洲开拓也近三十年。最近几年，一贯道的一些分支更是在美国、南非、墨西哥、巴西和巴拿马等地开辟道场，传播到五大洲。一贯道的文化根基是华语和儒学，有人认为就是“孝道”，这是华人普遍接受的文化和道德基础。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缅甸、柬埔寨等，华人要开办正规华文学校，会受到极大限制。一贯道有效挤入这个空缺，摇身一变成为非正规的华文学校，对当地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当然，目前的一贯道，也有超越华人社团的趋势。比如，在澳洲的一贯道佛堂里，不仅有华文和英文资

料，还有越南文资料。一贯道的信众们，似乎对团结“儒家文化圈”的影响力充满信心。

教义与基本组织形式

不妨先回头来看一贯道的教义和基本组织形式：它同时具备了宗教和秘密团体这两方面的特征，与过去的白莲教、弥勒教、罗教、天理教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直接的一点表现为，它们都有弥勒崇拜和末世论的特征，又摆脱了佛教、道教清修苦练的痛苦而主张“顿悟”，甚至真言口诀都有类似之处。佛教认为弥勒是未来佛，而这些宗教以末世论来吸引教众，核心崇拜偶像也从释迦牟尼佛转变为弥勒佛以及无生老母。现在，一贯道公认的最重要祖师当属第十八代祖师，也是末代祖师，“济公活佛转世”的山东人张天然（张光璧）。张天然奉无生老母之命，1930年在山东开坛传道，1937年赴天津传道，又写下《暂定佛规》，从此一贯道迅速传遍全国。张天然尊路中一为第十七代祖师，又开沙扶鸾后受命与“月慧菩萨转世”的孙慧明结为夫妇，共掌一贯道。道众称其为“师尊”。

一贯道有一条核心教义，即“三期末劫”。三期者，青阳、红阳、白阳也。民国以降，白阳大劫已经开始，世界趋于毁灭，所以才有末代祖师张天然受命传道，“三曹普渡”，通过“直指人心，不二法门”来帮助大家得道解脱。张天然为末代祖师，他已于1947年去世，之后便再没有祖师。而一贯道既有“天命”，各个堂口之间就存在无形“金线”，形成松散的组织结构。当然在祖师转世和“天命”的阐释上还存有一些分歧，导致一贯道分裂为不同的派别。

同时，一贯道又有非常严密的组织形式。它并非佛教、基督教那样的开放性组织，愿意接受一切非信徒来参观或听道。在一贯道里，如果一般人要入道，必须有引师和保师，然后经过点传师（相当于一个佛堂的“经理”，须有天命，在一贯道中位阶很高）开坛，授予“三宝”，这才算正式入道。他入道时必须立下重誓，不得泄露秘密。很多手法都与洪门，白莲教等秘密帮派的仪式非常接近。平时，信众之间互称道亲，自称后学，称别人为前人，还有很多暗语，加上点传师、引保师的名字，能迅速建立起一种隐秘的认同感，并扩展为有效的组织。

从各个角度看，一贯道都是很有弹性的宗教。“一贯”显然出于《论语》里的“吾道一以贯之”，可一贯道除了尊儒教外，也尊道教、佛教、耶教和回教。儒教存心养性，道教修

心炼性，佛教明心见性，耶教洗心移性，回教坚心定性。在澳洲一贯道的“天帝佛堂”里，五教宗旨都挂在墙上，配以张天然、路中一等祖师的画像。中央则是三佛，两侧分别是青阳期的燃灯古佛和红阳期的释迦摩尼佛，中央是白阳期的弥勒佛，象征三期末劫以弥勒佛为主；有时也会在周围供奉济公菩萨、月慧菩萨、关帝圣君等，但须以弥勒为主。平时，只能点两盏佛灯，所谓日灯与月灯。中央一盏佛灯名为母灯，意为“明明上帝”，只有新人“挂号”（即入道）时才能点燃。

一贯道讲求素食，也是过去中国很多民间宗教的共同特征，所谓“食菜事魔教”。印度教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口素食，并不稀罕，可在中国文化中，素食仍是一个非常异端的行为。笔者曾问过一些道亲对一贯道的看法，他们无一例外地会强调素食，并且从这种行为中感受强烈的道德优越。但一贯道吃素的教义与佛教不同，道亲们一般持蛋奶素，可以吃蛋，所以在台湾又被戏称为“鸭蛋教”。

另一个特点，一贯道注重仪表，讲求服装整洁。过去民间对这种秘密宗教有很多传言，比如一贯道活动多在晚间，男女必须裸体拜神，或者男女间进行“神交”等，颇为不堪。所以，现在一贯道的各条主要组线都要求大家参与活动时衣冠整洁，听道时男女分坐，男性是乾道，女性是坤道，不得有言语上的暧昧。一贯道尊崇儒教，“男女之大防”本就是儒教重要传统。所以，一贯道至少有在表面上把这些关节要害做到位，在群众之间树立了一个更好的形象。

除了这些仪轨之外，一贯道最常见的活动就是开沙和讲道。开沙扶鸾是一种颇有争议的活动，电影《一贯害人道》也狠狠地加以讽刺。开沙须由三个幼童来实现，称为“天地人”三才。天才在仙佛上身之后，手执桃木枝所制的沙笔，在沙盘上倒写出一个个文字，还常有“回文”，一般人难以辨识别，只有“人才”可以读。“人才”大声读出“天才”写的字，并清理沙盘，“地才”则负责在纸上记录，这就是仙佛的重要训示。据说早期一贯道还有“借窍”的形式，即仙佛上身后通过某个人的嘴，直接说出训示。这种形式后来取消，全部转为开沙。师尊张天然与师母孙慧明结合，便是通过开沙获得仙佛的承诺。

但开沙这种传导训示的方式仍有大量争议。已有很多过去的三才出来揭露开沙的秘密。《一贯害人道》就把女主角设定为一个痛改前非的天才。所以，目前影响很大的宝光组在几十年前已经废除开沙制度，只是推行讲道。在宝光组新加坡、澳洲的佛坛里，人们自然也看不到开沙了。但是，这些组的“老前人”们，也并不愿意否定过去开沙所获得的训示，只表示当今很难再能有效开沙罢了。不过，也有一些组线仍在开沙，但其影响力已远远不及讲道。

鼎革之后的海外流变

行文至此，有必要再对台湾一贯道的组织模式，即所谓“十八组线”做一番梳理。1947年，张天然猝然去世，毫无预兆（亦有人说为人所害），对一贯道组织造成不小的打击。当时，一贯道分裂成孙慧明为首的一派（师母派，又叫金线派）和以张天然之子张英誉为首的一派（师兄派）。两派对“天命”的认识并不一致，被外界嘲笑“各办各的道”。师母派的影响力远大于师兄派，目前台湾的一贯道完全就是师母派的道。师兄派的人很少有出去的，“师兄”张天誉也于1953年以反革命罪在大陆枪毙。几十年前，在台湾的极少数师兄派残余人员提出将自己的道改名为“天道”，与完全被师母派所控制的一贯道加以区分。当然，一贯道仍与天道有密切的联系，只是对“天命”的认识有所不同。

在张天然去世后，孙慧明自称与张同时受命。所以，在她之后，各个不同的组线就通过“金线”联系，真正是各办各的道了。以“金线”组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台湾并没有承认一贯道的合法性。为了保持实力，一贯道道众相约暂不联系，各自为政，日后则以“金线”相连。所以，鼎革之后来台的一贯道信众有十八支之多，多以当初在大陆的“坛名”来传道。后来发展规模比较大的组有：基础、宝光、发一、兴毅等。比如基础组的前身就是上海基础坛，宝光组的前身是上海宝光坛，发一组的前身是天津同兴坛，兴毅组的前身是天津新毅坛。

很多在大陆属于同一坛的信众，到了台湾，又根据老前人、点传师的不同，细分为再下层的组。以后的发展，一般就以道场为行动单位。比如，赴澳洲开拓的一贯道信众，就隶属于宝光组的建德道场，以台中天皇宫为中心，现任领导老前人名为林再锦。我们如果问他们打听其他道场的情况，那就几乎一无所得了。所以，了解佛堂的时候，只有落实到道场，才算找到比较有效，组织力最强的单位。同一组的不同道场之间有着巨大区别，而不同组之间的区别就更大。在海外经常可以看到，几个不同组的一贯道道场来办道。比如，在泰国北部，就同时有发一组和宝光组的人在拓展。两者之前没有任何隶属关系，行为模式（比如对开沙的认识）可能也有不同，甚至存在强烈的竞争和排斥。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可能就是孙慧明师母所说的，通过“金线”的潜在联系吧。

台湾一贯道的发展，显然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放开党禁有关。当时，一贯道被承认为合法宗教，而且在民间有着强大号召力。而在动员和拉拢选票方面，最有力的组织就是黑道

和民间宗教。从此，一贯道的意义逐渐为政客所认识，并与之相互利用。最终，一贯道扩展为台湾的一支重要宗教力量。

当然，一贯道的教义在传播过程中也会发生很多变形。据说，十七代祖师路中一从先天教中学来的口诀有“六字真言”，可十八代祖师张天然改为“五字真言”。目前台湾所流传的，基本都是这“五字真言”。现在，一些台商也在大陆经商的同时，往大陆回传一贯道。笔者有一次听到台商在大陆“传三宝”传的竟是“六字真言”，与张天然当年定下的“五子真言”不符。这种口诀是整个宗教的核心，绝不能乱改，于是整个传承系统就很值得重新研究了。

又比如，笔者在澳洲所见到的入道仪式，应该与目前台湾主流的入道仪式相接近，但与张天然的《暂定佛法》或1951年拍的《一贯害人道》对比，都有一定的不同。点传师将一部分颂词用闽南语念诵，必是张天然当年所无，倒与洪门的仪轨有一些相通之处。一贯道在台湾和海外流传了大半个世纪，受到洪门或其他秘密组织和宗教的影响，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事实上，笔者所见到的点传师、坛主们，对这些教义教规并不执着。一贯道在缅甸与小乘佛教融合，在新加坡就与道教融合，只要坚持华语和儒教本色，讲求道德，培养孩子读书知礼讲孝道，一贯道就能很容易地获得华人的信任与推崇。澳洲天帝佛堂的点传师与笔者一行说起，台湾的一贯道协会正不断与大陆沟通，只要洗清历史，一贯道就愿意改名后重返大陆。早在张天然祖师时代，一贯道就已经以“中华道德慈善会”“顺天圣会”等多种名义活动，形式多变。在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他们更是根据当地的法规选择一个恰当的名称和身份。在他们看来，名义根本不重要，重要的还是行动。一贯道既有隐秘的“三宝”，又有半公开的如“三期末劫”“五教合一”的教义，还有公开的慈善、教育、教化、文化传播等社会活动，很有弹性，以此在社会上博取一席之地。

这几百年来，从先天教、罗教、白莲教、天理教，直到一贯道这几十年来普及，说明民间宗教在汉语文化中有着极为强大的生命力。只要政治松动，它就能迅速繁荣，丝毫不逊于佛教、基督教等主流宗教的能量。它的成功经历与发展前途，颇值得思索。■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2014·惊蛰

观澜学社·观察报告·第四期

前言

进入 2014 年之后，我们继续追踪中国的变化，尝试为公共舆论的讨论提供知识的增量与视角的启发。

“观澜学社”是一个自发、独立、非商业的网络社群。我们关注当代中国历史的展开，试图对几项可能会影响中国命运的因素进行观察，进而分析和评估其未来走向；我们无意于介入学术界的对话，更无意于鼓动任何政治势力；我们追求中国社会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建构“重叠的共识”。我们的名称来自《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我们计划每两个月公开发布一份《观察报告》，上一期《观察报告》的编号是“2013 年·冬至”，以后也将逐次按照中国农历的节气编号。我们不会为了乡愿式的“客观中立”而牺牲洞察的敏锐与论述的犀利，但我们会始终保持知性的审慎。

本报告所有文章均可根据“署名完整—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原则在互联网上传播，商业使用务必征求原作者同意。 ■

目录

法政篇

中共高层观察

李靖云：王书记面前的“纸牌屋” 5

王明远：胡耀邦与赵紫阳的不同（上） 10

经济篇

资本观察

楼晟：新长征路上

——中国的结构调整与信息经济 14

阶级篇

新工人观察

巩高兴：打工者的春运购票难题 17

社会组织与互联网篇

非官方教会观察

李晋、马丽：宗教场域，文化信念（上） 19

——基督教在中国的演变

互联网观察

宋宇：重估微博的价值 25

边疆篇

新疆观察

李永峰、热依莱：新疆“跨越式发展”的生态陷阱 29
——以和田地区为例

本土/国际篇

萧敢：柬埔寨的美元化 32

法政篇

中共高层观察

王书记面前的“纸牌屋”

作者：李靖云

如果说王岐山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中最有个人特性的人，恐怕会有争议，但是在一共就七个人的最高统治集团里，他无疑是最为鲜活的人物之一。见惯了胡温时代冷峻刻板的官僚面孔，以及小学教师式的讲话方式，王岐山鲜明的个人色彩，非常富有现代政治人物的风范。从其政治履历来看，出身传统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具有“改革四君子”的称号，使之在传统特权精英——知识分子群体里有着开明的声望。作为前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婿，他又是标准的“太子党”，为党政特权精英所接受；作为“经济沙皇”朱镕基的重要门生，他处理过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的棘手问题，又是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一推手，被认为是能干的官员和经济专家，被胜出精英和技术精英所接受。在一个精英阶层分化与冲突的时代，作为统治者，能被四种统治精英都认可，这是殊为难得的。事实上，政治的分裂一般是统治精英群体的分裂造成的，王岐山个人显然无法解决政治结构上的分裂，但是至少不会扩大这种分裂。这位排名第六的常委，担负了纪委书记的职务。有着洋派风格的王岐山也喜欢看流行美剧，并且援引流行美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主人公弗兰克的身份——党鞭，来比喻自身职责，而外界对王岐山也有“中共之鞭”的称谓。虽然，这样明显有噱头可讲，但是就政治的实际内容而言，纪委书记与党鞭之间有着极大的不同，但并非不可逾越。

毛邓时代中共政治框架的变化

就传统政治分野来看，中共是一个标准的列宁主义政党，按照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M.Duverger）的两种政党划分，即内造政党（interior party）和外造政党（exterior party），中共显然属于外造政党。其政党机器在政治框架之外，而非政治框架之内。列宁主义政党是科层制政党，政治阶梯当中，中央总书记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之下是政治局常委，再下一个阶梯是 25 人左右的政治局委员，然后是 200 多人的中央委员会，再往下是从村到省的各级党委。这一高度层级化并行政化的体系，保证了中共的行政指派能力。与这种党政体系高度发达相对的，是中国国家能力的弱小。自清末开始全面建立行省制度，并改革中央官制，建立专门司法、警察系统以后，直到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国家建设方面，中国一直停滞。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有恢宏志向，但是其国家能力从来都局限在东南数省范围内。全国性的战争，事实上是一种政治能力竞争。国民政府并没能在这个竞争中胜出，胜出者中共则依赖其高度有力的组织。这种组织能力并非是一种国家层次的政治能力，而是一种党政政治能力。从军队到税收，所有的基本国家政治能力，实际都存在于中共的党政政治能力上。这种外造政党的结构，从一开始就别扭在一起。1949 年的政协，中共为首制定共同纲领，开始了正式的建国过程。但是这种协商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的基本形式，在中

国共产党的政治能力支撑下建立。一旦中共准备施行某种具体的国家发展目标的时候，这个形式实际就可有可无。这种情况很快成为现实，1956年中共重建书记处，实际上就是在自己的党政框架内设立了新的政府。1958年，毛泽东对书记处的任务规定是，“重大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党政不分”，又讲“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一元化”。归纳起来，这其实就是一句话，“一切权力归书记处！”，即通过党的政治能力来实践具体的政治安排。

客观来说，这事实上是一次政治转向，甚至可以说带有一定的宪法更迭意味。一般而言，所谓的外造政党，主要是指党机关不是在议会内，而是在议会政治外，议会外有党机关来组织党在议会中的基本政治活动。毛泽东设立书记处，全面吸收政府职能，事实上政府已经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其直接后果，就是中共从一个人格化明显的政党，变成了一个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本身的非人格化，和党意志的人格化直接发生冲突。而“大跃进”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国家战略失败，可以说是陷入了失败国家的陷阱。这一失败的后果是惨重的，不仅导致大饥荒等许多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家结构实际上被破坏了。事实上，即使一个外设党政体系和一个政府体系并行，毛泽东也没有能力发动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政治结构的破坏降低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难度。事实上，他最后也是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官僚体系非人格化和党意志人格化之间的冲突。如果客观看待这种解决方式，毛泽东强调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属性，乃至强调党的人民性，可见在其政治意识中，党的人格化特征还是要盖过党的行政能力。但是，其直接后果就是政治局中充斥普通工人农民，但是并没有一个人有着政治能力。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等人既不懂具体的行政，也不懂列宁主义党的权力结构，很快在毛之后的政治斗争中输掉了。叶剑英以军事家的身份实施了政变，可以说是运用了中共过去最基本的政治能力——战争能力。但是，中共于其后形成了“邓小平—陈云体系”，完全是党务官僚和政务官僚的组合。可以说，中共一定程度上回归到1956年的政治框架状态，但是大联盟民主政治结构是彻底破坏了。

中纪委的产生与嬗变

这样一种政治框架，事实上就是党政特权精英和技术精英治国的组合。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也就是国家建设完全以经济竞争形式展开。“经济改革”一方面是一个涵盖商业政治法律的词汇，在另一方面则是讲求实际，解决问题的实际衡量标准。可以说，在具体的行政能力中，政治能力是压倒性的。这样看来，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家能力的增强和政党的人格化特征消亡，最后失去政治能力。但是，无论陈云还是邓小平，都对中共的人格化特征非常重视，都反复强调中共作为政党的特殊性，对于执政的特质非常强调。某种程度上，“文革”后重建破坏的政治系统，国家建设的投入远远不如党政建设。中纪委的出现，事实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建立起来的。中共成立之初就建立过中央监察委员会，希望能够以此来明确并加强中共的组织纪律。但是，在军事竞争为主要的时代，这一机构显得非常多余，事实上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1949年之后，中共又建立了相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和董必武这两位元老，先后担任书记。但是，自从政治框架被破坏之后，该机构基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很快也就寿归正寝了。客观地说，毛泽东既有驾驭群众运动的能力，也有自成一体的政治体系，而且又有崇高的政治威望。他完全不需要借助一个官僚体系来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增强党的人格化特征。而且，莫里斯·迈斯纳就指出，毛不断地发起运动，实际上使得中国在政治上无法形成稳定的利益集团，所以也没有反腐压力。

但是，毛泽东的办法是邓小平、陈云所要坚决革除的，克里斯玛式治理让渡给官僚制度。1978年中纪委重建，陈云担任书记。从这个时间点，我们也不难发现中纪委与“反贪腐”并无直接联系。事实上，中纪委真正的作用在于加强中共的组织纪律，贯彻党的意志，也就是保护中共的人格化身份。所谓政党的人格化，从组织体系上讲，体现在政党的组织纪律上；从政治原则上讲，体现在本党的党纲以及意识形态上。但是，从一般的直接政治行为讲，则是体现领袖的意志。正是邓小平—陈云的领袖地位并不牢固，才有了中纪委的设立。纪律的核心要求就是贯彻领袖的意志，而非其他。不能遵循党的领袖意志，就必须接受处罚。这一点从一开始就体现得非常清楚，胡耀邦曾经一度主持中纪委，立刻公布了“组织纪律十二条”。其具体条款，就有着洗刷毛泽东的影响，重新建立组织约束能力的作用。客观的说，平反冤假错案，清洗“文革”派，纪委都发挥了作用。但是，在当时大众政治依旧存活在中共政治逻辑之中的情况下，领袖权威之间的恶斗还是普遍的。中纪委事实上发挥确保领袖意志的作用，还是在六四事件之后。

作为一个外来的，非军功进阶的党的领袖，江泽民可以借助贯彻自己意志的手段并不多。这里将讨论他当时运用的两个手段。其一是“三位一体”，总书记任国家主席、军委主席，通过国家政治的身份来强化自己的政治身份。江主席和江总书记，两个政治身份合一。中共的最高领袖，第一次借助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来强化自己的权威，其实说明国家权威已经具有事实的政治能力。“三位一体”，使得江泽民能够运用多重政治身份来提高政治权威。但是，这远远不够。因为，中共作为一个政党，也是有强烈人格色彩的，对江泽民而言仍然是个考验。具体到党的人格化权威，其实也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个人人格能够赋予党的人格化，这也是外造型政党领袖通常所必须担负的。在江泽民之前，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经赋予过党某种性格。第二种方式，就是个人能体现党的原则，能实现政党的基本政治观念，一般而言，这是内生性政党的特点。那么，对于江泽民而言，他接班是通过第二种方式实现的，即邓小平、陈云等元老认为他符合党的原则。但是，一旦作为领袖，他又必须要能赋予党一种新的人格。这就必须要有另外的手段来显示自己的人格威力，从而贯彻自己的意志，而中纪委实际就是最好的手段。

江泽民第一次利用中纪委贯彻自己的意志，是在与陈希同的权斗过程中。通过反腐这种斗争方式，江获得了政治胜利，从而贯彻了自己对党的统治能力。从组织体系角度讲，中共也完成了一次历史性嬗变。纪检监察作为一种组织体系，真正开始起到贯彻党的意志的作用。这一基本框架被胡锦涛完全继承，并进一步组织化，成为中共政治体系内的一个基本制度。

正是基于这一制度对组织体系重大的约束作用，中纪委书记从中共十四大开始就成为最高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一员。纪委崛起，相应的是组织部长地位的下落。组织与人事是中共最关键的政治制度，通过人事任免，是政治支配权的核心所在。但是，中纪委掌握了随时发力进行政治打击的权力，这一支配权力事实上已经大于一般人事安排。正是基于此，组织部长晋升纪委书记，一度成为一个规范化安排。一则，组织人事体系比较熟悉工作，能够掌握官员情况；二则，这也是中共内部的一种政治妥协，组织部提拔的官员，进而再掌握纪律监察权，都在同一官僚体系掌控之下，本身能保持稳定。故而，从纪委公开的信息可以发现，在由地方长官执掌中纪委的吴官正时代，中纪委有过一次全面扩大时期；而到组织部长贺国强掌握中纪委的时期，中纪委则相对安静不少。中共在“文革”之后的权力碎片化状态，是政治领导人所竭力要解决的。由此才有中纪委地位的提升，即希望通过纪委来绑定各个权力碎片。但是，中纪委本身则面临权力碎片化的状态。这看起来是一种讽刺，却也是王岐山接

任纪委书记时的基本政治现实。我们无法从切实的渠道知道，这种内部的政治安排如何做出，但王岐山本人从一个行政主官变成一个党务主官，确实有着先天的优势。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他的三重政治身份，被中国目前四类统治精英所接受。这也意味着，他具备进一步改造中纪委的基本条件。

当下中国的“纸牌屋”

不论对王岐山还是对习近平、李克强而言，中共目前的政治构造确实是一个“纸牌屋”。这部流行美剧，不仅王岐山爱看，习近平也喜欢看。中共目前政治结构的碎片化，倒也较符合“纸牌屋”的字面意思：由碎片搭建，实际危如累卵。在这样的一个旧制度环境中，他们必须要完成一次带有宪法革命色彩的行动，才能够延续中共目前的政治生存。爱好看书的王岐山选择什么样的理论并不重要，但是投射出一种有理论修养的政治家的形象，则非常必要。

梳理王岐山在中纪委的一系列举动，直接的印象就是扩权增效。中纪委从机构编制再到权力效能，都大为扩张。政治区块之间的分割被打破，不管是“边”还是“块”，中纪委都前所未有地统一起来。另外一点，就是打击力度非常大，“一月一个副部级”并不是开玩笑。从反腐风暴角度看，没有谁比王岐山的步子更大，势头更猛。这既出于实际形势推动，也是习近平体系的自身政治需要——去威权碎片化。

一般而言，现代国家的必须要有三大支柱：第一，统一的立法机构；第二，统一而且科层化的行政机构；第三，统一的司法机构。这三者都是韦伯所谓“现代理性主义政治”的一部分，也是孟德斯鸠对英国近代政治所总结归纳出的“三权分立”的基本三权。对于中国政治而言，统一的科层化的行政机构很早就已经出现。但是，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虽然这是理性主义的政治制度，但却和传统型政治混合在一起，本质上并非理性主义的官僚体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中国官僚机构的人格化问题。中国的行政体系，乃至整个官僚机构的人格化状态，在根本上由中共作为政党的人格特点所造就。作为一个外造性政党，中共实际上完全依附于行政体系。这正如有中国学者所讲的，中共是行政吸纳政治。但是，就目前看来，这个结果不是党的非人格化，而是官僚体系的人格化。目前，中国的碎片化威权主义状态，恰恰就是因为整个政治体系人格化的结果。党内有怎么样的派系组织，有怎么样的政治人格行为，就会体现在行政体系上。中国的“新左派”学者希望，借助毛泽东曾经的“大众政治”手段来实现政党认同，从而解决威权碎片化问题。习近平提出的“群众路线”，某种程度上也有与之合拍的迹象。但是，深入观察则可以发现，习的“群众路线”，其实是一个文宣系统通过意识形态控制落实权威的手段。对于习近平而言，可能是策略，而不可能成为长期制度。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可以发现，司法改革可能是未来制度建设的关键，包括司法体系去行政化。需要注意，这里的“去行政化”并非一般意义的去行政化，而是去行政绑定，成为一个新的政治系统，并且服务于政治结构。但是，这显然还是不够，故而王岐山的任务更重。

客观地说，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也是议会政治。正如 19 世纪的英国名相迪斯累利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政党政治就没有议会政治。反过来说，没有议会政治也就没有政党政治。正因为议会政治存在，所以政党的原则才一次次被反复讨论，政党的政治身份才越来越清晰，

其人格属性才被广泛认知。外造政党融入议会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对于革命化的列宁主义政党而言，则比较困难。这主要是因为革命党通过战争竞争方式，授予“议会”合法性，而这一合法性发源于党的政治权威。一旦“议会”自立权威，政党通过占据议会来获得政治权威，事实上就意味着抛弃政党原本政治权威。这对于革命化的列宁主义政党而言，不啻于自杀行为。比较可能的方式，在于“议会”继承政党的政治权威，最终使政党融入到议会之中。要想进入这样一个政治进程，条件很多，难度很大，这里不多做讨论。笔者仅仅想指出，如果想进入这样一个进程，中共必须要有一套新的整合本党的方式。

所以，不管从实际政治需求而言，还是从未来政治发展的要求而言，中共都必须有一套新的政治整合机制。这既是习近平的难题，也是王岐山的难题。中共虽然逃避民主政治，但却强烈拥抱现代政治体系。这看似矛盾，事实上确实是一种直接的政治需要。

照一般理解，民主政治就是定期的选举政治，内涵在于政治权威授权于民众。这是一般民主政治的最根本原理，但民主政治虽有其固有原理，但比原理还重要的是操作技术。如果一个政治组织没有一套正统的政治操作技术，没有人会在“非战争形态”的政治竞争中认输，那么政治将永远处于授权阶段，而无法进入实际的政治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的民主政治，能够运作起来，客观地讲都是指“选举之后的阶段”。特别是对代议制而言，选举之后并非是民主政治，而是政治交易的形成。选举并不是难事，但是如何达成政治交易，并且履行交易是更难的事情。所以，所谓的政治成熟国家，不仅在于有一套选举制度，而且还有一套操纵民主的技术，更需要有一批能掌握这套技术的群体。

对于中共而言，虽然对于民主授权并不热心，但是对于建立一套认输的体系则是非常积极的。客观地说，《纸牌屋》中，弗兰克作为党鞭，就是负责政治交易和处理认输下野问题的。对于王岐山而言，他领导的中纪委，必须要从一个党纪的调查处罚部门扩大成一个负责政治交易、政治市场的督导，变成一个政治博弈的参与者，及政治竞争规则的裁判员。这些具有宪法意义的革命，要比单一的反腐风暴更有政治意义，也更能长期维持政治影响。就现有的政治体系讲，中共组织部事实上是政治交易的市场督导，政治竞争的裁判是缺位的。孰胜孰败，往往取决于上层的直接权力博弈。要整谁，就查谁，绝然是一种成本极高的斗争方式。而且，中共正在谋求建立统一的司法体系，长期来看，这种以“查人”方式来处理政治博弈的机制势必会淡出。这意味着，中纪委更需要真正成为现代的党鞭，而不是传统的御史大夫。如果要完成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至少需要一些条件。首先，组织部的政治交易督导工作必须要直接交付中纪委。获得了基本的人事安排权力，纪委才能真正起到执行政治博弈的作用。其次，一般性的政治竞争机制必须要建立起来。竞争无处不在，没有竞争的政治必然是一潭死水。对于中共而言，即使是模拟状态的竞争，比如民意测验安排，也必须要有了一定的约束性。中纪委能够通过人事安排捍卫这种规模控制的竞争方式，也必须要有相当的办法使参与者能认输，而不产生治理上的成本。再次，也是极为重要的，这样一种政治安排必须是全国性的。一旦无法形成全国性的政治竞争，那么区域化的政治竞争只能形成本区域的认同，反而继续加大威权的碎片化。

但是，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改革的直接政治后果是对改革的强烈需求。对于政治竞争的放开，其直接后果是对竞争的需求更为强烈。这也意味着，即便王岐山真正能完成这样的工作，中共的政治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而这是一个无法破除的难题。■

中共高层观察

胡耀邦与赵紫阳的不同（上） ——为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

作者：王明远

世人提起胡耀邦和赵紫阳，常常以“胡赵”并称之。大家皆认为二人政治理念相似，年龄相仿，一个做党的元首，一个做政府首脑，实为相辅相成一对。君不见，每年6月4日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内都高高挂起胡耀邦、赵紫阳的巨像。在当代中国研究中，胡赵相提并论似乎是一个公论。

我与胡赵二位圣贤，算是都有些“渊源”，这也算人生一大幸事。2009年，我参加工作，办公室桌对桌的李树桥同志是赵紫阳的二秘。他在80年代就是正局级秘书，“天安门事件”后遭到贬谪，20年不升一级。而我所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也就是当年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赵紫阳曾经长期兼任体改委主任，这里是他当年的主要政治班底。之后，我又从事胡耀邦研究，有幸和胡耀邦的家人和老部下接触。这些年，深入了解80年代的历史后，就会发现，胡耀邦与赵紫阳并不是什么政治盟友。他们的背景出身、权力根基、行事风格，甚至人格道德都有迥然的区别。人们常挂在嘴边上的“胡赵”，只不过是想象猜测，或美好期望罢了。

“中央军”与“地方军”

首先，两人在政治背景上有巨大差异，这在讲究派系门第的中共是很重要的。胡耀邦是湖南浏阳人，中共历代领导人，很多出自该省。他1931年起就参加了红军，长征期间担任少共国际师政治部主任。在党内，胡耀邦可谓根正苗红的主流派。

1940年，胡耀邦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是八路军最年轻的高级干部，那时候他才24岁，而赵紫阳彼时不过还是预备游击队的一个指导员。1948年，胡耀邦成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也是最年轻的兵团副职领导。1949年，他担任川北行署主任。当时，四川被分为四个省级行政单位，所以时年33岁的胡耀邦成为最年轻的省长。1952年，胡耀邦调到中央，担任团中央书记。1956年，他当选为八大中央委员，时年40岁。这样，胡耀邦又是中央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八大上仅选出56名中央委员，多数部长、省委书记都不是中央委员，其含金量可想而知。所以，胡耀邦是一路顶着“最年轻的”帽子上来的，又担任团中央总书记。其角色十分明显，最起码建国后毛泽东、刘少奇一代领导人就把他当做未来主要接班人培养了。胡耀邦所走的路子，也就是后来胡锦涛、李克强、胡春华等人走的路子。他以后做党的一把手，是不足为奇的事情。

赵紫阳则自始至终只不过是一个地方军，非主流派系，在担任国务院总理之前，从来没有在中央工作。1938年到1949年，他一直是一个地方干部。1949年到1980年，赵紫阳先后在广东和四川工作，可谓与中央主流派没什么渊源，自然不会像胡耀邦一样被当做接班人来培养。然而，赵紫阳以其出色工作能力，能够异军突起。1965年，他成为最年轻的的省委书记，1980年又被元老们看好，直接出任政府首脑。

胡赵政治背景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他们成为领导人后权势能量的差异，也是当今他们在中共党内官方话语中，评价不同的一个渊源。

半朝人马与手下无兵

中央军出身的胡耀邦和地方军出身的赵紫阳，出任领导人后，其权势自然不同。胡耀邦经营共青团达30年，此时，当年共青团的部下纷纷出任督抚大员或部委首长。而当时炙手可热的领导们，基本都是胡耀邦在红军时期或陕北时期的上司或同僚。以1986年胡耀邦被迫辞职之前的政治格局情形为例，中央书记处主持工作的常务书记胡启立，是胡耀邦的共青团老部下；中共中央四部首长，全是胡耀邦的老部下或政治同盟军，中组部长陈野萍是胡耀邦老部下，中宣部长朱厚泽是胡耀邦的坚定支持者，中联部长朱良和统战部长阎明复则是当年共青团的书记处书记；共青团干部外放的，有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和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等。这俨然是“邓家天下胡家党”的态势，以致陈云在批判胡耀邦时，说他搞“青红帮”。胡耀邦在1987年被元老们用非法程序赶下台，我认为固然有政见差异的原因，但元老们不愿看到大权旁落才是更直接的原因。

然而，胡耀邦经营的“团系”，此时已经根深蒂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胡耀邦虽然被罢黜，但是他的嫡系胡启立还能在十三大上当选为第四号领导人，并被确立为下一届总书记人选。其后，胡锦涛、王兆国等团系部下一直能左右中国政局至今日，也足见胡耀邦权力根基之深。

所以，胡耀邦在1987年被赶下台后，他的政治盟友或部下们能立即反扑，搞得“左王”邓力群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没当上。胡耀邦一直不能被完全打倒，仍旧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江泽民执政期间，胡耀邦一直被刻意回避，但是待胡温执政后，其政治声誉与影响力能够立刻反弹。

而赵紫阳就不同了。他到国务院工作，可谓“单刀赴会”，是光杆司令。后来从四川调来的“半路部下”田纪云，就算是他在中央的唯一嫡系了。由于赵紫阳建国前长期在革命地位不怎么重要的豫北，在元老们中也没什么老熟人，所以，虽贵为总理，他却只是孤家寡人一个，工作全靠邓小平的全力支持。

赵紫阳未尝不想经营他的班底，搞他的“北洋六镇”“黄埔系”。但是，赵紫阳搞来搞去只搞出来个“体改所”和“政改小组”，全是吴稼祥、吴伟、吴国光等一帮年轻的“章京”，有正义有学识，但搞政治帮不上什么忙。所以，一旦“邓大人”对赵失去耐心，他不但权力全部丧失，人身也失去自由，被囚于东皇城根。他的小“章京”们，不是被下狱，就是像康

梁一样远走海外，活脱脱一个现代版的“戊戌政变”。

“阳人”与“小资产阶级分子”

胡耀邦是个无权谋的人，向来光明磊落，这是其至今仍受社会推崇的原因，在中共党内也是个异数。

毛时代的中共党内斗争哲学就是整人，谁人身上没有“几条人命”，谁人不整人。连被奉为道德楷模的周恩来，整起人来也不眨眼，整彭德怀、朱德、刘少奇、林彪，周公都不甘落后。大家别忘了，周公还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呢！敢说一辈子没整过人的，也就只有胡耀邦、习仲勋了。

在苏区，胡耀邦还是红小鬼时，就吃了左倾的苦头，差点在肃反中被杀头，自此对“左”祸恨之入骨。1942年延安整风，他没有整一个人。1949年到1952年他主政川北省，也是搞温和土改，在镇压反革命中少杀人。1957年反右，他硬顶着在团中央不抓右派。结果，团中央趁他出国访问之际，划了20多名右派，其中一个著名作家陈模。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当了总书记后，见到陈模还给他鞠了一躬，说当年没有保护好他。

1965年，胡耀邦被派去陕西省做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北局第二书记。这时，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要胡耀邦抓“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余孽”，胡耀邦硬顶着不抓。结果，胡耀邦在陕西当了100天书记，就被批判了100天，实在干不下去，1966年春被叶剑英接回中央。1978年，胡耀邦主动给当年整他的“老左”刘澜涛平反。刘澜涛到他家去道歉，胡耀邦说都把这件事情忘了。

1980年，胡耀邦接替华国锋成为党中央主席。但是，在怎么评价华国锋的问题上，胡耀邦和邓小平有很大分歧。按理说，胡耀邦理应拼命贬低、压制华国锋才是，通过非正常程序上台的新君，无不拼命构陷前面的皇帝。但是，胡耀邦觉得不应该完全剥夺华国锋的职务，也觉得其历史功绩不应被抹煞。这事情引起邓小平的不快，也是影响胡邓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直到下台后，1988年春节胡耀邦和夫人李昭去看望邓小平，两见面就直说了一段话，邓问胡“你还是那么看待华国锋吗”，胡说“还没有改变看法”。可见，胡是“坚贞不屈”，而邓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1986年底，元老们早已经密谋好要让胡耀邦下台，而邓先给陈云、李先念这两位超级元老打了招呼。李先念颇为不满邓搞宫廷政变的做法，躲到上海以图撇清干系。年底，胡耀邦去上海视察，顺便看望了李先念。先念同志在耀邦面前大发雷霆说：“还学老一套去整人，再整我就不干了”。回京的飞机上，耀邦天真地问秘书，谁要整先念同志？岂不知，先念是在警示胡耀邦。而胡耀邦浑然不知，其性之率真可见一斑。

而赵紫阳是有点权谋的，会在背后整人。1983年，胡耀邦被剥夺经济领域决策权，实有赵紫阳的原因。赵紫阳在背后向元老们打小报告，结果陈云发话：“经济就让紫阳来管好了。”1987年，在批判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赵紫阳的发言最让人心惊胆战，说胡耀邦是野心家，今天小平同志还在，你就如此猖狂，如果小平同志不在了，你会怎么样云云。这不活脱脱就

是“庐山会议”上林彪批判彭德怀的话吗，不像是正人君子讲的话。后来，胡耀邦评价赵紫阳是“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其实，“六四”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赵紫阳权谋的结果。正因为赵紫阳被撤职，而让大家忽视了他的权谋，忘记他对“六四”的责任，使他全然成为一位圣人。其实，赵何尝不应为“六四”承担责任。整个学潮过程中，赵其实一直在利用学潮向邓施压，正所谓“挟寇自重”。学潮闹得那么凶，跟赵紫阳一直不断释放信号不无关系。而邓小平一旦下决心要军管，堂堂党中央总书记却不能挺身而出救学生，继续态度暧昧，既不愿得罪邓，又不想落得镇压学生的骂名。此时，党内同情学生的高官和将领不在少数，倘赵总书记能公开表达对学生的同情，则高官们发话也“勤王有名”。可赵总书记依然首鼠两端，至被废黜也没有公开表明态度，可谓关键时刻无胆无谋。今人都把赵视为“六四”的殉道者，岂不知学生遭戮，党内改革派高官悉数被清洗，改革前程中断，他要负很大的责任。■

编者注：本文为《胡耀邦与赵紫阳的不同》的上篇，下篇将于下期《观澜报告》刊出

经济篇

资本观察

新长征路上

——中国的结构调整与信息经济

作者：楼晟

在刚过去的 2013 年年底，内外市场的普遍预期还是对流动性收紧的担忧。转过年来大家却发现，2013 年那块笼罩在新兴市场国家头顶的阴霾，已然褪去了大半。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观察，当从国际、国内两方面入手，进而去推演未来的方向。

国际：美元资产曲高和寡

在海外方面，随着耶伦顺利继任，对美联储宽松政策延续性的担忧，已经被对美国金融市场泡沫的担忧所取代，国际热钱回流美国本土的速度明显放缓。这不仅体现在美股上涨乏力，资金获利离场意愿渐强上，也体现在，此前一些受到资本外逃与国际流动性影响较大的新兴经济体以及“欧猪国家”（初期指欧元区的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和西班牙[Spain]四个南欧国家，财政赤字均较高，后与爱尔兰合称“欧猪五国”[PIIGS]——编注）的融资环境都有明显改善。比如，印度央行已经预计，2013-2014 财年印度的经常帐赤字（CAD）将从 GDP 的 4.8% 下降至 2.5% 以下，并表示会考虑在连续三次上调黄金进口税后，一次性将税率从现在的 10% 下调至 2%-4%。在欧债方面，希腊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自 2010 年 5 月以来首次跌至 7% 下方，西班牙与意大利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也创造八年来的新低——这虽然有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与德国通胀数据低迷的功劳，但不可否认，其中有美元资产因价格过高而导致其吸引力下降的原因。

美联储官员已经放风，将把加息的失业门槛下调至 5.5%，并声称即便通胀暂时高于 2%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很难想象，其中没有受到自由派倾向明显的耶伦影响。如伯南克毕生研究大萧条，耶伦对失业课题的长期研究，也一定会为未来的联储货币政策打上烙印。鉴于美国金融体系去杠杆已近完成，而实体经济依然面临着失业与增长不足的情况，相信耶伦在她的联储任期内必将改变伯南克对金融市场“有求必应”的态度。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市场整体牛市的货币环境将发生变化。虽然，还会有一些小型新兴市场国家受到联储退出波及，但相信“大块头”们过关的难度不大。

国内：宏观风险释放顺利

与此同时，2013年困扰国内市场多时的“钱荒”也出现缓解迹象。虽然，由于年初资金面一向较为宽松，以及对“钱荒”记忆犹新，市场还对今年的流动性宽裕度持谨慎态度。但随着shibor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编注）的持续下行以及预期中的资金紧张状况落空，至少对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流动性的看法，已渐趋中性甚至乐观。

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持续偏紧的货币环境，以及人民币在过去一年多时间中快速升值，倒逼了经济结构调整，外加“一行三会”（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这四家金融管理和监督部门——编注）对相关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管理，使得有效信贷需求下降；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人民币近期的快速下跌上。虽然，人民币兑换外币汇率的涨跌，背后一直被外界认为是由监管当局的有形之手干预，但我们不能忽视，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的形成机制（即银行间外汇市场中所产生的价格），至少在中短期上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过去一年多时间中，人民币在经济转向调整结构，且美国方面也不以此为主要政治谈判筹码的情况下，还会持续快速升值。正是由于，在国内这个相对封闭的市场中，人民币流动性相较于美元流动性在过去一年多时间中明显吃紧，使得银行间外汇市场上的主动结汇、套取人民币的意愿增强，才可以推升人民币不断逆经济基本面与政治因素上涨。而随着人民币汇率近期的迅速回调，也可以表明是金融机构的结汇意愿下降，以及人民币流动性状况改善。

此外，随着中央政府“打老虎”形势的明朗化，也使中国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中短期下行风险得以释放。毕竟，如果中央政府在政治路线上遇到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的强力反弹，那么从经济上进行反制的“以打促服”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甚至，不能排除此前较为紧绷的经济金融环境，含有配合政治路线推进的意图。因此可以认为，国内宏观环境在未来的三个月至六个月中将好于去年同期。

方向：信息经济

如果说，在去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还在人们的意料之内，那这次出任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小组组长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了。比如，外部媒体在仓促间的解读口径，都在望文生义地把这理解为加强舆论管控的一种信号，并仅以“网安组”的称呼描述该机构。但是，我们只要对相关新闻的细节稍加关注就不难发现，新成立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其涵盖范围远超单纯的“安全”话题（且不论如果只是单纯的安全问题，完全能够把职能归入国安会），可以说是一个综合了安全、经济以及新产业蓝图的“创新”小组。

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做出的类似“要让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与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日益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以及“提升信息采集处理传播利用安全能力”等提法，表明本届领导层已经开始走出传统的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模式，不再是那种基层试错彻底成熟后，由中央在众望所归中确认背书的改革方法，真正体现了“顶层设计”。即便从传统模式来看，在比特币、余额宝、打车软件这些新生经济金融现象还起伏不定的时候，就能从最高层传出回应，其反应速度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就影响来说，短期上可以看到，信息互联网产业在经过近二十年的打磨后，已经具备了向传统产业进行深度渗透的能力，可以借其突破成熟产业与地方利益集团的藩篱，充当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和开路先锋。这在近期关于如何对待余额宝的问题上已表现出来，代表传统银行一方的银监会与银行业协会，想将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货币基金存放银行的存款纳入一般性存款管理，不作为同业存款，需按规定缴纳存款准备金。而若将余额宝存放银行的存款纳入一般性存款管理，必将对目前高收益的余额宝造成巨大冲击，试图直接扼杀的意图非常明显。而央行行长周小川及副行长易纲，则显然对余额宝持开放态度。不过，即便这些新生事物的前景还存在不确定性，但其作为新经济中核心亮点与热点的地位却毋庸置疑。而对处于调整结构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在传统行业难有起色的状况下，关注度本身就蕴含着极大的机会。

而在中长期上，大数据的运用，也将改变当下经济学概念中对于单纯市场配置资源概念的认识。仅以打车软件为例，如果通过有效的数据匹配，可以保证使用者的出行需求得到及时满足，那还有多少人会保有私家车；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思考，目前私家车的实际使用率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从这个角度讲，虽然在传统的马列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造成生产力极大浪费的观点有待商榷，但在信息经济背景下看，消费领域的私有制所产生的浪费却是实实在在的。而这其中带来的挤出和歧视效应也已经出现，打车软件导致相关服务与资源快速向软件使用者倾斜，使得没有或不会使用智能移动设备的中老年人用传统扬招方式打车愈发困难。虽然不能简单的以小见大或由此及彼，但依然可以看到，信息经济对社会固有经济与地位次序的洗牌效应，只会比想象中的强。

综上，我们在解读未来中国改革方向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实施路径时，不应仅仅停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里。结合信息经济的角度去看待这一问题，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阶级篇

新工人观察

打工者的春运购票难题

作者：巩高兴

标题中之所以使用“打工者”，而非“农民工”，是因为“打工者”乃我们这一阶层成员的自称。社会上通用的“农民工”是他者对我们的称呼，来源应该是官方文件与媒体，然后其他阶层随声附和，不论他们对现政权持什么态度。一些具有“毛左”倾向的人称我们为“新工人”，以区别于曾具有政治荣耀及铁饭碗的国企工人，因为他们把时间范围限定于中共建政之后。不过，民国时已存在大量产业工人，而且出现过比 1949 年后活跃得多的工运。如国共合作时共同支持的工人势力；破裂对立后，双方各自支持的工人势力，特别是中共幕后推动的工运。其他的称呼还有数个，就不再列举简述。

打工者回家乘坐的交通工具有火车、大巴车、包车、私家车、摩托车及飞机等。

首先，话题的空间范围，限定在我熟悉的珠三角及家乡甘肃。但是，其他地区的打工者具有相似的行为模式。家在两广及湖南的打工者，会优先选择大巴车，因路途短费时不多，票价虽会上浮但不是高得不可接受，而且没有买火车票那样麻烦。湖北、河南、贵州这些省份的打工者，如果实在无法买到火车票，也会接受大巴车。至于包车，东莞一带的一些打工者，会在略有积蓄的情况下，购买小车转行载客谋生，也就是所谓的“黑车”载客。这一群体，会在年底招揽四五个同样目的地或同一线路的乘客乘他们的车，而乘客主要是粤西北的打工者。打工者很少乘坐飞机，费用高是主因。而且，打工者来自不发达地区的农村，机场则位于大中城市，打工者下机后还要转乘火车或汽车，非常麻烦。

火车之所以成为中长距离打工者回家交通的首选，是因为票价优惠，及相对于汽车所具有的安全性。在此文中，我将主要叙述与购买火车票有关的事情。选择乘火车的人多，竞争激烈，买票从而成为难事，困扰打工者及铁路运营者。

这里，先回顾一下车票实行电话、网络购买前情况。在家乡，南下的打工者要么托关系走后门，买到坐票或卧铺票；要么彻夜排队购票，如一次不能买到就会继续彻夜排队，直到买到票，不管是否有座。在严寒中，排队的人们穿着头套、手套、耳套及面部防护的棉制品。如既无关系又不愿忍受严寒与漫长等待，那就只好折腾于不同的交通工具。如 2008 年，我与两位老乡初下广东时，先在火车上站着到达汉口（幸好我是从车门进去的，我的姐姐 2001 年南下时，是从车窗进入火车），隔天再搭上脚都无法挪动的临客（火车）站着到达深圳西站。半夜到站后，我们再搭黑车到老乡租住处。2010 年独自南下时，我先乘火车到武汉，在无法买到当天去广东的车票的情况下，只好乘坐大巴。因沿途有雨雪落下，高速路上

时有车祸出现，车走走停停，经二十多个小时才到深圳。而在广东，人们为购买回家的票，除了彻夜排长队，去私人中介那里买高价票也是一种选择。

实行电话与网络售票，可异地购取票，及同一铁路局不同车站实行不同时段售票后，人们少受了许多不该受的罪。可见，只要当局重视打工者的利益，有些问题是有解决方法的。此时，虽有人去售票点买票，但排长队的现象不存在了。新的购票方式让大家不停地拨打电话，然后焦急等待。很多人让数个关系密切的人同时拨打购票电话，以增加拨通的概率。2013年前，私人购票中介还存在，之后在警方的打击下彻底消失，人们只有依靠自己。中介的消失，虽然给购票系统减轻压力，但也使人们少了一种选择。网络购取的车票，占去了总票数的最大份额。因此，成天与电脑打交道，受过较高教育的群体，成为购票大战中的优胜者。打工者并不是人人都方便使用网络，在资源占有不平等的情况下，同样的机会，会产生不公平结果，就算有“农民工团体票”这一补充，矫正效果也不明显。

可以认为，买票难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解决，及打工者在就业地的安家落户。■

社会组织与互联网篇

非官方教会观察

宗教场域，文化信念（上）

——基督教在中国的演变

作者：李晋 马丽

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基督教新教成为中国大陆宗教复兴现象的主要部分。参加非官方教会（也称为“非注册教会”或“家庭教会”）的基督教新教信徒，其人数已经远远超过参加官方“三自”系统的信徒数量。学者们从诸多角度来解释这一增长：后 89 时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后，人们对意义的寻求；市场化随之而来的道德滑坡；中国农村在 80 年代出现因“神迹医治”而归信基督教的大潮；以及教会通过高信任度网络招募新成员的结果。不过，很多研究忽视了这一增长背后的组织特征：经过几十年的政治逼迫和打压，人数增长的基督教新教组织大多停留在地下化、小型、秘密聚会的形式，也就是“传统家庭教会”形态。同时，这些新归信的信徒组织，生活在一个以恐惧和冷漠为特点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信仰更倾向于成为一种私人化的经历，缺乏公共视野。我们所要强调的一点，在于“私人化”这个本文研究中的关键概念。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其理解与西方宗教社会学中的含义有所不同。基督教信仰的私人化，在西方语境下，指的是人们随着世俗化的影响，渐渐自愿地将信仰与公共生活脱离开来。在中国语境下，基督教信仰的私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政治压制后，共产主义政体所施加的政治恐惧和冷漠所带来的。

1978 年改革开始，政府对经济上渐渐放松管制，允许市场秩序重建，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开始享有更多自由。在 80 年代的“文化热”中，也因政府开始宽容对待一些意识形态之外的宗教文化，学界、文化界短暂经历了“文化基督徒现象”。在此之前，因为官方控制媒体的刻意审查，“基督教”已经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了几十年。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基督教新教组织中开始进入一个“去私人化”的阶段，具体表现为，一些基督教信仰的表达和见证开始广泛流传于民间。2000 年以后，随着基督教新教信仰逐渐向城市社会的传播，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包括城市职业人士、知识分子、大学生）进入或成立非官方教会，加上传媒科技（包括网络和新媒体）的普及，更多基督教信仰资源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使得城市非官方教会组织呈现公开化的趋势。一些教会已经不再使用私人住宅作为聚会场所，而是转向商务写字楼，甚至购置教产。这一类建制化教会是组织形态的创新者，他们冒政治风险，试验出一种更正式化、有组织的教会制度，包括教会名称、地点的联系方式的公开，也包括人员和财务等制度的正式建立。在一些城市中，几个创新教会的成功转型，甚至带领一种趋势，让更多秘密聚会的教会加入正式化、公开化的行列，形成一个公开化的宗教场域。同时，这一公开化趋势，也重新塑造了当地的政教关系。虽然，起初有一个政府教会对峙甚至冲突的阶段，但随着时间流逝和教会透明度增加，政府对公开化教会的打压冲动逐渐淡化。

而在另外一类场域中，此类创新极少发生，大多数教会组织仍处在秘密化聚会状态。这些教会组织的带领人通常更体认所谓“传统家庭教会”的模式，信徒中也盛行去政治化的观念，信仰仍然处于私人化状态。

当学者们不关注非官方教会的组织演化过程时，他们只是把“家庭教会现象”作为一个统管所有非官方教会的类别。但实际上，非官方教会已经呈现出分化的趋势，比如说存在两种以上的“组织场域”，借用布迪厄的社会学概念“场域”来说。如果说，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之间，因为政治打压，大多数非官方教会都属于一类封闭化的组织场域，是以秘密性、非正式性和去政治化态度为特点的，那么此后的十年，可以说是非官方教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另一种公开化的教会组织场域出现了。本文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种分化趋势。因为关于非官方教会的数据非常少，我们不能直接检验这样的假设。但是，我们可以用定性数据来呈现并分析其中的因果过程。

宗教空间的转变

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建政前后的宗教现象，“公共空间”的概念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概念有时也被称为“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公开、可进入的场所（或虚拟领域），是人们可以自由集会和发表言论的。从定义上看，公共空间与基本的个人自由密切相关。当人们被剥夺这些自由权利时，公共空间就被缩减了。当公共空间被一个敌视宗教的无神论政权侵犯时，宗教组织的形态就会发生巨大变化。纵观历史，中国的“家庭教会现象”并不是特殊的，也曾存在于罗马帝国时的教会，以及当代的古巴和朝鲜。所以，公共空间的自由度与基督教新教教会的公开化密切相关。

在中国历史上，基督教新教也不总是地下化的。上世纪 20 年代，曾有大量传教士活动于中国大陆，教会在植堂、宣教上都很公开。根据一些回忆录描述，民国政府对基督教信仰非常包容，甚至很多官员、商人、军官都是受洗基督徒的身份。1949 年之后，可以进行宗教活动的公共空间，在多次暴力运动和无神论教育推行后被大大缩减，公共空间完全被共产党宣传机器覆盖，甚至在农村也建立起一套宣传和控制机器。所以，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城市和农村社区的自治都是不可能的了，而且所有社会组织都被铲除。在基督教界，50 年代的“三自爱国运动”力图将天主教和新教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多数不参加“三自”的教会领袖，遭到处决或监禁。此时，信徒们开始在家中形成小型、秘密聚会形式。而这样的隐秘化组织，也作为中国基督教信徒的主要信仰方式，从 50 年代一直延续到 90 年代。

到了 90 年代末，市场化和城市化过程，为宗教活动在公共空间重新出现做好了预备。我们在田野研究中发现，一系列城市社会的变化，为新教非官方教会从地下化形式转型到公开化形式，预备了制度条件：引进外资为外籍宣教士借商业身份入华提供了方便，户口制度的放松使人口流动更自由，单位制度的瓦解给居民社区打开更多自由空间，房地产业的发展，非官方媒体的增长（包括互联网和基督教出版业）。随着更多城市非官方教会迁入租赁的商业写字楼中，这些组织的可见度增加，继而带来更广的归信潮。我们从访谈中得知，很多教会都在三四年间经历了从一二十人到上百人聚会的的速度。而新归信的教徒中，很多是城市精英人群。

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的普及对非官方教会发展起到很大作用。虽然政府还会审查网络上传播的信息，但网民开始使用“翻墙软件”。人们从海外网站、个人博客和论坛中越来越频繁地接触到关于基督教信仰的信息、个人生命见证，甚至包括一些公共人物、明星的信仰见证，以及一些非官方教会的聚会时间地点等。此外，基督教出版在几十年的控制之后再次复苏，除去独立的出版公司，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几家独立运营的基督教书店。人们可以在网络书店或基督教书店中找到关于信仰的书籍。一些书籍甚至从国营出版公司发行，甚至畅销。例如，《标杆人生》一书，在中国的销量已经超过三十多万册。

基于以上制度因素，基督教新教信仰在中国社会的可见度越来越强。在 90 年代之前，一个普通中国人不可能从媒体中听到“教会”一词，更谈不上进入一间非官方教会。但是，现在如果一个人对基督教信仰感兴趣，他很容易就可以从网络或朋友中问到如何进入一间非官方教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官方与这一类教会之间的冲突消失了。大多数非官方教会都经历过不能进入其租赁或购买商业空间，所以常常搬家、换地点是它们共同的经历。有时，这样的冲突上升，会引发一些更可见的户外敬拜事件。虽然中国官方媒体对此一字不提，但很多户外敬拜事件得到海外主要媒体的报道，更增加了非官方教会的可见度。

从新制度主义视角看教会的重组

制度环境

现年 65 岁的 Z，是在 1971 年回乡探亲时听到福音的。他的一位教数学的中学老师，与他分享了基督教信仰。因为是基督徒，这位 L 老师在反右运动时被送到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的夹边沟劳改农场，但奇迹般生还回到故乡。在接下来的八年中，Z 没有见到过一本《圣经》或接触任何教会。他依靠“耶稣救我”的祷告，维持着自己微弱的信心。直到 1990 年，他换工作到另外一个城市之后，才进入一个朋友家中的聚会。此时 Z 非常吃惊：“原来这就是‘教会’！”

在 1980 年代之前归信的新教基督徒中，大多类似 Z 的经历，他们许多人的信仰与教会参与过程是断裂式的。在 1986 年《圣经》被允许在大陆出版之前，拥有一本完整的《圣经》是非常困难的，也有政治风险。此外，大多数早期带领教会的领袖，都没有从监禁中获释。这样一来，新增长的新教信徒，好像一出生就被放进一个信仰的试验田中。他们没有接受正规圣经教导，也没有任何宗派性的西方信仰资源。这是中国基督教新教教会呈现一种“无宗派”化形态的原因之一。50 年代教会的带领者们，大多受到救赎主义、复兴主义和灵恩神学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传统家庭教会”的信仰。由于经历“三自”和打压，这一传统中包括一种躲避政治的分离主义思想。至今，虽然城市非官方教会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探讨“政教关系”，但这个话题对老一代而言还是比较忌讳的。同样，90 年代底开始出现，随着海外信仰资源流入，一种神学观点上的分化出现在新教版图上。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趋势也影响了去私人化过程。

本地文化

进行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比较两个城市政治文化因素的不同。

海港市是一个经济发达的沿海大城市，以金融业和制造业占主导。本地市政府鼓励经济文化的多元发展，但在政治管控上也加大力度。强政治管控体现在两点：第一是本地 NGO 的生态衰败，至今市政府不允许有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存在，但扩大了民政部门管理下的民间组织，被谑称为“GNGO”（Government NGO，即“政府管控的非政府组织”）；第二，海港市的居民社区中存在一个贯彻共产党统治的控制体系，就是各级街道居委会，不但作为每一个社区的眼目，也继续执行计划生育及流动人口登记的国家政策。尽管这样，城市社区不会再像 90 年代中期之前的单位制度，将每个人牢固地锁入计划经济的系统中。

在文化上，海港市的人口大多是外地移民构成的，所以社会网络关系更短暂，社会交往中的匿名化现象更突出，信任度比较低。此外，高度商业化的城市生活，让职业人士的生活节奏异常加快，造成人们普遍地对时间有一种效益计算。在田野中，我们还经常听人谈到，“海港人的性格”就是“小资情结重”，但不谈政治。这些都不利于民间结社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1949 年之后，这座城市中出现过两次宗教活动大潮。第一次是 50 年代的“三自”运动，海港市成为很多“传统家庭教会”组织的发源地。这一时期的政治打压，将一种恐惧心理的心理植入很多带领者的感受和观念中。至今，大多数海港市的非官方教会，还处于小型化、秘密化聚会形态，尽管很多已经租赁了商业场所，但聚会并不公开。

内地市是一个经济上欠发达的内陆中型城市，以旅游业为主导。该市的文化特点是“茶馆文化”，虽然人口只有海港市一半，但其茶馆数量超过海港市。这个城市以悠闲散漫的生活方式著称，而茶馆氛围培养出的闲谈、论坛文化，使这个城市的居民普遍喜欢花时间在社交和聊天上。历史上，这座城市曾是内地非法文学出版物的聚集地，特别是在 80 年代。我们曾在本市访问过一位学者 R。他熟悉本地文化，曾评价说：“这座城市的传统一直很自由。在茶馆里，人们把一切都当做谈资，内地市人没有什么权威的概念。”

在 40 年代，内地市曾是海外宣教士进入中国西部的中转站，所以那时市内的大学医院都是宣教士创立的。但是，50 年代当宣教士被驱逐，教会领袖被监禁之后，这里只有极少数信徒在家中形成“传统家庭教会”。和海港市一样，90 年代的新一波宣教士也进入这座城市。不同的是，因为内地市仍只有两座“三自”教堂，而外国人带领的新信徒不能进入“三自”，所以后来形成的家中聚会，很多都是外国宣教士带领出来的团体。他们和 50 年代之前的老信徒团体，并没有太多联系。

在 90 年代末之前，内地市的非官方教会聚会形态和海港市非常相似。但是，2008 年发生在中国西南部的大地震，为内地市非官方教会的重组预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因为，内地市是进入西南部灾区的要道，很多国内外志愿者聚集在这里，非官方教会也纷纷组织起来加入救灾。这一危机时刻反而成了政府放松对非官方教会活动控制的契机。民间救灾活动中的调度，基本上都是由内地市的非官方教会完成的。所以，灾后根据很多机构需要长期驻扎西南部的需要，本市政府进一步放宽了对民间组织独立合法注册的控制，很多 NGO 机构（甚至包括基督徒建立的机构）都获得独立合法存在的地位。地震拓展了市政府对各种宗教活动的宽容度。我们进入田野的时间，恰好是地震后一年，所以在很多访谈中都听到对这一

过程的叙述。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促进因素是，内地市宗教局从 2005 年开始的新任官员，是一个思想很自由的人，比较提倡宗教多元化发展。这也是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的。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内地市几乎所有非官方教会都是公开聚会。他们更倾向于称自己为“城市教会”，而非“家庭教会”。因为，后者的意义，除了与“三自”对抗之外，一般指的是封闭化的状态。

宗教场域的转变

杨凤岗的三色市场理论简练地总结了后共产时期的中国宗教版图的复杂性。但是，这一描述中缺乏对宗教组织的分化和转型的分析，也就是说，即便在灰色市场中，也已经出现了场域的分化。我们区分了中国社会基督教新教非官方教会中的两类宗教场域，即隔离的场域和融合的场域。在隔离的宗教场域中，非官方教会的组织界限是封闭式的，也就是说，陌生人很难找到并进入这类教会。因为隐蔽性，这类组织的规则也是非正式的，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形成任何可以传阅的文本规则和正式制度，否则会增加政治风险。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此类教会都避免为自己取名，而是以最初开始聚会的街道名为代号，如“平阳路教会”或“三盘路教会”。这类组织更强调调年长者或信仰时间长的信徒会的老资格、组织内部身份认同，以及个人魅力型领袖的重要性。同时，这一场域中许多同辈组织之间不存在太多联络，原因也是为了避免政治风险。这些描述的就是所谓“传统的家庭教会”。他们所感受到的政治风险总是很高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继承了过去受逼迫的记忆。新加入的成员必须有高信任度的引介，有时甚至需要被面试几次，然后先被接纳进入一个十人左右的家庭小组，在稳定参与小组“三个月之后”，新成员才有权利进入大组的主日聚会。这样一种三个月小组审查制度，是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当我们询问这一规则的目的时，很多带领者用另外一种逻辑来解释：这规则是为了帮助新加入的人适应并融入人数比较少的群体，以便建立紧密团契关系。如果一开始就让他们进入主日聚会，人太多了，他们会不知所措；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防范异端的潜伏，三个月可以帮助小组带领者了解新成员的信仰背景，才不至于让可能渗透进来的异端影响更多人。

从神学观点或宗派背景上来看，这些组织倾向于模糊地将自己归入“传统家庭教会”的大类。如前所述，“传统家庭教会”的立场是 50 年代针对“三自”的；在 50 年代之前，很大程度上受到敬虔派神学的影响。但一般来说，此类组织的历史和信仰内容，很难被细致地描述出来。因为，他们主要依赖高信任度网络关系来扩展新成员，在社会经济地位上，一个团体内部的成员分层同质性很强。例如，本地居民为主的教会中，很难看到外地人或民工。有的教会，大多数人都是白领阶层，在职业和受教育水平上都高度同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如果一个封闭教会的成员因不认同其教导，要转会到另外一个封闭教会，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这个过程不但没有任何可遵循的文本规则可行，而且，带领者彼此之间因为互相认识但为了不造成个人嫌隙，都不会接受彼此离开转会的人。带领者会把转会者视为缺乏对教会的委身，而不是教会自身的问题。有人要转会，对于带领者而言，是很丢面子的事，所以更要强调是转会者自己出了问题。这些彼此独立行事的教会内部之间，并没有任何起协调作用的区会权威，所以除了形式化的牧者委员会之外，极少有实质上的彼此监督。

非官方教会中还有一类内嵌在“融合式”宗教场域中的组织，指的是教会的界限是公开

的，信徒之间和与外部社区都保持互动，转会只是一种程序上的操作，而不会让同辈教会的带领者们感到尴尬。这类教会所强调的是专业化、正式规则和开放度。我们在田野中发现，他们都有明确的信仰告白和会员制度。他们与社区有公开的接触，甚至包括与警察和官方的公开互动。聚会时间、地点、治理结构和联系人信息都是对外公开的。这些特点体现了一种正式化、公开化的状态。每一个教会都有其可识别的标志，一张独特的“脸”。这类教会普遍都有自己印刷的章程、历史简介和主日程序单，以便新朋友或访客来认识他们。

创新抑或路径依赖

虽然同是非官方教会，为什么一些教会组织趋向公开化，而另外一些组织继续呈现路径依赖的形态？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样的分化？要承认的是，神学观念的确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塑造信仰的实质，而且为组织分化提供理论根据。但是，我们越来越能认识到，起到更重要作用的是文化信念：人们共享的一些思想、认知，可以指导他们的社会行为。一般来说，文化信念是在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包括人们对社会界限的认知和熟悉，甚至连神学观念也需要文化信念作为土壤来传达。是文化信念塑造了社会规范，进而促进创新者的行为以及组织的演化，这被新制度主义学者称为制度的“内生性制度变化”(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社会运动学者也认同，在集体行动实现之前，必须发生一种“意识形态的改变”(ideological shift)。不论是处于隔离式宗教场域中的封闭化教会，还是处于融合式场域中的公开化教会，他们都面临制度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即中国政府的宗教管制政策。

在这个意义上，教会带领者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在田野研究中发现，封闭化教会中的带领者普遍认为，政府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管制现状，有利于教会人数增长。他们也认为，“传统家庭教会”小型规模、高信任度网络和无宗派等特点，都是值得赞许的优点。对他们而言，教会和政府的关系是以冲突为主导的。这些教会更强调个人灵性建造，过于强调公共责任。过多关心政治的基督徒，在它们看来是不适宜的。这些观念描述了此类教会的文化信念，所以其中很难出现与政府或宗教管理者协商界限的行为。在它们看来，政府对基督教的敌意，还是停留在几十年前的状态。

相比之下，公开化的教会因为一直与社区、其他民间机构和政府宗教管理者保持互动，一种公共参与的风气已经形成。这些教会的带领者，也积极传播一种整全的基督教政治观念。我们从参与式观察中了解到，带领者会通过讲道或教导场合，鼓励会众多关注本地的公共事件和需要。内地市C教会曾在六一儿童节发起一次“不堕胎宣传”，在各大医院门口发放关于生命神圣性的宣传单。此教会牧师还多次与街区管理者洽谈，主动提出可以为社区中的家庭纷争提供咨询服务。这些积极的公共事工，大大增加了非官方教会的社区可见度，随着时间流逝，也让周围居民和宗教管理者淡化此前对基督教群体的怀疑和敌意。由于他们的主日聚会从一开始就是对任何人开放的，其成员构成也渐渐向各个阶层扩展。■

编者注：本文为《宗教场域与文化信念——基督教在中国的演变》的上篇

互联网观察

重估微博的价值

作者：宋宇

尽管商业前景尚属明朗，但微博仍然受到微信越来越大的压力。依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例行报告，微博用户人数在去年年底较前年同期有约 9% 的下降。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给能够占据大量碎片时间的微信带来了实在的发展机会。年初发布的这份 CNNIC 报告还提到，“减少使用微博的人中，37.4% 的转移到了微信”。尽管微博同样可以适应移动互联网，但难以与植根于移动端的微信等量齐观。无怪乎，微博账号为 @摘星手 010 的祝华新会认为，“微信正取代微博，成为网络舆论最为集中的平台”。

作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的判断和态度不免与其官媒背景相关。消息传播或者说舆情，从大广场回到小圈子，自然要着手调整因应策略。而本文则试图比较这两种存在竞争关系的产品，进而重估微博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价值。

除去最基本的即时沟通功能，以及“摇一摇”“漂流瓶”之类的陌生人交友功能，微信主要分为朋友圈、群组和公共账号等部分。有趣的是，它们分别可以与微博的某一部分对应，而三者依靠的关系强弱程度依次递减。朋友圈可以做到随时随地分享、互动，几乎是复制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再基于互联网的逻辑加以呈现。在另外一端，公共账号为传统媒体及优秀的自媒体提供了深耕内容的空间，微信用户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关注并分享内容。公共账号仍以目标读者明确的精良内容为基础，可以视为网络媒体的延伸，并可供用户转发至朋友圈。值得注意的是，单一账号每天推送一次的规则（一些较早开通的公共账号，可以每天推送两次），在可能保证内容质量的同时，制约了消息获取和传播的速度。基于强关系的朋友圈和群组虽然可以弥补这一点，但其不可避免的封闭性仍为消息传播制造了壁垒。

在突发社会事件的传播中，朋友圈的封闭性以及公共账号的滞后性更为明显。这令一些希望接收更多资讯的用户“重返”微博，为受管制、信息过载与意见极化所困扰的微博带来希望。在中国当代社会的语境中，这种希望可能更加饶有意味。

突发社会事件：昆明“3.01”事件

3月1日晚间发生于昆明的砍杀事件，可以视为微博媒体属性的一个新近例证。砍杀发生后较短时间，央视新闻频道曾有简单播报。云南当地电视台提供了更加具体的报道，但无疑传播效果有限。

同样，尽管内容单薄，门户网站都在较短时间内推出相关专题。但是，这些内容很快被撤下首页。2日1时，在新浪、网易等五家门户网站首页要闻区，均未见任何相关新闻。在新闻频道较不明显的位置，新浪网发布了新华社英文部几分钟前的简要报道。报道标题为“昆明火车站砍杀事件已致27人遇难109人受伤”，基本与正文内容相当。这种沉默，与新闻规律甚至网站的商业利益相抵触，但符合中国大陆一贯的新闻/宣传逻辑。在互联网上，也有“严格采用新华社通稿”等中宣部训令流传。

观察微博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则有助于重估其作为社会性媒体的价值。

就3月4日下午可以看到的微博看，《东方早报》认证官微自1日晚间23:09开始发布昆明火车站“3.01”暴力袭击的消息，至2日凌晨1:31共发布15条消息。其中，自发布于23:13的第二条微博开始，已经有该报记者自现场发布的消息。除第一条综合消息和三条无意义的转发之外，其余微博均为记者在昆明发出的第一手消息，受访者包括伤者、目击者、医院工作人员及警方人员。

虽然在较晚的新华社稿件中，“3.01”事件的发生时间提前为“21时许”，而《东方早报》据称曾发布大树营发生袭击的消息（后被证实为讹传，相关内容目前已不得见），但其确实在第一时间提供了事件的一部分细节。因为时为深夜，转发与评论的数量并不很大，但是能够最大程度保留网民的即时反映。在网评员体制化存在的情况下，网络论坛在观察舆情方面的价值已经相当低微，虽然会有删除、屏蔽等干预手段，个人化和即时性强的微博可以提供信度较高的样本。同时，在热搜榜、相关推荐及微博标签等功能的帮助下，微博用户可能迅速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资讯。有消息称，截至2日凌晨0点，“昆明火车站”以16万的搜索次数高居新浪微博热搜榜首；到凌晨1点，新浪微博有关此事的实时微博更新突破300万条。媒体官微，既是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延伸，也能视为参与贡献即时消息的众多“去中心化”后的个体用户的一员。

另一方面，过分依赖于微信的网民，获得消息的速度、广度，甚至真实性，都弱于更倾向于使用微博的网民。在极端情况下，朋友圈、群组和公共账号的相对分隔，很大程度上迟滞了消息传播。当然，微信用户可以在稍晚或转天清晨获知昆明事件的官方定性、大致经过，甚至非官方的“小道消息”。就病毒般传播的“小道消息”来说，微博的转发功能，实际上强制标明了信息来源，有利于追溯和判断；而微信朋友圈的用户，则往往不习惯标明消息出处，加上封闭性降低消息的自净可能，往往更有利于错讹信息的传播，形成误导。而且，即便是微信朋友圈，突发事件的消息源头也往往来自微博。如果来自微博的错讹信息进入朋友圈，在不同功能环境中，其误导程度可能更高。

因为当前形态更接近传统媒体，而且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自媒体，微信的内容受监管的力度更大。在朋友圈分享的公共账号内容，内容敏感的，有可能出现“此内容被多人举报，无法进行查看”的情况。相对于新浪微博“小秘书”式的内容管控制度，及社区管理委员会式的纸面自治尝试，微信的内容管理者与政府监管部门的互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在中国大陆的现实舆论环境中，尤其是互联网方面，在政出多门的监管方看来，整齐划一自然是最理想的状态。即时却相当开放的微博，或有可能通过种种“无心之失”来撬开铁板的一角。

固然，有许多人坚持认为，至少在事件初期的消息控制（或“适当”控制）有利于侦破

案件、避免恐慌等。但是，联系波士顿爆炸案后当地警方应用 Twitter 与市民沟通，诸如辟谣、避险提示与通缉等，能够反思信息公开对处理类似事件的帮助作用。

可以说，微信的问题之一，在于缺乏公开互动，使有建设性的讨论更难出现。这与其功能设置有关，也可能反映了微信团队对产品定位与商业前途的考量。作为一种获得巨大成功的互联网产品，微信与开放性和消息自由流动理想拉开距离，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缺憾。

开放的互联网

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世界中，商业门户网站尚不具备新闻采编权，虽然财力雄厚，但只能采用转载及新闻专题等方式曲线突破，并招揽传统媒体的从业者参加互联网新闻的生产。独立的或依附于（未必可靠的商业化的）微博、微信等平台的（以微博“大V”为代表）自媒体人，视野总体上较为有限。虽然一些传统媒体已经有新媒体的意识并积极转型，也有专业性较高的独立网站如“政见”“参差计划”出现，但与美国网络媒体《赫芬顿邮报》和 Propublica 已经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肯定相比，仍然差距很大。上述两家媒体，前者为新闻博客网站，而后者为专注调查性报道的非营利性网媒，证明互联网新闻的业态可以充分多元化。在此情况下，从业者总在以中国媒体生态与美国同业的时间差，来警醒转型之迫切。当然，美国媒体尚不足以完成政府“第四分支”的伟业，中国的路则更长。

具体到微博，作为具有媒体属性的互联网产品，在商业与监管的双重压力下，其前景太过模糊，又有内容芜杂的痼疾。但是，如上文回溯，面对突发社会事件，它又具有不可复制的快捷与直观，从深挖内容到实时报道，都能为媒体提供切实帮助。不过，《东方早报》的实时播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可复制性，值得进一步观察。

日常的内容审查、删除，以及 2013 年下半年对薛蛮子式微博“大V”的整肃，无疑伤害了微博的价值，并直接造成微博的整体萧条。但是，这也意外地部分遏止了中文互联网世界惯有的，对政治话题的极度偏好。一些由团队运作的“大V”，充当意见领袖，却无法维持理性、专业的水准。他们的式微，可能意外地造成了言论空间的明晰。与中国大陆政治无关或相关性较弱的议题，有可能在微博上得到更为专业化的讨论。比如乌克兰问题，以及外媒对中国报道客观性的质疑。这可能是威权治理手段的一个讽刺性后果。

微博以及微信，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去中心”的特征，都是更加个体化的的所谓 web2.0 时代的产物。如前文所述，微信虽然强调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分享与交流，但仍存在难以克服的消息壁垒。在一个封闭环境中，讨论可能更加“小圈子”化，这种情况并不比大量的谩骂更优越，与强调开放的互联网理想相差更远。在封闭的网络环境中，可能出现类似于“牛津共识”的有趣产物，却没法使普通网民在公共空间中得到接受、鉴别消息的锻炼，并在剔除噪音的过程中求取进步——无论这种进步的形式有多么奇怪。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之间的联系因互动、交流而加强，能够体现互联网的价值。

从博客（blog）到微博（microblog），再到微信，技术进步无不在改变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方式甚至社会心理，同时也在消解互联网中充斥孤独个体的迷思。互联网究竟给人类带来什么，是太大的问题。在 web2.0 时代之前——那时更不可能验证社交网络对民主社运

的推动作用，法学学者桑斯坦（Cass Sunstein）就认定互联网是“民主的同盟者”，而民主的要件之一就是“能接触到一些未预期的、实现不经过选择的多元的话题和想法”。探索未知的新奇感，是微博、微信的用户粘性的来源之一，同样也是众多互联网产品的特质。对 web2.0 时代的观察与讨论，将是一个有延续性的长久话题。■

边疆篇

新疆观察

新疆“跨越式发展”的生态陷阱 ——以和田地区为例

作者：李永峰、热依莱

不久之前的3月1日，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了针对平民的无差别恐怖袭击。五名持刀者，在短短25分钟内，砍死29人，砍伤100余人。这件事，以及最近一年来所发生的众多恐怖主义事件，都在证明，过去五年，中国的治疆新政并没有化解新疆的矛盾。从2009年开始，因为“七五事件”的惨烈结果，中国大幅调整新疆政策。一方面，撤换了雄踞新疆近20年的王乐泉；另一方面，仿效四川地震之后的模式，在2010年3月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举全国之力建设新疆”的对口援疆方案。如果用结果倒推，只能说，无论新旧，中国的治理模式都有很大问题，因为局势在急剧恶化。或许，中国政府的思维走进了某种陷阱。

昆明事件并非本文的主题，如果要关注这一事件，有两个因素不得不考虑。第一，新疆宗教保守主义在扩张，来自境外的教派，以瓦哈比和伊扎布特最为典型，他们已经从小众范围内的传播，转变成可以左右社会风气和人民生活习性的庞大势力；第二，南疆青少年失业人口激增。正如“茉莉花革命”前的北非国家突尼斯和埃及一样，虽然GDP确实在增长，但庞大的新增就业人口却无法从中获得任何收益。造成昆明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经济因素依然非常关键。这一点，在不断重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中国社会内部，应该很少有人质疑。只不过，尝试去解决经济矛盾的不同思路，却可能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

当前推动新疆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是源于2010年新疆工作会议的“对口援疆”。那次会议提出了两大历史任务，即“新疆跨越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19个省市分别结对援助新疆12个地（州）市的82个县（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2个师”。以南疆的和田地区为例，北京市对口援助地区内的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洛浦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十四师团场，天津市对口援助地区内的民丰、策勒和于田三个县，剩下的皮山县则由安徽省对口援助。

之所以选择对口援助模式，是因为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的震区重建过程中，短时间内，政府看到了这种迅速集结力量进行援助所产生的良好效果，所以期待也在新疆复制四川的模式。但是，现在看来，新疆有其特殊性。对口援助固然催生了不少大型工程，让部分人满意，但并没有缓解新疆的民族矛盾，也没有发挥预期中的政治作用。新疆不同于四川，其原因何在？

在新疆最南边的和田，宗教氛围浓厚，经济条件恶劣。如果以和田地区为例，检视对口援疆政策，我们可以看到，新疆除了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与四川等内地省份截然不同，在生态环境上同样具有特殊性。在和田这类的绿洲地区，复制东部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不仅无法收获预期中的政治与经济效果，反而会引爆更大的问题。在新疆鼓吹“跨越式发展”，很有可能堕入生态陷阱。

和田位于青藏高原的西北边上，南枕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北部深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总面积 24.78 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 33.3%，沙漠戈壁占 63%，绿洲仅占 3.7%。而且，绿洲被沙漠和戈壁分割成大小不等的 300 多块。人类的活动，主要就在这 300 多块绿洲上进行。对和田人民生活影响最大的是和田河。该河依靠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的积雪消融而形成，每年都会受季节影响。因为绿洲都是相对孤立的小区域，所以在绿洲之上所发展出来的经济，也具有分散性和封闭型。不同绿洲之间，间隔几十乃至几百公里，中间横亘着戈壁或者沙漠。

因为水源和绿洲稀缺，所以在考虑和田经济发展时，特别要关注一个政策顾问或者大众媒体并不太重视的概念，就是资源承载力。按照中国学者黄宁生等人的定义，资源承载力“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该空间内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在新疆的历史上，曾有众多小城市，最后遭遇了灭亡的命运，比较著名的如楼兰国和精绝国。他们的灭亡或许也有政治等因素，但从繁华之所变成彻底被人遗忘的废墟，更重要的在于其资源不足以再支撑人类的生存。而在新疆最近数千年来的历史上，纯粹自然因素促成的地质变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楼兰、精绝等地资源承载力所遭到的破坏，显然只能是人为。

所以，如果说在中国的东部地区，资源承载力只算是一个或可参考的因素，那么在新疆，资源承载力的变化，则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影响。在和田地区，无论农业还是工业发展，都受到很大限制。戈壁沙漠是天然屏障，增加了不同绿洲之间交易的成本。因此，来自北京、天津和安徽的对口援助，只能在技术层面解决一些小问题，比如帮忙建蔬菜大棚、卫生室等，而无力建设可以提供就业岗位的工业体系。另外，根据官方统计，最近几年维吾尔人口普遍增长，本身已经产生人口与耕地的冲突。而内地移民的涌入，使这一矛盾更加突出。又由于，维吾尔人本身就业能力的限制，使当地人从长远来看根本无法与外来移民竞争。这一因素，又大大加剧了民族之间的隔阂。

本文作者之一，小时候曾在和田生活：“努力回想多年前我家前后的景象，几乎都是可以耕种的田地。我们和其他邻居一样，会种一些蔬菜，有些人也会计划建自己家的果园。……那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楼房最高也是到四层高。那是当地政府楼，最顶层有时候会给从其他地区来支援和田的年轻人做宿舍。当时，回忆都是一片绿意。直到 90 年代末，很多内地建设队开始到处建立基地，给当地居民建房。我渐渐察觉到，我家后面的整个绿地，已经悄然出现很多新的住房，那片绿地已经荡然无存。”“当然，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是这些绿地需要被房屋取代的原因之一。但是，很多依靠农业为生的农民，会被渐渐驱逐到更加偏远的（地方）种地，又因为那些偏远的土地需要更多的水，使他们面临还未收获就已经负债累累的局面。也是在这一段时间，我非常明显地觉察到，和田恶劣的风沙天气，比以往更加频繁。”

也有些维吾尔族学者担忧，“维吾尔族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南疆农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脆弱、狭窄的生存空间拥挤着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不但脱贫无望，同时也构成了滋生违法及犯罪行为，蓄积冲击社会秩序的巨大能量的温床。这种恶性循环长期持续下去，甚至会造成南疆脆弱绿洲生态圈的崩溃。”而当前对口支援新疆的过程中，也有大量资源投入到基建之中。这可能陷入了某种死循环，为了追求“跨越式发展”，而增加大量类似东部基建一类的投资，超过了资源承载力，导致生态失衡，进一步加大了维吾尔底层人口的困境，扩大了民族冲突，引发广泛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新疆“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的生态陷阱。

化解新疆矛盾，必须要充分考虑新疆的地理特殊性，不能迷信东部经济发展的模式，动辄期待“跨越式发展”。在目前已经受损的生态面前，新疆的出路，或许还在于依靠内地经济，吸引维吾尔底层向内地移民。但是，这首先需要政府给予所有民众以平等待遇，同时也需要广大的汉族群众，能够尊重与宽容对待不同民族和宗教背景的同胞。否则，新疆局势，可能会更深地陷入某种陷阱。■

本土/国际篇

柬埔寨的美元化及其他

作者：萧敢

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柬埔寨的美元化（dollarization），这是任何游客到柬埔寨一眼就能发现的问题。如果不是在柬埔寨住上几个月，根本就不需要兑换本币。发展中国家同时流通本币和外币是很普遍的情形，但除了遭遇恶性通货膨胀（比如津巴布韦）以外，很少有基本废除本币，完全依赖外币的情形。柬埔寨实在是一个特例。

在过去，亚洲有很多国家都曾有美元化倾向，比如老挝、越南和蒙古。但是，从数据来看，随着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美元化的趋势逐渐往正常方向回归，即美元所占比例不断降低，至少稳定在一个水平上，本币变得更重要。而柬埔寨随着这十余年的经济发展，美元化的趋势反而进一步得到加强。

柬埔寨的一切都在用美元计算，在街头叫个嘟嘟车（tuk-tuk），在街边做个按摩，在摊位上买个点心，这些基本服务一般都美元计算。甚至在超市买东西，唯一的标价也是美元。只有店家在面对小于一美元的找零时，这才按照 1:4000 瑞尔的恒定汇率找给本币。本币仅仅起到辅币的作用。一般的游客如果不多跑跑，恐怕连本币的样子都看不见。

柬埔寨的美元化，并非一天两天的事。瑞尔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发行。70 年代红色高棉时期，整个柬埔寨的货币被废除，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时代。随着越南进入，柬埔寨秩序重建，经济就逐步开始美元化。虽然，后来瑞尔被恢复使用，但美元化程度已经很高。随着柬埔寨政治经济逐步稳定，美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速，在经济中的作用已经远远压倒瑞尔。

对于这种现象存在两种解释。第一种是经典的“货币替代”理论。该理论认为国民使用哪种货币，完全取决于对它未来发展的看法。除非因为通货膨胀对一国的货币完全失去信心，认为本国政府完全没有能力控制货币，否则不可能大规模转向外币交易。

但是在货币替代、货币制度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时滞。这里有一系列凯恩斯经济学热衷于讨论的问题，比如菜单成本、投资刚性等等。因为这些摩擦阻力，使得柬埔寨去美元化的努力没有起色。但是，这种理论似乎很难解释柬埔寨美元化程度不断升高的趋势。

而另一种解释似乎更有力。柬埔寨现在面临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城市经济以美元为基础，农村经济以本币瑞尔为基础，城乡差距非常显著。从结构来看，柬埔寨的农业产值大约只有 GDP 的一成，以旅游业为代表的服务业有两成多，以服装业为主的工业则有六成多。农村只有农业，且规模可怜；城市则主要是服务业和工业。不管是出口导向的服装加工业，还是吸引国际游客，或是接受国际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这些经济活动都以美元为结算单位。

即使考察金边等核心城市的房地产,可以发现,它的房地产有相当比例都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柬埔寨政府想推行瑞尔,去美元化,几乎也不可能。

从这个问题上,就可以看出柬埔寨的一些经济特点。第一,高度依赖于外国经济;第二,极弱和缺乏追求的政府;第三,经济活动被高度垄断,社会严重不公。

不妨举几个例子进一步说明柬埔寨人民的生活特征。柬埔寨至今没有公交车。今年刚开始开辟两条线路试运营,但试运营结束后又停止了。首都金边有 200 余万人口,有 100 多万辆正式注册的摩托车,还有数十万辆汽车。每天上下班的时候,糟糕的道路上挤着如此数量的摩托车,使得金边成为交通最拥堵的城市之一。不仅是金边,亚洲许多城市如曼谷、雅加达也面临类似情况。但金边政府最弱,既无动力加强道路建设,也没有动力提供公共交通,放任自流。

又比如,柬埔寨的基础设施很落后,城市里的停电是家常便饭,相当大比例的农民甚至还没有机会接触到电。柬埔寨政府似乎并没有提高电力建设的计划,所以稍有能力店家、个人都自备发电机,这几乎成为中高级旅馆、饭店的标配。每逢夏季用电高峰,金边、暹粒等大城市必然停电,这些自备发电机就发挥出重要作用。这种现象,在印度和很多政府失灵的地区也能见到。

每年雨季,柬埔寨等受季风影响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因水淹而遭受巨大损失,本来尘土飞扬的道路顿时变成泥沼。金边的地下落水管道非常落后,完全不能与暴雨匹配,导致整个城市被淹,几乎家家进水。农村地区则一般都建高脚屋,反倒不一定受灾。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多年,但政府也无意动手加以解决。东南亚国家里,似乎只有新加坡通过大量建设排水管道,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新加坡的面积足够小,新加坡的政府也足够强。

政府能力薄弱的地方,地下经济活动或非正式制度往往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很多柬埔寨人都提到,洪森是个“很公平”的人。所谓“公平”,并非指他施政民主,而是指他“收钱办事”。对于商人而言,这比印度的“收钱不办事”可好多了。柬埔寨历来是东南亚的犯罪天堂,大量的枪支、毒品都经过此地,很多国际通缉犯也流落此地,洗钱、雏妓现象都极为严重。经过这些年的整顿,表面上犯罪率有所下降,这些犯罪活动不再那么明显可见。但略深入地探究即可知,这些现象依然存在,许多富商都“非正常死亡”。柬埔寨依然是“有钱可以买到一切”的地方,买到公务员职位,买到贵族头衔,也可以买到人命。华商都说,在柬埔寨做生意的首要原则是“和气生财”,千万不要得罪人。

柬埔寨民众的主流心态则是仇越崇华。他们与越南有世仇,从心理上看,也许还在以为自己应是湄公河三角洲的拥有者。虽然,越南是柬埔寨摆脱红色高棉的主要力量,但越南人在柬埔寨逗留了十余年才很不情愿地撤军,并且遗留下一大堆社会问题。目前,我们通过书本对红色高棉的了解,乃至在金边参观的大屠杀遗址,绝大多数都为越南人用于攻击红色高棉所设计。洪森政府似乎对重新叙述和认识这段历史并无兴趣,简单沿袭了越南人留下的东西。虽然,我们并不能据此否定大屠杀,但目前认识红色高棉的主流材料肯定有所偏差。尤其柬埔寨在红色高棉之前的宗族结构、社会网络遭受的破坏,也许比我们的设想要小很多。

这些宗族结构、社会网络的核心是华人。华人在柬埔寨一直拥有很高的地位,上百年历

史，也真没怎么经历过排华。十年前，柬埔寨最大的投资来源是台湾。台湾竹联帮的精神领袖陈启礼，就长期居住在金边，在当地华人圈影响巨大，他的家甚至成为旅游景点。陈启礼在 2007 年去世。近年来，中国大陆开始取代台湾，成为柬埔寨最重要的投资来源。中国国企的投资数量惊人，投的多是大型工程。他们与原有的华人网络紧密联系，一起发财，还开办孔子学院进行文化扩张。现在，大多数柬埔寨人都在为华人打工，不是为中国国企盖房子，就是为中国民企做衣服。所以，他们不但不排华，反而有崇华倾向，而洪森的妻子也是海南人。

从社会层面看，柬埔寨有大量社会问题。比如，柬埔寨历经战乱，变成一个显著女多男少的国家。传统以来，柬埔寨就是个男尊女卑的国家，一夫多妻，直到 90 年代的法律才规定一夫一妻。柬埔寨女性的地位十分低下，雏妓问题更是屡禁不止。色情业在泰国面临打压后，逐步转向柬埔寨，所以未来该国的艾滋病形势十分严峻。

经历战乱后，柬埔寨青年人的比例也显著偏高。毕竟是东南亚国家，柬埔寨的识字率上升得很快，已经超过了印度。柬埔寨的教育没有多少门槛，所以全国一下子涌现出数以百计的大学。可是，这些大学的教育水平很成问题，学生毕业之后也找不到工作。如此庞大的失业青年群体，也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些社会问题，在现有经济结构里都不可能解决。

总的来说，柬埔寨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国家。虽然，糟糕的基础设施和城乡二元结构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阻力，但它灵活的经济模式和巨大的地下经济使它可以保持很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只要周边经济体不要产生巨大经济波动，它就能保持现有增长幅度。但是，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仍然让人感到忧虑。现在的国王西哈莫尼据称是同性恋，不会有子嗣。柬埔寨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洪森手中，他也正在努力培养两个儿子成为新一代的政治领袖。王权在未来会怎样传递，与周边国家会保持怎样的关系，这一切都有可能左右柬埔寨的发展方向。

（作者感谢陈世伦博士提供的大量材料）■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2014·夏至

观澜学社·观察报告·第五期

前言

这是“观澜学社”第五份《观察报告》。

“观澜学社”是一个自发、独立、非商业的网络社群。我们关注当代中国历史的展开，试图对几项可能会影响中国命运的因素进行观察，进而分析和评估其未来走向；我们无意于介入学院的争论，更无意于鼓动任何政治势力；我们追求中国社会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建构“重叠的共识”。我们的名称来自《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我们计划每两个月公开发布一份《观察报告》，上一期《观察报告》的编号是“2014年·惊蛰”，以后也将逐次按照中国农历的节气编号。观察必然伴随着命名，但是我们会警惕各种大而化之的命名所孕育的风险；观察必然隐含着诠释，但是我们会谨慎地给诠释设定边界。

本报告所有文章均可根据“署名完整—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原则在互联网上传播，商业使用务必征求原作者同意。 ■

目录

法政篇

中共高层观察

- 李靖云：利维坦时代之后的国家建设（提纲） 5
王明远：论意识形态的去神学化 7

经济篇

资本观察

- 楼晟：政治挂帅与灌水大赛
——2014年Q3资本观察 13

阶级篇

工人观察

- 巩高兴：打工者的前途 15
周安安：企业管控中的传统主义因素（提纲）
——以长三角两家企业为例 17

社会组织与互联网篇

非官方教会观察

- 李晋、马丽：宗教场域，文化信念（下） 19
——基督教在中国的演变

边疆篇

西藏观察

李永峰：治藏机构中藏族干部的角色观察 27

本土/国际篇

萧敢：印度的大坝 31

法政篇

中共高层观察

利维坦时代之后的国家建设（提纲）

作者：李靖云

一：

没有皇帝也没有议会的权力合法转移，权力转移的俾斯麦难题

毛泽东的权力移交的失败，超级权力转移的失败，邓小平—陈云的强弱配权力结构形成
邓小平—陈云权力体系对俾斯麦难题的克服，一次权力交接的失败
邓小平—陈云权力体系二次交接，隔代交接以及隐退的苏拉保护
江泽民—胡锦涛交接办法之后的宪法习惯压力
习近平权力转移后的疑问

二：

天朝崩溃之后的麻烦，从国家到党，再从党到国家的轮回，天朝体系—降落凡间的国家
一党的政治建构—国家再次出场，党与国家之间的轮回平衡

党与国之间的痛苦

- A、把党找回来之后，国家去何处？——中央政治的麻烦
- B、嵌入式治理的地方政治难题？——地方政治难题
- C、边疆与民族的党国身份焦虑，王朝还是中原？

三：

意识形态的战争，不能退后一步并不能前进一步
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习近平的“who are we”？
宣传部主义的出现

四：

中国道路的辩论的实与虚——意识形态的虚与能力增强的实

方法论的中央突围和地方突破

- A、中央的内阁再造，和事实总统制和行为主义责任内阁
- B、行为主义联邦制度的地方经略手段

去碎片化的难易

- A、权力集中的容易，分散化的集中
- B、制度集中难，约束制度和发展方法的难

五：

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中国：传统专制主义和现代规制的不同

- A、传统的专制主义的治理技术分析：1、技巧和技术的差异，2、技能的传递和治理的私人化，3、特殊化处理取向
- B、现代规制的治理要求：1、治理技术的标准化，2、治理技能的公共化和继承性、学习性，3、普遍化处理取向 ■

中共高层观察

论意识形态的去神学化

作者：王明远

提要：是否允许质疑是科学与神学的根本区别。中国的意识形态虽标榜为科学理论体系，但还保留浓厚的神学性，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理论被当做不可置疑的，唯一正确的真理，政治决策群体对按照意识形态设计的制度不敢动，对意识形态以外的先进制度和理论不敢接受。甚至，近几年意识形态神学化还有回潮趋势，导致中国的深层次经济制度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都无法推进。我们应对意识形态进行神学祛魅，允许质疑，不把意识形态凌驾于各种理论、学说之上，回归马克思主义科学本面目，这是深化改革的思想前提，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解放。

中国“增量部分改革”和技术层面上的变通已经走到尽头，制度层面改革却久推不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制度层面现代化的瓶颈。改革无法在制度上有所突破，原因有多方面的，比如人们常说的利益集团的阻挠，共识不足等，但是意识形态定论的束缚是更根本的。

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的国家，意识形态对国家的影响是根本的。国家机器和国家基本制度都是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设计的，任何制度、政策的变动，都需要先在意识形态上需找合法性，先做意识形态的文章。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要求意识形态的改革。

由于意识形态定论的作祟，导致政治决策群体和社会大众对按照意识形态设计的制度不敢动，对意识形态以外的先进制度和理论不敢接受。比如，从马克思、列宁到邓小平都没讲过“公民社会”，所以我们不能建设“公民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都强调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以我们要不惜代价坚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革命领袖说过“反对绝对的自由”，所以我们就应该限制言论；革命导师们反复强调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所以我们要拒绝监督，拒绝选举，拒绝分权制衡……对意识形态的迷信，导致国家陷于对制度变革的质疑和恐惧当中。

从历史看，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欧洲的崛起，文艺复兴为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 80 年代思想解放，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西欧文艺复兴和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的实质都是把意识形态从各种观念教条中解放出来，打破各种约定俗成的禁忌。只不过七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只解放了一小半。要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还需来一场彻底的意识形态解放。

中国意识形态的神学性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它同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进

步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一样都是众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学说。但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断章取义和异化，并使之道德化、制度化、绝对化，使得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浓厚的现代神学色彩和宗教性。

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来源于苏联，以及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指令式干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免把斯大林式的意识形态神学作为社会主义的“正统”。毛泽东等人出于种种需要，进一步把意识形态神学化，甚至连“早请示、晚汇报”“表忠心”之类的政治宗教式仪式都具备了。改革开放后，我们虽然对毛泽东思想的弊端和错误做过反思，但是，这反思是很有局限的，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意识形态的神学逻辑，致使当今我国的意识形态还保留浓厚的神学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意识形态是不可质疑的，这是神学性的最重要表现。神学与科学的区别是，神学是只能信服、遵守，不可质疑的，而科学则崇尚价值中立、论证、逻辑思辨、怀疑和试验。虽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包装成为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呈现出一种与时俱进、包容的表象，但是它从根本上否定其他学说的质疑和挑战，任何的理论争议往往都被视为“思想误区”，与欧洲中世纪教廷严禁“异端学说”是一回事。

第二，任何神学都会宣称自己是关于世界的唯一真理，是理想社会制度的美好蓝图，国家意识形态也有这个特点。比如，我们常常看到的“只有 xx 才符合国情”“只有 xx 才能发展中国”“xx 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等意识形态论述，这就从理论上排斥了进行其他制度尝试的可能性。

第三，国家意识形态像神学一样都是全功能的。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神学不仅管人的信仰，也主宰着世俗万物。而意识形态不仅主宰国家的政治信仰，而且也是思想各个领域的最高指导，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都要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各个学科都成为意识形态形态在本领域的诠释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文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以及苏联自然科学界的反唯心主义批判都是意识形态对各个学科灵魂的替代。

在现代神学性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的国家政权，也就难免带有很多“神权”色彩。比如，国家的任何制度、政策的出台，必须要从意识形态中寻找依据和合理性，任何意识形态出格的变动，往往都要冒很大的风险和阻力；还表现在权力领袖也承担精神领袖的角色，只有权力领袖的话语才是意识形态的最高标准，下级只能按照上级指示做事。

意识形态的神学化在“文革”时达到顶峰，“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胡耀邦、陈云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积极推动意识形态回归科学，破除个人权威，破除教条迷信，鼓励社会思想的自由化。然而，这股意识形态回归科学的热潮在 1989 年后急刹车，甚至在近几年有回潮的趋势，重回意识形态神学化的老路。

比如，2004 年以来国家力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先后组织 7 万多名专家参与这项工程。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法学、新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也都开展马克思主义工程建设，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的新的教材体系”。马克思主义也升级为一级学科，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把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学科或研究所升级为马克思主义学院。

同时，意识形态趋于收紧状态，反复强调“两个绝不”——绝不搞三权分立，绝对不搞多元化——将其归结为资产阶级的，不符合国情的东西；唱红大行其道，极左思潮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国家对民间社会成长也越来越警惕，网络言论受到越来越多管制，NGO 成长也受到限制；90 年代提出的依法治国被淡化，国家更习惯于用维稳来解决公民利益诉求；党内政治学习明显加强，言必称主义，言必称领导，言必称指示，对理论权威迷信加剧，党内理论自由空间和民主空间也缩小。诸多的言论和行动，倒退到“文革”和 90 年代初的逻辑形式上。

国家意识形态与现代社会的冲突

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主要论断，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已经跟今天的社会现实有很大出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建立在 19 世纪初欧洲文明成果之上，每个观点无不透露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在科学和哲学经历了 100 多年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已经很难作为现代社会基本价值判断的依据。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论断，跟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和政治斗争需要有关，也无法成为衡量 21 世纪中国社会现实的圭臬。而我们还继续坚持这些主要论断，禁止怀疑，这显然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精神。

在意识形态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只有列宁主义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思想理论如“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才是科学、正统的社会主义，也只有在列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指导下建立的政权，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然而，理论研究表明，斯大林模式所坚持的是完全忽视个人自由和解放，被异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而以欧洲社民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更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里面的科学、人文精神，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认可的一条道路，而不应该简单的冠以“修正主义”“冒牌社会主义”予以否定。

马克思、列宁都蔑视议会斗争，认为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虚伪民主，只有建立“议行合一”的无产阶级专政，才符合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马克思、列宁对议会的判断，分别建立在西欧和俄国代议民主刚刚起步的初期，只有极少数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议行合一的整体，则是源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然而，欧洲左翼政党的斗争历史表明，通过议会斗争，落实普选权，让占有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掌握选票，也可以改变国家政权性质，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权变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权。而没有真正选举、议行合一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容易滋生专制，形成新的权力贵族。可是，我们依旧坚持马克思、列宁对三权分立、代议制的论断，拒绝选举和分权制衡。

现有的意识形态强调，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认为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才可以解放发展生产力，实现劳动成果分配平等，防止两极分化。事实却表明，在缺乏监督和强制机制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只能沦为管理者所有，全民享受不到生产成果。中国经济上的“三公”（土地公有、国有经济、国有金融），已经成为加剧分配不公的最大助推器，严重挤压普通经济个体和民营企业的利益空间。然而，我们近年来愈加迷信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让国有经济享受着政府的金融、地租、产业政策、原料供给等方面的超级待遇。国有经济占主导是否就是社会主义，就能保障政权不变色，这也值得打个问号。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形态。在《共产党宣言》诞生时代的西欧和列宁时代的俄国，工业化刚刚起步，社会形态基本呈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元对立的状态，因此萌发了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对少数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呈现多元化，扶植中产阶级建立公民社会是大势所趋。但是，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里没有“公民社会”，以建设公民社会不符合社会主义理论为由，拒绝“公民社会”。这种观点也值得疑问。

在对外战略上，从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俄（苏联）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是出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制裁之下，所以出现了把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说法，并且认为两个阵营是你死我活的。然而，冷战结束之后，两大阵营对立早已不再，资本主义国家也经过 70 多年的改良，基本抛弃了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思想，成为维持世界和平的主力军。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和民间组织，也积极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援。可是，我们依然在外交政策上，在教育宣传上敌视、丑化西方文明，认为“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带着一种“阴谋论”的有色眼镜看待西方。这些思想，都严重阻碍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共处，以及国民对西方文明的正确认识，也不利于中国成为世界的文明领导者。

在民族问题上，我们过度迷信斯大林的民族自治理论，通过一系列“少数民族政策”（身份、语言、教育、文化、干部制度），让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差异制度化。60 多年的实践表明，这种政策既不能实现民族平等，更不利于民族的交融。现在，西藏、新疆、内蒙都出现很多民族问题，很多学者提出对民族政策的反思，提出美国和印度的文化族群主义更适合能解决问题。然而，社会主流不仅不接受，反而把民族问题视为最不可碰的“禁区”。

在哲学上，我们依然信奉产生于 19 世纪初期的机械唯物史观，用“一元主导论”“决定论”和“必然规律论”来解释社会发展。社会进步是各个文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个因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如果把某一因素归结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是无法被证明的。尤其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决定论”，是难以解释历史发展的。人口迁徙、宗教传播、粮食作物引进，甚至是气候变化，都会改变历史的进程。

我们的世界观里，也到处充斥着“二分法”。这是启蒙运动时期流行的一种机械辩证法，利用其，能把世界机械地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好与坏”“公有与私有”等，并认为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这种简单粗糙的二分法，既夸大了事物之间的矛盾，又扼杀社会多元的发展方向。比如，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不是你死我活的，二者的产生各有各的社会需求。在公有与私有之间也有很多模糊地带，如社会所有制，而这往往是社会中最有活力的成分，却被我们忽视。

对中国基本历史的判断上，我们按照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中国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发展阶段。而历史研究表明，被视为奴隶社会的夏商西周，生产劳动中使用的奴隶是少数，自由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角。商周的奴隶比例，甚至没有所谓封建社会中的某些时代高，比如两汉末期和北朝。中国的“封建社会”，其社会形态也与西方封建社会截然不同。相反，中国的商周时代更接近于西欧封建社会。而在历史教科书上，我们还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观，甚至“五种社会形态”争论都不允许出现。这些做法，并不利于国民形成对本国历史文化的基本判断。

由于中国以意识形态立国，意识形态对国家的影响是根本的。上述及未提及的意识形态

种种落后之表现，现今已经是国家进步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坚守那些已经过时的意识形态教条，导致国家制度改革无法推动；官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强硬高压态势，严重禁锢了人民的思想创造自由，阻碍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加之与商业的过分结合，社会风气整体堕落；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飞速前进，现在已经成为引导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然而中国却无法在制度文明和思想艺术层面成为引导者。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最大软肋。

意识形态重归科学

与后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奉为不可置疑的真理化身相比，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对待他们的学说上，往往持有十分科学的态度。马克思的任何理论，都是经过周密分析，并且广泛虚心接受恩格斯等人的批评建议。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理论是唯一的、亘古不变的真理。恩格斯也科学地对待他本人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学说，甚至在晚年不断质疑、修正自己的理论。在他去世前几个月，还写文章表示，无产阶级暴力夺权理论看来是错了（《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11月）。列宁也以民主的领导作风著称，听得进别人的批评，不断反思自己的理论。晚年在病榻上，他还提出了对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系统反思，指出一党专政会使苏维埃政权异化，必须实行党政分开，加强党内监督，允许其他党派的存在。这与斯大林、毛泽东等人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断章取义，进行神学化，理论解释权垄断化，粗暴镇压党内外异见者的作风截然相反。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思想里，也透露着对意识形态的回归科学的愿望。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继承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到“三个有利于”，都是对共产党人所坚守了几十年的错误意识形态教条的否定。尤其是他提出，市场经济不“姓社”，也不“姓资”，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更是对意识形态逻辑的一个有力否定。陈云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书”，江泽民的“民营企业也可以入党”和胡锦涛的“不折腾”，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激烈变化的社会形势和思想潮流，中国意识形态的空间却急剧收缩，又有回归老路的迹象。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对国家整体的影响是根本的，对意识形态的固守，也就意味着无法在制度变革上有所创新。这是近年来国家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无法推动的根源之一。因此，中国改革要想深入，必须以哲学的大解放为前提，把意识形态从神学桎梏中解脱出来，让其成为真正的科学观念集合。

意识形态回归科学的核心，是允许人们质疑。无论是欧洲文艺复兴时的神学解放，还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真理问题讨论，其核心就是允许质疑“上帝”。前面讲过，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把自己的学说当做万古不变的真理，今人有什么资格去当马克思主义的裁量官？意识形态的解放，不仅不会否定“上帝”的权威，反而会增强意识形态的活力；“两个凡是”才会让意识形态枯竭，让政权失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哲学的解放的另一个含义，是把人类思想的各个领域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文学就是文学，艺术就是艺术，历史学就是历史学，不是上帝历史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各个学科不应该成为意识形态在这个领域的解释学科，让文学成为真正的文学，艺术成为真正的艺术，历史学成为真正的历史学，才能有文学大师、艺术大师、史学大师。

哲学的解放，也是意识形态从一元到多元的过程。我们的价值观念不允许多元化，就阻碍了很多领域的发展，比如艺术没有多元的价值观念，就只能拍假大空的片子；政治没有多元的价值观念，政改试验都无法推行；教育没有多元的概念，建设一个“去行政化”的大学的建不成。

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是世界上少数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之一。在一个经济崛起的大国，一个民间意识迅速成长的社会，继续强化意识形态的绝对性，显然是违背历史规律的。长期的意识形态禁锢，不仅导致国家制度结构、人民思想的畸形，还导致整个国家整体的堕落。中国要想真正实现文明的复兴，必须来一场彻底的“哲学解放”。 ■

经济篇

资本观察

政治挂帅与灌水大赛 ——2014年Q3资本观察

作者：楼晟

国内：政治挂帅

近期，关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消息，使得“小组长”一时成为网络热词。虽然关于“鸠占鹊巢”与“架空”的流言很快被澄清，但由此引发对当下中国经济金融决策机制的讨论却值得关注。

可以看到，虽然二季度国内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已经企稳或开始回升，但要达到全年7.5%的经济增速目标依然存有压力，且随着各种政策的调整效果显现与对国内主要产业走势的预期拐点来临，即便是无视政治压力，回到传统刺激手段的老路来保增长，也已力不从心。其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今年以来国内银根虽呈现出趋宽走势，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却并未像往常一样变得活跃，反而体现出预期改变之后的信贷需求疲弱。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实际上反而是一种类似市场化反应的结果。所谓“接地气”即符合各方利益和预期的政令走的出去，而不符合的政令则难免遭遇各种阳奉阴违。尤其是在当下这种既要坚持调结构，又要适时适度保增长的矛盾政策环境下，单靠政策手段推市场化改革难免出现跛脚，毕竟市场化本身一般不能对市场各方的固有格局产生影响。而不管是调结构还是保增长，都要涉及到对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洗牌，反而需要高于市场本身的力量进行介入，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官媒会高调报道由总书记领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这件事——即便如近期媒体所澄清的那样，党的总书记担任组长是惯例，但实际主持工作的也往往是国务院总理。

所以，不少看法认为，到下半年时，中央会出台更具力度的保增长措施。即便如此，笔者也不认为会是简单的回归传统手段，而是代以动静更小，更具针对性，更为细化的非常规举措，甚至不会从行政体系，而是从党政体系作为发起点。

国际：灌水大赛下半时

纵使美联储耶伦在加息时点问题上立场软化，造成上周国际市场大幅波动，但二季度国际影响力最大的举动，还是要数欧洲央行德拉吉一次性打出了几乎所有的宽松措施，包括堪称史无前例的名义负利率。耶伦的变化，近乎于对欧洲央行行动的条件反射——美国当下资

本充裕、通胀稳定，没有扩大利差吸引海外美元回流的需求，加息预期带来汇率波动，反会影响美联储在改善实体经济和就业上的政策效果。

虽然，德拉吉在政策解释上给出的理由是，希望负利率能够更好地支持相对更依赖间接融资渠道的欧洲企业，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负利率直接惠及的，还是依旧被债务阴云笼罩的“欧猪国家”，为相关国家政府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大开方便之门。

这也可以看作，以德国为首的欧元区经济强国，在企图通过统一财政整合欧洲的道路的重大妥协。随着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实力发生质的提升，在与中美这样的巨无霸级经济体的竞争中，欧盟与欧洲国家经济体量偏小，缺乏纵深腹地，行动协调性差的缺陷越发致命。欧洲要保持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难度越来越大。但受制于意识形态和利益的牵绊，欧洲又没有进行政治性整合的条件。因此，德国才会在欧债问题上“小题大作”，企图以经济手段整合欧洲各国，以应对新环境下的挑战。不过，由于德国和欧洲都缺乏足以支撑这种整合的硬实力（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始终难产，欧洲的安全防务无法自理，依然依赖北约和美国），导致不论多么严厉的经济整合手段，都难以逾越相关国家主权这道屏障。德国对“欧猪国家”的严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迫不得已。因为，相关国家一旦主权违约，它将毫无办法。反之，如果德国有能力担负其欧洲的防务安全（即强制执行），那么也就不必担心违约问题。

因此，在整合目的难以达到，同时欧洲经济已经面临明显通缩威胁的情况下，德国以认可负利率，而非直接出资救助这种国内政治压力较大的方式，作为缓和与欧盟各国关系的手段，就不足为奇了。■

阶级篇

工人观察

打工者的前途

作者：巩高兴

打工者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再打工。有部分人实践了，用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尝试着在老家或打工地做小生意。其中，少部分人暂时成功了。剩下的人，退而求其次，希望回到老家打工。有观点指出，底层或平民子弟“向上爬”的通道在变窄。这里指称的人群，应是底层出身，受过大学教育者；对于出身底层，只受过初等教育，走入社会后干着底层所惯常从事职业的人群而言，无所谓“爬上去”。

曾有媒体人潜入富士康，观察体验工人生活，以做报道用。他们以初始发现的口吻说，打工者无前途。看来，他们既不了解历史，更不了解现状。从古至今，底层人一生中没有任何经历疾病、饥荒、战乱，能自然死去就是万幸。拼命维持生存是常态，谈前途太奢侈。大家辗转于制造、建筑、服务业，依旧徘徊于底层。

在此，我以一位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族叔的谋生经历，来诠释命运的辗转徘徊。

上世纪90年代初，他位于陇东南的家乡，还很闭塞、保守、传统，婚姻要通过媒人介绍。而他却是这种传统氛围中的领先分子，与初中同学相恋成婚。婚后，她俩去广东打工。与常人年后外出，年底辞工回家这种模式不同的是，他们在一个生产塑料花及盆景的工厂，坚持做了数年。女方其间因怀孕回家，儿子出生后，交给老人看管。

她这一走，却给家庭带来灾祸。当时政府大力推行计生，因她一胎后未上环，副乡长带着计生干部、联防队及派出所的人，前来兴师问罪，索要罚款。未果后，他指使别人将房脊推掉，用锄头将瓦片揭掉，用方言说就是“拆房溜瓦”。独自守家的老人骂他们是土匪，副乡长嚣张地回应：“有本事就去告呀。”

作为农民，除了计划生育，可能遭遇的政府暴力还有：征收农业税，征地，流转土地，城管打击摆摊及非机动车，收容遣送等等。

女儿出生后，族叔出于上进，选择了预期收益会高些的生意。在那个年代，做生意一开始就是从县市场进一批低价劣质成衣，托运到四川或云南的偏僻地带，在当地县城或镇上租房，然后走街串巷或逢集摆摊式地兜售。除了成衣，他们还依次卖过电子表、眼镜等这些曾经时新过的东西。不过，随着当地经济逐渐发展，这种行当也已衰落。去年底，我从熟悉村里人情世故的堂弟那里得知，亲友邻人中从事过这一行业的中年男性，绝大多数被迫转行做

建筑工了。

进入新世纪，以前靠生意营生的部分胆大心狠的人，开始干起卖假手机的勾当，以团伙的形式分散在各个城市的汽车、火车站，而族叔曾远赴沈阳。他们将手机模型卖给贪小便宜及相关知识不足的，以流动打工者为主的人群。有人告诉我，有人曾外出两个月，进账一万多。伴随高收益的是高风险，他们不时会遭到私人报复或警察制裁。因此，包括族叔在内的很多人，被迫放弃了这一行当。

谋生还要继续，他开始干起了建筑。在老家，人们称搞建筑为“搞副业”。土地包产到户前，大队有副业队，公社有工程队。当时种地是主业，搞建筑是副业。久而久之，种地虽已成副业，包括搞建筑在内的外出务工成为主业，但称搞建筑为“搞副业”的传统却沿袭了下来。过去的一些集体企业，后来都成了队长或经理的私产。现今村书记的父亲，曾是大队副业队的队长。这位队长现在是大包工头，并移居市区。而他儿子不仅是养猪场场长，通过土地流转，还也成为村里最大的地主。

去年底回家得知，族叔与七八个亲朋外出，在新疆伊犁地区做钢筋工。揽到活时，个人日收入有三百，当日结清；没活时，就在出租房看电视、睡觉。说到此，不得不提媒体的有关报道。有些白领说民工的工资高过他们，却不深思，建筑工为此所付出的辛劳，以及高收入建筑工在这个行业内的微小比例。还有一些公务员及中小学教师，抱怨自己的工资不如打工者。听这些人的说辞，仿佛他们一夜之间都成了弱势群体。这些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受过现代文明洗礼，“劳力者”收入不能超过“劳心者”，贵贱该是命定世袭的陈腐观念，却并未丢掉。

族叔的儿子在兰州二本院校读书，女儿读初中。老家的院子里，三面都建起了房。老父即将去世，他只有老后才会回乡常住，儿女将来回家生活的机率很小。但是，所有的打工者都像他一样，在家里建房或在县城买房，不仅是面子，而是失败的进城经历促使大家给自己留后路。打工地点是流动的，家是不变的。学术理论喜欢讲工业化，进城农民市民化，但我短时段内看不到这一现象。

一个可期待的社会应该是，就算没有“爬上去”，身处底层也该享有体面的生活及有尊严的工作。■

阶级篇

工人观察

企业管控中的传统主义因素（提纲）

——以长三角两家企业为例

作者：周安安

研究背景

企业尤其是大型制造业中的劳资问题，一直是社会热点。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工人权益意识的提高，各地的劳工运动也愈成气候。在这些劳资问题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经济问题已不再是劳资矛盾的唯一诱因。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说明，在城乡结构变化这一大背景下，年轻工人的心理状态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些年轻员工，已不再像他们的农民前辈一样，天然将“吃苦耐劳”作为一种美德；在繁重、重复的工作环境中，对于这些年轻员工来说，工作的意义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另一方面，对企业经营者来说，他们面临着在不断变动的商业环境下，如何对员工进行有效管理的问题。中国企业面临的管理问题往往是跨越时代的，其中既有如何让工人服从流水线工作，提高效率与良率这样的老问题；也有与企业中基于地域、血缘关系建立的小团体进行博弈，绕过工头，尽快建立管理者权威这样的问题；还有在企业引进新技术的过程中，与工人共同协作，发挥其主动性，共同制定有效的生产模式这样的新问题。在实际运营过程中，许多企业主都感慨，设计再精良的规章制度，也只能解决企业管理中 60% 的问题，而还有 40% 的问题，要通过员工的自发改变做到。

由是，在许多中小型制造业中，企业主开始试图通过对员工的“思想工作”来解决劳资冲突和管理效率问题。在许多长三角地区的企业中，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被作为重要的思想工具引入了。在这些企业中，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成为了一种近乎宗教仪式的行为。有许多企业主宣称，这一学习活动对于弥合劳资矛盾和提高企业效率，起到了良好效果。

固得电子与方太厨具

这些引入传统文化作为思想资源的企业，其行为更多基于企业主的个人特质。这些企业主，自身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兴趣，并且有着强烈的社会改造诉求。

制造业企业往往像城市边缘的一座离岛。在某种意义上，员工的生活是与外界隔绝的。这种情况，为在企业内部创立一个独特的文化氛围提供了便利。

运用传统文化进行管理，苏州固锔和方太厨具这两家企业尤为突出，而且这两家企业都有不俗的经营业绩。固锔在集成电路制造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且是中国最大的二极管生产商；而方太则是中国高端厨电业的领军品牌，其行业第一的地位暂无竞争对手。方太在去年正式提出了“儒家管理”的口号，开始全面在企业内部推行这一制度。

固锔电子则走的更远，其以传统文化对于员工进行管控，已深入到其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细节。例如，在员工餐厅内每周有三天是不供应肉食的，因为老板希望以素食来培育员工的“恭敬心”。固锔更让员工每周脱产带薪进行一天的传统文化课程学习，这在讲求成本的制造业企业难以想象。可以看出，这种培训已经起到相当显著的效果：从高管到员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和谐幸福的表情，为人处事也十分客气得体；固锔的内部清洁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员工义务负责的。其企业内部的清洁程度之高，远超一般的制造业企业。

其中，传统文化最大发挥其作用之处，在于对企业内部员工的组织。固锔特别成立了“大爱人文”部门，集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工会组织的功能于一身。在各类宣导课程之外，固锔鼓励员工结为各类义工组织，实行企业服务和员工互助工作。

固锔表示，它的目标在于通过对人的教育，提高人的素质，并最终培养起人对工作的热爱。最极端的是，固锔甚至取消了良率考核制度，转而诉求员工的互帮互助和自觉性。固锔开出的工资，在同类制造业企业中并不算高，但其员工流失率很低。同时固锔宣称经由多年传统文化教育，其产品良率提高了50%以上。

企业如何为员工制造“意义”

以提高人际和谐程度，创造良好工作氛围等高福利手段，来代替高薪酬，并不是十分新鲜的做法，非常贴近传统大国企的做法。与自由竞争的商业相比，其用人逻辑的不同之处在于，目的是在较低的薪酬成本条件下，以独特的文化氛围，培养员工和留住员工。

事实上，这一做法不仅可以以“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武器。通过扩大企业功能的外延，对员工进行从行业技能到生活习惯的全面管控，是目前在很多中小企业通行的做法。本文将许昌平东来超市和苏州德胜洋楼作为例，将其内部管控的逻辑与苏州固锔做一对比。

传统文化因素的外部诱因——慈济、净空与传统文化学院

在演讲中，固锔和方太这两家企业的老总，将自己的管理称为吸收“东方智慧”的结果。事实上，这两位老总也确实和许多传统文化组织有着网络关系。固锔老总本人与净空法师有着私交。据传，在台湾慈济会进入大陆并落地江苏的过程中，他在其中也起了一定作用。在固锔内部使用的教材中，大量吸收了慈济会与净空法师的宣教内容。

近年来，儒家与传统文化的复兴之势蔚为可观。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官方对这一新意识形态的塑造之意也愈加明显。从固锔、方太的个案可以看出，这一意识形态，目前在小型企业的内部管控中找到了结合点。 ■

社会组织与互联网篇

非官方教会观察

宗教场域，文化信念（下）

——基督教在中国的演变

作者：李晋 马丽

宗教场域背后的文化信念叙事

海港市：不谈政治的教会

现今 84 岁的 H 是在上世纪 40 年代大学时代归信基督教的，曾作为青年团契的代表被监禁多年。当他在 80 年代中期被释放时，一些老朋友请求来他家里一起读读圣经，于是他的家成了一个秘密聚会点。从最初五六个人的读经，到 2006 年已经发展成主日三堂聚会的 100 多人的聚会。之后的两年内，这个聚会点的人数又增加到 200 多人，非常拥挤。作为长者，H 建议其他年轻同工把会众按居住地区分为多几个聚会点。这样的自愿分堂做法在海港市的非官方教会中，是很常见的。一般来说，他们认为，100 人以下的聚会不会招致官方注意力，但如果是在一个居民区，邻居会因为人员频繁进出和声音而向居委会提出投诉。

在 2009 年，海港市一间超过 150 人的非官方教会被政府驱赶出了他们租赁的仓库。这间教会大多是低收入家庭和老年人，大家勉强在仓库旁边的空地继续聚会了几次。但因晚秋天气渐寒，不再适宜户外聚会，带领者向其他一些教会发出求助请求，居然在短时间内收到大笔捐赠，并购置下一个写字楼中 300 多平米的房产。26 岁的 L 就是在这个教会中长大的，她父母在 90 年代初归信基督教后，成为当时的同工，现在仍是教会的核心成员。她叙述了这一空间转变的过程和影响力：

我们刚开始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只有各个点，分散在家里聚会，传道人就到处跑。后来有了一个地方，一个姊妹是做裁缝的，有一个仓库，蛮大的，虽然环境不好，但很感恩，主日就有一个地方聚在一起，平时还是在家里。2002 年、2003 年，可能五六十个人，人不多，但过程中人渐渐进来，有 100 多。现在我们有 150 多人。她那个地方有两层，我们把下面一层租下来，后来也把上面租了，扩展。在那里有七八年，在飞虹路，地铁四号线下来就是，方便，老区的房子，比较隐蔽，但来来回回人多了，而且借给其他教会做活动。因为难得有这么大的地方，比如七彩桥开会就用我们的地方。这样就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09 年之前都说过，我们也没理会，他们也没有采取强硬的手段。但是到了 09 年，相关部门就施加压力给房东，以至于房东承受不了，不能再租给我们了，坚决请求我们离开。这样一来，我们也不想太勉强那个房东，因为本身是靠信心仰望神，也求神帮助我们。而且我们遇到这

样一件事，在海港市不多见。我们就面临没有地方聚会，其实当时钱已经交掉了，如果坚持按法律形式，还是有据可依，但不想难为房东。

我们教会多是偏中老年，民工多一些，根本没有钱，买不起会所。当时只是觉得，一个教会不能没有聚会的地方，不能停止聚会，既然没有地方，还是要坚持主日敬拜。就在那里对面，有一块草坪，就在那里聚会。他们没有赶我们，他们只是派一些人来拍我们，我们就坚持聚会。原来想，可能就只几次就可以进去了，想不到一来，一直从7月份持续到10月份，好几个星期。夏天的时候倾盆大雨，我们都坚持聚会、唱诗、讲道。一直到11月份，天冷了，担心一些年纪大的，身体不好，就考虑是不是回到原来的家庭。

他们也找人谈，我妈妈是同工，我们保护带领人，保护传道人，我妈妈也和他们交涉过。他们的态度是，你们只要离开我们的管辖地，随便去哪里都可以。我们就觉得，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买一处会所吧。你说的，买了就是我们的，不要再面对被赶来赶去的情况。加上另外一些教会为我们祷告，是不是要买，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其实买会所对我们是一件大事，一来好像海港市那时还没有听说过买会所的，因为会面临房产上名字写谁的问题。一般买的是住宅，我们买的是商务楼。我们就去看，看的过程很顺利，写字楼甚至比住宅楼还便宜。买下来是凭信心的，付了30多万。那个楼，加上装修费是260多万。我们为了这个很大的缺口祷告，也发动兄弟姐妹奉献。包括各个教会，甚至知道我们这个事情的都有感动来奉献，所以我们就分两次，把欠款全部付清了，没贷款。特别是有一些大老板奉献很多钱给我们。年老的多，打工的多，是没有很多力量。其他教会的兄弟姐妹也给我们出谋划策，包括房产名怎么写，怎么安排，要写好什么样的协议，这个会所就买下来了。政府后来关注过，他们也无话可说，一来我们离开了他们管辖的地方，二来我们是在一个商务会所里，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

34岁的G所在的教会已经有近200人的规模，所以他们的聚会场地一直是个问题。用她的话说，最近三年中他们已经搬了六次家了。她谈到，一次教会请一位外国人来做工培训，但几天后他们租赁场地的房东就收到政府通知，不得让他们进入。房东把场地锁起来，导致写字楼下聚集很多人围观。询问她这样的摩擦是否有利于教会与政府之间的互相了解时，她认为与政府周旋是“浪费时间”：

那个租房的也是弟兄。他们就施压给管理人员，很多人聚在楼下，引起很多人围观。他们也找我们兄弟姐妹去问话，后来开门了。对于公开化，同工会里也有分歧，但整体不认可。一开始就是不断流离失所的，最早是一个工厂的车间，后来施压给厂主，几十人吧。后来换，我都经历过五六个地方，现在这个是比较稳定的。之后“金灯台”也经历这个事情。我们自己觉得，可以开放，你愿意来听都可以来。我们甚至愿意和你正面交谈，他不给你这种机会，那我们就和他们耗。我们的意思是，他让你散，我们就散，然后再聚。要么就一直硬挺到底。如果是我们，像上次碰到的情况，我们会有一些策略，一些兄弟姐妹就装糊涂，别人拿他没办法。两三个人被叫去问话。其实她是一个大学老师，态度非常好，就装成一个无知的家庭妇女，问什么就装傻。包括一些年老的兄弟姐妹，就和外地的一些出去散步的一样，他们是本地市民，你不能把你怎么样。

海港市教会虽然也常常受到官方驱散和骚扰，带领者往往只求维持聚会秩序，而不会诉诸于权利和法律，觉得与不讲法律的政府周旋是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政治风险可能更大。我们在访问该市一位基督教学者D时，他也提到这种“躲避政治”的文化信念的作用：

海港市民本身小心谨慎，不关心政治，不大喜欢显山露水。一个是因为市民社会的性格，比较关注生活，私人化，不希望参与。第二是对政治一种更准确的想法：就算你参与了，也不会怎样。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政治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利维坦，要靠信仰去做的话，可以形成一些制约，但有时恐怕代价更大。第三方面和教会传统有关系，海港的教会即没有商业的那种向外拓展的热情，也没有 B 市教会那种政治的情怀。你信可以，悄悄进行就可以了。

关于北京守望教会因户外聚会与政府持续僵持的例子，海港市教会中占主导的声音是不赞许的，一个经常听到的评论是“搞政治”。现今 70 岁的 B 仍在带领一间传统家庭教会，按他的看法，家庭教会是不能与政府如此抗衡的：

对于守望，教会里有两种意见：年轻一代基督徒说，要正规化，说我们干什么躲在家里躲着啊，要争取合法权利，拥有合法地位，和政府对话；还有一部分，差不多像我们变老的一些人，这几十年也这么过来了，人少一点就少一点吧，要分开就分开吧，好好读读圣经，追求生命长进。你要做这个工作，可费你事呢，你有没有那个精力啊，一直和他们去搞？没有这个精力，他们要花好多力量，和政府对话，要争取。从我个人来说，我不说守望他们错，但我们没有那个托付。我们就是安安静静地聚会，读圣经，走十字架的路。如果人多呢，再分。你要和政府对话呢，就等于自己找了一个麻烦。

我希望像守望教会这样一批新一代的人，能够继续走在我们信仰的精华里头，就是十字架，不要走到民主运动里去。我们还不是要拯救这个世上的事。耶稣不是做这个事的。有些第三方就把守望看成“茉莉花运动”，实际上不是，但在这里头的人，也不要看成是做民主的，那是另外一条路。你在教会里，政教又缠在一起了。

如果说，老一代带领者的去政治化观念，来自于他们在 50 年代的经历，年轻一代带领者的同样观念可能出自不同的源头。自 90 年代末开始，随着一批外国新福音派宣教士进入海港市的大学校园，一批新归信的大学生、职业人士和归国人士组成了一类新福音派教会。新福音派神学的特点，与敬虔派在私人化和教会观上很相似，与秘密化聚会的形态比较兼容，所以催生了一代年轻人居多，但同样隐秘化的教会。现今 30 岁的 W，在大学二年级时接触到外教基督徒，在听了名为“四个属灵原则”的信仰小册子后归信。但是，他在之后的三年内，都只是每周三晚上参加外教家里的小型圣经学习，并没有参加任何教会的主日聚会。用他的话说，每周三晚上的聚会，就是他所知道的“基督徒生活”。

不过，不管我们如何反思批判甚至反对这一类模式或神学理念，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过去十年中，他们在各大校园里有显著的果效。如果看海港的一些家庭教会领袖和信徒，很多都是从这个背景里催生出来的。我会认同他们的比较积极的一面，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群体在做校园事工。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校园团契的建立是外国人做领袖，信徒和本地的联系非常薄弱，很少有一个教会观，缺少和本地教会的认同，也缺乏和教会属灵传承的认同。他们对教会的认同是非常薄弱的，脑子里完全没有教会这个观念。

第二个问题是，他们的事工策略有很强的福音遍传的倾向，如何去有效地去传福音，成为他们事工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知道他的人数报告，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数据，而是背后有神学理念的，就是要在人数上取胜。不管这目的是对是错，已经造成了事工上很多的问题。

比如对学生事工的深度，很少去关注。第二，它也带不出来一个正确的呼召观，和一个正确的职业观，因为没有办法去探讨，正式地和学生们去谈论对呼召的理解，对职业的理解。这些探讨是非常薄弱的。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要去探讨这些问题，或者是非常肤浅地去探讨。如此对于未来教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因为所培训造就出的信徒，完全缺乏对时代的思考。如果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机构不能理解现在发生的现状时，它是没有办法理解，现在慕道友或信徒的一些需要的。

实际上，很多海港市非官方教会在近几年才开始有主日聚会，此前的小组形式可以分散人数，规避政治风险。向公开化状态的转变也是一样，当我们询问一间教会的带领者 P（33 岁）如何看待教会向公开化转变时，他的回答颇具中国特色：

教会也和邓小平说的一样，应该“摸着石头过河”。根据教会的需要，需要公开的时候就要公开，不需要的就不用。各教会可以有自己的决策，比如我们公开的话，就有很多慕道友。我们没有那么多力量去牧养他们，教会就变成一个松散的组织，可能对属灵生命没有正面的影响。我们现在满足不了那么多方面的需要。所以目前的情况是，就算可以公开，我们也不希望公开。教会的会众，可能适应起来并不容易。我倒是希望这种看似紧张的局面还是维持下去，让我们有一种紧张感，知道信仰是要付代价的。当然，公开化有很多好处，就是教会成为一个合法机构，很多事可以运作。比如大学生传福音，在法律上应该是允许的吧，在校园发单张，租场地，应该都可以做。

谈到公开化，海港市的一些年轻教会带领者关心的，除了政治风险之外，还包括这样做会代表与一种家庭教会传统的脱离。现今 35 岁的 K，在带领一间 80 人的教会三年后，希望通过牧师资格考试而被国外一间神学院正式按立，但他听到很多老带领者的反对意见：

“按立”这个东西，是今天家庭教会很麻烦的东西。不敢让海外的人来按立，免得在这个政治的环境下授人以话柄。但也很难让国内的同工来按立，因为很多长辈都没被按立过，这是历史形成的。如果你年轻人按立，但对第一代信徒的牧者怎么处理？你说当教会正规化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要求。我对“正规化”这个词是不太认同的，什么叫正规化？有长老才叫正规化吗？我不认同这样的正规化。

家庭教会的处境很复杂。你从洗礼上看，他们都是浸信会，然后又很像弟兄会，没有牧师的，治理的时候又变成长老会。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家庭教会。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当然，如果你要用一个很成熟的，海外发展很好的教会模式来要求家庭教会，是很难做到的。

从以上叙事中，我们把海港市非官方教会所处的宗教场域中的文化信念做一个总结：

（1）基督教信仰是关于人灵魂得救的，而因为这个世界都要过去，最关键的是拯救灵魂，而不是去改良社会，所以基督徒不应参与政治；

（2）教会要顺服政府，即使在受到政府打压后，不应坚持协商自己权利的问题，一是浪费时间，二是有政治化的嫌疑；

（3）半公开化或秘密化聚会有利于教会增长；

（4）公开化和正规化需要教会做出太大调整，包括离弃一种有利的传统。

这些信念是受到海港市的政治文化和市民文化塑造的，也掺有特定神学理念的影响。按照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是这些信念的路径依赖，导致教会组织之间鲜有集体行动发生。加上政治逼迫记忆和恐惧，借着一些年老的领袖继续影响教会的认知，即使发生过一些户外聚会事件，教会的公共性还是非常微弱的。

内地市：公共参与的基督徒

本地政府官员和宗教管理者对待非官方教会的态度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会的组织形态。我们在内地市的田野调研时发现，在这样一个非移民城市，本地人之前的乡邻亲情，在很多时候帮助人们在交往中更加彼此尊重，愿意对话。现今 60 岁的 G，从 90 年代就开放自己的家，作为聚会点。而他楼上的邻居，就有一位当地宗教局的官员。这位朋友常常会为 G 提供一些内部信息，好让 G 家中的聚会可以安全进行：

有一天他和我打招呼说，G 老师，这两天查得很紧，不要在你家有聚会了。那是 95 年、96 年的时候了。我家很小，也坐不下了，就搬到另外一个姊妹家，40 多人，后来 100 多人，在她家院子里聚会了一两年。人多了，政府就不许聚会。我们就成立小组，一个月，我们又到了另外一个院子，是一个生产队书记家里。他阿姨信主，在他家院子里聚会了四五年。后来又搬到一个能坐 200 多人的大地方，也算是礼拜堂了。

从 90 年代末开始，内地市有一些知识分子归信，并且很快成长为教会带领者。与海港市的领袖们不同，这些有过人文训练的带领者，愿意接触更全面的神学观念，包括信仰如何影响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基督徒的公共责任。这种公共意识，在 2008 年地震时更加强烈。现年 60 岁的大学教授 N 在地震前几天刚归信，她叙述从一个平信徒角度看到的教会变化：

身边有很多老师学生的亲属都在地震灾区，家里死的人多的很，有个学生家里九口都死了。追悼会不断开，每天都是死亡的信息。那时就感觉到，特别需要教会的福音进入社会。就在整个过程中，教会就完全介入到赈灾中去了。这个过程中，发现佛教比我们做得还好，带了一个很庞大的团队来灾区。我们就说，我们做的和他们做的有什么区别呢？基督徒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爱？而且，这个爱还不是来自我们自己，这个很重要。这个过程也使我们社会化、公开化的程度很高了，很多教会都浮出水面。好几个教会就联手起来。看到原来基督教里面有各种教派，我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怎么基督教里还有灵恩、自由派、改革宗啊，太多了。开始，我们面对灵恩，还是很受吸引的。尤其是我们联合起来做活动，一祷告哭倒一大片。我每次带学生去，学生都激动得不得了，一出了那个屋子就没感动了。一公开化，就把里面的问题都显露出来了。我当时还有疑问，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也带给我很多迷茫。

地震危机不但让教会浮出水面，也让信徒的身份更加公开了。因为 N 是老党员，考虑因信仰要公开退党，学校干部找她谈话，劝她“悄悄地信”。在谈话中，N 把《圣经》打开，指给他们一些经文，说新耶稣的人必须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一个干部回答说：“你们基督徒怎么这么奇怪？不能学学那些佛教徒或伊斯兰同志吗？”随后的一年中，N 不但退了党，而且积极参与教会对震后伤员的探访工作，也在教会被驱赶时参与过户外聚会。一开始，她非常赞同回到家庭聚会的模式，因为在中国社会中，人会天然避开政治风险。但后来她也成了支持公开化的主力成员。她说这个过程也是充满挑战的：

我开始就说，让大家都回到家里，对很多信徒都是一种保护，就没有那么公开，因为你要知道人都有软弱嘛。我就和他们有争执。但我回来自己祷告的时候，就发现神就是要他们建山上之城。这时就发现自己不对了，开始感觉到神的旨意，并不是让信仰成为一个私人化的东西。我确实发现改革宗信仰和别的不一样，尤其是从马丁·路德到加尔文。加尔文提出的苏格兰长老会的模式，就是要彰显山上之城。这时我就慢慢认同了，发现信仰不是一个私人化的，自由主义的东西，解决自己内心平安的，有罪没罪的问题，得不得救的问题，灵魂的问题。而确实是一个整体，而且只有在教会这个群体中，在圣徒相通的过程中，你的灵魂才被提升起来，不是自由主义的，你一个人在家修行读经就可以的。所以，这时就非常认同改革宗的，尤其是看到教会一路走来的路程。教会历史，这个过程中需要神学跟上。这样认识到以后，我就反思自己了。然后，我就放弃以前的立场，在教会从反对者变成积极支持他们的，而且理解他们所做的决定。

我们刚进入内地市田野时，泉源教会（化名）已经购置了一处房产。一走进这座市中心的写字楼，从楼下挂出的各公司名牌中，可以看到这间“泉源教会”的牌子。对于非官方教会而言，拥有教产意味着聚会稳定性增加，会员委身度提高。而且在没有如海港市的封闭式规则的情况下，教会的场地是向任何人开放的。我们在访问内地市几所有教产的非官方教会时，不止一次遇见或得知有警察来参加教会的聚会，想要了解基督教信仰。N的教会，甚至每周主动把周报程序单送到辖区派出所，借此机会与他们建立关系。

这间教会购买房产的事，也不是没有争议的，甚至在同辈非官方教会中也是如此。第一个尝试的人，总是要承担比较多的风险，如谚语所说的“枪打出头鸟”。但当泉源教会成功买下房产后，随着时间流逝，公开化模式吸引更多新成员加入，与政府的互动也更良性，这间教会成了内地市其他很多非官方教会模仿的样本。相隔第一次进入内地市一年之后，我们再重访几间教会时，得知至少十几间都已经购买了房产。28岁的K是另一间教会的传道，他叙述自己对泉源教会这一做法的态度转变：

当时有一些会友，觉得他们公开和政府冲突，不是很明智。我当时也有这样的想法，在他们没有公布事件的细节之前，当时觉得，他们这样做，会不会带来整个内地市的教会都遭受逼迫的危险。毕竟，内地市的教会很多，而且都处在一样的状况。一旦有一个跑出来和政府对抗，如果政府觉得这些人想“上房揭瓦”了，要对全教会进行一个打压，那这个，会不会给别的兄弟教会带来伤害。虽然说逼迫对教会有好处，但大家还是有点担心这个情况。但后来我们同工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也尊重这些长老的决定。神既然把这个长老团放在那里，他们会向神负责，我们作为兄弟教会，就是为他们来祷告，灵里扶持他们。包括守望教会，我们也为他们祷告。

我个人来说，觉得有他们这样的教会蛮好的，走在前面，教会也可以发出声音来，让政府知道我们有一些诉求和渴望，让他们正确面对教会这一块。如果我们还是逆来顺受，像以前一样，抓我们，打我们，我们就不说，可能过很多年以后，情况还是这样。现在内地市的大环境非常好，其中一个原因，还是和泉源教会这样的争取有很大关系。我想政府也知道，因为有一个先例在那，我们就是简单的信仰，又没有搞什么政治运动。你可以来对泉源一样，警察可以来拿一份周报，我们每周讲什么，奉献是多少，拿去看就好了，这也是和政府有比较好的交流。我们教会，警察也来聚会很多次，我觉得是可以的，欢迎你来聚会。第一次他穿警察的衣服来，第二次，他觉得有点不舒服，穿便衣。他说，我穿警察衣服，看你们看我

都有点怪，我很紧张，下次就穿便衣来。他其实就想知道我们讲什么东西，他觉得你这些人讲的没有什么不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39岁的S是另一间正在经历重组的教会带领者，他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整个（公开化）过程是一个不断教育的过程。我记得2004年我们刚回国，内地市的教会都还是围坐一圈，你唱完诗歌，这些人就去拿着杯子倒水喝，讲道的时候都走来走去。而且都不提讲道，说是分享。我们就开始教导关于崇拜的观念，很多人意见很大，说我们家庭教会从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要不断地教育他们，说家庭教会当然是你的特色，但归根结底你要确认你首先是教会才行。所以经过这么几年的教育，特别是神学课，首先确立了有一个东西，你首先要成为教会，对大公教会大公信仰，这些方面确立下来，后面就比较好了。

我们在内地市访问到一位担任市政协委员的F（65岁），他同时也带领一间100多人的非官方教会。我们从对他的访谈中得知，他每年都会向政协提交一份关于争取非官方教会合法地位的报告。在长达四个小时的访谈中，他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我不可能在政治上是无神论，在信仰上是一神论，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很有趣的是，在海港市我们也访问到一位担任政协委员的W（63岁），他也带领一间200人的非官方教会，但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就谢绝了我们的访谈。闲聊之中，我们得知他会刻意避免将自己的职业身份与教会联系在一起，“怕给教会带来麻烦”。我们并没有刻意找到这两人作为对比，但他们的政治观念反差之大，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以上叙事中，我们把内地市非官方教会所处的宗教场域中的文化信念做一个总结：

- （1）基督教信仰不只是关于个人灵魂得救的，也包括基督徒在世上做光做盐的公共责任；
- （2）教会应该教育并引导政府的做法；
- （3）公开化聚会是实现“山上之城”的责任，教会不应该躲在暗处；
- （4）所谓家庭教会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

这些信念也受到内地市的政治文化和市民文化塑造，并经过特定神学理念的影响。按照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是这些信念转变（或意识形态的转变）导致教会开始重组，并触发公开化的集体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内地市的制度环境。

结论

经过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已经得到了很大拓展，使得曾一度处于秘密家庭聚会状态的非官方新教教会可以进行重组，包括空间、政治观念和组织架构上的转变。但我们观察到，虽然城市社会中的宗教场域已经趋向越来越公开化，在一些城市，仍存在很大的制度惯性或路径依赖。田野调研数据说明，不同地域的教会团体所持有的文化信念的差异，导致宗教场域的分化。文化信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信念成为个体到组织和组织之间的主导驱动力。文化信念也是本地政治文化和教会的神学观念相融合的结果。

从历史传承来看，海港市和内地市的非官方教会虽然都经历了50年代“三自”运动的

冲击，但因为海港市老一辈教会领袖继续传承逼迫时期的记忆和策略（当然也因为海港市政府仍采用高压政策），“传统家庭教会”的身份还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他们的组织创新。另外，还因为海港市是一个移民城市，社会网络的匿名性很强，不像在内地市，乡邻感情可以作为教会与政府协商的润滑剂。内地市的大多数非官方教会，都经历了一段与“传统家庭教会”脱节的发展阶段，同时其市民政治观念一直是公共性的，并不避谈政治。加上一批知识分子带领者在神学上的进深，为公开化策略提供了坚固的理论基础。

若从宗教市场理论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新教的增长，的确为宗教服务的供应者提供了一个市场。但是，在某些地方细分市场中，宗教服务的质量、竞争规则和透明度都处于比较低、不正规的水平；而在另外一些地方细分市场中，不但单个教会开始重组织，在服务质量、竞争规则和透明度上都大大提高，而且在本地带领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非官方教会之间，教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都进入更为良性的状态。但宗教市场理论不能解释的一点是，为什么海港市作为一个经济文化多元的发达城市，其非官方教会的形态还不如一个欠发达城市的教会形态更公开。若不是用宗教场域中的文化信念理论，这一现象就是一个悖论。本文的贡献，在于提出另外一种解释。

编者注：本文为《宗教场域与文化信念——基督教在中国的演变》的下篇

边疆篇

西藏观察

治藏机构中藏族干部的角色观察

作者：李永峰

在 1911 年之前的帝国时代，理论上，中国大致以“五服制”来划分“国家版图”。以清政府为例，中央政府直接可以掌控的地区是直隶、省府州县、将军府，间接掌控的则是土司、藩部，更远一层还有藩属国。虽然并没有严格遵守《尚书·禹贡》的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的命名，但差异化治理的思路是一致的。从帝国走向共和之后，“五服制”虽然已被现代的理论话语所取代，但差异化治理依旧持续。

中共鼎革之后，最重要的差异化治理，莫过于民族自治区的设立。差异化治理的关键，在于官吏拔擢是否有差异化。因为民族区域自治区所有政策，最后需要通过官吏与当地人民接触。而官吏的差异化，是可触摸与可检验的，一般也会被认为是“自治”的关键指标。本文仅尝试梳理一下西藏自治区（兼及其他藏区）治理差异化中，藏族干部的角色转变。

以解放、改革、发展等名义，由中央向地方自治区所派遣的资深党政干部，自然是当地展开政治、社会、文化革命的主要领导。但是，面对截然不同的民族与宗教环境，中共要重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管治秩序，并将其带入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又红又专的当地民族干部队伍同样极其重要。甚至可以说，当地民族干部的忠心与能力，将是影响自治区管治稳定与否的最核心问题。

解放之初的敌我划分

1950 年解放军进军西藏之前，中共各级干部，乃至整个中国主流的汉族社会，都对西藏社会了解甚少。同时，旧西藏政教合一的传统，又与中国其他省份截然不同，显然也不能将其经验简单移植。所以，新体制之下，如何吸纳和培养本地精英为其所用，既影响着新政府对于西藏信息的掌控，也将影响未来全新管治秩序的设计。

解放前的西藏，上层的管治精英只有寺院僧侣和拉萨的几家贵族。在达赖喇嘛领导之下，最高级别的行政机构噶厦政府，是由一僧三俗四位噶伦大臣组成。在 1951 年到 1959 年，中共所主导的新秩序与达赖喇嘛所主导的旧秩序，曾尝试在《十七条协议》之下和平共处，但是最后发现，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一九五九年，随着达赖喇嘛流亡，以及追随达赖喇嘛的各宗派领袖和贵族家庭离开，中共的治藏机构放开手脚，尝试将西藏旧有精英阶层彻底改造，并全面培养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干部队伍。

毛泽东在 1925 年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论述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堪称中共政策的最核心指示。在西藏“革命”中，同样面临敌我划分。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已经跟随叛乱队伍离开西藏，自然是敌对的一方。留守西藏的上层阶级，比如十世班禅喇嘛、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则是可以统战的朋友，但他们依旧是需要改造的对象。而追随共产主义脚步的藏族党员，便是自己人。五十年代，在藏人中最重要“自己人”有两位。一位是西藏共产党的创建者平措汪杰，他被一些西藏流亡人士恨之入骨，称其为“引红汉人进藏的红藏人”；另一位是跟随红军长征，后来在延安民族学院受训的桑吉悦希，毛泽东亲自给他改名“天宝”。

作为签署《十七条协议》时的西藏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后来更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官列国家领导。他是中共在西藏上层统战中的头号对象。同样担任过国家领导人的统战对象，还有班禅喇嘛和帕巴拉·格列朗杰。帕巴拉·格列朗杰是西藏昌都强巴林寺第十一世帕巴拉活佛，也是第一位拥护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藏传佛教领袖，多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级别稍微低的统战对象则更多，著名的比如曾担任青海省副省长的喜饶嘉措。

平措汪杰是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中共西藏工委八位委员中唯一的藏族委员，深获毛泽东信任。五十年代初，据说毛泽东曾指示西藏工委，处理西藏问题时，“党内问平措汪杰，党外问计晋美（班禅堪布会议厅主任）”。平措汪杰自少年时，便决定实践共产主义理想，改造西藏，曾与中共、苏共和印度共产党都有接触，加入中共后，他是中共高级领导中最了解西藏的人，在西藏变革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平措汪杰还担任进军西藏的解放军第十八军的工运部长，专门发展和动员当地力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带领了成千上万的藏人加入中共队伍。这些最初的藏族积极分子，在后来的西藏干部班底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或许正因为平措汪杰在藏族干部中的影响力，所以每当西藏政策摇摆时，他首先会成为被猜忌的对象。以至于 1960 年起，入狱 18 年。80 年代，平措汪杰依旧被阴法唐等人视为需要批斗的“西藏三个代表人物”之一，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喇嘛并列。

本土藏族干部的培养

平措汪杰和天宝等人，在中共进军西藏之前就是共产党员，是“自己人”。中共在西藏本地培养起来的第一代藏族干部，则以巴桑和热地为代表。他们本来都是旧西藏农奴制社会中受压迫的阶层，在宣传口径中，是共产党让他们翻身做了“主人”。其中，1971 年成为西藏自治区副书记的巴桑，据说是“奴隶”的女儿，在 13 岁时便成为孤儿。但是，第一代西藏本地干部，所成长的年代正是最激进的“文革”岁月。所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结束以后，他们被中央的改革派领导人视为难以领导改革。加上西藏教育落后，储备人才不足，以至于到了 80 年代，胡耀邦等人突然发现，即便经过 20 年建设，中共在西藏自治区也并没有培养起足够的，可堪重任的本地藏族干部。

1951 年之后的西藏，追随整个中国的步伐，政策前后有几次大变。在“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趋于激进，在西藏同样也产生共振，最后激起了 1959 年的叛乱。第一代参与治理西藏的干部，平措汪杰和他的老对手范明，先后被当成“右派”关入秦城监狱。下一次大变则到了“文革”，天下大乱。再一次变化就是 80 年代。流亡印度已经超过 20 年的达赖喇嘛，在与中共接触时，获得许可向西藏派出了第一个代表团。代表团在拉萨获得万人空巷

式的欢迎。西藏的外来汉族干部严重误判了藏人的情感，也误判了西藏的形势。很快，中央便尝试重建西藏的本地干部队伍。

培养更多本地藏族干部时，中央曾考虑重新启用西藏旧社会上层阶级，以及他们的子孙，希望他们在西藏的管治机构中，继续占据相对重要的位置。但是，正如西藏民间广泛流传的谚语：“藏人毁于希望，汉人毁于猜忌。”80年代末，1987年和1989年，拉萨连续出现暴动，让中央政府无法继续相信这些旧贵族家庭出身者的忠诚。所以，这一策略后来并没有继续下去。

其实，不止西藏旧贵族的忠诚难以被充分信任。即便是1951年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之下，最享尊崇的藏人阿沛·阿旺晋美，其家族的忠诚同样也受到怀疑。阿沛·阿旺晋美的第三子阿沛·晋美，从1996起，常年担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在海外藏人中拥有巨大影响力。虽然阿沛·晋美的观点与西藏流亡政府有一些区别，但是在中共口径中，他依然是为达赖喇嘛做事的人。平措汪杰在自己的最后一本书《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中转述了十世班禅曾对他说的一句话：“大家都称我和阿沛是国家领导人，即（人大）副委员长，但是在我们两个人的头上有一位中央统战部的处长在严格地管着我们。”由此可见中共体制对阿沛·阿旺晋美家族的警惕。

除了旧贵族，传统的宗教势力，在80年代也开始复兴。“文革”后获释的十世班禅喇嘛，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费尽心机重建藏传佛教传统。在他推动下，1987年在北京西黄寺创立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是中国大陆最高等级的藏传佛教僧侣受训基地。所有的转世活佛，都要在这里接受培训。后来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塔尔寺寺主阿嘉活佛，便是“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第一届学员。但是，传统的宗教势力，除了成为“花瓶式”的统战工具之外，在西藏管制机构中，同样也难以成为核心力量。这一方面，是因为无神论的中共，不可能认可宗教势力对社会的领导；另一方面，同样也有忠诚与否的考量。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的阿嘉活佛，虽然也在体制内享有高位，但因无法接受认证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时“金瓶掣签”的操作，而于1998年流亡美国。严重打击了中共体制对于宗教领袖的统战信心。他们，还不是“自己人”。

援藏干部与西藏管治困境

根据藏学家提耶里·多登的观察，虽然藏人在西藏的公务员干部中总人数相当多，却大部分属于行政系统的底层；层级越高，藏族人越少。到了90年代，中央在西藏的干部思路，又有一次大变化。因为80年代末的叛乱，以及越来越多的民族院校毕业的藏族学生流亡印度，中央对当地干部的信任更加减弱。一种新的思路开始出现。从1995年起，在中央政府以“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口号引导之下，各地纷纷派出“援藏干部”。目前，“援藏干部”已经成为治理西藏的重要力量。这一思路延续到现在。

可以说，直到现在，中共所吸纳的藏族精英，在忠心和能力上，依旧存在诸多问题，所以西藏局势始终动荡。随着宗教势力复兴，传统寺院体系复活，西藏的旧有精英在中共体制之外获得了飞速发展。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寺院系统从藏区各地调集僧侣，赶往玉树救灾。其势头几乎可以与救灾的解放军分庭抗礼，可谓是对当下西藏体制外势力的一次检阅。

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论述中，整个中国都要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类似西藏这样的经济落后地区，目前的差异化治理只是在迈向共产主义大路上，因为走的慢一些，所以需要照顾。少数民族自治区，只是临时的过渡状态。最终，少数民族自治区与其他省份，都应该是无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而随着苏联解体，中国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日渐淡薄，少数民族自治区未来路在何方，始终没有得到明确认定。自治区究竟是否依旧是过渡状态，最终走向与其他省份一致，但这种一致不再是一致的共产主义，而是与中国主流的汉族社会或者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同一化”？抑或，自治区将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也就是实实在在的实实现“自治”？

因为自治区的定位不清，所以，中央在处理西藏问题时，过去 50 多年来时常反复。这影响了当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也影响了西藏的稳定。目前，特别是 2008 年的“314 事件”之后，西藏局势持续恶化，东部藏区更出现难以遏制的僧侣自焚浪潮。如何重新吸纳和培养本地精英，在未来应该会是更急迫的问题。■

本土/国际篇

印度的水坝

作者：萧敢

大坝一直是中国、印度这些人口大国梦寐以求的东西。尼赫鲁曾经把大坝称为“现代印度的神庙”。为了修建“神庙”，势必有大量人口需要搬迁，需要承受代价。1948年，尼赫鲁就对因为修建希拉库德大坝而不得不搬家的人们说：“如果不得不受罪，那么就为了国家利益而受罪吧。”

印度的水资源并不丰沛。在北印度，东部主要有恒河及其支流，东北有布拉马普特拉河，西北有印度河。中部地区，西有讷尔默达河，流入阿拉伯海；东有默哈讷迪河，流入孟加拉湾。再往南，就是三条东西向的河，全都注入孟加拉湾，由北往南分别是哥达瓦里河，克里希那河以及南印度的高韦里河。在印度教文化里，这每一条都是明文记载的圣河，与神有关。每一条河上，也都存在历史悠久的围绕水的争斗，结下无数代的恩怨。

从尼赫鲁当年的表态可知，印度对建坝一直很重视，所以目前已有 3600 座水坝可称为大型水坝。其中，3300 座于独立之后建造，遍及全国。此外，还有 1000 多座大坝正在建设中。印度与中国的外交争议，很多时候也直指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游的建坝计划。

纵观全球，目前全世界大约一半大坝在中国，1/6 在美国，1/10 在印度。可是，美国的大坝多为过去所建，当下主流思潮是反坝运动，过去十年一直在拆坝。亚洲则是新建水坝的热门地区，中国更是遥遥领先，其他亚洲重要水道如湄公河，也有很多建坝的计划。印度虽然对大坝有很多规划，但动作缓慢，围绕建坝又多有争议，延缓了建坝进程。它也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之一，受缺水影响的人口不下数亿。如何调整水资源的分配，一直是印度地域政治中的核心问题。

印度北部建坝较少，主要因为喜马拉雅山区容易地震。这方面已有一些惨痛教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德里大坝。印度地质部在独立之后就提出，要在德里附近的巴基拉蒂峡谷修建大坝。整个工程拖延了半个世纪，耗资无数。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地质学家指出，德里大坝很可能诱发大规模地震，在民众间引起巨大反响。德里大坝迄今尚未发生地震，但库区内滑坡不断，严重地影响了大坝的效率。

除了地质破坏之外，对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的影 响，也是建坝争议中的焦点。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是目前大坝最密集的地区，同时也是建坝争议最多的地区。兹举一例。讷尔默达河是南北印度的分界线，发源于中央邦的德干高原，往东流经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最后在坎贝湾注入阿拉伯海。印度教徒相信，这条大河源自湿婆神的身体。讷尔默达河水量充沛，是印度西部地区最重要的河流，但开发程度还比较低。在印度政府的规划中，这条河上应该修建 30 座大坝，将上游森林中富余的水资源用于下游灌溉和

工业制造。

此外，上下游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也很显著。下游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靠海，一直是印度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拥有孟买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古吉拉特邦近年来也有不错的经济表现，有“印度广东”之称，新当选的印度总理穆迪就来自这个地区。而印度中部中央邦的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为主。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却还没有跟上印度的现代化脚步。

贫困的、以乡村为主的中央邦，拥有讷尔默达河 80% 的流量，而下游正在全力推动制造业，急需用水的古吉拉特邦只有讷尔默达河 10% 的流量，旱季时更惨。下游极端渴望通过大坝来分享上游的水资源，但上游居民不同意，认为大坝会对上游环境、农业，以及人们的居住造成致命打击。随着大坝进程的推进，大量本就贫苦的人民流离失所。政府原本答应的重新安置最后一变再变，成了难民营，居住条件堪比纳粹集中营。有些人刚刚安顿下来，就被告知那里将继续修建大坝，不得不继续搬迁。其中发生的悲惨故事不难想象。

印度著名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 (Arundhati Roy)，以小说《微物之神》驰名世界。近些年来，她彻底投身于讷尔默达河反坝运动。她在中央邦的实地调查中听到了无数悲情故事，同时又看到军队、警察、官僚机器、法院对建坝争议给出激烈、残暴的回答，野蛮推进工程，置千万农民死活于不顾。农民自发组成了多种组织，以非暴力的手段对抗建坝。罗伊不再写小说，而是用她的笔来介绍讷尔默达河上这经久不息的斗争，试图帮助沉默的大多数。

这样的故事，绝不仅在讷尔默达河上才有。比如，克里希那河上普里钦塔拉河谷上的建坝计划，规划了足有一个世纪，但它的执行至今仍受到抵制。只不过，这次因力推大坝而被抵制的一方，变成中央邦政府。高韦里河上的普拉瓦拉大坝的规划也一样受到抵制，被认为收益极低，损失极大。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建坝需要各方的协调，常常还要在不同邦之间加以博弈，非常困难。这是印度建坝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

对于建坝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还很少。2007 年，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杜弗罗 (Esther Duflo)，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坝》(Dams) 的重要论文。她搜集了大量印度宏观经济数据和大坝数据，对印度这些年来建坝的总体后果做出了一个评价。

她的结论是，单纯从建造地域来看，大坝周围地区的农业产出，并没有从建坝行为中获得好处，贫困率反而增加。这个现象很容易解释，大坝导致水位上升，很多世居河边的人被迫搬家，流离失所，陷入贫困。但是，从大坝下游地区来看，上游往下游的移民会促进经济增长，下游的贫困率有所下降。所以，总体来说，印度建坝从再分配角度看有好处，即强制把库区人民迁徙到下游经济水平更高的地区。

杜弗罗这个研究结论，具有一丝讽刺的意味。建坝初衷是调节上下游的水资源分配，从而使得双方受益，经济发展。可是，建坝的主要后果，变成把库区周围的人群强制迁徙到通常缺水，但更富裕的下游地区。过去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过类似的看法，比如，大家普遍认为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在实际作用上很失败。但是，如果从经济标准来衡量，它还是成功的。阿斯旺水坝不仅在经济收益上成功，也显著降低了埃及的贫困率。

必须指出的是，包括杜弗罗这项研究在内，大多数对于水坝的经济研究，并没有将其他环境成本和非市场产品考虑在内。大坝很可能导致库区周围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可如何导致

生物多样性变化似乎也没有定论，背后的经济价值更没有定论，学术上极难测量。又比如，大坝可能导致土地盐碱化，可能导致海水倒灌。印度不同河流的含沙量不同，对河床、海岸线的侵蚀也不一样。所有这些因素背后，都蕴含了潜在成本。

不仅经济学家不知道大坝的实际成本和收益，每个生活实际受到大坝影响的人也不知道。每一个坝都不仅是一次生态实验，也是一次经济实验，把大量无辜人群驱逐到一个未知的新区，接受截然不同的经济挑战。■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2014 · 秋分

观澜学社 · 观察报告 · 第六期

前言

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或许唯有知识与思想，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某种“确定”的自信。

“观澜学社”是一个自发、独立、非商业的网络社群。我们关注当代中国历史的展开，试图对中共高层、资本、新生代工人、互联网、公民社会、思想界、边疆、外部力量等几项可能会影响中国命运的因素进行观察，进而分析和评估其未来走向；我们无意于介入学院的争论，更无意于鼓动任何政治势力；我们追求中国社会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建构“重叠的共识”。我们的名称来自《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我们计划每隔两至三个月公开发布一份《观察报告》，上一期《观察报告》的编号是“2014年·夏至”，以后也将逐次按照中国农历的节气编号。观察必然伴随着命名，但是我们会警惕各种大而化之的命名所孕育的风险；观察必然隐含着诠释，但是我们会谨慎地给诠释设定边界。

本报告属于观澜学社成员内部交流之用，如需转载、引述，以及任何形式的利用，请与相关作者联系。看到本报告的读者，如有兴趣查阅过去几期报告，也可与邮箱 guanlanxueshe@gmail.com 联系。 ■

目录

法政篇

李靖云：政治统治再造与利维坦国家建设（一、二） 5

慕容实：中共“道统”的歧变？
——以如何处理与孙中山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13

经济篇

聂日明：谁掌控中国金融系统？ 19

楼晟：改革进入深水区，次序渐重于进度 41

学社讨论：聂日明简评《改革进入深水区，次序渐重于进度》 42

阶级篇

詹妮：中国工人行动的新灯塔 44

学社讨论：王明远简评《中国工人行动的新灯塔》 45

社会组织与互联网篇

李晋、马丽：身份冲突
——官导民族主义与基督教教会增长之间的关系 46

本土/国际篇

萧敢：沙巴的困境 53

张昕：“去美元化”如何成为现实 56

边疆篇

李永峰：似是而非的“伊吉拉特”组织 58

李潇雨：边陲照片与“民族”的视觉呈现 61

法政篇

政治统治再造与利维坦国家建设

作者：李靖云

一，后发国家政治权力交接中的俾斯麦难题

二零一一年，辛亥一百周年之际，缅怀清王朝反而成为一种趋势。不仅长期以抨击革命为爱好的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大张旗鼓地撰写文艺色彩的“悼词”，即便是严肃且新锐的学者也开始重新研究晚清到民初政治。如果抛开激烈的个人现实政治情绪，从政治制度易代交替来看，中国人必须面对一个长期的政治制度——皇帝制度的消失问题。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皇帝政治的复辟，绝非是简单“民主共和”政治深入人心可以解释的。新一代的学者也开始更多地从政治结构变化入手来分析这一问题（北京大学章永乐教授《旧邦新命》一书就是系统地探索这一问题的佳作），这是更为冷静思考观察的起点，其实也反应了更为深刻的中国国家政治问题——利维坦国家建设在失去过去合法性权威支持的条件下，还能否继续？

凡有国家就必然有国家体系的建设，从大历史的背景而言，国家体系的规制，基本来自于政治上的挑战。对中国长期有“文明体还是国家”的基本发问，不纠结其问题所指内涵的西方话语霸权问题，也搁置其本身隐含的政治目的，从最为基本的意思来看，从白鲁恂到韦伯，都是基于中国过去的国家规制不足以应对当时的挑战这一基本事实的判断。这种不足以应对挑战表现在三个层次：第一表现在治理技术不足以应对政治挑战，旧的办法和规制无法解决现实的挑战；第二表现在技术上可以克服政治挑战，但是主要依赖于个人的政治能力，一旦失去政治家个人因素，则对于持续的压力失去治理能力；最后一个层次，为了应对挑战建立新的规制系统，并且建立新的政治势力，接着新的政治力量本身存在合法性压力，必须要继续寻求新的合法性能力。

这种政治环境压力带来的统治难题，中国并非第一个遇到。所谓的后发国家，由格申克隆从经济史研究中得出，在政治与国家建设领域里依然存在。在利维坦国家出现之后，传统国家都遭遇到巨大的压力，不同区域，不同政治形态的国家都有这样的遭遇。中世纪晚期，欧洲首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压力环境，竞争化的政治压迫造成了积累型的政治系统。这种政治环境的改变，在大航海时代被欧洲人彻底带到了世界，从内到外颠覆了古典以降的世界政治。中国常常被认为是现代世界的失败者，虽然相对于整个世界的传统文明而言，中国无疑已经算非常成功的了，但是基于竞争积累型社会的规则设计，中国并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德日长期以来被当做应对挑战、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成功国家。客观而言，德国可能更为

有样本意义。德国地处中古欧洲，在英法和低地国家开始形成现代利维坦国家体系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则是作为中古封建政治系统的一个落后存在物。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无论意识形态权威还是基本的政治能力权威，都已经失效。这种多层次竞争压力，很快就转变为实际的政治压力。拿破仑战争彻底绞碎了旧封建体系，对外战争的失败，导致旧的封建主统治阶层在德意志地区统治权威的丧失，以及统治手段的解除。对于整个德国而言，改革是整个政治体系的改造，从统治者，到统治工具、统治资源，再到统治目标。德国不能再以神圣罗马帝国的身份来维持政治联系，而是要建立深化统一的政治系统。德国也不能再依靠封建主和教士的联合来建立政治统治，而必须要借助更为强大的统治资源，以及更为有效的理性统治工具。这一背景下，德意志各邦有了一个实际上的改革竞赛，偏居东北的普鲁士王国最终胜出。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政治体系再造，这个过程不同于英法等国早期的政治现代转型，也不同于低地和北欧小国的政治转型。错过构建利维坦国家先机的德国，始终面临内部对利维坦国家的抵制，更面临着先于德国的现代政治的压力：首先，德意志面临的是旧体系的全面失败，而非英国等国的部分失败；其次，德国面临更多的政治身份平等化的阶级压力，对于德意志而言，即便是君主的权威也必然是一个理性政治的接受，而非是绝对的天赋；第三，理性化统一的政治标准面对特殊化的封建关系的矛盾；第四，实现德意志政治整合的政治阶级内部矛盾，即普鲁士王室、军队系统与俾斯麦的行政外交系统。这些矛盾从普鲁士战败后的全面改革开始形成，直到最后成为德国一战失败的阿喀琉斯之踵。

如果追溯一下德意志政治整合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特点是自军事失败开始，到军事胜利结束。正是拿破仑一世靠军事胜利解除了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政治关系，普鲁士最终依靠对外战争重建了新的德意志政治关系。这一政治关系的重建，不再是基于上帝，也不再基于日耳曼传统部族关系，而是非常直接的武功。一八四八年革命，普鲁士国王拒绝了德意志议会授予的皇冠，这出于君权权威的考虑，更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如果普鲁士不能依靠军事胜利来确立自己对德意志地区的政治整合，那么政治基础是不可靠的。正基于此，军国主义成为普鲁士政治体系的内核，但是这远远不够。操作一个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现代战争，不可能是军队一家之事。普鲁士以来的支持战争的财政体系，完全是现代的财税体系。普鲁士建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奠定了工业化生产的基础。外交成为协调和组织战争的另一个重要政治工具。而普鲁士最早开始实行的义务教育系统，则是标准化地提高了国民的竞争能力。封建的人身财产关系也会破除，代之为私人产权的司法关系。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借助国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的理性架构，彼此独立，并没有隶属关系。奥托·冯·俾斯麦作为普鲁士的宰相统辖这一切，但是他的政治权威也仅仅是被国王授予的。俾斯麦并非责任内阁的首相，而是国王的宰相，因为国王的信赖而领导政府。他建立伟大的功业所运用的那些普鲁士的政治力量，本身是分散的，从军事到经济再到外交部门，乃至国会机构，都互相独立，并无隶属关系，凭借俾斯麦个人的高超政治能力才能驾驭。

德国统一战争，特别是对法战争的成功，造就了俾斯麦的至高权威，也给予了霍亨索伦王朝无比的荣耀。但普鲁士政治构造的失败扩散到了整个德意志，而且这一问题日益严重。由于在德意志统一和崛起的过程中，普鲁士议会的党派政治并没有审时度势成为一个重要的引导力量，反而因为俾斯麦的成功导致整个议会政治的附属化。传统的德国军队一军官阶层

因为战争的胜利，成为一个有效的政治阶层。文官阶层本身却因为体系的高度分割，未能成为可以与军官集团一较的政治集团。普鲁士王室上升成为德意志皇室，但是也助长了皇帝盲目的自信。对于老威廉皇帝、俾斯麦、毛奇、罗恩而言，武功的重要性他们非常清楚。但是他们更清楚战争的不可复制性，对于战争的审慎是他们比较一致的特点。虽然德国政治体系分散，但是因为内部私人政治的存在，这种私人的政治信任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老威廉因罗恩推荐而任命俾斯麦，毛奇则出于对君主的效忠，能承认俾斯麦的领导地位。但是后继者一旦没有这样的政治信任，则很容易造成顾此失彼，互相矛盾。

这一问题随着老威廉的病逝，俾斯麦的下野而彻底暴露无遗。德国军人对武功的推崇，德国皇室对武功的依赖，文官体系彼此不能一致，以及议会政治的依附性，导致了德国对战争的警惕性以及战争成本估计较低。一战从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开始，将整个德国政治的问题暴露出来。当德国无法像普法战争时取得明确胜利的时候，合法性的支持实际已经瓦解。对于当时的德国皇帝小威廉而言，君权的神圣性很快就因为战争的僵持而失效。没有一个责任化的政府的结果是整个统治体系无法找到一个替罪羊，也无法凝聚力量重整。事实上，英国和法国都重新做了政治整合，推举出新的责任政府，并且将各种政治力量汇聚到与德国的持久战中。最后的结果，德国皇帝丧失了皇冠，军队丢掉了佩剑。即便到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程度，德国的政治体系依旧各自为战。虽然都肇基于皇帝，但是所有的系统各自理性决策，虽然在竞争中一时能发挥德国资源人口的优势，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于偶发事件。

如果回头再看德国建构利维坦的成功与失败，其中的普遍性问题就非常清楚。当君主以绩效理性为政治原则，开始全面的政治现代化时，君主神圣的意识形态权威已经落入到了现实的竞争成绩中。如果整个体系继续扩大，而合法性基础仍然如此，君权不能以某种方式及时卸掉自己过重的负担，用比较理性的政治责任处理方式，保护自己的国家历史传统的正当性权威，让渡一种现实理性政治的合法性权威，那么这一政治体则是比较脆弱的。一旦对外竞争，特别是战争失败，新的体系首先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努力寻找自己的新合法性存在依据，其次君权本身也不会再被信赖。一般而言，因为所谓的后发优势，比较成功的改革者都善于驾驭各个系统，通过个人政治技术来处理这些问题，做出许多积极的创新，但是如果不能处理关键的问题，一旦遇挫，则非常麻烦。这里我将其称之为是“俾斯麦难题”，俾斯麦建立了伟大的功业，他个人获得了超级权力，但是却无法遗传并且找到保护这一功业的人，也无法把这一超级权力从偶然性变成一个必然可以移交的政治权力。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所依靠建立功业的体系本身，未必是要保护这一功业。既没有传统皇帝的威望，又没有现代议会的霸气，事实上导致了政治功业的继承和维护的难题。

这里必须要注意的是战争的影响，因为直接的战争竞争而获得合法性很容易导致对战争这一模式的认可和依赖。这种依赖是长期性的，不仅是对战争方式，而且是对战斗序列的组织模式。一战开始时，德国 93 位知名的科学家艺术家，签署了告世界文明书，内中明言“如果没有德意志的赫赫武功，就没有德意志的文化”。这可以视为一个最为基本的合法性判断，直到一战，德国的政治合法性还是建立在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时刻。虽然当时的德国有着种种的现代政治机制，俾斯麦也创造了许多政治技术，但是始终未能实现合法性的转移。德国的

政治合法性仍然建立在专制王权的胜利基础上。

这里德国遇到的问题并非是一个孤例，而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德国的问题在于德国没能解决这一问题，而解决这一政治合法性压力的办法往往是战争。事实上普法战争之后，法国基本没有实力再挑战德国。俾斯麦早就认定法国东山再起的机会渺茫，主动权更多掌握在德国手中。但是德国的军事系统并没有依据内政系统的判断行事，德国的外交系统则完全独立于政治体统之外，最后导致信息依据各自不同，判断各自不同。我们无法判断一战时期其他各国的责任，但是从统治系统而言，德国的确带有非常明显的军国主义色彩。德国的军事系统、内政系统、外交系统彼此分离，而政治合法性则非常明显的掌握在军事系统中。

我们还必须要认识到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一个有宪法的国家，而且有很强的宪制规范，也有着民主政治程序，并且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是和当代流行意义的“宪法”不同，德国宪法实际要解决的问题是授予权力，而非限制权力。德国希望的是通过宪法建立一个利维坦国家，并非其他目的。当代流行意义上，宪法是约束权力的机制。但是从长期历史角度讲，宪法和宪政则必须首先是对一个现代政治权力体系的认可。英国作为现代宪制之母，利维坦国家形成大概经历过三个王朝——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以及威廉王朝。都铎王朝首先建立了强大的 *absolutely sovereign*。王权作为纯粹的政治权力摆脱了对意识形态的依附，完全建立在现代意义的理性政治基础上。所以德国宪法本身有授权内容也并不奇怪，但是没有走完从授权到限权的过程，是德国最后的失败。而限权首先就是限制君主擅自对外作战，英国议会与国王的冲突就是起源于对外战争。传统意义的君主是上帝的第一骑士，但是上帝远离政治之后，君主就是国家的第一骑士。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连续自然承担这种角色，但是这种独断的军事权力背后要求的动员系统已经不再是一般传统政治的系统，而是一个完全的现代体系的税收支撑的系统。对外的军事竞争，首先是一个全面的政治算计，而非简单军事上的计算。这就要求国王作为政治领袖的身份高于骑士的身份，军事外交必须统辖在政治立法权力系统内。继而民族国家的单一外向军事竞争绩效标准演化为全面的竞争伦理的标准，而所谓的自然权利，可以比较明确的接轨自由权利。既是约束权力的基础，也成为权力基础来源的理性基础。正如丹麦历史学家格雷斯所指出的那样，“自由之所以发展成长，乃是因为对权力有益”。虽然德意志帝国的超级权力对德国人的权利有帮助，但是这种超级权力本身是分裂的，并不充分。

二，近代中国的权力再造难题

虽然作为一个欧洲国家，近代德国的遭遇非亚洲国家可比。但是作为普遍的情况，德国的问题并非是一个简单孤例。社会科学多个学科都注意到了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现象，也就是资本主义与现代政治从边缘地带兴起，或者说从不被人注意的角落爬出。从一定程度上讲，有其合理成分，但是从整个地理环境比较，作为人类文明非中心的地区，美洲和非洲也没有出现现代资本体系。可见所谓的边缘地区必须是文明中心地区的边缘地区，本身受到强大的核心文明压力，其竞争压力相对比较大，对于他们而言，变化是有利的。而一般处于文明核

心区域的国家，其原则要求是维持长期稳定，保持不变是有利的。对于长期处于中古中心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而言，它们是体系最核心的基础，变化最难，挑战也最大。这种变化与挑战在于如何在帝国的地理范围内，重建帝国。用芬纳的语言而言，可以是宫殿式，可以是广场式，也可以是广场+宫殿式，但是一定不能是宫廷+教会式和贵族+教会式，而此两者都是传统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组成方式。我这里暂时把俾斯麦的难题称为“帝国重建难题”，这里使用帝国两个字，并不是说这个国家是传统的有着宫殿政治的帝国，而是指这样一种地理区域的政治关系的多样性。神圣罗马帝国，本身是有着多样政治身份的政治社群——我这里使用这样一个词汇主要是指有着不同的政治关系组织的人群。对于这样的政治社群而言，帝国瓦解的灾难要比独立化大的多。发达地区，或者说竞争优势地区，希望摆脱较弱政治地区，但是其目的在于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而弱势地区寻求独立，往往是为了增强自己的优势。这其中造成的冲突，比帝国政治多样化造成的摩擦要严重的多。所以对于帝国的翻新者而言，除了要建立新型的政治统治模式，还要保证传统的政治社群关系逐步溶解到新的政治统治模式中来。在这一过程中，翻新者所依赖的不仅有理性化的政治统治技术，还必须要有意愿的说服能力。俾斯麦看重前者，但是并不看重后者。俾斯麦最早推行普选制度，但是又运用议会上下两院的办法，成功的将权力的中心归于联邦议会，形成了由过去封建诸侯代表，实际是职业官僚权力媾和的小圈子决策。这一政治格局的划分，基本反映了普鲁士再造德国的三次战争的实际战果。通过帝国宪法明确下来，俾斯麦利用权力分割的巧妙机制掌握了帝国权力，同时维持了普鲁士君主的至高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一个系统的政治领导人生成机制，太过独一无二的结果就是未来没有独一无二的人，政治就无法继续。故而所谓历史学家曾经指出的德国近代对世界吸引力最大的就是俾斯麦，任何一个希图强大起来的民族都希望拥有自己的俾斯麦。但是对德国而言，俾斯麦也是极其稀缺的。

位于欧亚大陆东侧的中国，事实上处于一个区域文明核心地区。虽然有过多王朝更替战争，乃至由边疆政权重建王朝。但是这种政治重整机制都是比较一致的，科层制行政管理体制的存在，税赋机制的存在，最重要的是科举机制的存在，这些都使得（强）宫殿+（弱）教会的体系得以继续循环。但是在近代遭遇强势的现代国家冲击时，这种传统政治统治的效率能力基本无法对抗。清帝国的瓦解，直接面临着几种可能：

第一种，在旧帝国疆域内生成几个现代的 nation-state，这常常见诸于理论家的思想，但是客观地讲只有在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有过少部分相对成功的尝试，大部分都失败了，成为另一种情况。

第二种，旧帝国主体变身成为 nation-state，其他的地区以政治社区形式成为其他国家殖民地。

第三种，旧帝国形成两到三个小型的 nation-state，并有一大批碎片化政治社区。一般而言这是第一种情况的变种，属于最常见的情况。

第四种，帝国刷新，在丧失了一些传统领地之后，重新建立新的政治统治系统。

这里必须要考虑到的是清帝国的政治本钱还有多少，一般而言，最坏的情况是第三种，也就是全面碎片化状态。但是传统中国政治有着从上到下的行政科层体系，其本身的内在理

性特征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可能。而且必须要注意的是，在面临现代的挑战之际，清政府做了许多调整。首先就是军事上挫败了太平天国、捻军、回民等多次政治上的挑战。这些叛乱运动，事实上都是政治社群对已经衰落了了的帝国政治的反动。可以想象，如果这些挑战成功的话，清帝国瓦解之后，很可能出现第三种情况，当然也可能出现第一种情况。通过这样一场战争，清帝国事实上建立了一种商业税收直接对接军事的财税制度，这就是地方督抚主持下的厘金—新军制。这也造成了清帝国的统治集团分成了两种不同税收对应的体系，田赋—皇权—科举官僚系统，厘金—督抚—洋务派。当然两者之间不是完全确定的，有明确界限的社会集团，而是非常模糊的，直到科举废除才有了较为明显的分野。同时清帝国也在地方施行了新的调账，首先普遍建立行省制度，废除了一些特殊的地方政治形式，在东三省设立了行省制度，新疆建立行省制。同时在湖广、两湖、两江、直隶等地区做了一些新的行政改革，中央建立了一些新的部门，力图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方式。虽然这一改革未尽其功，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第二种可能性相对比较小。

清王朝的这一政治努力，对于后世的影响很大，客观而言，形成了后来政治上的路径依赖。这一依赖往往不为后世重视。如果从具体的事实来看，清帝国的崩溃不应该从一九一一年开始算，而可能需要往前延伸到一八五零年，这是传统帝国的政治统治失效的时刻。清政府的选择是“帝国崩溃”之后走向第四种道路，刷新帝国，但是清王朝显然没有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那样的成功。辛亥革命从根本而言，是准备对政治统治做出一次改造，但就其理论而言，更倾向于第三条可能，既在原帝国的主体范围内建立一个完全单一化政治关系的 nation-state，其他的区域可以不必理睬。但与之并行的是清政府内部传统的皇权—科举官僚集团与督抚—洋务官僚集团的激烈斗争。以反皇权为口号的革命党，很大程度上属于政治变化中的变量。这一结果就是一九一一年，田赋—皇权—科举官僚集团宣布退出历史前台，而隐藏于历史后台，权力移交给了厘金—督抚—洋务官僚集团。实际掌握权力的就是这一集团中势力最强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这一集团的领袖袁世凯所依赖和继续的方向仍然是“再造帝国”，而非是寻求建立一个单一化的共和国。对于革命党而言，其革命目标事实上也做出了转变。孙中山期许袁世凯建华盛顿、拿破仑之事业，客观来看就是对革命党具体的目标的修正。相对于清后期掌握皇权的慈禧太后，袁世凯本人的政治权力要小的多，合法性也弱的多。袁世凯本人需要聚合权力，至少需要一种类似俾斯麦这样的“超级权力”，但是俾斯麦的授权来自于普鲁士国王，背后则是以普鲁士的赫赫武功为基础。袁世凯只有全面谢幕的清帝国的一纸诏书。而清帝国的谢幕直接原因就是武功不济，它没有在国家间直接竞争中取胜。当然这样的成绩袁世凯也没有，这一权力过度本身并非是超级权力授予过程，而是一个统治方式转变过程。另外一种方式，扩大自身的权力基础，也就是政治学者梅斯基塔 (Mesquita) 所指出的扩大自己的政治致胜联盟。这一方式通俗意义上是更多地依靠民众的支持，具体的政治行为要求就是给予人民更多的权利 (right)，继而有利于扩大自己的权力 (power)。虽然从定义上，两者都做了非常明确的划分，但是事实上，这两者都是以利益 (interest) 为基础的，每一种权利 (right) 都隐含着对权力 (power) 的划分。这对于袁世凯而言，也是非常之难的。袁世凯本身的政治习惯和取向，使他并没有相应的手段。而且袁世凯自己的致胜同盟，被总结为军绅势力的政治利益集团，其主要的组成部分是清帝国瓦解时代形成的督抚—洋务官僚势力，这一势力本身很难稳定扩大。其合法性还不断受到隐藏

在政治后台的皇权—科举官僚集团的挑战。对于深入基层政治生态的督抚—洋务官僚集团而言，合法性挑战往往来自于皇权—科举官僚集团，所以其更愿意追求稳定而非变化。这样的条件之下，袁世凯考虑成为一个合法的皇帝，重新进行权力组合就是非常自然的行为。这一方式在近现代世界并不鲜见，但是却极少有成功者。拿破仑一世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变身为皇帝的统治者，但是这首先在于拿破仑有着赫赫武功。而且拿破仑在成为皇帝之时，已经破除了旧的致胜同盟对自己的限制，他成功的实现了宫殿—广场政治的稳定。这些都是袁世凯所不具备的。袁世凯谋求“超级权力”的失败，从实际的政治结果来看，恰恰说明了“超级权力”的缺失，新的统治形式无法确立。从政治现实看，这个“超级权力”可以是实现新的统治形式的皇帝，也可以是其他人物，也可以是一个新的集团。虽然袁世凯未竟其功，但是这说明的是他不合格。对于其他的政治势力而言，都可以通过在竞争中获胜取得这一位置。这一点从孙中山之后的变化的就可以发现，原本孙中山依靠各地方势力联合，以形式上宪法的实现为基础。但随后，他迅速转变以建立直接的军事力量为依靠。从政治行为看，袁世凯和孙中山实际上走上了同一条道路。而蒋介石登上历史舞台，也正是在于他实际看破这一基本状况，真正开始争夺这一权力。

这里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比较，孙中山和蒋介石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将军的崇敬，并且以自己为凯末尔事业的东方接力人自居。从具体的政治处境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清帝国非常类似，都由尚武的军事集团缔造，都是多种政治关系组合，而且都被现代西方国家所击败，都有救亡图存的现实政治生存压力。但是两者之间的约束条件则有一些差异，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建立科层制的理性行政官僚体系，同样也没有科举化的政治阶层进阶竞争方式，而这些都是清帝国的基础制度。奥斯曼帝国拥有的神权化统治系统，其进阶带有竞争性，但是长期不负责具体行政军事。具体的行政军事由身份依附性的专业军事团体构成，也就是奴官系统。这些奴官受专门的训练，甚至会产生重要的政治家族，但是其政治地位完全由苏丹私人的政治关系决定，并没有独立的公共性。更为重要的是，地缘环境有着重大差异。奥斯曼土耳其是最后一个有跨洲际影响和冲击能力的古代帝国或者说东方帝国。对现代西方国家而言，奥斯曼是必须要拔出的威胁。所以受到的压力要比清帝国大。

所以奥斯曼帝国崩溃过程中出现了多种现象，首先是欧洲国家不断剥夺其附属国家，而掌权的军事集团则完全出于现实政治利害的角度考虑如何取舍其帝国疆域，许多地区被放弃。这一点与清代文官集团掌握军事大权，力图刷新帝国完全不同。文官行政是国家与社会统治和治理的核心，作为一种有着内在完全整齐的理性要求的政治机制，文官行政系统有着捍卫帝国疆域的强烈意志。这既是出于传统儒法政治观，更是出于现实政治利益。一般如果帝国不能保证疆域，则对文官行政系统造成直接政治损失，所以清帝国晚期推广行省制非常成功，得到了文官行政系统所有派系的大力支持。但是奥斯曼帝国想要破除米特制，则非常困难。奥斯曼帝国最具政治能力的阶层，还是传统的奴官军事集团，这一集团衍生出现青年土耳其党等现代政治组织。并且在小亚细亚半岛，帝国的心脏地带，重新建立了现代土耳其民族以及 nation-state。这一组织的领袖人物凯末尔将军，获得领袖地位的直接依靠仍然是出色的军功。凯末尔的军事天才使之克服了希腊以及英法列强的干预，在国家间竞争中获胜，并建立了政治基础。而奥斯曼帝国曾经的疆域里，确实也建立了希腊这样的

nation-state, 但相当多的地区则以政治社区的形式成为殖民地、托管地和依附地区, 更严重的是形成了巴尔干政治碎片带, 这显然是帝国解体过程中多种政治关系不能有效理性处理造成的死结。对于中国而言, 虽说确定以“刷新”帝国为目标的政治, 但是在袁世凯之后, 已经变成了一个直接的军事较量。但是与职业军人掌握政治的土耳其不同, 中国是政治掌握了军事。所以中国在权力竞争中, 实际上已经确定了具体的政治目标, 而这一政治目标其实又超过当时中国各方的实际政治能力。这一点和土耳其军人从政, 比较从现实取舍, 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样的直接结果有两个: 第一, 竞争更为残酷, 持续更久; 第二, 政治阵营重组频繁。这成为后袁世凯时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特色。■

法政篇

中共“道统”的歧变？ ——以如何处理与孙中山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慕容实

在中国历史上，“道统”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最初由韩愈提出。按照他的说法，这个“道”是儒家之道，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孟传承不息，之后中断千年，韩愈将其接续起来，代表了天地之正气，伦理之正则。韩愈“道统说”的提出，是针对李唐王朝佛道的兴盛而发，具有很深的现实关怀，也启发了宋代以下的儒学经师。

一、中共有“道统”吗？

对于传统儒学之“道”，中共的理论家大多抱着研究僵尸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表述，已经比较客气，实则从未将其纳入自身意识形态建构的讨论之中。而中共自身也并无“道统”之说。但是，从中共对其自身理论来源的追溯及其发展轨迹的表述来分析，它虽然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大致还是存有共通之处。

从意识形态的粗线条来看，中共自创党至今的历史，似乎可以从延安整风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理论上奉马、恩、列、斯为圭臬，行动上接受苏联的指导和帮助；后一阶段则呈现三个特点：一、继续认可理论的源头，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马克思；二、在表述中特别突出中国特有的国情（中国特色）；三、实际权力的最高领导人也是理论最高水平的代表（君师一体）。

一个举世皆知的事实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共尽管对自身意识形态有迥然不同的解释，但始终以“发展”、“创新”的名义，强调这种不同没有质的差异，只是量的随机应变。毛、邓时代如此，邓后迄今亦如此。换言之，中共关于自身“道”的解说可以千差万别，但是道统却一脉单传、赓续不断。所以我们认为，中共尽管没有关于自身“道统”的表述，却有道统的事实。

这里无法对中共的“道”做面面俱到的解说，尤其若要做历史的考察，将是一个极其庞大的题目。但这个清晰的“统”，与宋元以下历代王朝无异，也就是君师合一。本文要考察

的所谓“岐变”，是一九二零年代到抗战前，其间的变奏与孙中山密切相关。

二、中共对于所谓“孙中山道统说”的反应

中共没有关于自身“道统”的直接表述，但是国民党有。关于孙中山道统问题，是孙中山去世之后国共党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反映到学术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

一九二五年七月，也就是孙中山病逝四个月后，戴季陶在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一本仅六十页的、名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的书。他通过对孙中山五种主要著作（《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军人精神教育》、《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研读，得出两个结论，其中一个：“一、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¹

为了论证他的说法，戴季陶还炮制了一段孙文与俄国顾问的对话，蒋介石也随之主动做了伪证，成为数十年来被许多学者广为摘引的经典。这段话全文如下：“去年有一个俄国革命家去广东问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先生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者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那人不明白，再又问先生，先生仍旧把这一句话来答复。”²

戴季陶的道统说，在国民党内产生了重要影响。蒋介石还主动为戴季陶做了伪证。在后来的多次讲话中，他对与戴季陶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支持。例如《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1931年）、《进德修业与革命之途径》（1933年）、《在庐山军训团的讲话》（1934年）、《总理遗教六讲》（1935年）、《三民主义之体系及研究程序》（1939年）等来看，他不仅完全赞同于戴季陶的说法，还言之凿凿地声称这位俄国革命家（马林）与孙中山谈话地点是在广西桂林，而他本人也在现场见证了这次谈话³。但是，事实绝非如此。排比史料发现，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都不在桂林，而孙中山与他们声称的俄国革命家马林谈话时，此二人均无在场的可能。胡适曾遍翻孙中山的著作集，找不到此种说法的依据，因而发生过疑问。但是这桩弥天公案，直到一九八五年一月台湾学者李敖发表《孙中山、蒋介石与道统》一文，才揭开了戴季陶炮制的过程，也从历史的细节上推翻了蒋介石的伪证⁴。

¹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上海民智书局1925年7月版，第36页。

²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第33-34页。

³ 蒋介石的原话如下：“……总理讲这句话是在广西桂林，我当时也在桂林，那个俄国共产党问总理的时候，我也在那里。共产党当时只是宣传，头一次越飞还没有来，那个俄国革命党人并不是俄国人，而是瑞士人，也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后来他又称此人为瑞典人。

⁴ 李敖：《孙中山、蒋介石与道统》，收入李敖《李敖大全集》第11册之《蒋介石研究六集》，第11-27页。顺便一提的是，李敖的研究并没有立刻引起包括台湾学术界的注意，1985年11月在台北举办的“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研讨会”上，还有学者援引戴季陶的说法为立说依据，并为戴与蒋介石说法之不同疑惑不解，但是虽疑惑不解却笃信不疑，足见戴氏学说影响之久远（见贺凌虚：《儒家思想对孙中山先生政治思想的影响》，收入《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一册“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1985年12月31日出版）。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则是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蔡和森就曾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孙文主义就是大众哲学，是关乎人们衣食住行的普通作品，根本不需要什么哲学基础。对于戴季陶所谓的“道统说”，中共也是绝不认可的。

除了不认可这一理论本身，中共与国民党人都心知肚明的是这一理论背后的现实关怀。当时，国民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国共两党并未撕破脸皮。邵元冲在戴季陶《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一书的跋文中，就点明了这一点。

“今天的中国人，大家是一点自信力都没有了。‘中国人’三个字，成了最恶劣、最丑陋、最腐败的形容词。‘外国的’三个字，便是代表一切真善美。尤其受了一点科学教育的人，更加如此。在另一方面，守旧顽固的势力，和政治的支配阶级势力，深相结纳，把科学文化发展阻碍的水塞不通。一般青年，在这两种思想的诱惑和暗示之下，不生崇拜金钱万能的利欲病，便害梦想一跃而实现共产的懵懂病。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唤起青年们国民的觉悟，鼓舞起独立的精神，培养出判别是非的能力，使他们事事都晓得注意时和地的关系，认识中国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国家的危亡，恐怕不能得救。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大党，从质和量两面说，都没有别一个政治团体能够和中国国民党相比。现在中国国民党党内的纠纷，也就不易决。就今天中国的情形来说，一定要能够统一国民党的道理，才是能够统一中国的道理；换一说话，也要真是能够统一中国的道理，才能够用来统一中国国民党。想到这一点，更看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这一部小册子用意之深刻、关系之重大了。”⁵

再来看戴季陶本人的说法：“为什么要创出一种主义来要求多数人信奉呢？我们可以晓得，凡一个主义创制的时候，一定在同时或以前，另有别种主义存在，创制新主义的人，认为那些主义不适宜，那些道路错了。为了要排出别种主义，然后才创出一种新的主义。就这样看来，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一定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假如这几种性质不具备，这一个主义，一定生不出信仰，生不出力量。一定只能成为一种消极的思想，而不是一个主义。”⁶

由此可见，戴氏提出并发挥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具有明确的意图，即在于确立一种新的主义、排除“之前或同时”的其他各种主义。更明确的现实落脚在于，“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⁷强调国民党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就当时而言，就是排斥共产主义思想，为清除共产党制造理论基础。由此也就可以了解，蒋介石以及其他反共人士，之所以因袭戴氏学说的缘故了。

⁵ 邵元冲：《读〈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书后》，收入戴季陶著《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附录，第98-99页。

⁶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导言》，见氏著《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第3页。

⁷ 同上，第4页。

观察同一时期中共方面的对“戴季陶主义”的反应，就更能了解个中缘故。一九二五年九月，由中共机关报《向导》推出“向导”丛书之《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陈独秀、瞿秋白等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对戴季陶进行反驳。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文的开篇即说：“最近国民党中发现‘戴季陶主义’的运动：理论上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 C. P. 的跨党，甚至于反对 C. P. 的存在。”接着，他又分析说，“戴季陶等这种思想的根本点，便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竟只是仁慈忠孝的伟大人格，竟只是继承尧舜禹汤周孔的道统——戴季陶又继承孙中山的道统！这算是中国的特别文化，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责任，竟只是在‘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作慈善事业，当作孙中山戴季陶等一些‘君子’爱民的仁政。其实三民主义是很简单明了的中国一般民众——各阶级所共同的政治要求，并用不着什么哲学基础。”⁸“戴季陶等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运动，实际上是把国民革命变成狭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目的，成了正中国民族之‘哲学思想’、‘孔孙道统’、‘国民文化’，甚至于‘血流’的久长和多量；要做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运动，却又不许有阶级斗争，只许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作基础。”⁹

这便是孙中山去世后，国共双方关于所谓“孙中山道统说”的一次较量。一九二七年，两党的完全决裂后，这一争论的中心正式演变成成为谁是孙中山真正信徒和谁背叛了孙中山。

三、谁是真正的中山思想的信徒？

讲道统其实是讲现实。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高层的权力格局极其复杂，党、政、军的领袖尚在逐鹿。蒋介石拥护戴季陶的“道统说”，其目的是以孙氏道统的正宗传人自居，试图由此与党内大佬胡汉民、汪精卫抗衡，更藉此整肃其他的反对派（如邓演达、李济深等）。所以说，戴氏“道统说”的提出和蒋氏的大力支持，主要意思固然是打击和排除中共，但顺带确立党内新格局也是其中重要的目标。

对于中共来说，严厉抨击、否定这种道统说，最初的指向在于否定中山先生事业继承人具有唯一性的说法，由此论证自身革命的合理性，从而抨击破坏国共合作的理论和行动。但在国共彻底决裂之后，再去追究孙中山的道统问题，对中共而言，起码在谈合作的问题上，就意思不大了。至于国民党内反蒋各系，亦莫不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但在不同时期之反应亦有不同，这是自不待言的。

但是，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中共并没有放弃孙中山的旗帜。他们一直不遗余力地以“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叛徒”来抨击蒋系国民党政权，以被出卖、被迫害的、值得同情的真正的革命者的名义开展活动。不过，由于这一时期中共面临的军事斗争极其严峻，内部争斗也十分

⁸ 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收入《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第1-2页。

⁹ 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收入《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第8页。

复杂，要真正重新树立起孙中山这面旗帜，是到延安之后的事。

而要举起孙中山的旗帜，首先就是要辨明谁是孙中山真正的信徒。对于这个问题，国民党人当仁不让，不屑于讨论，但是共产党却一定要找个标准出来不可。这个标准就是毛泽东所谓的是否遵从了“真正的三民主义”。他说：“这种新时期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¹⁰

一九四五年，毛泽东曾经说过一段话，值得注意。他说，“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的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¹¹

在孙中山的著作中，的确多处提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等论断；他也曾多次对批评社会主义的人进行理论上的严厉批评。这自然成为被中共理论家视若瑰宝，论证自身与孙中山的赓续相承。

很明显，如果确实有这么个东西，一九二零年代后半期与中共决裂、与苏俄决裂，无疑就是国民党背叛孙中山的铁证，而中共才是受到迫害的、值得同情的真正革命者。国民党人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因而他们绝不承认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更不会承认中共提出的所谓“三大政策”。

事实上，“三大政策”的概念的确后起的，孙中山生前从来没有使用过。研究标明，这个概念的出现，最早不早于一九三六年十月。有意思的是，三大政策的提出，是由宋庆龄、何香凝等人联名做的提案中首次使用的，最初的提案起草人却是中共重要成员潘汉年。但就是这个概念或理论，成为中共与国民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要标杆，影响至今；也成为国民党史学家及后世史学家聚讼难解的一个课题。

四、回归学术的歧异

一九四九年之后，孙中山在大陆被定性为民主革命家，以其革命先行者的地位，得到中共一如既往的尊重。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著文宣称，“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

¹⁰ 毛泽东：《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论三民主义》，胶东新华书店 1946 年版。

¹¹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 4. 24），《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21-322 页。

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¹²

但“继承者”毕竟与“信徒”相去甚远。一九四九年后，蒋氏父子治台时期，孙中山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体，其生平行谊、思想的研究，以及具体应用等，几乎深入各个学科领域。与大陆几乎同时期对毛泽东的神化并无二致。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后、改革开放前，对于孙中山的处理，好似神坛边上陪祭的木偶，可以供奉，不能亲近，遑论深入体味。开放之后，研究的环境逐渐松动，又有获得海外华人华侨的支持的实际要求，孙中山的位置似又稍稍靠近主流一些。于是，孙中山研究的热潮，在一九八零年代开始轰轰烈烈展开。但是，即使在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孙中山研究也主要局限在历史学、哲学领域，罕见其他学科的参与，至于指导现实运作的作品几乎没有；而反观台湾学界，尽管早已将孙中山请下神坛，甚至将其塑像打翻在地，但在稀疏的研究作品中，仍多以关怀现实、指导现实的内容为主。

这似乎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解读，对于国民党或者台湾学人而言，研究中山思想的现实意义，是一以贯之、不曾停歇的工作；而在大陆，这种研究似乎主要是策略性的，从未付诸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实践。■

¹² 《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56页。

经济篇

谁掌控中国金融系统？

作者：聂日明*

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指从事金融服务业有关的金融中介机构，为金融体系的一部分¹³，同时还有金融体系的底层服务机构与监管机构，以此共同组成金融体系。虽然中国存在着庞大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但它们大多依附于正规金融系统，地位与角色严重受制于监管政策。因此，本文着重讨论正规金融系统的控制权。

1、概览金融机构

根据央行规范¹⁴，中国金融机构包括如下：

一、货币当局：1、中国人民银行；2、国家外汇管理局。

二、监管当局：1、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1、银行；2、城市信用合作社（含联社）；3、农村信用合作社（含联社）；4、农村资金互助社；5、财务公司。

四、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1、信托公司；2、金融资产管理公司；3、金融租赁公司；4、汽车金融公司；5、贷款公司；6、货币经纪公司。

五、证券业金融机构：1、证券公司；2、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3、期货公司；4、投资咨询公司。

六、保险业金融机构：1、财产保险公司；2、人身保险公司；3、再保险公司；4、保险资产管理公司；5、保险经纪公司；6、保险代理公司；7、保险公估公司；8、企业年金。

七、交易及结算类金融机构：1、交易所；2、登记结算类机构。

八、金融控股公司：1、中央金融控股公司；2、其他金融控股公司。

九、新兴金融企业：1、小额贷款公司；2、第三方理财公司；3、综合理财服务公司。

结合这一规范，根据机构监管条线，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组成包括如下机构：

鉴于中国目前机构监管的特征，各金融机构的准入、业务审批等均受限于其监管上级，由具体的司、局、部（委下面的部）进行管理。

*作者邮箱：nieriming@gmail.com，本文系《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中的利益攸关者》的节选，系未定稿，请勿引用，本文所有言论与所在机构无关，仅代表个人观点，欢迎批评指正。感谢马翼与龚于的助研工作，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收集、梳理了大量的文献与数据。

¹³ 在中国，能称得上是金融机构的，是有许可证的，一定是正规机构。还有为数庞大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如标会、和会、P2P网站等，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¹⁴ 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编码规范》，从宏观层面统一了中国金融机构分类标准，首次明确了中国金融机构涵盖范围，界定了各类金融机构具体组成，规范了金融机构统计编码方式与方法。

金融机构概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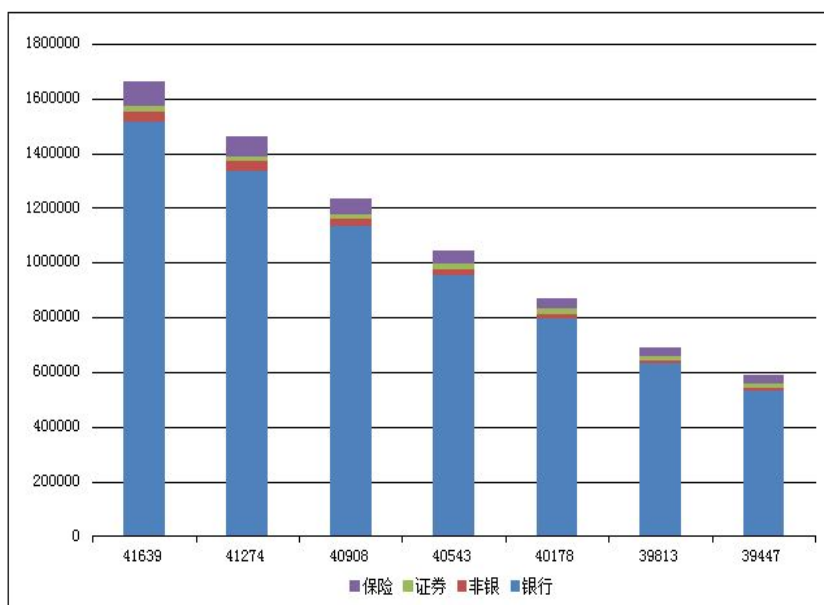
监管机构	信用中介类	融资中介类	交易平台类	登记结算等
央行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第三方支付	央行清算总中心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上海清算所 中国银联（卡组织） 征信中心、评级公司
银监会	国有银行（5家） 股份制银行（12家） 政策性银行（3家） 城市、农村商业银行、村镇 邮政储蓄银行 外资、合银、信用社等	信托公司（65家）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家） 金融租赁公司 汽车金融公司 贷款公司、货币经纪公司 P2P 贷款		
证监会		券商（投行）及其资管 基金及其资管 期货公司 投资咨询公司	固定收益证券综合交易平台 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 各商品、黄金、期货交易所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保监会		财产保险、人身保险 再保险公司、保险资管 保险经纪、代理、公估等		
地方政府		小贷公司、农村互助社 金融控股公司		
未定		金融控股公司 第三方理财、民间借贷 风投、私募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笔者自制。

2、概览金融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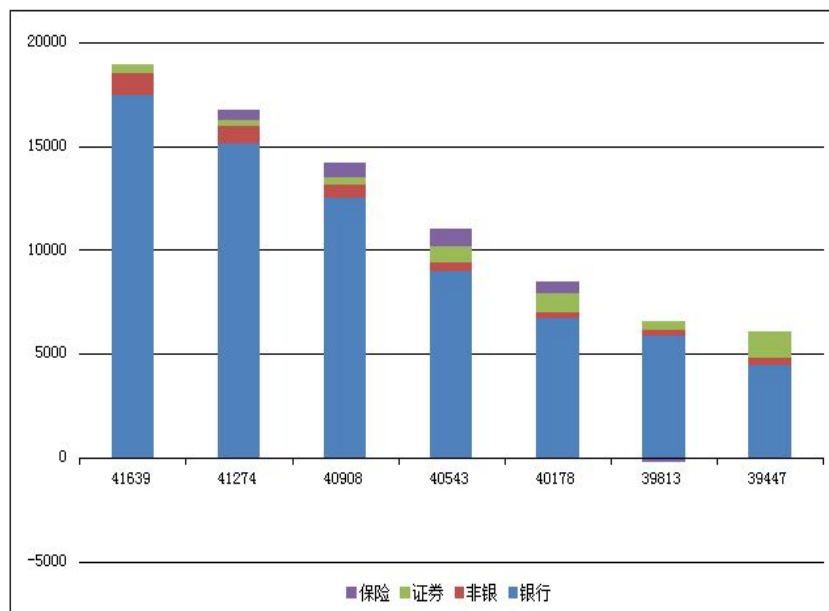
中国存量金融资产，主要是银行为主，占有绝对的优势，近十年以来虽然有下降的超势趋势，但仍然高达 90%。这显示着中国仍然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

金融业总资产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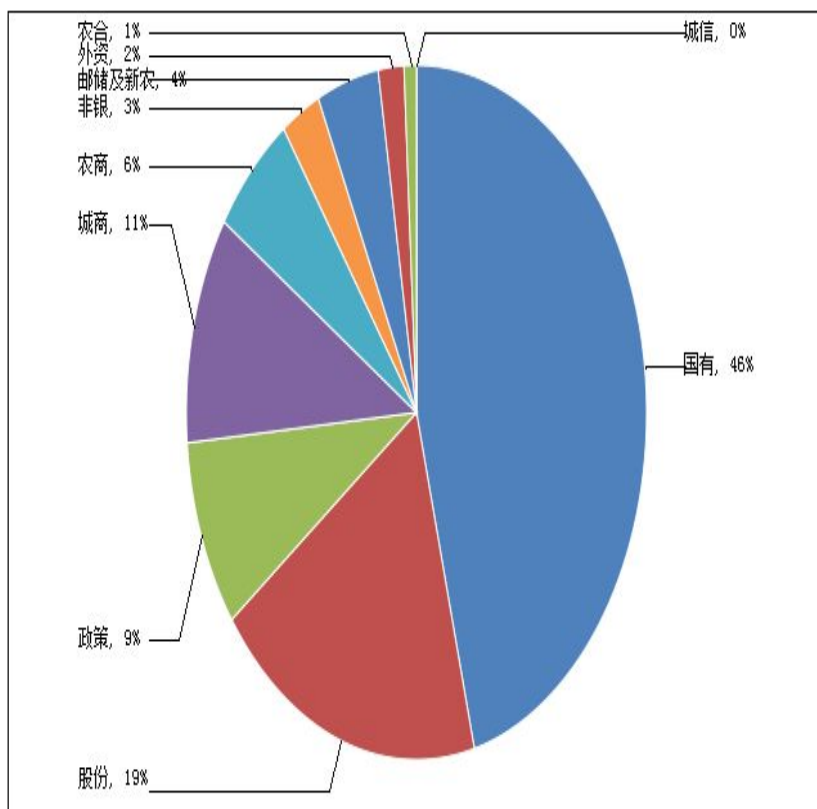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单位：亿元

金融业净利润规模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单位：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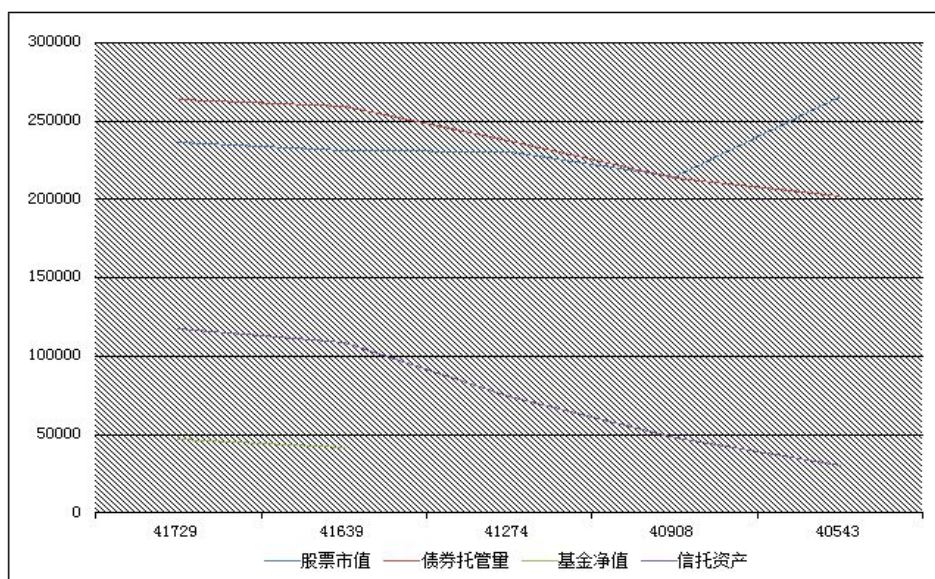
银行业构成：国有银行主导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按总资产规模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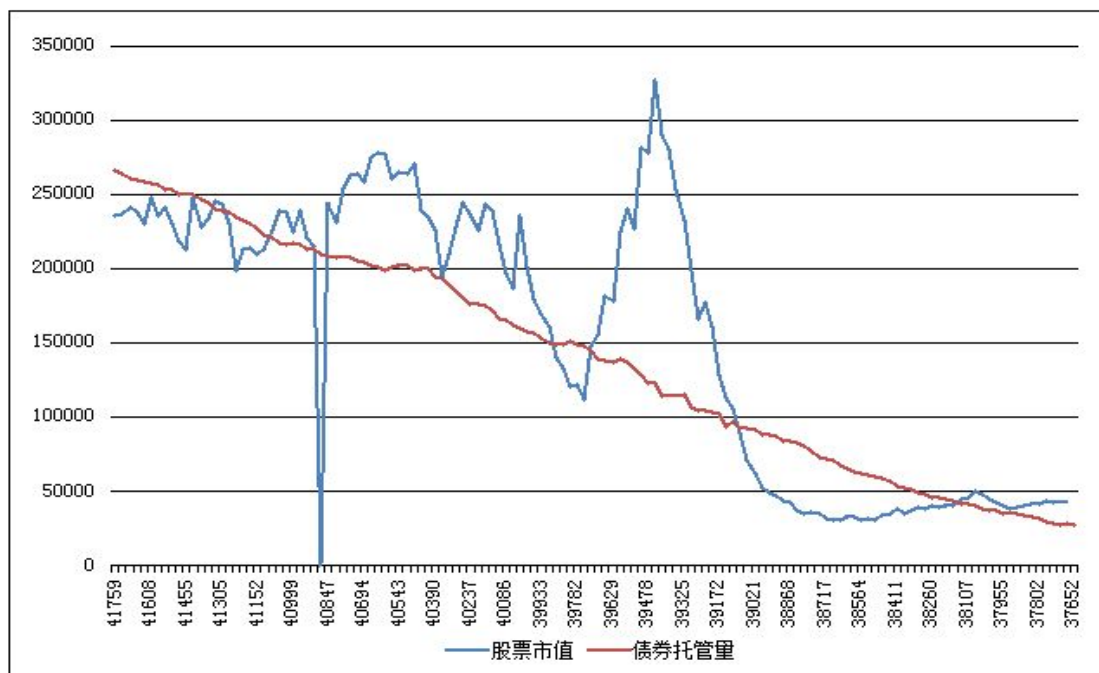
中国直接融资市场以债券和股票为主，近年信托业发展迅速，管理资产总量已经接近股市或债市的 50%。近年股市低迷，而债市暴发，债市存量市值已经超过股市。

管理资产或市场总量：股市与债市双雄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单位：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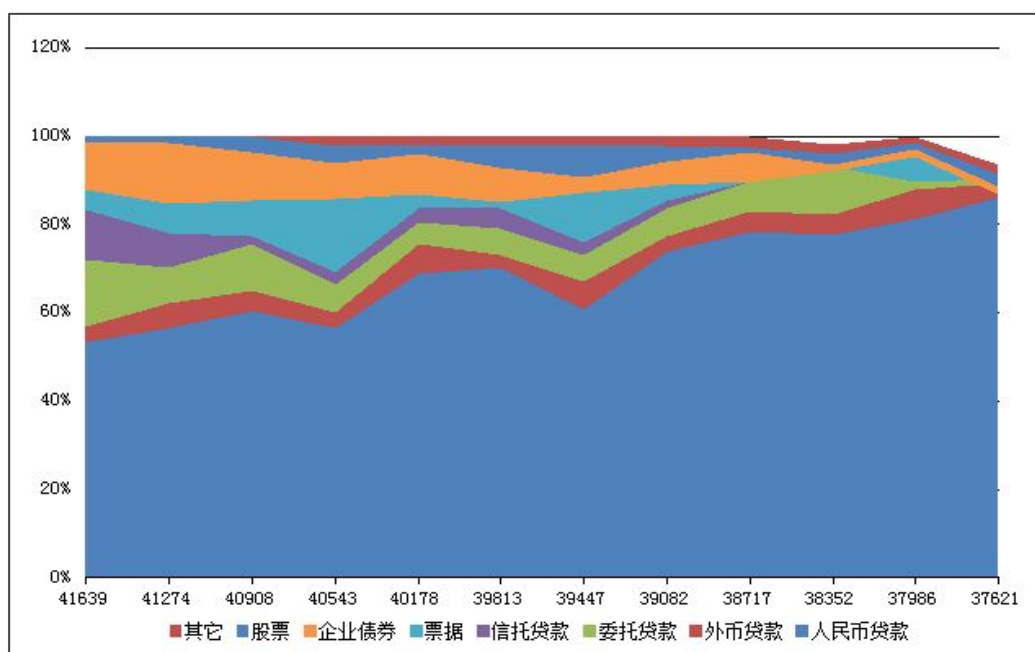
资本市场的两大主体资产存量：债市超越股市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单位：亿元

虽然银行资产总额依然占全社会金融系统资产的绝大部分，但金融脱媒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信托、银行理财等直接融资规模越来越大。

社会融资规模：直接融资占比提高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

注：社会融资规模为央行在 2012 年新推出的指标，主要是当月、年新增的融资量。

3、重要的金融机构

A) 主要银行，按总资产计算，前十家分别为：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国开行、交行、招商、浦发、兴业。

	资产，占行业比	利润，占行业比
前十家	92 万亿，61%	12459 亿，71.4%
前四家	63 万亿，41%	8080 亿，46.3%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笔者计算。

B) 主要信托公司，按管理的信托资产计算，前十家分别为：中信、建信、兴业、中融、中诚、长安、外贸、华宝、平安、英大。

	资产，占行业比
前十家	29090 亿，39%
前四家	15770 亿，21%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笔者计算。

C) 主要券商，按总资产计算，前十家分别为：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国泰君安、广发证券、华泰证券、招商证券、国信证券、银河证券、中信建投、申银万国。

	资产，占行业比	利润，占行业比
前十家	9781 亿，47%	227 亿，51.6%
前四家	5486 亿，26.3%	8080 亿，25.6%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笔者计算。

D) 主要基金管理公司，按管理的基金规模计算，前十家分别为：天弘基金、华夏基金、嘉实基金、南方基金、工银瑞信基金、易方达基金、广发基金、博时基金、汇添富基金。

	管理资产，占行业比
前十家	20877 亿，57.3%
前四家	13327 亿，36.6%

4、主要金融机构的所有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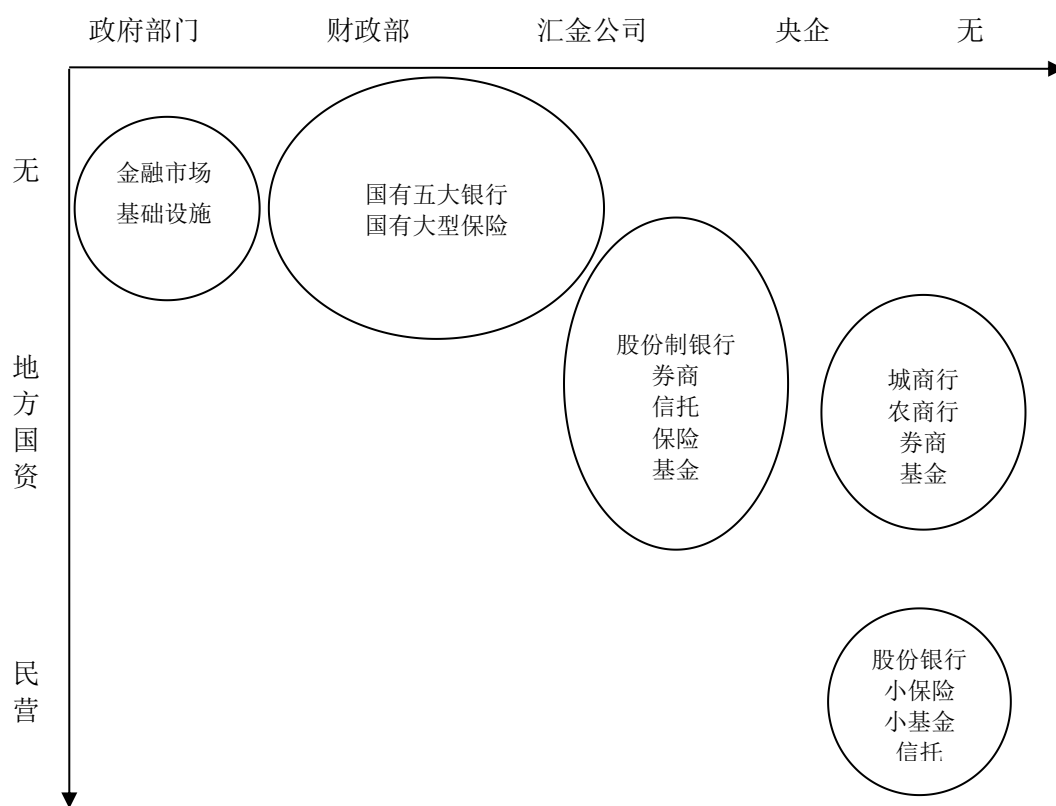
如何控制一家金融机构？一家上规模的普通公司，受《公司法》等制度的约束进行人事任免和公司治理，符合“三会一层”议事规则，即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决策体系。股东大会为最高决策机关，由此产生董事会、监事会（或监事）和公司高管。

同时，中国现行的《公司法》等在保护小股东利益、限制高管权力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安排，虽然还有相当可以改进的空间，但应该说，还是比较符合当前国际通行的规范的。

但长期以来，《公司法》在国内执行的并不是很好，大量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不符合《公司法》要求，国有企业的管理更是远远背离《公司法》等法律制度的规范，离现代公司治理的原则相去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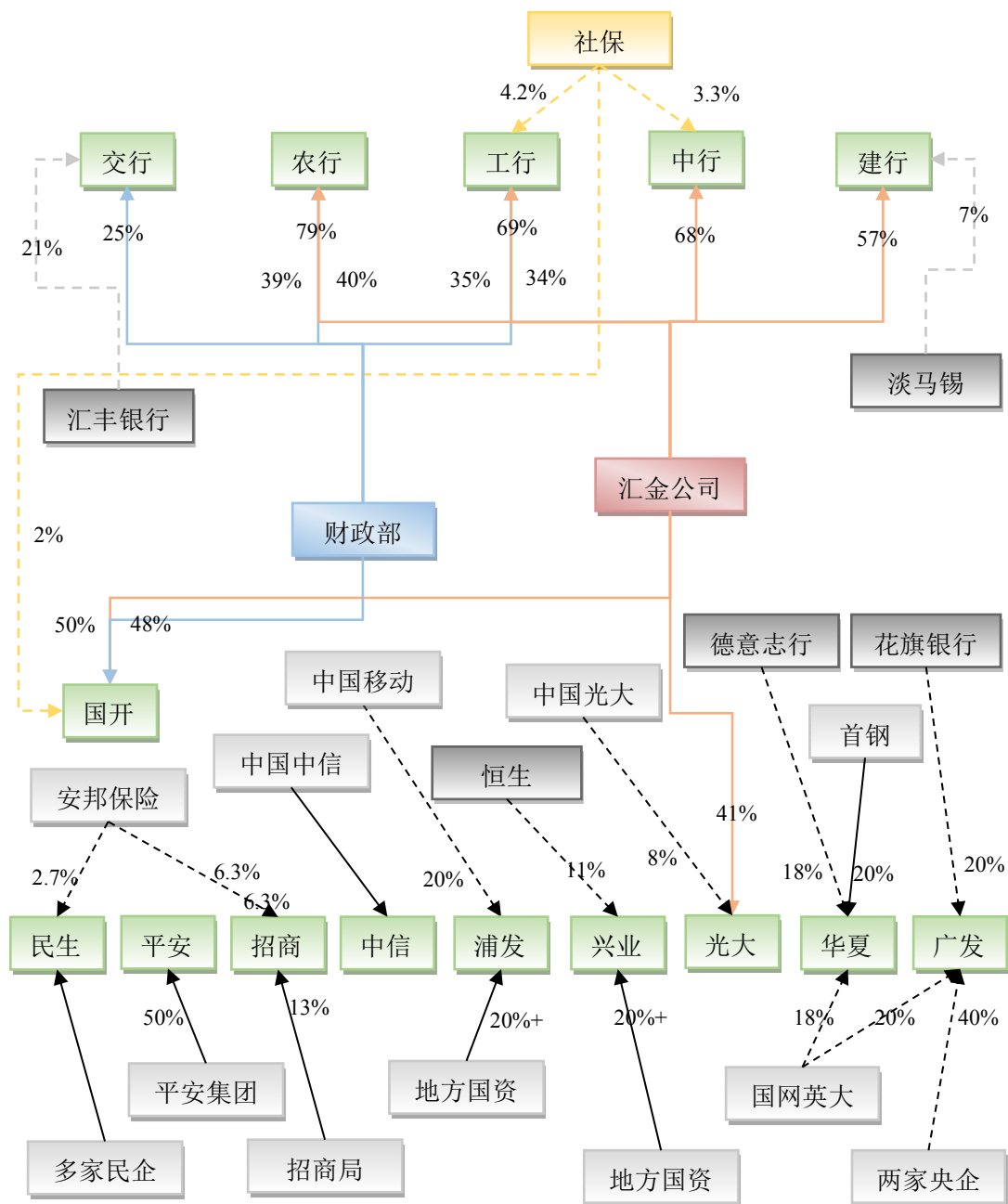
一般来说，一个公司内，三个方面的内容比较重要：人（人事任免与辞退）、事（业务管理）、财（利润分配、薪酬、剩余索取权等）。通常来说，所有权是决定所有这些权力的基础，在基础之上，才能谈人、事、财。

中国金融机构所有权全景图



资料来源：根本上述所有权数字绘制。

主要银行的所有权人



资料来源：综合各银行的公司年报及网站汇总，笔者自制。

部分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

	第一大股东	股份	地方国资	股份	外资股	股份	央企股	股份	民资股	股份	年报时间
北京银行	ING 银行	13.6%	京国资 京能投	13.9%	ING 银行	13.6%	中信证券	3.88%	华泰汽车	4.5%	2013
南京银行	南京紫金	12.7%	南京紫金 南京高科	23.9%	巴黎银行 QFII	16.78%			沙钢	1.5%	2013
宁波银行	华侨银行	13.7%	甬开投 甬电投	18%	华侨银行	13.7%			雅戈尔 华贸集团	11.1% 8.32%	2013
上海银行	沪联合投资	19.2%	沪联投 黄浦国资等	25.3%	汇丰	8%	建银投资	7%			2011
上海农商行	澳新银行	20%	上海国际 上海国资 上海盛融	24.93%	澳新银行	20%	太平人寿	7%	日照钢铁 深圳联想 绿地地产等	15.95%	2013
江苏银行	江苏国信	10%	江苏国信 凤凰传媒 无锡建投	21.4%			东方资管	3.31%	华泰证券	7.03%	2012
杭州银行	澳联银行	20%	杭州财政 杭州汽轮 杭财开投	27.63%	澳联银行	20%	太平人寿	5.98%			2012
徽商银行	安徽能源	9.99%	安徽能源 安徽信担 安徽国元 安徽高速	34.34%					中静四海 (杉杉集团)	5.44%	2011

资料来源：各银行的年报。注：灰色底纹标注，意味着该机构为实际控制人。

主要信托公司的股权结构

	第一大股东	股份	地方国资	股份	外资股	股份	央企股	股份	民资股	股份	年报时间
中信信托	中国中信	80%					中国中信 中信兴投	80% 20%			2013
建信信托	建设银行	67%	合肥兴泰控股 合肥国资控股	27.5% 5.5%			建设银行	67%			2013
兴业信托	兴业银行	73%	兴业银行 福建华投 南平投资担保	73% 9.33% 0.84%	澳国民银行	16.83%					2013
中融信托	经纬纺织	37.5%	哈尔滨投资	21.5%			经纬纺织	37.5%	中植企业集团	33%	2013
中诚信托	中国人保	32.9%	兖矿集团	10.2%			国华能源 中国人民保险	20.4% 32.9%			2013
长安信托	西安投资	41.3%	西安投资	41.3%					上海证大 上海淳大	30.3% 11.7%	2013
外经贸信托	中国中化	96.2%					中化财务 中化股份	3.78% 96.22%			
华宝信托	宝钢集团	98%	舟山财政局	2%			宝钢集团	98%			2013
平安信托	中国平安	99.9%	上海糖烟酒	0.12%					中国平安	99.9%	2013
英大信托	国网英大	84.6%	济南市能投	4.38%			国网英大 中国电力	84.55% 5.21%			2013

资料来源：各信托的年报。注：灰色底纹标注，意味着该机构为实际控制人。

主要券商的股权结构

	第一大股东	股份	地方国资	股份	外资股	股份	央企股	股份	民资股	股份	年报时间
中信证券	中信集团	20.3%	南京高科	0.59%			中信集团 中国人寿 华夏人寿 运载火箭 中信国安	20.3% 5.38% 1.18% 0.97% 0.58%	南方东英	0.65%	2013
海通证券	光明食品	4.4%	光明食品 上海海烟 上海电气 申能集团 久事、友谊、 兰生、文新	4.40% 4.18% 3.93% 3.36% 8.54%							2013
国泰君安	上海国资	32.99%	上海国资 上海国际 深圳投控 上海城建 深证能源	32.99% 11.82% 10.56% 4.27% 2.53%							2013
广发证券	辽宁成大	21.12%	辽宁成大 吉林敖东 中山公用 粤财信托 信宏资管	21.12% 21.03% 11.6% 3.56% 4.73%			酒泉钢铁	4.44%	香江集团 安徽华茂 亨通集团	4.77% 2.18% 1.77%	2013
华泰证券	江苏国信资产	24.42	江苏国信 江苏交通 江苏高科	24.42 8.48 7.05			国华能源 金城集团	3.13 1.95	海澜集团	1.42	2013

			江苏汇鸿 江苏苏豪	6.17 7.93							
招商证券	深证集盛	28.78	河北港口 华强新城市 广州海运	4.83 2.96 1.47			深圳集盛 深圳招融 中国远洋 中国交通 招商局	28.78 13.30 10.85 4.60 3.80			2013
国信证券	深圳投资	40	深圳投资 北京城建	40 4.9			华润深国投 云南红塔 中国一汽	30 20 5.1			2013
银河证券	银河金控	69.23	上海农商行 兰州银行	1.46 1.20			银河金控 人民财保	69.23 1.52	健康元药业	0.38	2013
中信建投	北京国有资本	45	北京国资	45			汇金公司 中信证券	40 7	世纪金源	8	2014
申银万国	汇金公司	55.38	上海久事 中国小商品	13.38 1.38			汇金公司 光大集团	55.38 12.51			2013

资料来源：各券商的年报，笔者整理。注：灰色底纹标注，意味着该机构为实际控制人。

主要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结构

	第一大股东	股份	地方国资	股份	外资股	股份	央企股	股份	民资股	股份	年报时间
天弘基金	天津信托	48	天津信托 芜湖高新投	48 16					内蒙古君正	36	2013
华夏基金	中信证券	62.2	山东农经开	10	加拿大能源	10	中信证券 南方工业	62.2 7.8	青岛海鹏	10	2013
嘉实基金	中诚信托	40			德意志资管	30	中诚信托	40	立信投资	30	2012
南方基金	华泰证券	45	华泰证券 深圳投控 厦门国信 兴业证券	45 30 15 10							2012
工银瑞信	工商银行	80			瑞信银行	20%	工商银行	80			2013
易方达基金	盈丰投资 广发证券 广东粤财	25 25 25	广发证券 广东粤财 广东广晟	25 25 16.67					盈丰投资	25	2012
广发基金	广发证券	48.33	广发证券 烽火通信 粤科风投 康美药业 前海香江金控	48.33 16.67 8.33 10 16.67							2013
博时基金	招商证券	49	广厦建设 天津港	2 6			招商证券 长城资产	49 25	璟安股权 丰益\盛业	6 12	2012
汇添富基金	东方证券	47	东方证券 文新报业	47 26.5			东航金戎	26.5			2013
银华基金	西南证券	49	西南证券 东北证券 第一创业证券	49 21 29					山西海鑫	1	2013

资料来源：各基金的年报，笔者整理。注：灰色底纹标注，意味着该机构为实际控制人。

主要保险公司的股权结构

	第一大股东	股份	地方国资	股份	外资股	股份	央企股	股份	民资股	股份	年报时间
平安集团	深圳投资控股	6.08	深圳投资 深业集团	6.08 2.11	隆福集团	3.02	同盈贸易 商发控股	4.98 3.11	林芝新豪时	2.55	2013
中国人寿集团	财政部	100					财政部	100			2012
中国太平洋	申能集团	13.69	申能集团 上海海烟 上海国资 上海久事	13.69 5.17 4.68 2.77			华宝投资 云南红塔 全国社保 宝钢集团	14.17 1.92 0.87 0.76	爱建信托	0.96	2013
新华人寿	汇金公司	31.34	上海商言 华泽集团	1.16 1.02			汇金公司 宝钢集团 申银万国 中信集团	31.34 15.11 1.17 2.06%	北京弘毅	2.59	2013
中国再保险	汇金公司	84.91					汇金公司 财政部	84.91 15.09			2013
农银人寿	农业银行	51	重庆国信 北京中关村	15.01 14			农业银行 新纪元	51 9.8	上海安尚	9.8	2013
泰康人寿									陈东升		
安邦保险									陈小鲁		

资料来源：各保险的年报，笔者整理。注：灰色底纹标注，意味着该机构为实际控制人。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股权结构

机构名	分类	角色、作用	性质	股东	交易规模	主管机关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	登记结算	大部分债券的登记与结算	公司	央行、财政部及九家金融机构		央行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清算所）	支付清算	短期债券的清算	公司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债登、印钞造币、金币公司		央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登记结算	股票的登记与结算	公司	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监会
央行清算总中心	支付清算	央行、银行和社会提供基础性支付清算	事业单位			央行
中国银联	支付清算	银行卡支付清算	公司	82家金融机构发起，152家股东，印钞公司与五大行持股25%		央行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交易平台	机构投资者的同业业务，单体最大的金融市场	事业单位			央行
固定收益证券综合交易平台	交易平台	部分债券交易平台		上交所内设业务平台		证监会
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平台	股票交易平台	会员制	全体上市公司		证监会
各商品、黄金、期货交易所	交易平台	各类交易平台	会员制、公司	有的是会员制，有的是公司		证监会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平台	融资融券	公司	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证登		证监会
央行征信中心	信用评级	自然人与组织	事业单位			
国内评级公司	信用评级	企业信用评级	公司			央行

资料来源：各机构网站汇总。

股权结构的基本结论

第一，银行业存量资产占金融业资产的 90%以上，其中五大国有银行占银行业总资产 43%。这意味着**五大国有银行的总资产占到全社会金融资产的 40%左右**。

第二，财政部与汇金公司两者，以绝对的优势控制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以第一大股东控制了交行、光大。这意味着，**中国金融资产中超过 50%是由财政部和汇金公司联合控制的**。

第三，汇金公司原先由央行监管，现在转移为中投公司下属公司，中投的董事长均为财政部的副部长等，这意味着，**汇金与财政部为一致行动人，中央政府通过财政部控制着中国金融业的半壁江山**。

第四，地方政府与央企控制了其余金融机构的绝大部分，控制了**中国金融业另半壁江山**。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股份制银行基本上由地方政府和央企设立，至今多数仍然为实际控制人**。

第五，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多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在银行改革大潮以来，**地方政府仍然为城商行与农商行的实际控制人**。央企、外资与民营分享了这一盛宴，但其中大多数仍未上市，退出渠道尚不明确。

第六，信托、券商、基金股权结构分布基本相同，与股份制银行相近，多为央企和地方政府所设，经过多年的股权变更，民资、地方国资、央企股份、外资间的转让，多数公司的股份已经相对多元化，但**地方国资与央企投资控股公司仍然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主要的信托、券商、基金**。

第七，依规模大小，大保险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国有商业银行相近，为财政部与汇金控股，小保险机构与券商相近。

第八，以安邦保险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在金融市场中崭露头角，开始进军银行、券商等机构，部分机构已经实现了银证保的全牌照。其与安邦保险不同的是，他们不像安邦那样公开在资本市场上举牌，而是通过分散持股或者多公司形成一致行动人，例如肖建华的明天系。

第九，**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几乎全部控制在政府手里**，次重要的机构，虽然是会员制机构或者公司，但会员大会名存实亡，主要负责人均由政府任命。

最后，国有股也并非铁板一块，以股权作为控制权的抓手，需要明确国有股份的实际控制人。银行改革之前，财政部是四大行的唯一股东。中行和建行采取的方案是，将原有全部资本金冲销坏账，财政部的权益被尽数冲销，在此基础上央行以外汇储备注资，并透过汇金公司持有两家银行 100%的股权。

而在工行与农行的改革中，注资方案不再用原有全部资本金冲销坏账。2005 年 11 月，新《公司法》明确了财政部作为国有金融机构出资人的地位，中国财政部随后参与了工行的股改。因而，财政部将依然保留部分在工行、农行的权益，与注入外汇储备的汇金公司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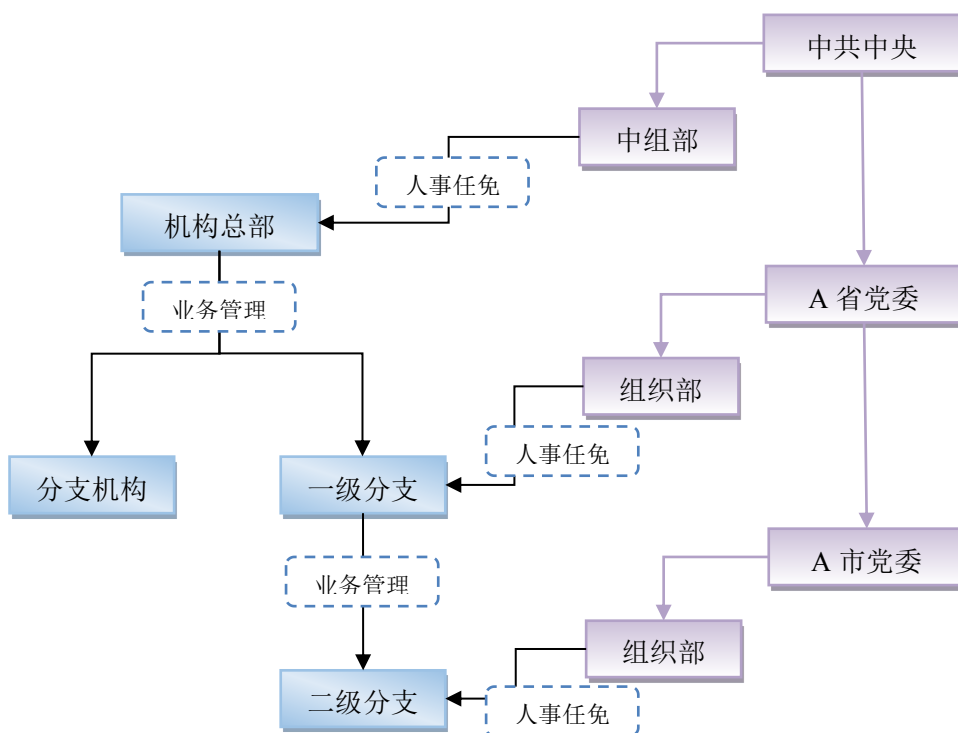
成为新工行的股东。汇金公司将不再是工行的惟一股东。更有媒体指出，“在对工行的注资中，财政部不愿意再像在建行、中行股改中被‘晾在一边’，将力争成为工行注资方案中的‘主角’”，为此不惜承担 2350 亿的贷款损失（工行不良贷款 4700 亿的一半）。

而汇金公司，在工商登记中是财政部的全资子公司，5000 万元注册资本金为财政部出资，但其运用的资金却来自央行的外汇储备。郭树清与谢平执掌汇金公司的时代，一般认为汇金公司是由央行控制的，为此引起财政部的不满。最终在财政部的努力下，汇金公司被中投公司吸收，成为中投的子公司，回归到财政部的控制之下。

5、人事任免权

现有中国金融系统人事任免框架是在 1998 年之后慢慢形成的。涵盖了两条主线：党务与高管。但在 1998 年时，这两条线并不区分，因为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起现代的企业治理，人事基本上由党委组织部管理。

金融机构管理结构图（98 年前）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当时，包括央行在内，很多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甚至完全处于地方政府的控制下，总部对分支机构失去控制。“为地方政府发展出力”，“在本地吸储、贷款用于本地”成为通行的做法。

基于这种背景，自 1998 年以后，在朱镕基的领导下，中央开始金融集权（后面详述），

从党务的条线对主要金融机构收权,实施垂直管理,上收金融机构各分支机构的人事任免权。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体制,加强和改进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¹⁵中,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金融机构系统党委和中央金融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

文件明确了主要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为中央管理¹⁶,中国人民银行¹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各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的干部实行垂直管理,中央金融工委管理深度下沉至分支机构一把手¹⁸。以此隔绝了地方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当然,为了减轻地方的反弹,文件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分行,中国证监会地方证管部门,各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交通银行省级分行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省级分公司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各金融机构党委决定前还应听取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委的意见,如有不同意见,由中央金融工委进行协调。

其中,中央金融工委书记由国务院副总理兼任,设副书记两名,其中一名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各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党委分管党的工作的副书记及中央金融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书记担任工委委员。中央金融工委书记、副书记和委员列入中央管理。

在机构业务管理条线,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¹⁹,从任职资格、任职资格审核与管理、任职资格取消等方面对金融机构的高管任免规则进行限定。这时,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人事任免拥有两条较有约束力的权力:不通过任命的权力,免职的权力。

随着2003年中央完成金融集权,中共中央金融工委撤销,金融体系的党委监管权分别下放到各监管机构,被监管金融机构的党组织关系分别设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由他们“代管党的组织关系”。

而业务管理条线的任职资格的审查与终止的权限移至各监管机构,分别制定了行业的“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包括银、证、保在内,均有相应的管理办法,涵盖所有主要类型的金融机构。

¹⁵ 中共中央于1998年5月19日发布,中发[1998]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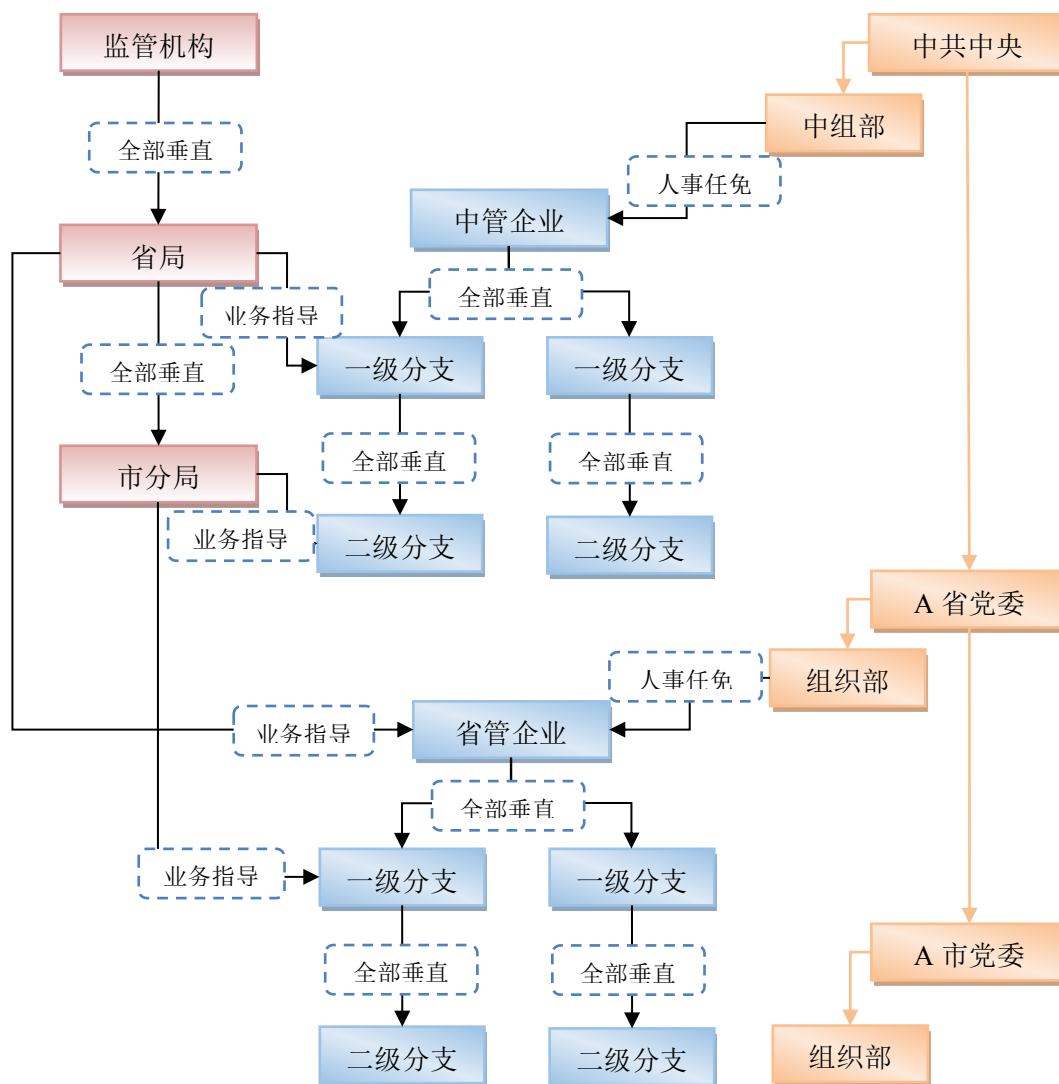
¹⁶ 201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进一步发文《中管金融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明确了中管金融企业。一般认为包括: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包括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太平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银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集团公司、光大(集团)总公司、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等金融企业。

¹⁷ 当时银监会还未成立。

¹⁸ 各金融机构的省级分支机构、派出机构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各金融机构党委决定前应征得中央金融工委的同意。

¹⁹ 中国人民银行令(2000)第1号。

金融机构管理结构图（现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而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党委与业务两条线的管理，在中共中央金融工委时代，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党组织设置、领导关系和工作职责，由地方党委参照该通知精神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规定。城、乡信用合作社的党组织，由所在地的市、县委领导。地方性金融机构的跨地区分支机构党组织，一般实行属地领导。演变到现在，各地情况均不相同。

典型的人事任命案例：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

招商银行，为股份制银行，招商局轮船为实际控制人。马蔚华为该行第二任行长，2013年年中为招商银行第八届董事长届满换届之时。换届之初，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招商银行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的议案》，其中执行董事候选人3名：马蔚华、张光华、李浩。董事会同意将上述候选人名单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产生股东董事9名、执行董事3名、独立董事6名，共18名董事组成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对3名执

行董事候选人和6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以普通决议案进行等额选举,即选举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表决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马蔚华原定是可以继续执掌招商银行的。

但随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2013年5月9日审议通过了取消原提交到本次会议审议的该项子议案,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马蔚华先生按其本人意愿,不再参加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选举。大股东招商局轮船提交了《审议及批准委任田惠宇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提案。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聘任田惠宇先生为招商银行行长。2013年9月9日,招行公告,接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招商银行田惠宇任职资格的批复》(银监复[2013]454号),核准田惠宇先生招商银行行长的任职资格。

与招商相近,工商银行行长的人事任免也基本类似,虽然在组织架构与法律程序上,中管金融企业满足了董事会基本需求和法律要求,但实际上,企业是没有发展自主权的,董事会并不能代表出资人的角色行使权利。新的国有银行董事会虽依据《公司法》有权向中组部建议罢免行长,但考虑到中央国有资本和地方国有资本对金融机构的控制,目前还没有出现董事会这样做的情况。

这种奇特的人事任免权,与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权、《公司法》等存在冲突,现实中也爆发了相应的案例。

任职资格审核与组织部任命高管²⁰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在修订《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规定》时,征求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意见。1998年7月17日,中组部函复:“鉴于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领导干部的任职,中央均进行全面考察,并征求有关方面(包括人民银行对其任职资格)的意见,因此,金融系统属中央管理的干部任职前可不再单独进行资格审查”。中组部的意思为,中组部任命的金融机构高管,监管机构无须再履行核准职责。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回复为,“我行认为,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任职资格审查,是我国法律授予中央银行的职责,也是国际通行原则。为了加强人民银行依法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核和管理,妥善处理与党的组织部门考核任命干部的关系,我行起草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银行依法审核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与党的组织部门考核任命干部关系的意见》(附后),现送你部进一步征求意见”。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在我国有关干部的任命由党组织决定,并通过一定法律程序公布。为此,需要妥善处理好人民银行依法审核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与党组织部门考核任命干部的关系”。为此,央行坚持“中央组织部和中央金融工委作出任命后,要由拟任职的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提出任职资格审核的申请,由人民银行发出任职资格审核文件”。

²⁰ 银函(1999)281号

所有权（出资人）与人事任免权的冲突：中再集团董事长刘京生辞职²¹

2008年8月，中国再保险集团原董事长刘京生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递交了辞呈。《中国金融》报道称，薪酬问题是导致他离开的直接导火索。

中央汇金公司在注资中再集团以后，其时谢平为汇金公司总经理，风格强硬，以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向企业派驻董事并介入公司决策。作为中管金融企业的高管，当时，刘京生年薪为200万人民币。中央汇金认为中再集团的高管薪酬发放程序存在问题，高管薪酬的考核及发放并未经过董事会讨论。公司董事长的薪酬应该由董事会决定，这一质疑完全符合现代的公司治理原则。

但中再集团方面则回应称，刘京生的薪酬标准是“党委定的”，而所谓的党委，是指上级党组织，亦即中国保监会党委。“表面上看，这是中再集团的董事会与党委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很多人都知道，董事会的背后是大股东中央汇金，而党委的背后则是保监会。”

最终，刘京生未能进入新一届董事会。

2009年6月，中再集团领导班子的党组织关系和人事任免权，从保监会划至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公司”）。划转后的中再集团人事任免权和党、团、工会等组织关系与中投对接，保监会只负责对中再集团高管的资格核准，对其任职资格进行行政审批。

6、业务监管

业务监管²²是金融机构中最为庞大的、最具寻租空间的权力，准心就是以市场准入、业务审批为主的管理。近年来，经营监测越来越成为央行、银监会的主要工作重心。

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机构管理：包括市场准入，分支机构设立，人事任命核准与终止等。

第二，业务监管：金融产品的各个方面（价格、面向对象、治理机制等）。

第三，经营监测：以合规和风险防范为基础的各类基于指标的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

业务监管权、所有权与人事任免权的冲突：央行设立上清所边缘化中债登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是中国资本市场乃至金融市场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基础设施。但由于设立之初央行未考虑过其后来的影响会如此之大，中债登的财务与基础管理在财政部，人事任免权在银监会党委，央行拥有业务监管权。显然财政部是中债登绕不过的重要主体，但一直以来，央行都希望将中债登的人事管理权收归到自己手中，但始终未能如愿。

于是，央行决定成立上海清算所，力推自己对口监管的机构做大、做强。尽管业务高度重合，但人事权分属两个部委的中债登与上海清算所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名义上，上清所执行中央对手方（Central Counter Party，下称CCP）清算机制，区别于中债登的双边

²¹ 中管金融企业“人事权”之争，《金融世界》2012年08月号。

²² 由于这一块被市场所熟知，所以本文从略。

清算机制，丰富了市场的竞争。但央行将其负责审批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逐步移至上交所。2013年债市危机以来，央行借此债市整顿契机，加强了银行间债券市场规范管理，未来中债登将更加专注于国债、央票和金融债。而企业的信用债将更多集中于上交所。

7、财权等基础管理

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分置，不受《公司法》等法律约束，更体现在资产转让、收益回报、薪酬制定等方面。从2003年至今，中管金融企业²³的基础管理职能，主要由财政部金融司承担，包括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的基础管理，即相关的统计备案工作；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转让、划转处置管理，监交国有资产收益；拟定金融机构的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并监督其执行，如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商业银行的拨备和核销政策及报批等。

8、不算结论的小结

从股权上来看，财政部是中国金融系统的实际控制人；从业务监管权来看，对中国金融系统来说，央行是相对强势的控制人，“央妈”称号也缘于此；从人事任免权来看，银监会的人事任免权覆盖到的资产总额，是金融系统内最大的。

但控制权也无法一概而论，被控制机构对监管机构甚至更高层的游说能力惊人。金融系统中，四大行对国务院、央行和监管当局的影响力非常大，目前“一行三会”的负责人一般都从四大行中产生，四大行的负责人又从监管当局中产生，金融高官与机构高管交替升迁的路径已经程序化。所有的监管机构在监管金融机构时，都需要考虑被监管机构领导人未来的可能性，不可能无差别监管。■

²³ 非金融央企的相关职能已经移交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经济篇

改革进入深水区，次序渐重于进度

作者：楼晟

随着政治格局在周案公布后进一步明朗，诸领域的深化改革措施明显有提速的趋势。但在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局中，单一的措施以及单一领域的改革的得失并不容易衡量，更难以点去评价整个改革层面的成败。甚至可能会出现因为改革进程的步调不一，造成缓不济急、欲速不达的混乱局面。因此，除非以军事政治为剑，否则要解开当下国内的“高尔丁结”，还是得靠“慢工细活”，从线头做起。所以当展望未来的政策走向时，我们也应着重分析其内在逻辑联系，而不是单纯被领导层一时的推动力度牵着鼻子走。

目前可循的几条线索是：

1、随着房地产市场限购的放开与五个地方 AMC（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央政府推行的新政治路线的目的已经初步达到，经济有了托底，中国经济中短期上硬着陆的担忧已经不复存在。

2、虽然有了托底，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依然没有头绪，不论是产业升级、拉动内需、城镇化以及混合所有制，都非一日之功且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争议。

3、七月，央行第一次明确给出了希望在两年内完成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时间表”。财政部正式开启地方与中央财权事权的新一轮划分。同时，全国各地的混合所有制提速推进。

4、将在 10 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以“依法治国”为主题。

据此我们首先可以认为，资本市场在三季度的上升走势应被看作价值修复性反弹，且反弹的力度会较为有限。但由于解除了系统性风险的困扰，虽然市场整体虽然难有太大作为，但局部性与结构性亮点依旧会持续。

然后是对于新增长模式的探索，可以看到的是不论是产业升级、拉动内需还是城镇化，都无法独立的改变目前国内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三者必须结合才可能真正推动经济模式的转变。

以产业升级来说，就不是单纯的一种技术追赶或展开与国外同类产业竞争。毕竟作为产业技术上的后发国，即便中国产品缩小或赶上了与国外产品的差距，在欧美主要市场的贸易

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环境下，也难以形成压倒性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因此，产业升级其实还是瞄准内需，以替代国外同类产品，挤压外资外商同类产品在国内市场份额为目的。

而在拉动内需上，地方与中央在财权事权的重新划分无疑对拆除流通与运输环境的藩篱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财政部与地方谈判必须要有相应的筹码，否则在房地产市场预期扭转、土地财政每况愈下的背景下，再要让地方从本已捉襟见肘的税收中让出一块，不啻是天方夜谭。这个筹码目前来看，只能是以房产保有税为核心的财产税，同时中央政府还应对地方债问题进行一次性的兜底。再结合央行关于利率市场化时间表的设想，可以认为对于地方债的系统性处理应在 2 年内见分晓。而混合所有制实际上也可以认为至少在地方层面上，是含有很大的资产清理、摸家底的性质。至于央企层级的混合所有制，则实际上依然未见分晓，目前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水和油放在一起搅混，要真正做到水乳交融，还需要加入催化剂。

所以，在中国经济的转型问题上，时间跨度应该至少在 2-3 年以后，其标志性事件应是房产税的敲定。在此之前，不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实体经济，调整依旧是大方向。不同的是这个调整已经不再包含系统性风险因素，资本按其规模大小，在这一过程里都可以找到合适自己的潜伏点。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主题虽然表面上不涉及经济与资本市场。但由于其肯定要发布对国家未来管理模式与权力结构的纲领性文件，会通过改变资本与权力之间的交易、游戏规则，来影响国内经济与发展模式的走向。 ■

学社讨论：简评《改革进入深水区，次序渐重于进度》

作者：聂日明

楼兄的文章提供了很多不错的思路和判断，例如在两年内解决房产税的立法问题，这也是财政部的时间表，最早于 2016 年出台系统性的房产税方案。

我与楼兄一些相关的观点如下：

1、财税改革比金融改革要更能重塑央地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例如，如果放量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会冲击现有的央地格局，对金融集权形成挑战，中央将缺乏制约地方的抓手。

2、房产税是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利器，虽然会出台，但非到不得已的时候，估计很难大面积展开，作为一种直接税，征税合法性将受到严重挑战，政府必须做出非常积极的改变，才能应对。

3、混合所有制要和央企降薪放在一起看，可能非简单的国退民进，而是拉平不同资本间的地位差异，引入市场资本制约国有资本。同时央企降薪，逼退精英对国企的热衷，使其下海。

4、前述所有事项，没有提及改革的动力，个人认为，改革动力还在于引入开放，让外国的压力作为推动中国改革的动力。■

阶级篇

中国工人行动的新灯塔

作者：詹妮

去年被捕的深圳工人领袖吴贵军，于今年5月底被无罪释放后，立即投入到工友的维权行动中。他的新浪微博签名是：“劳动最伟大，工友最可敬！”几个月来的几起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劳工维权事件，从湖南常德沃尔玛维权事件，哥式比女工争取裁员补偿，石岩奇利田工人争取社保和薪资福利，再到最近的广州大学城环卫工的集体维权行动，都能找到吴贵军的身影。

吴贵军去年5月参与迪威信厂工人争取搬迁补偿的维权行动，被深圳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扰乱交通秩序罪”起诉，并被刑事拘留。

在今年2月的庭审上，吴贵军没有被国家机器吓倒。他的自辩铿锵有力，他向社会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工人采取合法的手段维权是正当的，他没有犯罪，不需要在公检法面前低声下气。

5月底，检方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对吴的起诉。至此，吴贵军已经在拘留所里度过了371个日夜。与家人团聚后，吴贵军立即向宝安区检察院申请刑事国家赔偿。宝安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判给吴贵军7万余元的无罪羁押赔偿金。

吴贵军案是中国工运史上不能忽略的一个标记。在过去四年里，工人罢工、游行、抗议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因参与罢工而被控刑事犯罪的案例极少，而被拘留1年多之后又被无罪释放的，吴贵军是第一个。

吴贵军不仅仅是一名维权工人，是迪威信厂300多名工人推选出的工人代表，他也是中国的劳工活动者们的榜样，为中国工人运动注入了正能量。

现在全国范围的工人行动此起彼伏。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群体事件地图，今年8月的工人抗议、停工事件就有100多起，其中讨薪的有46起，要求社保及各种形式的补偿的有22起，要求涨薪的有15起。

我们很难统计这些工人行动的结果。是的，中国工人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但工人在维权、争权的过程中还是要面临现实的斗争，不仅要与资方周旋，而且要与街道办、区工会、市工会、省工会、劳动局等政府各部门打交道。由于缺乏有力量的工会，行动起来的工人缺

乏组织、力量分散、缺乏团结，使工人在集体维权行动很容易退缩，受到资方甚至当地政府的分化。即使得到了胜利的果实，以后的斗争也很难有持续性。而也是因为这种“野猫式”、突发式的罢工，使工人行动成为中国政府维稳的一大难题。

吴贵军的出现，很可能改变这个局面。吴贵军在迪威信工人维权过程中的信心和坚持，以及最终的胜利，使他能在工人中建立难能可贵的信任，成为工人的代表和领袖。理性、有策略、有组织的产业行动，劳资政的三赢，也因此成为可能。

2009年张海超开胸验肺开创先例，获得当地政府的特事特办，之后积极为其他尘肺病人提供法律、媒体资源策略维权，成为全国尘肺病工人维权的灯塔。而吴贵军，也可能成为下一个张海超。■

学社讨论：简评《中国工人行动的新灯塔》

作者：王明远

吴贵军让人看到中国工人维权的活力，但是吴贵军最后无罪释放并获得国家赔偿，并不仅仅因为他的魅力与智慧。我们更应该看到背后劳工NGO（如番禺打工服务部），以及法律界力量在工人维权中的作用。另外，近年官方工会也在悄然发生一些变化，开始较为主动地为工人提供维权服务。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中国的工人维权朝着更高水平、理性，以及长效性方向发展。■

社会组织与互联网篇

身份冲突

——官导民族主义与基督教教会增长之间的关系

作者：李晋 马丽

继 1989 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之后，随着东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瓦解，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已经不足以为中共政权提供一种合法性来源；经济发展和 GDP 增长逐渐取代政治意识形态，成为中共的统治合法性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也出现一宗由官方引导和渲染的民族主义思潮，甚至在结社自由受限制的大环境下，发生过很多次官方引导的民族主义抗议和社会运动。

同时，随着基督教近些年在中国社会的增长，尤其是向城市阶层的传播，使另一种带有普世色彩的价值观念得到更多承认。我们在对非官方基督教会田野调查中发现，非官方教会成员普遍都对社会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抗议游行持负面评价。本文认为，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单位制度的瓦解，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一种社会心理上的身份危机，一方面这种危机被市场化和物质主义填补，另一方面官僚资本化和市场中的乱象也使这一危机更加突出。此时，官方大力引导的民族主义，和广泛传播的基督教信仰，都提供了身份认同的资源，但前者缺乏真实的社群关系，仅表现为激烈的游行和暴力行为，或是一种修辞上的想象的共同体；而基督教教会本身组织所必需的社群组织，给个人提供了一整套超越世俗国家观念的身份认同资源，从而消解了人对民族主义理念的接纳度。

本文也回应世俗化理论和传统的民族主义研究，这两种路径都把民族主义作为 18 世纪以后一种宗教信仰的替代品，让宗教不再是必需的。但是，在 21 世纪的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基督教信仰的增长，恰恰消解了官方倡导的民族主义观念。

现代中国社会民族主义的起源

杜赞奇曾在他的专著中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进行了出色的梳理。他认为，自 1900 年起，反宗教运动是构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起源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对宗教活动的清理，说是为了造就真正的国民，实际上是用民族主义身份，构建出可反对的“他者”。²⁴ 反基督

²⁴ Duara, Prasenjit.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教运动把基督教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将其作为一种对立方，以此激发出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最著名的例子是1900年前后的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口号背后的，是将在中国传播的基督教构建成敌对方。²⁵ 在五四运动（1919年）前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觉醒”被认为是推动现代中国社会运动的动力。正如Pye所说的，“Nationalism in China has steadfastly involved hostility toward one or more foreign nations...In contrary, the more sober expressions of nationalism—the early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or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movement of the 1920’s—have tended to founder.”²⁶ 由于民国政府没有禁止基督教的发展，教会组织的发展一度显著。²⁷1920年代在知识分子中出现的由民族主义转化来的反基运动，也是同一理念。²⁸

1949年之后的共产主义政权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也将社会网络关系、信任和个人身份认同完全与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尽管共产政权可以通过物质所有权来划分阶层，但宗教组织发展到各个阶层内，如何将这些带有其他意识形态的团体进行区分和改造，成为一个重大理论难题。中共使用的一个重要历史契机就是朝鲜战争，这次战事导致中国国内与外界的封闭。共产政权，首先将群众运动和一系列的政治宣誓，对于其拥护者和反对者进行了区分，拥护者和组织被吸纳入极权主义政体之中。²⁹

在取得自由派教会领袖的支持之后，共产党提出中国教会应该与境外教会脱离，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组织，否则教会就丧失了民族性，很可能帝国主义渗透的工具、成为颠覆国家的敌对势力。³⁰“基督教革新运动”将基督教组织变成“新政权的一个积极力量”。³¹并且由已经进入中共政权内部的教会人士起草了一些对于美国的抗议，以及拥护共产政权的宣言，并且要求基督教人士签名。如最为重要的《三自宣言》即在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85-114.

²⁵ Esherick, Joseph.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68-95. (日) 佐藤 公彦著《义和团起源及其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²⁶ Pye, Lucian W.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70.

²⁷ 到1950年为止，独立教会的信徒（independent church adherents）数量达到至少200,000家，新教总人数大概有900,000到一百万之多。²⁷

²⁸ 在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在清华大学要召开第十一届年会，而遭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所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和学生进行组织非基督教组织的反对，并且在知识分子中演变为民族主义化的反基督教运动。²⁸在被视为非基督教运动开端的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所发表的宣言中，将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代表”的基督教对立起来，宣言中写到：“我们认定：这种残酷的，压迫的，悲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非另图建造不可。所以我们认定这个‘助纣为虐’的恶魔——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于是，[各国]先后涌入中国，实行经济的侵略主义了。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这经济侵略底先锋队。...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底良善走狗。简单说一句，目的即在于吸吮中国人民底膏血。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必须反对这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

²⁹ 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中共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共有232位代表参加，正式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作为拥护和推动运动的吴耀宗为第一任主席。这也标志着作为一种国家教会形式存在的三自教会正式成立。

³⁰ 吴耀宗，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天风》1950年9月30日，总233-234

³¹ 吴耀宗，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天风》1950年9月30日，总233-234

报》发表的《中国基督教在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提出信众要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同时号召他们参加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运动，并教育他们彻底了解及拥护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并且要求从教会领袖到个人进行签名。第一批签名包括了 1527 名教会负责人，通过政治压力和劝说，到 11 月份签名人数就达到 2 万多人，到 12 月就上升到 78596 人。根据官方统计，在 1951 年 1 月一周签名人数就近万人。³²到 1952 年，达到近 34 万基督徒签名。³³签名和控诉本身作为一种政治效忠的信号，也成为了划分政治身份是否对于共产主义政权效忠的一个标志。对于每次没有签名的人，都会受到政治压力和有可能被排除在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之外的危险。并且对于不参加三自运动和组织的教会和个人，在之后的几次运动，如反右，绝大多数的教会带领人和信众被判刑、处决、劳改或者流放，被排斥在社会资源和组织之外。

经过对于教会组织网络的整合，作为国家教会不再区分宗派，而是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保留部分同工其余参加劳动生产，统一的诗歌，以及不能宣言封建迷信，一切宗教活动在教堂举行³⁴。以上海为例，50 年上海教堂数量约 200 多所，到 58 年减少 8 所。在广州，由 52 所减少到一所，北京由 66 所减少到四所。³⁵

官导民族主义 (Government Sponsored Nationalism) 的兴起

从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到 1989 年间，在中共意识形态宣传中，民族主义色彩渐弱，被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这是为了符合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宣传的需要。尽管有学者指出，在文革和后文革时代，中国社会依旧有一种“华夏中心主义” (sinocentrism)，如林彪将中国描述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³⁶但是，这显然还是以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阵营为基础的说法，正如 Pye 指出的，用“毛泽东思想取代儒家价值成为‘核心’。这一核心逐渐变成一个执政党的立场，所以造成后来一种宣传上的僵化的正统模式：毛泽东思想除了作为党派运动口号之外，甚至无法成为某种民族主义观念的基础。”³⁷

随着 1989 年之后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后共产主义社会表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即建立在共产主义体制遗产上的民族主义的复兴，这是因为，后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者，通常把民

³² 吴耀宗，《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新阶段》，《天风》1951 年 1 月 30 日

³³ 蒋翼振，为庆祝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两周年纪念而欢呼，《天风》1952 年 9 月 27 日。在签名的同时，也开始了由官方所主导的社会运动，在教会内部，由官方派去的代表主持。控诉的主要内容：1，美帝国主义对于教会的影响和利用 2. 教会自身的问题 3. 教会内部问题。其中，作为官方代表的教会杂志《天风》在 1951 年 6 月 21 日，专题就是《我们要控诉》，之后持续两年杂志的内容就是：“（1）加强时事学习；（2）继续推进三自革新运动；（3）继续肃清教会内的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和败类；（4）参加地方和全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5）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以及拥护共产党政权一系列土地改革等国家改造运动。

³⁴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 1949-1997》，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 6 月

³⁵ 同上，p136-137

³⁶ 刘青峰，《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64

³⁷ 白鲁恂 (Pye, Lucian W)：〈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二十一世纪》，1992 年 2 月号，p24

族主义作为大众动员的有效方式。³⁸在天安门镇压之后，中共将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用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国家主导的民族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替代，重新构建一种民族主义作为过去意识形态的替代³⁹。许多文献都指出，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兴起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幻灭的替代品，这是官方所通过全面的宣传所构建出来的一种新的身份认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一个社会原因在于，单位体制等的瓦解后，后 89 时期，官方禁止民间的自主结社和 NGO 组织。因此，除了民族主义之外，缺乏新的社群共同体使得个人获得群体性的认同和新的身份。

官方主导的民族主义表达，可以从几次游行示威运动看出来。后 89 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集体运动的兴起的标志是 1999 年的抗议贝尔格莱德事件的反美游行。⁴⁰这是《集会游行示威法》颁布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第一次集会游行。随后中国社会中还陆续出现过几次全国性的民族主义大众游行，都是在政府的引导或默许，甚至违反《集会游行示威法》，下表是几次游行。

	反对对象	起因	主要口号	人员
1999 年 5 月	美国	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	打倒美国！ 不考托(托福)， 不考寄(GRE)，一心一意打美帝。	以高校学生为主
2005 年 3-4 月	日本	反对日本历史教科书和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反对日本、抵制日货	社会各阶层
2008 年 4 月	法国， 西藏独立， 家乐福	反对法国官员抵制北京奥运，支持西藏独立	支持北京奥运、 抵制法国连锁店家乐福超市、反对西藏独立	
2010 年			“还我钓鱼岛”、 “抵制日货”	

若不了解后八九时期的社会运动环境，就很难理解这些示威游行的意义。在天安门镇压之后，中国政府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 1989 年 10 月 31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该法规定，任

³⁸ Schwarzmantel, John. "Nationalism and Fragmentation since 1989."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Nash, Kate, and Alan Scott, eds. John Wiley & Sons, 2008. p389

³⁹ ZHAO, Suisheng.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998, 31.3: 287-302.

⁴⁰ ZHAO, Dingxin. An angle on nationalism in China today: Attitudes among Beijing students after Belgrade 1999. *The China Quarterly*, 2002, 172: 885-905.

何游行必须经当地公安局的批准包括地点，参与人的详细信息，⁴¹任何人不能之后加入，并且附录中加入了任何被称之为聚众扰乱的所受到刑法的处罚。⁴²这项法律的颁布后，被认为几乎没有批准过一次符合宪法的示威游行，而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并且中国政府对于维权人士和社会运动的领袖多是用“聚众扰乱”违反该法律而判刑。⁴³

官方引导的多次民族主义运动中，都出现过难以控制的暴力场面，因为这些示威游行活动是近年来少数被允许的几次，很多出于对社会问题不满的搭便车行为，都掺杂在里面。

“很危险，政府在玩火，没必要做这种事情。让他们游行，但又把圈圈在那里，不能引申，一引申就出问题。这样一动员，社会还是处于一种很动荡的状态，不是很稳的，悬在空中的。所以每年维稳费用要很多。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看下来，说到要学雷锋，意思就是没有人学；说到要和谐，意思就是已经不和谐了，就是要反着来看。”（Xu, 45岁，基督徒）

在国内，我们不可能真正发起任何大型游行，我相信这些背后都是有政府推动的。很多人过去就是打砸抢，成了一个情绪的发泄口，他们并不是真反日，只是发泄生活中的压力而已。就是政府一个转移视线的方式，利用钓鱼岛这个点来转移民众对被社会所压迫的压力，

⁴¹第六条 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机关，是集会、游行、示威举行地的市、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游行、示威路线经过两个以上区、县的，主管机关为所经过区、县的公安机关的共同上一级公安机关。以及第八条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有负责人。依照本法规定需要申请的集会、游行、示威，其负责人必须在举行日期的五日前向主管机关递交书面申请。申请书中应当载明集会、游行、示威的目的、方式、标语、口号、人数、车辆数、使用音响设备的种类与数量、起止时间、地点（包括集合地和解散地）、路线和负责人的姓名、职业、住址。

⁴² 第一百五十八条 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扰乱社会秩序。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国家和社会遭受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一百五十九条 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⁴³在2014年1月22日，中国78位学者和律师公开发表《对《集会游行示威法》提起违宪审查的公开建议书》，其中指出该法违宪。并且说到了限制性条款的苛刻和其后果：“有诸多限制性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时间限于早六时至晚十时。”“以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的名义组织或者参加集会、游行、示威，必须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等等。该法沿袭对自由和人权“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做法，36个条文中，抽象肯定的有2条，而含有禁止和限制性规定的则达到23条，占整个条文的64%！难怪人们把这部法律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集会游行示威法”。…政府有责任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而不是目前的以“拒绝批准”的方式将一切集会游行示威扼杀在萌芽状态。更不是滥用公权力，将正常行使宪法权利的公民以“非法集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等罪名构陷入狱。各地维权人士和公民因集会活动被逮捕入狱的事情时有发生，尤其严重的是，2013年3月以来，刘远东、袁冬、马新立、孙含会、王永红、李蔚、丁家喜、赵常青、刘萍、魏忠平、李思华、许志永、郭飞雄、袁奉初、袁小华、黄文勋、李化平、刘家财、王功权、张林、董如彬、杨匡等，因参加争取基本权利而被以“非法集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捕的人权捍卫者，至少一百余人。这愈发表明废除违宪的《集会游行示威法》的紧迫性。见《中国人权双周刊》<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4100>

让他们用这个点来把压力宣泄出来，然后他们就可以再继续承受压力。政府就周而复始地用这个点来，但其实我知道钓鱼岛早就不是中国的了，很简单就是在转移压力……真正认识到人的价值，真正尊重个体的人，尊重人的自由、个体的权利，他对于国家的价值，对于社会的价值，他需要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也需要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并且能够在义务和权利上都能抓住。”（Nora，女，32，基督徒）。

一位参加过游行的大学生这样对我们讲述他对于游行的看法：

前一阵的反日游行、保钓，学生还是比较简单，不是那么理性的……（64和反日反法一样吗？）可能带头的学生、站在高处的一些人的想法不一样，但基本面的学生都一样，大家都想干点什么事，但干什么不重要，我觉得这个是共通的，还是欠考虑吧。爱国（民族主义）我可能还是受党员身份的限制……（XD，24，大学新闻系学生，党员，2011-01-21）

一位基督徒编辑认为，这种民族主义的背后充斥着不仅仅是一种官方的想象，也有普通民众对于社会的不满，通过民族主义的游戏表现了出来。

“真正的爱国这些已经没有力量了，因为现在的青年人在一个以经济为核心的社会成长起来，看起来物质好起来，但在精神方面匮乏，没有爱国主义了，哪里有什么爱国主义呢，都是作态。青年变得非常世俗，但我想这个也是好事情，在于他们不是那么容易被一种主义或精神所鼓动起来，理性一些；不好的，就是什么都不相信了，相信利益，给多少钱，给什么条件就可以。但是对于社会本身的不满却在这个社会中不断的增加。”（HX报社，编辑，基督徒，56，2010.12.3）

我们在田野调查中，用半结构访谈的形式，与受访者谈到对近十年发生过的反日反美游行以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看法和反思。我们的访谈对象大多都是近十年内归信基督教的城市居民。1999年至今也是城市非官方教会快速增长的时期。非官方基督教教会（或“家庭教会”）提供了一种独立于民族、国家和种族的身份，而且，加入非官方教会的信徒是一个自选择群体，即他们大多不认同官方教会的亲共立场，并且对官方主导的宣传保持怀疑。此外，基督教伦理也起到很大作用：

05年反日游行在上海很厉害，我没参加，但我看见那个壮观的场面，我们学校的校门都挤破了，人太多。我对这种冲动的反日反美热情不是很赞同。与其把热情放在这上面，不如反思一下什么是本质性的原则性的东西，不单单是去指责别人、别国，有时候是自己本身、民族的亏欠。但当然那种指责、愤怒的情绪比较容易出来，但不应该去放大这些。如果你可以独立来做判断，基于事实、合理的方式，就比较好。这和我信仰当然有关，因为你不会出于一些民族的情绪伸冤或对别人进行报复，来伸张自己的正义，有一种克制在里面。另外你知道最大的利益不是以你的民族你的国家为代表，而是高于这些的。”（FF，32，男，基督徒，NGO，2010-11-1）

我不算是个愤青，不是特别感冒，觉得挺没必要的。我很不希望自己心里有一种仇恨，不管是一个有形的国家还是一种理念。到信主后，觉得爱国主义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偶像，是让你放弃理智的一个东西。本身你去爱一个国家的人是没有错的，但那种是非理性地去表达这种情绪。”(XY, 23, 女, 基督徒, 大学生, 2011-2-23)

爱国是单相思。我愿意把这些人叫做“脑残”，是长期吸收某些信息，以至于他缺少反思。还是和信仰有关系的。信仰给你带来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完全转变。以前一直和同学们讨论的是，共产主义是否能实现。你看的听的都把你限制在一个范围内，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一切都是这一个思路。反过来看这些的时候，我认为是愚民政策的结果，大的媒体宣传环境之下造成的，是一种广泛的，包括教育以及一切，在这么长时间里接触的。(WDB, IT, 男基督徒)

此外，基督教的聚会和小组提供了一种身份在团体中的认同，成为了后 89 时代官方禁止公民自由结社，特别是成为高校中同乡会、学生自治组织的替代，从而不需要通过民族主义所提供的身份认同。在我们访谈中，一位参与过高校心理咨询的基督徒这样说，

“我觉得他们需要团契生活。现在的大学还不像以前老乡会啊什么的，一进校门就想着我以后找什么工作，相互的心灵依附感，就是团契生活，特别欠缺。所以校园团契特别重要。这种游行，还不如我们那一代，有思想。我们上次去电子科大做公开讲座，就遇到反日游行，之前就有辅导员上去说，各班班长请把你们班每个人的动向报告上来。我听了怎么觉得白色恐怖似的。他们说老师太担心学生的安全，他们根本不关心你是不是反日，而是你会不会打闹起来。爱国，民族主义这种引导，跟一个民族的基本素质很有关。爱国很难用这样，就是树一个敌，然后你不爱它，你就爱国。不是这样的。就像你爱妈妈，你不是去找一个张阿姨来凶你两下，然后说，还好我不是张阿姨的女儿，我爱妈。你不是这样来产生感情的。这种游行啊什么的，我看了警方也很警戒，布置了大量的警察啊什么的。大学生真的需要家，需要团契生活。我看到的是一种心灵的缺乏。”(WO, 女性, 心理辅导, 44, 基督徒 2011-1-29)

结论

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将西方，特别是基督教作为假想敌，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随着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基督教遭受到打压，长期以来只有作为国家机构的三自爱国教会存在。然而，在后 89 时代，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瓦解和统治合法性的危机，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于身份的焦虑，官方压制结社自由和其主导的宣传，以及其他因素塑造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和官方主导的示威，但是基督教非官方教会提供了一个共同体，作为一种可以替代的身份认同，消解了这样一种民族主义。■

本土/国际篇

沙巴的困境

作者：萧敢

马来西亚分为西东两部，西马即马来半岛，拥有吉隆坡、檳城、马六甲等著名城市，一般人都比较熟悉。而东马包括加里曼丹岛北部两个州即沙捞越和沙巴，面积比西马还大，地广人稀。大家对东马的了解就远不如对西马了。前一阵子，沙巴州的潜水胜地仙本那连续爆出菲律宾叛军绑架马来人质事件，才让大家对这片土地投以更多关注。

沙捞越、沙巴以及夹在其中的文莱，本来都各有历史，错综复杂。中国文献上记载的浡泥国，基本就对应于今日之沙捞越。这些地方先后经历了英国殖民和日本占领，直到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沙捞越、沙巴以及新加坡与马来亚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后来新加坡从中退出，独立建国，而沙捞越和沙巴在一直留在了马来西亚联邦之中。

纵是如此，沙捞越和沙巴还是保留了许多自治权力，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移民自主权。外国游客拿了马来西亚的签证，在西马畅通无阻。可要去东马，还得再加盖一个入境章。西马的签证并不等于东马的签证。马来本国人去东马也是如此。笔者认识一个马来籍的政治学者，家住檳城，经常发表政治言论触怒了沙捞越政府，从此就不能再踏上沙捞越那片土地了。

东马与西马有着极大的不同，最直接一点就是人种族群的不同。西马由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三大族群构成，马来人占优势。华人和印度人在比例上不及马来人，但也占据相当比例，成为政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在沙捞越，原住民伊班族人占多数，其次是华人和马来人；而沙巴亦是由华人和原住民卡达山人及巴瑶人组成。这两个州自然不会像西马那样处处可见伊斯兰风情了。

事实上，这两地的经济命脉多掌握在华人手里，沙捞越尤其如此。华人从来擅于经营，这种情形在印尼、缅甸、柬埔寨都屡见不鲜。而且华人在这两地的经营，早在百多年前就已开始。不妨举个例子：诗巫现在是沙捞越的第三大城市，而在19世纪末，它还只是一个小渔村。1900年，中国福州的基督徒黄乃裳带领数以百计的乡亲来诗巫开垦，经过几十年努力，把诗巫变成了“新福州”。而且这里的华人多信基督教，与西马的情形大不同。

沙捞越和沙巴矿产丰富，金银铜铁俱全，又有天然气、液化气，还覆盖着大片大片的热带雨林，实在没有理由不富。事实也是如此，早在90年代，马来西亚林木出口创汇就已经超过传统支柱产业锡矿和橡胶的总和。

而且沙捞越和沙巴另有一项优势，即这两州砍伐森林、出口原木较少受到马来西亚林业部的控制，使得掌握土地的人可以靠自然资源致富。马来西亚与其他邻国一样限制未经加工的原木出口，西马虽有一些热带雨林，但不能像东马一样依靠伐木来赚钱了。

仔细研究东马的经济现状，会观察到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沙捞越州目前人口有 240 万，人均 GDP 大约为 1.2 万美元左右，高于马来西亚 1 万美元的人均 GDP，这已是相当不错的表现。而且我们要注意到，沙捞越人口中大多是生活在乡村的伊班族人。他们的教育水平很低，收入水平也很低，显著拉低了 GDP。所以沙捞越华人的富裕程度很惊人，在世界范围内都颇有名气。西马人说起沙捞越华人都羡慕不已。

同时再看沙巴的数据，情况就有所不同。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报告，沙巴州人口已达到 320 万人，远多于沙捞越，但其中的 89 万或 28% 为非公民即非法移民。沙巴的人均 GDP 才 5600 美元左右，连沙捞越一半的水平都不到，即使在马来西亚内部都要倒数。为何相邻的两州，经济表现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回顾历史，沙巴在 1970 年代曾经是马来西亚最富裕的州之一，经济表现直逼雪兰莪。不到半个世纪，它已沦落到现在的模样。

从表面看，非法移民问题一定对沙巴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菲律宾的人均 GDP 只有 2600 美元，印尼的人均 GDP 是 3500 美元，都很低。沙巴虽然只有 5600 美元，已经显著高于这两个国家，存在很强的吸引力。从历史来看，沙巴曾一度隶属于苏禄苏丹国，地理上十分接近，所以菲律宾人一直有去沙巴工作的传统。与此同时，印尼也从来没有放弃争夺沙捞越和沙巴这片北婆罗洲土地的努力。印尼与沙捞越之间隔着天然山脉和雨林，交通极为困难。但是它与沙巴之间的交通很便捷，促使很多印尼人前往沙巴打工。

沙巴与印尼的边境线，还有海岸线，相对于三百多万人口的政府而言，还是太长了。就像美国难以在边境上堵住所有墨西哥偷渡者一样，沙巴也无法堵住来自印尼的偷渡者。而菲律宾人更是很容易地乘坐快艇从任何一个小岛进入沙巴，防不胜防。大量印尼和菲律宾人在沙巴都无法找到正当工作，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沙捞越和沙巴一直是马来西亚政治上的心病。自从东马加入联邦，沙捞越的反政府游击队就一直活跃在农村，到上世纪 70 年代才缴械投降，之后的抗争则转为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东马地区对于马来西亚的认同很弱，宗教、文化都有一定的差异，至今“沙捞越独立”的呼声不绝于耳。

影响沙捞越和沙巴对马来西亚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与资源控制。沙捞越人觉得，如果独立自主，华人可以真正完全自由地决定矿产和资源的开发，那么沙捞越要比现在富裕很多倍。而沙巴人觉得，如果政府能真正有效改变沙巴的产业结构，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沙巴不再完全依赖于初级产品的出口，那么就业问题可能有所改善，收入分配也随之改善。正是由于这些限制，使得沙巴的产业水平很低，目前只能依靠“水清沙幼”的自然环境来发展旅游业。但旅游业似乎也推高了沙巴的消费水平，直逼

首都吉隆坡。

从经济发展的局限来看，沙巴所面临的问题与苏门答腊、缅甸等地的情况都很相似。虽然马来西亚的人均 GDP 已经跨过 1 万美元的关卡，可以被认为基本实现工业化，但沙巴一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土/国际篇

“去美元化”如何成为现实

作者：张昕

美元与美国的军事力量一样是战后美国霸权最重要的基石。关于“去美元化”的讨论和各种传闻，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但是，2014 年以来，以欧亚地区主要国家为代表的一组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商业实体，正在将去美元化的努力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甚至可以说，一个具备实际行动力的去美元化国家集团正在浮现。

其中表现最积极，也最乐于直接诉诸“去美元化”话语的国家是俄罗斯。2013 年末开始并不断升级的乌克兰事件，导致俄罗斯遭受美欧国家连续几轮的经济和金融制裁，被迫加速建立美国主导经济体系之外的平行体系——虽然目前还不是替代性体系。在今年五月，俄罗斯政府召开了一个被媒体戏称为“去美元化”的会议。在这个由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主持的会议上，俄罗斯财政部宣布准备在俄罗斯出口中迅速提高卢布支付的比重，减少使用美元标价的交易。在五月份上海亚信峰会期间签订的所谓“世纪合约”中，中国同意在今后 30 年内将购买价值约 4000 亿美元的俄罗斯天然气。虽然当时双方并没有明确交易的币种，但是在六月底，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该公司准备好用卢布或者人民币结算和中国的能源合同。而这方面最实质的进展，来自八月底俄气公司下属的石油公司同意，从位于北极的油田向欧洲出口 8 万吨石油接受卢布支付，并计划对通过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线(ESPO)向中国出口的石油以人民币结算。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八月视察克里米亚时，更公开宣布“石油美元(制度)必须死去”，并宣称在这方面“现在我们正在和几个国家商讨用各自的本国货币来进行贸易支付。”这里的“几个国家”不仅仅是中国：八月俄罗斯又和伊朗签订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用卢布购买 200 亿美元的石油，绕开了西方国家对伊朗的禁运。在 9 月 9 日中俄两国副总理会晤中，舒瓦洛夫和张高丽再次宣布，双方政府同意将在贸易中增加卢布和人民币的份额。

在中国方面，除了和俄罗斯双边在能源、贸易和金融领域一系列增加本币结算和支付的协议以外，更加具有广泛意义的是，自 2008 年到 2013 年间，先后与 24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的总规模约 2.6 万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中俄两国在过去一年里也都在减持自己掌握的美国国债，俄罗斯更是在今年三月份出售了自己三分之一的美国国债。

在中俄这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看似自然的“去美元联盟”之外，可能更具冲击力的是来自西方世界内部的类似举措。今年六月底，法国巴黎银行(BNP)收到了来自美国司法部 90 亿美元的天价罚单，金额比 2013 年该银行的盈利总额还高出 9 亿美元。美国司法部作出如此处罚决定，是因为美方监控到该银行有资金流入苏丹、伊朗和古巴等遭到美国经济制裁的

国家。更让巴黎银行感到羞辱的是，自己的 13 名高管将被迫辞职，并有可能被禁止再次进入银行业。部分作为对此事件的反应，七月份在欧盟总部召开的欧元区财长会议上，欧盟首次就去美元化展开专门讨论。如果说来自俄罗斯国家能源企业的去美元化态度很自然的话，那么来自西方国家主要石油企业的态度则更有说服力：欧洲第二大石油生产商道达尔的首席执行官，在欧元区财长会议后也表示，原油虽然是以美元作为计价单位，但并不意味着必须用美元来支付。

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大量美国本土以外使用的美元，实际上是发生在和美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交易上，这直接推高了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币值，使美国国内消费者可以消费非常低价的进口商品。外部世界对于美元的需求，也使美国政府可以以非常低的融资成本来填补政府债务。因此，去美元化毫无疑问将直接挑战美国的经济霸权和一般美国民众的高质量生活，美国政界和商界肯定会奋起反击。

同时，即便从挑战者的角度看，去美元化也将是一个漫长而且斗争焦灼的过程。在货币三大功能中，美元以外的新兴货币，最多只是在计价单位和交易媒介两项上正在尝试部分取代美元的功能，而且这种取代目前仅仅是国与国双边意义上的。而人民币这样还不是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要被广泛接受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价值储备工具，更有难度。所以，今后相当长一段事件里，与去美元化伴生的，很有可能是多种主要货币并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而且在这个体系里，主要新兴货币又会高度依赖类似于中国现在频繁采用的双边货币互换的模式。这种形态又会对全球意义上的贸易计价和结算带来相当大的额外成本。这样的成本，最后如何在主要币种和国家间分摊，会是这个漫长焦灼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边疆篇

似是而非的“伊吉拉特”组织

作者：李永峰

最近几年，新疆极端宗教势力所发动的恐怖主义行为日渐增多，中国媒体引述有关专家言论时，时常会提及一个关键词“伊吉拉特”，并将其与活跃于新疆的另一极端教派“伊扎布特（Hizb at-Tahrir，又称伊斯兰解放党）”相提并论，认为“伊吉拉特”组织是多起恐怖行为的元凶祸首。有一种说法认为，“自二零零九年以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破获的涉暴涉恐案件 90% 以上都是‘伊吉拉特’组织实施”（古丽燕：《新时期“东突”恐怖活动新动向及对策研究》）。在一些官方材料中，也有这样的介绍：“所谓的‘伊吉拉特’组织其实质是职业暴力恐怖分子团伙，该组织内的暴力恐怖分子煽动并进‘圣战’”⁴⁴。

“伊吉拉特”是由维吾尔语发音转译而成的汉语词汇，阿拉伯语的写法应该是“جهاد هجرة”。如果由阿拉伯语发音转译，“伊吉拉特”可以翻译为“希支拉”或者“希吉拉”。目前中国有学者将“伊吉拉特”与埃及人舒克里·穆斯塔法(Shukri Mustafa)联系起来，认为“伊吉拉特”组织是从穆斯林兄弟会中分裂出来，由舒克里·穆斯塔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创立而成。中国研究新疆问题的权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厉声也曾表示：“当前应当高度关注新疆境内两个恐怖组织，其一是极端宗教组织和政治组织‘伊扎布特’，其二是极端暴力组织‘伊吉拉特’”⁴⁵。

其实，在上述论调中，中国舆论对于“伊吉拉特”的认识似乎存在极大误区。“伊吉拉特”问题关系到新疆未来的发展形势，为了避免被似是而非的概念误导，有必要仔细辨析一下“伊吉拉特”思想和“伊吉拉特”组织。

根据穆斯林的历史记述，穆罕默德在传教初期，被迫于公元 622 年出走麦加，前往麦地那，并在麦地那建立了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这一事件被称为“迁徙”事件。上世纪七十年代，埃及人舒克里·穆斯塔法，挑战近代以来埃及反帝反殖背后所具有的“民族主义”思想底色，主张通过“迁徙”来践行信仰，告别过去的国家性、地方性的限制。“迁徙”的阿拉伯语就是“جهاد هجرة”，经过两次转译，便是汉语中的“伊吉拉特”。

要辨析中国语境中的“伊吉拉特”，首先需要追溯与舒克里·穆斯塔法有关思想和组织。舒克里·穆斯塔法在全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展史上是个重要人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⁴⁴ 吐鲁番地区反恐维稳宣讲材料：宗教极端势力的现实表现及其严重危害

<http://www.tlf.gov.cn/xwysym.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305&wbnewsid=85112>

⁴⁵ 财新：新疆劫机者称本欲劫机外逃 <http://china.caixin.com/2012-07-05/100407767.html>

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军人在推翻法鲁克王朝过程中所结成的同盟关系很快破裂，纳赛尔总统将数千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投入监狱。这是埃及现代史上军人与穆兄会的第一次决裂。六十年代末期，身处狱中的穆兄会成员出现分裂，一派主张与军人政权和解，此派成为当时的主流；另一派则反对。反对者在狱中另建了秘密的“伊斯兰极端组织”。

七十年代，因为“和解”达成，穆兄会以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核心成员纷纷出狱。出狱后，“伊斯兰极端组织”又发生大分裂——上埃及极端组织发展成为伊斯兰组织(Jama'at al-Muslimin, 一般也称 Takfir wal-Hijra)，下埃及则发展成为圣战组织 Egyptian Islamic Jihad)。伊斯兰组织的领袖便是舒克里·穆斯塔法，而圣战组织的重要成员则有艾曼·扎瓦希里 (Ayman al-Zawahiri)。舒克里·穆斯塔法发展了他的“赎罪与迁徙”理论，号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为了圣战而进行“迁徙”。“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是不会满足于一处永久居所的，哪里能履行信仰，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哪里就是他的家园。”

46

舒克里·穆斯塔法曾在埃及国内小试了一番“迁徙”的理念，尝试带领信徒到上埃及地区建立伊斯兰政权。但是这项尝试很快失败。舒克里·穆斯塔法在一九七八年，因为绑架埃及宗教基金部长而被埃及政府处决。而更多人放弃永久居所，开始进行迁徙，则是在八十年代的阿富汗战争期间。这时候，实践“迁徙”理论的，不止由舒克里·穆斯塔法所创建的“伊斯兰组织”，也有他们的对手“埃及圣战组织”，以及全球众多的原教旨主义者。值得顺带一提的是，八十年代“迁徙”往阿富汗的艾曼·扎瓦希里，后来将埃及圣战组织与奥萨马·本·拉登所领导的沙特圣战成员合并，建立了现在人人都知道的基地组织 (al-Qaeda)。二零一一年，本拉登被美国海豹六队击毙以后，扎瓦希里成为基地组织新领袖。

目前在中国语境中的“伊吉拉特”，显然也是受了舒克里·穆斯塔法的“迁徙”理念影响。但是，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这批希望在中国通过“伊吉拉特”实现圣战的人，属于舒克里·穆斯塔法所创建的“伊斯兰组织”的分支机构，同时，也很难找到证据证明二者间有联系。苏联撤军之后，留在阿富汗的“伊斯兰组织”成员纷纷撤离。回到埃及的“伊斯兰组织”，在一九九七年已宣布放弃暴力。至于“迁徙”理念，早已扩散到全世界，获得了大多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认可。今天，大多数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宗教组织，都在号召追随者告别永久居所，为“主道而战”，到合适的地方进行“圣战”。其目的在于促使穆斯林超越国籍，建立一个崭新的、带有世界性的教法统治的国家。最新的典型例子就是崛起于伊拉克和叙利亚乱局中的伊斯兰国 ISIS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所以，当下在新疆众多鼓动追随者告别家园、通过“迁徙”进行圣战的行为，应该并非来自某一个自我命名为“伊吉拉特”的组织的驱动，而是所有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派别都在这

⁴⁶ 涂龙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

http://bianjiang.blogspot.hk/2014/09/blog-post_98.html

样做。上文所提及的“涉暴涉恐案件 90%以上都是‘伊吉拉特’组织实施”，这个 90%如果确实成立，那么也只能说明，这些涉暴涉恐案件都与“伊吉拉特”思想有关，而至于其背后的组织，既有可能是“伊扎布特”，也有可能是“乌伊运”，更有可能只是某些单独受到“迁徙圣战”思想影响的人。

辨析“伊吉拉特”问题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文字游戏，目前散布在新疆各地的地下教派和宗教组织，是影响新疆未来的关键因素，调查和掌握这些组织，应该是维护新疆稳定的基础。但前提是，告别一切似是而非的判断。其实，不止一个“伊吉拉特”，包括“东伊运”、“三股势力”等等提法，也都有太多似是而非的内涵包括其中。如果要化解新疆未来的难题，需要更精准和正确的判断。■

边疆篇

边陲照片与“民族”的视觉呈现

作者：李潇雨

作者说明：

这篇文章是我博士论文中“边陲摄影与‘民族’的视觉呈现”这一章节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对“视觉”、“国家”、“历史”等大议题感兴趣的文化研究专业学生，我的论文以1860至1911年间外国旅华摄影师在中国的摄影作品为研究对象，致力于讨论中国“旧照活化”文化现象中同一批照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与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当代中国这两个不同的社会语境和时段中的具体运用方式，以考察照片、历史叙述、民族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本篇文章本来围绕着当代晚清相册中的“民族”选题而展开，焦点集中在晚清旅华摄影师的“边疆与少数民族”摄影作品的“在场”与“缺席”上。由于内容繁多，篇幅过长，因此在观澜学社《观察报告》中，截成几部分陆续发出，而“秋分”号中登载的是讨论“晚清边疆摄影”中的“新疆”区域的部分。由于文章所需的背景框架相当庞大，在字数限制下，我已经在原文基础上做了最大限度的调整和压缩，希望不会造成意义上的损失，也希望“晚清摄影”这个题目能引起大家继续读下去的兴趣。在这里提前谢谢各位的耐心。

1860年以后，摄影术在晚清中国大行其道，外国旅华摄影师频频流连于中国的通商口岸及大都会，拍摄了大量富于异国情调的中国影像。然而帝国广袤边疆——诸如国境线周边的西北、西南、东北地域也并不是西方旅行者的禁地，摄影师对于它们的再现塑造出了与前者完全不同的“中国面貌”。

我将这些在清帝国的边疆地区所拍摄的照片称为“边陲摄影”。因为清帝国的疆域与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辖范畴基本一致，因此这些照片是旅华摄影师在今日被称之为新疆、蒙古（内蒙古）、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所拍摄的作品。与再现通商口岸及大都市情景为主的晚清商业摄影不同，边疆摄影展现出多样化的“族群”内容，区域与区域之间、甚至同一区域内部的族群构成均相当“异质”；而在“人情”内容以外，边疆摄影的“风土”内容也多表现自然地理的的开阔与粗砺而非城市与人造环境，草原、森林、山林、沙漠、戈壁，冰川等边地景色都成为镜头的捕捉目标。

除此之外，边陲摄影的生产机制以及流通情况都与以商业为目的、多拍摄通商口岸、沿海地区与大都市的旅行摄影大不一样。首先，边陲摄影多数是西方国家和政府所支持的各种关于中国边疆的人种、地理考察和探险活动的副产品，而此类活动又往往与帝国主义国家在特定时期内对中国边疆、以及与中国边疆相联的广大地区的激烈争夺有关，因此边疆照片作为一个类型也相应地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在时间上较反映其他地域的商业摄影更晚，其拍摄者也多由“非摄影专业”的探险家、考察者、殖民官员等兼任。由于对中国边疆的考察活动多服务于某些具体的政治举措，有时甚至带有秘密主义的色彩，因此在考察活动中产生的照片也并不以公开发售和娱乐大众为己任，它们多数时间是作为各种书面报告的补充材料被固定的读者阅读，而这种“资料”体制也决定了它们的低调。实际上，边陲照片在19、20世纪的流通的确不多，市场上印刷着边疆风土人情的晚清明信片数量稀少，而独立出版的晚清边疆照相集几乎为零。如此惨淡的流通情况，使边陲摄影师在业界的影响力无法与拍摄中国内陆、沿海、腹地、通商口岸的商业摄影师相提并论。

晚清边疆摄影与商业摄影之间在内容上的区别与分野有其结构性及历史性的原因，我们必须从地理、文化、地缘政治的角度对晚清时代的中国领土和疆域做一分析与判断，才能清楚地理解中国边疆的特殊性是如何具体地影响了“再现视野”下边陲摄影的存在与内容。自17世纪起满人入关为始，清帝国统治者通过一系列继承、征战和怀柔政策，在原明朝固有疆界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一个疆域广阔的多民族大帝国。因为兼并与扩张，这一帝国内部是异质且多元的，各个区域在地理、文化、宗教、社会形态上都大相径庭。

不过在帝国内部，这种基于地域分别的“多元”差异之间并不是彼此平等的，而居于其上的族群之间也存在着清晰的优势与弱勢的权力关系，以至于能够清晰地在其中勾画出“中心”与“边缘”的相对位置。首先，虽然清朝是满人建立的王朝，但关内汉人的聚居地不仅在地理结构上处于帝国的中心，而且在人口、文化与经济上都处于压倒性的优势位置；而清统治阶级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以及对儒学的拥护和利用——如何炳棣所言，“利用各种渠道宣传程朱正统政治和道德思想的通俗版本，无休无止地劝诫国民”⁴⁷，以及对明代的这个汉人政权的政府组织机构的承袭，则从抽象的思想文化及实在的政治体系上，巩固了汉（或者汉文化）在帝国中的核心位置。而东北、西北、西南地区的领土与民族则因与“中心”在地理和文化上的距离，被汉族知识分子视为“趋鹿使犬之部，烛龙冰鼠之乡，衣鱼种羊驱象驯狮之国”⁴⁸的边地，其上的少数民族也在文化上处于次等位置。

但满族统治者的“汉化”并无需排斥对其他形式的认同。为了能够维持一个政治统一的帝国架构，本身作为“异族”的清朝统治者针对帝国内部区域性的差异，对不同对象展现出了不同的统治面貌：对于广大的中原人民，统治者通过变更王朝名称、祭祀元明两朝的法宝、供奉两朝皇室后裔、恢复汉文科举、尊奉程朱理学、继承明朝法律等一系列措施将自己确认为中国王朝的合法统治者——中国皇帝。而对新纳入的土地，清朝统治者则根据当地原

⁴⁷ 何炳棣，《捍卫汉化》，收入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第一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2。

⁴⁸ 葛兆光，《宅兹中国》，第一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248。

住民的风俗灵活地运用特殊与差别的制度实行所谓“从宜从俗”的统治管理，尝试在“复杂的皇权多重性的转化和演化”（汪晖语）之上，将不同的种族、不同区域和不同信仰的人口纳入到一种多元且富于弹性的政治架构之中。

清的这种多元政治架构也具体地落实在不同区域的行政管理上。总体而言，内地十八行省以六部为代表的官僚机构管辖，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则情况各异。广大的北境、西北地界——包括今天的蒙古（内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与黑龙江一部分——以“藩部”的形式被统领，清廷专设理藩院，掌管以上地区事务，具体涉及爵禄、朝贡、定界、官制、兵刑、赋税、贸易、宗教等大小事务，还设有内馆、外馆、蒙古学、唐古特学、俄罗斯学、木兰围场、喇嘛印务处等机构⁴⁹，集行政、学术、经济、管理大权于一身。该区域内部的行政管理方式与编制也迥然有别，我们可从清代思想家魏源的《答人问西北边域书》中简略观之：对于正北内蒙古，“四十九旗皆曰内藩蒙古，合归化城土默特二旗计之，合五十一旗，分东西六盟。”正北外蒙古：“……天朝设札萨克⁵⁰（札萨克每旗一人，或世爵或简放总理旗物），其部凡二十四，并归化城则二十五。分西路北路中路东路四部，凡四汗（其汗以下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与内蒙古同）共八十一旗，自设札萨克，俱在漠北”。而对于新疆准格尔部旧地伊犁、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哈台，“今皆有重兵”。而往西南方向，对前后藏，“天朝设驻藏大臣司其事，而达赖喇嘛副之，藏王则虚存贝子爵而已，非有土之君也”其西边的广大地界青海，“……与藏与准皆接壤，界甘肃四川边境，凡五部，有大臣一。”最后，对于平定准噶尔汗国而得到的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以及回部辟展、新疆、哈拉色拉、库车、沙雅尔、塞里木、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这些大片领土，“设将军参赞都统提镇，及办事领队诸大臣，及侍卫司官有差。”⁵¹通过以上措施，清廷对这些民族地区采取保持、尊重和利用其文化与固有制度的方式进行统治，同时也严格限制边地的人口流动，禁止汉人的迁入。虽然晚清边疆动荡的局势让清廷在上述地区撤藩建省，加强了中央集权，不过长时间以来，清帝国内部东北、西北的大片边陲领土，是外在于“汉”而存在的。

而帝国对西南边疆的管制又与上不同。相比起晚近并入的西北和东北地区，西南的大部分疆域在明朝时已被纳入行政版图，后清又跟从明代俗例，沿用土司制度管理西南诸省，然而土司们拥兵自重，常有内斗，甚至不受朝廷节制，反戈中央。为加强管制力度，清雍正时除了继续在苗族聚居地区及附近地区实行“安塘汛”、“修城垣”、“设重兵”、“划行政”的军事防守政策外，还制定了《保甲条例》、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元明时期设立并沿袭的土司制度，动用武力裁革拥兵自重的土司、头人，将其治下的“土人”（少数民族）置于清朝官员（流官）的直接统治之下⁵²。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一地区，清廷鼓励汉人往云贵地区移民，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种族、人口、风俗和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查，这些措施都加强

⁴⁹ 汪晖，《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114-115。

⁵⁰ 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札萨克是清代为游牧民族设置的基本政治单位——旗（和硕）的世袭统治者，只能从贵族阶级中产生。旗下划分“苏木”（箭），六苏木设一扎兰（参领）。

⁵¹ 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收入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八十，兵政一一，第一版，（北京：中华书局，1992），1962-1963。

⁵²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一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二部上卷，541。

了西南地区的中央集权化，并形成了与西北、东北地区复杂的自治性政治架构有所区别的形式。

在清帝国的“弹性策略”之下，边疆地区在人口、族群、行政甚至军事情况上与帝国中心相比享有特殊性。然而“边疆”会被拍摄下来，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对清朝边地的兴趣，而一兴趣是以边疆与清帝国“外部”的密切联系为基础的。自1759年清完成其在内亚的开拓、巩固边防之后，清朝有了一条极为绵长的边境线：“国之北境，东起鸭绿江黑龙江，逾两蒙古，西迄准部，袤二万余里，皆接俄罗斯界。”⁵³渐次向南，新疆毗邻霍罕、布哈尔、阿富汗等一系列疆界时有变化的中亚汗国。西藏除与印度、尼泊尔相邻外，还与阿达克、锡金、不丹有着复杂的领属关系；西南的云南、广西与东北的吉林则分别与清朝贡国缅甸、越南、朝鲜接壤。需要强调的是，这条边境线是充满变化的，边疆与“外部”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从17世纪开始，处于扩张过程之中的俄罗斯帝国就使得其与新疆、蒙古的边界形式极为复杂；然而直至19世纪中后期，边疆与“外部”的联系才变成一种对清帝国而言的全面性威胁，这种变化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亚洲腹地及东南亚地区的殖民进程的升级息息相关。而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中，随着中亚各汗国实力的衰落以及朝贡国越南的沦陷，清丧失了传统上对该地区的控制权，也丧失立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缓冲地带。于此同时，与这些区域相连的清帝国边疆也逐渐成为被帝国主义染指和觊觎的前哨地区。

边疆摄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跃上历史舞台。正如前文所述，边陲摄影基本是各种关于中国边疆的人种、地理考察和探险活动的副产品，而这些考察则多由英、俄等国家皇室或政府所支持。虽然考察的具体任务不一，但在探查清朝边地的自然资源与物产、搜集区域性的政治军事情报、考察清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权威和势力这些具体任务之外，各类考察的最终目的不外乎是希望尽量广泛地掌握清边疆区域的动态与信息，方便制定利益最大化的对清政策，或者更进一步，在适当时期“伺机而动”，直接以暴力攫取利益。而作为在“争夺”具体脉络下产生的视觉实践，边陲摄影不仅在“信息”层面上非常直观地展现了当时边陲的社会情况、民众生活，其存在本身也印证着帝国主义国家对边疆区域的兴趣与焦虑。

在下文中，我将具体讨论“边陲摄影”这一门类中，晚清旅华摄影师对新疆地区的拍摄，并分析这些照片在21世纪中国蓬勃的“旧照活化”潮流中耐人寻味的调整以及出版位置。作为一种历史材料，晚清摄影作品的时间性和真实性是将历史“可视化”的重要材料，因此它们在当今中国的出版绝不是一种对原始照片资料的“符号重温”，而是一套经由影像的挑选及其意义的挪置、改写所实现的，倚重图像的历史叙述方式的建立。而当今的“旧照活化”作为一个成系统的、隐形的“国家行为”，其中的历史叙述方式必然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我认为，当代“新疆”区域照片的编辑出版策略与当代中国政治现实中的“边疆区域”问题关系紧密，而在我们继续探讨视觉化的“文化产品”如何映射当代中国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区域问题之前，应该首先厘清它们是如何从一个更广泛的“晚清新疆摄影序列”中被选择出来的。

⁵³ 魏源，《清经世文编》卷八十，兵政一一，1962。

晚清旧照中的新疆

作为连接清帝国和广袤中亚腹地的关节点，新疆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由两大盆地组成，其北边的准噶尔盆地，向西可通往俄国中部南边的广大草原地带。而塔里木盆地的主体塔克拉玛干沙漠则被两条丝绸之路的主干道环绕，其上有一系列重要的绿洲城市，比如北面的哈密、吐鲁番、库车，南面的敦煌、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而和田与叶尔羌又可以通过最南面的昆仑山口与克什米尔、英属印度区域旁遮普相联系。除此之外，两条丝绸之路交汇的地方是交通枢纽和贸易城市喀什噶尔（今喀什），从这里可以穿过帕米尔山脉去往塔什干、撒马尔罕等重要城市，甚至可以再往西进入中亚腹地。正是这种特别重要的衔接位置，使得新疆确如历史学家何伟亚所称，将清所控制的中亚地区与俄帝国、英帝国连接起来。

而十九世纪英国和沙俄对晚清新疆的兴趣是与它们在中亚的扩张、争夺和相互制衡相联系的。在这场被称为“大博弈”的战略冲突中，对俄国而言，对中亚领土的兴趣是自16世纪中期开始向亚洲扩张的一部分，时至19世纪，沙俄必须在疆域扩张的道路上直面其竞争者英国，以求分庭抗礼，在亚洲攫取更多的利益；然而对于英国而言，中亚的战略意义在于牵制对手俄国的继续南下：如果放任俄国在中亚不断扩张和推进，它很有可能进一步以阿富汗为跳板继续南下，威胁自己在印度次大陆的帝国利益。为保证印度这一财富的源泉不被竞争对手暗谋甚至偷窃，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必须致力于建立或巩固印度次大陆及其周边区域的外交与战略关系，制造对付俄国的缓冲地带，并在避免直接交锋的前提下，通过一切手段向俄施压，竭力阻止这只双头鹰势力的坐大⁵⁴。这一大背景下直接导致了清帝国边疆与中亚接壤的满、蒙、西藏、新疆这些亚洲腹地受到威胁，而新疆则因为地缘政治的缘故成为其中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西方国家在19世纪后半叶向新疆持续派遣考察队、探险团的深意。而这种“政府行为”又以俄国为最盛。19世纪70年代，就在英俄两国在阿富汗、中国新疆南部（包括帕米尔）一线激烈争夺时，沙俄政府和俄国半官方机构皇家地理学会向新疆派出几十个地理考察队，并给予人员、财力、武器、设备等全面支持，企图在情报收集方面占据先机。而为了掩人耳目，特别是为麻痹清廷，考察队通常以学术研究、地理考察等“科学”名目作为自己的出使目的。时任俄国副外交大臣的格尔斯就曾直白地表示，考察可以用来“掩盖”俄国的“政治目的”，“避免我们敌人的任何怀疑”⁵⁵。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俄国的意图倒是露骨非常，因为它对外围地区的地理探险考察基本是与其军事推进同步进行的，对中国西北边疆的考察也正兴盛于其1871年侵占新疆伊犁之后。这大

⁵⁴ 有关“大博弈”的相关情况，可参阅 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2).

⁵⁵ 马大正、王嵘、杨镰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第一版，（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50。

概也能解释为什么俄国派遣的探险家多是军旅出身，在考察时也特别留意政治军事方面的信息搜集。

这一时期最早进入新疆的俄国探险队是由著名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 Mikhailovich Przhevalskii）于1876-1878年率领的“第二次中央亚细亚考察团”。1876年1月，普氏筹措探索从天山东部、塔里木盆地、罗布泊至喜马拉雅山这片广袤地区，在写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报告中，他力陈考察的必要性，称“最近时期的地理考察大大地扩展了我们对亚洲大陆的知识范围，但考察还很少涉及亚洲大陆的中部，及绵亘于喜马拉雅与西伯利亚之间，从东而西延伸于中国版图的广大高原地带。尤其是这一辽阔的区域内部，人们了解得很少，对它进行科学考察是亚洲地理研究当前最为迫切的问题。而这个宏伟的计划让俄国国内倍感兴奋，时任俄罗斯地理学会主席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立刻公开表示支持：“此次俄国深入中亚腹地作一次新的考察，乃是以往俄国从事的地理学活动的自然发展，在政治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完全应当受到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二者可谓一拍即合。而正是这种在科学和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使得普氏考察队成为最受沙皇政府青睐和支持的队伍。虽然未能按照原计划到达拉萨，然而普氏的考察确实成果丰富，他首先勘定了罗布泊和阿尔金山的位置，引起欧洲学界的震动和讨论；其次是对这一地区哺乳动物和鸟类进行了专门研究，搜集了大量动植物、矿物的标本，这些成果也反映了他对中国边疆物产和资源知识“战略性”地关注和掌握。据称在这些公开项目的掩盖下，普氏也肩负著搜集关于阿古柏政权的报告、探查和钨金矿的秘密任务，以便俄国政府可根据局势伺机而动。1883年，普氏又再进行第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从俄境内恰克图出发，经青海柴达木盆地翻越阿尔金山重抵罗布泊，对新疆塔里木河上游的黄河河源地带、塔里木盆地南缘、阿尔金山山脉和昆仑山脉都进行深入和系统的考察。

因为对探访地区的土著居民有著强烈好奇，普氏在这次的考察中拍摄了许多以他们的生活状态为题的照片，在他的探险旅行记《第四次中亚旅行记》（1888年首次出版，中文译本名为《走向罗布泊》）一书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在柴达木盆地为当地蒙古族妇女和小孩拍摄的照片（图1），其中有一张显示他们在劳动中的情景：无论大人小孩均身背箩筐，据解释正在拾牛粪备用（图2）；而在罗布泊和塔里木和下游，他将镜头对准了聚居在此地的喀拉库沁妇女、儿童甚至统治者伯克，也拍摄了他们居住的芦苇房子；在沙漠城镇若羌和绿洲城市且末，普氏也照例为当地的居民拍摄了人像照。从游记中看，普氏对考证这片区域上各民族的血缘颇有兴趣，对他们的面部、身体特征也兴致勃勃，这种倾向生动地说明人种学说在19世纪末的重大影响。但从普氏的著作中看来，他的这种兴趣与探索仅止于文字，并没有典型地体现在摄影风格和手法上。应该说，尽管热衷此道，但普氏似乎并没有运用摄影来进一步追求一种“科学”的体征记录。



图1 普尔热瓦斯基：捡牛粪的蒙古妇女和小孩



图2 普尔热瓦斯基：骑牦牛的蒙古人

相比起来，另一位后继者马达汉（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的考察则更为广泛地使用了摄影技术。这位芬兰裔中校军官接受俄军总参谋部指令，于1906年以俄属芬兰

国贵族男爵和探险家的身份，作为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科（Paul Pelliot）考队成员，从中亚进入新疆单独行动。而他在中国境内的旅程是从喀什噶尔开始的，先向南疆一线考察了叶尔羌、和田、阿克苏，紧接着翻越木扎尔特冰川进入特克斯河谷，考察伊犁地区，结束后越天山进入巴音布鲁克草原探访土尔扈特人，并由喀喇沙尔到乌鲁木齐；之后又继续考察北疆一线的奇台、吐鲁番、巴里坤、哈密，最后进入河西走廊，穿越甘肃和青海两省的穆斯林领域，最后经陕西、山西到达河南开封。

在完成的任务后，马达汉向俄国总参谋部递交了一份《上校马达汉男爵奉旨于1906-1908年穿越中国新疆和中国北方诸省至北京之旅的初步考察报告》，在其间非常详细地罗列了此次任务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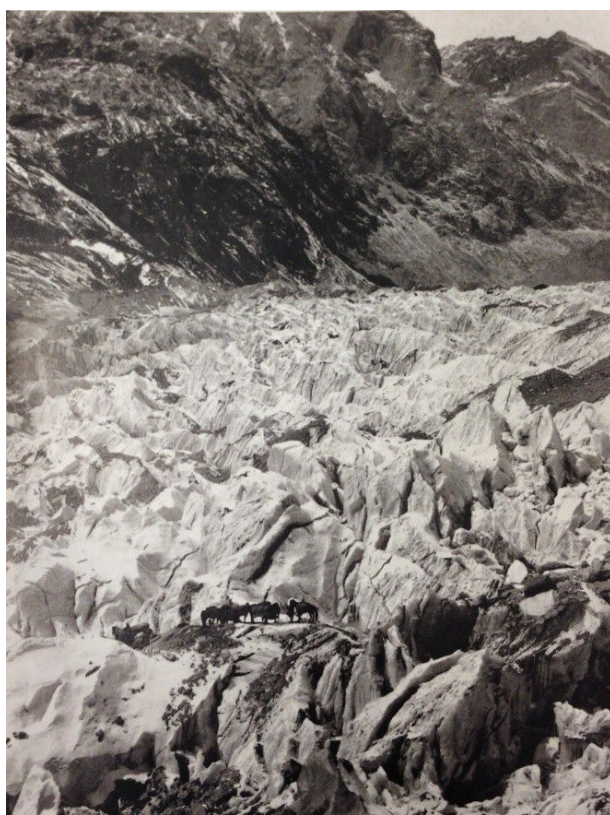
“……总参谋部长官希望我做一次从俄属突厥斯坦出发，经中国西部（新疆等广袤地区）以及甘肃、陕西、河南、山西诸省直至北京的长途旅行，……我此次旅行的目的是：

- 沿路收集情报和军事统计资料，特别是长城外各省份的情报和军事统计资料；
- 查清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所推行的新政对地方有何影响；
- 了解国防基础以及军队的整编及训练情况。
- 调查所经过各省汉人移民的情况和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的改革。
- 了解当地百姓的情绪，他们对朝廷政策的态度，一些地区或当地部族的自治运动、达赖喇嘛在这一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老百姓对俄国和日本的看法，以及日本对中国政府的一切措施有何种影响；
- 勘察通向喀什噶尔，乃至通向兰州和北京的道路，尤其要查明我国骑兵部队及由三个兵种组成的独立部队进军兰州的条件。”

而除了以上这些“刺探军情、查明虚实”的任务之外，马达汉还肩负一系列专业的军事制图、编制和侦察的间谍工作，比如绘制沿途道路、探查河道、考察中方军事基地等。在考察中，马达汉也践行着普尔热瓦斯基“科学考察与政治考察并行不悖”的理论，他的考察日记中对沿途的动植物资源、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文教、交通、商业等情况作了详尽的记录，并尽力搜集了古代经文手稿、木牍、碑铭等实物，甚至对边疆不同地区的居民进行了社会学、人类学考察，留下大批科考资料和照片。然而这些学术经营并非只是采集现实标本，更非与政治无涉，而是收集情报信息、增进了解的一首手段，其目的是谋求俄国利益、巩固甚至发展俄在新疆的既存势力。相比起前辈普尔热瓦斯基的探索历程，马达汉这次的西域考查虽在路线上有所不同，但从其意图上来看，则完全是旧方法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故伎重施。

与其他热衷于在中国留下影像记录的旅行者不同，马达汉既非摄影爱好者，也不是专业摄影师。于他而言，照相机和脚手架固然是记录自己探险成果的必要助手，但更是用于掩盖自己间谍身份的烟雾弹，因此，虽然在考察过程中一共留下了约1370多幅照片，但马达汉对于摄影的重视却是有限的。比如，他仅仅使用一个单镜头和一种底板，对专业的模糊曝

光术和全景技术也不太熟悉。更重要的是，摄影在马达汉的整个探险旅程中似乎并没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而是如尤·库科宁所言，是对他自己探险日记的一种“自然的、多姿多彩的补充。”而正是因为他拍摄的照片完全呼应着自己的探险活动，因此我们可以在其中轻易找到地质探险的主题。比如在考察队一行人穿越新疆天山西部的木扎尔特冰川时，他从远距离拍摄了一张冰峰和山脊的局部图（图3）。只见照片上一片黝黑陡峭的山崖自上而下铺叠过来，沟壑纵横的冰原混杂其间，冰峰嶙峋，其上布满深浅不一的冰隙。而在黑色的岩石和苍白的冰川之间，一小队人马站在羊肠小道上修整，在自然的伟力面前，他们显得如此渺小，却又极具反差地凸显出一种倔强的英雄气概。而另一张照片则采取了仰拍的角度，在一片冰封的陡峭山川上，突出了那个行走其间的小小身影（图4）。这种景与人之间的对比，实在是地质考察摄影中最为经典的手法之一。



图片3 马达汉：穿越木扎尔特冰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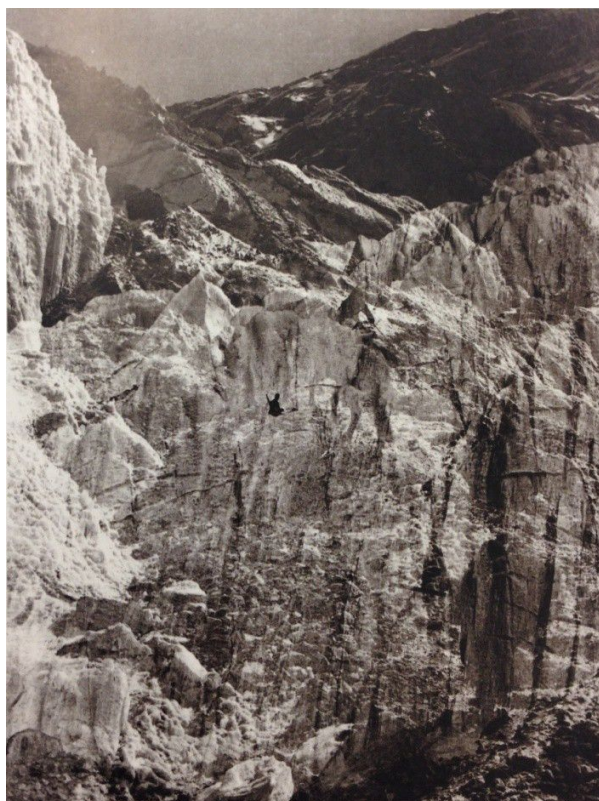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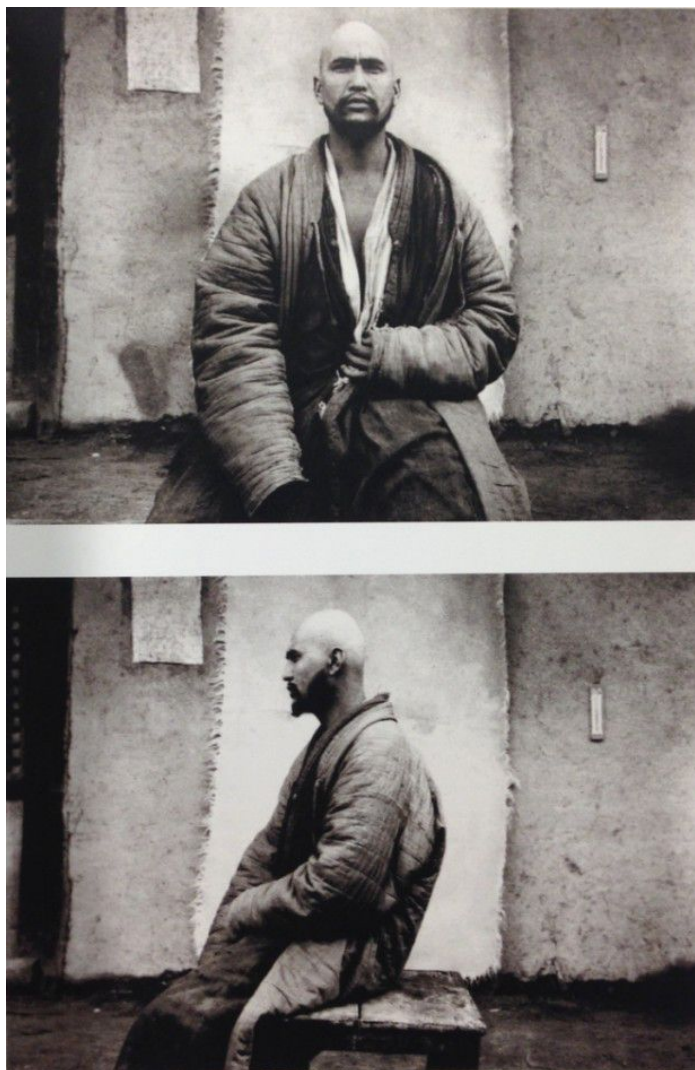


图4 马达汉：通过木扎尔特巴什的道路

此外照片档案中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的人类体型特征和人体测量的图片，也是马达汉野外考察的收获。虽然他曾在报告中略显顽劣地写到：“做人类学测量和搜集许多民族学实物，主要是为了当著我旅伴们的面，进而当著中国当局的面，为自己的工作增添一点学术的色彩。”然而他还是以一种相当勤奋和审慎的态度去进行这项工作。就记录来看，他在伊犁的特克斯河谷地曾为卡尔梅克人和哈萨克人做了人类学测量，也用同样的方法对阿布达尔人、哈尔噶里克山附近的西合休、帕合甫人以及马拉尔巴什（巴楚）的多浪人（图片5）、以及甘肃境内的撒里尧乎尔和西拉尧乎尔这些鲜为人知的部落进行了



图片 5 马达汉：马拉巴什的多浪人马杜尔·阿洪



图片 6 马达汉：24 岁的西拉裕固族妇女和她的儿子

最值得称颂的应该是马达汉所拍摄的大量边疆人民生活 and 民情照片。正如前文所述，在旅行的初始阶段，马达汉拜访了新疆丝绸之路上的好几个重要的绿洲城市，由于他的旅行护照需要通过官府首肯，因此他的照片系列中有不少清廷边疆官员的人像照和家庭照（图 7），这些汉人官吏和武装的影像证明，1884 年清廷为加强内部统一性而将新疆彻藩建省后，其边疆事务上已相当倚重汉人的力量。除此之外，马达汉对对当地的城市景象、房屋建筑及工商业情况也多有呈现，拍摄了贫民窟胡同、染布坊、商业街、织毡作坊、穆斯林墓地等题材，也注目于犯人、军官、乐师、猎人等不同职业和身份的当地百姓，然而在这些照片中，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混居和融合现象值得重视，根据影像所提供的信息，除官员、驻军和他们的家眷外，似乎已有内地居民前去新疆屯垦经商。比如说在叶尔羌，马达汉拍摄了一张当地大庙外由“内地人”架设的赌桌（图 8），画面上一个站在突出位置居高临下的人物应该是其“所有者”，他一副清朝中原的“法定”打扮，头戴瓜皮帽，身穿长马褂，脑后拖著一条辫子；而将赌桌团团围住的各色人物中，既有他的“同胞”，也有很多高鼻深目的当地撒尔特人。如果说这张照片只能含糊地证明中原的影响而无法详细说明这些“外来者”或满或汉的民族属别，那么另一张在喀什噶尔城中拍摄到的两位妇女（图 9），则更有力地间接证明了汉族势力已经在边疆扎下根来。这两位撒尔特妇女坐在马车上，态度自然，面目姣好，

然而她们的发式和衣著，却俨然一副汉人女子的模样。马达汉解释这是因为她们嫁了汉人丈夫的缘故。这些展露于照片中的细节，揭示了晚清边疆民族关系和格局的新变化。



图7 马达汉：阿克苏镇台一家在打靶



图8 马达汉：叶尔羌大庙前的赌桌



图9 马达汉：喀什噶尔著汉人服装的撒尔特人妇女

而走出城市，在新疆广阔的牧场、河谷和草原地区，马达汉为吉尔吉斯人、卡尔梅克人、柯尔克孜族、土尔扈特人等游牧民族留下了不少影像记录。他对特克斯河谷中的卡尔梅克人颇有兴趣，十分关注他们的精神领域和宗教信仰，因此拍摄了喇嘛寺庙，甚至取得喇嘛们的同意，专门为他们做法事的情景摄影留念（图10）。而在与当地牧民交往的过程中，马达汉显然十分敏感于自己的职责，不动声色地调查了这里的屯兵制度和武装、战力情况，伊犁地区六苏木头领“纳生巴图”和他所辖的士兵的照片就是这次考察的生动成果（图11）。在其中一张卡尔梅克士兵演练打靶的图像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些“戍边部队”在武器装备上实在是相当落后的，他们使用一种老式而简陋的毛瑟系列卡宾枪，由于平时都用它来打猎，因此为了方便瞄准，有的枪杆上加装了两根结实的长木棍做支架；而能够使用的弹药也十分匮乏，照片中只有一位士兵腰间绑著一排子弹。马达汉对这次军事演练评价很低，在他的日记中，他称这些士兵“毫无一点军人的威严”，“枪支保养极差”，“瞄准动作实在太差劲”。



图 10 马达汉：卡尔梅克人的喇嘛庙内做法事的喇嘛



图 11 马达汉：卡尔梅克士兵的演练

相比起它的竞争对手，英国也毫不落后，在 19 世纪 70 年代起也在新疆展开了一系列外交和考察活动，最重要的一项成果应属 1873 年福赛斯（T. D. Forsyth）外交使团出使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在与中国签订贸易条约的同时也著手收集商业、地理和政治信息。因为担负著情报搜集的任务，使团的考察队员很重视摄影术的运用，所摄照片大部分登载于两年后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的《1873 年出使叶尔羌报告》（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中。而这次考察中进行的访古活动，也成为 19 世纪末西方人在新疆的大规模考古挖掘的先驱，间接开启了其后针对新疆遗址、古迹的摄影再现类型。

稍晚的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爵士可谓是其中的表表者。这位卓越的探险家和声明狼藉的文物大盗于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和甘肃一带开展了一系列的探险活动，单是 1900-1901 年的第一次中国西部考察，就拍摄了 800 多张摄影底片。但因为其兴趣和任务，相比起其他商业摄影师，斯坦因的成像内容大多是考古遗迹的现场记录与沿线的地形地貌考察，对当地人的现实生活并不特别关注，对民族差异以及社会形态也著墨不多。不过这些照片的确能反映边疆的一个侧面，而那些被开掘出的古墓、庙宇的景象（图片 12），也是帝国主义在华活动的重要补充。

我想要重点论述的是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在 1910 年的中国西北行中拍摄的照片。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是晚清非常重要的外国观察家，虽然严格而言他并非“英国人”，但作为在英国海外殖民地出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莫理循一直忠实地为自己的母国服务，自 1895 年开始担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特派记者长达 20 余载，在北京政坛和西方新闻界都拥有很大影响力。这次西北行是他 1894 年西南之旅后的又一次长途游历，行程始自北京，途经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等省，最后到达俄罗斯，耗时半年。在西行备忘录中，莫理循表达了对这次旅行所抱有的兴趣和期望：“我此行的目的是了解中国西部的状况，察看其商路和大中小学校，以增进我对中国的认识。……此行将极大地增长我对中国形势的见识。我对中华帝国壮大与繁荣的各项事业均表关注。”而这种关注不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兴趣。作为一名记者，莫理循的西北行可谓是一次相当公开的探访和考察，在整个旅程中他一共撰稿 12 篇，以《穿越中国和中亚》为题于 1910 年 1 月 31 日至 1910 年 9 月 24 日刊发于泰晤士报上。和同时期的马达汉相比起来，他的旅程并不孤独，起码有许多读者正跟随著他的脚步，分享著他对清帝国的观察和分析。

虽然未曾言明，但莫理循为何要在 1910 年这一时期探访西北，个中原因值得玩味。此时，清廷在义和团庚子事件后推行新政已近 10 载，西方各国均对这一“自救活动”十分关注，因为其措施与成效、其实行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将直接影响西方各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或重建，因此必须谨慎考察，全面评估。莫理循的公开寻访，是与马达汉秘密考察相对的另一形式，如果说马达汉是以科学研究为烟雾弹，那么莫理循的“非官方”和“记者”的身份则是他的保护伞，而且他在北京多年积攒的人脉也助益良多，以至于清廷实权人物端方为他开出的介绍信上，仅称“其人学行素所深佩，而于中国政俗研究精详，而持论公平，于两国多所补益”，此次前往西域只为“一扩见闻”，希望陕西巡抚恩寿“优加招

待，使得宾至如归，亦嘉惠远人之美政也”。然而在面具之下，莫马两者的动机和目的又极为相似，他们都选择在清帝国一个十分敏感又相对薄弱的战略地区，搜集新政最为可靠和重要的信息情报，用以评估清廷的统治局势，为本国对华关系的调整或延续、甚至中亚的区域政治建设提供第一手参考资料。这一点从莫理循的旅行文章中对西北各地的铁路建设、教育、禁烟、工业、金融、军事、传教、民族等社会情况的关心中可以看得相当真切。这些文章既是凝练的简介，也是直观的评论，似乎的确成为英国舆论界判断局势的参考，其理由就是在刊登完莫理循的系列游记两日后，泰晤士报发表了题为《西部中国的发展》的社论，其中根据莫理循的观察和分析，对中国的现状做出了审慎和正面的判断：“记者此次旅行的最大收获是，他发现西部中国在大发展。正在进行的改革清楚地说明清朝的皇帝恢复了权力。北京保守势力的影响仍然存在，成为改革的阻力，但他们无法阻止各省革新的活力。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从未被真正削弱的有力证据不在紫禁城内，而在幅员辽阔却人烟稀少的地区。”

除此之外，莫理循的西北行中也对英国的老对手俄国的行动倍加关注。特别在行程进入新疆之后，“俄国”明显地频繁出现在莫理循文字中，他在关于乌鲁木齐、伊犁地区、伊犁-阿克苏沿线、喀什噶尔等文章中均有提到了俄国在该地区的策略以及动向。而出于对英国利益的维护与关心，莫理循对英、俄在这些重要城市的不平等贸易关系忧心忡忡，也对俄国在这一地区努力经营的交通优势感到焦虑。但他同时敏感地察觉到，英俄关系在中亚地区发生了诸多显著变化。鉴于俄国驻华公使、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以及其他军官在他的旅途中给予的帮助，莫理循乐观地说：“这一关系在过去表现为敌视，现在则被高度的友善与和谐所替代。”而这种变化，则恰当地反映出国际政策的变动。

与文章相对应，莫理循在考察沿途拍摄了许多照片，据整理共有 658 张之多。他的风景照与民情照均是较为随意的社会采风，对当地的标志性建筑、重要地点、城市废墟甚至百姓的生产生活道具等多有表现，但风格似并不明显。然而莫理循人物照却大有看头，它们风格粗砺，手法简约，被摄对象居于照片中心位置，不加更多修饰。虽然如此，但这些照片并不是民族学与人类学意义上的肖像照，而是更近似于直率朴素的新闻快照风格。而也许是为了潜在的调查导向，莫理循人物照的设想似乎更注重“兼容并蓄”，他的镜头曾经收纳过差人、乞丐、罪犯、老妪、主妇、传教士等不同性别和身份的人，强调一种广泛“取样”的客观效果。

而随著旅程从山西、甘肃愈发向西北深入，莫理循镜头下的族群也越来越多元，特别是进入新疆境内之后，一种多民族混居的状况非常集中地在照片中显现出来。而这种情况的复杂性在影像上的表现是：在新疆，不同地方与地方之间甚至同一地方的城乡之间，均存在著跨度极大的族群差异：在入新疆后的第一站哈密，莫理循为维吾尔族农民、小贩、妇女留影（图 13）；而到了乌鲁木齐，汉人似乎又重新在他的相册中占到一个较高比例，城市中的混居状况明显。在伊犁，除了汉人与维族人的照片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哈萨克人与蒙古人，甚至还可见阿富汗（图 14）和俄罗斯侨民的影像；喀什则有更多塔兰奇族（在莫理循的游记中，他说塔兰奇族是从喀什、哈萨克或喀萨克迁移来的居民的后裔）和吉尔吉斯人。然而虽

置身于不同的族群中，但莫理循似乎是以同样的眼光对他们等而视之，因此在他镜头下，无论是愁眉苦脸略显犹豫的塔兰奇族老人（图 15）、笑容灿烂的阿克苏商人，还是骑在马背上双目低垂的乌苏蒙古人，甚至满面迷惑的维族新娘，无论他们是神态紧绷还是怡然自得，都自有一种直面观众的勃勃生气和魅力。



图 13 莫理循：新疆哈密的女性与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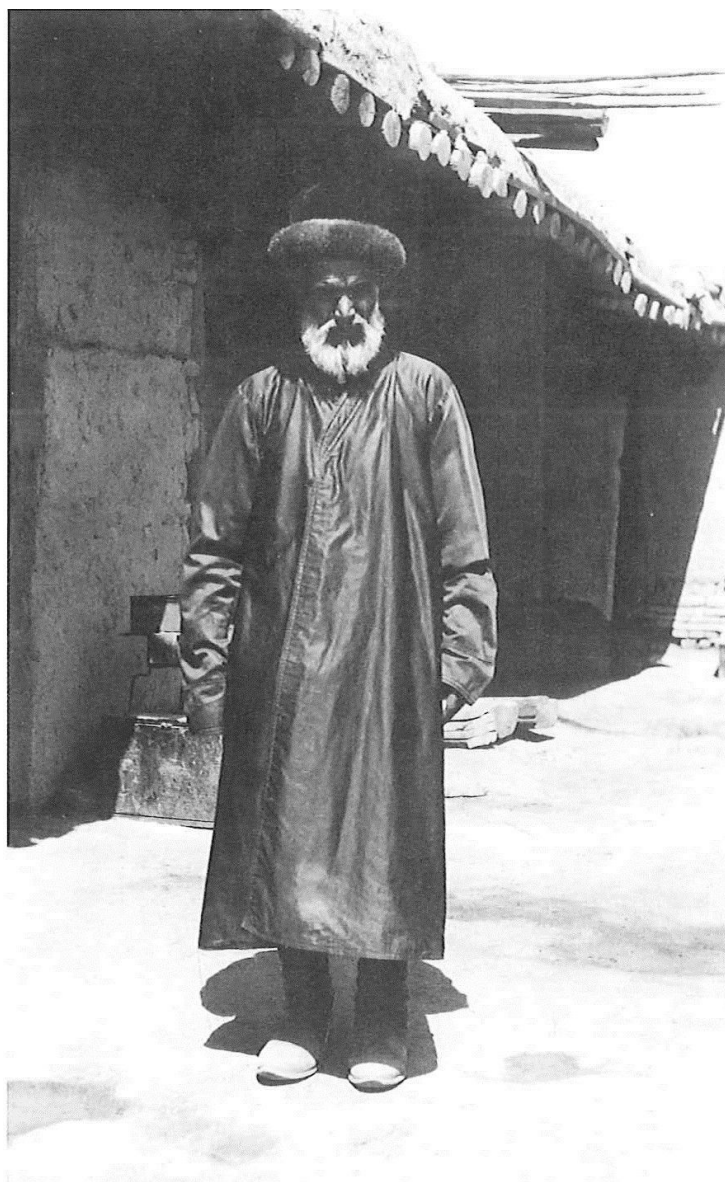


图 14 莫理循：新疆伊犁的阿富汗侨民



图 15 莫理循：新疆塔 兰奇老人

在这里需要再补白一句的是，莫理循不仅拍摄了晚清西北的风土与人情，对西南的风土与人情也多有记录。1908 年，莫理循在初次游历中国西南 14 载后，重新回到云南，在思茅地区拍摄了多幅少数民族的照片。在本章提到的摄影师中，他是唯一一位在新疆和云南都拍摄照片的旅行者。而其云南成像在以后会更加详细地谈到，这里先按下不表。

几十载过去，在二十一世纪的“旧照活化”热潮中，晚清的边疆摄影渐渐被中国观众所知晓，而其中，“西北”这个区域的影像，特别是以马达汉、莫理循为首的新疆旧照受到了相当的关注，而这一关注主要来自于学术、艺术、摄影界“业内”。国内对马达汉摄影作品的关注是“西学东渐”式的，上世纪末，芬兰出版界率先开始重新发掘马达汉的西域考察记录，并于 1990 年由彼得·赛德伯格从其上千张西域考察照片中选编了 87 幅集结成书，作为芬兰-乌戈尔学会人文科学丛书中的一册出版。而后这本图册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芬兰大使馆高级外交官王家骥翻译，并于 2000 年以《1906-1908 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为名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国内唯一一本马达汉的摄影资料（之后兰州大学于

2003年曾发行过一本名为《曼涅海姆 1906-1908 亚洲之旅摄影集》的书，然而它只是90年芬兰编选本的不同中文译本，所收录照片完全相同。）这本图册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对马达汉及其西域考察的学术研究计划之一被翻译和出版的，该中心主任马大正教授在《图片集》的序言中交代了事情始末：2000年，马大正与王家骥结识，商谈之下有感于国际学术界中中国边疆探查史的升温与探险家马达汉的鲜为人知，决定合作开展马达汉西域考察的资料收集、翻译整理和研究工作。而当马大正看到芬兰版《马达汉图片集》时，他被旧照片定格历史的美丽震撼，于是立刻建议将其翻译出版，直接促使了《图片集》中文版的问世。译者王家骥也在《译者的话》中强调这本图片集是中国马达汉西域考察著作系列的首篇。可见，国内对马达汉摄影的引入和出版，与其说是面对公众的视觉读物，不如说是针对专门领域和人群、有著明确学术研究导向的资料类书籍。

而莫理循的西北照片则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境况下被发掘并介绍到中国的。莫理循去世后，其夫人按照其遗愿，将他生前所整理、收集的关于远东生涯的全部文件、信函与日记捐赠给迈克尔图书馆，其中的图像部分包括莫理循自己的肖像照片、他亲自拍摄的各种事件、景物、社会风情照片与搜集的各类摄影作品与明信片，共有几千张之多。其中，唯一由莫理循本人编排成册并逐日注解的是其亲自拍摄西北行的照片集。虽然迈克尔图书馆对所有的档案图片都进行了编排和整理，但由于图像资料数量众多，主题零散，再加上莫理循写在照片上的记录笔迹潦草，难于辨认，因此长时间以来，这批照片基本仍处于“尘封”状态。1993年，中国旅澳画家沈嘉蔚在偶然的机下看到了这批馆藏照片，深以为然，萌生将其系统地发掘与出版的念头。而在此君的主动推介下，福建教育出版社与迈克尔图书馆联系、接洽，终于取得了出版摄影集的机会。

2007年，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由沈嘉蔚编纂的照片集《莫理循眼中的近代中国》。这本相册分为三卷，其中所收录了500多幅照片从迈克尔馆藏图片中所精选出来的照片。需要强调的是，这部书不仅包括莫理循自己的摄影作品，也包括了他的图片收藏。但为了保证1910年西北行系列摄影作品的完整性与独立性，沈氏只从这部分700多幅照片中选择十余幅人物肖像编入书中以示收录，而更为完整的西北行照片系列，则交由资深莫理循研究者骆惠敏先生的夫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史学》学术期刊资深编辑骆海伦女士整理编辑，以待出版。

而一年之后，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莫理循眼中的近代中国》的姐妹篇《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不过与之前计划不符的是，骆海伦女士在编辑工作进入尾声时因病无法继续，于是转由沈嘉蔚代为完成，并由莫理循研究者窦坤负责资料的翻译及补充说明。虽然如此，骆海伦注重考据的编辑方针和策略仍然决定了《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的性质，她在尊重莫理循对西北行照片排列顺序的基础上，根据莫氏日记整理了逐日的旅程状况，并从中摘抄出了关于新疆、喀什的资料与莫氏赴西北前写的计划备忘录，也收集了旅程中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的12篇报导。正是这些努力，使得这本相册在编辑与出版社的合约中，最终被定位于“学术品质的资料性图册。”

也许是这种稍偏“专业”的定位影响和限制了相册的宣传、发行和传播。与前一章约翰·汤姆逊与其中国照片的境遇相比起来，莫马二位可以说是相当寂寞。这两本相册在出版时非常低调，没有大众舆论为其造势，也没有同名巡回展览帮助其在大众中普及影响。而就照片集的发行而言，《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印刷3200册，而《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印刷仅2000册，数量不多，且没有再版，可想其在广大读者中的平平反应。

而在更为“大众”的层面上，这些关于西北的边疆旧照似乎也有些“运转不良”。2002年，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套五卷本“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系列，介绍了普尔热瓦夫斯基、斯坦因、马达汗等曾游走于中国西部的探险家。作为通俗读物，丛书以传记形式评介了他们的西部考察经历，然而对其摄影作品却著墨不多。虽然书中的确附有少量他们自己拍摄的摄影作品，但那些照片仅是文字之余的点缀和增加书本趣味的历史材料而已，编者似乎没有考虑在“探险家”之外兼顾其“摄影师”这一身份。而边疆摄影作品这种并不高的“存在感”说明，中国的出版界对西域探险家认识较为单面，对其摄影作品即缺乏认识，也不够重视。当然，在这种状态下，这些边疆摄影也不可能在普通读者中完成所谓普及。

而就上文提到的《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和《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这些“专门”影集而言，其视野与出发点体现的是“外国人”处在“外部”来思考和观察中国边疆的角度：前一本忠于莫理循的原版编排，力求在“还原”与“重现”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增加准确的解释性细节；而后一本则体现了图册主创人和图片编辑、芬兰人尤卡·库科宁的眼光，或者更确切地说，体现了一位当代西方人理解晚清边疆的具体视野。在材料的编选上，库科宁用影像构建了一个较为“均质”的西北：他试图在各个不同省份的章节中较为平均地表现汉族与少数民族，而也很注意在照片中表现不同的社会阶级——通常是坐镇边疆的汉人官员与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的对比，但这造成了两者在照片数量上的大致持平，客观上“稀释”了少数民族在相册中的比率。■

觀瀾

第七期

觀察報告

2014 • 大雪

觀瀾學社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前言

闰九月的冬天，终究没有毫厘雪色，朗日和蓝天倒成了主要的风景。这样一个冬日里，香港在清理街头的黄伞，北京在清理圣诞派对后的垃圾，上海则在清理证券市场的一片喧嚣。过不了几天，官方可能要照例总结 2014 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对很多人来说可能的确是意义非凡，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可能又是平淡一年。一些老人物死去，一些新人物出世。未来的历史怎么考察公元 2014？又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年份？当然，经验表明历史的许多伟大转折往往就在“无足轻重”的步步积累之间。

2014 年，色彩不再分明的香港，突然又成为了中国政治的要角。持续数月的“占中”与“占钟”，往来反复的“非法”和“公民抗争”，最终湮没在年末大 Party 的欢乐之中。TVB 一直热播的情景剧《爱·回家》，温馨浪漫的中环背景悄然挪到了对岸九龙半岛的金融区。这部收视率极高的情景剧，充满了办公室政治，但是却从来没有给过“占中”一个镜头，好像从来没有过这件事。淮南子所谓，“目察秋毫之末，耳不闻雷霆之声；耳调玉石之声，目不见太山之高”，听与察都因偏好而产生盲点。人只愿意相信自己的偏好，而偏好往往则由于关注，关注又牵扯到利益。我们以专题来观察香港，自然不是 TVB，上到五大家族的形成，下到 Facebook 的运用，一概观之。虽未始能全面，但希望能展现更多的偏好。

艾伦·布鲁姆在回忆雷蒙·阿隆的时候，即如此描写，“相对于各种流行的社会史，作为历史学家的阿隆只关心政治史，唯一且真正的历史”。现代大学不断产生受到经典和严格训练的人，操持陋业以谋稻粱。作为其中一个混迹末业的人，虽然有着这样的爱好，但也仅仅是完成一些抽屉之作罢了。观澜的意义或许就是这样一个抽屉，可打开看看，又可随着关闭。有关于中国近代政治的连载笔记，也有经济基本面的分析，还有对同样是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的观察——的士和厕所绝非是人间小事，更有专文解释这世界不止一条的丝绸之路。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不管是惊涛还是涟漪，姑且就记下吧。

“观澜学社”是一个自发、独立、非商业的网络社群。我们关注当代中国历史的展开，我们计划每隔两至三个月公开发布一份《观察报告》，上一期《观察报告》的编号是“2014 年·秋风”，以后也将逐次按照中国农历的节气编号。本报告属于观澜学社成员内部交流之用，如需转载、引述，以及任何形式的利用，请与相关作者联系。看到本报告的读者，如有兴趣查阅早期报告，可向 guanlanxueshe@gmail.com 索取。 ■

目录

法政篇

李靖云：利维坦时代之后的国家建设（三） 5

李靖云：工程师革命家——江泽民的政治肖像 9

经济篇

楼晟：北平无战事，另有新常态 12

本土/国际篇

张昕：“一带一路”思考——到底有几个“丝绸之路”？ 14

萧敢：印度二则——的士与厕所 17

专题讨论：“占领中环”运动

李潇雨：从“世代”和“阶级”角度看占中运动 21

聂日明：“香港化”的逻辑与现实（上篇） 24

张宁曦：对《“香港化”的逻辑与现实》一文的评论 33

张宝莹：从警方拘捕占中网上发言者看言论自由及互联网私隐 34

刘舒婷：对《从警方拘捕占中网上发言者看言论自由及互联网私隐》的评论 36

李永峰：占中、互联网、历史终结的随想 39

法政篇

利维坦时代之后的国家建设（三）

作者：李靖云

利维坦国家建设的党国道路

1911年革命，中国告别了皇帝，但是未曾告别的是传统帝国的国家机制，以及对田赋—官僚系统的高度依赖。从中央政权的角度看，关税+债务成为了重要的财政来源，清末以来新官制改革的上层科层官僚构成了主体，而地方政权则恰恰相反，仍然是以田赋+厘金为基础财政支持，帝国时代的吏构成了行政主体。但不论中央还是地方，军事集团的支撑则是基础。军政府的建立，一般被认为是政治的临时状态，但是这个临时状态至少是一个普遍阶段。现代政治中，军事竞争是政治的主流，国家的失败源于军事竞争的失败。传统帝国政治的溃败也是以军事失败为起点，军事集团取代帝国原本的统治者，成为统治的核心，这也是现代政治发展中的普遍状况。但是问题是军事集团掌权之后的变化，这经常表现了不同的国家建设的政治路径。

袁世凯以及北洋军事集团，本身是清帝国政治改革的产物。为了应对内外的政治压力，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发生了分裂，曾国藩领导的湖湘集团，建立了一个以厘金—幕府—营官的体系。相对于传统的皇权—田赋—科举官僚政治集团，这一集团则是督抚—厘金—洋务军人政治集团。直到清帝国瓦解，这一政治集团正式成为中国历史的主宰不同于皇权和传统士大夫精英群体。这一政治精英群体可以被概括为军事洋务精英（注：洋务并非是指以其西方化，而是指基本垄断比较长期的与西方列强的交流渠道），作为地方督抚政治遗产的直接继承人，他们拥有了较强的政治实力，但是仍然是一种有着地理局限的政治权威。从政治权威角度讲，本身的政治授权角度看，首先既有皇权的授权，又有本地的政治认同。其次，则来自于本身的政治实力，既军事和财政能力，也就是迈克尔·曼所谓的基础组织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系统的强弱。袁世凯在并没有现代国家政治组织体系的条件下，成为了中央统治者。临时参议院的授权，并不能解决其本身组织权力不足的问题。作为北洋集团的领袖，袁世凯能够调动整个北洋军政系统的人财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有效的指挥整个国家。在清帝国的非人格化国家制度失效之后，袁世凯所凭借的更多的是个人化的关系来重建整个机制。通过个人化的政治安排，建立一套非人格化的制度，这是难度极大的一种政治跨越。政治家个人的技巧和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除了这些较为私人化的东西之外，政治家本人对个人化政治关系的依赖程度也是关键。袁世凯所不幸的是，虽然他和俾斯麦遭遇非常一致，但是他并无俾斯麦的赫赫武功，事实上也无法取得如此辉煌的对外武功。所以他无法像俾斯麦那样，能够通过自己的权威去建立改造全新政治体系。故而袁世凯总面临着权力事实上不够大，而外界已经觉得其已经是超级权力的拥有者的尴尬处境。袁世凯在称帝之前，曾数次和冯国璋的交流，慨叹“民国办不下去”，冯国璋则说，如果励精图治几十年，袁世凯能把中国办的由弱变强，那么他不要忧虑自己的权威不够强。这一私人交流很能反映袁世凯的尴尬处境，以及他和北洋军事政治的实际关系。袁世凯这种“超级权力陷阱”，在北洋集团后

续人物中多次出现，无论是段祺瑞还是曹锟都有过相似的经历。很大程度上，作为北洋元老的张勋谋求清帝复辟，也是解决这一“超级权力陷阱”的尝试。

虽然从历史成效来看，北洋军阀时代的中国，或者说第一共和时代，从国家建设和基本制度搭建角度看，有着许多成就。但是总体来看，“超级权力陷阱”长期存在已经注定了这个政权无法继续下去了。当下中国很多人，包括一些严肃的历史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政治上最为开明的时代，甚至是宪政法统得到真正尊敬的时代。但这些对当下政治的感情投射，基本属于盲人瞎马的论断。北洋政权时代，宪法多次颁立，从袁世凯制定天坛宪法，再到曹锟制定新宪法，宪法都打上浓重的个人政权烙印。政权对言论的克制和放松，并非是从宪政立政的宽松，而是政治领导人个人的技巧选择。由于政权对传统政治结构的权威高度依赖，北洋时期，虽然丧失了对政治的系统性驾驭地位，但是文人士大夫传统文化精英保持了大量的政治特权，对于政治行为可以做出专断的评价，这时期所谓“言论自由”的黄金时期实际是国家建设不力的一种反讽。细究那个时代传统文化精英的政治言论，主要为各种建国理论设计，这事实上是一种宪法的不忠诚反对。而且这种宪法的不忠诚反对，不仅是观念与认知上的反对，更是一种行为上的宪法不忠诚反对。

散布在中国的各种地方军事集团，近年来也被认为具有多中心政治特点，这是另一种盲人瞎马的判断。中国近代的地方军事集团，勃兴于清帝国晚期的全国性叛乱，镇压叛乱的方式导致了督抚一厘金一洋务军人集团的割据。与多中心治理相反，这种地方势力本身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守旧性。由于其能力和体量都比较小，固守维持区域稳定，往往都是其第一选择。这本身就注定了地方势力并不能成为传统政治系统的革新者，反而会是一个保护者。地方势力对中央的抵御，首先就是拒绝基础组织权力的被整合，其次是对财富税收的抵制。从修铁路到发行货币，中央的任何一种政治的改革，都无法深入到社会的细胞之中，地方势力的抵制就是最为关键的阻挠。

如果做一个简单总结，清帝国晚期的改革，以传统儒家的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为主导，进行了全方面的改革。改革的结果使得中国政治重组的走向为“帝国重建方式”，其主要的依靠是督抚一厘金一洋务军事系统。然而到了清帝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北洋军阀集团掌握了政治权力，却出现了政治停滞，进退维谷的状态。根本而言，这一集团和皇权是共生关系，缺乏授权权威的直接后果就是基础权力系统（infrastructural power）基本无法确立。一个附带的恶果就是英国式的宪政建设路线，实际在中国宣布失败，这一法统的丧失对未来中国政治走向造成了许多问题。

袁世凯死后的中国政治，孙中山成为了一个中心人物。从力量对比看，直到耀世，孙中山都不是最具实力的人物。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孙中山是这一时期最有“折腾能力”的人物。在直皖丰以及两广集团之中，孙中山是最早发现“法统”已经完全失败的人物。袁世凯死后，能够将“宪法”扶上马的政治权威已经不再。不管是段祺瑞也好，曹锟也好都无法有足够的政治权威保证“宪法”上马。当时更为有竞争力的是吴佩孚，但是吴佩孚本人得到的信赖，仅仅是传统文化精英群体和军事洋务精英群体的信任，他并无独立的政治权威可以维持。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政治授权关系，吴佩孚不仅不可能背叛曹锟，反而受制于这一种清誉，更加依赖北洋集团的身份辈分等差。否则他既无法发动组织其政治资源，也无法增强其政治信赖。军阀洋务精英+传统文化精英构成了北洋时代，中国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致胜联盟。对于孙中山而言，他基本不可能被这个联盟接受，这样一个政治联盟中，他是一个局外人。对他而言，既然不能进入这个联盟，合适的办法是再造体系。我们现在看，孙中山选择的是布尔什

维克道路，但其本人更感兴趣的不是在共产主义的理念，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迅速夺权的方式。布尔什维克被排斥在之前的政治致胜联盟内，但通过全新的政治组织体系，建立了自己的“选民”基础，从而获胜。俄国的政治变革事实上也是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政治变革方式，我这里继续使用芬纳的政治分类，这是广场—宫殿式政体。芬纳指出，这一政体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时代，而形成一种体制，则是列宁作为立法者的一个创新。这是传统政治走向现代政治的一种方式，芬纳视为宫廷政治的变种，从长期来看，并非是一种临时个别现象。

孙中山的基本政治基础在广东，但是他的政治手法则是全国性的。国民党是一个全国性政党，这是孙中山的最大的政治资本。将国民党全面改造成一个列宁式政党，通过党的政治组织型式，全面组织治理社会。传统文化精英对于乡土政治有着天然的权威，人民服从这些精英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习惯。国民党一大之后，党组织的全面深入，意味着党的组织将取代地方政治这种“服从”。服从不再是天然的必须的，而是有疑问的，也是不应该的。来自启蒙思想与欧洲社会主义的观念，合并为三民主义的理论。平等、自由等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非一种法权关系，成为一种国家建构乃至治理的手段，作为代替传统的宗法意识形态。这里就财政行政和意识形态基础三个方面做个简单的对比。

军阀洋务精英+传统文化精英政治体系：

行政： 层级化军事组织+科层官员，地方保守精英+洋务精英

财政： 传统的田赋+近代厘金，关税+盐税，外债

意识形态： 传统礼法+宪政政治术语

党国体系

行政： 党务官员+科层官员+军事官员

财政： 现代税收货币体系+党务体系征收的传统税赋

意识形态： 党组织的纪律伦理+泛启蒙思想组合话语

孙中山不幸的在这套机制成熟之前辞世，但是无疑他是这样一套机制的缔造者。毛泽东称其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辛亥革命固然重要，但是毛所强调的则是“国民革命”——既通过“政党”这一政治组织，全面组织社会，确定全面建设现代国家。如果没有孙中山以自己的政治实力来建立这套机制，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只能是一个边缘的知识分子政党。如果孙中山没有过早辞世，他更大的可能是走上凯末尔将军的道路，由他自己展开清理共产党的工作。但是随着他不幸刚刚触到一生政治的高点，不幸罹世，所有可能都改变了。国共的分裂，造成了党国道路的竞争关系，竞争的残酷，几乎挤压了中国所有的政治动员力，也造成了空前的权力紧张。这里我不再对中共最终取胜做什么比较多的分析，必须指出的是不论是财政还是行政以及意识形态，中共都有许多先进之处，譬如说货币和财政组织。这里仅分析一下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目前在中共的政治话语里非常热烈。

客观而言，毛式的党国国家重建方式和孙中山所开创的党国道路并不差别，甚至在做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时候，毛泽东就为这一党国体系建立了初步的宣传系统。除了更为严格的执行这一基本体系，以毛泽东思想命名的意识形态以外。毛泽东更为具体的贯彻了“群众路线”——这一在今天被中共反复提出的政治路线。正式这一政治行为的理论和推动，中共从最基础政治细胞建立了党国体系。

一般而言，宪政国家的建设是其主要的通过选举政治确立现代国家的授权机制。国家能力提升与民主选举必须互相促进，才能保证国家的良性运转，而一般的“权利”则是通过司法体系，当然更广泛的说是法治系统来维护的。这一现代政治体系，不再是宗教或其他的伦理性约束，而是体现一种竞争伦理，基于法权意义上的“平等”关于，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互相承认的政治。政治上的互相承认则是透过选举建立的。选举中的选区划定，拉票，拜票，以及各种竞选活动，甚至于贯穿选举历史的暗杀，以及早期投票中的抢票斗殴活动，这些都塑造了一种上下共通的政治意识。从而保证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交流，达到彼此的“平等”确定。就更为广义来看，选举的这种内在政治意义，要比政治责任的划定更为重要。那么党国体系，作为一种宫殿政治，必须要有一个广场过程，否则就不可能是一种现代政治。可以设想，如果法统没有断裂，传统文化精英可以非常轻松的通过选举形式将自身授权，投票给他们是一种天然的正确。这已经被亚非拉大部分后进国家所证实，建立选举非常容易，但是选举制度仅仅是为了保证传统政治秩序与精英权力，而非保证现代国家建设。

与这种宪政国家体系不同，党国体系作为一种严格的金字塔权力体系，没有选举安排的话，即或在内部的权力体系中建立某种类型的政治责任，并无履行政治的相互承认的机制。而毛泽东对“群众路线”事实上通过一种政治行为，建立了这一职能。将政治场域从一个抽象的政治活动，下沉为一个具体的“事件场域”。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很早就指出，小范围下的权力关系再造是相对容易，而且非常容易产生认同的热情。干部必须来自“群众”，特别是直接来自于“群众”；必须要能从针线事务做起，具体到服务好“群众”生活的日常细节；广场政治运动的即时发动，保证“群众”全身心无障碍的投入到政治活动中。“群众路线”的这三个规范性要求，保证了党组织嵌入到社会基层中，取消了传统精英色彩，带以道德性要求意义的先锋队，来其统治作用。通过“为人民服务”这一政治行为证明“人民当家做主”和“所有人都是平等”这一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得到了这种承认之后，党国体系的潜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动，从而迅速建立秩序并加强国家能力。这里也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直接实践方式便是“阶级斗争”，与经典的马列所谓的阶级不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更多以你我寻找共同敌人作为核心理念，通过对敌人的确立与打击，翻转之前的被压迫不被承认的屈辱感，达到互相承认的政治效果。这是毛泽东一个独特政治创造，也是毛式党国道路不同于苏联列宁主义最大的特点之一。这一路线本身带有的强大颠覆性作用，也是被历史经验所证实的。■

法政篇

工程师革命家——江泽民的政治肖像

作者：李靖云

他是革命时代最后成长的一代，如果说有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话，他是最后的接班人。同时他又成长在一个官僚士大夫世家，同样如果有士大夫接班人的话，他也是最后一代。江泽民的出身，家庭长期以来是一个禁忌话题。他的生父是汪伪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嗣父则是一位新四军的抗战烈士。发生在他家庭的故事，可以发现，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所谓的“救国”选择是多样的。沐浴传统中国文化的江父，加入汪伪政府和郑孝胥促成满洲国的建立可能怀有同样的美好想象。中国近代多个伪政权，都有大量的传统士大夫精英加入，这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有趣但是并相当程度上忽视的话题。

对于江泽民而言，革命救国的内容既包括牺牲也包括建设，所有的革命和建设都和“重工业”高度相关。革命的武器需要重工业，国家的建设也是重工业。江泽民以重工业为自己的专业，从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家族走出来，这是一个普遍的选择。他曾经学习过的中央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都是以科学理工专业教育为方向的。江泽民选择成为共产党员，既是时代的选择，也是客观的必然。作为一个向往改变世界的年轻人，加入一个更为基层，更容易出头的政党，而非是遍布世家和派系的老大党是最优的策略。选择专业是自然的，但是为什么选择革命呢？

专业报国与革命救国在中国近代是一个高度交叉的历史，革命树立了技术主义的政治正当性。所谓的专业技术理性主义，在革命话语中以“科学”的意识形态被推举到一个无上的高度。江泽民如此，他的同代人李鹏也是如此。只是对江泽民而言，更多的是欧美式的工程教育，他也曾经留苏学习，工程师并没有国别。从政治属性上讲，江泽民和李鹏都是党政特权干部精英，国家的统治者。工厂与工程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而非简单的技术单位存在。作为工程师，江泽民担负着政治领导工作，而非是技术责任。从机械、汽车到船舶再到电子工程，从东北到中南，江泽民的政治经验横跨了整个中国。他宽大的眼镜，喜欢穿白色衬衣，留细密的头发，发福的肚子都是一个时代党政干部精英的特点。

作为工程师的政治领导的江泽民看重绩效，也推崇绩效。国家是一个机器，政治也是一个机器，党也是机器，必须要有效运作，高效的产出，专业水平的提高。如果说邓小平是通过战争经验总结国家竞争的模式转变，江泽民则是天然就接受这种转变。邓小平那里改革开放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意义，而江泽民看来改革开放就是实现绩效提升的工程措施。不管是系统工程还是一个革命的继续，江泽民都完全的贯彻了这一方针。为人民服务，从一种革命战争的干部观念，转化为一个具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态度。从做上海市长开始，江泽民对修下水道，铺路建桥就有超乎寻常的热情。他将这一热情带到了中央，并且深化成为一种政治政

策。大陆对岸岛上“第二中国”的民选总统李登辉在“第三中国”的领袖李光耀面前讥讽江是木头人，李登辉以及很多人都准备看到苏联故事再现。但是李光耀当时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大力投资所谓“第一中国”。江泽民离任之际，中国经济从低谷走出，进入了一个飞快的发展过程。这位退休领导人看到实力对比的变化应该非常开心，这是他的道路决定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江泽民是一个毫无文化情趣的人。正如李鹏在回忆录里讲述自己跳舞和接触俄罗斯传统文学的经历一样，江泽民是一个有着深厚士大夫精英文化修养的人。相比较而言，李鹏是成长在革命文化当中，而江泽民则是成长于精英文化之中。这一差异给两人的政治生涯带来一些差别，最为重要的就是江泽民有更多意愿和渠道接触更多更新的社会理论。无锡顾毓琇纪念馆，藏有几份江泽民与顾毓琇之间的毛笔通信。顾毓琇向江泽民推荐了吉登斯的著作与理论，从回信看得出来，江泽民对于吉登斯的新社会理论非常关注，感谢老师的推荐，并且要求中国官方研究机构注意研究。从政治家的特点而言，这是江泽民更值得留意的特点。江泽民传中也强调江泽民很早就大量学习西方的经济理论，应该并不夸张。至少笔者的一位老师就给江泽民专门讲过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西马的最新历史理论。理论视野有多大的影响力，恐怕一时难以评估。但是必须要注意的是，对江泽民而言，这是革命的一种继续，理论的更新必须要保持活力。

与对各种新的社会理论爱好相比，江泽民更为让人所知的是对文化艺术的爱好，流利的外语，对音乐的爱好，长于唱各国的歌曲。中共老一代的革命领袖更多是以政治家的卡里斯马人格来显示自己的魅力，而仅仅是革命接班人的江泽民则更多的显示了士大夫文化精英的底色。他可以显示自己的博学，专业能力，以及艺术爱好，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以“naïve”来斥责记者。也正式这一点，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得以解放的传统文化精英喜欢对他有着一种莫名的好感。但是作为党政特权精英的江泽民，政治上的强硬并不逊于他的前辈。他可以雷霆手段解决《世界经济导报》问题，也能够迅速建立强大的武警强力力量以备社会弹压。一切的玫瑰色彩仅属于个人的情趣爱好，江泽民从来就没有觉得这有着政治身份的意义。他在公开场合总是组织大家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本色。他已经无法再有卡里斯马的战神魔力了，他可能是1949年以后中国领导人中段子最多的人。但是他个人的情趣，士大夫文化精英的色彩，虽然为他加分不少，但是仍然未曾扭转这一局面。乃至自他上台起，总是被认为是过渡人物，但是他整整过渡了十三年，平稳中交接了权力。

改革和开放是江泽民的历史使命，也是他作为一个务实革命家的本质。工程师治国在后发国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不要说通产省里大量的工程师官员，江泽民的学长，严家淦就是非常典型的工程师。江泽民对于竞争的理解要比革命一代有更多的变化和体验，经济科技到非战争状态的国防，他都有了全面的改变。甚至于他看到了好莱坞电影的意识形态塑造能力，专门强调了美国“主流价值观”的现实意义。后来影视节目中强调“主旋律”，这很难不让人觉得这是他的贡献，虽然到底也没有捏合出一个主旋律。但是江泽民至少直接接触了竞争伦理的争夺战，而且必将对未来中国的国家政治产生极大的影响。

江泽民离开中国政治中心已经十年了，他最后的信件如此写到，“在我之前，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三个职务是分开的，我将这三个职务合为一体。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也正式这封信中，他卸任军委主席，从而正式完成了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转移，这一制度在2012年由胡锦涛习近平职务交接得以巩固。这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最重要也是最大的改革。

下野的江泽民，喜欢游山玩水和听课。这位喜欢历史的政治领导，既喜欢清史，也喜欢世界史。据闻，一位资深的世界史学者给江泽民讲了很长时间的文明史课程，突然江泽民问他，“你说共产主义会实现吗”，教授一时语塞，调整思路正准备回答的时候，踱步中的江泽民突然扭头说，“我看未必”！ ■

经济篇

北平无战事，另有新常态

作者：楼晟

随着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结束以及四中全会、北京 apec 峰会的召开，中国经济虽然在增长数据上依旧步履蹒跚，但当局一直描绘的新常态与顶层设计终于露出了峥嵘。而由于脉络被理清，纲举目张之下，资本市场也迎来了一波久违的上涨狂潮。

之所以会提及近期热播的《北平无战事》，一方面是因为国人向来喜欢借古讽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的确可以为我们解读当下国内经济提供启发。与坊间热议的“打虎”和“无间道”不同的是，多数在讨论《北平无战事》的人只看到了蒋经国与南京政府在內战后期的回天乏术，打虎失败，却看不到几年后退守台湾时，陈诚能成功实施土改这样比打虎要更猛烈的变革政策。所以这部电视剧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同样的组织也能在短时间焕发出不同的执政能力。同理，在经历了一轮猛烈的自清运动后，北京政府不论在组织体系还是运作机制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推进很多政策时的效率与得失，也无法再用胡温十年的旧眼光看待。实际上，通过近期的政策变化可以发现，本届政府推出的政策组合拳的强度与频率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能力。当多数人可能还按着旧常态的思维在为了一项政策的得失争论的时候，该政策的走向已经确定了。

从目前已经出台的政策看，新常态可以被看作以农村土地确权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标的物，以金融改革创新为杠杆，结合行政司法体系改革的引导，推进第二轮工业化。

首先从土地确权和混合所有制来说，这不但是社会上舆论左派与右派之间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在经济学界内也争议多多。而在旧常态下，正反两方又都没错——因为以旧常态中权力碎片化的状态，任何非帕累托式的改革都难免变成一次官商分肥的盛宴，所以左派的“守旧”未尝不是一种持重之策。同时改革派虽然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有清醒的认识，自身却因为瓜田李下，失去了执行力与号召力。而随着改开后三十年最大一次党内自清运动的展开，使得行政与司法得以有了实质性进展，让当局的组织与执行力获得了提升，才能推动这些之前在旧常态下只能冷处理、徐图缓进的制度痼疾，把土地和国有资产这两项国民经济里最大宗的资产的盘活。

然后通过金融创新与改革，为这些新盘活的资产加杠杆，为第二轮深入工业化、提升产业水平提供所需的资金支持。如果没有对旧体系的破旧立新，对一些诸如地产、地方政府这样的既得利益部门和阶层进行打压，就不能保证新增杠杆被有效利用，无法控制金融创新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我们才能看到，公开周永康案以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束后，房地产限购马上开始松绑，央行的降息与存款保险制度也随之而来。同时在资本市场上，政策宽松并没有使得房地产类股票成为本轮市场狂涨潮中的主力，反而是金融板块成为领头羊。这体现的就是市场中的“聪明钱”对新常态脉络的把握与理解。

而在这一切后，我们就不会再诧异于中方在 APEC 上向美国提出主动减排目标——这

种与哥本哈根回合气候谈判时截然不同的态度，其实是标志着中国政府在新常态上的蓝图规划已经布置妥当。减排问题已经不在是欧美 拿捏中国的贸易问题的把柄，反而会成为中国未来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筹码。因为中国经济未来不但可以通过产业升级、提高效率缩减碳排放量，还能通过“一路一带”、“亚太自贸区”这样的手段，用资本输出来向外隐藏碳排放与贸易顺差。

综上，在新常态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国内资本市场虽然会因为短期涨幅过大而进行一定调整，但向上的趋势已然确立，以金融创新作为新增杠杆的主力，资本市场会围绕新常态下的各个主题，展开一波牛市行情。■

本土/国际篇

到底有几个“丝绸之路”？

作者：张昕

中国最高领导人在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先后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一时间，以这两个概念为代表的中国新领导层全面开花的区域和国际经济战略成为各方关注的热议话题。

近日被频繁使用的“丝绸之路”概念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和政治概念，而是一个流动的历史概念，也不仅仅是以传统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概念。就与该概念最目前关联最密切的区域能源合作而言，“新丝绸之路”和诸如“欧亚”等概念，作为空间和政治经济上的边界，也随着能源技术、全球能源市场供求关系、以及周边国家本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包括中国在内，动用或者接受“丝绸之路”话语的国家都要做好准备，对上述概念保持一定的开放程度，不断修正自己对于上述概念在空间和政治边界上的界定。

具体而言，随着“丝绸之路”和欧亚概念在近年的兴起，至少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三个大国都提出了三套不同的地区发展方案。美国在 2011 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俄罗斯在 2012 年全面提出的“欧亚联盟”和中国最近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此外至少还有土耳其、韩国、哈萨克斯坦等次级力量从各自立场出发积极动用了“丝绸之路”话语。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重心落在打通从印度开始由南往北的通道上，促进从南亚经阿富汗到中亚的经济走廊建设和地区发展。和中国的丝绸之路计划相比，2011 年美国版的“新丝绸之路”动议的提出非常仓促，主要是为了在 2014 年撤军的前提下，为该地区提供一个正面的话语，这种心态导致美方没有很好评估政治意图背后的经济利益。目前美国和盟友资源有限，所以希望新丝绸之路有关的新基础设施项目能够财政独立，并且主要由私营部门驱动，而现实中间美国企业不愿意承担进入该地区的风 险。美国在推进新丝绸之路计划以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又坚持排除中俄。对于中亚国家，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更多的是将该地区经济重新导向美国的新盟友印度，而削弱和俄中的关系。但是相应的具体政策都没有得以有效实施：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然气管道。但是现实项目基本停止，或者根本没有开始。而且，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已有建设成就也没有说服力，使美国的“新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对美国是否有足够坚定的决心和足够强大的能力来推进此计划产生质疑。因此虽然其提出时间早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但实效有限而且已基本退出政治舞台。这些因素都导致美国版本的新丝绸之路已经很难起到最初预期的效果。

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项目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项目，和此前提出的关税同盟和欧亚共同经济空间一样，都带有明确的在政治上整合前苏联空间的意图，而欧亚联盟更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个人项目。在中国提出自己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之后，俄罗斯会越来越地使用“选择性一体化”策略：深化和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经济相互依赖，增加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

斯坦的影响，土库曼斯坦则被忽略——只要它保持稳定和中立，俄将在中亚有称霸野心的乌兹别克斯坦则视为最大问题。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过程最有可能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主权被逐渐吞噬。对俄倡导的多个一体化项目，中亚国家态度不同且不清楚，导致没有合力，美国也不愿意与这些俄主导的项目和组织直接对话。俄主导的这些一体化项目对外也可能形成新的贸易壁垒。考虑到中国目前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贸易中的份额已经超过俄罗斯，这使得未来可能加入欧亚联盟的国家的态度都不积极。去年开始的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事件和近期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俄罗斯经济呈现危机前兆等近期变化，都可能会让欧亚空间内的其他国家对于俄罗斯目前追求的欧亚空间进一步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的构想产生更多质疑。但同时，近期俄罗斯面对经济制裁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又给欧亚空间内其他国家和其谈判的筹码，同时给了中期内加快欧亚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更高的政治必要性。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原有的经济模式遭遇瓶颈，国内结构需求发展到某个阶段需要对外施展，进一步持续发展需要新动力，国内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也需要借助对外发展来调整，“一带一路”便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诚然，高铁等技术突破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硬件上的可能性，但是本质上还是国内整体局势的变化直接导致“一带一路”的提出。“一带一路”的提出也可视为中国外交话语权的主动出击，这与新的领导层重视主场外交和议程设定权的外交理念一脉相承。事实上，一路一带的现有内容中有不少过去已有的政策主张，比如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能源管线建设、与中亚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与中亚前苏联地区的农牧业合作、跨欧亚的交通带建设等。这些政策主张本来和“一带一路”并无直接关系，而且在近几年已经得到推行，只是如今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便把这些既存政策主张再次纳入“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中来。

在中俄美三个大国提出的地区性发展倡议里，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具体，也是类似宏大计划中唯一一个全面集中在区域经济发展上，并且有具体内容的计划。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已经承诺的具体资金投入也使得她提出的经济带最具有实质意义。和其他的类似计划相比，中国主导的经济项目超越了关于内政事务、国内改革或者博取政治影响的话语；和俄罗斯相比，中国不要求中亚国家绑定某些贸易政策或者寻求贸易交易背后的政治结果；和美国相比，中国不要求中亚领导人同意国家内部改革的时间表。而且，总体上，中国投资者和西方投资者有很大不同，后者受制于本地法律、环境保护和避税的诸多丑闻，并且不同意帮助当地政府实现经济多元化。因此，中国为“新丝绸之路”合作伙伴开出的条件（包括能源合作的条件）更能够被接受。同时，中国也将中亚各国一直在寻找的能源市场多元化转变为现实，因此以能源合作为主导之一的中国版丝绸之路在该地区的多个宏大叙述中具备了足够的竞争优势。

还有就就目前已经公布的信息来看，中国已经建立和正在筹建可能为“一带一路”计划实行融资的区域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就两者的性质和职能而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政府间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而“丝绸之路”基金是一个高规格由政府多边合作基金，其地理覆盖范围更广，并允许民营资本的加入。

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制度建设还处于紧锣密鼓的商讨阶段，其创新之处之一在于中国可能会借鉴在国内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积累的经验，比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宝贵的经验。此外，中

国可能会突破完全按照出资额或者资本比例来分配机构的控制权的惯例，即不严格按照股权和资金投入取得相应比例的投票权和控制权。这会使机构中各出资方的主要权利相对平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际机构和开发性金融国际合作领域的一种制度创新和突破。这些内容目前在其他国家关于“丝绸之路”的构想中都没有出现。

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建设过程中，保证投资效率会有一些难度，尤其是当大量潜在投资是在投资周期漫长的公共品领域，而投资所在地又大多是投资环境不佳、投资风险较高的地区和国家的状况下。另一个难题是如何避免中国成为这些金融机制实际的控制者。不管是在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还是在丝路基金中，中国毫无疑问都是最大的出资方。若将视线转向美国，会发现美国正是凭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拥有的股份获得实际的否决权或者主导权，造成对小国的不公平。因此，中国需要避免重蹈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覆辙，避免对“一路一带”金融机制的绝对控制，违背共同发展的原则。同时，中国也需要规避所占股份份额多所致的大份额的风险，面对这一挑战需要高度的政治和经济智慧。■

本土/国际篇

印度二则

作者：萧敢

—

印度大城市的市内日常交通有多贵？这主要取决于你的讨价还价能力。很多人都能证明，讨价还价能力对车资的影响可能要超过路程远近的影响。出租车在印度不算普及，更常用的是被称为 auto 的黄绿色机动三轮车，以及条件更差、需要人力踩踏的人力三轮车。很多出租车和 auto 上并没有装计价器，即使装了也不用，还得靠嘴来谈。上车前要谈一次，下车付钱前重新谈一次，有时恳求、有时威胁，包含了各种花样。

虽然讨价还价要浪费大量时间精力，双方屡有纠纷产生，路径不熟的外地乃至外国游客对此尤为苦恼。但 auto 司机们乐此不疲。利用讨价还价敲诈得来的超额车费乃是他们每天重要的收入来源。许多年前就有人主张给所有 auto 装上计价器，规范这个行业。现在每年仍有大量这方面的提案提交给各级政府。但这个貌似简单的提议在印度就是推行不下去，至今仍没有 auto 司机使用计价器。

Auto 本身是个非常庞大的产业，在东南亚许多发展中国家皆是如此。大量进城农民花很低的价钱就能买一辆 auto，办了运营证就马上开始做生意，也许就可以养活一家老小。这是一个自生自发的产业，每天都在变。政府并不对 auto 数量加以限制，所以各地到底有多少 auto 几乎不可统计，每辆车背后的产权关系就更不可考。Auto 司机之间的竞争非常厉害，司机还常想拉着乘客去别的地方，或是额外买点什么，好多赚外快。印度交通设施很差，auto 又不规范，导致它的车祸率、事故率都很高。可它终究是印度最主要的市内交通工具，大家离不开它。

政府多年来对 auto 乱宰客现象漠不关心。这个行业就是一个社会减压阀，可以吸收大量社会闲散劳动力，使得大家看起来都还有一份工作好做。终于有一些企业家坐不住，主动提出新的解决方案。班加罗尔一家私人出租车运营公司声称，他们公司的汽车将严格执行计价器计费，最终收费可能比条件简陋的 auto 更低。他们的基本收费标准是，一辆有空调的出租车在 4 公里之内收 49 卢比起步费，10 公里大约会收 200 卢比（目前汇率是 1 美元=62 卢比）。这个价格确实很低，4 公里之内甚至比 auto 更低。而很多 auto 也不太愿意走 10 公里那么远。

政府方面的交通管理者这时才站出来。他们拿出一些二十多年前的法律条文，指责这些出租车公司搞不正当竞争。印度过去一直执行计划经济，曾规定出租车每公里的指导收费价格为 20 卢比，可现在这些私人公司把车费降低到了每公里 14 卢比。这些私人公司则反驳说，政府制定的价格是天花板，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单纯从油价算，每公里的价格约 4 卢比就够。这些公司通过挖掘潜力把边际成本降低到了 14 卢比，这对于消费者而言更是一

件好事。

法律上的争议还在发酵，这些出租车公司继续做着生意。一些风险资本也加入进来，大手笔地投资出租车公司。他们正在计划购买更便宜的国产汽车 Tata Nanos 投入运营，这将有可能进一步降低车费。他们联手之下现在打出了 2 公里 25 卢比的广告，而街头的 auto 司机无论如何都不肯按这个价格接生意。当然智能手机和拼车软件的兴起也在这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Uber 是世界知名的拼车软件，目前正在印度飞速扩张。许多时尚的印度出租车司机也在车上放三四部手机，各种约车信息不断。

司机不肯用计价器，这个问题几十年都解决不了，但目前似乎正在被智能手机所解决。乘客带着智能手机，本身也是一个计价器，可以方便地计算经过路程以及耗费时间。用这个作为计费依据，下车付钱时真可以少费很多唇舌。出租车司机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逐渐地主动规范化自身的服务。而 auto 司机的条件参差不齐，有针对 auto 市场的打车软件如 Autowale 也在扩张，多数 auto 司机则在与此种趋势做抗争。

若是观察打车软件在 auto 市场上的拓展，也会发现许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 Autowale 深知 auto 司机不像出租车司机那么有钱，多半买不起智能手机。他们就放弃 GPS 监控和电脑自动分配订单的做法，让有经验的职员根据事先调查了解的 auto 位置分布，手工下单，短信通知 auto 司机。这样虽然不比 Uber 高效，但 auto 数量更庞大，也很有可能在未来为公司带来惊人的收益。

目前印度的交通状况就是少数规范化的出租车司机与大量不可辨认、不受管束的 auto 司机之间的竞争，后者的规模要大得多，所以许多人对于出租车行业能否保持指数型增长持怀疑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进步确实正在促使印度司机的行为模式作出调整。

印度市内交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安全，尤其是女性的安全。印度女性的地位较低，各种性犯罪层出不穷，臭名昭著。近年来发生一系列大案，频频引起国际关注。性骚扰、性犯罪在印度的各种场合、各种交通工具上都曾发生。印度一些地铁和火车上专门设置了女性车厢，很有帮助。可 auto 和出租车对此就无能为力。过去常有女性投诉 auto 司机对她们骚扰，最近则发生了出租车司机利用 Uber 软件强奸女乘客的恶性事件，引起全国性的抗议。目前新德里政府已经停止 Uber 在新德里地区的所有服务，对于出租车行业是一个重大打击。

女性安全问题是印度的千年顽疾，绝不是打击一个拼车软件就会好转的。也许未来会有专门针对女性客户的租车软件出现，但那仍是治标不治本的举措。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印度市内交通存在的大量问题，根源仍在经济贫困、失业率高、基础设施落后、管理制度落后这些方面。拼车软件也许会对此有所推动，但要想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整体的进步。

二

印度的环境污染举世闻名。燥热的天气，弥漫的灰尘，肮脏的河水，无形的传染病，更可怕的是时时可见的随地排泄，从农村到城市，男女老幼皆是如此。著名印裔作家奈保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访问故乡印度，就为随处可见的就地排泄场面所震惊。奈保尔当时访问过许多当事人，大家表示这就是印度传统习惯，贴近自然。甚至还有人表示，随地排泄本

身有一种“诗性”。他把所见所闻写入游记《幽暗国度》，在印度引起轩然大波。

很多印度官员、学者都为这种社会现象辩解，说这只是印度经济转型期间特有现象，公共厕所不足，人们也还不习惯去公共厕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难免保留农村的陋习，恰被在城里闲逛的奈保尔发现。随着经济发展，这种现象会自然减少甚至消失。他们谴责奈保尔，作为一个知名作家，不应该只把眼光盯在这些方面。

那场争议迄今已有半个世纪，印度经济也已取得长足的发展。近年访问印度的游客，还是很容易在城里看到这种场景，更不用说农村。那么程度是否比奈保尔所看到的有所减轻？人们的习惯是否有所改变？政策评估专家已经为此付出很多年的努力。

在发展经济学里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假设，即改善一个发展中地区的基础卫生设施（如修建更多厕所），有可能极大地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脱贫致富。中间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痢疾、疟疾等恶性传染病对儿童的伤害比对成人伤害更严重。改善卫生情况就能降低儿童感染这些疾病的几率，使得孩子身体更健康，学习更有效，积累人力资本，最终将自身人力资本投入经济建设，帮助整个地区经济发展。

这个设想获得很多学者的赞同，并且在非洲、印度等很多地区加以尝试，已经取得一些支持性的证据。但要具体评价这类政策的效果并不容易。健康儿童如何将自身人力资本转为经济利益，这算是经典经济学命题，暂且放置一边。更基础的问题是，在印度（尤其是农村）大力推进厕所建设，是否真的减少随地排泄，是否真能有效降低儿童的传染病感染率？

1999年，印度政府提出一个“全面卫生计划”，要在2012年之前在全部农村实现修建厕所的计划。政府的动力应该不是文明考量，而是实实在在地追求卫生目标。但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计划，执行力度颇为可疑。很多地方政府听取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意见后，同时推动另一种扎根基层、社区主导的修建“公共厕所计划”，目标是让社区内不再出现随地排泄的不文明现象。

但学者们对社区主导修建厕所的政策效果存在意见分歧。一派支持的人认为，修建公共厕所所有示范效应。村子里修建公共厕所之后，家庭也更有可能性去修建厕所，从而真正消除随地排泄现象。反面的意见则认为，千百年来陋习很难改变。如果在村子里修建了厕所，各个家庭可能反而更不愿意修建厕所，并不一定会提高厕所的拥有率。

另一个与之有关的问题就是厕所的利用习惯。人们随地排泄，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厕所可用，比如印度有些大型贫民窟聚集了上百万的人，却只有不到十个厕所。可另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并不愿意使用厕所。即使在有厕所的情况下，很多人也会选择随地排泄。所以提高厕所的拥有率并不等于也提高了厕所的使用率。

环境卫生与传染病的关系则更为复杂。随地排泄既容易通过空气传播疾病，又可能通过污染饮用水来传播，毕竟农村很多饮用水都是露天的。而痢疾、疟疾这些疾病的发病率还与气温、蚊虫情况以及传染病本身的周期有关。一个社区里染病的比例超过一个临界点时，传染病就有可能大规模爆发。传染病的爆发还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与金融危机的爆发差不多，几乎不可预测。

面临如此多的困难，世界银行专家和许多印度学者还是投身于这项研究，取得一些阶段性的结论。首先是每个家庭的厕所拥有率显著上升。虽然远没有实现“全面卫生计划”所要求的2012年厕所覆盖所有农村的要求，但还是迈出了一大步。有些学者认为，随着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拥有厕所的比例自然会提高。但印度的数据表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反而比那些收入稍高的家庭更有动力修建厕所，收入稍高的家庭很可能省下修厕所的钱而用于其他面子上的事情。印度家庭拥有厕所比例的提高，政策作用十分显著。

另一点令人欣慰的发现是，社区修建厕所并没有挤出家庭修建厕所的热情，反倒发挥了示范效应，促使家庭也更积极地投身于厕所修建。拥有公共厕所的社区，家庭也更有可能修建厕所。当然这里也存在其他解释，比如高种姓群体不愿意和贱民共同使用厕所，因而在家里修建厕所等等。但毕竟家庭拥有厕所率有所上升。

可是再来看传染病的数据，结果就没那么乐观。推行“全面卫生计划”以来，各个地方感染痢疾、疟疾等传染病的儿童比例并没有显著下降，儿童的身高和其他身体指标也没有显著改善。儿童身体健康是否受益于这个政策，结果十分可疑。这里面存在许多需要解释的问题。

第一点是数据本身的问题。所谓十年树人，涉及人本身的政策评估需要很多年的数据对比。目前常用评估儿童健康指标如贫血比例、成年身高，都需要更多的观察时间。目前判断政策效果还为时过早。

第二点是对传染渠道的认识还不足。儿童有可能因为周围有很多感染痢疾、疟疾的人而得病，也可能通过不干净的饮用水而得病。任何一个渠道的“短板”都可能导致发病率的居高不下。单纯从厕所拥有率来研究传染病可能并不充分，至少这并非唯一的“短板”。

第三点，也是最有意思的一点，人们的行为模式不一定完全改变，或者改变的速度有可能低于厕所的建设速度。虽然社区里有了公共厕所，家里也更多地有了厕所，但人们不一定坚持使用厕所。很多私下的访谈表明，即使有了厕所，许多印度人仍然喜欢随地排泄，奈保尔所观察到的正是印度人的本质习惯，而非过渡时期的偶尔失范。

另一项基于全国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在过去十多年里，印度各地随地排泄所占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不要忘记印度人口同时也在飞速增长。从绝对数量来看，随地排泄的人数反而在增长。人的行为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大家在街头有可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随地排泄，示范效应可想而知。

“全面卫生计划”或“社区修建厕所计划”的效果还有待评估。但我们在之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在印度街头肯定仍能看到随地排泄。改变这种陋习，要比许多印度官员的设想困难得多。■

专题讨论：“占领中环”运动

从“世代”和“阶级”角度看占中运动

作者：李潇雨

在 2014 年大中华圈的文化政治语境中，“占中”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年度词汇。这场声势浩大的香港民众运动，以 2013 年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发表在《信报》上的文章《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为滥觞，经过漫长的行动策划、动员、讨论甚至预演，终于在 2014 年 9 月 28 日凌晨由学生先锋们坐实。随着运动的发展，当初由戴耀廷提出的“和平占中”早已发酵升级成为“雨伞革命”，占领者在金钟、中环、旺角等地用障碍物瘫痪交通，在马路上搭设帐篷，彻夜留守，甚至与警察长期对峙，形同割据状态。而 11 月底占领据点之一旺角被警方武力清场后，被驱散的人群又以“流动占中”形式重新集结，以购物、过马路等为由聚集大量人员进行反扑，这种策略性的、更加无中心、散点化的“游击战状态”，标志着占领行动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

虽然戴耀廷曾为切割责任或摆脱骑劫运动的指控，两度出声希望厘清他所打造的“和平占中”概念与现时“雨伞革命”的差别。但是，戴的构想仍然体现在整个运动中：不仅大众媒体和广大市民仍然习惯以“占中”来指称 9 月 28 日以降在香港各地点所发生的种种对抗和抗议行为，其参与者和支持者也自觉以示威行动的“和平”性质作为理据，强调抗议行动的合法性以及控诉港府及警队的行为失当。而作为近年来香港所发生的耗时最长，影响最为严重的社会事件，“占中行动”虽然由人数、力量对比参差，政治诉求不一的政党、社团、知识分子、市民共同经营，但整体说来，这是一场由年轻人所领导和贯彻的大规模公民运动。其核心力量“双学”——学民思潮、学联，不仅贡献了大多数持续稳定的示威者群体，而且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组织和执行职责；除此之外，部分年轻中产人士也是运动的支持者。这种人员构成在“世代”“阶级”上的特殊性，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占中行动的文化表征与政治性质。

线上与线下的互动社群

早在 2010 年，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中所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反政府运动，就让人初见社交网络作为信息中介与载体“点燃”、推动群众性运动的效力。同样，在占中行动的初始阶段，年轻的占领者十分熟稔地利用网络技术平台，创造出一个实时的、高度同质化的信息空间，第一时间起到了发酵情绪、传播信息、召唤同盟的作用。占领者所使用和依赖的 Facebook 是一个用户群相当年轻而且高度依赖影像的社交网站，在占领行动发生的当日凌晨，大量上载自现场的照片及视频使它成为一个权威、庞大的自媒体，而影像也“尽职”“生动”地向用户普及了运动的信念，渲染和强化了运动所面对的肃杀气氛，使年轻用户基

于同情和支持迅速结成了线上的共同体。除此之外，由于 Facebook 所提供的线上社交服务部分基于用户间在线下现实生活中的联系，因此占领者的“线上同盟”有助于将运动向线下社群推动，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相互转换。

而在占领行动的进行过程中，为了避开政府和电信商可能的信息管制，年轻占领者更广泛运用 Firechat 等蓝牙及无线电通讯系统应用程序，务求可以即时将最新消息以图象、文字和影片形式传播出去。这种对新科技和新媒介毫无隔膜的运用，以及对信息流动的敏感和掌握，体现了年轻人主导的社会运动的特性。

中产价值，小资情怀与亚文化表征

占中行动爆发的“官方”原因，是为反抗 2014 年 8 月 31 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香港特首普选方法决定。这一方法明确表示，特首候选人必须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产生，而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则与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规格一致。这意味着提名委员会人数将维持原有的 1200 人，其成员也继续由四大界别的 38 个分类界别代表所担任。此决定一出，立刻引起巨大反弹，民主派人士既无法接受在行政长官选举中“民意”无法得到体现，也对人大毫无回旋空间的“落闸”表示失望，因此以“真普选”作为旗号号召公民行动，反对由资本寡头们所主宰的“小圈子”代议制选举原则。

然而在“占中行动”的实行过程中，我们却讽刺地发现，种种抗争无助于落实和实现原先拟定的原则性诉求。运动进行至今，并未打击、触动所谓大财团利益，最受打扰和连累的是般民众、各色小商贩、的士车司机。而随着运动时间的延长，运动中无法回避的“自毁”性质给社会常态所造成巨大压力。面对被迅速损耗的同情与民意调查中高比例的退场要求，占领者的固守，也从另一个层面体现出他们对“民意”尊重的地步。

更进一步来看，这个由年轻学子、年轻中产和准中产所支持的公民运动，处处体现着中产阶级追求的品味、情调和生活品质，也处处体现着他们所尊崇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则。金钟占领区物资非常充盈，针对占领者的“服务”非常细致：午后，有人发放蛋糕；而住帐篷的占领者也有摆放着各式各样护肤品，甚至隐形眼镜清洁剂的公厕可供使用。在区内，有的示威者打机，有的开始在这里种蔬菜，这种“培育行为”极其有力地象征了中产阶级想象中那充满正当性的、浪漫的，同时也远离劳作本质的与土地和自然的亲密关系。有去金钟占领区理解这场运动的留学回港青年失望而归，因为“在讲求整洁和秩序的占领区内，连一个会公开发表政见的人都没有”。当占领运动步入中期、长期对抗的局势形成之后，金钟出现了“自修室”。根据到场观察朋友的叙述，由中产阶级父母带到金钟占领区“体验民主生活”的小学生，正努力地完成自己的各种补充练习，中学生拿着教科书苦读，大学生则对着课程 PPT 讲义发呆。她揶揄这个场景高度体现了真正的主流核心价值——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在占领过程中不忘“争取时间”，为个人前途奋斗的现实，则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赖以成功的“人人皆我竞争者”的意识形态。而对于另一批支持占中运动的上班族中产而言，为了不牺牲自己的工作和“搵钱”时间，占领成为白领工作日外的“工余活动”，造就了抗争活动响应着中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时间表荣衰的奇景。

相比起金钟的中产气味，而旺角占领区则体现了占中行动“轻佻”的一面。年轻的占领者在区内涮火锅、踢球、打麻将；万圣节时则抓住机会大玩 cosplay，不仅上演蒙面示威好

戏，还以女鬼、僵尸、吸血魔等造型齐齐现身。在这个“变身”的过程里，占领者成功地将政治诉求转化为集体狂欢的一部分，也消解了政治实践的严肃性：黄伞这个占中运动的典型标志如成为行为艺术的道具，“我要真普选”也成为魔怪们手中的血书。我认为，这种翻转和解构的创造力，表现出了占领者对亚文化的高度接受与熟稔程度。但值得注意的是，与这种在消费文化中展现出的充沛的想象力相对，占领者对政治、制度内部的形式则基本没有想象能力——放眼整个占中运动中出现的诉求，除了“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之外，基本只剩“打倒 689”“梁振英下台”，其本质都是千篇一律的空泛口号，不仅无法体现日常民主政治参与的实感，也无法落实、展现“占中”的政治实践的具体细节。这些口号的“不即物”情形，恰好显示了这场运动内部的价值中空。

退场与冲突

早在占中进行了一个星期时，舆论界已有声音讨论整个运动的退场机制，呼吁适时收割运动成果。然而，随着运动的持续，年轻人旷日持久的坚持，显然出乎所有中年人的理性判断之外。

如果说运动早期尚能大打民意牌，那么在占领行动所带来的不便尽显，民众支持政府清场比例攀升的时候，占领行动的“合法性”已位于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势之下，学联和学民思潮在 11 月 30 日晚仍然发起了围堵政府总部的行动，之后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峰更是率领学民成员发起绝食行动，要求港府重启对话。与这种不妥协和判然有别的，是占中行动发起人“占中三子”的表态。他们不但早前便已撤离前线回归日常生活，近日更高调赴警局“自首”，以示自己对法治的尊重与对后果的承担。

利用现行体制的运作机制进行合法斗争，与突破规定武力抗争，是发动群众性民主运动时必将面临的两个不同抉择。后者显然会使不具有体制优势和武力优势的抗争群众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既有法律会有足够的借口去制裁暴动者。正是在这一关系下，占中行动才会一直强调自己的“和平”性质，也以此为基础攻击警方对“手无寸铁”的民众施暴的“不正义”。但公允地说，在政治运动过程中，合法抗争与非法抗争本来就界限模糊；而且对于政治运动的参与者与潜在参与者而言，更能使他们凝聚起来的纽带也许不是政治理念，而是在不公正的现实中面对共同“敌人”时的仇恨。这种非理性的感情要素尽管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但它具有在短时间内聚集多数个体的感召力。

因此，将年轻人的冲击政府和绝食行动视作一种挑衅，甚至是不谙世事的鲁莽，实际上有可能低估了他们的机心。虽然年轻人的抗争的确与以往接受妥协和协商的政治理念判然有别，也并不遵循一般现实政治伦理，但它并非是一种缺乏计算性的非理性行为。作为政治运动走到末路的最后一搏，年轻人冲击港府，开展苦行，其意图是逼迫港府动用警力“出手”与控诉其漠视人权，以争取同情、凝聚同志，巩固道德高地。他们察觉到，只有在“见血”的瞬间，运动才能摆脱沉闷与拖至尾声疲态，重获生机与正当性。这些抗争手段证明，青年人虽然对于政治理解浅薄，但对于政治斗争的理解却不全是形而上的。同时，年轻人用自己身体作为筹码，挑弄政治运动中的“情绪”，一方面说明他们对社会有效资源的占有的确偏低，另一方面则说明他们所需要承受的成本与付出的代价的确更少。■

“香港化”的逻辑与现实（上篇）

作者：聂日明

居香港，搵食不易。最近 10 年，年轻人出人头地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性越来越弱，社会向上的流动性也大为减弱。持专上非学位及学位学历的雇员，所得月收入的中位数已分别由 1999 年的 1.6 万元及 2.3 万元，下降至 2009 年的 1.3 万元与 2.22 万元，即 10 年内间物价上升，市民实际收入下降。另外，过去 10 年中，在金融机构工作的经理和专业人士收入比过去增加，但同样职位在其它行业例如运输、仓务、零售和贸易则多数收入倒退。较低薪技术、文职、服务业和非生产性工人，普遍薪金停滞和下降。

阶层流动固化与收入差距拉大，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编注）虽然保证了香港经济继续向前增长，但未惠及普通居民，但自由化却挤占了本港居民的生活空间，抬升了生活成本，造成陆港两地居民的冲突，香港本地居民很难对北京和内地居民保持好感。

作为华人地区的标杆城市，香港当前面临的局面也困扰着内地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这种境况，我命名为“香港化”，主要表现包括畸高无比的房价，生活成本高，阶层流动固化，家境普通的青年很难通过个人努力向上流动。只有理解“香港化”形成的逻辑以及现实困境，才能找到打破阶层流动固化的钥匙，也有助于避免京沪走向“香港化”。

香港的现实及“香港化”

香港是发达地区。香港的人均 GDP 高达 37,955 美元（国际汇率），与日本相当，是中国大陆的 5 倍多，是美国的 7 成。从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香港居全球第 15 名，是极高人类发展指数，相较国内，也超过了北京和上海两个特大城市的发展水平。从预期寿命来看，居世界第 4 名，仅比第一名日本少 0.8 年。自 1960 年代，香港经济起飞赢得“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声誉后，香港经济体在大中华地区的地位一直举足轻重，1993 年，香港境内 GDP 高达中国内地全境的四分之一。

如果看整体，香港无疑是光鲜靓丽的。不仅如此，香港奉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其经济重点在于政府施行自由放任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更视香港为自由放任经济典范。香港的商业规制政策精简，政府廉洁高效且有高透明度，法制健全，产权保护良好，简单低税制及货币稳定等因素，加上香港拥有劳动力素质较高，大部分经济学家均认为香港是市场经济中的佼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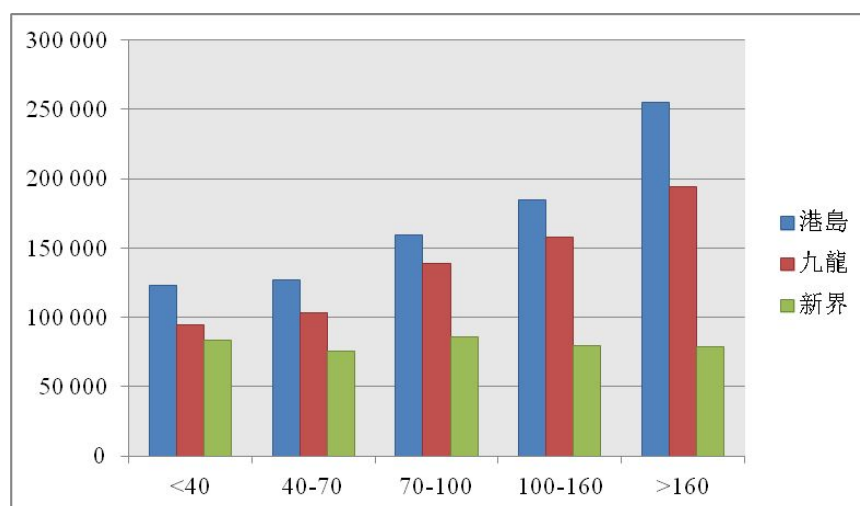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邮箱：nieriming@gmail.com，本文系未定稿，请勿引用，本文所有言论与所在机构无关，仅代表个人观点，欢迎来信批评指正。感谢周阳的助研工作。

然而，现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香港近些年来呈现的诸多现象越来越撕裂香港社会，不仅造成陆港冲突，也是占中、要求真普选的时代背景。这些现象及趋势，我将其命名为“香港化”，“香港化”不仅仅是香港一城一地的现象，内地的北京、上海等地也渐次呈现“香港化”的很多特征。

何为“香港化”？直观看来，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高；第二，收入差距大，社会资本差距大，阶层流动难；第三，本地与外地居民冲突明显。

在香港置业颇为不易，香港楼价数十年来都保持着较高水平。香港地少人密，房型普遍偏小，这使得中心城区套内面积越大，单位房价越高。港岛套内 160 平方米以上的房型，单位房价超过 25 万港币，这意味着每套 E 型住宅至少需要 4000 万港币。即使在房价水平最低的新界买一套 40 平方米的小户型住宅，也需要 332 万港币，2013 年香港全行业工资中位数是 14100 港币，相当于其 19.6 年的收入。

香港各地区、各房型房价（201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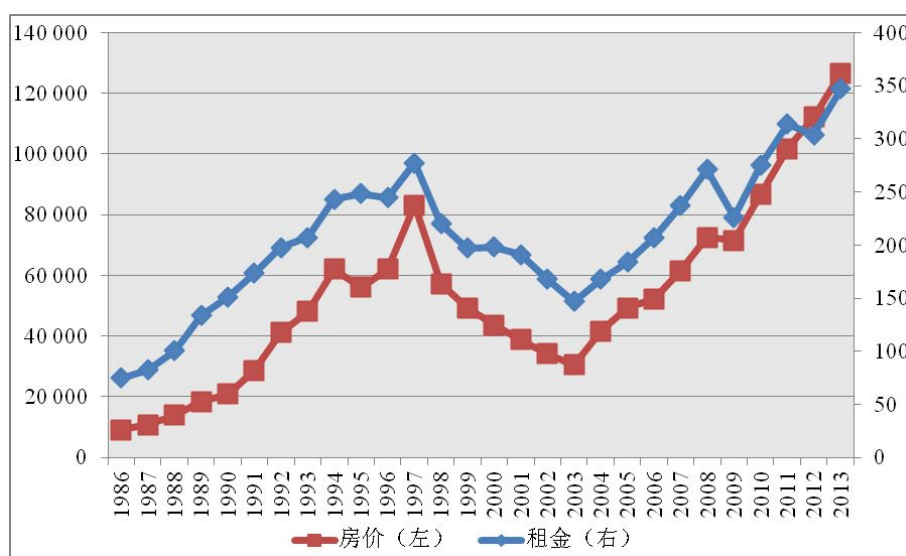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单位：港币/平方米。

住宅和各类商用楼房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其价格高低，直接决定着城市的生活成本。有戏言，“香港的一盘菜中一半是房租”，即是说这个现象。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房租，自 1986 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租金的变动幅度与房价基本同步。自 2003 年房价保持上涨以来，2013 年的租金相较 2003 年已经上涨了一倍有余，而 2013 年较 2004 年初的全行业工资指数，不过上涨了 34%。从支出结构来看，每月总支出中，用于房租（或等价于租金）及差饷、地租需要 6,418 港币，占月总支出的 29.7%（2010 年）。

作为发达地区，香港人均收入水平高，但物价水平更高，生活负担极重。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二零零九至一零年住户开支统计调查》，仅食物和住屋两项，就占据了香港居民总支出的 56.8%，算上水电煤等刚性家庭支出，共计 60%。一个家庭在吃住之外可以腾挪的空间很小。

港岛 B 类住宅房价与租金



数据来源：香港差餉物业估价署。单位：港币/平方米。

注：B 类住宅是指每套面积在 40-69.9 平方米。

以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占居民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一线城市，恩格尔系数一般低于 20%，像 2003 年时，纽约、巴黎、东京等地分别为 14%、16% 和 19%。而香港 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的这一数据分别为 25.7%、25.8% 和 27.1%（政府统计处的住户开支统计调查）。不仅远高于上述与香港齐名的国际中心城市，还处于连年增長的状态，甚至这一数字比中国内地的北京、上海也没有低多少（2009 年北京市区恩格尔系数为 33.2%）。

生活成本高，抬升了城市的居住门槛。如果居民收入高，也就罢了，但香港是一个撕裂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极大，其基尼系数为 0.54（2011 年），在美国 CIA 的 World Factbook 中排第 12 名。而全球排名中的前 20 名，除香港外无一发达经济体。2009 年，香港本地家庭的收入中位数是每月 1.75 万港币，收入少于 1 万港币的家庭总数，占全港 28.8%，收入少于 2.5 万元的家庭占全港总家庭户数的三分之二。与此同时，富裕家庭的数目也在不断增长，月入 10 万元或以上的家庭从 2000 年的 2.1% 上升到 2.9%。此即所谓“M 型”社会，两头大，中间小。

香港是一个市场经济导向的地区，贫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大向来不是问题。香港在商业竞争中，强调个人努力，在竞争中出头是主流价值观。1997 年以前，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创业故事一直是激励年轻人努力向上流动的励志故事；1990 年代 TVB 拍制的影视剧，大量的情节都是穷小子如何出人头地。

但近十年，情况发生了改变，成功创业的人士比以往少，创业的环境越来越困难，小企业受大企业挤压的态势也越来越明显。这是因为现在的企业结构呈现两极分化，以六大地产商为代表的垄断企业触手遍及全港，涵盖了绝大多数的地产、基础公用事业、零售业，限于

香港政府的不干预政策，缺乏反垄断手段，大企业很容易抑制中小企业的扩张与发展。

更重要的是，香港高房价致使现存不动产所有者具有先发优势，巨大的房价收入比，使得多数青年无法不借助父母而独立买房，有钱才能买房，房价跑赢收入，不断攀升的房价产生的财富效应，进一步恶化了贫富差距，阻碍了阶层流动。

本地居民的阶层不流动，在香港作为中心城市，源源不断吸引外地的“高富帅”来港，外来人才携比本地人更勤劳的态度，更有优势的财富和相对优秀的才华的情况下，造成外来者居上的现象。再加上 CEPA 启动以来，外来游客渐多，外地人挤占香港的购物、生活的空间，抬升了他们的生活成本，这必然会出现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游客之间的冲突。

“香港化”的特征是高房价、阶层固化与社群冲突，但并不意味着具备了这三个要素就是“香港化”。“香港化”的特殊性，在于其形成的逻辑。

自由的香港早已经不存在了

高房价当然是因为香港政府从来没有管过房价，收入分配差距与财富差距较大，也因为香港没有采用累进税制和遗产税。这些都指向香港的自由放任政策。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一生中多次把香港作为自由放任经济体的代表，认为香港的成功更多是因为更多依靠私有企业和自由市场。

弗里德曼认为，尽管英国的经济制度曾颇具社会主义色彩，但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却实行了自由放任政策。这主要归功于英国人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在主持财政司时，他坚持低税率，不干预经济，甚至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数据，担心这会给政府官员以增加干预的借口。这一“积极不干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是个非常贫穷的小岛，人均收入仅为英国的四分之一。到 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香港的人均收入同英国基本持平，尽管英国在同期也经历了高速增长。晚年时，弗里德曼也因为 2006 年香港政府实施干预市场的政策而对香港有所批评，认为现在的香港背离了自由市场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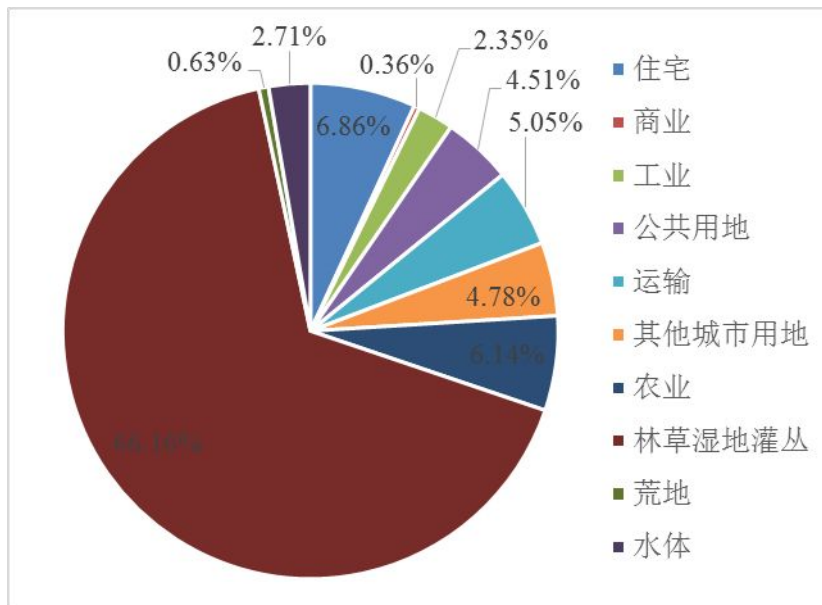
很多人将香港的现状归结于自由放任政策，如单一低税率保护了富人的利益，不干预市场运行使得垄断企业横行，掠夺了普通人的利益等。这些说法看起来似乎是对的，但其实似是而非。实际上，郭伯伟时代的香港确实是自由的，但自由的香港很早就没有了。近 30 年以来，香港的自由只是一种外在的表象。

稀缺的土地供给

作为一个自由港，香港最大的价值，抛开制度优势不谈，主要体现在土地——香港的土地可谓是寸土寸金。香港是弹丸之地，总面积仅 1100 平方公里，略高于上海的 1/6，略低于北京的 1/15，但人口却高达 720 万，整体来看，人口密度本来就很高，远高于上海和北京。即使如此，香港还是有高达三分之二的土地是林地、草地、荒地、湿地和灌丛，这些土地不做建设用地开发。城市建设用地仅占总面积的 23.9%（2013 年），按此计算，人口密度高达

2.74 万人/平方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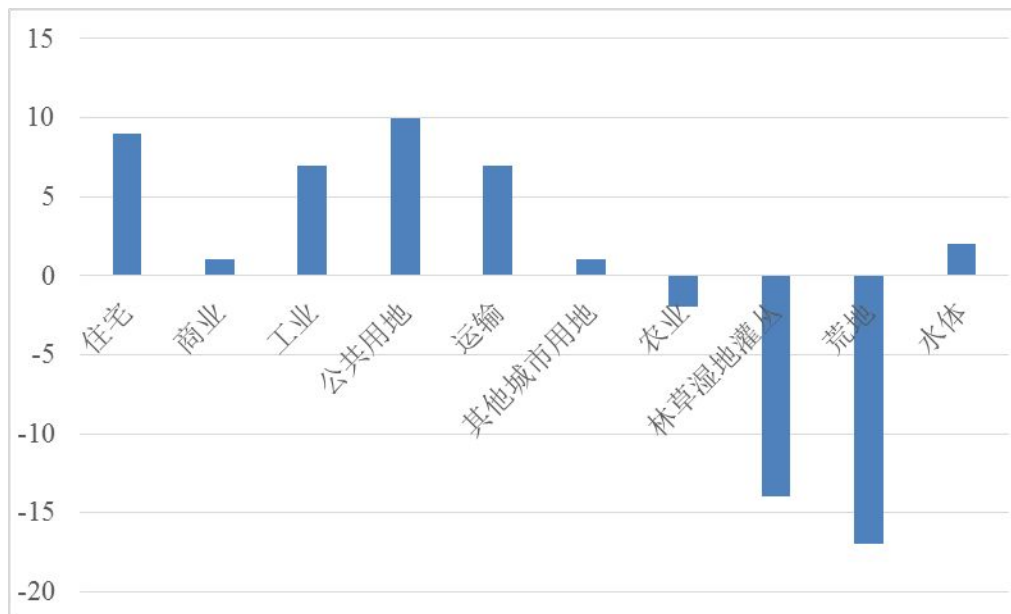
香港土地利用情况（2013 年）



数据来源：香港规划署。

问题是，香港政府对此毫无要纠正的迹象，从 2000 年到 2013 年，长达 13 年，香港住宅用地仅增加了 9 平方公里，合 900 公顷，比 2013 年上海一年的住房用地供应还要少 100 公顷，平均每年仅增加 70 公顷。商业用地甚至 13 年时间仅增加了 100 公顷，年均 7.7 公顷。

香港土地利用变动情况（2013 年-20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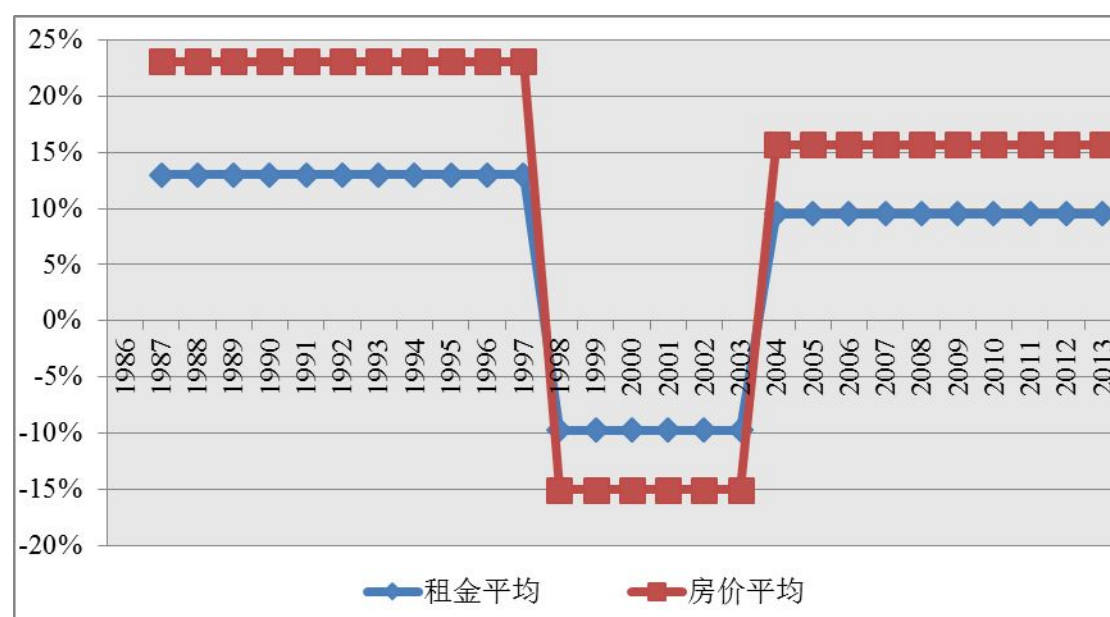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香港规划署。根据 2000 年与 2013 年的数据计算得出。

寸土寸金的香港，把半数以上的土地不做开发，保持林草湿地状态，如果认为这是保护生态，无疑非常幼稚。而这些从本质上讲，都可以归结到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以此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没有丝毫动力去放开土地供应，平抑房价。

香港房价涨的早，但也不是什么太悠久的事情。就近 30 年来看，香港房价周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85 年到 1997 年、1998 年到 2003 年、2004 年到现在，这三个时间段分别对应着三件事：

香港房价变动的三个阶段



数据来源：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统计口径住宅为全港住宅。纵轴为房价与租金的同比增速。

注：分别计算 1987 年（1986 年才有数据）到 1997 年、1998 年到 2003 年、2004 年到 2013 年三个阶段各自的同比增速的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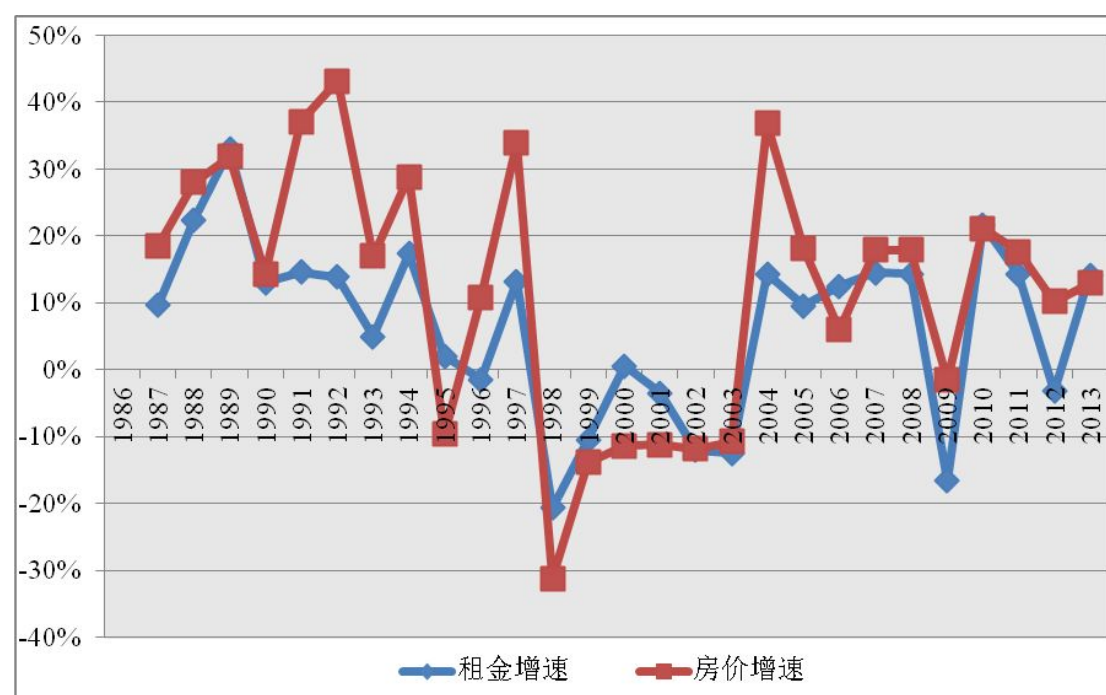
第一，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香港房价的崛起于《中英联合声明》，声明列明英方于过渡期内（1984 年—1997 年）每年只可卖出 50 公顷土地，初衷是中国担忧英国超售土地，使得未来香港无地可卖。这一政策客观上限制了土地供给，成为香港房价长期上升的基础，从 1986 年到 1997 年保持着年均 23.08% 的增速，其中 1992 年的增速超过 42%。

第二，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来临，香港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香港房价从 1997 年的历史最高点（全港平均 83159 元/平方米）迅速下跌，平均跌速为 15.05%，1998 年一年就跌掉 31%，房价在 2003 年达到历史最低点（全港平均 30497 元/平方米），较 1997 年跌去 63.3%，可谓十分惨烈。

第三，新的土地批租制及 CEPA 启动。2003 年的香港，商品房市场惨淡，居民对住宅消费的信息低迷，这也使得开发商不敢拿地开发，政府手中的地也卖不出去。定期拍卖土地的政策受到严重的挑战，流拍的不在少数。为此，港府在 2002 年推出了“救市九招”，包括

停止供应土地，停止公共住宅建设（八万五），宽松货币等，并于 2004 年开始，采用“勾地”机制来维持地价。

香港房价与租金的变动



数据来源：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统计口径为全港住宅。纵轴为房价与租金的同比增速。

随后，陆港签订 CEPA 协议，启动内地居民来港自由行，极大地扩展了香港的住宅需求，同时，2003 年起，也是内地居民收入与财富增长的黄金 10 年，大量的内地居民赴港置业。更稀缺的土地供应政策（供给少）和更庞大的购买人群（需求多），成为最近 10 年香港楼市火爆的主要支撑点，年平均增速为 15.69%，在 2010 年，房价回到 1997 年的历史最高点，当年增速高达 21.12%。到 2013 年，香港的平均房价已经高达 12.6 万港币/平方米。

土地政府所有与政府做庄

事后，我们来复盘，香港的土地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高房价（以及因此衍生出来的高生活成本等）的必要条件。在地少人多的背景下，香港政府进一步约束土地供给，加剧了住宅及商业设施的供应不足。香港独特的土地公有制，使得政府成为土地的拥有者，可以通过卖地来获得收入，这个时候，政府成为土地市场的利益中人，很难独立于房地产市场。这时的政府，更在意每年获得收入的稳定性，而不是房价的高与低及居民获得房产的难度。

以 2012-2013 年度为例，香港一般性财政收入为 3140 亿港元，而在此之外的土地收入为 862 亿，是一般性财政收入的 27.5%。如此大的一笔收入，政府很难淡定的放任其地价滑落直至土地流拍。香港一直以低税率著称，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政府通过卖地，变相回收了公众的收益。以此计算，香港的税率要提高 27.5%。

当然，土地批租并不必然导致高房价。中国内地的多数城市都采用土地批租制，但广东省、江苏省等地，房价虽然也不低，但相较京沪、浙江省等地，还是远远不足。但经济弱于广东、江苏的浙江，很多县的房价却居全国前；经济发展上平平无奇的县，房价往往可以和江苏的地级市相媲美。要知道，浙江的县中，有一半是人口流出的。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广州、无锡等地政府卖地的时候，未能控制好节奏，在土地市场下滑的时候，为了保证获得总收入不变，增加土地供给，没有及时减少土地供给以维持地价，以此循环造成长期土地价格的低迷。而如果政府财政能力充沛或土地基金储备充足，政府往往敢于减少土地供给，以维持长期地价保持在较高的位置。内地的北京、上海均是如此，追溯近七年时间，两地的住宅土地供应在多数年份都是逐年递减的。

香港也是如此。《中英联合声明》中的 50 公顷限制是一个偶发的外生因素，以此肇始的土地市场紧缺，保证了地价长期上涨。到 2002 年时，尽管土地流拍，但香港政府并不急于一时，宁可不卖地，也不让地价跌的太厉害。其背后就是因为有充足的土地基金，2003 年时还高达 2600 亿港元，而当年香港政府的一般性财政收入不过 2000 亿。

如果仅仅按此计算，香港的税率仍然不高，土地财政与一般性收入在 2012-2013 年为 4000 亿港元，仅占当年 GDP 的 18.8%。同期上海的政府性基金（土地出让金为主）与一般性财政收入合计 8130 亿港元（6449 亿人民币），占 GDP 的 29.8%。香港税负为上海的 6 成。

家族企业垄断的间接税效应

问题在于，香港的经济高度垄断，以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郭氏三兄弟、吴光正及嘉道理为代表的家族企业，几乎控制了全港最为重要的商业机构。

垄断虽然会影响经济效率，但随着技术进步，总会有创新来冲击垄断企业的地位。如果香港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放任的地区，显然不用过多的担心垄断。但现实并非如此，在建设用地数量及土地用途严格管制的香港，可供开发的土地掌握在政府和几家主要地产商手中。在 1970 年代，香港曾经允许新界等农地使用权人用其农地换取建设用地的开发权（即“换地权益书”），但后来担心这会冲击土地供应市场，很快就取消了。

部分地产商之所以有实力，主要体现在对土地的拥有，新世界、新鸿基、恒基等地产商在 1970 年代后开始收集“换地权益书”和农地，作土地储备，这些土地可以通过更改土地用途规划进行住宅与商业用地开发，使得他们成为政府之外的地主。据原新鸿基创始人郭得胜的私人助理统计，截至 2009 年，仅新鸿基和恒基拥有的可供开发的农地就高达 527.7 公顷，相当于最近 15 年香港平均年供地数量的 7 倍。

上游土地供给限制与土地用途管制，让政府与垄断地产商具备先天优势，可以轻松获得经济租。几大家族企业（及其地产公司）携土地的优势，在住宅建设、商业开发与物业管理上获利，之后运用财力收购其它资产，从公用事业开始，向衣食住行类别的行业渗透。香港因为面积小，即使餐饮这种竞争性强的行业，也容易形成垄断。上述六个家族就控制了包括

香港仅有的两家电力公司，水务公司，煤气公司，两家绝对垄断的百货公司以及各自为数众多的上百家公司。一个普通人在香港的一天生活，很难避开与这几个家族的公司打交道。

在基础民生行业、公用事业和地产处于垄断角色的六大家族，很容易对上下游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和消费者榨取经济租，是一种变相的汲取社会资源的渠道，与中国境内的国网帝国、石化双雄、电信三英扮演的角色非常相似。我们可以将其近似看成“国税第二总局”“第二土地财政”。这些支出与土地财政相近，更像是一种间接税。

按此计算，香港政府征收一般性财政收入、卖地收入，高度垄断的家族企业以垄断身份获取经济租（间接税），全香港的绝大多数企业与个人充当的是为港府与家族企业打工的角色。能够例外的只有金融业等少数几个行业，涉及雇员人数少，惠及人群少，与绝大多数香港人的生活是无关的。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弗里德曼对香港的判断。香港不是从 2006 年才开始变得不自由的，而是从 1984 年就不再自由。受约束的土地供给，极其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保证了香港政府和大地产商的利益，在低税率（一般性税收）之外，通过土地财政、公用事业收费、物业管理等向普通市民征收经济租，其实际税负并不比京沪及其它国际中心城市低。

香港规制政策简单，对经济较少干预，这恰是一种最恶的自由，在土地政策等关键性行业的严格管制，保证了大地产商的利益。在这一前提下，坚持自由放任政策，意味着放任这些地产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肆意向上下扩张，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加剧垄断趋势。这并非是自由放任的本意。这与内地的国家电网、石化双雄的垄断和行为有何区别？保证它们垄断的前提下，让上下游市场自由竞争，允许它们滥用优势地位，以多元化、兼并上下游企业，造成横纵向一体化。

可以说，1984 年以后，香港就已经不再自由了。当下的香港，只不过是自由放任的外衣掩盖了政商一家的本质。■

（未完待续）

笔谈：对《“香港化”的逻辑与现实（上篇）》一文的评论

作者：张宁曦

因为只看到本文的上篇，并不知道作者下篇的计划和内容，所以这个评论的内容，有可能在作者的下篇当中涉及或者得到充分讨论。尽管如此，还是希望提出一些讨论的话题。

本文上篇的核心观点——香港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供给实际向普通市民征收间接税，以及垄断性地产行业通过垄断土地开发权部分回收市民收入的论点，切中了我理解的香港经济运行的关键。而政府实质上在向市民征收间接税的提法，让人耳目一新。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政府通过垄断土地的寻租一般并不被看作是税的一种？传统上一般把政府收入归类为两个来源：税和政府所持有财产带来的收入。如果这样划分，批地收入应该被算作后者而不是前者。

作者如果能够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在回答一个理论问题：什么是税？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作者可以进一步更正我们一般对税的认识，指出政府通过土地供给寻租应该被算作是税的一个种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感觉作者也许需要分析，香港政府每年拿出多少（什么地段的）地可以使地价平抑多少，以此来说服读者这是一种税。因为如果香港政府在可能范围内调整土地的供给，并不能带来地价明显的平抑，我们就很难说目前的批地寻租是一种税，而要考虑其他使地价居高不下的因素。

这里也涉及到税率的计算问题：如果政府通过土地供给寻租应该被算作一种税，我们怎么来计算税率？作者提到，“以 2012-2013 年度为例，香港一般性财政收入为 3140 亿港币，而在此之外的土地收入为 862 亿，是一般性财政收入的 27.5%。……香港一直以低税率著称，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政府通过卖地，变相回收了公众的收益，以此计算，香港的税率要提高 27.5%”，其计算方法是将香港政府年度土地收入和年度一般性财政收入的比率视作香港的实际税率应增加的部分。我对税率的计算可以说没有任何认识，只是通过日常生活需要报税的经历，以为税率的计算是税收额占收入比（或者税收额占市值比）。这里的税率为何要如此计算？

作者进一步希望驳斥的观点是：香港为一个自由经济体。作者指出，从 1984 年开始，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由经济体。这里暗含的假设是，香港的地价成本导致很大一部分产业的垄断，因此已经不是一个自由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因为我们知道，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而产生的世界经济自由指数排名（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多年来一直把香港排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2014 年香港在这个指数排名中名列世界第一）。这个排名的方法是量化经济体的四个领域：法制度、政府规模、治理效率和市场开放程度。作者如果能够进一步扩充自己的论据，比如增加香港各行业的垄断程度，以及讲解高额地租对市场自由度其他方面的影响，可以更好地支持自己的观点。■

从警方拘捕占中网上发言者看言论自由及互联网私隐

作者：张宝莹

自占中开始两个多月以来，警方已拘捕至少 4 名在互联网上发表“煽动性”言论的网民。这不仅带出了政府对网上言论自由的管治问题，亦暴露出政府及互联网公司在处理网上用户资料时的不透明做法。

12 月 4 日，警方以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拘捕一名顾姓男子。他涉嫌于 12 月 3 日在社交网站上煽动市民于圣诞节到旺角及立法会集结并进行非法活动。

11 月 7 日，警方拘捕一名 25 岁男子，因其在互联网上发布“占领礼宾府”指南，涉嫌在社交网站煽动他人参与非法集会。

10 月 22 日，警方于湾仔区拘捕一名二十岁男子，因其在网上讨论区留言，声称有人受指使袭击一名警务人员的家人，并鼓吹其他互联网使用者发放该名人员的相片。警方以涉嫌刑事恐吓将其拘捕。

10 月 18 日，警方以涉嫌干犯“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的罪行，拘捕了家住天水围的 23 岁男子。警方在其新闻发布会上称，“该男子日前于网上讨论区鼓吹其他人士到旺角参与非法集会，冲击警方及瘫痪铁路”。

香港高登讨论区向媒体承认，警方在破案过程中，向其索取了该男子在高登讨论区上的相关资料，包括 IP 地址。

高登讨论区 CEO 林祖舜称，他有义务向警方提供相关资料，称保障资料私隐原则不适用于警方防止或调查罪案的情形。

尽管《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58 条设有豁免条文，规定为个人资料可在“罪行的防止或侦测”而持有的个人资料，可不受保障资料原则的管限，但第 51 条“释义”亦指出豁免条文“既不对任何人赋予任何权利，亦不对其施加任何规定”。换句话说，除非有法庭命令，否则警方向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提出的索取用户资料要求，并没有法律约束力。

香港互联网供应商协会法律顾问陈晓峰指出：“根据目前香港法律，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不会因为拒绝向警方提供资料而受到惩罚，警方出示法庭命令的情况下除外。”

警方已两度拒绝公布其向互联网公司索取用户资料的相关指引及内部监督机制。在此种情况下，法庭命令成为约束警方公权力的唯一方法。然而，现实情况是，警方向互联网供应商提出的索取用户资料要求中，并没有全部根据法庭命令提出。例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樑答复涂谨申议员提问时称，今年 2 月至 10 月中，警务处共向供应商提出 2,621 次用户资料索取要求，其中只有“部分”是根据法庭命令提出。警方没有解释，为何未能提供

准确数据。

根据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下设的香港资讯公开报告搜集的数据，去年，警务处向供应商提出了 4,557 次用户资料索取要求，只有“部分”是根据法庭命令提出，供应商仍执行了 64% 的索取要求。海关向互联网公司提出 873 次用户资料索取要求，所有要求没有根据法庭命令提出，却均得到互联网公司执行。

一个透明、有保障的互联网环境，是公众行使网上言论自由的前提，亦可延伸为公民人权的一部分。没有法庭命令及其他监督、检讨机制的约束，公众无从得知包括警方在内的执法部门以“侦查及防止罪案”的理由，向互联网公司提出索取用户资料私隐的要求是否适当且必要，此种行为是否构成侵犯用户私隐，以及有哪些补救机制。

香港互联网供应商协会为在协助执法机关防止罪案及保障用户私隐中取得平衡，于今年 9 月底发布提供资讯守则（Code of Practice for Release of Information）草案。守则中规定，政府部门若向互联网供应商索取用户数据，应以书面方式写明索取数据的内容，是否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豁免条文提出，当局所索取的数据将用做何种用途，以及获取该数据是否是当局防止及侦查罪案的唯一方法。警方及海关在草案发布会上称，尚在考虑是否支持该守则。

近年来，国际大型互联网公司如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已开始注意尊重用户的知情权，定期发布资讯公开报告。根据谷歌的资讯公开报告，今年上半年，谷歌共收到 359 次香港政府索取用户资料的要求，谷歌仅执行了 48%。谷歌在其法律程序中明确指出：“我们接获资料调阅要求时，相关小组会审查这些要求，确认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 Google 政策。一般来说，这类要求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由调阅机关授权官员签署后依据适用法律提出，Google 才会配合揭露资料。如果我们认为要求过于广泛，将会设法限缩要求范围。”

而香港的互联网用户仍无从获知，其使用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及网上论坛有否向执法部门提供其个人资料，以及该种做法是否合理适当。迄今为止，香港主要的互联网公司、网上论坛及数据中心仍未发布资讯公开报告，披露执法部门是否有向其索取用户资料，索取数据的要求是否根据法庭命令提出，以及该公司在何种情况下会向执法部门提供用户资料等。

香港的互联网用户有权知悉个人数据如何被第三方获取及使用，政府及互联网公司亦有责任保护及尊重用户隐私，从而保障而非遏制网上言论自由。香港资讯公开报告敦促政府相关部门及互联网公司应尽快向互联网用户发布资讯公开报告，证明其在处理网络用户数据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及必要步骤，以恢复互联网用户对政府及科技公司的信心。■

笔谈：对《从警方拘捕占中网上发言者看言论自由及互联网私隐》一文的评论

作者：刘舒婷

从宝莹的文章里可以发散引申出很多东西，其中之一便是占中与社群媒体（Social Media）的关系。在这次为期 70 余天的运动中，社群媒体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下文将对其进行一个基于个人观察的概要梳理，作为宝莹文章的延伸阅读。碍于篇幅，谈得较为宽泛，言辞意喻若有不周及未到之处，还望诸学友斧正。

在占中时期，互联网及更为新生的移动互联网成为运动参与者、旁观者最为主要的“言论集散地”。而由此引来的问题，宝莹提到的“隐私”是其中一个方面。面对运动中的信息杂冗，怎样传播，如何准确传播，置身其中的人均在不断探索。将使用者粗分为三类（港人、在港内地人、内地人），其所对应的平台按社交属性公开到私密罗列，得到一个简单的表格（如下）来呈现占中时期所涉及到的主要社群媒体。

人群	平台						
	公开			半公开	私密		
港人	Facebook	网上论坛 (如高登、 香讨)	Youtube (直播)	微博	Firechat	Whatsapp	
在港 内地 人	Facebook			微博	Firechat	Whatsapp	微信 (朋 友圈)
内地 人				微博	Firechat		微信 (朋 友圈)

从该表中可以看到，在这场运动中，社交媒体的使用是多样化的。其中，在三类人都曾起过传播作用的有两个，分别是微博与 Firechat，前者是社媒平台，后者是即时通讯工具。此二者的使用大都集中在运动前期，微博的使用随着“你懂的”原因渐渐淡出，而 Firechat 作为“临时应急对讲机”在“催泪弹之夜”后，网络盛传港府将切断互联网通讯时达到高潮，而后逐渐淡出。有趣的是，在当时很多内地人亦安装了该软件，在软件内公开发言组群为占中者摇旗呐喊。

在港内地人族群在 Facebook 上建立了不同的粉丝专页，或支持占中（数量较多，传播范围较广），或反对占中。这两个派别在运动发起后约两周开始分化，继而引发了所谓的“港漂友尽潮”，而此时的香港社群平台仍然处于齐声讨伐警察的团结中。微信朋友圈是他们的另一主阵地，通过图片、文字将香港的第一手消息传出去，而后朋友圈（发图片功能）一度

遭到封锁。

此次运动社媒的功用对于港人来说毫不亚于三月在台湾的“太阳花”。通过即时直播、文字记录回顾、照片等方式，占中在香港的社交媒体上全面开花。

初期（以“催泪弹之夜”为始）：

Facebook 上多为文图、视频直播，几乎人人都是自媒体，第一时间将现场的状况分享给未到现场的人，催生了最初的响应者；

头几个晚上，出现“解放军装甲车入境镇压”的谣言，经查该图为旧图后辟谣，论坛、whatsapp 为主要传谣渠道。

初期至中期的过渡时期：

Facebook 上的言论多以声援、同情学生为主，并且不断有人透过 Facebook 自发组织到现场，或发出物资求助讯息等；

此时经历“港府断网”传言，近场通讯应用 Firechat 在香港 Apple Store 和 Google Play Store 的下载量一度蹿升到榜首；

此阶段现场仍较为混乱，通过社媒发布的讯息真假难辨，不时传出“清场”“解放军出动”等消息。

中期（僵持期）：

此时期，社群平台不再只是与“到场支持”有关，各类型创作开始大量充斥社群平台；随着局面趋于“平稳”，自发性的辟谣组织开始在 Facebook 上出现，过滤了大量不实传言；

同时期，Facebook 上开始大量出现“蓝丝带”（撑警察）专页或头像，与“黄丝带”进行网上激辩；

此外，几个网络论坛仍属于较为激进的平台，时不时有煽动性帖子出现，号召港人出动占中。

中后期至后期：

在 Facebook 上反思的声音渐多，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仅仅是现场，Firechat 逐渐淡出；此时期出现“暴徒冲击立法会”事件，其起因之一是当日盛传“网络 23”条将获得通过，号召民众瘫痪立法会，阻止法案。早在今年 6 月，就曾有一 15 岁少年因在高登发布《冲击立法会指南》，呼吁网民到立法会参加示威而被捕，11 月 27 日认罪并被判感化一年。

而此事件过后，民意急转，社群再次分裂。

后期：

清旺、中、铜时，各社群媒体已趋于平缓，在较为私密的平台上仍有自发的“游击战”行动，但声势渐微。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整个占中过程中，社群媒体平台的功用在不断流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其中自发辟谣专页的出现如同“民间网络纠察队”，过滤了相当数量的不实信息。而与谣言不无关系的“冲击立会”事件，则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转折点。社群媒体平台连接了两岸三地，使得“占中”有了一批“不在场的参与者”。这一事件和“太阳花”“乌克兰”一样，皆可成为学者研究新媒体与社会变革的蓝本。■

占中、互联网、历史终结的随想

作者：李永峰

在耶拿，当黑格尔亲眼目睹拿破仑跨上马背时，意识到历史已经终结。

以拿破仑/法国大革命来划分，之前可以称之为古代社会，人类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承认了主人的存在，人类历史在主奴对抗的结构中被创造出来。占据主人或伪主人地位的，有领主、皇帝、上帝等等。但拿破仑/法国大革命之后，现代社会里，人类通过绝对知识、理性和科学，获得了自我意识，“同时接受作为人类，作为一个终有一死的存在者的有限性”，从而摆脱了对主奴体制的依赖，取消了对主人角色的承认。

20世纪30年代，来自俄国的科耶夫，根据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主奴辩证法”的解读，认为未来和历史不再属于主人，而是属于劳动着的奴隶。主奴斗争（奴隶追求打败主人并取代主人角色）的历史已经终结，世界走向普世且同质。其转折点，就在拿破仑跨上马背的那一刻。

美国学者福山，轻率地将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论”诠释成为“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制度打败挑战者、获得了胜利。福山的诠释很快便遭到现实的嘲讽。实际上，黑格尔-科耶夫意义上的“历史终结”，正在到来，远未结束。世界依旧在走向普世且同质，而不是已经抵达普世且同质。

在后拿破仑时代，有两大势力，尝试着重重新确立主人的身份，影响“普世且同质”的世界趋势。一是民族国家，二是阶级共同体。

民族国家与阶级共同体主导了整个20世纪的政治发展，但他们不断遭遇获得了理性的“自我意识”的质疑。下一个百年，他们必将边缘化。已经获得自我意识的奴隶，从主奴体制中解放出来，唯有平等的思想——奴隶（人人）生而平等——可以成为他们彼此交往、缔约的基础。而平等，则意味着不止要取消对主人的承认，也要取消对中间人、代理人的承认。

“劳动着的奴隶”为了把握属于他们的未来和历史，也在不断挑选和光大一切可以确保他们地位的技术手段，这些手段可以帮助他们打败各种伪主人、中间人、代理人等等，比如我们都在用的互联网。

我们已经可以断言，在今天，互联网会成为推动世界走向普世且同质的一个重要力量。互联网的核心在于，摆脱中心（伪主人、中间人、代理人），直接进行对接，它也会成为挑战新的谋求主人地位的野心力量的工具。但借助互联网这件工具的自我意识的集合体，目前始终还是受到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暴力力量压制。

刚刚遭到警察清场的香港占领中环运动，最核心的思想遗产，恐怕是其“没有大会”的呼吁。占领者拒绝一切代表。他们将互联网中“去中心化”的行为规则，直接复制到了运动

现场。短期来看，这当然是占中运动政治失败的一个原因，这与过去几年中，从伊朗“twitter革命”到北非“茉莉花革命”中的失败一样，“去中心化”的革命者无法将借助互联网而产生的政治能量直接导入政治斗争中，而只能将其停留在广场，这导致广场之后，主导政治发展的依旧是那些民族、阶级及宗教的力量。依旧是代理人与中间人在操弄未来。

但是，“没有大会”的政治，正在试错中发展。曾一度以“青年黑格尔”派中一员而闻名的马克思，在因《莱茵报》一案而流亡巴黎后，发明了“工人阶级”的概念，从此相信未来革命的主体将是工人阶级，并掀起了后来工人阶级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只不过，后世发展证明，工人阶级难以堪此大任。那么，今天，在进入“去中心化”斗争的时代，谁会成为革命的主体呢？或者，革命还有主体吗？没有主体的政治该如何进行？

普世且同质世界趋势不可阻挡。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虽然无法达成改变“2017 政改方案”的目标，更不足以撼动民族国家的力量，但是，这场运动对于互联网这件工具的依赖，在历史走向终结的过程中，或许也可记上一笔。■

觀瀾

第八期
觀察報告

2015 · 清明

觀瀾學社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前言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似乎已近在眼前，但每每令人惊奇、不安与兴奋的是，中国社会的变革似乎远没有停滞。时光走入 2015 年之初，很多新的变化与发展已经初显端倪。在政策研究领域，一场智库建设的大跃进似乎正在悄悄展开。这场涉及巨额财政投入和研究机构结构转型的无声运动，是否能带来国家、专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到底什么样的智库和政策研究制度才是中国需要的？郦菁将在政法篇中回答这些问题。在始终备受瞩目的经济领域，同样出现了一些新信号。一方面，李克强作为推动经济改革的最高政府首脑，在权力结构中的弱势已成定局。那么现任总理的政策观和权力基础到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他和之前的两任总理在个人背景和追求的政策范式等方面有何不同？而这又将给未来经济改革埋下哪些障碍？李牧之将在《李克强的难题》一文中加以阐释。另一方面，诸多表征似乎说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也许无法维持，经济下行可能近在眼前。但细查之下，中国地方债问题似乎也不是一个绝对的系统性危机，而互联网经济也有切实的发展。楼晟通过《中国经济的冰火两重天》来解答这些问题。此外，阶级和民族问题也是政治场域中的重要维度。巩高兴在两篇短文中分别讨论了外来打工者的方言问题和身世问题。语言、身世等因素既构成了阶级问题、身份认同和群体文化的基础，也最终将影响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动员的基础。民族问题也依然是当下政治的焦点之一。李永峰分析了最近维吾尔族偷渡出境的目的、规模、可能性与政治影响。这些出境者与 ISIS 若隐若现的政治联系，必将给中国未来的民族冲突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而李潇雨则承续上一期的内容，从视觉人类学的角度继续探讨了民族问题的历史维度。在她眼中，老照片不光是艺术的载体，也反映了特定的权力关系，是很好的政治隐喻。最后，萧敢与张昕为我们带来了一组关于外部的观察，因中国的问题始终也无法与世界分开。前者讨论了印度毛派“纳萨尔”运动的起源、发展与政治力量，后者则试图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理解俄罗斯的精英，在改革的过程中他们又是如何被国家吸纳和驯服的。尽管中国目前中央的控制力颇为强大，也没有实行选举政治从而放大各种离心力量，但这两个邻邦的例子对中国国家能力建设、建构统一的公共政治平台以及消除可能的地方权力中心都有借鉴意义。

“观澜学社”是一个自发、独立、非商业的网络社群。我们关注当代中国历史的展开，我们计划每隔两至三个月公开发布一份《观察报告》，上一期《观察报告》的编号是“2014 年·大雪”，以后也将逐次按照中国农历的节气编号。本报告属于观澜学社成员内部交流之用，如需转载、引述，以及任何形式的利用，请与相关作者联系。看到本报告的读者，如有兴趣查阅早期报告，可向 guanlanxueshe@gmail.com 索取。 ■

目录

法政篇

郦菁：反思智库建设运动 5

经济篇

李牧之：李克强的难题 9

楼晟：中国经济的冰火两重天 12

社会篇

巩高兴：外来打工者聚集地区的方言现象 14

巩高兴：一个农村平民的家世 16

本土/国际篇

萧敢：印度毛派的历史与现状 18

张昕：超越“宗派政治”

——俄罗斯的精英博弈、政商网络与租金分配（上） 20

边疆篇

李永峰：近期维吾尔人偷渡出走现象初步观察 24

李潇雨：边陲照片与“民族”的视觉呈现 28

法政篇

反思智库建设运动

作者：郦菁

“智库”在当下的政治生活与公共政策讨论中，往往和两个既定的观念捆绑在一起。首先，智库作为政策研究和理念的重要来源，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再则，智库往往代表了相对中立的知识和判断，独立于政府官僚体系和政治派系之间的利害之争。这些有关智库的形象和既定看法，很大程度肇始于美国的实践。然而，在经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规模发展之后，美国的智库还符合这些想象吗？智库作为美国政策网络的重要一环，是在怎样的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又出现了哪些内在的矛盾？

另一边，从去年 10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之后，中国也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智库建设热潮。一时间，各类政府内外、特别是大学内部的研究力量和准研究机构，纷纷以智库的名目重组，以便在财政支持的政策研究体系中分一杯羹。这一场“智库大跃进”运动对于中国未来的公共政策制定的格局和制度是影响深远的，包括各种意料和非意料的后果。那么，这种与美国依靠社会资金来源为主的体系截然不同的模式，绩效又将会如何呢？中国智库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结构性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建构美国式的智库来加以解决呢？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美国智库的变异

尽管智库已是今日美国之政策场域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但总体来说这是一种相当晚近的组织形式。直到 1970 年，美国总共才有 70 家左右的智库，且其中大部分是由公共财政和类似福特基金会这样的大型基金会支持的，比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等。而到了最近几十年，即使根据最为保守的估算，美国全国性智库的数量至少也在三四百以上。根据 Andrew Rich 的统计（*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美国目前 80% 的智库是 1970 年之后建立的。这一批“70 后”作为美国智库生态的主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智库的资金来源发生变化，从财政和大基金日益转向个人资本、公司捐款和政治利益集团。“金主”的转换，意味着智库产品的“听众”和“受众”也会发生变化。第二，智库的主要工作从之前的预测、评估和各类实证政策研究转向意识形态倾向更为明显的特定政策方案的宣传和营销。智库内部的结构也随之调整，与媒体和国会议员的日常联系成为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最后，智库把工作的重心从之前的政策前端研究和介入转为政策后程的国会辩论、两党竞争和政治交易以及最终的政策方案出台过程。

美国智库在 70 年代之后的这些变化，是深刻嵌入在当时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环境的转型之中的。一方面，美国的政治权力本身相对分散，建国者出于权力制衡的考虑，把立法过程设置得相当冗长繁复（美国相当一部分政策制定属于立法过程）。在最近的几十年，国会两院下属的专业委员会权力进一步加大，还增设了 CBO（国会预算办公室）等机构，使得立法程序更加复杂，权力分化的局面更为制度化。这种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和制度造就了多个“进入点”（access point），即可以影响政策的节点；也造就了多个否决点（veto point），即可以阻碍政策法案顺利通过的节点。另一方面，美国在战后二十多年之间国内矛盾相对缓和，两党形成共识，基本是在民主党为主导的政策平台上运行，部分克服了上述立法制度的结构性分化。但是，自七十年代以后，民主党受内外夹击，经济下行导致政治上的分裂，主要阶级与两党之间的共识难以为继。在这种政治格局下，保守的共和党从七十年代开始不断挑战民主党确立的政策范式，直到八十年代全面推进新自由主义的新范式。

这正是智库自七十年代以来发展和转型的主要背景。由于多重进入点和否决点的存在，并随着两党竞争加剧打开更多“政策之窗”，很多新生的智库找到了更多的政治机会，用相对较少的政治资源和资金，就可以渗透到政治制定过程中，或影响政策形成，或阻碍政策通过。很多时候，这的确是一桩“以小博大”的政治买卖。七十年代中后期政治权力日益增大的私人资本当然不会错过这桩买卖。他们越来越多地资助或创建智库，以期推动对其有利的政策。此外，共和党和其代表的保守力量也在利用智库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来挑战和削弱民主党的政策霸权，从而获得更多话语权。他们显然也很成功。实际上，七十年代最早一举成名的几个智库都是保守主义倾向的，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凯托研究说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等等。民主党作为之前的执政党，应对这种“组织创新”明显晚了一步。直到七十年代晚期开始，他们才有意识地仿效保守智库来创建贴近自己党性和意识形态的智库，有些也颇为成功，但始终不如保守智库那般风生水起，玩转政学媒各界。换言之，智库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并不如一般民众所想象的那样“政治中立”。智库在美国政治中的崛起，恰是嵌入在权力结构分散的制度遗产、两党政治分裂的格局和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大背景之中。

智库崛起的政治背景为智库的功能、性质和行业生态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如前所述，70 年代之后美国智库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意识形态化。根据 Andrew Rich 的研究，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智库有明确的意识形态阵营。因为把资源和精力投在前期政策研究、建模和预测上既费时费力，又无法保证最后的结果与意识形态相契，很多智库实际上放弃了高质量的政策研究，转而关注能见度更高的政策辩论阶段。这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策略在七八十年代还是颇为成功的，特别是保守主义智库，对美国政治的保守主义转向功莫大焉。但是，这种策略最终必然会减损智库的公信力，从而导致智库这种组织模式的衰落。

此外，智库模式也放大了资本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声音。美国智库固然不受官僚体系的控制，经济上独立于国家，但是无法独立于资本。70 年代后资本的力量俘获了智库，为资本和利益集团建造了一条以中立性、科学性为掩饰的政治通道。80 年代整个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资本的政治权力大大提升，也是和智库的崛起分不开的。

最后，智库的成功和数量扩张也带来了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在其他主要西方国家，如德国和法国等，智库的数量往往是有限的，分工也比较固定和明确。但是美国几乎所有的政策议题都有多个大小智库研究和宣传，要博取政策博弈者和广大民众的注意并不容易。这种高度竞争性也进一步促使智库把资源配置到外宣上来，其观点也日益被推向极化，以便博取眼球。

二，中国如何建设“新型智库”？

以上对于美国智库的简短回顾无非是想说明，这种所谓以社会资金支持“独立智库”模式，其实并不“独立”，也不一定“科学”，更不是公共政策领域必然的参与者。智库的模式和功能，始终是嵌入在特定的政策环境中，是政党结构、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风向的产物。中国目前要改革公共政策制定程序和政治研究体系，美国模式并不是最好的参考模板。当下中国绝大多数的政策研究都是由公共财政支持，受官僚系统直接控制。这种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因为官僚系统的利益主导政策，而社会与主要利益集团的政策偏好处于下风。但反过来说，如果完全把承担政策研究的智库都推向社会，那么资本和资源较多的利益集团一定会很快俘获这种组织模式，将他们改造成政策游说的渠道。虽然中国的政策过程总体来说比较封闭，但这些智库还是可以利用官僚系统内部的裂痕来获取政治收益最大化，也能够控制或至少影响媒体。而劳工及其他弱势群体因政治资源较少，往往很难推动有利于他们的议题。这也是不利于社会公平与公正的。

所幸者，从去年以来的智库建设运动并没有落入美国模式的窠臼。尽管如此，这场运动很快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智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目前的很多智库建设计划不涉及创造新的组织模式和政策研究方式，而是把既有的社科院、党校和行政学院、以及高校体系都纳入到所谓的智库逻辑之中来，并投入更多的财政资源。这种做法效率如何是存疑的；但实践中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进一步羁靡广大政策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通过资源诱导和制度型塑，这一群体进一步认同国家的政策理念，所从事的研究也进一步向政策靠拢。不同的智库之间也产生了高度的竞争，也使得研究人员不得不依照官僚系统的预期来修正研究。在这过程中，国家的权力大大增强了，而不是增强与社会的协商。

因此，目前的智库建设运动并不能提升政策研究的质量，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策略。由此我们不仅要问，那么何种智库模式和相应的政治安排才能破解这一困局呢？

首先，由公共财政支持智库建设和政策研究未必没有效率。比如德国的很多分配与管理研究项目的基金会都是公共财政支持的，但相对独立于政府，决策也不受政府官僚体系干预。特别在经济政策方面，德国从1963年开始就成立了一个经济专家委员会，从事就业、收入和宏观趋势方面的研究，也做预测和政策研究。为了进一步防止特殊利益通过政策专家来影响政策，德国设计了很多制度樊篱，比如禁止这个委员会的专家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等。在奥地利，有一个类似的社会与经济事务委员会，也从事经济预测和政策研究。有意思的是，这个委员会由社会主要利益群体的代表如资本、劳工、农民等组成，而从事政策研究的专家只有在政策协商的过程中提供有限的建议和数据。德国和奥地利的例子都说明，公共财政支持的政治研究机构也许更容易保持中立，条件是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证专业知识不被利益集团俘获，并控制专家的权力。相反，如果政策研究由社会资本支持，则更容易借用科学和中立的名义，为某些特殊利益渗透政策过程打开方便之门。

然而，这并不是说国家应该控制智库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智库要独立于特殊利益，更要相对独立于国家，这样才能保证政策研究的价值，不以官僚系统的价值和偏好为转移。再比如德国和奥地利的这两个机构，他们有权要求政府提供数据和报告，甚至可以传唤政府官员

来了解情况和提供证词。但政府绝对无权干涉内部的研究活动。此外，相对抑制智库之间的过度竞争也是保证研究质量和中立性的重要条件，以防止研究机构将资源大量错配到争取资源和维持政治网络上，就如今日之美国和中国智库。最后，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协商当然也是智库可以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国家、社会与专家三方达成制衡，才能更好引导专业知识真正为政策服务，相对实现公平、公正等政治价值。■

经济篇

李克强的难题

作者：李牧之

2015年3月27日，国土部和住建部联合发文，要求限制住宅供应偏多地区的土地供给，允许调整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户型，地方可以将商品房作为保障房的房源等。30日，央行等三部委发文，调整房贷政策，其中首套有贷的家庭购二套首付比例4成。同日，财政部等也发文，二手房交易免营业税的时限从持有5年调低为2年。

至此，自2013年起被广为传诵的“李克强经济学”堪称破产。那一年，基于对新总理的一系列政策的梳理，巴克莱资本总结了李克强经济学的内涵：无大规模刺激计划、去杠杆化、结构性改革。

目前，李克强面临的危机远比维护其经济政策主张更为艰难。2015年1季度GDP如预期回落，虽然稳在7%这一目标之上（名义GDP增速只有5.8%），但制造业、基础设施、房地产三大投资继续全面下滑，发电量、货运量、PMI更达历史低点，业界声音对GDP数据的可靠性颇有置疑。下一步，李克强应该怎么做？

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前几任总理面临的问题。199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个总理：朱镕基、温家宝与李克强。1990年代初虽然是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但1993年4月至8月，曾因病入院治疗约4个月，朱镕基则在国务院全面负责日常工作。自1991年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993年初开始，朱镕基就成为中国经济的事实上的掌舵人。算起来，这三任总理各自主政十年。

纵观近几任国务院总理，其任总理之前的履职经历与风格对中国改革进程影响颇大。朱镕基1952年就是副处长了，到1978年才升到处长，时年50岁，政治上的进步很小，期间近30年时间，主要是在计委系统。随后调入经委和上海市工作，政治上才有了较快的进步，这也使得朱镕基对计委系统的意见很大，他在推动改革时，并不待见计委系统的人。甚至为了绕开计委，恢复经委、成立经贸委，将国企管理、商品流通等职能划入。他大量提拔有学术素养的官员，而学术界在改革领域总体呈现市场化，这些都是朱镕基的主张看起来更加市场化的主因。时至今日，财经与金融系统仍然有大量的官员得益于朱镕基的提拔。

朱镕基虽居部委数十年，但职位成长并不在部委，对计委体系意见也很大，推动改革时不会特别照顾部委的利益，市场化改革相对彻底。同时他本人风格凌厉，敢于承担责任，给人勇往直前的感觉，容易聚集改革的同路人，也容易凝聚共识。

温家宝总理，出于地方，调入中央后在中央办公厅任副主任、主任十余年，历经三任总书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也有十余年。以办公厅任职为代表的秘书派，工作的重点在于寻求不同主张之间的平衡，行事倾向稳妥为上，不轻易得罪人。

事后来看，温家宝任职十年，面对部委或央地间利益纠缠时，不轻易做出决策，往往要求部委意见一致时才拍板决定，致使错过大量绝佳的改革时机。同时，温总理没有主政一省一市，没有遭受过审批之痛，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的决心一直没有坚决起来，其任上虽然多次裁减行政审批，但行政审批泛滥的更严重。

值得指出的是，温任职期间中国金融系统进行了较好的系统性改革，这主要归功于黄菊——一位来自上海帮的官员。黄菊风格硬朗，担任副总理时，主管金融、经济、工业工作。黄菊主持的国有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在面对银行业局部上市还是整体上市，是小改革还是大改革的选择时，选择了以市场化、整体改革的方式上市，为今天金融改革的深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资本市场改革中，面临股权分置的历史难题，他提出“开弓没有回头箭”，把股市中最大的一个障碍给去除了。2005年，他支持央行设立金融市场司，启动短期融资券与中期票据的发行，推进了债券市场的发展。2006年病危的时候，正值广发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社会普遍担心黄菊去世会致使中国金融改革停滞。事实确实如此，此后国务院关于金融方面的改革，温家宝要求各部委必须达成一致，方能通过，由于缺乏有担当的决策者，金融改革停滞至今。

对照朱、温两任总理。李克强总理未在中央部委任过职，不易受行政审批部门的影响，又先后主政河南、辽宁两个大省，两省亦在投资等多个方面深受行政审批之困，这使得他在减少、下放、取消行政审批方面的力度和决心十分坚决，是近几年经济结构性转型中的亮色。

性格只决定施政的意愿，策略才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温家宝运气很好，自2001年入世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财政充裕，政府解决问题的手段很多。他取消了农业税、上调养老金、创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面临房价高，他祭出有浓重计划色彩的“限购令”杀着，面对2008年经济衰退，他放出史无前例的“四万亿”。

朱镕基就没那么好运了。朱镕基自任国务院副总理始，就面临着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上任之初，他主持清理企业三角债，继而经济过热，然后又是衰退，要保障经济软着陆，随后金融危机，他大搞基建、国退民进、让职工下岗，一刻不得歇。金融改革是箭在弦上，银行已经技术性破产，医疗、住房改革是国家实在养不起了，被迫要推向市场。

站在2012年的视角上来看，李克强面临的摊子比温家宝要差的多，时局的困境一个比一个棘手，但仍然远远好于当年朱镕基面临的乱局。首先，财政状况还好，中央政府的权威远远大于1990年代；其次，开放程度远远大于当年，有大量的外部压力可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助力；其三，改革不再是摸石头过河，三十年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和国外理论与经验的引入，在相当多的领域都有较为成熟的方案可供选择。

“李克强经济学”的破产，源于他的改革策略。“不刺激、去杠杆、促改革”针对是当前经济改革中的弊病开的药方，但没有回应最核心的问题。什么是核心问题，第一，加杠杆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过剩产能的主体也是国有企业，要降低他们的负债率、去杠杆，意味着有一些国有企业要破产、要退出市场；第二，刺激经济的核心在于政府干预经济，在于政府

有能力过度参与经济，不刺激更像是一个自律约定，只适用于没有危机的时候，危机来了，刺激与否根本不是国务院所能决定的事情。第三，忽略了改革的阻力，最后变成总理对部委的压力，没有借力打力。

回过头来看朱镕基当年是怎么推动改革的？朱镕基长期居于处级干部，做事直接，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即使居高位，亲自解决危机也是常事。在清理三角债时，他以副总理兼任国务院生产办主任、经贸办主任；推动分税制改革时，他亲自上阵，带着财政部长刘仲藜一个一个去和省长省委书记谈判；在经济过热时，他兼任央行行长，亲自整顿信贷，赴美入世谈判，他坐阵最后一天的谈判现场。这种行为在他的前任李鹏与继任温家宝身上都很少见。以常务副总理、政治局常委身份去和省长省委书记面谈央地分税，谈成功的概率当然远大于财政部长自己去谈。入世可以成功，搞定美国是关键性成果，而1999年4月赴美谈判取得的成果最为重要，当时朱镕基带队的工作组与美国谈判了6天6夜，所有分歧朱镕基当场拍板，最后一天的谈判他到场亲自参与。如非如此，跟美国能否达到共识，恐怕变数不小。

即使在今天看来，分税制改革与入世谈判的成功都是非同小可，面临的困难也并不是可有可无，最起码不比今天的医改、国企改革要简单。改革成功的要点在哪里？第一，不要全面战略，要重点突破。一段时间内，只聚焦于一个关键领域的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以后，再利用改革凝聚的共识，向其它领域扩展。第二，明确改革的方向，团结改革的力量是凝聚共识的重要手段。

当然，眼下最大的问题在于，本届总理的权力可能是历任总理中最小的。过往两代领导班子，总理在经济议题上有着较为充分的话事权。当下，小组治国的思路下，处理与党的一把手的关系是总理的经济改革主张可以实施的前提。■

中国经济的冰火两重天

作者：楼晟

当 A 股市场正沉浸在如火如荼的牛市氛围中，中国经济却有如一条沉船，拖着迟缓而沉重的步伐滑入不见底的深渊。不论是不再被提及的“克强指数”，还是不断下滑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都在无情地提示每个了解基本经济学知识的人：中国经济正步入衰退！如果还有哪位不信，可以去看 4 月 10 日的新闻联播。央视请的专家在谈及三月份 CPI 的时候，除了继续大谈有效控制了通胀，还第一次提出现在还不能算进入通缩。

虽然我们在 2013 年经常会听到“钱荒”这个词，但 2014 年初，一直高调宣称中国经济还能继续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前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成为央行首个首席经济学家，以及几个新任副行长就位，央行实际上已经进入积极配合国务院的状态。同时，地方政府、央企、国企已经饱受地产调控、产能过剩与地方债的困扰，外加中央的调控政策开始全面走向松绑，上下理应很有保增长的积极性。可实际情况却是，2014 年开始的那些由国务院牵头，为保增长而密集启动的一批重大工程的进展并不理想：投资完成率虽然达到 86.8%，但个别领域重大工程投资只完成 50% 左右；全国建设用地供应量下降了 16.5%，已供土地使用率只有 50% 左右。这种状况多年来少有。项目批了，资金下了，土地供了，工程进度却上不去。以至于在人大闭幕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反腐既要惩治乱作为，也反对不作为，庸政懒政是不允许的”——矛头直指官僚体系的执行问题。

然而，官僚体系也有官僚体系的“难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虽然已经结束，但反腐以及落实“八项规定”却依然维持着高压，不可能不影响中基层官员的“积极性”。而前期大量的简政放权措施，也使得政府主导或者说“官办经济”的既有模式受到挑战——即难以继续通过审批流程来分解任务以及任务附带的利润和风险。在原来的模式中，一人进步即是大家共同进步，人人担责即是人人无责。这种风险收益的不对等，固然滋生了各类腐败，也使得即便项目遭遇阻碍，官僚体系也更愿意去推动和执行，而不是放弃，主观上强化了执行力。简政放权虽然客观上减少了审批事项，却忽视了减少事项后项目风险的显性化，以及官僚群体作为一个理论上的单纯执行者，在行为模式上近乎于零的风险承受能力。至少在短期上的效果，这导致简政放权更类似托宾税（Tobin Tax）。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相关保增长的重大工程为何进展缓慢和中国经济的每况愈下。在反腐运动与简政放权的“双重打压”下，传统模式上牵引中国经济的三个火车头——央企、国企与地方政府，已经集体熄火。

那这是否意味着当下的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系统性风险，随时可能爆发黑天鹅事件，抑或是当下以 A 股为代表的中国资本市场，正在制造一个即将破裂的大泡沫呢？笔者倒不这么认为。像“新常态”之前数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被诟病为不可持续和“打鸡血”，当下中国经济的萎靡也同样带有很大的干预因素，或可称之为“抹炉灰”。以地方债来说，这虽然普遍被看做中国金融经济领域中的短板，但中国政府并不乏处理相关问题的办法，很多东西都是现成的，近的就上世纪 90 年代清理“三角债”的经验。实际上，市场中也一直有呼吁中央政府采取系统性兜底措施的呼声。只是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急于这么做，而是

不断采用一些在市场看来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措施,以致引发市场对地方债问题严重性的猜测和怀疑。可是,只要注意新任财长楼继伟刚在三月底闭幕的博鳌亚洲论坛的讲话,我们就会发现,他在回答有关地方债的提问时,除了继续以往的官方辞令,还特意强调中国的地方政府是有大量资产的,甚至说地方政府可以出售资产还债。这就已经非常直白了。以此类推,我们应该就能对“新常态”关于让经济主动降速的论调,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现在,再让我们回看在这波 A 股市场行情中处于风眼中心的“互联网+”概念。虽然其中有不少是胡吹乱炒、滥竽充数之辈,短期看也确实有不小的泡沫,甚至可能即刻就将面临调整,但大方向还是正确的。因为,从国际大宏观上,在全球经济贸易再平衡的格局下,继续做大中国经济蛋糕的阻力和边际效益递减已经越来越明显,各方至少已经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要在传统模式下继续做大蛋糕,会费而不惠,并导致系统性风险的不对称积累。所以,“新常态”才提出要调结构,要转型升级。而调结构和转型升级,在实际操作上的更多表现,其实是切蛋糕而不是做蛋糕。而在国内的小宏观上,不需涉及具体政策,单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的规格,就已经是对互联网产业重视程度最好的定调。更重要的是,以反腐运动、经济降速和简政放权构成的组合拳,在束缚了中国经济达到其潜在充分增长率的同时,也捆住了传统产业利用既得利益与巨大体量,抵抗反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蚕食取代其市场地位的手脚。虽然还达不到“趁病要命”的地步,但对中国的以互联网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元素来说,目前正是史无前例的发展黄金期,应是无疑。这里最直接的例子,莫过于打车软件、专车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对出租车这个有极强地方行政垄断色彩的行业的冲击。

因此笔者建议,在解读当下的中国经济与中国资本市场时,应着眼于目的,而非现象。多想逻辑,少看数据。就如 J.P. 摩根曾经套用牌桌上的一句老话来形容股票市场:“如果你没发现这个市场里有傻瓜,那很大可能你就是那个傻瓜。”我们不该再问什么是“新常态”,改革红利在哪里,而要多想这是谁的“新常态”,再摸摸自己的后脑勺,看是否插着写有“改革红利”的标签牌。■

阶级篇

外来打工者聚集地区的方言现象

作者：巩高兴

关注方言问题，还是来到珠三角打工之后。其间在东莞发现，公交车汽车站及部分银行的语音提示系统都是双语，普通话与广府话。而我长期暂住的东莞某工业镇以客家人为主，公共场合也是普通话广府话双语提示。

这里外地人与本地人的比例最少是五比一，是个移民区，各个方言区的人在此共同生活。我觉得，如果以公平为理念的话，就应该考虑各个族群的感受，公共场合应该使用中介性语言：国语。比如老乡间用方言交流，异乡人之间用普通话交流，就是此理。至于专门的白话广播电台，其他方言群的人不感兴趣，可以不选择收听观看。就此问题在网络上，曾与撑粤语人群交锋过，理性温和者认为，在广东应该使用广府话作为官方语言之一（他没有考虑客家话、潮汕话的地位），其他省份的人在本乡争取自己的方言为官方语言。

民族众多的实行联邦制的印度就实行这种制度。极端保守排外的本地人，除了以“蝗虫”辱骂外，还说其他省份的方言是北语、捞话，普通话是胡普。珠三角地区的本地青年，应该是中国大陆汉地最热衷于撑方言的人群。2010年，以某位广州政协委员提出在专门的粤语台增加普通话的份额为触发点，一直存在的保护粤语行动被激发为现实行动，也可以说，撑粤语的人以此为借口，将理念付诸为行动。

相对于其他地区，珠三角地区的人为什么更热衷于支持方言，我试着分析一下原因。第一，经济发达触发了对本地文化的自信，本地人会觉得是优越的本地文化造就了经济发达，更有甚者，得出了种族优越的原因。细细分析，事实并不如此，优惠的经济政策，出口代工业最适于海运，其沿海的位置切合了这一点，外来的资金技术原材料及劳工，共同促成了此地的经济发达。第二，因经济发达，该地区吸引了大量外地人前来谋生。本地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生活服务行业的一线员工，都由外地人充任。他们每天不得不使用普通话，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这种现象就不是很突出。作为经济条件普遍优越于外地人的本乡人，此种现象有反客为主的意味，使他们在语言方面产生了危机感。第三，当初制定国语时，甚少吸收南方方言也是一大原因，由此普通话与南方方言有很大的隔阂，使南方人对普通话产生不了亲切感。第四，当初为了统战香港，在粤开办了专门的粤语电台，如今你想“掺沙子”增加普通话的份额，就是侵犯了既得利益。

我曾在百度贴吧的本乡县域吧、省域吧发文，提出甘肃人也应该保护自己的方言，但应者寥寥，而广东吧却充斥着撑广府话与地域排外两大主题。在此，我也来试着分析一下原因。第一，甘肃作为中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本地人谈不上对本地文化的自信，更热衷于向

以普通话为代表的强势文化靠拢。在现实中，一提到甘肃，外地人就会条件反射式地想到贫穷与缺水。所以，很多甘肃人不愿在外地人面前主动亮出自己的语言身份。每次乘火车南下谋生，车里除了几个关系亲密的老乡会用家乡话交谈外，同省的不同县市的老乡，多会用普通话交流。在家乡火车站买票时，你用乡音发声，售票员却用普通话回应；而在广州汽车站，有人用白话发声的话，售票员也会用白话回应。在甘肃，普通话代表现代的城市，方言代表落后的农村。第二，在家乡县城，除了个别川人与浙江人，很少有外地人在此工作生活，日常生活中，人们之间很少会用普通话交谈。作为本乡人，如果你用普通话与不熟悉的本乡人交谈，人家会投来鄙夷的眼神；如果你用普通话与本乡熟人交谈，人家反而会嘲讽你变“洋气”了。第三，甘肃方言，黄河以东是中原官话秦陇片，以西是兰银官话，此两种方言都是北方方言，而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两者之间有亲缘关系，所以对普通话甚少有抵触情绪。

香港的“驱蝗”行动及其提出的理由，给予大陆经济发达地区的地域排外者以启示与榜样；同样的，广州的撑粤语活动，也会给予大陆经济发达地区撑方言的人启示与榜样。极端的地方文化保护者，反过来也是极端的地域排外者。对撑方言者及其诉求，同情的理解外，也需要有反思。■

一个农村平民的家世

作者：巩高兴

平民的生活总是被社会大环境所左右，历史大事件又改变了人们的命运。一直以来，我只知道妈妈是属鸡的 1950 年代生人。因写这篇文章的需要，特地从网上查询而得知，她出生于 1957 年。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个社会依旧是世袭制的，财富权力的世袭，唯一的进步之处，就是平民上升的通道比以前宽点儿而已。人的命运，更多是被你出生在哪个地方，出生在怎样的家庭所决定。如果不是历史事件改变了外公的命运，母亲的命运也不会被改变，她的人生路也就不会坎坷崎岖。外公是军队转业至地方的县级干部，因政治运动而被劳动教养，在一个我至今不知道具体位置的地方——草滩农场。

外公被劳教时，我妈妈一岁。接下来的两年里，为了生存，外婆带着女儿要过馍馍（即乞讨），直至 1960 年得知丈夫死去（读《夹边沟纪事》，可以推测出，外公也是因那场大饥荒而死）。因希望已断绝，为了生存下去，生于良好家庭并识文断字的外婆带着女儿来到山区，改嫁给一个目不识丁的山区汉子。我外婆曾说，因失去顶梁柱后导致的贫穷外加饥荒，三岁的母亲因饥饿而虚弱，刚到时后爸家的低矮门槛都跨不过去。来到新家，母亲有饭吃了，但作为继女，她没被送去学校，至今不识字，而同母异父的弟妹都上过学。母亲后来说，因后爸有伤力病不能出大力，而农业社时期吃饭要靠工分，十岁后，为了挣口饭吃，她就开始在修梯田的工地干活。

成年后，母亲嫁到了一郭姓人家。她后来提及此家人时愤恨不已，说姓郭的没好人。可想而知，她应该在那个男人家受到了虐待，不知是男人还是婆家。后来，母亲改嫁给我大大（爸），因为家里穷，我爸爸 30 岁才娶我妈。不过，曾听已经过世的爷爷说，民国时家里有一座水磨坊，经济条件尚好，内战时国民党抓壮丁，家里可以掏得出钱去顶数。后来，共产党来了，磨坊失去了。

文革后，外公被平反，家属得到了一笔补偿，他的大侄子还得到了一份民办教师的差事，后来转正。而作为他的配偶，外婆因改嫁而没有得到一分钱补偿。在农村人的观念里，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而且母亲跟着外婆走了，虽然是外公唯一的后人，也没有得到一分钱补偿。按农村的习俗，外公的大哥把他的二儿子指给死去的外公为子，以延续香火。出于残存的亲情，他们家与母亲还在联系，也给日子过得不好的母亲以言语上的安慰。我大大是个典型的无用书生，爱读书，谋生能力却很差，而我又很不幸地继承了这一点。因经济困难及性格不和，他们俩总是吵架，吵了大半辈子，吵架时院里院外总是有乡邻看热闹。母亲吵完架后，就在子女身上出气。那时，母亲与一个同村的已婚男人好过。记得儿时，在官道上，那男人的老婆带着儿子扇了我妈一耳光，这段孽缘最后就不欢而散。因丈夫无能，我妈妈一直打零工（方言叫“搭主儿”），养活自己与儿女，农忙时给别人在地里干活，在瓦厂（记得放学后，跟着母亲搬过砖）、蜂窝煤厂工作过，还给城里人踏过辣椒面（是用圆型铁疙瘩），去新疆拾过棉花。总之，常人不干的活，为了生存，她都干过。在我们老家人的观念里，只有日子过不下去的，女人才会去干活，因而，我们一直在乡邻的异样眼光中生活。直到我们

三个子女成年后外出打工，她才不经常出去干活。

因早已与父亲分居，妈妈现在其实是一个人在生活。姐嫁到了三十里外的地方，偶尔会回去看望一下，我和妹妹一年只能回一次家——妹妹与一个湖北人恋爱、结婚，而我远在华南谋生。因为伤力病，妈妈的后爸最后在壮年时死去。也是因为贫穷，舅舅以大龄男子的身份来到我村，娶了村里的一个女子。他丈人那时是个一字不识的包工头，当时因被合伙人欺骗而破产，最后因为缺钱，为得到一笔不菲的礼金，才把大女儿嫁给了一个山区穷小子。丈人后来翻了身，重操旧业，舅舅依靠他的扶佑，在我们村安家并有了车。不过，外婆因为与儿媳不和，在儿子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怀着凄凉的心情，以 70 多岁的高龄，独自一个人回到小山村居住。她有次说，外公当年的同事都已经退休了，并过着安逸无忧的生活。而那些活着并已老去的外公同事，在县城碰见时，还认得我外婆。50 多岁的妈妈与 70 多岁的外婆，因历史变故、社会现实及人情世故，不得不过着相似的独居生活。哀，惨。■

本土/国际篇

印度毛派的历史与现状

作者：萧敢

前几年有一部印度宝莱坞电影《无法避免的战争》(Chakravayuh)唤起大家对印度纳萨尔派运动(Naxalite,即毛派)的重视。毛派也对这部电影的关怀表示了感谢,并指出一些并不认同之处。它在中国也受到乌有之乡、四月网等网站的大力推荐。以《微物之神》出名的著名女作家罗伊(Arundhati Roy)近年来一直关注毛派的生活和运动,不断撰文介绍,也扩大了毛派的影响力。

去年,立场右倾的莫迪当选总理,毛派对此自然极为不满。今年年初,奥巴马访问印度,再一次触及毛派的神经。毛派在自己传统势力范围内如恰蒂斯纳邦(Chhattisgarh)大规模散发反美小册子,焚烧莫迪与奥巴马的头像,呼吁发起全国性的大罢工。并且他们暴力袭击了喀拉拉邦的一个公司,再掀武装斗争热潮。

总体来看,纳萨尔运动在近年有愈演愈烈之势,它在2013年5月攻击了印度中部恰蒂斯纳邦的Darbha Valley,打死27人,其中包括几名国大党的领袖,顿时引发了国际关注。现在纳萨尔派主要在印度东部和中部活动,影响范围从西孟加拉一直到中央邦,甚至延伸到南印度的喀拉拉邦,完全纵贯印度,形成所谓的“红色走廊”,影响到的人群有数亿。

印度政府2005年公布的数据认为,印度91%的暴力事件,89%的暴力死亡事件,都与纳萨尔运动有关。在2003年,它的影响范围还只有8个邦,到2005年已有13个邦了,现在是17个邦,涉及印度大约40%的领土,并且与海外毛派如尼泊尔,不丹等国的组织的联系也趋于密切。印度前总理辛格曾多次公开表示,毛派叛乱问题已成为印度内政安全最大的威胁。印度毛派自称与尼泊尔毛派有联系,但遭到尼泊尔毛派的否认。而从武器装备来看,大部分武器可能来自印度东北、中缅边境等地。

听起来毛派的影响力非常恐怖,可是看一下数据,真正纳萨尔派的武装分子大约2万多人,不到3万人,且多以轻型武器装备。再算上非武装的纳萨尔分子,大概也就5万人。这股力量与40%的印度领土,几亿人口相比,应该算微不足道。但这片土地非常贫困,基础设施落后,同情纳萨尔运动的人也不少,真要抓捕他们并不容易。在2007年至2012年间,被打死、遭逮捕或被迫投降的纳萨尔分子有将近1.5万人。暴力活动的最高峰大约在2009和2010年。

有学者研究了纳萨尔运动与当地经济的关系。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纳萨尔运动的频繁程度直接导致了暴力、尤其针对妇女暴力的增加。还有研究指责纳萨尔派雇佣儿童兵。而且纳萨尔运动的频繁程度直接导致地区贫困率的提高和识字率的降低。纳萨尔运动对“红色走廊”地区的伤害是很显然的。反过来,如果要降低概率乃至消除纳萨尔运动,那么最重

要的手段就是扶贫和扫盲。而这两项都是印度在过去几十年里始终没有完成的任务。

纳萨尔运动一直可以追溯到 1967 年。奈保尔在《百万叛变的今天》第五章里就描绘了他在 1988 年从金奈到加尔各答所见识到的纳萨尔运动。1967 年，西孟加拉纳萨尔地区的一群农民为了夺回被侵占的土地，包围一队警察并杀死一名官员，从而开始了纳萨尔运动。西孟加拉是印度思想最活跃的邦之一，参与纳萨尔运动的人们也借鉴了很多左翼思想，马、列、毛，也有本土的罗易，维维卡南达和罗曼罗兰，而他们本身多半出身下层阶级。比较有意思的是，毛派认为政治斗争高于宗教斗争，虽然主体都是印度教贫民，但他们并不反对伊斯兰教，认为印度伊斯兰教的兴起也是反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应加以团结。

在印度东部和东南部，甘地或者那教思想并不受到欢迎，非暴力被认为是很奇怪的想法。《薄伽梵歌》等印度教经典是真正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哲学思想。而《薄伽梵歌》里就有论述，为了大义而使用暴力，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最初纳萨尔分子的行动还比较克制，内部存有分歧，既有相对温和的派别，也有相对激进的派别。纳萨尔派一开始主要表现为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只是占领学校，破坏雕像，偶尔袭击警察。后来警察对纳萨尔分子的手段逐渐严厉，纳萨尔分子也用上了炸弹。纳萨尔运动公认的领袖是查鲁·马宗达，他在 1968 年开始主张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在英迪拉·甘地的镇压下被捕入狱，1972 年死于狱中。激进的派别也不再认为孟加拉本土思想家如罗易能给纳萨尔行动提供指导，而是应该作为保守思想而狠狠打倒。社会运动在这过程中逐步升级，最终在 1980 年以后转变成为暴力革命运动。原初意义上的纳萨尔运动在七十年代初就已结束，可武装斗争从未真正停止，各个派别都在分头行动。

2004 年，纳萨尔的马派与毛派正式合并，武装暴力运动开始升级。他们开始驱逐地主，重新分配土地，用暴力来维持印度烟叶的价格，保证当地穷人的收入。此外，纳萨尔也根据共产主义原则派推行男女平等，他们在广大农村很容易地招收到大量女兵。很多女兵骁勇善战，曾有一个女兵成功狙击 250 名印度士兵的经典战例。

而纳萨尔派的经济来源也与其他国家的游击队或黑社会相近。其一是在政府权力缺失的地区征税；其二是非法开矿；其三是控制罂粟，大麻等毒品（罂粟种植在贾坎德邦非常普遍，是暴利行业）；其四是垄断高收益的工程项目；其五是敲诈勒索。这几种手段与日本、台湾等许多黑社会的经营模式都很类似。此外，一些纳萨尔派分子还介入政治，参与选举。虽然他们一般受到城市中产阶级的强烈抵制，但在最底层贫困民众中颇有影响，很容易赢得选举。

从暴力活动的分布来看，中央邦和比哈邦是毛派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在未来也最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暴力活动。可这同时又是印度极为贫困的地区，扶贫任务极为艰巨。印度政府从来缺少执行力，加上毛派的草根特征，使得它会长期地成为印度政府的肉中之刺。■

超越“宗派政治”：

俄罗斯的精英博弈、政商网络与租金分配（上）

作者：张昕

一，超越“宗派政治”

对于俄罗斯政治（甚至是整个前苏联空间内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形态），学术界和公共空间的讨论已经形成一套“宗派政治”或者“派系政治”的稳定话语。各种媒体中充斥着对克里姆林宫内部不同派系斗争的猜想和揣度，俄罗斯最高层政治生活被简约成为对若干精英派系之间冲突斗争的描述，而如此冲突斗争的结果被认为决定了俄罗斯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这类“宗派政治”分析中最常见的，就是把普京时代的俄罗斯高层政治归结为两个派系或者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一个亲西方、亲市场经济、亲民主法治的自由派（梅德韦杰夫曾被描述成为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以及一个强调国家控制，强调主权独立和俄罗斯发展道路特殊性的“强力部门”集团。前者是转轨目标新制度的政治基础，整个转型过程的成败，就取决于前者在政治斗争中是否占据上风，能否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般化，而后者如果继续控制政治主导权，则旧体制将复辟，转型失败。普京这类领导人的独立权威，就来源于在这些不同家族、派系，或者精英集团之间协调裁决利益冲突的独特地位。

但是，这样的“宗派政治”分析有诸多缺陷：它往往忽略了所谓“家族”“宗派”或者“门阀”之间边界的高度模糊，以及个人在不同派系之间归属的流动性和灵活；对具体集团的界定和具体人物派系的归属界定，往往流于随意；并且先验地将派别加上道义判断色彩浓重的标签（比如作为好人的“自由派”和作为坏人的“保守派”）。如此分析框架的流行，迎合了一般公众对于“宫廷政治”黑幕的热情，也有助于一些研究人员兜售“内部消息”以获取商业利益，但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分析也忽略了整个政治体系本身的性质和体系内“租金”（economic rent）总量的变化，对于不同派系形成产生的重要影响，即这些“宗派”本身的产生、分化组合是体系变化的结果，而不是成因，是需要解释的对象，而不是可以直接用来解释制度变迁结果的因素。

我提出一个替代的分析框架，希望更好地描述苏联末期至今，俄罗斯政治在最高精英层面的变化。在这个替代框架中，整个苏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商业精英）处于一组相互交叠，不断变动的网络当中。而这些不同网络的分化组合，又高度依赖于政治经济体系中总体租金的数量与分配方式，以及对暴力手段的控制。传统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租金”的认识是负面的：租金是不完全竞争的结果，对经济增长不利，因此市场化改革或者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目标，是尽可能消除设租金的可能性。而传统的“宗派政治”分析框架中，保守集团或者旧制度代表集团就是主动“设租”，希望从中保持自己对租金的分配权，从而阻挠市场化经济和开放政治的引入。

而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诺思等人（North, Douglass Cecil, John Joseph Wallis, and Barry R.

Weingast. 2009.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则提出, 对于特定社会和发展阶段(主要是他们所说的“有限准入社会” [limited access society]), 租金的存在是必须的。因为, 对国家来说, 控制不同精英集团之间掌握和实施暴力的能力是关键。有限准入社会的特征是: 政治经济权力为处于社会顶层的少部分精英所控制, 而在向一“开放准入社会”(open access society) 的转型过程中, 会发生以下转变: (1) 从个人特权向部分精英集团的权利转换, 后者权利的基础是非个人身份的(“非人格化的交易关系”), 这可以视为对部分精英实现了“法治”; (2) 出现了比较复杂、稳定的精英组织(“组织的永久性”), 比如政党、商会等作为社会发展的工具和平台; (3) 对于暴力组织和有组织的武装力量的中央集权式的控制(“政治控制军事力量”)。在这个框架里, 租金在上述两种社会间转型过程中可能是必需的, 尤其是国家往往需要用设立租金的方式, 来和这些精英集团交换对暴力的控制, 以维持自己对于暴力的垄断权, 否则可能是全面的社会失序和暴力失控。

二, 苏联晚期

苏联晚期的计划经济不承认私人产权, 严格控制人员的流动(包括国内地域间, 不同职业部门和产业间流动), 对于外贸高度垄断, 国内市场上实行价格控制, 这些政策选择都可以成为设租和租金攫取的手段。同时, 苏联社会呈现高度的科层体系特征, 社会福利的分配, 尤其是对高端稀有资源的分配, 严格依据这样的科层体系进行。苏联国家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实行大规模的暴力行为, 但是同时对部分非精英集团有选择地开放, 用对政权的忠诚来换取国家资源分配。苏联晚期社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水平相对较低, 教育和卫生系统的开放度较高, 教育文化领域、科研领域的从业人员得到优待。同时国家通过建立从上至下的各种全国性组织(包括苏共、共青团, 各种职业协会)来推动个人进入政治体系。最后, 对劳工阶层而言, 纵向科层体系提供了一定的上升机会, 同样需要以对政权的高度忠诚来作为交换。

苏联晚期呈现出诺思笔下“有限准入”社会之成熟阶段的特征: 社会层面没有广义的法治, 但是对部分精英来说, 有集团性的权利和比较稳定的行为规则。个人如果不违背这些规则, 能够享受可预期的分享租金的机会。而整个体系的稳定, 包括精英间相对稳定的互动关系, 又最终以苏共和克格勃对于强制力的全面垄断为保证。苏共和共青团等组织已经是发展相当完善的精英组织, 负责纵向体系由下至上的人员选拔和租金分配, 国家也具有对军队和暴力组织的完全的政治控制。

但是, 这样的体系没有承认公开的物质利益, 而是用意识形态、宣传和大众动员作为治理的主要工具, 因此非物质激励成为重要的资源。有限准入的原则, 同样适用于作为非物质激励的信息。对精英而言, 意识形态宣导与真实生活之间存在巨大反差, 导致一系列非正式制度的兴起, 比如传统的个人关系网络(BLAT)盛行, 渗透到各种正式制度中。对于分配体系的进入, 成为租金的一种重要非正式源头。精英间由意识形态宣导为基础的共同价值, 在1960年代后期开始遭到侵蚀, 整个寻租体系也缺少创新激励, 导致与美国在冷战时期的竞争最终走向失败。

三, 1986-1993年: 准入逐步开放时期

这是戈尔巴乔夫主导的“新思维”改革和苏联解体之后短暂的第一共和时期，这阶段推动制度变迁的主要精英集团是：苏联干部体系（Nomenklatura）中的少壮派和知识精英，这些精英调动和鼓励苏联大众对于自由化改革的全面支持。尤其是苏联的大中城市已经达到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准，有了中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生活方式，而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相对较低，这些地区也是对民主改革，打破政治和经济垄断（有限准入）的社会基础。

就整个体系中的租金而言，由自然资源带来的所谓“自然租金”，因为1970年代末开始的能源价格下降而急速下降。但是，随着部分改革的开启，整个体系迅速出现大规模的转型租金，具体包括由价格双轨制而产生的价格扭曲，私有化带来的一次性租金的分配机会，来自外部包括世界银行贷款和技术支持在内的一次性可分配资源。同时，原来体系中一系列没有被政治制度公开和认可的非正式租金，迅速转化成为现实可见，以个人为基础的货币形式。这一切都导致体系内租金总量急速上升。

在暴力领域，作为旧体制基石的军队和安全精英的地位开始弱化，国家对各种暴力集团的控制力下降，社会整体使用暴力的程度明显上升。这一阶段内，民族之间，加盟共和国之间围绕独立、民族地位等问题的矛盾迅速上升，出人意料地摧垮了苏联时期相对稳定的民族结构，出现了诸如1988年阿塞拜疆苏姆盖特地区对亚美尼亚族居民的大屠杀，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归属问题发生的战争，1991年最终以失败收场的“8·19”政变和迅速泛滥的地下黑社会。

同时期，整个苏联经济陷入全面危机，苏联精英的民粹主义心态和缺乏基本的经济知识，导致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机械使用。大规模转型租金的存在，使得苏俄转型和其他转型经济相比具有更明显的“银行挤兑”性质：所有人都抱着“捞一把就走”的心态，唯恐出手缓慢，可分配的租金就没有自己的份，而没有任何集团有维护“国家”作为最重要公共品继续生存的动力。

四，1993-1998年：全面寻租时期

1993年，叶利钦政府和联邦议会之间的宪政危机，以前者的武装介入方式解决之后，俄罗斯进入新的阶段。这一时期推动制度变迁的主要精英集团，是叶利钦政府内的联邦级别的官僚集团和新兴的商业集团，他们对抗的主要是地方精英和所谓的“红色经理”（苏联时期掌握大量国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老派管理者）。前者有动力推动进一步的自由化改革，后者则反对在地方和传统国有企业层面进一步开放竞争。在社会层面，对于宏观自由化改革的公众支持率迅速下降，1993年宪政危机的解决方式，给叶利钦倡导的民主自由蒙上阴影。

全社会体系中的租金，也在这个时间段内迅速转变形式。这一阶段的租金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活跃领域包括：自由化过程中的金融部门、1991-1992和1995-1996两轮大规模私有化，房地产和土地市场。俄罗斯联邦层面几个主要的精英集团之间，在不断尝试组成新的执政联盟。民主选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操纵选举的方式（尤其是1996年颇具争议的总统选举合法性问题），都不断侵蚀着叶利钦政府和背后的联邦官僚和大商业集团的合法性。但是，地方势力组党和推出自己政治代言人的努力，在1996年选举周期中没有成功。个人特权和非正式租金成为这个阶段的主要形式，也导致整个体系的腐败程度上升。

俄罗斯国家对暴力组织和手段控制松懈，体现在如下重要事件：1993年叶利钦“炮打白宫”，1994年和1999年两次车臣战争，黑势力对商业的控制进一步加深。国家甚至被迫和大商业集团、非正式暴力集团达成交换和妥协，以换取在执行暴力领域的部分主导权。

上述精英集团竞争的模式和暴力组织的控制，一起导致了1994—1995年俄罗斯经济部分复苏之后的1990年代末的深重危机：扭曲的利益机制导致各种市场参与者都更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快速的“再分配”而不是关注于生产性活动，高度的寻租和有限性准入的体系特征，也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迅速上升。这种始终高度关注再分配而不是生产性行为的特征，被有些学者总结为“持续再分配”，类似托洛茨基的“持续革命”论题。1998年8月，俄罗斯经济的全面崩盘伴随着新一轮新的政治经济精英的重新洗牌。■

边疆篇

近期维吾尔人偷渡出走现象初步观察

作者：李永峰

最近几年，在国际媒体中，经常会见到东南亚国家截获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偷渡者的报道。这些偷渡者包括老人、妇女和小孩，亦会有全家人一起行动的情况。例如泰国在 2014 年 3 月 12 日，曾从宋卡省一处橡胶园，截获 218 名非法入境者，“……疑似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但他们自称是土耳其人”，其中包括了六十九名男性、五十四名女性，以及九十五名孩童。妇女中还有些是怀有身孕者。2014 年 10 月 1 日，马来西亚警方在吉隆坡郊外的两处公寓拘捕了 155 名中国维吾尔人，当中有 79 名成年人，其中 37 人为女性，42 名男性；还有 76 名儿童，其中有 33 名女孩，43 名男孩……

除了东南亚陆路，还有其他通道。《环球时报》曾做过一则报道，“2014 年 11 月，上海市公安局协同有关部门侦破一起土耳其人组织我国涉恐人员使用变造土耳其护照偷渡出境案”，该案的具体案情是这样，“达吾提、拉马赞等人以 1 本土耳其护照付 2000 美元报酬为条件，利用伪假来华签证邀请函，组织、安排赛拉哈丁等 9 名土耳其人向我驻土耳其使馆骗取签证后入境我国，与我境内的阿巴拜克热、伊敏托合提、亚森等 9 名准备偷渡的人员接头，并收取‘定金’。随后，拉马赞安排土耳其人卡鲁克将该 9 名土耳其人护照携带出境伪造、变造后，企图组织阿巴拜克热等 9 名人员从上海浦东机场非法出境。”

以上这些例子，只是想说明，近几年维吾尔人偷渡出走现象严重，其背后最大的原因，自然是新疆越来越恶化的局势。对于这一波维吾尔人偷渡出走现象，目前并没有权威的研究和数据，所以还无法准确得知偷渡者规模有多大、主要来自哪里、如何组织、出境后的流向等。政府对此问题的判断也未曾公开，所以也无法得知政府所掌握的状况。但是，透过中国政府的公开应对，以及政府所重视的方向，我们或许可以推测这些偷渡者的一些特征。本文尝试粗线条地观察一下最近几年维吾尔人出走或偷渡的现象。

透过政府的应对来了解这个群体

由于新疆民族关系一直紧张，所以政府对于新疆社会的控制程度、政府的集权程度，远远超过内地各省。那么，新疆政府为何不从源头上制止偷渡现象呢？透过新疆当前所头号重视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仅管新疆政府的控制能力层层深入，希望掌控每个人的动向，但是有一类人，依旧是政府所无法掌控的。这类人就是“下落不明人员、变卖家产外出人员”。

2014 年 8 月 1 日开始，依托 20 万下乡干部的“访惠聚”工作组，以及各地的社区、村和警务室“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进行“社会管理基础数据摸排采集”。这项工作应该是

新疆当前所头号重视的工作。那么，这个“社会管理基础数据摸排采集”主要是做什么呢？

以青河县为例，采取“以房找人、以人找房、走访调查、全面摸排”的方法，在复核辖区实有人口信息的基础上，重点对辖区流动人口、下落不明人员、变卖家产外出人员、无户籍人员、流入人员、重点人员、特殊群体、清真寺和宗教教职人员、出租房屋进行摸排登记，以达到全面掌握辖区实有人口底数和情况、全面掌握辖区实有房屋底数和情况、全面掌握辖区教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底数和情况的目的。”（青河县开展社会管理基础数据摸排采集专项核查，http://xj.ts.cn/2014-08/13/content_10411123.htm）。

那么，在新疆基层，“下落不明人员、变卖家产外出人员”究竟有多大规模呢？

我们可以看看阿克苏地区一个只有 13 个村庄的小乡镇古勒阿瓦提乡的情况，“由派出所、综治办、村委会组织人员通过多种查找去向不明的 23 人，现已找回 8 人。”（温宿古勒阿瓦提乡近 2 万农民拥有家庭档案，<http://xjrb.xjdaily.com/tsnb/1161025.shtml>）。阿克苏地区另外一个乡村亚科瑞克村的情况则是“登记亚科瑞克村流动人口 234 人，其中外出人员 196 人，变卖家产、举家搬家搬迁人员 38 人”。《国家能源局新疆监管办驻村党小组工作情况》（<http://xjb.nea.gov.cn/NewsDetail.aspx?id=435>）。

以上乡村中的例子，大致可以让看到，下落不明人员、变卖家产外出人员，在新疆基层中的比例应该并不低，而他们又是不在政府掌握之中的。偷渡出走者，应该主要是在这类人群中产生。

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偷渡出走现象的应对，除了从源头上掌控和制止之外，另外还有就是从边境堵截。根据中国媒体的公开报道，2014 年 3 月 1 日晚上，昆明火车站的恐怖袭击发生以后，“公安部成立‘4·29’专案组，5 月起河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新疆等地警方针对西南边境偷渡活动展开联手打击，多个工作组被派驻一线。由此，一个复杂而严密的偷渡网络浮出水面”。“4·29”专案行动打掉的 30 多个跨国组织偷渡犯罪团伙中，仅以广西“蛇头”韦海为首的特大团伙，在 2014 年 1 月至 4 月就组织了 300 余人偷渡出境”（<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01/5433274.htm>）。

《环球时报》的报道引述公安部的通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例子，“一名女子古丽齐娜尔·阿卜杜热西怀有 8 个月身孕，数月前她和丈夫变卖全部家产，带着 16 岁的大女儿从和田坐大巴到乌鲁木齐，停留 3 天后，坐火车到广州，在一家日租金 40 元的小旅馆落脚，等待“蛇头”安排偷渡出境。阿卜杜热西的丈夫在“4·18”案件中被越南警方击毙，得知死讯，她和女儿没掉一滴眼泪。”

能够实现偷渡的多项因素

七五事件以后，新疆局势的紧张人所共知，一方面是地下教派所推动的社会形态日渐保守化，另一方面是政府反恐压力之下的风声鹤唳。因为有外出经商、谋生传统，离开新疆进入内地，应该成为很多人所考虑的方向。但七五之后，整个内地对于维吾尔人的警惕，也比之前更加严重。而到了 2013 年 10 月 28 日天安门金水桥恐怖袭击，再到 2014 年 3 月 1 日昆明火车站的暴力恐怖事件，维吾尔人在内地汉族社会中的生活变得更为孤立。此前依靠一些

边缘行业而生者，由于受到打击也日渐艰难。这成为一些人谋求走向更远的地方的一个因素。当然，偷渡者构成复杂，有人出于生存目的，也有深受地下教派影响者，期望出国参加圣战。

如果说，某些维吾尔人有想偷渡的想法，那么要完成偷渡，依然极其遥远。推动目前维吾尔人选择偷渡出逃，除了社会所造成的压力，还有几项因素。首先，偷渡需要资金，新疆有广袤的土地，这些年来新疆的土地交易非常成熟，村集体土地，已开垦或未开垦的，都有大量交易的例子。维吾尔人如果举家出走，需要积累一大笔钱。由于土地交易成熟，卖地、卖家产是一项可能的选择。过去大量前往中国内地谋生的人，大家多也是选择举家外迁。因为这个市场的存在，所以才会出现政府语境中的“变买卖家产、举家搬家搬迁人员”。

其次，除了资金，还需要地下的交通路线。这些年维吾尔人在中国经营海洛因贸易，早已从西南到西北，打通了很多走私通道。早在十几年前，维吾尔人便大量定居云南、广东等地，其中云南边境的小城瑞丽，一度曾有八千维吾尔人定居。所以，偷渡所用的地下交通路线，只需要继承过去的走私路线即可。

对于维吾尔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在此有必要多做探讨。世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对于少数民族究竟在他们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往往只有暧昧不明的印象。实际上，维吾尔人凭借其世代经商的传统，在中国社会中，一直都在某些行业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除去和田玉、新疆特色餐饮（如羊肉串等）这类有其技能优势的产业，在高度竞争的领域，维吾尔人也能找到自己突破的方向。八十年代，维吾尔人最早发现在中国严格外汇管制之下，可以通过外汇套利交易获利。中国的外汇黑市可以说是由“新疆帮”所开创。后来苏联解体之后，中亚的边境贸易同样受到维吾尔人控制，九十年代热比亚因在边境贸易中发达，而成为新疆首富、全国政协委员。由于少数民族属于边缘群体，因此大多只能游走于中心之外，在地下的非法或灰色地带寻找自己的势力范围。二十一世纪初，维吾尔人曾一度控制中国的海洛因交易。

第三，则是偷渡出去以后，需要有人接应。海外维吾尔人有广泛的网络，目前在德国、土耳其、北美、澳大利亚，维吾尔人都有很大的社区。除了政治避难，打黑工一途，去 ISIS 打仗，依靠战争谋生，现在据说也成了—些维吾尔偷渡者的选择。

新疆是地处东西民族往来的大熔炉，作为重视商业的民族，维吾尔人一向追逐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利益，在东西方之间游走，乡土观念并不像汉族那般重。现代社会，全球普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而分立，但维吾尔人在不同民族国家边境间的往来，依旧极为普遍。很多时候，他们的越境往来，其初衷与政治相距甚远。

维吾尔历史上最重要的两部文化经典《突厥语大词典》和《福乐智慧》，其作者都是周游世界的人物。近代新疆重要的政治家包尔汉，其祖父辈便离开新疆前往俄国的喀山定居，到包尔汉一代，成年后才因商业原因返回新疆。包尔汉后来成为新疆自治区主席，对新疆近代史影响甚大。最近几年，因《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三本书而享誉中国的美国记者何伟，在《甲骨文》一书中，记录了一个鲜活的当代维吾尔人波拉特。他的经商路径遍及中亚各国，最远到达阿塞拜疆，一度也曾定居北京雅宝路，后来又以“政治避难”的理由跑去美国。波拉特的游走范围，会令很多安土重迁的人诧异。从包尔汉到波拉特，对于他们的行为和经历的理解，需要考虑维吾尔人独特的文化因素。同样，对于最近几年日渐增长的越境出走或偷渡的维吾尔人，也需细致探究其背景、动机和目的，而不可一概以恐怖行为而

论。

维吾尔人偷渡出走对中国的影响

维吾尔人的偷渡造成了各类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在偷渡路径被截之后，所出现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最严重的便是昆明火车站事件。根据公安部对案件的侦破，“该案是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维吾尔语：ئابدۇرېھىم قوربان，拉丁维文：Abdurəhim Qurban）为首的暴力恐怖团伙所为，该团伙共 8 名成员，曾在云南个旧的沙甸镇落脚，原计划出境参加‘圣战’，到广州未能出境，于是返回云南，计划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其中三人事发前被警方抓获，其余五人则包车逃至昆明，3 月 1 日晚进入昆明火车站制造了该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更严重的影响则在于对中国国家认同感的动摇。当更多的公民，无论是因为政治还是非政治原因，开始放弃自己的国家，选择偷渡离境，而且这些公民都集中于某一个族群，这一现象说明，国家对这个族群的感召力日渐下降，这将更严重的挑战这个国家的统治权威。

再其次，则是广大维吾尔人流入 ISIS 成为圣战者。从阿富汗、波黑到伊拉克，伊斯兰极端势力不断挑起战争热点来培养圣战者，当某一个战争热点结束，无仗可打的圣战者便会策划下一场战争。所以，八十年代，驱逐苏联之后，留在阿富汗的圣战者，建立了基地组织，酿成了后来包括九一一在内的众多恐怖主义行动。今天，ISIS 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圣战者，当叙利亚局势平静，这些圣战者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会有大量成员流散到世界各地，下一场圣战在哪里？会是中国吗？起码，参战的维吾尔圣战士，肯定有人会回流。

提起 ISIS，不得不提及另一个重要话题，就是目前在 ISIS 里面，究竟有多少维吾尔族战士？《环球时报》曾在 2014 年 12 月一篇报道中，估计约有 300 名中国人曾经与“伊斯兰国”成员并肩作战。也有民间学者判断，在去年 10 月时候，在 ISIS 参战的维吾尔战士，已经超过 1100 人。这一话题，或者我们未来另作探讨。■

边陲照片与“民族”的视觉呈现（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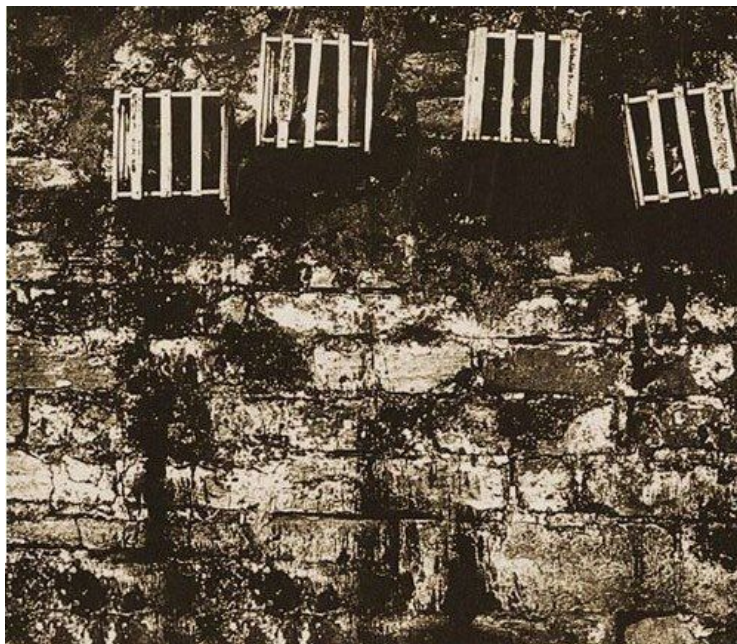
作者：李潇雨

作者说明：在2014年的《观察报告》“秋分”号中，我发表了博士论文中“边陲摄影与‘民族’的视觉呈现”这一章节的上半部分，具体梳理了晚清时外国摄影师在新疆所拍摄的照片，以及这些照片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如何重新出现。而在余下的部分里，我将进一步讨论和“西北”同处边陲的“西南”地区——川、滇、黔——是如何被晚清外国摄影师的镜头所呈现的，并对比不同的边陲照片如何在不同的策略下被生产和被重新活化。通过影像-知识生产的角度，我希望能够响应和折射晚清帝国与当代民族国家对待和治理“西北”、“西南”区域时所面对的问题。

旧照中的西南部分

与新疆拍摄者多是探险家出身不同，在再现晚清西南边陲的实践上，一位极为重要的拍摄者——法国人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是一位殖民地官员。1899年，他从法国驻广西龙州领事的职位上调任成为法国驻云南府（今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开始了长达五年的任期工作。作为一位摄影爱好者，方苏雅驻守云南的日子也是他摄影创作的全盛期：他为西南山区拍摄了上千张照片，这些“战利品”除了反映出他对当地社会市民生活、商业贸易活动、政治事件的关注外，也证明了此人应该非常懂得利用“职务之便”云游四方。

与普尔热瓦斯基、马达汉、莫理循等在中国西北实行考察与“间谍”工作时所拍摄下的摄影作品相比，方苏雅的西南照片中并没有太多关于“野外”、“地质特点”、“军事哨卡”的记录，而是更集中于反映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关注重点”上的区别也许直接而形象地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对清帝国“西南”边疆较为“松弛”的重视程度与处理策略，毕竟“西南”在地缘政治与国际格局对弈方面的意义都略逊色于清帝国的西北部分。大略来说，方苏雅视野和关注兴趣与大多数西方摄影师并没有显著区别，都热衷于记录城门、商业街、寺庙、佛塔这些典型的“中国元素”；而从他拍摄的闹市街道、小吃摊、庙会场景、婚丧嫁娶以及滇戏名角来看，西南的“人间烟火”对这位外国领事而言也有相当的吸引力。除此之外，方苏雅还在照片中展现了他对刑罚的兴趣，那些装着起义首领头颅的木盒子（图片3.16）和被吊死在站笼中的囚犯的影像，使他的摄影也不脱“猎奇”的范畴。



图片 3.16 方苏雅 起义首领的首级

然而最为特别的是他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拍摄的少数民族照片。其中有一部分致力于以“群像”形式反映其生活片段，从画面上看，这些作品多采取中距离拍摄，人物布局松散，构图随便。而另一部分则表现出更为强烈和连续的个人风格，因为方苏雅在画面中要刻意突出和表现少数民族在服饰、样貌上的细节特征，所以他尽力选择甚至创造简单的背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他视觉要素的干扰；而“目标人物”一般也以正面站姿入相，既方便全面展示他们的五官与服装细节，也可完全占据图片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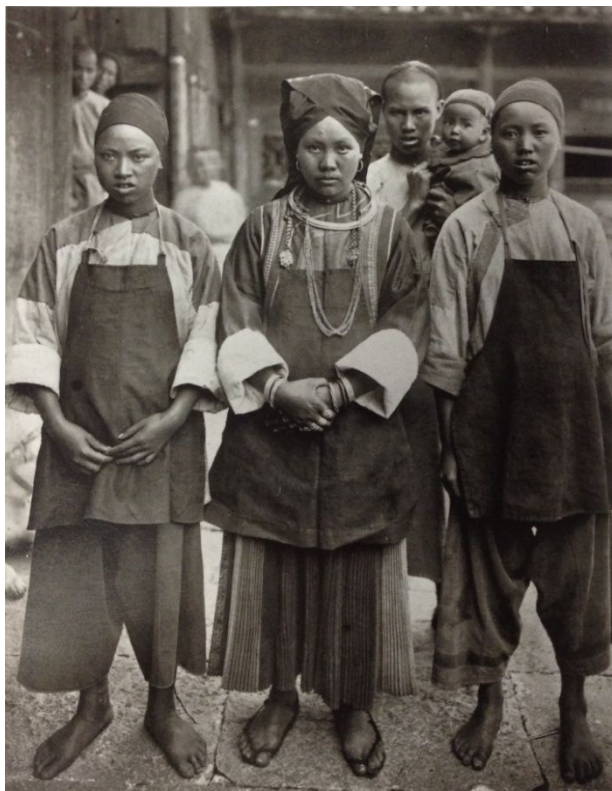
出现在方苏雅镜头下的少数民族是多种多样的。总体来看，他使用个别形象来抽象、区分民族间的差异，也会对比不同阶级、不同身份的同族人在衣着上的变化。因此，这些照片在样式上而言是更为“人类学式”的。方苏雅曾拍摄了四川西昌、泸沽地区的黑傈罗人，其中一张是黑傈罗武士的群像（图片 3.17），照片上十一个男人站在一栋当地木结构建筑前，手持木棍与土枪，神态各异。他们展示了黑傈罗群体中男性的惯常穿着：布衣裤，其外罩着毛毡质地的大披风，头巾在前额处结成锥形，赤脚。而对比另一张黑傈罗首领的单人照（图片 3.18），我们可以看到族群内部的等级差别在服饰上的表现：画面里的男人除了标志性的包头和深色布衣之外，额外穿了一件护胸口有圆摆的铠甲来表示自己的地位。而方苏雅镜头下云南、贵州地区归顺了汉人的白傈罗人，其男性在装束上已与晚清汉人完全无异，不过女性的装扮则更为复杂，也更倾向于用服饰来体现身份上的差异：在一张标题为“白傈罗已婚女子及少女”、摄自贵州的照片中（图片 3.19），三位女性上身都穿偏襟布衣和围裙，而在这种“民族特征”似不明显的表象下，她们彼此之间却有显著的分别，两边的年轻女孩穿布裤子，而中间的一位则身着百褶裙，并在手臂、手指和脖颈处佩戴繁复的银饰，头顶的深色布帕的包法也与其他两位的黑色圆顶布帽明显不同，这些细节似乎表现了她较高的地位。而在照片所呈现的苗族群体内，云南蒙自地区的花苗女性（图片 3.20）与贵州的青苗女性（图片 3.21）在服饰上也有相当不同的“地区差异”，青苗打扮较为朴素，而花苗则佩戴隆重的帽冠，衣裙、腰带上都装饰着花纹繁复的绣片。



图片 3.17 方苏雅 黑傜罗武士



图片 3.18 黑傜罗人首领



图片 3.19 方苏雅 白佬罗的妇女



图片 3.20 云南蒙自花苗女性



图片 3.21 贵州青苗女性

与方苏雅这种风格较为严肃正经的人物照相比，莫理循镜头下的西南少数民族照片气氛就轻松活泼多了。1908年，莫理循在游历中国西南14年后，重新回到云南，在思茅地区拍摄了六十余幅少数民族生活的照片。虽然在地域上并不如方苏雅覆盖广泛，但莫理循的这组影像却也呈现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展示了瑶族、佤族、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与他们的具体生活场景。在拍摄主题的选择上，莫理循并没有将展示少数民族在装扮上的特性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摄影追求，而是在兼顾其“特异性”的基础上，刻意呈现他们的社会生活片段。这组照片中风格最强烈的一张是思茅妇女观看军事表演的照片（图片3.22），画面上的主角们是一排没有被注明具体族别的妇女，她们穿着深色短上衣和及膝短裤，脑后拖着一根拴着装饰品的长麻花辫，背对摄影师站在土坎之上。在强烈的阳光下，她们有的带着斗笠，聚精会神地望着前方，有的则好像发现了身后的摄影师，又招朋引伴地回头注视着这个外国人的奇怪举动。她们生动的神态，成为这张照片和其他的摆拍作品最大的区别。而这些姑娘们或赤裸或穿着精美袜套的健美小腿应该给莫理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照片说明中只写了一个被惊叹号修饰的字：“腿！”（“legs！”）



图片 3.22 莫理循 思茅妇女观看军事表演

莫理循的云南少数民族照片最为吸引人的特点是活力。因为摄影师注重呈现他们在“生活中”的状态，并没有把少数民族拍摄对象处理成为钉在纸板上的标本，因此照片总是洋溢着一种轻松的气氛；而且在相片视觉感觉的处理上，莫理循似乎也并没有刻意经营摄影构图、技法，而是更注重现场感和即兴带来的感染力。他的多幅照片都反映出了这种灵活又松弛的观感，比如他在滇缅边境孟连市场上所拍摄下的的佤族女子看上去坦然自若，非常自在（图片 3.23）；而“云南边远地区的瑶族妇女”（图片 3.24）中在街头扎堆儿的年龄各异、表情各异的瑶族妇女们看上去那么地毫不设防，以至于它的虚焦问题无损、甚至增添了最右边的那位年轻妇女笑容的魅力。然而这并不是说莫理循的摄影是非常粗糙的，恰恰相反，在有的照片中，莫理循体现出了他对摄影场景的巧思与控制画面的高超能力。比如在“思茅的少女在表演”（图片 3.25）中，一组不知名的少数民族女性和小孩组成了照片中非常扎实的中景，与空旷前景形成对比。对这一人数众多的“主角群”，莫理循选择在他们自然划分成为各个小圈子、进行社交、交流甚至等待时按下快门，有效地突出了最前方那一对亲密的女伴，而其身后每组人群却又都兼具细节，使得照片的构图显得疏密有致、毫不拥挤。在这些影像中，莫理循虽没有遵循“民族学”的摄影原则，但却成功营造和强调了另一种“异族情调”，它与服装、头饰这些物质性的符号有关，但更是精神性的——这些在边陲生活的少数民族族群的生活是平静、轻松、快乐又不乏诙谐的。

如果我们将这组照片与两年后莫理循西北之行中在新疆境内拍摄的成像相比较，那么这两无论是在技法、拍摄对象选择还是审美取向上都极为不同：前者放松而且惬意，后者则显得冷峻和充满距离。正因为这两组影像出自同一名摄影师之手，因此其中的“不同”颇为意味深长：首先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它们在“生产”上的不同原因——“西南”的摄影作品是莫理循私人旅游的产物，而“西北行”的照片则是一项政治任务、一个被英国传媒界和政界加以瞩目的“新闻事件”的周边产品，因此两组照片拍摄方式、截取对象上的不同，也许正反映了莫理循在“游客”和“观察家”这两种不同社会角色之下的心境变化。除此之外，莫理

循的“西南”、“西北”成像作为其区域观察的外化表现与结果，其区别也从侧面表现了帝国主义视野之下的一种“政治真实”：清帝国西南和西北边陲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和战略加以考虑和表现。



图片 3.23 莫理循 孟连市场的佤族少女



图片 3.24 莫理循 云南边远地区的瑶族妇女



图片 3.25 莫理循 思茅的少女在表演

虽说这两位在后世是作为拍摄“西南”的佼佼者被“活化”的，那么他们照片的编选境遇则又有所不同。方苏雅离世后，留下 110 幅玻璃底片以及上千张照片，这些照片并不为当世所知。1985 年，他的妻子将这些遗物分成四类，捐赠给不同的博物馆保存，其中包括法国吉梅亚洲艺术博物馆和由方苏雅的侄子皮埃尔·塞杜先生担任秘书长的“奥古斯特·弗朗索瓦协会”。1989 年，方苏雅的部分照片在欧洲巡展，并集结成为《领事的眼光》(L'oeil du Consul) 一书出版，成为其摄影作品的初次曝光。1996 年，吉梅博物馆和乔治·拉比博物馆合作，在法国图卢兹市举办“从南中国海到北部越南”(De la Mer de Chine au Tonkin) 摄影展，展出馆藏的旅行摄影家从 1886 年到 1904 年间拍摄的关于晚清中国西南和越南北部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方苏雅未出版过的照片。展览期间，这些照片以同名相册形式出版，其中照片目录由法文和中文编写，并附有简短的中文解说。这两本相册均收录了方苏雅拍摄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照片，且并不重复。

应该说直到此时，方苏雅与其照片的“复兴”都是以法国为基地，其存在并不为国人所知，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是峰回路转，变化多端。1996 年，皮埃尔·塞杜到访中国云南，期间主动向中方提到希望将方苏雅的照片交由云南有关方面展出，后几经辗转，在云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联系下，云南商人殷晓俊和罗庆昌共筹款 77 万元，向塞杜买下了 650 多张方苏雅照片的翻拍及使用权，再从中挑选了 200 多幅，于 1997 年在云南省博物馆以“云南沧桑话百年——1896-1904 年历史照片”为题展出，引起轰动，后又在北京、重庆、成都、西安、郑州等地巡展，使得“老云南”首次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这应该是方苏雅的中国照片在其“诞生地”的首次亮相。两年后，《黑镜头》系列丛书出版了名为《昆明晚清绝照》的 32 开本，以方苏雅的照片作为“图说”晚清云南生活方方面面的索引。遗憾的是，鉴于资料有限，笔者无法确定它与 97 年展览在引用照片上的关系，不过《昆明晚清绝照》在表现城市

部分中所引用的照片与上文提到的两本法文相册所收录的照片颇有相同。

此后，方苏雅作品在中国的曝光仍在继续。1998年，云南美术出版社总编辑与云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秘书长赴法考察昆明老照片的珍藏情况，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下将其出版权、展览权购买回中国。而在博物馆中，他们看到1600余幅方苏雅的个人作品，分别由法国吉梅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奥古斯特·弗朗索瓦协会”收藏。另外还有2600多幅关于云南的作品无法断定拍摄者的生平。两位从业者从其中选取了619张，组成《历史的凝眸——清末民初昆明社会风貌摄影纪实（1896-1925）》相册，于2000年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从相册组织上来说，方苏雅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拍摄者，其照片占总数量的三分之二，其他则是无法考证作者与拍摄时间的匿名拍摄者的作品，大致两百多幅。令人不满的是，这本相册在处理照片相关数据上相当草率，不仅缺少最低限度的照片拍摄者信息，也不提供照片的拍摄时间，只含糊地标识“清末”或“民初”这两个笼统的时间段以示区别。这种对“历史信息”的漠视，暴露了编者的编纂意识距离严谨的历史图册相差甚远，同时也吊诡地显示出图册的重点是放在其“影像”上而非“历史”的数据体质上。但更吊诡的是，这种处理方式也将所有照片都拉平成为同样琐碎而面孔模糊的“数据”，抹杀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也阻碍了人们深刻挖掘的可能。

相比之下莫理循的西南摄影作品则没有这么多跌宕起伏的故事性。他在云南思茅拍摄的作品，共有16张入选前一部分曾提及的《莫理循眼中的近代中国》相册。但也许是受限于整个系列不多的照片数量，至今未见这批影像作为独立主题成册付梓——看来旅华摄影师之间“受关注程度”的差别并非仅是其照片作品的“机缘”问题。

“旧照活化”与政治现实中的“区域”问题

在前文中，我以地理区域为单位，讨论了晚清边疆摄影的出现、内容及意义，也简略介绍了这批“图像数据”在当代中国的出版与发行情况。而以这些细节与事实为基础，我希望将这些照片的编辑出版策略与当代中国政治现实中的“边疆区域”问题联系起来，继续探讨可视化的“文化产品”如何映像当代中国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区域问题。

如果以“区域”的视角来宏观地观察上文所提到的各类再现晚清边疆地区的摄影集，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其编辑策略的“不同”也是“区域性”的。其中，以《昆明晚清绝照》与《历史的凝眸》为代表的反映晚清云南周边区域情况的摄影集，在“自主编辑”的思路中将重点集中在展现昆明的老城风貌、自然景观、社会生活以及历史旧事上，使两本相册里充满了怀旧的热忱，然而一直存在于西南社会中、作为其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却几乎消失在其缅怀的视线之中：偌大一本《历史的凝眸》，仅在“芸芸众生”中有两幅关于彝族撒梅女性的照片，可谓一笔带过；《昆明晚清绝照》也只收录了四张少数民族照片，其中三张同样可见于《从南中国海到北部越南》相册，并被标注为方苏雅作品。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根据法文版《从南中国海到北部越南》相册所提供的详细数据源，这三张照片均非出自方苏雅本人之手！这种“张冠李戴”，也许是由于翻译、参考的疏漏与错误，但也反映出了编者对于少数民族相片不够谨慎甚至无意深究的态度。这两本不同的中文相册显示出了相同的编选意图，那就是将所有重点都集中在表现晚清云南“汉”的部分——不论是文化、人物还是城市模式——而对同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却采取忽略的策略。对再现“西南”这样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而言，这种必备部分的被忽略现象令人感到迷惑与不满。

而“西北”的情况则完全相反。相较而言,《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和《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非常注重突出晚清新疆在民族构成方面的特殊性,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正是新疆在民族、地缘政治方面的特殊性促成了这些专门类相册的翻译和出版。除此之外,与上文提到的以“老昆明”为主题的相册相比,以晚清新疆为主题的图片集,其第一要务并非铺排怀念情愫,而是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治要求和更为“入世”的目的——以马达汉的西域考察照片集为例,在其序言中,撰稿人马大正(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直接道出了图册出版的目的、新疆影像与“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密切关系:一方面,作为19至20世纪外国探险家在新疆考察时所留下的视觉数据,这些照片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它们作为考察实录和考察成果,成为可供后人借鉴、研究、评述的历史遗产。这种“研究”的视角突显的“实用性”,以及其论述中所体现的从“知识”(视觉上与文字上的)上控制与把握新疆的企图,都与“老云南”的再现方式形成了鲜明差异。

我认为西北与西南晚清相册的“区域性差别”是由两者在当今“民族-国家”体制内分殊的重要性及管制策略造成的。这种政治现实以“映照”的方式体现在以图像为媒介的知识体系中。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相集与其产生时期的特定意识形态、历史语境甚至政治体制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而作为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某种实践体系,它有可能以正向或反向的方式泄漏这一时代的某种“政治意识”。正因如此,我相信将关于新疆和云南的当代晚清相册视为一种藉由符号取舍而实现的、具有清晰利害关系的“当代知识论述”也许比将其视为某种“历史真实”更有价值。而且,虽然当今边疆相册的主题与材料是“历史书写”与“过往片段”,然而在“当代”的生产环境,其所展现的具体“历史面貌”无法脱离现有政治关系的影响。

不过在“现有的政治关系”中,“历史”的影响同样颇为巨大,清代管制“西南”与“西北”的不同策略便极大地影响了今日的边疆格局与统治方式。当今的西南地域在中国的前现代时期便是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清初,西南少数民族不接受满清的统治,屡有异动,而所沿用的“土司制度”又过于依靠少数民族头人,为中央政府带来诸多不可控因素。因此为了控制西南,清廷不仅以靠镇压三藩造反和“改土归流”的军事政府和政治改革来改变原有格局、回收地区自主权,同时也鼓励汉人向云贵地区移民,形成了与其治理“西北”、“东北”边陲地区判然有别的管理政策。虽然这一“汉化渗透”的过程在清代也伴随着大规模的反抗和冲突,引起汉人与苗民、回民的大规模冲突,甚至直接导致19世纪70年代云南地区回民人口下降90%,然而它也最终形成了西南颇为复杂的“混居”状态,不仅是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也在此地混居杂处。

如果说清代的西南地区汉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夯实了边界、并解除了这里的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威胁,那么汉化及其结果在为这一区域带来一种较为“稳定”的局面之余,也在这个各族“混居”的地区逐渐建立起了汉文化、甚至汉族人口的强势地位。十九世纪时,汉族只占云南所有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而时至一九九五年,这一比例已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在当代中国,云南境内的人口比例与社会构成解除了区域内大规模“民族冲突”爆发的可能,也使得这个边陲省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实质上的汉人社会。与此同时,在边疆民族争拗和分离暴力日趋严重的今天,“西南”是一个特例,其中汉族的优势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相对“均势”,使这一区域的多民族混居状况并没有成为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政治麻烦。这些总体趋势导致了云南“民族问题”敏感度的降低,也许也直接影响了以想象云南“社会整体”

为己任的晚清相集的性质：在一个反映社会“普遍面貌”的图景中，某种“符号”在视觉上的可见性与其所代表的“实在”在实际政治关系中的重要性成正比，而“少数民族”影像在《昆明晚清绝照》与《历史的凝眸》中的边缘性，正说明了少数民族在云南社会中的“安全”位置。

然而“西北”的情况却大不一样。历史地看，自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将新疆这块地广人稀的领土纳入清的统治范围之后，这一地区一直处于一种相对紧张的战略关系之中：一方面，清政府对新疆所实行的管制策略以尽量不插手当地民族的内部事务为主，也并未移民大量汉人实行“实边”重任，造成了新疆在军事力量和中央集权上的相对空虚和松散，这一情况在1884年新疆行省化后才相对改变；另一方面，新疆是亚洲腹地上人种最复杂的领土，政治动乱频繁发生，但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位置既吸引着他国的垂涎，也使清帝国不能轻易放弃这里的统治，而十七世纪起清廷与俄国进行的一系列攻防战与边界摩擦以及19世纪60年代以降清、英、俄的三方在针对新疆所进行的军事与政治“大博弈”，都是这种竞争与争夺的直接结果。

晚清左宗棠等“塞防派”将领的一系列军事成就使清廷在政权崩坏的大背景下保持了对新疆的主权，而这一统治权成功地在中国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延续下来，使新疆成为现代中国体系内毫无争议的组成部分。然而清朝经营新疆的方式及其结果，也在客观上持续地影响着这一地区的现代政治关系。由于清末的低度汉化，直至民国时期，新疆汉人的比例极低，在缺乏确切的人口普查数据的前提下，一般学者倾向于认为截止1949年，新疆400万人口中维族约占75%，而汉族只有5%左右，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Doak Barnett）在《中国西部四十年》中说1948年他访问新疆时，汉人只占全部人口的6%。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大程度的“民族团结”以及边境控制，中央政府开始用政治手段大规模开展汉民实边，设立建设兵团屯垦、开发、守卫边疆。这一举措实现了快速而有选择性的人口增长，也大幅改变了新疆的政治格局。据1964年人口普查显示，新疆人口剧增到727万，其中汉族占31.9%，至1982年，此比例已增长至40.4%。然而进入20世纪末，凶猛的市场经济及全球化驱动经济的而非政治的内地移民进入新疆，造成新的人口流动及增长基点：1995-2004十年内，新疆境内维族增长118万，汉族增长却达至148万。

然而新的族群关系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带来族群间的和谐“团结”，也并未改变新疆的“异质性”，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凸显和加重了新疆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区隔”与紧张关系。特别是21世纪之后，汉族虽然在全疆人口中占40%，然而其分布却是极不均衡的：以天山为界，北疆的汉移民在人口中的比例高达60%，维族则只占16%，但北疆集中了新疆大多数的现代化城市和新兴城镇，是文化、科技、教育的中心，在全疆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反观南疆，汉族人口只占18%，维族则高比例地达到79%，然而除了依靠石油而迅速发展的巴音郭楞州外，南疆的其余地州，如阿克苏、喀什、克孜勒苏、和田等地GDP均列全疆倒数。而与数量快速增多、势力增强的在疆汉族移民相比，新疆维民的社会流动性弱，结构性贫困日益增强；而教育、文化、语言和其他社会资源分配方面的现实差异，又导致了针对维族的歧视现象的发生，进一步孤立甚至边缘化了这一原本的“主体民族”。上述的种种问题，使得新疆内部的经济、社会地位等等差距在“开发”为主导的现代政治经济秩序中以族群对立的形式尖锐地显现出来，而南疆地区近年来频仍发生的社会恶行暴力事件，与这一日益加大的汉维、甚至南北疆内部的差异不无关系。

上文谈及的这些当代中国西北边疆中的现实与挑战当然并非“直接”反映在马达汉与莫理循的两本关于晚清新疆的相册中，然而西北现实层面中的“少数民族政治”却以曲折的方式影响甚至“框定”了新疆“被再现”时的社会面貌与内容。不论是在帝国时期还是在民族国家体系下，“少数民族”始终是新疆政治中一个老生常谈然而历久弥新的话题，其敏感性和重要性催生了以少数民族作为对象、反映民族生活面貌的文化产品，而晚清新疆相册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得以重新出版。除此之外，马达汉与莫理循的相册又特别以“学术研究”和“实用知识”作为编纂目的，企图以“视觉”的方式控制与把握新疆，其政治上的意义不言而喻。而突出新疆少数民族的叙述方法，也颇为隐晦地表现了作为边疆的新疆与作为中心的“汉人”、汉文化相对紧张的关系。■

觀瀾

第九期
觀察報告

2015 · 大暑號

觀瀾學社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前言

这是“观澜学社”第九份《观察报告》，转眼之间，我们践行这项小小的尝试已经超过两年多了。我们会继续观察、记录、评估和预测中国的未来。

“观澜学社”是一个自发、独立、非商业的网络社群。我们关注当代中国历史的展开，试图对中共高层、资本、公民社会、思想界、边疆、外部力量等几项可能会影响中国命运的因素进行观察，进而分析和评估其未来走向；我们无意于介入学院的争论，更无意于鼓动任何政治势力；我们追求中国社会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建构“重叠的共识”。我们的名称来自《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我们计划每隔两至三个月公开发布一份《观察报告》，上一期《观察报告》的编号是“2015年·清明”，以后也将逐次按照中国农历的节气编号。本报告属于观澜学社成员内部交流之用，如需转载、引述，以及任何形式的利用，请与相关作者联系。看到本报告的读者，如有兴趣查阅早期报告，可向 guanlanxueshe@gmail.com 索取。 ■

目录

高层观察

王明远：胡耀邦主政时期的民族政策 4

资本观察

冯兴元、聂日明：中国金融体制的问题与改革 20

思想界观察

李晋、马丽：沃格林论现代危机和现象主义的兴起 36

边疆观察

李永峰：朝阳区“活佛”对藏传佛教传统的冲击 40

本土/国际

萧敢：印度电影的过去与现状 43

张昕：超越“宗派政治”

——俄罗斯的精英博弈、政商网络与租金分配（下篇） 48

高层观察

胡耀邦主政时期的民族政策

作者：王明远

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历来把打击防范民族与宗教分裂势力放在首位，表现出保守的倾向。但是，80年代的民族政策表现出比较自信宽容一面，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推动下，中央主动落实民族自主权，保障宗教自由，同时积极防“左”，批判大汉族主义。整个80年代是建国六十多年来民族政策最为宽松的时期，也是民族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这段历史，是中共民族政策的最宝贵正资产，值得认真研究与继承。

一、背景：“左”倾错误对民族自治的践踏”

中共在成立之初曾经奉行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为了斗争夺权需要，中共一度积极支援甚至鼓动各少数民族独立。随着中共在对国民党斗争逐渐占据上风，开始放弃“民族自决”的口号，转而主张“民族自治”，并且在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宣言》上明确将“民族自治”作为新中国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

建国之初，中央尚允许少数民族保留不少自主权，比如中央在与西藏噶厦签订的“十七条”承认达赖、班禅的世俗统治权，承诺不触动寺庙的经济利益；在新疆，也承认“三区”的地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有自己的区旗，区政府组成部门称为“部”而不是“厅”；新疆、内蒙、西藏都有自己的民族军。

然而，民族自治所包含的地方自治、宗教自由、文化多元等因素是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中央集权体制相悖的。中国共产党信仰的是无神论的，逐步消灭宗教是革命的目标之一。中共政治体制效法的是苏联民主集中制，要求地方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因此，民族地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治。新政权在边疆地区的统治一旦站稳脚，就必然要削弱少数民族的自主权。

除了这些“制度性因素”外，无论是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还是民族地区地方实权领导王震、张国华、李井泉、阎红彦等人都是缺乏现代政治素养的传统农民领袖。一方面，因受自身文化水平限制，他们对少数民族宗教与文化有很大偏见；另一方面，这些地方领导不愿意当地少数民族精英分享自己的权力，他们只有不断排压少数民族精英，彻底瓦解少数民族的社会、宗教基础，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往往执行比中央更左的政策，来增加自己的权力。

1957年，在内地开展“反右”的同时，中央开始部署在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开展“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共早期的少数民族党员，如平措汪杰、

刘格平、扎喜旺徐、马思义等被打倒，民族干部，例如新疆有 1612 人被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占新疆民族干部人数的 3% 以上^[1]。这场运动后，“民族自治”成为少数民族干部的话语禁区。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开明的汉族领导，如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的范明、慕生忠被打成“反党集团”，青海省长孙作宾也被划为“极右分子”。

此后，积极执行落实民族自治政策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也被毛泽东点名批评。毛泽东在 1962 年北戴河会议上斥责“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2]。此后，李维汉遭受 40 余次批判，中共中央于 1964 年作出《关于李维汉同志问题的报告》，称李维汉长期在统一战线、民族、宗教工作方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向资产阶级和封建农奴主投降。李维汉被撤销中央统战部长、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中央统战部也基本停止了工作。

“文革”中，大汉族主义随着极“左”路线发挥到极致（极“左”政治往往在民族问题上，与极“右”想通，演变成种族主义，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越南武力排华）；反帝反修，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的忠诚度受到怀疑，成为防范限制对象；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为落后、愚昧的象征，沦为被革命的靶子。民族自治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1、制造大量迫害少数民族干部的冤案，如内蒙古的“内人党案”，吉林延边“叛国暴乱案”，西藏的“七星党案”，新疆“帕米尔前进联盟案”、“努尔尤夫叛国集团案”、“阿勒泰地方民族主义集团案”等。其中“内人党案”迫害致死者 16222 人^[3]。

2、民族自治机关领导“去民族化”。到 1977 年，全国 5 个自治区的全部，29 个自治州中的 17 个，69 个自治县（旗）中的 32 个，行政机关一把手都改由汉族担任^[4]。

3、废除民族自治权利。1975 年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取消了 1954 年宪法所规定的所有少数民族自治权，当届少数民族人大代表比例仅占 9.4%，为历届最低。

4、随意撤销民族自治国家机构和地方区划。1969 年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被取消。1969 年内蒙自治区被肢解，多数辖地被分割到相邻的省份，保留在内蒙古的仅剩 4 盟 2 市；云南省革委会擅自取消四个民族自治州，在周恩来多次过问下，1973 年才被恢复^[5]。

5、刻意破坏少数民族宗教与文化。几乎所有宗教活动都被禁止，大量清真寺、佛寺被毁，甚至强迫少数民族改变习俗。到 1976 年，西藏开放寺庙只剩下 8 座，僧尼仅 800 多人；云南玉溪、师宗一些单位取消清真食堂，强迫回族职工吃猪肉^[6]；1966 年宁夏掀起拆除清真寺运动，海原县用四天就拆除 67 座清真寺；回民不吃猪肉被认为是“四旧”，青海省强行规定回民每户每年上交两头猪，连清真寺的阿訇也有交购指标；红卫兵甚至发起“灭回运动”在北京散发《行动起来，消灭伊斯兰教！》的传单，之后被周恩来、陈毅所制止^[7]；少数民族

[1]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49-1966），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一版，162 页。

[2] 《党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第 22 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1980 年 11 月 21 日。

[4] 中组部调配局、统战部二局等编：《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 年第一版，355 页。

[5] 云南省民委编：《云南民族工作大事记》（1949-2007），2008 年，第 123 页。

[6] 同上，第 110 页。

[7] 丁抒：《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栏目，

语言文字也不被提倡，如文革前少数民族文字教材有 787 种，到 1970 年仅剩 75 种。^[8]

极“左”政治极大伤害了少数民族的自尊心和对中国的好感，并引起社会动荡。比较大的事件有：1958 年，青海甘肃藏民暴动，参与者多达 16 万人以上；1958 年临夏回民暴动，波及青甘 32 个县，最终甘肃出动 33 个团的兵力，并空军配合才平息下去^[9]，平叛中回民死亡达 1074 人（一说 3268 人）^[10]；1962 年，新疆塔城、阿勒泰两万多边民集体越境逃往苏联；1972 年，宁夏固原、隆德、西吉等地区回民暴动；1974 年至 1975 年云南沙甸事件，导致 1600 多人死亡。

毛泽东去世后，极“左”政治也走到尽头，中国转向有限自由的“威权”政治，实行有限度的“民族自治”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从“人治”角度考虑，新一代领导人中，无论是总书记胡耀邦，还是主管民族工作的习仲勋等，都是被称为“共产党人良心”的政治家，他们认为应该兑现建国之初给予的“民族自治”许诺。在民族工作拨乱反正、平反冤案的同时，一场如何给予民族地方自主权的探索也开始了。

二，历史上最开明的民族工作领导班子

八十年代民族政策走向宽松，诚然与反思过去、改革求新的时代背景背景有关，更得益于主管民族工作的上下领导都比较开明，这一点在“人治”的政治文化中尤为重要。当时的主持一线工作的总书记胡耀邦，分管民族工作的习仲勋都是中共历史上的有名的开明领袖，先后担任统战部长的乌兰夫、杨静仁是少数民族人士，统战系统其他领导如阎明复、李贵、伍精华、江平也都是民族自治积极推动者。这种特殊豪华的领导阵容，是 90 多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中共历任一把手中，胡耀邦是对少数民族最关心的一位。胡耀邦就任总书记后，召开的第一次书记处会议是西藏工作座谈会，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第一次外出视察是去西藏。他担任最高领导人的六个春节，其中四个春节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的，分别是：1983 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1984 年与广西壮族群众共度除夕，1985 年是去云南看望彝族同胞，1986 年是与贵州布依族群众庆祝新年。

在任期间，全国 30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胡耀邦到过 28 个（青海玉树、果洛除外）。他先后视察内蒙古、广西 5 次，甘肃 4 次，新疆、云南、青海、贵州 3 次。中央领导人去少数民族地区视察，一般都是两三天，多则四五天。而胡耀邦一般要去十来天，他希望深入基层，倾听少数民族群众声音，温家宝那篇感人的《再回兴义忆耀邦》就是记述了他到贵州布依族村寨调研的事迹。1980 年他去西藏调研，尽管高原反应发高烧还是坚持了 9 天，1985 年去新疆调研长达 14 天，1983、1986 年视察青海分别停留了 10 天、12 天。他对民族工作如此用心，也是历任领导人中极为罕见的。

习仲勋从 1981 年起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统战、民族与宗教工作。习仲勋是中共

<http://www.mjsh.net/Book.aspx?cid=4&tid=1410>

^[8] 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等：《中国民族统计年鉴》（1949-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年，第 356 页。

^[9] 《平定青海及甘肃藏(回)区的叛乱》，王中兴、刘立勤编著：《国防历史》（下），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

^[10]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下册，“政法志”，第 1044—1045 页。

领导人中，民族工作经验最为丰富者之一，他在建国之初担任西北局书记，管辖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他在任上对待少数民族、宗教和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上都执行了温和的路线。

在“镇压反革命”中，毛泽东提出杀人的指标应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习仲勋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说：西北有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应该更加宽大，建议在西北把镇反方针改为“宽大与必要的镇压相结合，”建议杀人指标减为千分之零点五。在镇反第一期江西省杀了 17000 多人，而整个西北局才杀了 500 人。西北局总结道“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泽东对此却批示道：“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11]。

在西北土改中，习仲勋主张要“改的和平些”，提出土改首先要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同意和赞助。他要求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12]。

青海黄南藏族首领项谦，九次发动暴乱，青海省本打算派五个团去镇压，习仲勋制止了军事行动，派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去劝说项谦，还安排项谦当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从此项谦彻底悔悟，不再与党和政府为敌^[13]。原马步芳集团军官马良煽动甘肃、青海回族和藏族群众叛乱，聚集武装千余人，习仲勋派藏族民主人士黄正清去甘南说服了藏族群众，成功瓦解了武装叛乱，马良被我军俘获后，习仲勋不仅不杀马良，反而让民委安排他的职务^[14]。

习仲勋成功处置了新疆分局因土改和镇反过火引发的北疆牧区叛乱。从 1950 年起，习仲勋就多次指示新疆分局和王震土改要有序推进，反大土耳其主义要收缩，镇反不要杀人过火。新疆分局却坚持提前在半牧区和牧区土改，并以新疆情况特殊为由，主张新疆要再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并于 5 月 26 日不经过西北局同意就擅自发布《关于在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15]。新疆局的“左”倾错误，激起北疆牧民多处发生骚乱，事后王震、邓力群被降职调离，中央派习仲勋主持善后事宜。他提出以下措施：对武装叛乱分子，要先最耐心的政治争取，确实无效时再武装进剿；牧区土改要不分、不斗、不划分阶级。习仲勋还主持通过《关于防止和克服大民族主义倾向的决议》，提出汉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要主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16]。在习仲勋领导下，新疆局势迅速安定下来。

在习仲勋影响下，西北局为党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民族工作领导干部，如周仁山、范明、汪锋等，他们曾经担任新疆、西藏领导职务，能够务实、开明处理民族事务。

在这期间，乌兰夫（蒙古族）和杨静仁（回族）也是主管民族工作的重要领导，他们先后担任中央统战部长，是历任战部长中仅有的两位少数民族，体现出胡耀邦等领导人放手让少数民族管理少数民族的开明态度。1983 年，乌兰夫担任国家副主席，杨静仁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们也成新中国历史上担任国家领导职务最高的少数民族干部。

同时，胡耀邦也比较注重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人选，因为中央政策是否能够被执行好，地

[11] 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始末》，江淮文史，2011 年第 3、4 期。

[12] 《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 110-111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第一版。

[13] 何家梁：“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年，第 357-362 页。

[14] 马文瑞：《记习仲勋在西北局工作》，《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年，第 162 页。

[15]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49-1966），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一版，71-72 页。

[16] 同上，第 75 页。

方领导是关键。80年代中央任命自治区书记都比较开明务实，比如，新疆自治区书记王恩茂一贯比较注重民族团结；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周惠曾经在庐山会议上直言反左，与彭德怀一起被打倒，扣上“彭黄张周周反党集团”的帽子；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伍精华能够团结西藏宗教人士，被称为“喇嘛书记”。

三，西藏新政与自治扩权

1979年3月，邓小平回见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时，答应了达赖流亡政府派访问团回西藏看看的请求。1979年5月，第一个访问团抵达西藏，先后访问了拉萨、那曲、林芝、日喀则等地。中央本来希望访问团可以亲眼目睹西藏社会主义改革以来的进步，以此感化达赖，放弃其固有政治立场，然而，所到之处都是藏胞的哭诉，甚至发生了在大昭寺1200名藏族群众包围访问团的事件。这对当时中央产生很大震动，促使民族政策加快调整。因此，自治权扩大政策首先从西藏开始了。

1980年3月14日、15日，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座谈会形成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于4月7日下发全国，即著名的1980年中央31号文件。由此开始了西藏政策调整序幕，《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对“自主权”做了明确阐释，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1、中央各部门各项政策，必须事先了解、研究西藏的实际情况，一切决定和措施，必须首先确实得到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的真心同意和支持，否则就要修改或等待，切忌盲目地、硬性地将内地的和汉族的工作经验。

2、中央涉藏部门制定政策，要事先征求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的意见，并请示报告中央后，才能做出决定。

3、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

4、大力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逐步做到自治区县级以上党政群机关以藏族干部为主体，积极帮助他们把建设西藏的主要责任承担起来。

5、中央在经济、文教、卫生等方面给予西藏特殊的支援，各地方做好援藏工作^[17]。

这5点尤其是第2、3点，允许西藏地方有权否决中央的政策，中央政府制定政策必须先征求西藏地方意见。这无疑是对新中国所确立的地方必须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突破，给予民族自治区实质的自主决策权。

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胡耀邦与万里亲又前往西藏视察。这是胡耀邦就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外出视察，也是西藏归顺中国七百年以来中央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踏上西藏土地。胡耀邦在西藏提出了“放开，免征，走人”六字方针。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02-303页。

胡耀邦在拉萨 5000 人干部大会上，再一次阐述了落实自主权的主张。他说“自治就是自主权”，“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尊重西藏人民的自主权，这是一切问题关键的所在”。他批评一些进藏干部总要“取消人家的自主权”，提出“没有民族的充分自治，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

为了真正让藏族干部发挥自治的作用，胡耀邦提出让多数汉族干部内撤，即“走人”。=当时西藏有 30 万汉族干部、军队，他们为边疆稳固和西藏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老西藏”中长期“左”毒弥漫，逐渐成为妨碍民族团结和西藏发展进步的负面因素。西藏自治区纪检委总结了进藏干部六个问题：第一，违反民族政策，损害民族团结；第二，利用职权安插私人；第三，闹派性，搞小圈子；第四，不负责任，浪费国家和集体财产；第五，作威作福，打骂群众；第六，搞特殊化，到处请客送礼。尤其是第四条，数目庞大进藏干部已经成为西藏人民和国家财政都是沉重负担。胡耀邦说当年陕甘宁边区有 220 万人口，供养 5 万干部军队，如今西藏仅有 180 万人，却要负担 30 万干部军队。建国后，国家还向西藏提供了 45.3 亿补贴，其中多数用于供养驻藏干部，并没有对西藏发展产生作用，胡耀邦愤怒地说，这些 9 亿人民的血汗钱“都被扔到雅鲁藏布江里了”。

针对西藏落后的经济面貌，胡耀邦提出了“放开”、“免征”思想。文革时，西藏的经济割资本主义尾巴，手工业、商业被禁止，牧区也被鼓励生产粮食，人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他说，“要在经济问题上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提出农业要包产到户，发展手工业、工业，并对印度、尼泊尔开放贸易。胡耀邦鼓励说“犯了资本主义，不要你们检讨，我们检讨。”（万里副总理插话说：“最好你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西藏。”）胡耀邦还提出“要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要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短期之内免去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取消一切形式的摊派任务。这比内地取消公粮、农业税提前了二十多年^[18]。

西藏工作座谈会及胡耀邦视察西藏，揭开了西藏的历史的新篇章，也揭开了中共民族政策调整的序幕。胡锦涛曾经对此有客观评价：“大家都说，从全国来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西藏来讲是 1980 年以来，在西藏历史上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19]。胡锦涛曾经主政西藏四年，他的评价不是官样辞令，应该是从自己实际经历感受到的。

四，新疆等地自主扩权的进一步探索

《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问题不仅单独对待西藏，中共中央在指出：“本通知的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全国其他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州、县”，并要求“各有关地方党委根据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检查一次自己的领导工作和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并且拟定今后改善党的领导、落实民族政策、做好各项工作的措施。”胡耀邦在西藏视察结束后，返京途中路过青海格尔木，在接见青海省领导时，他说中央对西藏的政策，也同样适用于青海。因此，31 号文件是针对全国民族问题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文件发布以后，其他民族自治区，以及自治州、自治县，普遍召开会议学习 31 号文件，并结

[18] 本节胡耀邦讲话引自盛平编著：《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第 页。

[19] 《西藏党史资料》1990 年第 3 集，1990 年 4 月 13 日胡锦涛同志在《当代中国的西藏》审稿会上的讲话。

合本地实际进行了历史检讨与政策调整。

西藏座谈会后，中央又分别召开了新疆、云南和内蒙古座谈会，分别讨论各个地方的少数民族问题即：1980年7月至1981年10月，中央先后5次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1981年2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召开云南工作座谈会；1981年7月16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内蒙古工作座谈会。

针对新疆自治权问题，中央提出更明确和更宽松的主张。1980年7月10日、14日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形成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即1980年46号文件）。关于自治权问题，纪要提出了除了外交、国防和必要问题上的否决权归中央外，其他权可以归自治区的构想^[20]。同时针对干部问题，纪要提倡汉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当参谋当助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担任公社以下党政领导的汉族干部，除了当地群众真诚挽留的之外，都可以逐步调出来；州委以下主要领导，由少数民族担任，汉族干部当顾问。纪要也指出，这不是最后决定，要经过充分研究，并提请中央政治局考虑后决定。^[21]

此次座谈会的主张得到很多领导人的支持。乌兰夫说，西藏工作会议和此次新疆工作会议所“形成的两个文件是我党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而提出的重要的决策，新疆工作会议的决定公布后必将像《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那样，受到热烈的欢迎”。1980年6月，邓颖超从国外访问回国，途经乌鲁木齐时也明确表示支持汪锋在新疆所采取的自主权扩大政策，她认为，1949年和建国初期进疆的汉族干部已经完成了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建设边疆的任务，现在可以撤回内地了^[22]。

但是，新疆内外形势远比西藏复杂，在执行扩大自主权中遭受了很多挫折。新疆的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远优于西藏，进疆的干部、农垦战士都已经扎根新疆，不愿离开，他们与部分中央领导相呼应，反对缓和与让步。

新疆工作座谈会后，1980年8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了区、州（地、市）、县三级干部大会，传达纪要精神，讨论汉族干部内撤，然而遭到汉族干部的强烈抵制。此后，王震四次去新疆视察，并且发表较为严厉的主张：“现在一说到专政，就有人怕扩大化。我们当然要注意不要重犯扩大化的错误，但对唯恐天下不乱的打砸抢分子，对妄图破坏祖国统一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要坚决实行专政。”^[23]1981年，王震还邀请邓小平去新疆度假，邓小平当年8月视察了新疆，过程中王震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治疆看法。受此影响，中央书记处的第四次、第五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放弃了内撤汉族干部和给予更多自主权的主张，改而强调“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也搞不好”，即“两个离不开”，汪锋也被免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改由王恩茂接替。

^[20] 据平措汪杰、何方等人回忆，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治条例起草小组来人大民委反映问题》，《第一届至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文件资料汇编》（中），中国民族法制出版社，2003年。

^[21] 朱培民、段良著《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6页。

^[22] 转引自 哈日巴拉：《80年代初期中共民族政策的转变：原因、过程及其结果》，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旅美历史学会《中国历史评论》2008年第10期。

^[23] 李慎明（曾任王震秘书）：《皓首杖策走天山——忆敬爱的王震同志晚年关心新疆往事》，百年潮，2009年第9期。

五，大力选拔少数民族干部

“民族化”是八十年代民族政策调整的另一个中心工作。“民族化”是指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即自治机关的人员组成和政务处理应由自治民族作为主体来完成。八十年代民族政策调整中，民族化与自治权被认为是落实少数民族自治的两个关键步骤。

1957年反地方民族主义后，少数民族干部选拔也陷于停滞。云南有的民族自治州20多年不曾选拔一名民族干部。1978年全国民族干部数量比文革前还减少了2万。即使是现有的民族干部，也不被重用，乌兰夫曾经说“少数民族干部往往是任正职的少，当领导干部的少，在重要部门工作的少，在党的机关工作的少，当了领导干部而真正有权的少”^[24]。

早在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就已经开始推动民族自治地区干部的“民族化”。1978年6、7月间，中组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召开了少数民族干部问题座谈会，会后形成了《中组部关于少数民族干部工作侧几点意见》，提出民族自治机关第一把手要由少数民族担任，少数民族应该“用自己的腿走自己的路”^[25]。

1980年的31号文件作出了“大力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帮助他们把建设西藏的主要责任承担起来”，“逐步做到自治区县级以上党政群机关以藏族干部为主体”的规定。1981年7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的《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明确规定了此后少数民族干部应该达到的比例，即：“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权机构中，民族干部所占的比例应与当地人口中民族人口所占比例相称”^[26]，这成为此后民族干部配比的基本原则。

在1980年31号文件推动下，1980年至1983年西藏共内调汉族干部20045人，1986年又内调汉族干部工人约17000人^[27]。同时，大量提拔藏族干部，到1984年底，全自治区民族干部已占总数的60%。其中，区领导官员30人，民族干部24人；地厅级官员691人，民族干部539人；县处级官员889人，其中民族干部668人，比例均达到80%左右^[28]。新疆民族干部比例也大幅上升。1978年，新疆少数民族占65%左右，但是，少数民族干部有11.7万，仅占新疆党政干部的28.9%，到1986年少数民族干部人数上升到21.1万，占比上升到44.4%^[29]。

不仅民族干部数量和比例问题受到重视，胡耀邦等领导还认识到要改变少数民族干部无职无权，仅仅作为权力“花瓶”的状态。提出要真正使民族干部“有职有权有责”，“充分发挥骨干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推动少数民族干部担任自治地方党委书记。

众所周知，党委最重要决策机构，重要决策和人事安排都是先由党委决策通过，再由国家机关执行。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党委主要领导无疑是保障他们真正享有自治决策权。1978年

^[24] 《乌兰夫文选》，第3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25] 中组部调配局、统战部二局等编：《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355页。

^[26] 中组部调配局、统战部二局等编：《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364页。

^[27] 《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438-439页。

^[28]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300页。

^[29] 国家民委网站：民族工作大事记（1986年）http://www.seac.gov.cn/art/2011/5/13/art_134_122134.html

的《中组部关于少数民族干部工作侧几点意见》就提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党委）第一书记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的《通知》中又再次提出“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党委常委和委员中，也要增加民族干部，在三、五年内做到由民族同志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这个规定如能落实，无疑更能让少数民族感受到中央对他们的信任，增强他们对执政党的认同感，很可惜这项政策不仅没能落实，到90年代后再也不被提起了。

六，以立法保障民族自治权

鉴于“反地方民族主义”和“文革”等左倾错误的教训，胡耀邦等领导人强烈感受到没有完善健全法制的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很难落实的。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民族自治的经验教训时也指出“必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在这个精神指导下，中共开始构建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的民族自治法制体系。

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自治机关的自治权从1954年宪法规定的4项扩大为6项，1954年的宪法对各项自治权的表述都语焉不详，这次明确界定了其内涵，使得行使民族自治权利有了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

1983年2月，中共中央又成立《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分别是乌兰夫、杨静仁、李贵（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伍精华（国家民委常务副主任）和云北峰（全国人大民委秘书长）。其中，乌兰夫、杨静仁、伍精华和云北峰为少数民族人士，李贵也是民族工作的“开明派”，足见当时中央是希望制定一部能够真正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

当时制订《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有不少认识和利益上的阻力，为保障顺利立法和实施，胡耀邦和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一直指导整个起草过程，重大问题都是由他们主持敲定的。伍精华曾经回忆说，没有胡耀邦和彭真的支持，《民族区域自治法》能够被成功制定是不可想象的^[30]。

1984年的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民族区域自治法》获得通过。这部法律有诸多特别之处：第一，它是除《宪法》的之外，唯一一部由党内成立领导小组来制定的法律；第二，它是除《宪法》以外，第一部有序言的法律；第三，它是唯一一部在本法上规定和公开申明自己法律地位的基本法。以至于彭真说《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

八二《宪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还提出少数民族有权制定自治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需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自治条例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被赋予了类似美国州宪法的意义，意在从法律上界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范围，保障地方自治权。如果能落实，这也是我国国家结构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0] 伍精华：《参与制订〈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回忆与思考》，（未刊行）。

1984年到1989年全国多数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县都制订了自治条例。五个民族自治区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指导下，都认真起草了自治条例，其中，内蒙古自治条例前后易稿达17次。然而，1989年政治风波后，自治条例也被长期搁置。当时各自治区起草的自治条例都规定了自治权限和人事问题，还提出了地方如何享有矿产资源管理支配权，央企与地方利益如何分配的建议——这两个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新疆等地少数民族不满情绪的最敏感根源之一，也是少数民族分裂分子攻击中央掠夺资源的口实。通过《自治条例》规定合理的利益分割原则，不失为法理上作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七，少数民族宗教政策

在民族问题中，宗教往往与民族是分不开的。藏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都是全民信教的民族，佛教在蒙古族、壮族、傣族等也有很深的影响。能否处理好少数民族信教的问题，关乎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建国后，以“唯物主义”、“无神论”为信仰的中国共产党曾经试图改造和消灭宗教，造成文化和政治的双重悲剧。

1982年在胡耀邦的主持领导下，中共中央制定并通过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1982年19号中央文件），确立了以宗教信仰自由为核心的党的宗教政策：

1.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并且是一项长期政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唯一正确的宗教政策。

2. 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实质，就是要使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国家政权当然绝不能被用来推行某种宗教，也绝不能被用来禁止某种宗教。

3. 认清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长期性的事实，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

4.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都由宗教组织和宗教信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

5. 恢复、建设寺庙教堂，保障信教群众的需要。认真落实有关各种宗教的房产和房租收入的政策规定，保障宗教场所可以自办自养。教徒的捐献和布施，不必加以干涉。

6. 党和政府的干部应当善于支持和帮助宗教组织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要包办代替。党政干部要密切地联系信教群众，同宗教界人士平等协商、合作共事。

7. 为了保证宗教活动的进一步正常化，国家今后还将按照法律程序，经过同宗教界代表人士充分协商，制定切实可行的宗教法规。

8. 依法严厉打击宗教违法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但是要事实确凿，并注意划清正常宗教活动同违法犯罪活动的界限。

19号文件是中共历史上对宗教问题最系统、最经典的论述，它不仅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还提出了各种保障宗教自由的措施，使其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宣传口号。19号文件还着力分析了在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好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在19号文件的指导下，民族自治区普遍开始了宗教政策反“左”和拨乱反正的政策。

为了保障群众满足群众的宗教活动需要，中央在1985年、1987年又专门下文要求各机关清退占用的寺产。西藏自治区统战部规定，文革中散失的寺庙文物，不管任何单位、任何个人，“包括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单位和个人，都应该贯彻中央‘开仓认领’的精神，彻底予以清退，不得以任何借口留存”^[31]。解放军驻拉萨部队退还了林仓寺、乃琼寺和热振寺^[32]。到1988年西藏政府机关退还各种原物37704件，铜佛法器37万多公斤，林卡72个土地，房屋779间，落实赎买金492万余元，寺庙财物折款85万余元^[33]。新疆也要求“应恢复的被拆清真寺，哪个单位拆除，哪个单位有责任资助修复，对落实好的要表扬，对落实差的要批评，对顶着不办的要严肃处理”^[34]。经过努力，西藏宗教活动场所由64座增加到928座，僧尼也由1288人增加到14320人^[35]。新疆的清真寺数量也由文革结束时的1400座，恢复1985年的到15500座^[36]。

当时，西藏自治区一些领导，受传统“左”的思路影响，对宗教还抱有很强的戒心。胡耀邦在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上对西藏自治区领导讲：“有的同志担心太多了一点，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担心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担心宗教的影响会不会愈来愈大，担心有朝一日会不会重新出现大叛乱。对这些问题，如果想得太多，考虑太多，而对于其他问题，又想得不那么够，首先把自己思想束缚住了，反倒问题不可能真正解决。”^[37]

习仲勋也多次批评统战系统干部对宗教工作管的过紧，但有过多。他说，有的同志“习惯于以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宗教问题，“把执行党的宗教政策认为是‘宣传唯心主义’，‘助长宗教发展’”，“回顾历史，无数的事实证明，对待宗教问题，我们的政策越是搞得很紧很死，在实际生活中越是压制它，其结果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不仅不能引导它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反而会使它的活动脱离正常轨道，甚至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38]。

八，落实民族自治权政策的终结

1987年，胡耀邦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迫辞职。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民族工作主要领导习仲勋、阎明复、伍精华等也皆被免职或淡出政治舞台，以自治权扩大为核心民族政策随之终结。中央开始强调打击民族分裂势力是首要任务，新一代的民族政策改变了影

^[31]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334页。

^[32] 布琼：《三中全会以来党在西藏的宗教政策》，《西藏研究》，1989年第1期。

^[33] 吴云岑：《西藏寺庙经济的历史、现状及对策》，《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22卷第2期，2001年6月。

^[3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局：《新疆伊斯兰教方面落实政策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1985年7月19日），郭泰山等编《新疆宗教问题政策文献选编》（内部刊印），第265页。

^[35] 潘建生：《中国共产党西藏宗教工作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

^[3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局：《新疆伊斯兰教方面落实政策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1985年7月19日），郭泰山等编《新疆宗教问题政策文献选编》（内部刊印），第278页。

^[37] 陈维仁（曾任胡耀邦秘书，中央党校副校长）：《从“西藏考察”到“西藏工作座谈会”》，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编著《怀念耀邦》（未刊行）。

^[38] 《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7—348页。

响民族团结的因素主要是“左”倾错误和大汉族主义的判断，认为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分裂势力是威胁民族自治地方稳定的因素，政策着力点由扩大自主权、落实民族自治，变为打击、防范民族分裂势力。

1989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新的《讨论西藏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纪要可视作是对1980年31号文件给予民族自主权政策的完全颠覆。纪要提出西藏的两大任务是政治稳定和发展经济，政治稳定成为首要任务，而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是与达赖集团和分裂势力作斗争，纪要还特意指出“不能把骚乱简单地看成是长期‘左’的结果”，工作的左倾失误，已经基本纠正，落实政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39]。这显然是与80年代防“左”的态度相悖的。

同年7月、8月，江泽民分别视察了西藏、新疆。江泽民在西藏提出，深入开展分裂斗争是西藏各级党组织首要任务，并且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40]江泽民在新疆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还指出，敌对势力分裂新疆的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也是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他还号召“应经常分析形势，及时掌握情况，一发现搞分裂活动的苗头，就要坚决果断地加以解决”，“各民族的干部要教育和带领包括本民族在内的群众，投入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41]。

1996年3月19日，江泽民主持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会议纪要》（1996年7号文件），纪要认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要“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和各种严重犯罪分子”，并提出了维护新疆稳定的十个措施，包括干部纪律、宗教、教育等方面。会议前后主管新疆的事务的核心机关也由中央统战部，变为掌管国家暴力机关的中央政法委，显示出治理新疆主要举措不再是团结少数民族干部和宗教人士，而是依靠公安和武警部门的暴力震慑。

在与民族工作息息相关的宗教领域，政策重心亦由保障宗教自由，变为防范、打击宗教渗透。

1990年12月5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会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1991年6号文件）。与1982年19号文件相比，1991年的6号文件偏重对宗教政策收紧。例如：文件中对限制宗教界活动的“不得”就用了11个，“不允许”用了2个，“取缔”用了2个，“打击”用了3个、“反对”用了3个，“抵制”用了3个，合计禁止性用语达24个。同时，还授予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对宗教团体全面巨大绝对的行政管理权，包括“重大涉外活动，需报国务院审批”，“开放新的宗教活动场所，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等等^[42]。

在西藏，针对喇嘛教推行一系列管控制度，如“干部和军队驻寺”，“寺庙六建”（建管理机构、建党组织、建领导班子、建干部队伍、建工作职能、建长效机制），僧尼爱国普法教育等。新疆自治区党委也规定：“全区的宗教活动场所已完全可以满足信教群众正常宗教

^[39]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4页。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17页。

^[41] 《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宗教观》（江泽民在新疆考察时的讲话第四部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二版，第183页。

^[42] 徐玉成《宗教界十分期盼宗教法治化》，共识网

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gzl/20150217121219.html

活动的需要。确实需要新建的需按规定严格报批手续”^[43]；同时规定，国家干部、18岁以下未成年人（这意味着新疆少数民族的三分之一人口）不能正常参加公共宗教活动，突破了19号文件仅仅要求少数民族党员不信教的原则。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之交，面临内外严峻的政权安全威胁，进行暂时的政策收缩是必要的。但是，1992年后，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国际环境也发生根本变化，继续在民族、宗教政策上实行以防范和打击为策略的政策，不但无助于民族矛盾的解决，民族分裂和极端宗教势力还愈演愈烈。

九、邓力群、乌有之乡的谣言及背景分析

近年来，新疆、西藏等地的民族关系愈来愈紧张，引发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受邓力群《十二个春秋》影响，乌有之乡、司马南、孔庆东、张宏良为代表一些网络势力，以及党内一些高级干部，都把西藏、新疆动乱的根源归咎于胡耀邦。主要典型代表观点有：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邓力群）

胡耀邦的“两少一宽”政策是昆明暴力恐怖的根源（司马南）

胡耀邦时期开始形成的国家分裂势力，特别是其中的藏独和疆独分裂势力，完全是由胡耀邦的政治错误栽培出来的。（张宏良）

某大领导1980年到西藏，把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为近年的动荡埋下了隐患。（孔庆东）

当然新疆、西藏地区后来藏独、东突暴乱之事态的发展有各种因素的影响，不能完全归咎于胡耀邦同志的讲话，然而他的讲话，也确实为藏独、东突这二股反动势力的猖獗开了口子。（朱永嘉）

新疆的恐怖主义完全是胡耀邦宗教政策失误造成的。新疆伊斯兰教清真寺有2.43万座，平均500多人拥有一座清真寺，而中东平均1200人，伊朗约1.1万人，埃及约为2500人。新疆清真寺的数量是学校的5.8倍。新疆有2371个行政村，平均每个村拥有4座清真寺。（乌有之乡文章）

胡耀邦是中华民族的贻害无穷的人物，他奉行祸国殃民亲西方政策、奉行多元化政策、奉行宗教少民政策、奉行无原则只知私利政策，这些就是根子。（乌有之乡文章）

改革开放初期对宗教问题复杂性一度认识不足，放松了管理。80年代清真寺从1400座猛增至2.4万座；未加甄别地对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分裂分子予以平反，其中一些人重新成

^[4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关于贯彻中央7号文件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1996年5月6日）

为“三股势力”核心人物和精神领袖；一些地方发生宗教狂热现象，“地下讲经点”、出版非法宗教读物等活动趋于活跃。宗教领域不正常现象给极端宗教势力提供了温床。（朱维群）

这些言论多是无中生有或故意扭曲之词。比如，“两少一宽”本来是 1983 年为了防止“严打”在少数民族地区扩大化，提出针对因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而犯罪（如走婚，藏族男子佩刀）的要“少捕少杀从宽处理”。然而，90 年代以后，地方公安机关处理少数民族犯罪往往采取息事宁人态度，将“两少一宽”也适用于普通刑事犯罪。“两少一宽”有问题，但不在胡耀邦，是后人歪曲了当初制订者的初衷。

再比如新疆清真寺问题。其数据比较本来就有问题，不可能高度政教合一的伊朗、中东清真寺比新疆少。即便是新疆清真寺增加了，但是也绝对不是宗教恐怖势力产生的原因。恰好是因为 90 年代以后限制清真寺发展，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清真寺进行正常宗教活动，导致地下讲经点泛滥，为极端宗教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这些谣言被广泛流传，现在已经误导大批干部、民众，并且这些具有严重种族主义的言论不被禁止，还得到某些官方人物的认可。背后折射出两个危险的因素：

第一，某些统战、政法系统的主管领导因工作失误，导致民族问题愈演愈烈，他们为了推卸责任，把民族动乱的根源归咎于胡耀邦等人身上。如果任其所为，不但无助于政策调整，反而助涨高压喷气。正如原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平措汪杰所言，现在有一群“吃反分裂饭”的人，他们正如习仲勋所说指的“不少同志在执行宗教政策上缺乏全局观念和政策观点，往往不自觉地只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利害得失来考虑和处理问题”^[44]，因为民族宽容、缓和的政策会危及他们利益，他们因此要抹黑扭曲 80 年代的民族政策。

第二，大汉族主义，文化法西斯主义，在干部群众中仍然很有市场。国家如果不去有意识去纠正，传播符合现代价值的民族、宗教观念。未来产生民族间的流血冲突、宗教迫害，都有发生的可能性。

十，胡耀邦一代领导人民族思想的遗产

进入 90 年代以来，中央为解决民族问题，做出了很多的努力，经济上做出了很大的投入，但是民族分裂活动不减反增。胡耀邦、习仲勋、乌兰夫等领导人八十年代的思想，对于解决当前民族问题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第一，尊重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1980 年中央 31 号文件告诫进藏干部：“如果以‘恩人’和当然的‘领导者’自居，不努力培养本地干部并帮助他们真正当家作主和正确处理民族关系，那么我们就不能加强民族团结，而且必然要给内外敌人以可乘之机。”今天西藏的媒体不断宣传解放农奴的功绩，自己宣传的多了，必然会让少数民族不舒服，不恰恰又犯了当年的错误吗？胡耀邦还告诫西藏汉族干部“要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尊重藏族人民的历史文化”，“我们的汉族干部如果不尊重人家，甚至想用汉族文化去取代人家的文化，肯定是要碰大钉子的”，“不单单在西藏，同样在其他许多民族地区，尊

^[44] 《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347 页。

重民族文化的观念很可能是非常淡漠的。”为了让汉族干部更主动了解西藏，80年代藏语还成为西藏干部招考、提拔必考科目。

第二，信任少数民族干部和宗教领袖。1982年3月11日，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十世班禅，致信习仲勋并转胡耀邦，希望他能去西藏看看，由于1980年回藏区考察进行佛事活动时发生过意外，他两年多来一直未能再到藏区去。胡耀邦和习仲勋同意了班禅的请求。邓小平还特意把班禅约到家里，亲切地对他说：“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80年代，热地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拉萨有一些对他不利的传言，胡耀邦安慰热地说“你不要被闲言碎语左右，党中央和组织上是了解你的，要大胆工作”^[45]。正是靠这种信任，班禅到西藏非但没有助长宗教狂热，此后有多次到藏区，劝导信教群众，成为中央反对宗教分裂势力的一个重要依靠。

第三，注重民生，反对上“大和洋的项目”。近年来中央极为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但是着眼点往往是GDP增长了多少，上了多少项目，普通民众并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反而经济发展带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加剧了民族矛盾。而胡耀邦在处理民族经济的问题时，力主经济发展一定要落实在普通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上。胡耀邦在西藏视察时，批评西藏自治区领导“都是搞大和洋”，但是“藏族同志连木头碗也没有，酥油桶也没有，连毛纺厂毡毯呢都没有”，说他们是“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警告新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堂不要把中央的拨款用来“修大飞机场，修大公路，修大水电站”。1985年他视察新疆时，把大多数时间用于到南疆农村了解民情，他忧心忡忡对地方领导说，你们这里的老百姓生活比内地差很多，很多人现在还赤脚走路，又告诫随行新疆领导，你们的政策要照顾大多数人，一定要站在95%的农牧民和兵团职工一边^[46]。

第四，敢于承认工作不足，敢于自我批评，而不是把民族问题都归咎于“宗教势力”和“分裂势力”。胡耀邦在拉萨，面对5000多名藏汉干部，很坦白讲：我们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西藏人民的生活没有多大提高，部分地方有些提高，但有些地方还下降了。我们中央同志的心情很难受，感觉到我们党对不起西藏人民！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中央负责任^[47]。中央在云南工作座谈会上再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检讨了长期犯下的“左”倾错误：忽视甚至否认各少数民族的特点，不认真执行甚至歪曲、抵制党的民族政策；长期坚持“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混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的界限；把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地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盲目地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实行“一步登天”，挫伤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在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中，无视各个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的差别，不顾各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强行一刀切，损害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切身利益等^[48]。这样的声音，在80年代以后很少听见了。承认自己的失误，不但不会招致抨击和嘲笑，只能赢得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更多尊重和信任。

民族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花钱买不来平安，更多应该是让少数民族感到汉族对他们的尊重，信任，让他们感到在中国大家庭中的安全感和荣誉感。1980年班禅大师在友谊医院听闻胡耀邦在西藏的讲话后，激动地从病床上推被而起，兴奋地说：“有这样好的政策，

^[45] 热地：《可敬的师长》，《人民日报》1989年5月11日。

^[46] 新疆自治区党委编：《耀邦同志在视察新疆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内部资料）。

^[47] 本节胡耀邦关于西藏的讲话均引自盛平编著：《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第页。

^[48]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就是用棍子赶我们，我们西藏人也不会走的。”^[49]达赖在 2005 年也曾表示：“如果胡耀邦当时继续掌权，西藏问题早就解决了。”^[50]且不论达赖的立场用意如何，他们的观点都说明，尊重和宽容对处理民族问题有多么微妙的威力。建国初六大区书记中，习仲勋为共产党结下一批诤友最多，如班禅大师、喜饶嘉措、黄正清、包尔汉、马鸿宾等（后来达赖与班禅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与西北局、西南局对接领导的态度不无关系），这也是尊重与宽容的魅力，并且越是在政权强大的时候，越应该注重政策的宽容性。

以现在的眼光检视这是 80 年代民族政策，必然有很多不完美之处，也有过时之处。但是这些政策所彰显的信任、尊重、宽容、和谐共处思想，这是留给当下最宝贵的遗产，更是值得探究和发扬的民族思想“正能量”，而不是那些“铁腕治 X”的“英雄故事”。 ■

^[49] 王尧：《我陪耀邦书记进藏侧记》，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编著《怀念耀邦》（未刊行）。

^[50] 美国《世界日报》2005 年 10 月 17 日。

资本观察

中国金融体制的问题与改革

作者：冯兴元、聂日明⁵¹

摘要

我国金融改革有着三大目标：保证金融总量增长与金融服务全覆盖，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防范金融的系统性风险。自 2012 年新一轮金融改革以来，我国尚未较好地实现上述改革目标。究其根本原因亦有三：第一，市场主体不够多元，低效运作的国有股占主导；第二，经营不自由，金融抑制严重，监管与控制过度；第三，利率等价格体系被扭曲，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些弊端的后果是中国低效的国有企业负债率畸高，不仅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更全面抬升了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也致使中国实体经济不振、资产泡沫和影子银行盛行。

有鉴于此，我国需要厉行金融改革：应全面放开金融市场准入，推进金融机构股权多元化改革；放松对金融业的过度管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维护互联网金融的开放、互联、包容与竞争，同时切实推行反欺诈；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完善征信体系。而且作为配套措施，我国应该推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引言

一国经济从欠发达走向发达，需要一个功能齐全、运行良好的发达金融体系的支持。欠发达地区的金融体系一般处于金融抑制的状态，要摆脱这一状态，就需要历经金融深化的过程⁵²（Shaw, 1973）。

2012 年 9 月，我国政府发布了《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⁵³，启动了我国的新一轮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进程，金融市场化进程由此开始加速。整个金融改革涉及设立存款保险制度，推行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允许民营资本设立银行，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等内

⁵¹冯兴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小银行研究基地副秘书长；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⁵²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径和策略，自 McKinnon 和 Shaw 等金融发展理论的早期创导者提出以来，因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和 90 年代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个维度的研究，包括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金融自由化绩效及影响因素，金融自由化次序以及国际金融制度等方面。

⁵³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编制，由国务院批准实施。
http://www.pbc.gov.cn/publish/goutongjiaoliu/524/2012/20120917155836347504341/20120917155836347504341_.html（2015 年 3 月 27 日访问）

容。与此同时，金融与经济运行的形态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超过保险业，其与银行理财和民间金融等构成的影子银行成为金融风险的主要源头之一⁵⁴。多数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金融业属于顺周期的行业，经济增速的放缓和行业经营风险对金融业的资产质量带来较大压力。

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互联网技术在金融中的广泛应用，跨市场、跨业态、跨领域的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尤其是互联网金融的异军崛起，使得银行、保险和证券业的交叉融合和跨市场金融创新常态化，进一步深化了我国的金融混业经营格局。互联网金融和民间金融等非正式金融也部分弥补了现有金融体系的不足，但同时也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金融业务多元化发展的同时，监管机构也需要改革风险应对措施和监管思路转变。

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有着三大目标⁵⁵：确保金融总量增长与金融服务全覆盖，市场化改革，以及风险防范。确保金融总量增长与金融服务全覆盖是金融业的永恒目标，市场化与风险防范是一体两面：毫无疑问，金融市场化是金融改革的核心目标；与此同时适当的风险防范与之如影随形。

有基于此，本文将简要分析若干方面的金融体制问题，包括金融准入，金融机构股权结构，金融监管体制，利率管制，存款保险制度，互联网金融，征信制度问题，以及作为配套改革的国企改革滞后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建议。这里鉴于篇幅问题，将不讨论保险业改革，民间金融问题，也不探究更为彻底的货币金融改革方案，比如引入货币竞争和自由银行业的方案。

一，金融市场准入政策与金融机构股权改革

国有股东在各金融子领域的金融机构中都处于国有控股地位⁵⁶，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国家股东（财政部、汇金及社保基金等）控股重要的银行、证券与保险公司；第二，央企和地方政府控股各类城商行、农商行、信托、证券、基金等。绝大多数正式金融机构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都是国家股东、央企或地方政府⁵⁷。

据 Wind 的数据，截止 2014 年 6 月底，银行业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的 90%。中国五大国有银行，除了交通银行外，财政部（及其控股的汇金）对工农中建的持股比例都接近或超过 60%，占绝对优势，其中对农行的持股比例甚至接近 80%。这五大行的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高达 43%⁵⁸。

除了五大行外，其它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等银行以及券商、基金、信托等，绝大多数为央企和地方政府出资设立，经过多年的股权变更和改革，虽然股份已经趋向多元化，但央企和地方政府牢牢地控制了大部分金融机构。虽然国有成分在金融领域出现了名义上下降（以持股比例衡量）而实际上上升（国有资本通过更低的杠杆撬动了更多的金融资产）。考

⁵⁴ 关于影子银行的定义、分类、风险与监管，详见（殷剑峰，2013）、（阎庆民，2014）。

⁵⁵ 根据《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梳理、提取。

⁵⁶ 关于重要金融机构的设立与股权变更历史，参见（李利明，2007）

⁵⁷ 根据各金融机构 2013 年报或 2014 年中报披露的股权结构计算得出，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中未列出各类重要的金融机构详细的股权结构，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⁵⁸ 据 Wind 资讯整理的工农中建交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计算。

虑到国资在金融业的控股角色，超过 160 万亿元的金融业总资产都可以认定为国有资产（陆磊，2012）。

国有主导及单一的股权结构是目前金融市场绝大多数问题的根源——这些问题包括贷款政治化、利率无法市场化、市场竞争程度不够、公司治理结构无法改善、经营效率低下等。在银行、证券、保险业，国有主导的市场格局和监管机构对与金融机构风险相联系的自身责任的担忧，也使得监管机构对民营资本申请设立金融机构的态度极端保守，直到政府高层直接出面协调，银监会才开始受理民营银行的申请⁵⁹。

随着金融深化，各类型金融的融合度加强，工农中建四大行逐步转向综合经营，在存贷款、支付结算、信用卡、银行间市场的债券承销、基金托管等子领域，每家市场份额都超过 10%（谢平，2013），在贷款业务上更包揽了大建设项目、大型国企的融资计划。同时它们控股保险公司、基金公司或金融租赁公司，在香港等境外设立全牌照金融机构，全部成为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

国有股特有的权责不对称，使得中国的金融领域系统性出现了花别人的钱不心疼和听领导的话办事的现象。在经济不景气时，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其行为的一致性，使得金融市场无法对冲风险，加速了中国金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此外，我国政府于 2014 年批准试点设立五家民营银行，包括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上海华瑞银行以及浙江网商银行。这是新一轮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但是这种高度集权式的审批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金融发展的需要，而且仅仅试点设立五家，试点数量极少，试点范围太小，试点速度过慢，实际上成为真正开放试错型金融改革的障碍。

鉴于上述分析，金融市场改革首重金融主体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开放市场准入和金融机构主体股份结构的多元化，尤其是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要使得政府退出国有控股地位。具体可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全面放开金融业的准入，以核准制形式允许民营资本申请设立民营银行，信托、券商、基金、保险以及其它类型金融机构，允许长期在正式金融体系外生存的民间金融申请设立正式金融机构。全面放开民营资本控股大中型银行和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中国金融系统需要数量较多、规模大小不一的、接受适度监管的各类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数量结构应该是在保护私人产权和开放竞争基础上金融多元化的结果。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能让他们事先计划或者确定各种规模的、各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的最优数量。此外，可以根据金融机构是否奉行区域运作原则来进行分级核准民营金融机构的准入：奉行跨区域运作原则者，由全国性金融监管机构核准，奉行区域运行原则者，由省一级金融监管机构核准，并在全国性金融监管机构备案。

第二，推行银行、保险等行业的国有股权结构多元化，国有股甚至应该退出相对控股地位。首先，现有国家绝对控股的四大行及保险公司等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应把国有股稀释至相对控股，甚至不相对控股。整个国有股权的全部或者部分退出，部分可以通过金融市

⁵⁹ 除了原有的信用社改制和致力于小微金融的村镇银行以外，自 2005 年在天津成立渤海银行以后（得益于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时任天津市市长戴相龙的努力），中国再无新的商业银行成立。

场股权转让来进行，也可试点国有股份全民化来进行，比如采取按人头发放民营化券⁶⁰。不鼓励让国有股权的转让收益、留存国有股权的分红和收益权进入全国社保基金的专门账户以充实社保基金。这是因为社保基金应该根据自己的应遵循原则来取得资金，而不应该先采取搞糊涂账，然后用属于全国人民的金融市场资金来填补空缺。其次，应放开准入，鼓励、引导民营资本参与央企与各级政府控股国有金融机构的改制，择机承接减持的国有股。

第三，抑制四大国有银行及少数特大型国有和国有控股的金融控股公司的行业垄断行为，按照第二条同样的方式推行股权结构多元化和民营化。在其股权结构多元化，尤其是在退出控股地位之前，可限制它们主要业务的市场份额（存贷款、支付结算、托管、债券承销等），要求每家不得超过 10%⁶¹，或者合计不超过 40%。

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管制与限制过多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特征⁶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管制过多；二是监管机构对投融资机构和中介机构限制过多。监管当局过多地直接参与了资源配置的过程（尤其是证券业），行政管制代替了市场微观经营主体的决策过程。

我国的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管制有三类：第一，机构管理，包括市场准入、分支机构设立、人事任命核准与终止⁶³等；第二，业务监管，金融产品的各个维度，包括价格、销售与服务对象、治理机制等；第三，经营监测，以合规和风险防范为基础的各类基于指标的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我国的管制措施细致到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人事任免、金融产品研发等均要监管机构的审批（或核准、备案）。

这些管制措施束缚了金融机构经营的自主性，甚至成为监管机构套利⁶⁴的工具。例如以存款立行的银行业，开设分支机构是吸收存款的重要渠道，但银行是否可以开设分支行多由银监会决定，并非市场行为，形同导致政府审批部门权力过于集中，容易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在实践中重大行轻小行的准入策略，限制了中小银行的发展。在人事任免上，在国有主导的金融格局下，党委、监管机构代替董事会、股东会任命高管并不鲜见，公司治理形同虚设⁶⁵，甚至在监管机构与董事会意见不一致时，还会出现监管机构意见强过董事会的现象。

监管当局直接参与资源配置的过程，在证券业格外明显，包括股票与债券发行、上市公司与债券交易监管。现行 IPO 实行核准制，脱胎于此前的审批制，企业发行上市的关键是“过会”，即通过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核准之后上市交易由交易所审核。债券发行同

⁶⁰ 关于国有股减持，谢平、郭树清等人也提出了“国有股划拨社保”等思路。

⁶¹ 早在 1994 年时，美国规定单一金融机构在储蓄存款市场上所占份额不得超过 10%，次贷危机以后，美国通过了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将上述限制规定拓展到市场短期融资等其他非存款资金领域，限制了银行过度举债进行投资的能力。

⁶² 管制过多贯穿了过去三十年的金融改革，尽管不断的出台放松管制的政策，但中国金融整体仍然管制过多，关于金融改革的历史，参见（李利明，2007）

⁶³ 目前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均有相应的金融机构高管任职资格核准的管理办法。

⁶⁴ 现实中，监管机构与被监管的金融机构中，除了监管机构高层与重要的金融机构高管之间的双向流动以外，局级及以下级别的干部调至金融机构任职的现象非常普遍。

⁶⁵ 关于金融机构高管的任命中，中组部呈向监管机构建议其任命的金融机构高管，监管机构无须再履行核准职责。详情见中国人民银行的文件“银函（1999）281 号”。而金融机构所有人、监管机构与上级党组织在金融机构高管任命上的冲突，可以参见：中管金融企业‘人事权’之争，《金融世界》2012 年第 8 期。

样如此，企业债需要得到发改委的审批，公司债需要证监会审批。只有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由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备案，基本接近注册制。

监管部门的发行核准属于行政许可。与此相反，交易场所的上市审核则属于市场行为。证券发行的行政审批（及变相审批）是证券市场很多问题的根源。表面上看，监管当局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实际上是越俎代庖、代替投资者做决策，由其先行对企业的盈利能力、投资价值做预判，同时干预发行价格、保证发行成功等。这种类似“融资许可证”的证券审批制，使得股票的壳资源过高，产生了大量的寻租行为。近年债市股市整顿，在发行环节的腐败不绝如缕，概源于此⁶⁶。过去，央行叫停扫码支付等，也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名义，禁止业务准入。

监管部门的问题不仅在于管了不该管的，而且在于该管的却没管，尤其是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重事前、审批，轻事中、事后。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消费者与中小投资者在金融市场处于弱势，在金融机构的收费、及时支付、信息披露、关联交易利益输送、产品欺诈、风险提示等，他们缺乏对等的话语权，权益很容易被金融机构侵犯。

因此，我们建议应推进以下监管体制改革，减少金融管制，坚持由市场主体自担责任：

第一，在业务监管方面，监管机构应该全面放开对金融机构的微观管制，废除人事任免核准、产品销售等对金融机构正常运营的干预，让金融机构自行承担经营风险、优胜劣汰、提高效率。在推进国有控股金融公司的民营化（至少政府退出绝对或相对控股地位）的同时，理顺其公司治理，首先需要杜绝党的组织部门直接任免重要金融机构高管、公司党委代替或干预董事会做决策等影响公司治理的不当行为，在此基础上，监管机构及其它机关对人事、资产与业务的干预应当全面取消，在常规的公司治理框架下，集中在董事会层面解决。

第二，放松微观管制的同时，监管机构需要加强行为监管，以监管指标考核监管金融机构，加强金融消费者与中小投资者保护，强化对违规机构的事后追责。此外，还应鼓励金融消费者与中小投资者运用法律，直接诉讼金融机构或上市公司以保障自身权益。在这方面，监管部门应该为这种诉讼提供行政和技术支持，比如组织有针对性的监管调查，提供相应的监管数据。

第三，在证券发行方面应全面推行去行政化，废除监管机构审批，淡化和消除交易平台（如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的行政色彩，实行注册制，拟上市公司或债券发行经证券交易所或协会形式审查合格后即可安排上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投资者自担风险，由市场定价、研判投资价值。在此基础上，监管机构着重提升发行人信息披露的质量，强化发行人与中介机构的责任（如引入保荐人制度），实行事中行为监管与事后追责，严惩违规行为。

三，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是金融市场化的核心⁶⁷。利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

⁶⁶ 详见财新报道，<http://topics.caixin.com/bonds/>（2015年3月27日访问）

⁶⁷ 关于利率市场化及其发展历程的介绍，参见（张晓慧，2012）。

利率，主要是央行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利率，如央行逆回购利率；二是金融市场利率，主要是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率，在中国更多体现在银行间市场的货币市场和中长期债券市场，如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三是信贷市场利率，主要是银行类金融机构与存贷款客户间的利率，受到央行较为严格的管制，目前存贷利率差较大。

利率自由化指的是信贷市场利率由商业银行自行决定，货币及中长期债券市场之类的利率由金融市场交易主体自行决定，央行通过市场化手段与金融市场交易间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总体来看，中国金融市场利率更接近市场化，央行调控利率次之，信贷市场利率受到的管制最多，直接由央行决定，由于调控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央行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时，不得不继续采用控制货币供应量⁶⁸（包括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或调整存贷款利率来完成货币政策。

信贷市场的存贷款利率是金融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利率，考虑到银行业资产规模占全行业的比重及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其利率管制是当前金融资源错配的首要因素。2004年10月29日的存贷款利率调整确立的“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利率管制原则⁶⁹，持续7年多的利率管制（2004年到2012年），压低总体的存贷款利率水平，控制了贷款人的借款成本，让央企和地方政府（以其控制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国企为代表）、政府基建项目、房地产、出口导向型企业和资金密集型制造业等也成为既得利益者，又维持贷存息差，保证银行业的利润水平，银行业完成从救助对象到垄断暴利的华丽转身。它们也共同成为利率市场化的障碍。

利率管制造成中国整体利率处于较低水平，使得企业对信贷过度需求。但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央行还控制着信贷投放量，实际信贷供给远远小于市场的需求。央行同时管价（利率）又管量（货币供给量），而且由于国有和国有控股银行业金融机构占大头，其实政府也管贷款方向，信贷资金向国企和政府项目倾斜。所有这些使得中小企业在同等利率下更难获得融资，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

因为在正规金融体系内无法获得信贷，众多中小企业转向非正规金融机构融资。民间借贷是最主要的非正规融资渠道，融资利率往往会触及利息收入受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保护的上限：法定贷款利率的4倍。对非正规金融的清理整顿也是历次金融管制政策的重要内容。被利率管制扭曲的信贷市场，不仅使得资本密集型的投资机会向国企、大企业倾斜（他们更容易获得信贷），创新密集型的投资机会也向大型企业倾斜（他们天然具有竞争优势，容许的犯错率更高）。这是中国大中型企业热衷多元化战略的一大原因，也是中小企业贷款融资难、生存境况难的一大原因（聂日明，2014）。

2013年以来，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各子市场的界限模糊，跨市场、跨领域的金融产品打通不同市场间的利率，银行理财、信托、分级基金、委托贷款等融资手段成为传统存贷款业务的替代品。互联网金融更以技术优势，以极低成本吸引小额储蓄用户，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投融资服务，较为明显的案例是余额宝成立一年多，其基金规模就超过所有传统的基金

⁶⁸ 当然，《中国人民银行法》也规定，货币供应量仍然是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⁶⁹ 这一利率管制原则的确立，主要是基于银行业改革的背景，以此保证银行业的利润水平，弥补长期低贷存利差对银行资本和自身发展能力的透支，为银行改革赢得时间。在此之前，为了压抑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存贷利差长期被抑制，是银行业亏损的原因之一。

公司，跃居行业第一⁷⁰。发达国家曾经的“先机构、后散户，先大额、后小额⁷¹”的利率市场化策略由此被打乱，部分失效。中国的存款利率市场化必须正视互联网金融所带来的诡异的“逆袭”，如果放任这种情况而不改变，银行的存款将迅速向资本市场搬家，尤其是那些最基础的储蓄存款⁷²。

我们认为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过程，并没有什么待解的难题，所需要的只是改革的决心与毅力⁷³。

第一，总的来看，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应该是信贷利率、金融市场利率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三者都要加快市场化。具体看来，在核心的存贷款利率中，首先贷款利率应该率先全面放开。一般的企业因为财务约束，对贷款利率很敏感，其与银行的谈判中，自然可以形成市场化的贷款利率。有问题的是存在预算软约束的央企、地方国企及融资平台等，他们往往不计成本的大规模融资占款，是近年社会融资成本高的一大直接原因（聂日明，2014）。因此，在贷款利率放开的同时，应当建立一套规则约束它们的贷款，允许其更多转向债券市场融资。债券市场则有债务透明度和更为刚性的偿债约束（聂日明，2013b）。同时，需要通过改革禁止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注资或者提供隐性担保，打破国企刚性兑付的金身，同时推行国企的民营化，至少使得政府退出控股地位。此外，还需要引入预算民主的约束机制，进一步强化对政府负债和救助国企的制度约束。

第二，发展存款的替代性产品⁷⁴，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直至取消存款利率管制。配套取消贷存比控制，减轻银行吸纳存款的压力，发展同业拆借、债券等利率相对自由化的负债产品，将大额存款的利率先市场化，等到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以后，小额储蓄的利率自然而然就可以由市场决定。

第三，放开银行的准入限制，逐步直至全面放开银行对各类金融产品的自主定价权。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正视价格管制是准入限制的逻辑结果，允许优胜劣汰、公平竞争才是真实利率的形成基础。让银行可以自主决定以更高的利率吸纳存款，向高风险对象发放贷款，最终让银行形成以风险定价能力为核心的竞争力。从这一点上讲，金融市场不放开准入、不解除投融资限制，不废除其他有关制度缺陷，利率市场化就不可能真正的实现。

第四，完善金融市场利率，建立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为核心的基准利率，作为存贷款等金融产品定价的灯塔，同时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然而“灯塔易修、渔船难摇”，这首先需要财政部的配合，完善国债发行体制，丰富国债品种，建立健全完整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其次，要完善 SHIBOR 的报价与形成机制，保证 SHIBOR 能真实、有效地反映高信用等级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无担保信用融资价格。鉴于中国四大行在金融业的垄断地位，建立起防范他们操纵 SHIBOR 的机制也非常重要。伦敦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LIBOR）

⁷⁰ 2014年1月15日，天弘基金宣布余额宝对应的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规模突破2500亿元，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单只基金，天弘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也借此一举超过华夏基金，成为基金行业新老大。

⁷¹ 机构储户及大额存款者的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均远远高于普通储户和小额储蓄。

⁷² 吸纳小储户的储蓄成本较高，需要铺设网点等，因此欧美的利率自由化进程中，小储户的利益被放在最后。但互联网发展以来，可以凭技术进步降低收集用户的成本，借此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用“余额宝”、“理财通”让小储户直面高收益的金融产品。所以中国的普通小额储蓄也可以率先享受利率自由化的收益。

⁷³ 官方的利率自由化路径，参见（周小川，2010），（周小川，2012）

⁷⁴ 近些年银行理财、信托、委托贷款等金融产品规模发展迅速，成为金融脱媒的重要渠道，参见（殷剑峰，2013）。

曾被操控就是一大教训。再次，保证银行间同业拆放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规模大、交易高和信息披露充分，让更多的金融资产与负债性产品（如庞大的存贷款市场）的利率可以并有愿意锚定 SHIBOR，而非传统的存贷款利率。

第五，存贷款利率市场化以后，部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失效，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应当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货币政策目标从货币供应量转向通货膨胀，可以将 SHIBOR 作为中间目标，通过盯住目标的基准利率来引导整个金融市场利率体系，继而影响金融机构的存款贷款利率定价，以此影响企业、居民的投资、消费行为。此外，货币政策能承担的作用有限，控制通胀与保证增长往往无法兼得，更无法解决调整经济结构，保证经济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等职责应当从央行剥离，不应该再实行支持“三农”和中小企业、定向降准、向政策性银行定向宽松支持重点发展领域等扭曲性政策⁷⁵。应该让市场主体承担其资金责任，硬化其预算约束，让信贷产品的价格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比如据分析，由于资金用途的可替代性，去年定向降准释放出来的存款资金可能并没有作为增量贷款定向发放到“三农”或者中小企业，而是可能流向了房地产或者股市。

四，存款保险制度改革

存款保险制度⁷⁶是银行业的稳定机制，也是建立银行退出机制的前提。为防止挤兑，银行业必须要保障储蓄存款安全，主要是普通家庭和中小企业，他们没有能力判断银行的好坏，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差，它们的存款损失容易冲击社会稳定。

中国对银行存款实行隐性的国家信用担保。银行经批准成立后，就被国家信用所担保，存款安全无虞。这也使得银行在经营的时候，容易忽视风险，没有存款保险，监管机构也不敢让银行随便破产（易纲，2009）。为此监管机构不得不进行微观业务监管与利率管制。银行手脚被束缚住，也就没办法进行业务创新、风险自负，所以也就特别乐意做政府的生意，有很强的积极性去放贷给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因为这些贷款总是安全的，政府不会赖账，有办法筹资或者抵债。相比之下，它们也就认为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安全性没那么好，其信贷可得性自然就很低（聂日明，2014）。

随着近年来金融深化程度提升，市场出现了大量的存款和贷款的替代产品。这些产品的利率很高，导致大量的存款搬家，变成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货币基金等产品，在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中，这些产品借了银行的名义进行销售，通过资产池、银行信用隐性担保等手段，模糊了这些产品的风险承担主体，让投资人认为这些产品和存款是一样的，享有国家的隐形信用担保（聂日明，2013a）。

在国家隐性担保银行业、利率管制的情况下，金融各子行业往往通过傍上银行这个大款，透支国家的信用，单一产品的风险都等同于国家信用风险。并且随着支付宝的余额宝、微信的理财通等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推出，存款流出银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但银行所承担的风险不仅没减少，而越来越大，越来越脱离银行的控制。这时，任何一丁点的小风险，都可能引发

⁷⁵ 伯南克在总结央行的功能时强调货币政策虽是强有力的工具，但只是总量工具，本身无法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国内黄益平等亦有人有相同的表述，参见，<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2-18/100784952.html>（2015年3月27日访问）。

⁷⁶ 关于存款保险制度的介绍与国际经验，参见（余斌，2012）。

市场的崩溃。

通过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将存款的风险显性化，剥离附在银行身上的国家信用，可以一举消除国家保障存款人安全的负担。在这一前提下，利率市场化、银行自主经营，以及优胜劣汰、破产退出才有可能。

因此，应该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具体需要考虑如下措施：

第一，设立存款保险公司，其股东由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组成，保险费从这些机构按其存款额的份额分摊。原则上多数保险费只需要以银行承诺认缴并在接受支付要求时限时支付即可。政府不持股，可以在出现存款保险公司无法兑现保险金支付时，作为再保险机构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只承诺有限再保险额或者有限再保险支付比率上限。

第二，参考国际上的成熟做法，明确存款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的原则和机制，杜绝银行的道德风险，保障小额存款人的利益，而不保障大额存款和银行自身的利益。而且存款人的获赠保险金无论是在金额上，还是在比例上均应封顶，存款者需要为自己选择存款银行而承担责任。

第三，存款保险制度推出的同时，首先应该着力解决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不会破产的神话。否则，国有或国有控股的银行经营得再差、坏账率再高，只要存在政府信用担保这一不破的神话不被戳破，银行也不会破产，政府总会在银行陷入危机的时候救助银行的。存款保险根本没有用武之地，银行优胜劣汰、提高效率也就无从谈起。而且还多了一个监管机构，提高了银行的经营成本。

第四，推进存款保险制度改革，还需要深化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放松对银行的直接微观管理，尤其是要减少各级政府对银行在资金配置上的干预，让银行可以自主经营，通过竞争提高效率和风险定价能力。在完善外部监管和市场化约束机制的同时，还要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加强机构自身风险的防范。

第五，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存款保险可以解决银行破产带来的挤兑压力，但不能代替宏观审慎监管，尤其是次贷危机的经验表明，对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金融衍生品和影子银行的监管显得尤为必要。

五，保险业改革

如果说银行、证券、基金、信托等金融业态着眼于资金融通、投资收益，那保险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基于大数法则为投保人的意外损失提供经济补偿。银行业资产规模再高，也需要用存款保险来预防挤兑。为了保证赔付投保者未来可能出现的损失的能力，保险资金需要保值增值。这构成了保险业的两大业务：风险保障与资金融通，其中风险保障是保险的主业。而盈利模式上靠“三差”：利差，投资收益与客户收益的差额；死差，风险保费与实际理赔的差额；费差，收取费用与实际发生费用的差额。

近十几年，保险业的发展较银证信基等业态中相对缓慢。据保监会的年度统计，2014年

底行业资产总额才超过 10 万亿，管理资产总额甚至被信托业超过。较小的资产规模与保费收入，保险业所涵盖的业务范围与深度自然十分有限，其中人身险保费收入 1.3 万亿（主要是寿险），财产险仅 7200 亿（主要是车险）。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重要的险种的功能主要由社会保险承担，并且缴费义务很重，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2013 年仅养老保险的缴费收入就高达 19270 亿元，五项社会保险的基金收入合计 35253 亿元，商业保险只起到补充的作用，这限制了保险业的发展。也因此寿险、健康险等的税收优惠迟迟不能落实，进一步抑制了居民购买商业险的积极性；第二，险种少，覆盖面窄，缺乏巨灾险等险种，如医疗责任保险、房屋等固定资产保险在相关领域使用并不广泛，同时重要险种规模小，例如农业险规模非常小，其 2014 年保费收入不足产险整体的 5%，同时因为车险占财险的比重过高，受制于汽车增速放缓，财险长期增长的空间受限。

保险作为风险保障的主业发展缓慢，既制约了保险行业的扩张，也让行业的发展方向不明。为了吸引投保人投保，全行业以规模为导向、以保费论英雄，保险费率由销售主导，而非精算确定。由于保费收入是即时的，但保险的负债是长期的、不确定的，全行业存在风险低估的现象，越是如此，监管机构就越不敢放松对保险业经营的微观管制。

这也使得保险业的收入非常依赖于资金运用，在利率市场化与放松管制的同时，保险公司的内部治理与风险意识并没有跟上，保险费率不断降低、保险资金投资方向不断扩展，保险资金收益与股市周期联动现象明显，影响了行业利润与偿付能力的稳定的。这也使得保险业整体向银行化与投资公司渗透，平安、安邦等保险主导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越来越成为行业趋势。

金融业的痼疾在保险业同样广泛存在，并且尤为严重。如行业集中度高，截止 2012 年 6 月底，62 家寿险公司，第一名市场份额占行业 32.4%，前 5 家的市场份额为 72.4%；财险更为集中，前 5 家的市场份额为 75%（谢平等，2013）。国有控股的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也堪忧，短期行为明显，这也是行业发展方向走偏的主要原因，由此引发的监管与放松监管的左右为难是保险行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我们认为，保险业的发展，首先需要以相关领域的改革为前提，亦即将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的改革，除了保留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以外，其余的保险责任与缴费义务纳入到商业保险中，同时丰富健康险、大病保险、意外险等险种，为投保人提供多元化、有竞争力的保障服务，这需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如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等。

其次，发展非车险的财险业务。此前，交通事故造成的当事人责任界定一直是社会冲突的重要来源，交强险的引入极大地降低了这一危机。近年医疗事故造成医患冲突，其核心在于医疗责任的赔付问题，缺乏医疗责任保险是这些冲突的重要原因，此类职业责任以及雇主责任、产品责任保险在中国广泛缺位。再保险领域规模小，覆盖面窄，主要由中再集团的子公司负责，需要进一步扩宽再保险业务以提高保障力度。

农业险是财险中的重要品种，是保障农业发展、粮食生产与价格稳定的重要手段。目前农业险保障的农作物与畜禽种类偏少，主要是因为农业险费率高、收益低。政府应当改变以

往直接补贴农业灾害等损失的手段，改为补贴农业险和税收优惠的形式，让农业生产者购买农业险，用市场化的商业保险降低农业的经营风险。

其三，放宽市场准入，放松监管，促进行业竞争。鼓励混合所有制，降低国有股比例，抑制行业垄断，支持民营资本和外资投资、参股保险公司。改善保险机构的公司治理，放松监管，在宏观审慎的前提下，以竞争提高行业效率。

其四，坚持对外开放。目前进入中国的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已经不少，但总资产占保险业比重尚低，保费收入比重更低。中国保险业发展时间尚短，在长期赔付责任精算、险种设计等方面还缺乏经验。放松对外资保险公司在华经营区域、业务的限制，有助于从整体上提升国内保险市场的竞争力，继而提升效率。

六，互联网金融改革

2013 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⁷⁷。目前互联网金融产品主要包括三类：第一，融资工具类，如网络微贷（京东白条、阿里花呗等），P2P 网络贷款（拍拍贷、点融网、宜信等），众筹（京东众筹、点名时间、众筹网）等；第二，金融服务类，如第三方支付（支付宝），移动端理财，征信（芝麻信用）；第三，传统业务网络化，如商业银行网络化，证券网络化，保险网络化，金融产品网络销售（余额宝）以及电子货币（比特币）。

作为金融业门口的“蛮族”，互联网金融企业从支付、小额贷款切入，逐步向投融资、征信、甚至货币等领域扩张，已经对现有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传统金融机构的主营业务构成威胁。例如，余额宝直接导致银行存款搬家，阿里基金抢占了传统银行销售渠道的优势。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紧逼招至传统金融机构的强烈抵制。

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及其模式的创新，也冲击了现有金融体制的转型进程，放大了现有金融体制的缺陷。

第一，存在流动性风险。例如余额宝，其以“第三方支付+货币市场基金”的产品设计，投资者通过支付宝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又可以随时以“T+0”赎回基金。这就存在期限错配与流动性转换的问题，当市场大幅波动而用户赎回行为一致的时候，货币市场基金就会遭遇挤兑⁷⁸。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也有同样的问题。同时，由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消费者往往规模巨大，出问题时，很难通过市场出清的方式解决。

第二，P2P 贷款企业则大量存在资金池、刚性兑付的问题，或者构成“庞氏骗局”，触及“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监管红线。截至 2014 年年末，我国网贷运营平台达 1575 家，全年累计成交量达 2528 亿元，行业总体贷款余额 1036 亿元。同年共有问题平台 275 家，占统计中的平台总数的 17%⁷⁹。这说明当前放任状态下的网贷平台属于

⁷⁷ 关于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的介绍，参见（芮晓武等，2014），（谢平等，2014）。

⁷⁸ 出于担忧余额宝的流动性风险，央行官员曾表态，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银行存款应受存款准备金管理。此外，其他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银行的同业存款与货币市场基金的存款本质上相同，按统一监管的原则，也应参照货币市场基金实施存款准备金管理（盛松成，2014）。

⁷⁹ 数据来源：“网贷之家”发布《中国 P2P 网贷行业 2014 年度运营简报》，<http://www.wangdaizhijia.com/news/hangye/16216.html>（2015 年 3 月 27 日访问）

高危行业。近些年相关平台企业跑路的新闻也一直不断。

第三，现有法律框架还不允许互联网股权众筹的人数规模超过 200 人，因为否则会造成向非特定对象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嫌疑，甚至构成非法集资刑事犯罪。互联网众筹涉及通过互联网方式发布众筹项目并获得融资。目前股权众筹仍然有限，主要是债券众筹（如 P2P 网贷平台），回报众筹（投资者对项目或公司进行投资，获得产品与服务作为其回报，如京东众筹），以及捐赠众筹。

第四，互联网金融从业者大多为非金融业出身，将传统行业常用但金融业早已明令禁止的营销方式用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销售，比如保本、保收益，有奖销售，利息补贴、夸大收益、低估风险等，这些手段极易产生道德风险，导致消费者、投资者血本无归。

我们认为，互联网金融作为新生事物，对于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普惠金融是一个有益的促进。所谓普惠金融，是指各种有效金融服务需求均能得到满足的金融体系。在其中，尤其是小微企业和贫困农户的有效金融服务需求也应该得到满足。近年监管机构对其表现出的包容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新生的互联网金融，政府监管需要遵循以下规则：

第一，应当谨防出台严厉的限制准入或微观干预政策，着眼于建立和维持一个公平、公开和公正的竞争秩序，鼓励各种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实行“放开准入，维护竞争，防范欺诈，控制风险，活动留痕，事后追责”的监管框架。

第二，对互联网金融的宏观审慎监管要着眼于控制其负面的外部效应，具体体现在防范和化解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以此保护投资者及消费者利益。

第三，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行为监管与金融消费者保护，包括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运营行为合规性监管以及互联网金融企业对金融消费者后者的信息披露、消费者维权等，核心是反欺诈。

第四，对于各种“宝类”互联网支付、结算和理财工具，以及网络信用卡和借记卡的发行，本着反对垄断，维护竞争，增强信用的原则，鼓励开放发展，原则上要求有第三方金融机构或者符合资质企业提供足额赔付担保即可核准。

第五，对于 P2P 网贷平台的监管要区分信息中介平台和信用中介平台分类监管。一是要求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严格区分信息中介平台和信用中介平台，而且要求做到投资者、贷款人和借款人均可有效识别其注册信息与运作方式。二是要求信息中介平台不得拥有“资金池”，不必提供兑付担保，但仍需要其有一定的资本金门槛，同时要求信用中介平台为自己发行的 P2P 产品提供兑付担保（比如风险保证金，第三方担保等），以取得信用增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业务的扩展，一般信息中介平台均会朝着信用中介平台发展。因此，更为简捷合一的做法是不分信息中介平台还是信用中介平台，普遍要求提供兑付担保。三是应该确保借贷交易方、平台管理者和投资者身份的真实性，这些信息与借贷信息和违约信息一起，均需进入一种全口径社会征信系统。贷款需求者和提供者虽然以各种用户名出现，但其背后的身份必须真实，得到验证。只有这样才能纳入征信体系。需要将平台中介的不合规交易行为也纳入征信体系。四是要求对 P2P 网贷交易引入利息税，由网贷平台代扣税收，税收记录

也同时可作为一种交易登记和信息记录。五是对于为了防范平台负责人携款潜逃，可以要求平台资金存入一个信托账户，信托方按照预定程序允许资金进出，防止资金异常撤离。六是要求由权威信用评级机构对平台进行信用评级。七是 P2P 网贷平台本身还需要信用增强，比如需要第三方机构为其提供某种担保。没有这种信用增强，在当前条件下，很难保证不继续发生平台经营者跑路的问题。

第六，应该鼓励开放发展多种形式的股权众筹，而不是只限于发展某种股权众筹，引入一些信用增强的机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同时又能充分利用众筹的筹资优势：一是不设置对股权众筹人数的限制，也不设置对每人可投资金额的限制。二是区分无限责任投资人和有限责任投资人，鼓励引入部分无限责任投资人，无限责任投资人发挥兜底和信用增强的作用，一般为发起人，但发起人也可以是无限责任投资人，有限责任投资人则一般为跟投人。无限责任投资人也不应该对项目承担 100% 的责任，类似于存款保险，损失责任可以设置一个比率上限，比如 90%，以此强化所有投资人的风险意识。三是需要对众筹平台有一定的注册资本金要求，其中众筹平台对众筹项目违约也应承担部分担保，相当于对无限责任投资人提供部分再担保。四是鼓励众筹平台依托与一些实力较强的企业，银行与证券公司的合作开展众筹。

七，征信体系改革

目前中国征信市场⁸⁰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面向机构的征信；第二，面向自然人的征信。目前最大的基础数据库由央行建立，包括以组织机构代码证为核心的机构数据和以居民身份证号码为核心的个人数据。其央行征信中心和上海资信（已被前者控股）两家机构是最主要的企业与个人征信服务提供商。

2013 年，国务院颁布了《征信业管理条例》，明确企业从事征信的规范，除了原有征信机构以外，阿里、腾讯等非传统金融服务机构也申请征信业务牌照，如阿里旗下的芝麻信用。

中国征信业现存问题很多。首先，数据库不完整，央行收集个人和企业征信数据库时，主要来源于金融机构，这意味着只有自然人与银行等发生过联系时，才会被征信数据库收录，根据央行征信中心的统计，截至 2013 年 11 月底，征信系统收录自然人 8.3 亿多，但有过借贷记录的只有 3 亿人，收录企业及其他组织近 2000 万户，但借款人不到一半。大量的关于刑事、社保、税务等信息尚未完成统一联网。

其次，使用极其不方便，需要到各地央行的征信中心现场办理，有资格查询的用户少，其中企业征信为 13.8 万户，个人征信为 15.6 万户，主要是金融机构。近年开通了个人征信的互联网自我查询，但用户体验并不好。个人信用的维护与异议纠正也很困难。

再次，鉴于中国目前的环境，对个人隐私的保护缺乏法律保障，居民的身份证号码使用又极其广泛，一旦个人征信普及并对个人生活形成较大约束，信息泄露对个人正常生活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认为征信作为金融体系的一项重要基础设施，应该得到充分的发展，应以形成一种

⁸⁰ 关于征信业的介绍，参见（苏志伟等，2015）；中国征信业发展，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副主任王晓蕾女士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鸿儒论道”的《互联网金融与征信体系建设》的演讲。

发达的征信市场为目标：

第一，在现有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征信业的基础上，鼓励市场扩容，鼓励成立像德国 Schuffa 那样的商业性征信系统，政府部门需要开放各种有价值的信用数据，允许将其加入到基础数据库中，允许公立和私立征信公司以平等获得的方式利用这些数据，同时向美国等征信业成熟的国家学习经验，少走弯路，形成竞争性的征信业市场。

第二，征信机构需要利用全口径征信数据，包括利用政府部门之外的各种征信数据，比如利用移动互联时代的大数据，将个人或企业各种信息汇总，采用客观的评分方法，由计算机自

动生成信用分（类似与美国 FICO 信用分），由此为加速授信奠定信息基础。

第三，完善个人隐私保护制度，保证个人与企业的信用被合法、公平的使用。在对信用信息采集和传播时，征信机构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原则上要得到书面的认可。征信机构必须公正、合理地收集消费者和企业的信用资料。消费者有权了解征信机构收集、保存的本人信用资料。数据处理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保密的义务，只有在法律允许或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有关公司才能提供用户的信用数据。禁止在消费者信用报告中公开消费者收入、银行存款、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超过法定记录期限的公共记录中的负面信息等。

第四，监管机构保证对征信机构的监管，保证征信数据不被滥用。其中征信机构应该保持独立第三方的地位，包括阿里的芝麻信用等，其征信业务必须与交易平台、阿里金融分开、保持独立，其征信评分才有意义。

第五，设立信用管理协会，引入行业自律。信用服务的几个细分市场包括商账追收、信用调查、信用评级等，都应该由相应的行业协会自律管理。比如，美国的全国信用管理协会（NACM）拥有 20000 多家会员机构，包括私人征信机构、信用信息细分行业自律组织、地区性信用自律组织以及金融管理机构。

八，国有企业改革作为必要的配套改革

金融改革的难点，除了金融体系的固有的问题，金融也因深嵌于中国社会，受困于经济体制的痼疾，其中国企的超低的融资利率带来的租金收益、预算软约束和亏损国企无法破产对金融的冲击最为严重。

目前银行对外的贷款利率本身并不高，目前大企业和国有企业可享受 6%-7% 左右的贷款利率，而中小企业则在 10% 以上。但信托、理财等非信贷融资的利率高达 15% 以上（温信祥，2014），如此之高的融资成本，按目前的非金融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的利润水平，根本无法覆盖。从信托业的借款人的分布来看，主要是房地产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在接受高成本融资。其中政府融资平台纯粹是借着政府信用作背书，根本不在乎项目的收益能否弥补融资成本，不计成本的借款。

许多无效的政府投资，使得市场对政府偿付债务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为了维护政府信用“金身不破”，刚性兑付遍布地方债券、政府融资平台借款，并逐步扩散到政府还款承诺函、

国有大中型银行的金融产品、中间业务，金融业出现了普遍性的刚性兑付。

国有企业不计成本的融资推高了社会融资成本，其无法破产，又占据了信贷、金融资源，无法释放。相当多数量的国企已成“僵尸企业”，多为资金密集型企业，以钢铁、矿产、建材等为代表，它们的经营已经陷入困境，但并没有破产，靠银行输送信贷继续运行，但投资效率极为低下，僵而不死，甚至还在扩张中（聂日明，2014）。

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使得它们挟资本优势，很容易挤压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更是当下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根源。当大部分公司的投资收益还不如买理财产品，全社会投资赚的钱，还不够还融资的利息，风险几乎就在眼前。虽然大多数高成本借款都不是银行信贷，但在银行仍然主导非信贷融资的渠道，银行承担的风险不仅没减少，而越来越大，越来越脱离银行的控制。部分国有企业和其他大企业在获得较低利息的银行信贷之后，信贷资金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以较高利息辗转贷放给民营企业。近年的几起信托、债券违约，银行最终都没办法置身事外。可以说，局部性金融风险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我们认为，金融市场化除了着眼金融本身，更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夯实金融市场化的基础，国企改革的内容很多，其中涉及金融业的改革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全面梳理国企，实行分类处置，原则上国有股应该以多种方式全面退出，至少要退出控股地位，鼓励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创新退出机制。

第二，在“自然垄断”等基础性行业，国有企业在未完成改制前首先应当实行政企分开，应该对其融资不提供政府信用担保，禁绝国企在融资、土地等要素获得和利用租金优势。“自然垄断”行业不应该是政府垄断行业，也不需要由政府垄断企业垄断经营。可在这些行业建立或者形成全国或者地方全民所有股份制企业，现有政府垄断企业可以通过发行民营化券股份化，并允许股份转让，鼓励行业相关企业通过吸收市场股份获得更大的股份，整个企业股权结构仍应保持股权分散化状态。

第三，现有处于产能过剩的竞争性行业的国企，应该尽可能通过公开市场减持国有股份，并且要防止逃废债行为，这种民营化要做到既释放占用的信贷资源，又不引起较大的金融风险。

第四，界定政府与金融机构的责任，强化国企的自身责任，硬化国企的预算约束，打破金融机构对投资人的刚性兑付各种形成的承诺。禁止政府对陷入融资困境国有企业进行救助，同时要求金融机构作为直接融资的中介机构时，无论在口头、书面还是实际执行时，都不得保证投资人的投资收益、本金安全等。■

参考资料

中文部分：

- 弗里德曼，米尔顿与安娜·J·施瓦茨：《美国货币史（1867-1960）》，巴曙松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 哈耶克，弗里德里希：《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哈耶克，弗里德利希：《货币的非国家化》，新星出版社，2007年。
- 李利明、曾人雄：《1979-2006 中国金融大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 陆磊：《主攻主体、市场与监管》，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52期。
-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第九版）》，郑艳文、荆国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 聂日明：《“8号文”触痛银行》，《21世纪商业评论》第118期，2013年4月12日，2013a。
- 聂日明：《谁推高了社会融资成本？》，《中国经济报告》，2014年第11期。
- 聂日明：《以放开地方债化解地方债务》，载《东方早报》，2013-06-13，2013b。
- 芮晓武、刘烈宏编：《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 盛松成：《什么是存款准备金管理》，《中国金融》，2014年5月4日。
- 苏志伟等：《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征信体系发展模式与实践：对中国征信体系建设的反思》，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
- 温信祥：《如何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财新《新世纪》，2014年第37期。
- 谢平、邹传伟、刘海二：《互联网金融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 谢平、邹传伟：《中国金融改革思路：2013-2020》，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
- 阎庆民、李建华：《中国影子银行监管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 易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进程》，金融研究，2009年第1期。
- 殷剑峰、王增武编：《影子银行与银行的影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 余斌、魏加宁等：《中国财政金融风险问题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
- 周小川：《关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思考》，财经年会演讲，2010年12月17日
- 周小川：《利率汇率改革再推进》，载《财经》，2012年4月22日。

英文部分：

- Shaw Edward S.: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White, Lawrence: *The Theory of Monetary Institutio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 McKinnon, R. 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s, 1973.

思想界观察

沃格林论现代危机和现象主义的兴起

作者：李晋、马丽

1938年10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新闻报道的形式播讲了著名科幻小说家威尔斯的《世界大战》这部讲述火星入侵地球的小说。收听的人们以为这是新闻广播，在美国甚至欧洲引起了剧烈的恐慌。人们相信，从空中坠落到新泽西州的陨石，正是火星人所搭乘的飞行器，对地球开始大肆征服。尖叫，四处逃窜，恐慌在人们当中蔓延。至少170万美国人相信这个广播是真实的，120万人惊恐试图寻找能够生存下来的方式。这场遍及美国延续到欧洲的群体性的癫狂事件，尽管吸引了包括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德利·坎切尔（Hadley Cantril）等诸多心理学学者的研究，但是在20世纪政治和神学观念史中很少有思想家对此给予关注。一年以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就渐渐地淡忘了这场集体性癫狂。然而沃格林，这位从纳粹政权逃亡到美国的政治哲人却没有忽视这个现象背后真正的问题，这次的恐慌和二战的爆发，以及其他二十世纪的悲剧，都有同样精神危机的起源——人类的灵魂出了问题。

沃格林在他的《政治观念史第七卷：最后的定向》谈到这场危机时，说到：“我们目睹了科学的潜力所展现在宏伟的技术成就的领域之中。这些技术领域变得越来越现象化，并且摄取着难以让人摆脱的特性，它诱惑人们不需要关注实在秩序领域中所产生的后果，而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现实转变。这种技术手段变为了一种合法性的秩序。这同样的意义上，生物或经济学的技术秩序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准：什么能够做，应当如何去做。结果是，我们看到将整个人口进行毁灭性的迁移，用机枪扫射平民，恐怖性轰炸和城镇的焦土，以及恐怖的集中营。这些工具不再是一种服务实在目的执行工具，而是摄取为它们自身的动力，能够扭曲可能的技术性目的。如果目的领域自身在实际中已经干涸，如同我们这个时代一样，而生物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魔力却侵入了目的领域，各色现象主义的组合威胁着最后一丝实质的残留。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毁灭性赤裸裸的表现了现象性魔力压制了属灵秩序。在连载漫画和集中营之间有着一种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火星人的入侵而逃离的人，原因在于这种漫画和广播已经瓦解了他的人格，而党卫军没有任何懊悔而绞死一个囚犯，是因为在属灵实在秩序中原本是人类兄弟的人，在党卫军的内心中，他对于这些行动却已麻木不仁。现象主义进一步将我们的社会转化为一种附带精神病医院的联合式的屠宰场，少有同辈之人清醒地对此足够认识。”（引文均为作者自译）

现象主义（phenomenalism）被沃格林定义为在认识论上，现象取代了事物的实质，人错误的将事物的现象当成了事物的实质。现象主义将事物之间的现象关系解释为一套情感和观念的复合体。这是近代思想从笛卡尔开始，二元论，身体和灵魂在基督教教会秩序的压制下，并没有将欧洲的精神彻底地瓦解。随着基督教尘世国家秩序的瓦解，以及17世纪新科学的产生，自然科学取代神学和哲学的地位，转变了对于人和宇宙论的理解。这是现象主义

所产生的背景。17 世纪到 18 世纪，社会理论已经从神学中彻底地脱离出来，随之而来的是科学主义，一直到达尔文主义演化理论的出现，两者结合在一起，扩展到政治和经济的领域之中。

这是沃格林早期的研究《种族与国家》中就已经谈到的问题，这是一种“自然科学迷信的教义体系”，科学主义的两条教义就是，第一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唯一真正的科学，唯独它能够解决人所面对的一切问题。其次，就是科学本事是始终不停的进步，这种进步观，也延伸到了社会理论和人类历史之中，即先前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的思想，都是毫无用处的，形而上学不过是未经启蒙之光点亮的迷思而已。任何不符合科学范式所能把握的问题，都是虚假的问题。有趣的是，近二十年之后，沃格林在他的《政治观念史第七卷》中重新将现象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关系专门进行了论述，并且尽管沃格林对于卡尔·波普不屑一顾，却对于与波普立场相近的哈耶克的研究给予了肯定，在一个注脚中，沃格林让读者们参考哈耶克在 1942 年发表的《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一文。

随着科学主义的蔓延，欧洲社会和心灵的根基都开始动摇，人，在宗教改革之后，这个躲藏在宇宙论瓦解的碎片下的灵魂，需要存心寻找栖身之所。哲学的问题已经愈发不那样对人有吸引力，人不应当再追问人应当如何活着的问题？而是应当面对我们怎样才能活着的问题？人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本体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人的问题不在是一个心灵的问题，而是一个物质欲求的问题。

从沃格林主义的角度，整个现代危机的问题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是现象主义在三个层面上所引起的，也就是，生物学现象主义，经济学现象主义和心理学现象主义。

对于生物学现象主义，沃格林认为观念史学家应当注意到 18 到 19 世纪生物演化理论思想成熟这一重要的影响，他认为：“达尔文是一位伟大的实证生物学家，他整理了大量令人信服的材料来支持他的理论；大批量的实证数据扩展了一个新的有序的知识领域。同时，无论达尔文还是其追随者却都不是出色的理论家，以至于关于在现象和实在的知识之间这个问题上仍旧相当的模糊晦涩。” 19 世纪开始，真正的问题在于，随着科学的专业化，学术的分工，学者作为自身狭窄领域的主人，却无法能够认识到自身研究领域的理论在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之间有怎样一种关系。实际上这种学科的分化到今日已经在学科内部更为明显，所有的问题都排斥了信仰的知识（*cognitio fidei*）所启示的先验的秩序，人成为解释链条的终端，一切的研究问题都是工程问题而不是知识论的问题。

生物演化的运动成为了一场社会运动，一场群众运动，对此一知半解的大众们将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这些生物学的概念吸引如社会和政治理论之中，创造出一种与道德和灵魂无关的秩序。这在二十世纪现代危机凸现了出来，它们与种族差异相结合，就如沃格林所说到的：“人和社会的实质被生物学的大衣所遮盖，使得道德和精神意识变得窒息，并且试图用生物学上的生存去取代社会的精神秩序。当这些行动的规则被确立起来时，生命现象的秩序就变为了现象的痴迷。”

对于经济现象主义，这个幽灵依旧围绕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并且不断地扩散来影响我们的认知。经济学从政治和社会理论中独立出来，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才能够成为可能。只有资本支配世界的时候，经济问题才真正成为政治秩序问题。在经济学理论中，理性化，经济个体，利己导向，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现象主义的术语目前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充斥在

人的生活中，这是远比政治制度更为深入人心的事情，就是人是单一维度的理性自利动物，是一种经济的存在。然而实在秩序的问题对于社会中的人和他的生活显然要比商品最大化的均衡，甚至效用的满足更为重要的多，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一个产生最大化财富的经济秩序是否值得我们欲求，我们就必须考虑到为了维持它所付出的牺牲是否值得。沃格林同时代的人，作为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的凯恩斯那深入人心的口号，“在长期中我们都将死去！”，整个经济学所反映出来的经济现象主义，无论自由放任者还是国家干预乃至马克思都在这个阴影之中。有效和最优的外在秩序的均衡，已经代替了心灵-外在的秩序。沃格林对此的评价是“我们注定目睹了道德意识的衰落，并且自发去接纳罪恶，这些罪恶也就使得随着在短期中的所受的困难通过最终在长期中的收获作为补偿，这种现象关系转变为一个实质性的义务秩序而产生出来。短期和长期的论证特别地揭示出了经济现象主义。按照人的实质秩序，短期是人的具体的存在；另一方面，长期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以具体存在的视角来看，时间的点所呈现出的长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为了当下，在随后的时间点，其依旧是具体的个人所生活的短期。用现象的秩序来取代实质，现象主义就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不仅仅是商品的吸收剂，而是人的地位决定于其与整体社会间的关系。而实质上那真实的贫困和富裕，这些决定于其他社会成员的贫困和富裕之间的关系，可能根本就不会被改变。对于在社会中人的实质秩序的起源是被忽视了的，在原则上，这和生物学的现象主义中那种现象行为的残忍冷酷是一样的。即使通过那些试图重建社会实质秩序的革命，也不能打破这样的冷酷行为。极权主义的革命，共产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它们的要素中都存在对于打破自由经济的痴迷和演化出新的实质秩序的欲求。然而，在不同程度上革命的实质被新的计划的现象主义所遮蔽。“计划”将会像自由经济的市场机制一样，成为遍及于社会实质秩序之上的经济关系的一个系统。实质秩序的观念将会成为一个前提条件，离开了它，计划的观点就是空谈。然而，在政治实践中，我们发现它们和自由主义一样的趋势，将计划树立成为绝对的秩序，对待个人视为计划的一个功能，甚至相比现象自由主义对待个人时更为得残忍，在经济行为的互动中这种计划只是将个人视为一个具有功能性的要素。”

在对于心理学现象主义，沃格林指出了当代心理学已经彻底将灵魂问题抛掷，取而代之的是爱欲的分析，实验性、言语的行为，人类属灵的生命被约减为多因素的可控变量，心理上的管理者取代了灵魂的唯一主宰。在现代社会中，真实本质的丧失，导致心理学的控制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无孔不入，从沃格林主义的视角来看，依靠商业的广告、政治的宣传、“新闻”的报道，在期刊和杂志的书面批评都是这一现象的反映。我们生活的世界，在沃格林的眼中“是一个名牌商标、香皂、香烟、权威的人物和人们喝威士忌选择品牌的差别、必读书、畅销书、品味，以及应用于特殊场合的极为诱人的香水，成了这样一个世界；也是充斥着领袖，电影明星，大人物，教育家以及战争罪犯的世界；有着第三方、永久和平和无条件投降这些名义的世界；有着三巨头、四巨头、五巨头的世界；有着史无前例的炸弹负载和演讲的世界；有以历史会议命名的世界；调整的、有条件的、教育和再教育命名的世界；宣传和反宣传的世界；复杂、踌躇、挫败和喜悦的世界；进步的世纪、儿童、普通人和琐碎之人的世界。总之，紧接着中世纪天使和看上去似乎卑劣的魔鬼名册中，我们已经创造出了一个现代的魔鬼学“。

哈佛政治哲学家曼斯菲尔德认为沃格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被低估和忽视的三位重要的思想家（还有施特劳斯和米塞斯）。侥幸从纳粹的阴影下逃出，沃格林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中少有的面对现代问题深处灵魂的疾病的哲学家。这种疾病从本体论上来说就是失序，从希伯来传统而言就是背离了十诫中第一条和最后一条诫命，从希腊柏拉图的传统来说，就是我们灵魂中的疾病（*nosos*）。

当下，我们仍旧在这种灵魂的失序中，其表征的社会实在已经转化为一种现象主义的运动，成为去精神的次级存在，所表现在个体领域的焦虑和不安。在集体性的层面中，个人性的不安指向一种恐慌性的集体中寻求安全感，所以，任何脱离了心灵或精神实在所召唤的主义和信条都可能会将个人心灵与实在相互隔离，言语的统一性和消费的同质性将所有个体的人放置在一种虚幻的反抗和欢愉之中。任何不具有永恒意义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国家主义、个人主义，都侵入到精神的目的领域中。而我们看到各样的恐慌，就是它们本身已成为一种伪造的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再次重复先知以赛亚的追问，而非像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中试图要打破的那句话：“有人从西珥呼问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 ■

边疆观察

朝阳区“活佛”对藏传佛教传统的冲击

作者：李永峰

因为一些影视明星的带动效应，藏传佛教“活佛”，在当代中国社会所受关注非常之高。李连杰与王菲，可能是两个最著名的信徒，事关他们，连篇累牍的报道，似乎提示读者，无论是生活还是事业，他们都乐意接受“活佛”的指导；而台湾主持人阿雅，甚至嫁给了一个真正的“活佛”。不止影视明星，当代各类政商精英，同样也极为顺从地接受“活佛”的指导。

一个网络段子说“光是在朝阳区有 30 万散养仁波切”。段子固然是夸大，但道出了藏传佛教在当下精英群体中所受欢迎的程度。朝阳区是北京富商、明星、官员云集的地区。段子也调侃说，“仁波切”是中产阶级私人定制的“心灵鸡汤”。在汉语语境中，“活佛”是早已有之的词汇，而仁波切则是藏传佛教中转世修行者的称谓，藏语音译应该是“祖古”（或朱古），将“活佛”二字与异文化中的“仁波切”直接等同起来，是汉语社会一种创造性的误译。但这一误译，却让汉地社会更容易地接纳了藏传佛教。这种接纳，历史或许并不长久。

晚清时期，追求救亡的汉族知识分子，不少人将目光转向佛教，希望通过佛教寻找革新的精神力量。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都曾有这种努力，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杨文会。十九世纪末，在伦敦做过 6 年外交官的杨文会，注意到欧洲宗教改革的方法，尝试通过其他佛教支系的资源来革新中国佛教，开始追踪梵文、巴利文以及藏文佛经经典的状况。这扭转了中国历史上一直将西藏“喇嘛教”与内地佛教分立的传统。加上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第一次把各种将自身起源追溯到佛陀的宗教确立为一个叫“佛教”的单一宗教传统（腾华睿：《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69P）。这开启了汉语世界接纳西藏宗教的机会，在佛教范畴内，藏传佛教开始被视为与汉地佛教并列的佛教支系。学术上对于一个统一的佛教的建构，也带动了汉地社会对于藏传佛教信仰的认可，“活佛”开始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汉人精英的生活。

李连杰和王菲们，曾经有过地位更为显赫的前辈，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戴季陶，在“只有佛教才能统一中国各民族”的思想指导之下，曾大力推动藏传佛教在汉地社会的推广。他邀请和帮助各类藏地活佛前往汉地社会弘法，开创了后来朝阳区“散养 300 仁波切”的历史基础。民国时期，来自藏地的喜饶嘉措、诺那、贡噶、根桑、以及流亡汉地社会多年的班禅喇嘛等“活佛”，在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地的影响力，比起今天的朝阳区“仁波切”，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的密法修持，也改变了汉地知识分子对于整个佛教系统的理解。

1949 年国共两党的鼎革，一度中断了藏传佛教在汉地社会的传播。但是八十年代开始，宗教在经过三十年高压的无神论社会回归。藏传佛教伴随整个佛教的复兴，重新进入中国精

英阶层的视野。八十年代以来藏传佛教的传播，与两个新的现象相伴而行：第一，1959年跟随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的西藏宗教界领袖们，开始在西方社会找到了新的信众，藏传佛教已成为欧美国家中产阶级重要的“心灵治疗”方式（沈卫荣：《酒、色、疯僧与活佛》）；第二，从50年代中期开始，藏区对于所谓封建迷信和农奴经济体的改造，破坏了藏地社会中寺院的核心地位。这两者导致新时代藏传佛教传播具备了与民国时期不同的特征。首先是传法者不止来自藏区，也可能来自海外；其次，藏区旧有的教法传承次第受到破坏后，传法变得更自由但也更混乱。

传统藏区，不同寺院系统归属于不同的教派，格鲁派、萨迦派、宁玛派、噶举派等等，不同教派背后又有不同的政治和部族势力支持，对于佛法的修持，也都是在寺院中进行。但是当下，前往北京、上海、南京、深圳等地传法的“活佛”，因为受到宗教政策限制，不可能在大都市中新建寺院。所以，他们的传法，从寺院传法变成了巡回传法。而巡回传法中，汉地信众脱离了藏区当地的政治与部族背景，也不受西藏历史影响，单纯地将藏传佛教当成一种精神和灵性的修炼体系来对待。汉地信众受法的目的在于想体验神秘文化或求得解脱，化解人生困境等，并不重视教派分立的问题。一位学者在调查内地藏传佛教居士的信仰状况时，甚至遭遇“很多受访者严厉批评笔者对于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区分，以及对于藏传佛教中各派的区分”（彭兰闵：《试论当代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原因、特点和发展趋势》，28P）。

由于大都市信众富裕、大方，活佛可以在这里获得更多供养，所以，藏区大量活佛喜欢到大都市传法。网上那段子说朝阳区有3000仁波切，一方面说明，精英阶层对于藏传佛教的推崇；另一方面也说明，为了追逐“高素质”的信众，藏区活佛们也乐意奔走于“朝阳区”。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传奇的创建者堪布晋美彭措曾说过：“有些祖古，有能力出国的就去国外，不然就是前往中国内地，像个嗜血的寄生虫一样，贪得无厌，败坏佛教清誉”（色达·慈诚：《浴火重生——西藏五明佛学院盛衰实录》，154P）。晋美彭措建立五明佛学院，设定严格的入学、学位、戒律、考试（辩经）、学位等规则，希望重建藏传佛教的修炼与传法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对抗这些背离藏传佛教传统的“活佛”们。这也从另外的角度说明朝阳区“活佛”们对藏传佛教本身的冲击。

这种冲击首先表现的，就是如前文所说，对于教派分立的冲击。西藏历史上也曾有过“不分派运动”（Rimé movement），主张回归佛陀最初的教义，但教派成立的基础是历史源流、政治考量而不仅仅是对教法理解的歧义。所以，只要西藏的历史与政治基础还在，不分派运动注定会遭遇重重阻拦。但是朝阳区“活佛”座下的弟子们，脱离了西藏的社会背景，本身就拒绝因西藏历史缘由而成立的派别，更在意的是佛法本身。如果未来，来自“朝阳区”的供养继续扩大，那么，整个藏传佛教的社会基础产生变动，不分派，或者旧有派别重新洗牌，可能会成为整个藏传佛教的一大变动。其背后更大变动，恐怕在于走出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将完全不同于青藏高原上的藏传佛教。

在西方社会中，自从1970年代秋阳创巴仁波切在美国创建多所禅修与香巴拉训练中心以来，带动了藏传佛教的传播热潮，但这里的传播，在趋势上也从以传统的寺院弘化为中心转变成了以居士主导的禅修中心为中心（吴宽：《变动中之西方藏传佛教弘传：以噶举派为例》）。鉴于欧美社会的性质，这种趋势未来应该不会逆转。更重要的是，大量西方人接受转世，成为西藏历史上一些宗教领袖的转世修行者，出现了白色人种的活佛。甚至达赖喇嘛也说他的转世者可能会是一个白人。同样的趋势在中国内地出现。网络段子调侃说：“在朝阳区辽阔的大地上，生活着数以千计的仁波切，其中约80%说话带东北口音，且长相有浓厚的

在《乡村爱情》演员海选第二轮被刷掉的感觉”。段子的目的不过是讽刺随着藏传佛教的流行，大量投机分子开始冒充活佛。但其背后，确实有大量被认可的汉族活佛出现。出生辽宁、原名霍烽的汉族歌手火风被四川甘孜白玉寺认证为“活佛”，该新闻后来虽然被四川官方的民族宗教部门否认，但这种否认只是政治意义上的，甘孜白玉寺在宗教意义上认证了火风，是不可否认的。实际上，已经有调查显示，在内地传法的群体中，大量传法者是弘扬藏传佛教的汉族僧人或者学习密法的汉族居士（彭兰闵：《试论当代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原因、特点和发展趋势》，15P）。

国内外共同的趋势，都在推动藏传佛教形成新的生态系统。可以说，当下以当地居士为主导的禅修中心，和以其他民族成员为活佛进行传法的传法体系，已经让走出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淡化了原有的民族性，而变得更为普世化。这恐怕也是将都市作为传法方向的活佛们，无意中带给藏传佛教传统更为重大的冲击。未来如果出现白色人种的达赖喇嘛，或者汉族人的班禅喇嘛，这种冲击应该可以更为直观地震撼世人。失去民族性的藏传佛教，必然可以收获更为广阔的信众，但这些信众与藏区的联系会变得更为淡薄。这对于期望以藏传佛教信徒分布范围来划分藏区，并对藏区进行政治统一的政治势力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值得乐观的趋势。

网络段子单独将“朝阳区”列出来，不过是看到了朝阳区在都市中的代表性。段子热议的背后，是伴随以北京朝阳区为代表的都市藏传佛教兴起中所出现的各种光怪陆离，令旁观者好奇、惊讶、不满或者乃至鄙夷。作为精神修炼的方法，旁人或许并不能体会藏传佛教修炼者的欢喜。但是，旁人也不能回避，藏传佛教的确正在成为都市富裕阶层重要的精神依托之一。无论是心灵鸡汤也罢、心灵治疗也罢，从欧美社会到中国大城市，藏传佛教的流行自有其内在魅力的原因。单纯从宗教角度来说，王菲、李连杰等人对于藏传佛教的信服，可能比起晚清民国时期主张依靠佛教救国的名流们更加纯粹。今日明星们的藏传佛教，重要的是可以引导内心、求得此生或来生的解脱；昔日名流们，从杨文会、太虚到戴季陶、段琪瑞、刘湘等，除了佛陀的教诲，他们还在意的是藏传佛教在国家统一以及社会组织方面的效能。令他们意外的可能是，当代藏传佛教在内在和外向出现了背离，在都市中发展的“活佛”，为了适应都市信众的“心灵治疗”需要，而开始对传统作出了改变，这些改变一步步对旧有藏传佛教的整个“生态系统”造成巨大冲击。■

本土/国际篇

印度电影的去与现状

作者：萧敢

严格地说，印度不存在统一的“电影业”，数十个邦几乎都有自己的“电影业”，而且都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位于孟买的宝莱坞甚至不是印度生产电影最多的地方，只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2014年，它的规模已经达到1380亿卢比即22.8亿美元，在全印度范围内表现突出。从数量看，则给人印象更深。2012年宝莱坞出产1602部电影，而同年美国好莱坞仅生产476部，中国则有745部。如果从售出的电影票数量或者观影人次来看，宝莱坞总共售出26亿张电影票，好莱坞不过售出了13亿张有余。只是宝莱坞的电影票过于便宜，通常每张只卖0.2至1美元，所以在总体票房上败给了好莱坞。

从另一面看，包括宝莱坞在内的印度电影业，也许是最活跃的电影业。印度每年卖出电影票33亿张以上，除去宝莱坞贡献的26亿张以外，泰米尔纳都、特鲁固以及西孟加拉等地区也贡献了7亿人次的观影数量。目前印度有900个拥有多个屏幕的正规电影院，预计在未来5年里，这个数字将会翻一番达到1800个。而简易的单个屏幕的放映场所，就很难估计了。在印度乡村，随处可见简易的露天电影院，普通百姓都有经常看电影的机会。

很难估计印度电影的成本。因为很多电影的成本实在太低，用廉价器材和业余演员就可以拍成。且印度拥有各种层次的电影院和放映渠道，低成本制作电影也有可能被很多观众所看到。不过，宝莱坞的电影业相对透明，与国际接轨，所以我们可以从宝莱坞电影观察到印度电影的一些特征。

宝莱坞大片的制作成本一般在10至100克若尔之间，相当于150至1500万美元，甚至很多电影成本就在一两百万美元之间。今年制作成本最高的宝莱坞电影当属当红巨星Amir Khan的巨制《PK》。这部电影盯着国际市场，因此制作成本提高到了90克若尔即1300万美元，票房也成功达到330克若尔即5000万美元。高成本意味着高风险，今年印度的喜剧电影《态度》的制作成本也有60克若尔即900万美元，算得上是大制作，可最终只收回34克若尔，几乎赔了一半。

在印度电影的谱系中，宝莱坞电影一直是最商业的一支。他们对电影融资最有经验，成本控制最为拿手，对国际市场也最为熟悉。因此电影成本可以算印度电影的上限。而在电影类型方面，也很少有地方比宝莱坞经验更丰富。宝莱坞电影向来杂糅了爱情、动作、惊险、喜剧甚至科幻内容，上至神话传说，下至未来世界，全都信手拈来。必不可少的元素是宝莱坞标志性歌舞，每一部成功的宝莱坞电影必定捧红一首或更多的电影插曲。

而印度电影市场太大。除了宝莱坞这样主流的，与国际接轨的电影，印度还有大量地方性的故事片、纪录片。许多印度非主流电影充满了实验色彩，在各种小众电影节里也频频获奖，在各国文艺青年之中拥有极高的口碑。因此，概括印度电影的特征是一件极为危险的工作。如果把宝莱坞电影特征当作印度电影特征，在许多印度学者看来，就正好落入了东方主

义的陷阱。

从技术角度来观察印度电影，恐怕会有些失望。2012年，整个印度只有3块IMAX屏幕，至今也不超过10块。而且令人尴尬的是，首都德里还没有IMAX屏幕。与之相比，中国电影产业并不算太发达，但银幕建设却遥遥领先，在短短几年里建设了一百多块IMAX屏幕，很快就要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印度却拥有很多为好莱坞工作的特效电影公司。这应当归功于印度较为发达的软件业。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软件公司多为美国和欧洲电影服务，却较少为本土电影业出力，因为印度绝大多数电影都是小成本制作。宝莱坞电影中，成本在500万美元以上的不算太多，不可能支付高昂的特效费用。印度人民狂热地喜爱电影，但对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大片并没有更多的热情。据统计，好莱坞大片在印度的票房只占印度所有票房的5%。而奥斯卡奖之类的国际电影大奖在印度的影响力也颇为有限。印度有自己的印度电影观众奖，从1950年代就已开始颁发，总理经常会出席颁奖仪式，吸引全印度的注意力。

因此，要了解印度电影，必须先要了解印度电影历史和印度本身的历史。

一，印度电影的历史

印度是世界上最早拍摄和放映电影的地区之一。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铺辛路十四号的“大咖啡馆”地下室中第一次公开售票播放电影，标志着现代电影的正式诞生。第二年，他们就在孟买举办了“电影摄影术展览”，引起印度人的强烈兴趣。1897年，英国人拍摄的《椰子市场》和《我们的印度帝国》在印度上映，成为印度电影的正式发端，比中国至少早了八年。

1912年，印度有了第一家本电影企业“印度斯坦电影公司”，导演巴尔吉根据印度神话改编拍摄了故事片《哈里什昌德拉国王》，轰动一时。这部电影也在欧洲播放，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这部电影为以后印度影片的形式、内容和表现手法提供了具体模式，导演巴尔吉也被誉为“印度电影之父”。

1920年代，印度三大经济中心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各自发展出自己的电影传统。1931年，由伊拉尼导演的《阿兰姆·阿拉》（真主保佑）在孟买上映，轰动一时。这是印度电影史上的第一部有声片，将十支歌曲融入叙事之中，综合了传统音乐、戏剧、舞蹈演出，确立了印度歌舞片的类型模式。

二战前后，印度电影逐渐和追求独立的民族运动结合起来，诞生了一大批有民族主义特点的电影。如孟买资深导演阿巴斯的《新世界》，就揭露了孟买的新闻界黑幕，大受欢迎。而他在1946年拍摄的《大地之子》，直接表现了二战后期孟加拉地区饿死数百万人的大饥荒，震惊了印度和全世界。又如阿南德的《贫民窟》展示了印度贫民窟内外巨大的反差，获第一届戛纳电影节作品奖。民族电影的崛起与发展，为1950年代“新现实电影运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1947年，印度从英国手中独立。1949年印度就成立了电影专门委员会，着手研究民族

电影的现状及发展规划：1954 年设立了印度电影观众奖，后来也被称为印度奥斯卡奖；1955 年建立了儿童电影协会；1960 年成立了国家电影投资公司。1953 年，导演罗伊拍摄了取材于泰戈尔诗篇的印地语电影《两亩地》，开创了印度新现实主义电影浪潮，不但获得第一届印度电影观众奖最佳影片，也获得戛纳电影节国际奖，成为印度电影史上的经典。

1960 年代以降，印度电影一直存在两个不同的方向，简单说就是艺术品和商业片。前者以孟加拉导演雷伊和莫里纳尔·森等人为代表，主张电影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和政治问题，保持一定的艺术水准。雷伊长期在孟加拉语的电影环境中工作，电影语言充满孟加拉特点，以《小路之歌》、《大河之歌》、《大树之歌》三部曲闻名，得奖无数，并且在 1992 年获得美国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与此同时，另一批电影人则主张投拍迎合观众趣味、题材平庸，艺术手法公式化的商业电影，多产、多销并保持低成本制作。孟买的宝莱坞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到 2000 年以后，更是成为整个印度电影业的象征。事实上，从 1970 年代开始，印度电影年产量就一直名列世界第一，平均起来，每年都能生产数以千计的电影。

印度这种低成本多产出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并非孤例。目前年产电影数量排在印度之后的是尼日利亚(Nollywood)，然后才是美国（好莱坞），接着是中国。显然印度、尼日利亚电影的拍摄水平和内容风格上与美国好莱坞存在明显差异，但它们同时拥有巨大的观众数量。印度宝莱坞电影不仅在印度有影响，在东南亚、非洲乃至全世界都赫赫有名，捧红了一大批世界级明星。

从数量来看，宝莱坞都还算不上印度生产电影最多的地方。宝莱坞电影都说印地语(Hindi)，虽然这是印度最有影响的语言，但它也只是印度 22 种官方语言之一，主要在北印度有影响。而印度各地都有说不同语言的地方性电影产业，尤其是泰米尔语(Tamil, Kollywood)、特鲁固语(Telugu)、孟加拉语(Bengali, Tollywood)、坎拿达语(Kannada)和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地区，每年都会生产大量的本土电影。其中，南印度泰米尔和特鲁固语电影的年产量都在宝莱坞之上，都有深厚的电影传统和文化。

由于印度复杂的语言环境和历史因素，归纳印度电影的历史和现状绝非易事，甚至在印度电影界内部都存在大量的分歧。印度有大量电影院，且电影院收费普遍很低，一些电影院只收 10 卢比的门票（相当于 0.2 美元）。所以，每天都有超过 2000 万观众涌入电影院，各种类型的电影也都能找到自己的观众，看电影已是大量印度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探讨当代印度电影，必须从宝莱坞开始，最终又必须超越宝莱坞。

二，宝莱坞的发展历程

1970 年代起，印地语电影不断取得成就，涌现出一批有号召力的明星演员和导演，如 Rajesh Khanna、Sanjeev Kumar、Dharmendra 等，当时主要接拍商业片。例如，1975 年的印地语电影《复仇的火焰》是一部向美国学习的警匪片，同时又富有印度特色，汇集了 Sanjeev Kumar、Dharmendra 等明星出演，大获成功。这部影片，后来被观众评为 50 年来印度最佳电影。

当时也有一些印地语导演抱有艺术追求，将艺术考量置于市场之上。最典型如 Shyam Benegal，他曾 7 次获得印度电影观众奖最佳影片，始终坚持拍艺术片。他的代表作是《迷惑》，描绘了 1857 年印度人民大起义的历史，场面恢宏，荡气回肠。同一时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印地语影坛也出现一批既有思想又能被市场接受的主流电影，印度明星 Amitabh Bachchan 的代表作《墙》即是一例。Bachchan 在这部电影里塑造了一个不畏强权、痛斥政府腐败的年轻人，性格鲜明。但是，大多数艺术片无法赚钱，在计划经济时代广受批评。大多数印地语电影导演，最终还是走向了市场。

整个 1990 年代，宝莱坞电影出现一个明显趋势：回归家庭中心，回归浪漫爱情。这批新电影捧红了新一代演员，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三个名字都叫“汗”的穆斯林男演员，分别是 Aamir Khan、Salman Khan 以及 Shahrukh Khan，与他们配戏的女演员主要包括 Madhuri Dixit Sridevi、Juhi Chawla 等。他们成功替换了老一辈印度影星，包揽一大部分宝莱坞电影，成为票房保障。这一代演员至今仍活跃在宝莱坞银幕上，堪称当代印度电影的中坚，也广为印度以外的全球影迷所熟知。

在这个时期，有一部名为《塞雅》电影颇为引人注目，上映于 1998 年，主演是 J.D Chakravarthy。这部电影描述了青年人塞雅到大都会孟买来寻求成功，最终却沦入底层，拿起武器反抗的故事。它不同于其他光鲜亮丽的宝莱坞电影，而是真实地反映了孟买底层贫民窟的生活。这部影片在国内外获得了一系列奖项，并且在票房上大获成功。大量印度导演意识到，贫民窟也可以成为印度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而且孟买本地就有全印度最大的贫民窟。从此以后，印度影坛出现许多从不同角度描述贫民窟生活的电影。英国导演 Danny Boyle 与印度导演合作，在 2008 年拍摄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获得了包括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在内的一系列奖项，也使全世界都对印度的贫民窟产生浓厚兴趣。

到 2000 年以后，伴随印度经济的稳步增长，宝莱坞一下子变得国际化起来。大量国际资本涌入，使宝莱坞可以生产更现代、更高科技化的电影，效果直逼好莱坞电影。许多宝莱坞电影也走出印度，为其他国家观众所了解。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部电影，就是 2009 年由 Aamir Khan 主演的《三傻大闹宝莱坞》。这部电影主要反映印度的教育问题和贫富差距，情节曲折，表演生动。电影甫一上映就引发轰动，票房不断创下纪录，最终海外票房占到总票房的一半。这部电影是首部在香港公映的印度电影，在台湾的上映时间仅次于《侏罗纪公园》，而超过了《泰坦尼克号》。

Aamir Khan 也因《三傻大闹宝莱坞》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被选入全球 100 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被赞誉为“印度的良心”，随后在电视上开设了《真相访谈》谈话节目，揭露和抨击印度存在的社会问题。这部电影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世界对印度电影的认识。也正是这部电影，引发了中国人对印度电影乃至印度文化的浓厚兴趣，各种印度电影小组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了中国的互联网世界。

三，超越宝莱坞的印度电影

宝莱坞对印度电影和世界电影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歌舞是宝莱坞电影的一个鲜明特色，既有古代印度舞蹈的传统，又在几十年的宝莱坞电影里不断锤炼，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西方电影中已很少有宝莱坞这样的歌舞片。但从本世纪开始，《红磨坊》作为表率，直

接继承了宝莱坞的歌舞模式。随后，《芝加哥》《金牌制作人》《妈妈咪呀！》等影片，也都表现出浓重的宝莱坞痕迹。

有研究者把印度主流商业电影称为“马沙拉电影”。因为它与西方经典电影相比较的话，往往是一种混合类型电影。印度电影里常常同时包含言情、动作、喜剧、戏剧，以及必不可少的歌舞。印度导演不太像西方电影导演那样受到类型局限，而是想植入什么就植入什么。而且，因为印度电影时间一般比较长，中间还有中场休息方便观众喝水、吃零食，所以可容纳更多的内容，使电影结构一波三折。

印度电影史上有艺术片和商业片两种努力方向，其中艺术片导演与西方导演有着广泛接触。有人认为，印度也存在与法国新浪潮、日本新浪潮同步的印度新浪潮，拍摄《两亩地》的导演罗伊就是典范。表现现实的印度新现实主义电影也与之密切相关。反过来，那些商业片导演倒与西方电影没多少关系，只是迎合印度人民口味，大家爱看什么就拍什么。印度人对本土电影的热情，总是远远超过好莱坞大片。据统计，每年好莱坞大片在印度的票房只占印度总票房的5%，在中国则占一半以上。

几十年后回过头看，宝莱坞的成功却完全是商业片的成功。正是通过宝莱坞的努力，通俗的印度电影被传播到西方和世界各地。西方人不仅非常欢迎印度电影，而且从中借鉴了不少东西。与之相比，一直追随西方艺术电影潮流，试图与西方对话的电影，产生的影响力却相对有限。这恐怕是当年那批有热情的电影导演完全没能想到的。

深入研究了解印度电影状况后可以发现，宝莱坞光鲜外表下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宝莱坞电影为一些老牌家族所控制，圈外人几乎没有机会进入；又如宝莱坞镜头下的贫民窟充满了戏剧性，并非印度真实底层生活的反映。而印度其他地方的方言电影，虽然还未能走出区域，被更多人接受，但往往充满创造性，常能给人带来意外惊喜。2012年出版中译本的印度学者拉贾德雅克萨的著作《你不属于：印度电影的过去与未来》，就为我们揭示出很多印度电影镜头之外的认识和思考。■

本土/国际篇

超越“宗派政治”

——俄罗斯的精英博弈、政商网络与租金分配（下篇）

作者：张昕

四，1999-2004：有限准入的秩序重建

1998年的金融危机成为精英重组的一个分水岭。这一阶段的主要推动精英集团是联邦官僚，具体又可以分为两个次级集团：强力部门（Siloviki，有军队、警察和情报安全背景的官员）和自由化技术官僚，两者在这个阶段总体上维持联合局面，两者联合的共同目标是重建国家权威和联邦中央对于资源的严格控制。他们的共同斗争对象主要是地方精英、寡头集团，1998年以后兴起的非寡头背景的商业集团和“红色经理”的联合。联邦官僚集团在这个阶段借助外部资源价格的上升和联邦最高领导人的强势风格，不断推进联邦中央的纵向权力（power vertical）重建，代表该集团的主导政党“统一俄罗斯”（United Russia）也在该阶段最终成型，摆脱了之前每一次选举周期之后原有亲政权政党都必须大规模重组、改名的宿命。

作为该集团的斗争对象，老寡头集团（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等）和老寡头集团控制的媒体网络被全面整肃。代表地方精英集团的政党在1999、2003两次议会选举之后失去了单独组党的能力，彻底被其他集团所消解和吸收。2003年的尤科斯事件尤其带有分水岭性质，标志着代表联邦官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成为纵向权力体系的绝对控制集团，有能力控制和决定如何设立租金有选择的准入和分配机制。

由于苏联解体初期和改革第一阶段之后经历的混乱局面，俄罗斯一般公众普遍全面支持恢复秩序的“严刑重典”做法。此前，1996年以铁腕形象参加总统选举的前伞兵少校亚历山大·列别德在选举首轮中就有不俗表现，但最后被叶利钦集团所吸纳。1999年开始的第二次车臣得到俄罗斯公众的支持，也远高于1994年开始的第一次车臣战争。此后，2003-2004选举周期中主导政党的选举主打的口号和竞选纲领，就是不要回到1990年代、要秩序和稳定，将整个90年代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负面处理，而这一阶段主流政党控制的媒体也在不断强化这样的90年代印象。

随着2000年以后俄罗斯经济开始复苏，1998年危机和卢布贬值的部分正面效应也开始体现（比如刺激出口）。这一时段体系内租金主要来自经济复苏带来的全民收入的增长，俄罗斯国家和主导的联邦官僚集团也开始尝试设立新的“精英组织”以协调精英集团间的对话和协调机制，避免精英间全面冲突，稳固部分精英集团之间开始出现的、相互认可的“集体权利”。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是2001年开始联邦政府对于大商业、大资本集团的代表“俄罗斯工商企业家联盟”的全面支持，联邦政府尝试通过以该组织为纽带，以总统和大资本家代

表的定期会面为具体形式，来稳定和制度化国家与商业精英之间的谈判。但是，对于自然租金控制的不同主张，并不总是能够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尤其是在能源部门不断上升的自然资源租金面前，联邦官僚和大企业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 2003 年的尤科斯事件。最初貌似平等的对话、谈判，也迅速演变成为单向的国家对于大资本的全面控制。在地方精英向联邦中央“投降”的过程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故事。与此同时，在这一阶段俄罗斯经济开始全面复苏，但是俄罗斯社会内部阶层间、地区间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两个俄罗斯”的分裂局面开始形成。

在对于暴力手段的控制方面，联邦权力中心和持续的恐怖袭击之间的冲击，成为对暴力手段控制的主要竞争场域。包括车臣在内的北高加索地区，由于长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族群冲突成为恐怖主义重灾区。尤其是部分袭击直接进入俄罗斯大中城市，比如 1999 年莫斯科发生的多起公寓楼爆炸事件、2002 年莫斯科杜布罗夫卡剧院人质事件等。2004 年发生在北奥塞梯的别斯兰人质事件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恐怖袭击：车臣武装分子劫持了包括大量小学生在内的 1200 多人作为人质，双方激烈交火中 344 名人质死亡、727 名人质受伤。在这样的环境中，联邦中央全面加大了对各种犯罪和挑战基本社会秩序活动的打击力度，增加了对军队和执法系统的资金投入，这方面联邦中央的控制垄断能力也在全面上升。

就政企关系而言，俄罗斯的总体态势在 21 世纪初有一个巨变。针对企业和商人的来自外部的黑恶势力和其他形式的身体上的直接威胁，曾经是最主要的威胁。转型期最初的制度真空阶段，在没有有效国家制度的前提下，企业频繁地诉诸其他替代性渠道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执行合约。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和私人保安公司开始为企业和商人提供人身保护、收债、调停企业间的争议。当争议的标的达到一定规模，使用买凶杀人等极端手段的频率也很高，成为获取和保护财产的重要手段。

但是，这类黑恶势力、雇凶杀人和其他私人威胁使用频率在新世纪以后有明显下降，明目张胆的广泛使用私人暴力和强制手段，对于主流的企业来说已经走到了尽头，企业也很少再诉诸地下黑势力和私人保安公司来寻求保护。有组织的犯罪在传统的非法行业内仍然是突出问题，但只有在边远和不发达地区，企业才比较普遍的依赖犯罪团伙来获得保护、调解纠纷和保证商业合同的执行。相反，俄罗斯企业越来越多诉诸正式的法律工具、法律渠道和话语，来保护自己免于这类私人威胁。除了正规的司法体系，企业还开始大量使用律师在庭外解决纠纷，并且使用私人的商业仲裁机制。但同时，国家对于私人产权的威胁在迅速上升，主要的形式包括：剥夺企业资产，非法的企业恶意并购，非法的罚款、敲诈，非法逮捕囚禁商人等，围绕私人财产的斗争从街头转到了法庭和官员的办公室。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国家逐步重建自己对于暴力的垄断，商业环境“法律化”程度的提升，恰恰是上述过程的一个重要结果。国家对于经济体系中的租金有限准入的控制也相应得以稳固，在精英集团内部有了为这种有限准入制度化的努力和初步成效。

五，2004—2008：“纵向权力”与国家资本主义

这一时期的主导精英集团仍然是联邦官僚，有所变化的是部分自由派官僚被强力部门逐出官僚体系，留下的则是已经被驯服的自由派官僚。地方精英在州长选举制度变化，由地方直选改为由总统任命之后也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对于大资本已经实现非正式控制，虽然新的以

中小企业代表出现的商业协会 OPORA 成为商业政治利益代表的新基础，但是尤科斯事件之后“俄罗斯工商企业家联盟”作为大资本代表和国家定期互动的功能不复存在。通过这个体系稳定下来的仍然是特定精英集团的特权而不是权利，大众对普京的支持，换来的是对正式民主和媒体自由的限制。

这一时段里，自然租金加上来自经济成长的租金，共同构成了体系内的租金来源。从俄罗斯国家的角度看，在后苏联时期，第一次出现了有意识的利用各种租金来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努力：2004—2007 年间俄罗斯联邦中央设立了一系列具有全新法律地位的国家企业，设立了多个自由经济（特）区，建立了多家国家投资基金、财富基金、国家发展银行等发展型金融机构，并且提出了类似于传统产业政策的工业提升目标。所以，仅仅将此阶段的俄罗斯政府视为一个掠夺性的政府并不妥当。但是，官僚体系内部，尤其是地方和中层官僚缺乏动力，在不进一步开放租金准入的条件下，他们已经享有足够的资金分配特权。相应的，这一阶段腐败程度上升，企业面对的交易费用也在上升。

这一阶段，1990 年代后期曾经成为困扰私有经济发展的地下犯罪集团、黑社会等集团的作用和影响，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社会问题，但对于暴力手段重获垄断的国家却对私人商业部门构成越来越明显的压力。一系列俄罗斯国内对企业部门的民意调查都显示：私人市场参与者对正式法律体系协调私人市场参与者之间冲突的作用更有信心，但是对于正式法律体系解决自己和国家间的产权纠纷的信任度则很低。来自国家内部的威胁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类：（1）高级国家官员的攻击；（2）来自低级别国家官员的攻击，这种攻击往往是私人客户买通政府官员的结果；（3）由低级别官员直接发动的攻击，比如借助管制规则或者刑法的条款对商户进行骚扰或者施加压力等。

六，2009—2012：全球危机和系统的低效

这一阶段最主要精英集团内部的顶层联邦官僚出现了次级集团之间的尖锐冲突，最主要就是在强力部门、自由派官僚以及所谓“工业党”在 2008 危机爆发之后，围绕着是否需要加速私有化，如何拯救陷于困境的企业，如何使用前几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基金，是否需要国家领导的全面发展计划等问题发生的政策分歧，非寡头商业集团、中层官僚、地方精英也开始系统对抗有（联邦）政治联系的大商业，针对联邦权力的新的反对派政治力量开始重新积聚。

虽然俄罗斯政治体系依赖自然租金的基本事实没有变化，但是由于各个精英集团普遍存在机会主义动机的积累，体系腐败程度进一步上升。现有控制政权的精英开始系统购买大众支持，譬如 2009 年的反危机政策和 2011 年选举周期中的各种民粹主义口号。对精英而言，体系内可供分配的租金体量在迅速下降，维持原来政治忠诚和社会福利之间的交换关系日渐困难。

在暴力控制领域，国家一方面试图减少对于商业部门的压力，改善司法体系（包括警察体系的改革）；一方面作为对 2011—12 年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回应，国家也大幅度提升对于军队和警察的投入。外国力量对于俄罗斯国内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成为俄罗斯国内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个紧张源头，对于国内机构接受外国资助的情况出台了相当严格的法律，包括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的多个基金会、福特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在内的多个基金会先后撤出俄

斯，而主要西方国家政府对于俄罗斯政府开始呈现极强的负面反应。

2009年俄罗斯经济深度下滑，虽然2010—11年间已经有缓慢的复苏，但是商业部门和社会对于经济总体表现还是非常负面的预期。2008年前全球市场的高速需求增长加上俄罗斯国内积极的产业政策提供了投资和增长的足够动力，哪怕商业面对的成长条件很差。但是2008年以后商业部门和官僚的预期在改变，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对于经济政策的低信心，短期通过增加社会福利指出来稳定社会职能导致预算赤字。背后的基本问题是在租金减少的前提下，寻找精英集团间新的互动模式，通过对话和自我约束来实现社会稳定，尤其是政治上寻找和平解决租金减少之后各个集团之间就分摊损失达成共识。

六，超越“家族政治”：再政治化世界的俄罗斯底色

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国内“两个俄罗斯”的分割形态，在世界局势也得以映射。冷战的结束和此后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推行，并没有均质化不同国家和国民经济，相反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经济差距的扩大，却在迅速挤压部分国家和部分社会群体的生存空间，并增加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割和冲突。普京和俄罗斯政治精英应对国内两个世界的内在差别和分歧时的难题，也同样映射在他们处理对外关系和国际秩序上：曾经尝试过的去政治化的、“后现代”政治操作手法，在2012年周期的开始似乎走到尽头，在俄罗斯经济资本化和社会分化加剧面前，资源控制能力不断下降的俄罗斯统治精英，不能简单地把资源分配的艰难选择完全推向所谓中立自由的市场，自己仅仅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身份。

这样的语境中，传统的“家族政治”、“门阀政治”都不能准确把握：（1）精英集团本身兴起和变化的特征；（2）体系性租金总量与结构对于精英集团构成的决定作用；（3）本国国内“国家—社会”关系本身对于精英集团的影响；（4）国际环境因素对于国内精英集团构成和行为模式的影响。本文尝试提供一个更加复杂的精英网络对于国内政治影响的框架，逐步引入系统租金和国家社会互动，并最终提供引入国际因素，从而为理解俄罗斯政经变化，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

（本文上篇见《观澜学社·观察报告》第八期，2015清明号）

觀瀾

第十期
觀察報告

2015 · 立冬

觀瀾學社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前言

时值2015和2016交替之际，本期观澜学社观察报告旨在呈现各位作者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和边疆几个问题的思考，并展望这些问题在新年后可能的发展。李靖云关于两创的文章探讨的是目前中国一个核心经济问题-即中国企业如何从“山寨”制造业向原创产业升级。作者巧妙的将同一座城市的两个社区作为中国这两种企业模式的代表，通过分析深圳南山科技园和华强北的联系和反差，希望说明中国科技制造业正在发生的深刻产业变革。萧敢关于中国艺术市场的观察报告可以说是透视中国经济的腹部-一个不太为人熟知的经济市场。初步厘清这个市场的运行规律并将这个市场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大局联系起来，是这篇文章的贡献。楼晟的资本观察篇幅不长，但却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否可以把徐翔的被捕看作中国资本市场演变为金融体系核心的标志性事件？在社会问题方面，巩高兴和宋宇分别分析了珠三角电动车载客现象和目前新闻媒体产业的发展动态，两篇文章都是经过细心组织的第一手材料，是对这两个问题身处第一线的直接观察。在边疆问题方面，本期的两篇文章都非常独特。李永峰的文章剖析了一个罕为人知的历史群体：当年作为联合国军参与朝鲜战争的维吾尔人。文章并不局限于对这个历史群体的细节梳理，进而分析了这个事件的地缘政治意义，也让我们对目前新疆维族和ISIS的联系增加了一个新的视角。王明远的文章从容易被忽视的人口结构角度分析了新疆自治区辖内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口的历史变化和当下趋势（文中也包含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变化的数据），是本期篇幅最长、数据最详实的文章，把一个不在主流媒体视野内的边疆问题清晰地展示出来。

“观澜学社”是一个自发、独立、非商业的网络社群。我们关注当代中国历史的展开，我们计划每隔两至三个月公开发布一份《观察报告》，上期《观察报告》的编号是“2015·大暑”，以后也将逐次按照中国农历节气编号。本报告属于观澜学社成员内部交流之用，如需转载、引述，以及任何形式的利用，请与相关作者联系。看到本报告的读者，如有兴趣查阅早期报告，可向 guanlanxueshe@gmail.com 索取。■

目录

资本观察

李靖云：创新与倒闭，“两创”大潮之下的政治经济学之一

萧敢：中国艺术市场观察

楼晟：一力降十会，剑劈戈登结

农民工观察

巩高兴：解析珠三角工业区的电动车载客现象

公民社会与互联网观察

宋宇：媒体的新陈代谢

边疆观察

王明远：文明冲突背景下的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增长

李永峰：朝鲜战争中参加联合国军的维吾尔军人

资本观察

创新与倒闭，“两创”大潮之下的政治经济学之一

作者：李靖云

靠着海的深圳南山科技园，是一片与名声在外的华强北完全不同的地方，东西南北四个园区。靠近深圳湾的南区，新的四期五期的一层，已经竖起了深圳创业广场的牌子。这片仍然处于建设的喧嚣声的地方，在深圳本地也有一个响亮半官方的名字，“湾区”。从取名的角度看，深圳的比肩硅谷的雄心一目了然。南山科技园随处可见的是各种品牌，华为和腾讯，中兴，金蝶，大族，大疆，科大等高科技企业的标志耸立成林。南山科技园是深圳的骄傲，也是体现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实力。如果按照赫尔曼的《隐形冠军》的标准，南山科技园则拥有中国最多的隐形冠军。相当数量的世界领先的中小企业，都在这里隐藏在这里不知名的角落里。

但是南山科技园最大的特点不是其它，则是安宁。这里是深圳风景最好的地方之一，甚至于此地的骑行跑步已经成为了一个更为主流认知的特点。科技，电子，制造业更多联系的不是南山科技园，而是华强北。与南山科技园的安宁和宽绰相比较，华强北则是逼仄，喧嚣。一排排的大楼，电子商城，仓储，门面，构成了这样一个拥挤的天地。楼顶的LED广告牌闪烁着“深圳创客之城欢迎你”，楼下的门面则是不变的打折促销活动。这里是体现了全球电子消费的风向，任何新的电子产品，都能在一周内在这里出现，并且出现各种仿制品。城中村夹杂在高楼大厦之间，华强北体现的是典型的深圳的城市结构。“山寨”从一个深圳的俗语成为中国的流行话语，从一种本地的戏虐，上升为一种国家性的政治经济话语，深圳之于中国有什么深刻的意义，这样一个词汇可以发现一二。

对于深圳发展角度看，南山无疑是具有光明前景的，而华强北则是需要改进的。但是如果从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看，南山科技园和华强北孰轻孰重则很难讲。南山科技园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实体，乃至最核心的竞争力。但是甚至于深圳市市长许勤到了科技企业巨无霸微软进行访问的时候，对方表达的则是对华强北的关注与羡慕嫉妒恨。世界产业巨头对华强北的关注，并非是制假贩假的忧虑，而是对华强北强大的制造能力的羡慕。微软全球副总裁沈向洋表示，“华强北的硬件生态是全球绝无仅有的”。前店后厂作为一种企业经营模式，餐饮业，制衣业是普遍的，但是华强北能在消费电子业形成这样一套模式，显然是一个突破。这种长期被认为是制假的制造能力，被高科技企业认为是一种“硬件生产的生态”实际并非第一次。扎根在华强北国际著名的硬件孵化器hax负责人就曾评价，“山寨并不说明什么，其实他们制造的都是产品”。这家专门招徕海外团队的孵化器组织，主要招募海外创客。当这些人来到华强北之后，他们首先被要求按照一个名单，30分钟内买齐所有的硬件材料，谁买的最便宜，谁就将获得一份奖金。这一加强地方了解的游戏，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深圳产业创新的优势——你如果想设计制造一款产品，你可以找到所有想要的东西。

南山科技园近乎于白领配置的办公大厦，华强北这种清一色体恤加牛仔裤的前店后厂，大概十公里的范围内，这样两种企业模式，体现了深圳的产业格局。但如此大的落差，缘何产生，又通过什么

链接到一个系统的，这才是让人感到有趣的地方。做为世界工厂的核心车间，深圳的崛起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崛起的缩影。便利的资本和出口创汇型的发展模式，对于基础设施的投入，对劳动力的榨取，这些都可以说是深圳发展的动力。按照所谓传统的产业梯度转移，升级换代，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确实也有，也很积极。但是总体而言，深圳做为特区更大程度上的政治任务不在于引入已有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东西，跨越与赶超一直是深圳的目标。引进高科技企业，高技术人才，高等级的市场一直都是深圳的目标，也是真正意义上特区的目标。比亚迪和富士康一样是代工工厂起家的企业，但是比亚迪能够很快的跨越产业梯度，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制造企业，从一般的手机配件直接跨越到领先的电动汽车生产，这其中深圳市对比亚迪的支持是极为关键的原因。如果没有土地、信贷、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的政府配给，虽然王传福有着非常强大的企业家能力，比亚迪也很难短期内走完这么快的跨越。此类短期实现技术升级和产业跨越的企业在深圳并不少见，深圳本土的科技巨头都有过相似的经历。建立国际一流企业这是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一种政治使命，这个使命从蛇口开发区到罗湖中心区，再到南山科技园，这是一种使命传递。今天深圳正在南山进一步规划跨国企业总部计划，而华强北仍然是一个环境整治的福田区的工作任务，以至于虽然在国际创客中如此之名，这里仍然是另外一个端口，很难说这是特区的重要任务。

如今双创则把华强北和南山科技园紧密的在一个政治战略团结起来了，华强北从简单的电子批发业务，到电子产品拆装铺子，直接过度到科技孵化器，而以腾讯华为为代表的大企业，在这里投资孵化器。既表示对双创的支持，也是为未来押一注。从特区的政治目标，国家发展的雄心，再到地产商赚补贴解决自己存量压力，各种企图之间构成这股热潮。但华强北和南山科技园的关联，绝非是两创战略下的合纵联合，更深层次而言，它们都是关内的市场形态，但是其具体联系则更需要看关外。

比之于关内这种所谓的高格局，国际化，双创热火朝天。但关外则更显示是惨淡。以生产企业为主的制造企业大面积关停并转，这一趋势只能说是越来越强。“不是转移，也不是暂停重组，而是关掉”，做为大型代工企业主管，很简略的做了一个总体性描述。目前而言，到底有多少制造工厂离开深圳，并没有一个确数。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做为大量提供就业的支柱力量，产业链保证，制造工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重要意义体现在政府很早就开始给制造工厂企业提供产业升级服务，从过去的土地，资本以及压制劳工运动，再到从出口退税，推动机器换人，如此种种，但是惨淡仍然是大面积的状况。对于关外政府而言，限制防御罢工和招商同样的重要，推动创业创新除了面子需要，更有发展的里子需求。对于深圳而言，关内和关外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这样一个没有本地概念的城市而言，关内和关外实际是两个不同的区域。既意味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也意味着默认一种身份上的划分。对于关内而言，担负着特区的历史使命，既要探索强国富民之路，又担负着真正的国际竞争政治任务。对于关外而言，政策上更多的是一体均沾，但是政治上的发展指标竞争仍然是明确的。也正是这种竞争关系，形成了深圳内部的雁型阵格局，从关内的到关外，从南山福田开始，宝安和龙岗两翼产业延伸展开。深圳最早开始的是出口加工特区，以引进外资为主，蛇口工业园最早也是要做加工贸易为主。关外数量众多的代工工厂隐约可见过去的预定发展轨迹，但是关内实际上很早就以新兴产业发展为主。关外生产，关内完税并出口，这一初始格局奠定了关内和关外的产业分布。而华强北的市场销售则成为两者重要的联系的窗口，也成为了缔造深圳制造的重要推手。

一边是庞大的进出口市场，另外一边则是庞大的代工企业。华强北从最基础的电子元件再到面板，数据条，芯片，成型的电子表，手机，pc各种终端设备一应俱全。这种庞大的电子市场，本质上和一般菜市场并无差别，批发到零售，再到生产供货，其直线距离不过一百公里。由于华强北这一特殊的优势兼容组装这样一种仅是pc产品的组装模式，被无限运用于各种电子产品。基于这样庞大的现场组装拼接业务，模仿与改进就成了一种必然。这种山寨制造几乎囊括了所有电子产品，但是却因为手机

生产的超强能力，而成为了一种世界级制造现象。从制造程序而言，这种拆解降成本模仿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保证产品质量。向下迭代成了唯一的方向，降低成本，保证基本功能，立足于庞大的代工企业，任何一种简化设计都可以做到。这样一种迭代生产，本身属于跨代际制造，虽然这与一般意义的创新有所差别，但确实一种典型的迭代创新。华强北做为集中的电子消费品市场，克服了传统意义上to C的产品的销售渠道和客户服务等问题，形成了山寨产品的销售网络，从而形成了山寨产品的爆发。

但是这个爆发也成了华强北和代工工厂本身的绝唱，做为一种独立生产，山寨产品本身必然进入一般的产品运作逻辑。前店后厂的模式的同时，企业化生产已经开始了。同样山寨产品的突破，带动了传统电子企业迅速往智能化产品集中。一般的从业者估算大致的起点在十年前，而这也是南山科技园真正开始跨越发展的时候。大量的智能产品的生产，鼓励了非常多的一线产业领袖出来创业。这个层次的创业者具备最长的眼光，渠道，资本和经验。因为能够有效对供应链进行管理，他们成为创业金字塔最顶端的人。大量的代工工厂的技术人员，大企业开发人员，更多的是在华强北有着深厚根基的从业者，他们对产品拆解转化的能力，使得他们支撑了整个创新金字塔的核心力量。华强北的市场以及无数代工工厂，销售和生产能力奠定了创新金字塔的基础。所有这一切又得益于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大量代工企业陷入困难，传统电子产品收缩之际，智能硬件产品反而得到了极大的扩展空间。创业者能够有机会用较低的成本对产业链开始全面的整合，从而完成真正的产品跨越。今天深圳被认为是中国隐形冠军最多城市，但是这些隐形冠军的爆发的历史也不长，其轨迹一定程度上和山寨产品的洗白发展相符合。这些企业通过全球化的市场配置，迅速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和专业空间。但是这种专业化和产业链管理，又反向要求他们自己组织生产。典型如大疆无人机，全面生产都是自己来，而这已经成了一个趋势。这样的企业越多，代工企业的空间就越小。南山科技园兴起，但是关外制造业却彻底洗牌，这一现象并非是一种意外，或者就是根本必然的。■

资本观察

中国艺术市场观察

作者：萧敢

我们先从两个故事讲起。故事一：众所周知，翡翠应该是现在单价最高的玉石类宝石，而翡翠在全世界唯一的产地就是缅甸北部帕敢地区。而翡翠最主要的消费地是中国（占95%以上），最大市场是广东的几个城市（如揭阳，四惠，平洲）。前些年起，缅甸就实行“翡翠公盘”，即每年一次公开拍卖翡翠原石，只有公盘拍卖成交的石头才能出口。一些大块优质原石，往往能拍到上亿，颇引人注目。每年6月，广东揭阳商人都包机去缅甸，非常壮观。

拍卖有明标、暗标等拍法，但最终总归价高者得。但是缅甸人这两年发现这样的情形，越来越多的人，高价拍下石头以后，不交易，就这么走了。当然要损失一点保证金，同时损失信誉，即以后再不能参与翡翠公盘。但即便如此，中国人还是一直这么干，保证金再高也无济于事。一场公盘下来，本来就有一半的石头流拍，而成交的石头又有一半最后不交易，缅甸人百思不得其解。

中国人圈内管这种行为叫“拦标”。拦标的唯一目的就是阻止这块石头今年进入市场。因为翡翠公盘一年一次，拦标之后，它只有明年才能进入市场了。大料进入市场可能会导致价格波动，而一些中国翡翠商人就赌这一年中国翡翠市场的波动性更大，超过拦标成本。这种疯狂的事情就此发生。

故事二：法人股大王刘益谦以前经常在北京一些拍卖公司拍画。有时候他花四百万拍下一张画，付了一两百万定金，然后就不付了，拖着。拍卖公司默认的付款时间是半年，三个月内付款是极快的，几乎都愿意给你打折优惠，拖到两年是很正常的。刘益谦拍画经常拖尾款，老总只好不断地催。两年以后，老总再催的时候，刘益谦就直接说，你帮我把画再拍了吧。一幅画往往拍六百万，这样拍卖行反而欠刘益谦两百万。刘益谦拍得太多，以至于后来直接成为匡时拍卖的大股东。刘益谦拍的画一般都是中偏高价位，而且眼光不错，很多画会涨。所以刘益谦利用拍卖行的潜规则、时间差，还赚了不少钱。当然近年来，他主要靠把艺术品做抵押信托来进一步金融衍生品化了。

这两个故事大约能说明一个道理，观察中国奢侈品、艺术品市场，一定要注意其中的时间差，往往非常关键。尤其是这几年，中国市场处于非常强烈的波动中。

一、市场周期

讨论翡翠、红木、紫砂壶、奢侈品、艺术品等市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因为很多东西的性质不明、信息不清，问题会进一步复杂化。1. 我们不能说“翡翠的平均价格”是多少，这毫无意义，不同的翡翠有完全不同的价格，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计算公式，只有内行人才能根据所谓“种水色”给出大致的估价。因此我们不能说翡翠的平均价格。2. 我们也并不知道翡翠市场有多大。连揭阳市长都承认自己不知道翡翠市场有多大，因为所有商户必然瞒报，逃税。奢侈品税率极高，30%以上。想当年，还有很多翡翠商人以“矿渣”名义来申报进口，现在是不行了。但我们仍然无法估计翡翠市场总体有多大。3. 我们也不知道它的价格波动原因。它肯定跟供需有关，但也不是绝对有关。在前两年翡翠价格高涨的时候，圈内流行“三个月不去揭阳，任何人都是外行”的说法。很多资本有限的商人都不愿

意出货，因为“我这个镯子50万卖给你，你让我拿着50万到哪里去买差不多的镯子啊”。4. 它的暴跌，往往表现为“有价无市”。圈内人都承认，翡翠价格从07年开始暴涨，12年到顶峰，平均至少翻十倍。最近2年有一个明显的下跌。但50万以上的高货不跌，只是有价无市地挂着。小本经营的商家，纷纷离开翡翠市场转战其他市场。

再尝试着把这些原则推广到其他领域。先来看红木。所谓红木，一般是指已经几乎消失的A海南黄花梨（现在多用越南黄花梨代替，价格有显著差异）B 印度的小叶紫檀C老挝的红酸枝（北方说的老红木，也是最主要的红木材料），其他的无数更差一点东南亚硬木。红木水非常深，我们只是简单概括。

木头过去是做家具的，按吨来算。现在黄花梨和紫檀几乎都看不见了，只有一些小料一般用来车珠子做手串（中国这几年兴起的重要产业），所以开始论克卖。前几年还有红酸枝的家具，一张罗汉床20几万吧。当时一个家具论坛的权威人士说，老挝缅甸也开始限制木料出口，加上这种价格，大家以后一般就别想红酸枝了，这个时代过去了。以后只可能用白酸枝、草花梨等更次的木头来做家具了。但是两年之后，我们发现当年20几万的罗汉床，现在10万都不到，跌了2/3。市场上重新出现许多红酸枝木料，红酸枝的时代又回来了。红酸枝远没有用完，只是被一些炒家囤积起来罢了。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价格波动与翡翠有一定的同步性，都是2012年作为顶峰，然后开始暴跌。

目前已经可以在很多产业内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比如拉菲红酒，现在的价格比起2012年，跌去了2/3。有一些学者估计，奢侈品的暴跌与中国反腐有关。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对高档茶叶市场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但不全面。很多市场在反腐开展之前就开始暴跌了。以艺术品市场为例顶峰应该是在2011年，之后就一直没有缓过来，直至今年，艺术品市场仍然显得极冷。

对于中国的很多奢侈品、艺术品市场，我们需要认识它们的发展史。比如中国正式开始艺术品拍卖是在90年代中期。在这之前，包括艺术家都不知道自己的东西能拍卖换钱。比如上海的老画家唐云，喜欢喝酒。很多人带瓶黄酒到他家看他，他就送人一张画。又比如老画家程十发，他的画在上海朵云轩一直是几百块钱一幅，算是上海最高级的了。但人家拿到香港一拍，拍了几十万，把他都吓死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嘉德、保利以及其他一些拍卖行开始成立，开始春拍秋拍，时间非常短，我们也只有十多年的数据。国际化进程也还在进行中，佳士得刚刚进入中国，苏富比还没有进来。但现在从统计数据来看，全世界最大拍卖行是佳士得，苏富比，但接下来就已经是保利、嘉德了，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为艺术品市场中的两级。

拍卖是二级市场，画廊是一级市场，两个市场真正兴起也不过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还有各式各样的艺博会，也在不断兴起，可能变成画廊主要销售地点。画廊的销售状况不像拍卖行那么清楚，但我一直认为不应该高估艺博会和画廊的销售。佳士得一年的拍卖总额在70亿美元左右，苏富比在60亿，最大的艺博会巴塞尔也不过在40亿左右。与我们熟悉一点的产业做比较，iPhone手机一年的销售额应该在800亿左右，就远远超过整个艺术行业了。奢侈品行业的几个巨头如LVMH，它的年销售总额也超过艺术行业。所以艺术行业虽然说汇聚富人的钱，但规模可能没有一般人想象那么大。

2011年，整个中国艺术市场达到狂热的巅峰。那一年很多东西创下亿元拍卖纪录，极为疯狂，这主要是近现代传统书画作品。而在当代艺术里，中国当代艺术推手尤伦斯抛出上百件作品，包括著名的F4即政治波普作品代表人物方力钧、王广义、张晓刚、岳敏君等的作品，都拍出极高的价格。那可能是最近几年可见的中国当代艺术最后一次狂欢。从这几年来看，传统艺术市场和当代艺术市场都一

蹶不振，F4的作品几乎不会再拿出来拍了。就是所谓的有价无市，跟翡翠市场情况类似。当然也有少数艺术家的行情逆市而行，如曾梵志等。但数量极少，而且炒作痕迹明显，不像之前是系统性地炒一批艺术家的东西了。

二、市场评估

本文讨论这些商品，从消费角度，一般有多重价值或者目的。比如审美价值（当然据我观察，少有人带10万以上的翡翠珠宝，怕磕碰）和投资投机价值；比如炫耀价值；比如送礼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礼品市场”。对炒家而言，炒作翡翠和炒作茶叶可能差别不大。但从市场结构来看，珠宝、名牌包、表作为礼品的份额可能还不是很大，而酒、茶叶、艺术品作为礼品的份额非常大。据估计，超过7成艺术品是作为礼品被购买的。所以分析礼品市场占多大份额很重要，而这方面的估计又是最最困难的。

艺术品市场里，这种现象非常突出。比如过去启功的字、范曾的画都是最好卖的，几十万的价格，通俗易懂，最适合作为礼物。这些东西和艺术没什么关系，现在价格都开始猛跌。但对于一般人而言，是无法分清楚艺术/非艺术或者艺术市场/礼品市场的。

这里主要谈两个问题。第一，现有市场的炒作；第二，新兴市场的炒作。

紫砂壶一直是个很有趣的领域。今年年初，某上市的新疆电缆公司公报，投资1个亿购买28把顾景舟紫砂壶，引起很多争议。从目前市场价来看，顾景舟的紫砂壶多在千万元以上，所以这个投资是合理的。只是电缆公司投资紫砂壶，让人觉得有一些奇怪。随后公司宣布，同时已在全国投资许多紫砂壶会所，与许多紫砂壶大师签约，准备系统地炒作紫砂壶这个产业了。

从历史来看，宜兴紫砂壶并不是个很高级、很传奇的产业。在49年之前，曾经小小地炒过一次，但也很快过去。解放以后，顾景舟等人都在紫砂一厂工作，做壶也没那么多讲究。80年代开始，香港人第一波开始炒作，然后紫砂壶猛涨。90年代是台湾人炒。现在紫砂壶变成一个很大的产业，只要是有什么工艺美术师的职称，做的壶就能卖到数十万。连一些20岁不到的年轻人做的壶，市场上也能炒到几万。名家大师的壶更不用说，同时假壶泛滥。顾景舟的壶并不算多，现在拍卖上一般都能拍到千万。但是这个产业是否能一直炒下去，大众是否会长期承认紫砂壶值几十万，这一点令人怀疑。

但紫砂壶好歹是个传统手艺。与此相比，一些新兴市场更让人震惊。比如去年炒作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太行山“崖柏”，就是悬崖峭壁上的柏树根。柏树从来是不值钱的杂木，但现在大家提出这种概念，悬崖上的已经死的柏树根，形状千奇百怪具有审美趣味、又有所谓的药用价值、文化价值，还有稀缺性、不可再生性、采集时要冒着生命危险等等，所以价格应该很高。一段树根可以卖数万元。还有人把它车珠子。与此同时，很多仿冒的东西如“坡柏”（就是地面上的柏树而不是悬崖上的柏树），四川的崖柏等也混入市场。很多人都认为崖柏这个概念很荒唐，但不知道这个泡沫何时破灭，是否破灭。

又比如“星月”菩提子手串。这些菩提子跟佛教的关系很弱，甚至可以说没什么关系。星月菩提子是一种海南和东南亚野生黄藤果树的种子，据说现在还只有野生。海南文昌在80年代开始生产这种“佛珠”，非常边缘，到了前几年只剩下2家厂。但是2012年之后，这个东西突然火起来，大量资金开始涌入，甚至一些红木资金都开始进来，把整个产业炒到数亿。为了配合炒作，当然编出很多说法，分析

怎样的星月菩提子值钱，怎样盘玩变成老菩提子，会怎样升值等等。菩提子这一波热潮比翡翠、红木稍微晚个一两年，但到今年也已开始消退。菩提子价格涨不动了。相比之下，大家觉得翡翠等玉石相对“扛跌”，大众对它价格的认知不会大跌。但植物性的东西，似乎没那么扛跌，有可能维持不了有价无市的局面。

回到艺术品领域，首先要看真正交易的艺术品。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主要交易对象是瓷器和书画这两块，占了很大的比重，当代艺术的交易肯定在10%以下。瓷器当然主要是老瓷，现在景德镇新烧的瓷器则不会有很高的价格。而在老瓷里，最受欢迎的是明清官窑瓷器，尤其是青花瓷器。官窑这个标签影响非常非常大，是决定瓷器的关键性因素。而在具体市场上，又表现为清三代瓷器的价格往往高过明代瓷器，因为清三代瓷器更俗气、更直白，通俗易懂。很多人都讨论过，从艺术角度看，价值最高的瓷器应该是宋代瓷器。但宋代瓷器缺乏官窑标识，没那么直接，所以市场上的反映反而不如明清瓷器。这个趋势在纠正过程中，但还远远没有到位。

书画市场亦如此。除了九十年代礼品市场上流行的启功、范曾以外，目前市面上最流行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画，市场价值极高。此外，乾隆御笔之类的东西也被炒作极高。按照一些网站的统计，以平尺而论，目前中国已故艺术家身价排名，第一是乾隆，第二是康熙。这简直是笑话。而按照一些美术史家的观点（我个人颇为赞同），徐悲鸿、齐白石的画极为糟糕，价格被严重高估。大批不那么媚俗艺术家的画，还停留在较低的位置。在中国画里，刘益谦大规模收藏的溥儒是个比较好的例子，他的价格至今不算高。而在近代中西结合这一块，大量艺术家的作品也被严重低估，如林风眠、吴大羽等，价格至今不算很高。

倒是有一些奇怪题材的价格很高，比如“红色题材”。这一大批建国后老油画，或者中西结合的画（比如长安画派的黄胄等），从艺术价值来看很低，但市场价值极高。从美术史家的角度看，这些画缺乏艺术史的支撑。但从目前市场来看，这批画有力地得到了市场的支撑。

以收藏古籍著称的北京收藏家韦力也表达过类似观点。比如目前上海的古籍收藏，主要是两个题材，连环画和红色题材，价格远远高于古籍。从古籍版本角度看，无法解释连环画和红色题材有任何价值，但它就是获得了市场的承认。甚至在这两年的拍卖会上可以看到，一叠明代的纸可以拍得比明代珍本古籍更贵，达到20万。原因不明。总体而言，古籍相对于绘画还处于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水平。盘子也不大，上亿资金就足以撬动这个市场。但可能古籍还是需要一些知识，导致真正涌入这个领域的资金还不够大。

在当代艺术领域，情况就显得复杂得多。经过前些年的洗盘，九十年代出名的一些中国波普艺术家的虚高现象已经得到改观。现在中国艺术家已经和西方艺术家站在一个平台上对话和交易了，即使中西艺术的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一些比较好的艺术家已经获得国际承认，其中既有传统的框架画家如陈逸飞、吴冠中，稍年轻一点的刘小东、曾梵志等，更多的是跨媒体的艺术家比如徐冰、蔡国强、杨福东、徐震等。有潜力的艺术家还有很多（而且中国艺术家普遍年轻），但市场可以辨识的艺术家会非常有限。

三、交易制度

交易制度是艺术市场的一个核心问题。一般的奢侈品，不管玉石珠宝，还是紫砂壶，印章石料等，都还是可以花钱买到，主要看市场供需。但艺术品市场会比较复杂，必然有一级市场画廊和二级市场

拍卖，其中各有复杂玄机，而且市场并不简单相通。

我们要把已故大师和活着的艺术家分开，先讨论还活着的艺术家，他们的情况更复杂。所谓画廊，一是代理艺术家的作品，二是对艺术家进行学术上的梳理和支持，这两点功能都极为重要，而后者正是中国画廊所普遍欠缺的一点。画廊与艺术家的签约有多种形式，有的是完全签下来（就是你艺术家不许再把画卖给别人），有的是签你一部分画（比如每年你必须给我20张画，我帮你代售和营销），有的是签你一类画（比如我知道你有三个主题的作品，一个是具象的，一个是水墨的，一个是拼贴的，我只签你具象的画，其他的你可以签给别人）。画廊对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有大致定位，然后一般每年帮你涨15%什么的，这也需要画廊的营销和学术梳理。

对于画廊而言，一般绝不会把画直接拿到拍卖行。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渠道是隔绝的。如果你的画有的流入拍卖行，被人乱炒，那画廊还怎么对你的画进行定位和定价呢，同时也做不到对你的画进行垄断。所以画廊是非常忌讳自己代理艺术家的市场被打乱，也非常忌讳购买者（画廊一般称之为藏家）和艺术家直接接触。画廊认为自己有一套独特的体系，外行理解不了。但这种相对封闭、极少为外人所知的体系正在不断经受挑战。

比如近年来拍卖行提出一个概念叫“私洽”，影响很大。在传统上，私洽往往是作为流拍的补充。比如一幅画的保留价格是60万，但最后流拍了。拍卖行还是可能撮合双方进行私洽，希望促成这笔生意。但现在拍卖行开始进一步推广这个概念。比如你想买一幅方力钧的作品，过去作为拍卖行我还要四处征集他的拍品，然后让你们来拍。现在拍卖行我干脆直接介绍你们认识吧，你直接找艺术家，看看他有没有作品直接卖给你。这对于画廊来说是大忌讳，可能会毁灭整个生态。可拍卖行说，这只是他们针对VIP客户的专项服务。

所以艺术品市场，主要画廊和拍卖行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市场，相互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尤其是当代艺术这一块，画廊认为主要是自己在构建、描绘、界定当代艺术，因而反对拍卖行的介入。拍卖行更有实力，而且一般多是从最大众的艺术品如瓷器、古代书画起家，不断扩展自己的领域，珠宝首饰、名酒名表等都在拍，也希望更深入地扩展到当代艺术这一块。

画廊坚持认为自己是挑选顾客的，不像拍卖公司是不挑顾客的。可是画廊最看重的那些客户，往往也是艺术品味很差的土豪，最终结果可能差不多。画廊主要是在近十年里发展起来，但几乎每年都会淘汰掉1/4的画廊。真正对中国当代艺术建构有话语权的画廊，全国不过二三十家，而且很多是国外著名画廊介入中国。近几年，中国也开始办各种艺博会，包括巴塞尔在香港办艺博会，主要就是给画廊提供大规模的交易机会。据说很多西方画廊的业绩有七成都是在艺博会上实现的。从目前中国情况来看，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博会上还很边缘，这显然与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建构水平太弱直接相关。中国现在有一批年轻的、受过一些艺术教育的富二代藏家开始收藏，但规模和影响力都还远远不足。

拍卖行的行为相对比较公开透明，容易观察。雅昌艺术网积累了十多年中国主要拍卖行大型拍卖的数据，已经成为中外艺术研究者的主要数据来源。中国目前有上千家拍卖行，但真正有信誉的拍卖行不过是前十多家。很多小拍卖行会有一些奇怪的盈利模式。比如有人拿一些比较一般（或假的）的东西去小拍卖行，小拍卖行也接受下来，做图录、预展，最后当然是流拍。但它问藏品提供者收取比如2万块的图录制作费用，主要就指望图录制作费来盈利。正常拍卖行是指望拍卖佣金，为此付出劳动。而小拍卖行才会出现这样扭曲行为。

即使大拍卖行也无法杜绝（或是主动拥抱）“假拍”和“拍假”这两种基本做局手法。所谓假拍就是自导自演，付出佣金把一件作品的价格炒高，这样可以带动同一个艺术家或同一批作品的价格。而且假拍的复杂性在于，它有时还和礼品、行贿、腐败等联系在一起。比如我给某官员送一幅画，然后暗示他拿去拍卖。在拍场上，我把本来市场价格是50万的作品拍到200万，相当于送给官员200万。无论拍卖行还是艺术家本人，对这种行为也没什么好说，看起来也没什么坏处。只是正常的价格信号被扭曲了。至于拍假，就是拍卖赝品，这在中国已有千年历史。老一批国宝级鉴定专家当年有时也帮着出假的鉴定意见（比如启功、杨仁恺都做过这种事），随着他们的故去，传统书画更是完全没有权威鉴定专家。以我如此弱的眼力，也能看出大量的假画。目前市场上流传的齐白石的画绝对在30万张以上，而齐白石一辈子的画肯定在3万张以下（他与张大千都是极为高产的画家，每天不停地画，而且速度快，这才能画到3万张，正常画家一辈子的画应该在1万张以下），说明90%以上的齐白石的画都是假的。

我曾问过一些拍卖行，为什么主要拍卖就是春拍、秋拍两次，没有更多拍卖？这个问题很微妙，这其实是拍卖行控制这个市场的主要手段，他们要防止交易过于频繁。但一些拍卖行还是忍不住推出一些更高频率的小拍，如“四季拍”，“周末拍”，比如嘉德做了不少这样的拍卖。拍品质量当然没法和春拍秋拍相比，良莠不齐。我在网上看他们的展品，就书画而言，大多数小拍的展品都很可疑，开门假的很多很多，甚至一场拍卖会上看不到几张真迹。

一些小的画廊表示，经常靠自己的眼力在比如嘉德四季拍卖里捡漏。拍下一些可疑的画，回去翻各种图录，偶尔找到出处，做实了画的真假，往往身价百倍。我经常看到一些画，比如石涛的画，在嘉德四季拍到30万。我就很疑惑。如果这是一张假画，这个价格实在太贵，即使老仿也不会超过5万；如果这是一张真画，那又绝对太便宜，肯定在数百万以上了。那么30万的价格说明什么，是否有局，就不得而知了。

四、艺术市场与中国经济

我们不在这里过多纠缠艺术市场与艺术品本身的价值，更多地看看它与中国经济的关系。最后我试图有如下几点基本观察，与大家探讨。

第一，它与资本市场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与艺术本身价值的关系反而不那么紧密。当然艺术品作为一个变现能力非常差的投资，不会很直接地反映资本市场的情况。但是它的总体趋势即2007年以后的猛涨，2011年顶峰，随后的衰退，确实反映出大规模资金的流入和流出状况。

第二，中国艺术教育很落后，包括画廊在内，并没有真正地树立起自己的艺术价值体系。中国大量东西是自己在跟自己玩，从翡翠到紫砂壶，都不是世界承认的硬通货。近代艺术和当代也是如此。西方人也会承认齐白石贵，但不会承认齐白石的艺术价值。

第三，中国艺术市场目前正处于一个较冷的状态，跌得很厉害。与其他一些领域相比，艺术市场的泡沫倒还不算严重。尤其是一些艺术史上有价值，又超越一般老百姓欣赏能力的东西，价格还是被低估。

第四，中国艺术品市场与其他奢侈品、珠宝玉石市场并没有绝对的分割。中国艺术品市场，主要是北京、香港、上海，规模大约是6: 3: 1，其他城市都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在北京可能会高估这个市

场，在上海或其他城市会低估这个市场。而很多小地方，因为一些特殊石头、木头形成特定市场，也颇值得关注，比如广东揭阳的翡翠市场，福建仙游的红木市场，云南瑞丽的琥珀市场，四川凉山的南红玛瑙市场，湖北十堰的绿松石市场，苏州的和田玉市场等等。比如可以考察一下深圳的大芬村市场，已经有不下3本人类学著作研究了这个世界。■

资本观察

一力降十会，剑劈戈登结

作者：楼晟

徐翔折戟，泽熙沉沙无疑是现下中国资本市场中最大的事情，其影响甚至可以超过不久前的央行双降。对此，有人叫好亦有人哀叹。客观的说，不能因为此间事发，就把徐翔以及他的泽熙近年来独步中国资本市场简单归结于利益输送和内幕。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随着这个时代的落幕，他的进退和成败也早已游离出了个人能力的高下。

武术上有句话叫一力降十会。指招式再好，也得有力量基础才行。亚历山大远征波斯时挥剑斩断戈登死结也是同样的道理。即对于那些盘根错节的死局，不能纠结其中，只有靠引入外力的强力介入，用掀桌子、推倒重来的方式才能解开。中国资本市场走到今天，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段：89-03年为第一阶段，只是作为一个为特定政治经济目的服务的工具，属于“错了可以关”的“黑户”；03-12年为第二阶段，03年资本市场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作正式拿到户口，从整个体系的临时性补充，变为正式的一环。而12年迄今，是向第三阶段发展，要从经济金融体系的一个环节，向经济金融体系的核心演进。而徐翔和泽熙的陨落，则可能变成第二阶段落幕，第三阶段启动的重要标志性事件。

同时，这三个阶段对应的也是中国政经的战术、战役、战略需求。我们知道，战术的核心在于力量；战役的核心在于空间；战略的核心则在时间。笔者以为，当下的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此前的战役战略目标，获得了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所欠缺的只剩破局的力量和魄力。这就像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数年来去迎合欧美设置的条条框框，都不如8月份央行出手抛美债，SDR就到手了。一直以来，我们会奚落那些体制的拥趸们为“大棋党”。之所以对所谓的“大棋”会嗤之以鼻，并非是因为构思的不精巧不细致，而是因为这种一厢情愿的取巧，往往任意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满盘皆输。正如我们在感慨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出手的快狠准的时候，不能忘记这是因为俄罗斯这头瘦死的骆驼的体量已经大幅下滑，这才使得他有了投机的空间，而他不论怎么投机，都难以阻止其整体下滑以及处于守势的格局。以当下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占比，已经不需要取巧也难以取巧，最佳策略就是没有策略。只要居正守拙的靠吨位和体量挤压，就能达到与其地位相符的政治经济目标。就如中国的能源供应布局，在俄罗斯、缅甸、巴基斯坦、泰国克拉地峡、中亚哈萨克、马六甲这些选项上，因为中国的巨大体量，从而是并行不悖的。其中任何一个达成，即可宣告成功，相关方难以有待价而沽的空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伊核协议达成后，缅甸方面立刻大赦释放了此前被判20年的155名中国伐木工。

同理，这次股灾所导致的资本市场变数，反而会大大加速中国资本市场进入第三阶段的速度。这次事件的影响太过恶劣，痕迹太过明显，最高决策层已经别无选择。举个未必恰当的例子，这就类似“美丽岛事件”，据说当时国民党党内高层是以“覆血难收”“毕竟我们还是要在哪里待下去”为理由劝谏蒋经国，从而使涉案者得到从轻发落。可结果却是从美丽岛事件开始，台湾政局开始走向失控与意识形态崩溃，成为其被同为四小龙，且历程类似的韩国、新加坡拉开距离的开始。■

农民工观察

解析珠三角工业区的电动车载客现象

作者：巩高兴

中国的社会底层主要在三个行业求生：工厂、建筑工地及以餐饮零售为主的服务业。而他们主要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户籍人口，来自内陆及西部。当然也有例外，如广东这个经济发达省，他所属的梅州茂名韶关湛江地区的农村户籍人口多半在珠三角打工。

本文讲述的是政府及部分民众眼中的，外来底层民众从事的非法职业中的一种，即载客谋生者，主要以私家车、摩托车及电动车载客谋生的行为。低档轿车已进入外来工这样的寻常百姓家，如外来工租住区的楼下晚上会停满车。只要夫妻双双打工，省吃俭用三四年就可以买辆七八万的国产车。但他们买车主要是用来赚钱而不是代步，如我所在车间组别二十来个人，两个同事家里就有车，其中一个同事的丈夫下班之后去拉客，另一个的丈夫专职拉客。在政府的严厉打击下，珠三角摩托车几乎绝迹，但也有例外，如你坐大巴经东莞过塘厦，就会发现，一有乘客下车，就会有摩托车仔围过来问你坐车不。而电动自行车及电动三轮车载客应该是珠三角地区的一大特色，我这里重点讲述。

电动车拉客者当然是外来人口，以四十岁以上年龄的男性为主，也有少数女性。主要是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不容易在工厂找到工作。工厂招工有年龄限制，所以前几年瞎咋呼的用工荒，是工厂主设定条件下的用工荒，而非真正的用工荒。以地域论，从业者中四川人与河南人比较多，户籍人口最多的两个省份，所属人口生存压力大，用尽一切心思与手段谋生。

电动车服务的人群也是外来工，因为我所暂住的东莞的户籍人口中，无私家车者甚少。有则信息这样说，东莞户籍人口人均GDP已达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电动车载客者有专职与业余之分，专职的，整天不是徘徊在街头，就是在大商场大型工厂外，十字路口公交站台等客。业余的就是早上上班前或晚上上班前，早上下班后及晚上下班后赚些外快。他们多备有两块大功率蓄电池，有些专职者既有电单车也有电动三轮车，按情况交替使用，热天坐电单车凉快，凉天坐三轮的舒服。在工业村里，也存在配套服务载客者的店铺，有出售电动车及电池的，有给电动三轮车加盖棚子的。而乘电动车的花费，以我的经历为例说明之，有次赶着上班，平时步行二十分钟的距离，电单车收费五元。花两元坐公交车所走的路程，收费十元。有次坐大巴去广州火车站，傍晚遇堵车，为了赶四五分钟的时间，收费十元的电动三轮车把我送到车站广场。

当地政府打击载客行为，部分民众主要是私家车主反感拉客者，所以政府的打击理由就是扰乱交通秩序及易出事故。政府对违规电动车载客的对策有抓捕与禁绝两种。对工业村的载客现象，相关部门不定期进行抓捕，但拉客者与他们打起了游击战，来就跑，走就来，工具被没收再买一辆。而在镇区严厉打击，看不见拉客者，镇区是脸面嘛。此现象不能禁绝，有两个原因，一为当地公共交通不发达导致的外来工出行有需求，如车次少，收车早。以我所在镇区为例，多数公交要等二十分钟左右，个别要等四五十分钟，晚上九点收车。遇上节假日，难得休息的外来工海量出行，运力不够。另一原因则是政府睁只眼闭只眼的原因吧，毕竟赶尽杀绝，无路可走，会导致铤而走险，社会治安会恶化。

最后以我认识的拉客者为例，讲述电动车拉客者的生存现状。我有个80后的河南籍同事，目前的月收入是四千多，老婆在家里带两个孩子兼务农，他会在白班下班后或夜班下班后及节假日用电单车拉客赚钱补贴家用。他给我说，运气好的话，早七点下班出去拉到十点会有二三十的收入，节假日运气好的话，会有一百多的收入。他还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每月给某个打击者二十元的信息费，抓捕前他会提前通知。还曾遇见过一个四十多岁的河南籍女性，进我所在厂之前就在用三轮车拉客，在厂里做了半年后辞工（东莞普通工人一天上十一个钟，一周休一天的话会有三千七八百块的收入），又重操旧业，他们夫妻俩都在拉客，而他的一个女儿在工业村的超市里的散装食品区做营业员。另外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四川籍同事与上面的女同事的经历一样，同事称呼他老高或大叔，电单车与电动车各有一辆，他老婆因慢性病闲居在租屋，儿子未成年，却在小加工厂找了份活干，女儿二十岁刚出头，与男友未婚生子，因关系合不来，丢下男友与小孩后投靠父亲，他们一家四口挤在租来的一房一厅里。在经济发达地区，外来的低学历的农村户籍人口，谋生不易。如政府不帮扶，起码不要打压这个群体的求生之道，其他阶层的人，也应该宽容体谅之。■

公民社会与互联网观察

媒体的新陈代谢

作者：宋宇

传统媒体的忧和喜

媒体的困境是全球性问题。困境与互联网的发展相关，广告向互联网转移，内容往往呈现在智能手机屏幕上。同时，技术变化带来了新闻阅读方式的改变，大家即便对长文章有耐心，也很难集中注意力通读。

近两年，《纽约时报》、BBC等知名媒体以裁员、调整管理结构等方式，努力适应互联网环境。2015年中振奋人心的消息，包括《金融时报》的“东家”从培生集团转为日本经济新闻社。相比此前的《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等一系列媒体交易，8.44亿欧元（约13亿美元）的价格相当可观。

FT本身与传闻已久的绯闻收购者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在媒体数字化转型上都颇有心得。后者作为德国媒体巨头，2014年的数字收益超过16亿欧元，占到53.2%，旗下大报《世界报》《图片报》也建立起“收费墙”制度。

针对特定用户群体的小而美的数据库，也成为新兴媒体的一种形式。比如关注公众利益的Propublica，办公室就设在华尔街旁边，2010年成为首家获得普利策奖的网络媒体，生命力至今仍旧旺盛。

《经济学人》的逆势上扬，被视为传统媒体的奇迹。这份“报纸”曾表示不会出版中文版，但后来开设“中国”栏目，创办“经济学人集团”微信公众号。最后，它在4月推出全名《经济学人·全球商业评论》的“商论”app，事实上已经在事实出品中文版。

而重要的新媒体代表《赫芬顿邮报》，有进军中国的趋势。不过，它的本土化前景，究竟能带来多大“鲶鱼效用”，都尚不明朗。

中国媒体转型也在进行，但整体形势可能比西方世界滞后几年。

前媒体人、小米公司副总裁陈彤援引的中国广告协会数据显示，2015年前五个月，几大类型媒体的广告都有所下降。报纸广告降幅最多，32%，杂志不少，网络电视情况相对较好。发行量数据方面，报纸下滑37%，杂志将近6%。

“收费墙”是传统媒体可行的收入增长渠道，有助于降低广告在收入中的比重。但在国内，收费阅读并未受到广泛认可。在这方面，视频网站可以引为参照。

12月3日，爱奇艺创始人、CEO龚宇宣布，该网站付费会员数在1日突破1000万。按照媒体的算法，以其每月20元的收费标准计算，爱奇艺每月营收因此将增加2亿元，这也可以减轻广告份额的压

力。

2015年第三季度的百度财报表明，“爱奇艺将运营利润率拉低了5.4个百分点”，则百度视频业务该季度的亏损为约10亿元（1.56亿美元）。

近期，百度CEO李彦宏形容，百度旗下的视频网站爱奇艺，在五六年间“每年都在赔钱，可能每年亏损的幅度都变得更大”。其背景是中国在线视频业务体量的不断扩大，李彦宏也表达了乐观态度。

微信上的“自媒体”

传统媒体的“传统”二字，已经变得很模糊。出现不足十年的微博，已经算不得“新媒体”，更不用说门户网站。

无论在微博还是微信，因为需要考量流程与制度，机构账号面临着更大的僵化风险。而主要以个人账号形式出现的“自媒体”，则更为多元，趣味可能更加贴近普通公众。

此前的微博，现在的微信，都能体现这种境况。

依照腾讯给出的数据，截止2015年一季度，微信已经覆盖中国 90% 以上的智能手机，月活跃用户达到 5.49 亿。目前，而微信公众号的数量也突破了1000万个。

因为微信支付的应用已经相当普遍，“赞赏”功能是对作者最简便直接的财政支付。其判断依据是用户自身是否对文章产生共鸣。当然，得到“赞赏”多，与文章本身好坏并无正相关关系。

一些较受欢迎的微信自媒体，可以直接发布广告，或者发布符合自身特色的“软文”。后者的例子，包括公号“假装在纽约”及一些电影类公众号。

“自媒体”的运营者，很多都是前媒体人。考虑到内部分工，媒体经营状况等诸多因素，媒体工作实际上相对优越。而转换工作方式，甚至创业，可能意在更大程度满足自己的成就感，提升生活水平。

为了维护公众号的生态，微信方面制定了关于版权、内容、运营等多方面的规则，不可谓不努力。

但是，无论公众号，还是范围更广的“自媒体”，实际上还是无法自然而然地生产优质的内容。而且，因为商业利益等原因，这个平台具有局限性。“经济观察报书评”“世相”等广受欢迎的公众号被莫名其妙地关停，以及网易云音乐一度无法通过微信分享，都是例证。

今年媒体行业的大事还有很多，包括阿里入股多家媒体，乃至收购香港《南华早报》，“端传媒”成立，以及“今日头条”的持续强势。机会当然有，但需要继续观察和努力。■

边疆观察

文明冲突背景下的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增长

作者：王明远

摘要：新疆维吾尔族人口是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民族，而新疆的汉族已经提前进入负增长。预计到2050年，维吾尔族人口将增加到2000万左右，将成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新疆汉族人口则降至600-700万，新疆汉族人口比例将下降到20%左右。在人口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冲击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负增长现象尤为严重，兵团体制难以维系，一些传统上汉族人口优势的城市的民族结构也正在发生改变。如果继续维持现行的刻板的治理政策，缺乏战略规划，新疆的地区稳定和中央关系走向都将是变数。

我国愈发严重的人口增长颓势已经引发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人口的意义不仅在于经济，人口还是文明的最重要载体，人口多寡直接关乎文明力量的消长。一个国家人口的增长态势，会影响该民族在世界影响力；一个国家域内民族人口增长的不平衡，也往往导致政权变迭，甚至国家分裂与战争。亨廷顿作《文明的冲突》与《谁是美国人》就是出于这种担忧。

中国学者探讨苏联解体的根源，过多从制度因素去检讨，如果从更深层次文明角度看，苏联崩溃更是俄罗斯文明主导东欧、中亚文明秩序的崩溃。由于超低生育率，作为“帝国轴心”的俄罗斯族人口比例持续减少，苏联解体前夕已降至50.6%，濒临成为苏联的“少数民族”，随着人口的减少，单靠俄罗斯族已经无法维持国家机器¹，加上少数民族经济、教育现代化的同时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帝国”的分崩离析也就不可避免。

1990年年代初南非白人政府放弃种族主义，既可以看做是民主、正义的胜利，也可以看做是白人比例持在40年内减少了几几乎一半，导致“白人专政”无法维持的结果²。2008年美国大选出现了第一个黑人总统，本次大选共和党拉丁裔Rubio呼声颇高，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也要选择拉丁裔Castro做竞选搭档，这都反映了少数族裔人口壮大对美国传统政治格局的冲击。

表明上看，中国的人口少子化、老龄化不会带来“文明冲突”问题——汉族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从94.2%降至91.5%），但一直是绝对多数，未来这种格局也不可能被打破。然而，汉族虽多但分布不平衡，占国土面积多数的黑河腾冲线外侧汉族人口不占优势，甚至是劣势，另外，人口的少子化只表现在汉族、满族、朝鲜族等个别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西部少数民族长期保持每年2%—3%的高增长率。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人口只是增加了3000万，人口比例仅上升了2.7%，这些数字对全国来说

¹ 苏联成立初期，苏共党员和苏军中俄罗斯族均占85%以上。然而，到苏联解体前夕，苏共中少数民族党员数量达到40.2%，最后一届部长会议主席、副主席15人种有7人是少数民族；苏军中少数民族士兵比例达36%，苏军中民族派别林立是苏军在苏联解体中无所作为的主要原因。

² 南非白人的比例在1950年约21%，1990年降至12%，下降了将近一半。1990年白人人口增长率下降为0.7%，黑人增长率高达2.5%。（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South_Africa）

是无所谓的，但是在占国土面积多数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混居区域，人口的消长是很明显的，在很多地方，民族的人口对比已经发生逆转。

因此，中国人口危机（本质是汉族人口增长危机），亦有导致文明冲突的可能，那就是汉文明力量对边疆的控制力是否会减弱，并且是否会引起现有疆域的变化，这是现实问题，也是在阶级斗争决定论思维长期影响下的中国学界，长期忽略的问题。

新疆“文明冲突”的可能性

新疆是少数民族增长最快的一个省份。建国以来中央有意塑造的民族均势，现在逐渐被打破，人口优势的天平逐渐倒向少数民族一方。随着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增长，少数民族与占据资源优势、人口处于少数的汉族的对抗加剧是不可避免的。

新疆是中国唯一穆斯林占多数的省份，换言之也是中国唯一由性质完全不同异种文明统治的省份。而且近年来，伊斯兰四大教派中最为保守的瓦哈比派对新疆穆斯林影响越来越大，该教派对外来文明有较强排斥性，这使得新疆少数民族增长带有更明显的“文明冲突”的意义。

全球文明冲突中，穆斯林与周边民族的冲突时当今的主要话题。穆斯林与其他文明的冲突，不仅表现在穆斯林与基督教文明民族的冲突，在全世界所有汉族与穆斯林共处的区域都发生过“文明冲突”。比如马来西亚建国六十多年来，始终秉持“排华”、“马来人优先”为国策，不仅在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限制华人，甚至发生针对华人的严重暴力事件，1969年“5.13事件”导致近200名华人死亡。2015年9月发生马来人打砸华人聚居“茨厂街”事件则为近年民族矛盾的缩影。印尼华人与土著的“文明冲突”则更为严重，1960年“9.30事件”导致4000多名华人死亡、1998年雅加达骚乱导致1000多名华人死亡。³

新中国六十年民族人口形势的逆转⁴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大规模移民的原因（仅1958年就有62万移民到达新疆），新疆汉族比例由1949年的6.72%，上升到1978年的41.6%，人口数量由29万，增加到512万；而维吾尔族的比例由75.9%减至45.1%，人口从329万，增加到555万。这三十年的总体趋势是汉族人口比例的剧增，与维吾尔族人口比例的急剧减少。

1979年到2000年为第二阶段，期间汉族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不敌维吾尔族，但是由于相当数量内地移民带来的机械增长，汉族和维吾尔族基本保持了相同增长速度。这22年维吾尔族人口数量由555万增长到852万，增幅为53%，汉族人口由512万增加到725万，增幅为41%。汉族的比例基本维持在40%上下，维吾尔族比例维持在45%。

2001年以来为第三阶段，其特征是汉族人口发展阶段已经接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

³ 这与亨廷顿所认为儒家文明会与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基督教文明的情况是相反的。在政治层面，可能出现中国政府同伊斯兰世界国家政府合作对抗美国的情况，然而在文明层面，华人很难融入穆斯林社会，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却都较好融入当地社会。

⁴ 新疆少数民族人口中，穆斯林民族人口总数占97%，尤其是作为新疆主体民族的维吾尔族占少数民族人口的78%，又由于维吾尔族在新疆影响力最大，因此，本文主要讨论维吾尔族人口增长问题。

现代型，而维吾尔族依然处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传统型。同时，内地汉族移民数量也大幅减少，汉族与维吾尔族人口差距开始拉开。

2001年至2014年，维吾尔族增加了275万，达到1127万；而汉族人口仅增加了134万，达到859万。维吾尔族人口比例上升到48.5%，汉族下降到37%，双方比例差距由最低点3.5%扩大到11.5%。尤其是2008年以来维汉人口增长的差异更明显，2009-2014年间维吾尔族增长了144万，平均每年增加24万，汉族只增加了23万，平均每年只增加3.8万。

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同“五普”相比，维吾尔族人口增加了19.88%，在全国100万以上的民族中，维族人口增幅最高。2000年-2010年维吾尔族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约1.7%，大致相当于世界增长率排名60名上下的塔吉克、苏丹、柬埔寨的增长水平，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很高的。维吾尔族集中的喀什、和田、吐鲁番、阿克苏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2%左右，南疆个别县达到3%。受计划生育政策松动、民族传统生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维吾尔族仍将中长时期内保持较高速度增长，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另一方面，汉族人口在近几年已经开始了负增长。如果按照新疆“六普”数据，新疆汉族人口在2010年达到顶峰874万后已经开始负增长，到2014年已经净减少15万；而按照新疆政府工作报告数据，2013年达到顶峰860万后开始下降，2014年负增长0.55万。无论哪种统计口径汉族人口都开始提前比全国进入负增长。这次下降不同于1980年前后知青回内地造成的汉族人口短暂减少，完全是自然结果，是未来的长期趋势，这是在新疆人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情。

表一：建国以来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人口增长情况

年份	维吾尔族人口 (万)	汉族人口 (万)	维汉人口差值 (万)
1949	329	29	300
1954	366	47	319
1959	397	161	281
1964	402	244	158
1969	453	371	82
1974	514	466	48
1979	564	521	43
1984	617	534	83
1989	682	553	129
1994	769	616	153

1999	825	687	138
2004	897	780	117
2009	1001	841	160
2014	1127	859	268

未来新疆人口结构的预测

在决定人口增长潜力的几个关键指标上，汉族都远远落后于少数民族，因此，未来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差距将持续扩大，到2050年汉族人口比例将缩小至20%左右，而维吾尔族比例将上升至60%左右。

(1) 育龄妇女数量。“六普”数据显示，维吾尔族15-49岁育龄妇女总量为291.6万人，其中黄金育龄期（20-29岁）妇女人数为107.4万人。而新疆汉族育龄妇女为264万人，黄金育龄期妇女有57.1万人，仅为维吾尔族该年龄段妇女的53%。预计到2030年，维吾尔族黄金育龄妇女为87.5万，汉族黄金育龄期妇女将减少到33.6万，占维吾尔族的38%。

(2) 总和生育率。即育龄妇女在生育期内平均生育子女的数目，是反映未来人口出生规模的重要指标。根据“六普”数据，新疆汉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18；而维吾尔族生育率虽然由90年代初3.8下降到目前的2.2，但是仍然远远高于汉族。尤其是在维吾尔族人口占多数的南疆，总和生育率仍然在2.6左右。

(3) 0-14岁人数。代表未来人口的发展潜力。维吾尔族该年龄段人数约260万人，占全部人口比例为25.9%，是全国100万人口以上民族中比例最高的。而新疆汉族0-14岁人口仅有118万，比例为13.3%。汉族0-14岁人口数量，仅为维吾尔族的45.3%，仅大致相当于喀什地区一地的该年龄段人口数量（105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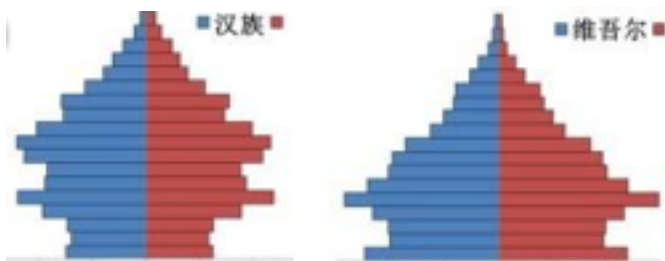
表二：“六普”全国100万人口以上民族生育率、增长率及14岁以下人口比例

民族	人口数（万）	0-14岁人口比例(%)	生育率	两次普查间增幅（%）
全国	133281.1	16.6	1.181	5.84
汉族	122084.5	16.1	1.138	5.74
壮族	1692.6	20.3	1.591	4.62
回族	1058.6	21.2	1.478	7.84
满族	1038.8	16.9	1.176	-2.76

维吾尔族	1006.9	25.9	2.035	19.88
苗族	942.6	25.5	1.819	5.43
彝族	871.4	27.2	1.819	12.27
土家族	835.4	22.5	1.744	4.06
藏族	628.2	25.6	1.602	15.99
蒙古族	598.2	19.7	1.261	2.89
侗族	288.0	22.6	2.023	-2.71
布依族	287.0	26.5	2.041	-3.41
瑶族	279.6	24.0	1.926	6.01
白族	193.4	21.1	1.436	4.06
朝鲜族	183.1	8.4	0.597	-4.83
哈尼族	166.1	23.1	1.585	15.87
黎族	146.3	22.9	1.718	17.25
哈萨克族	146.3	23.8	1.852	16.96
傣族	126.1	20.1	1.449	8.83

汉族和维吾尔族人口极不对称的人口增长潜力，近年已经显现出来，据“六普”对2009年11月1日至2010年10月31日之间新疆新出生人数的统计，全区27016名新生儿中，维吾尔族16692人，汉族6072人，哈萨克族2242人，回族1310人。汉族新生儿仅占全区出生人数的22%。如果不考虑人口迁入迁出外的因素，这基本反映了一代人之后的新疆民族人口比例。

图一：汉族与维吾尔族人口金字塔结构（依据2010年数据）



根据不同的预测（田雪原、华东师范大学课题组、原新等），维吾尔族人口高速增长将持续到

2035年左右，届时维吾尔族人口将达到“六普”的1.6倍左右，即1600万左右。喀什、和田两地人口就有可能达到近千万。之后维吾尔族仍然能保持0.8%-1%左右的自然增长率（相当于1990年前后汉族人口增长水平），到2050年，维吾尔族人口规模会达1800万-2000万。届时，维吾尔族将可能成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表三：喀什地区人口发展预测（上海市援疆项目，华东师大人口所承担，2012年）

年份	2014	2020	2025	2030
高方案（万人）	439	509	564	611
中方案（万人）	434	493	556	597
低方案（万人）	428	481	550	593

注：根据喀什地区2014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当年人口达到448万，仅仅用了两年就比高方案多出9万人，因此，即使是高方案也很可能低于未来实际数量。

如果考虑新疆其他主要少数民族。目前，哈萨克族、回族人口增长率略低于维吾尔族，按照到2050年这两个民族人口增长60%计算，其人口分布为242万、158万。柯尔克孜族人口增长率略高于维吾尔族，按届时人口增长100%，人口将达到38万左右。那么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将达到2250万-2450万左右。

新疆汉族人口推算则比照全国总体水平，按照最近预测全国人口在2017年即达到顶峰开始下降，2050年全国人口按中方案大约在12.1亿，约为2014年中国人口的89%。那么新疆届时汉族人口约764万。如果考虑到新疆汉族0-14岁比重低于全国1.7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老龄人口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的因素，新疆汉族人口届时更低可能在600-700万左右。仅相当于维吾尔族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汉族占新疆的人口比例也将下降到20%左右。

地区安全局势对新疆汉族人口迁徙的影响

以上人口数量的推算都是建立在新疆保持和平稳定的前提下，然而近年来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恐怖暴力事件频发，这也会影响新疆人口的流动，尤其汉族人口的流动。

就新疆内部讲，近年来南疆的汉族人向城市集中，在农村作为“少数民族”的汉族人越来越向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大城市集中。在城市内部，民族的分化居住也越来越明显，90年代以前民族混居很普遍，然而，近年来汉族人聚集而居以求安全感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另外，新疆近年来局势的不安，也促使更多的汉族人向内地回流。目前，汉族人往内地迁徙的群体主要有两类：一是，很多年轻人对新疆前途悲观，他们去内地求学、求职或经商；二是，六七十年代进疆的第一代移民到达退休年龄，其中很多退休后选择回内地养老。根据“六普”，居住在内地的新疆户籍人员有39万人，除去有可能统计在内的5.4万人维吾尔族在内地常住人员，约有30万人以上新疆汉族常住内地。这个数字还很可能远远被低估，仅兵团2010年外出半年以上人口就有50.5万。同时，

“六普”数据显示新疆是各省区人口迁出比最低的，即使是最发达的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迁出人口比都高于新疆，这个数据是与新疆社会经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

另一个现实是新疆人口统计中，包含192万外来人口。他们来新疆的主要是为了简单的谋生，如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者局势动荡带来经济恶化，他们往往会选择返回内地。比如，2009年“7.5事件”后，就曾经发生数万汉族群众滞留在乌鲁木齐火车站，抢票回内地的事情。

近年来新疆越来越不乐观的局势，已经改变了部分城市的人口结构。阿克苏曾经长期是南疆唯一一个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大城市。2005年，汉族有34.8万人，占总人口的59%，而到2013年，该地区汉族人口数量下降23.5万，比重下降到46%，而维吾尔族人口比重上升到54%。伊宁市“汉人街”曾经是汉族人口较多的区域。1997年“2.5事件”，“汉人街”是骚乱的中心地带之一，事件平息后，这里的汉族人口陆续迁出，“汉人街没汉人”已成为事实，都来提巴格街道办事处辖地即为汉人街，2010年该街维吾尔族居民占到91.6%，实际在此居住的比例可能更高。

地区政治变化引起的民族结构变化是普遍现象。移民群体通常有更强的危机感与不安全感，一旦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丧失，或安全受到威胁，他们往往选择返回原籍或者移民到其他地方。这是世界文明冲突中，这种因素对新疆未来人口结构的影响值得认真研究。

表四：战争、民族独立等引起的民族结构变化

地区	事件	人口变化情况
哈萨克斯坦	脱离苏联独立	俄罗斯族占比例由38%（1991年）降至21%（2014年），大约300万俄罗斯族离开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族比例由40%，上升至66%
乌克兰	脱离苏联独立	俄罗斯族比例由22%（1989年）降为17%（2001年），人口数量减少约300万。
俄罗斯车臣共和国	车臣战争	车臣共和国俄罗斯族人口比例由23.1%，降至3.7%（1989年），车臣族比重由57.8%，上升至93.1%（2002年）；
俄罗斯印古什共和国	印古什战争	俄罗斯族由23.1%，降至1.2%（1989年），土著印古什人由12.3%升至77.3%（2002年）。
科索沃	科索沃战争及独立	塞族人比例由10.1%（1991年），降至1.5%（2011年）。
南非		超过50万白人离开南非，白人比例降至8.7%（2014年）。

莫桑比克	独立运动及土改	白人数量由27万减少至3.6万
蒙古	外蒙古独立	独立之初汉人数量有10万左右，约占外蒙人口的15%，到40年代，外蒙汉人几乎绝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维持更加艰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是新疆稳定的支柱之一，下属14个农垦师遍布天山南北各战略要地。改革开放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从“兵农合一”的准军事组织，退化为“军政企合一”的特殊经营组织，逐渐丧失以往的军事功能。然而，由于人口少子化、老龄化的冲击，兵团作为经营组织的地位也渐渐发生动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全国人口增长形势最严峻的省级行政建制。六普数据显示，兵团十四个师中，有4个师人口负增长，有6个师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1，最低的农二师仅0.62。（世界总和生育率最低国家新加坡为1.1）。同时，兵团老龄化程度又最深，2014年兵团在职职工有71.4万，而退休人员有57.8万，抚养比为1.23，远远低于全国2.9的水平，并且，退休人员以每年将近1.6万人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23年退休人员将会超过在岗人员。

由于超低的生育率和人口的严重老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劳动力不得不主要依靠外来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来填充。“六普”显示，2010年兵团常住外来人口达到54万。如果加上短期流动人口，除了农二师，各师外来人口都在8万人以上。

兵团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也达到37.7万（比重14.5%），尤其是镇守南疆的农三师（少数民族比例56.1%）和农十四师（少数民族比例64.3%）已经变成少数民族为主的单位。

兵团一直被认为是巩固边疆的“堡垒”，主要原因在于兵团基本上是由汉族组成的组织严密、成员稳固的，如今既有的编制结构基本被流动人口冲散；在南疆地区“掺沙子”意义明显的农垦师民族成分也发生改变，其“堡垒”作用也就大打折扣了。

南疆人口外迁对汉族传统多数地区人口结构的冲击

目前南疆维吾尔族人口占全部维吾尔族人口的，而南疆以农村居民为主的维吾尔族生育率远远高于北疆以城市居民为主的维吾尔族。因此，未来南疆人口的增长主要表现在南疆维吾尔族人口的增长。近年来，在环境、就业压力下，南疆劳动涌向经济发达的乌鲁木齐、阿克苏、库尔勒等汉族占优势的城市，在给这些城市经济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在渐渐改变这些地方的人口结构。

阿克苏市近年维吾尔族人口数量开始超过汉族，如果加上11万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维吾尔族人口比例已经将近60%。库尔勒市有户籍人口56.8万，其中汉族约38.5万，维吾尔族约16.4万，然而，该市外来常住人口达38.6万，多数来自南疆喀什、阿克苏、和田地区，如果加上外来人口，库尔勒市少数民族人口可能已经超过汉族。乌鲁木齐市户籍少数民族人口在“五普”和“六普”间增加了51%，少数民

族流动人口占比也由1990年的4.5万人（占比17.6%），上升到40万左右（占比35.4%）⁵，目前乌鲁木齐少数民族人口已经达到120万左右。

摒弃种族主义人口优势思维，创造包容性制度来应对“文明冲突”

近年有中国社科院学者提出“大力组织汉族移民，再造南疆人口结构”的建议，这种思想带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已经为文明世界所唾弃，并且在实际中也不可行：第一，内地劳动力愈现短缺，不可能出现五六十年代富余劳动力涌向边疆的情况；第二，市场经济下，劳动力流动更受市场的左右，政府对已经没有力量组织大规模的政策移民，而新疆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有限，也不会吸引大量外来人口。

也有学者提出建设“融合型社区”，每个社区都配备一定的民汉比例，以期加强民族交流与融合。这种想法亦是空想，如果民族间文化隔阂不消除，各民族在混居中，只能激化已有的民族矛盾，制造“全面内战”。

无数世界先例证明通过限制人口或移民处理民族问题无一不失败了，只有像美国那样创造一个包容各文明差异的制度，利用制度化解冲突，并塑造新的文化认同才是行之有效的道路。■

⁵ 《乌鲁木齐维吾尔族流动生存和发展人口调查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边疆观察

朝鲜战争中参加联合国军的维吾尔人

作者：李永峰

因为伊斯兰国（ISIS）的冲击，在伊拉克与叙利亚之间，目前已有大量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拥有武装力量的团伙在此割据称王，四处混战。不同的团伙拥有不同的背景，有接受基地组织领导、有响应ISIS号召、有基于对抗暴政的追求，也有浑水摸鱼，来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想法的人，在这里组成了不同的武装势力。最近，中文世界注意到，这些武装势力中也有中国人，特别是有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

近两年以来，因为新疆形势紧张，大量维吾尔人外逃（《近期维吾尔人偷渡出走现象初步观察》，第八期《观察报告》），逃亡者很多去了中东的冲突地区。其中男性，不乏加入当地武装者，而且人数众多。有多少呢？据「东伊运」核心人物亚甫泉说：「叙利亚的维吾尔人数足以开战，有人说有2千多人，但是我知道比这个数目多。」（侍建宇：《「东突」一号人物：去ISIS不是我们的目的》）。而且，这些维吾尔人会“为东突独立而战斗”。因此，对于当前新疆局势来说，海外维吾尔人武装力量的存在，必然会是一个新的挑战。

其实，海外维吾尔人的武装力量，并不是从叙利亚开始，也不是从「東伊運」与基地组织结盟之际的阿富汗开始。海外维吾尔人的武装力量可以上溯到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对于海外维吾尔人的命运，具有转折性影响。

土耳其旅中的维吾尔军官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人民军的坦克突破38线向南进攻，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马首是瞻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出于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忧，当时，不同的国家分别根据自身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选边站。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3号决议，“建议联合国会员国给予大韩民国以击退武装攻击及恢复该区内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需之援助”，朝鲜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由此而诞生。

在过去几百年来，与俄罗斯爆发多次战争的土耳其，当时正谋求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所以迅速响应联合国军的提议。7月18日，土耳其总统杰拉勒·拜亚尔（Mahmud Celal Bayar）与军方高层人物，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亚洛瓦（Yalova）温泉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绕开大国民会议（Grand National Assembly of Turkey）直接派遣军队参加联合国军。土耳其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决定派地面部队参战的国家。很快，7月25日，一支步兵旅组建完毕，包括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以及工兵、军械、运输、医务各一个连和通讯排等支援部队，共计军官259人、军士395人、士兵4414人、文职人员22人，合计5090人（陈迪宇：《土耳其与朝鲜战争 参战原因及影响》）。10月17日，这支土耳其部队抵达韩国釜山港，因为土耳其军人粗犷的外表、飘逸的胡须、随身的匕首，受到战地记者的喜欢，“土耳其旅”在当时的媒体上引发轰动。

在这支“土耳其旅”中有一位炮兵中尉，名字叫贝肯（Mehmet Rıza Bekin），他生于新疆和田，他舅舅是穆罕默德·伊敏（Muhammad Amin Bughra），为第一次东突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在东突组建的“东突厥斯坦和阉伊斯兰政府”被马仲英镇压之后，伊敏带着贝肯的家人，以及数千名追随者逃离新疆，先后在印度、沙特阿拉伯、阿富汗等地流亡。1938年，13岁的贝肯和其他东突流亡子弟，前往土耳其读书（Yitzhak Shichor: 《Ethno-Diplomacy: The Uyghur Hitch in Sino-Turkish Relations》, 13p）。贝肯入读的是军事学校Maltepe Military High School，后于1948年加入土耳其军队。

1950年，贝肯作为“土耳其旅”中炮兵军官前往韩国，在朝鲜战场上与中国志愿军兵戎相见。在韩国13个月的战争经验，随后成为贝肯在土耳其军队中升迁的基础。毕竟，朝鲜战争是土耳其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唯一的战争经验，这一经验对于军人来说意义非凡。另一位在韩国服役的土耳其军人凯南·埃夫伦（Kenan Evren），后来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凯南·埃夫伦于1978年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1980年9月12日发动政变组建军人政府，1982年成为土耳其第七任总统。而凯南·埃夫伦在朝鲜战争中的资历，其实远不及贝肯。土耳其旅在韩国一年轮换一次，一支持续到1960年，一共经过了十次轮换。凯南·埃夫伦是1958-1959年在韩国服役，当时参战各方已经签署了停战协议，所以他并没有上战场。

除了贝肯之外，还有哪些维吾尔人在朝鲜战场上与中国志愿军打仗？目前我们缺少第一手的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由于1990年代末期以前，土耳其一直实行全民兵役制，所有20岁以上的男子都要服兵役，包括流亡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所以，加入土耳其军队的其他维吾尔流亡者，应该也会有人前往朝鲜战场。据说在安卡拉，有社团就是由共同参加过的朝鲜战争的退伍维吾尔军人组成。

朝鲜战争对于海外维吾尔人的影响

对于土耳其来说，踊跃出兵朝鲜，不止得以顺利加入北约，也获得了整个西方社会的接纳。此后，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土耳其，在西方社会，也被更多地视为是欧洲国家。而土耳其与中国之间，既是朝鲜战场上的敌人，又是分属两大阵营的对手。与中国的对立，为土耳其接纳更多的东突成员扫除了障碍。

1949年，在彭德怀所率领的人民解放军实现新疆全面解放之前，第二次东突运动的部分领导人，带领两千多人从南疆逃亡到印度喀什米尔。很快，土耳其议会派遣代表与这批人接触。朝鲜战争爆发之后，1951年，当时先后申请流亡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失败，并受到印度政府驱逐的东突领袖穆罕默德·伊敏获得土耳其的接收，定居土耳其。1952年，另一位东突领袖艾沙·玉素甫·阿布甫泰肯（İsa Alptekin）也抵达土耳其。在土耳其拥有更多关系的艾沙，成功通过联合国难民署和土耳其外交部，为更多的维吾尔人定居土耳其创造了机会。1952年，第一批有1850名维吾尔人以“政治避难”的身份定居土耳其（Yitzhak Shichor: 《Ethno-Diplomacy: The Uyghur Hitch in Sino-Turkish Relations》, 15p）。此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在六十年代晚期开始，位于土耳其中部的城市开塞利（Kayseri），成为维吾尔人在土耳其聚居的中心。直到最近，从中国大陆出走，转道东南亚最后前往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大部分还是被安置在此。

东突领袖伊敏和艾沙定居土耳其之后，发现这里与维吾尔人在文化、民族、宗教上都一致，土耳其人对维吾尔人也有同情，同时土耳其政府与中国政府对立。所以他们决定将这里建成东突的基地，他们转换策略，开始通过积极的政治行动扩大他们的影响力。（Yu-Wen Chen: 《The Uyghur Lobby: Global Networks, Coalitions and Strategies of the World》）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伴随土耳其移民向德国

等欧洲国家迁徙，维吾尔人也扩大了他们的网络。德国成为海外维吾尔人的又一个中心。这是另外的话题。

土耳其战俘的谜团

在朝鲜战场上的土耳其军队，因战术较为落后，损失惨重。在第一年的斗争中，“土耳其旅”第一旅的伤亡情况是阵亡747人、受伤2068人、失踪163人、被俘244人，另外还有298名非战斗减员（马儒：《“圣诞攻势”：土耳其第一旅的噩梦》）。在被俘的244名土耳其军的俘虏中，是否有维吾尔人呢？从新疆逃离，最后却又在朝鲜被中国志愿军俘虏？因为朝鲜战争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近似乎一场被“遗忘的战争”，缺少细致的研究，而中国官方也并没有公布战俘纪录。所以对于土耳其战俘中是否有维吾尔人的问题，我们只能当做一个还有待求证的猜想，或者说是谜团。但是中方的一些记录，却也显示了令人惊讶之处。

因为中国志愿军中缺少懂土耳其语的人才，无法与土耳其战俘交流。由参加朝鲜战争的志愿军的军人、后来成为作家的边震遐所撰写的《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一书说，第二次战役中，有100多名土耳其官兵放下武器当了俘虏，但是中国没有懂土耳其语的翻译，而土耳其军人中也没人懂英语。通过军用电讯系统，“总算在新疆伊犁找来了一位懂土耳其语的翻译，名叫马力克，俄罗斯族人。马力克曾经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留过学，回国后在一所高等学校里教书。可惜，他虽然懂土耳其语，但平时只讲俄罗斯语，却不懂汉语，也不懂英语，那怎么办？不得已，又火速从北京俄语学院调来俄语翻译华曼丽配合他工作。”一个马力克适应不了工作需要，“后来又从新疆找来两位既懂土耳其语又懂汉语的翻译”。另据参与对联合国军战俘管理教育工作与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的郭维敬，在《世界第一等战俘营：联合国军战俘在朝鲜》一书中说：“如我在的第4战俘营中有几十名土耳其战俘是后来被俘的，其中有一名军官，懂些英语，据说是土耳其军队中的英语翻译。我志愿军俘管干部无人懂土耳其语，就派一名英语干部专管土耳其战俘，他就是通过那名土耳其战俘英语翻译来实现管理的。”

因为翻译欠缺与中转，志愿军未必了解土耳其战俘的详细背景，而随后1953年交换战俘的时候，所有的土耳其战俘都回了国。所以，土耳其战俘中究竟有无维吾尔人？如果有的话，中方是否掌握这一情况？这些问题都是建立在猜想之上，或许毫无意义，但却也有趣。如果有档案能够公开土耳其战俘的情况，谜团或许可以揭晓。

第二代东突领导人

从朝鲜战场回到土耳其的贝肯，继续在军队中服役，直到七十年代末退役。退役前，他是中部公约组织（Baghdad Pact）的总参谋长。这一组织是由北约所推动成立，正式成员有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土耳其和英国，美国为观察国。该组织是美国为了在中东地区遏制苏联而建立的联盟，但是成效并不明显，被称之为是最失败的冷战联盟。该组织的核心成员伊朗，在1978年爆发霍梅尼革命之后，这一组织很快也便自行瓦解了，贝肯也退役了。

退役之后的贝肯，继续活跃于土耳其政坛，1989-1990年，他作为土耳其总理的顾问专家，参与联合国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救援。贝肯也一直介入维吾尔人谋求新疆独立的工作。1986年，他领导建立了东突基金会（the East Uurkestan Foundation），在世维会（World Uyghur Congress）建立之后，他一直是名誉主席。如果说，伊敏和艾沙是东突的第一代领导人，那么，贝肯毫无疑问是第二代领导人。其中既有他与伊敏是亲戚的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军人，他进

入了土耳其的上层。

中国也一直关注着贝肯在土耳其的影响力。1997年，在伊犁爆发“伊宁二·五事件”之后，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姚匡乙约贝肯一起共进晚餐，并邀请他到新疆访问。但在晚餐之后，姚匡乙提醒贝肯，并不能确定中国官方会有人愿意与他讨论关于新疆局势的问题。所以贝肯的新疆之行也没有成行（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2010年，85岁的贝肯在安卡拉去世。参与朝鲜战争的一代东突领导人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从伊敏、艾沙到贝肯，他们在土耳其所赢得的支持，毫无疑问为后继追求东突独立的维吾尔人创造了条件。这也是直到现在，土耳其一直在介入新疆问题的关键因素。

海外维吾尔人武装力量的存在，对新疆局势的影响，或许不能只从一个维度考虑，那就是只考虑他们是否有能力打到新疆。正如只考虑在土耳其军队中服兵役的维吾尔士兵是否可以挑战解放军一样，并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因为有维吾尔人愿意与土耳其人在朝鲜战场并肩作战，这对维吾尔人赢得土耳其在东突问题上的支持至关重要。现在，进入叙利亚的维吾尔人武装，无论是站在ISIS一边，还是站在叙利亚反政府军一边，这对于未来在面对新疆问题时，他们赢得同一阵营其他武装力量的支持至关重要。还有什么比战场上并肩杀敌的情谊更深呢？所以，解决新疆问题时，中国政府恐怕也需要更多维度地思考。■

觀瀾

第十一期
觀察報告

2016·春分

觀瀾學社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前言

2016年春分号《观澜报告》出版之时，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关于中国经济形势恶化的各种信号不断传来，其他如民族边疆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也在持续发酵，而国家似乎缺乏应对这个形势的有效手段。这样情况下，就更需要思考者来参与观察和讨论。本期报告的几篇文章，正是帮助我们来进行思索和对话。

楼晟的“资本观察”涉及最近一个重要货币政策问题：中国如何应对外汇储备流失。作者指出短期内人民币脱钩美元的目标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已经不可能顺利推进，提出政府应该采取扩大政府赤字的办法，同时利用现有时机让人民币债券在国际交易市场上站稳脚跟，为将来人民币国际化准备条件。本文不仅仅是在思考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当前外汇储备问题的对策，也是在构思在目前的全球金融环境中，中国中长期的货币政策应该是什么。在本文刊发之际，政府已经采取了国内扩大通胀而人民币汇率挂钩美元的策略，情况似乎正是按照作者的思路在发展。那么转变中的国家货币政策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外汇储备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吗？人民币债券能打开国际市场吗？我们拭目以待。

聂日明的“央地关系再调整”追溯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明确总结发展的趋势是中央权力的集中。回头来看，改革开放之后到1994年之前，到底是怎样形成了税赋在地方集中的情况，以至于学界提出中国形成了实质政治联邦制，在历史的语境中就更耐人寻味了。

边疆观察方面，王明远的“近现代‘蒙古’问题”一文在很短的篇幅内叙述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外蒙古是怎么从近现代中国独立出去，而内蒙古又是怎么保留在现代中国版图之内的。对于这个过程的解释有各种争议，但王的文章能自圆其说，给出了一个涉及中苏两大力量对比、蒙古内部各阶级势力消长的多元素解读，非常值得一读。本期报告同作者的另一篇文章，“青海蒙古四论”，考察了在另外一个地理环境中蒙古族人势力的崛起和衰落，展示了作者对蒙古族群命运的广泛关注和总结。这篇文章也讨论了青海蒙古族势力对于藏传佛教派别力量的深远影响，这就和李永峰考察藏传佛教派别的文章联系起来。

李永峰的“达赖喇嘛注视下的革命”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门，进入藏传佛教内部的派别体系和各派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但这文章的意义远不止此，作者进一步阐发：多年来藏传佛教不同派别通过不同策略争取信众（比如噶举派和宁玛派建立的不同信众群体），已经造成西藏问题在发生一些本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继承问题可能演变成世界性的对藏传佛教法脉的争夺（而不仅仅是西藏流亡势力和中国政府对于正宗十五世达赖喇嘛身份的争夺）。这个认识是惊人的！但惊人的结论需要惊人的证据，我们希望看到更细致更丰富的材料和分析来支持作者的观点。《观澜报告》希望这篇文章

只是李永峰对于这个问题的初步讨论，而将来各期报告能继续刊发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持续研究和思考。

“海湾四国访问手记”作者李靖云走访海湾地区的第一手见闻，读者会在这些观察资料中发现海湾国家急于摆脱对油气单一经济的依赖，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还缺乏能直接契合这种需要的“武器”，因为目前中国除了政府补贴下的基建开发以外，主要能提供的还是日用百货（只是制造，连高端销售领域都没能打入），而在高端服务业（包括金融业、法律业）和高端制造业，欧美日本持续着自己的优势，这是中国对外战略下一步发展的挑战所在，又何尝不是国内发展的一个重大难题？

刘舒婷的“中国民间字幕组浮沉十五年”追溯了一种很有意思的民间组织方式——网络字幕组——从2000到2015年间的沉浮。这种民间的能量，在政策和资本控制的夹缝中迎来了高潮，又在管制政策和资本的双重打压下趋于匿迹。这中间经历了字幕组想方设法要和资本结合、希望和政策妥协的努力。怎么来理解这个现象？作者展示了三个最重要的参与者：政府，市场力量和民间团体。字幕组的沉浮，更多的展示了民间团体在其中相对弱小的地位。

李晋和马丽的“记忆__逼迫中的信仰”是一个大的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在本期报告摘选的这个章节中，作者通过国内基督教信徒的口述史，论证如下观点：基督教信仰给信众提供了对抗制度性“恐惧”的力量，而回忆和述说本身也是信众不断强化信仰的方法之一。一个可能的批评是这样的论述还是没有摆脱宗教信仰功利化的基调，无法解释为啥在同样的环境中其他人没有转变为信徒。我们希望两位作者继续和我们分享他们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通过这个前言，我们希望已经部分展示了这期报告内容的丰富和讨论的深入。内容的丰富来源于现实的复杂性和作者们对现实敏锐的把握。历史的发展不会停滞，希望我们的思想也能跟上步调。

“观澜学社”是一个自发、独立、非商业的网络社群。我们关注当代中国历史的展开，我们计划每隔两到三个月公开发布一份《观察报告》，上期《观察报告》的编号是“2015·立冬”，以后也将逐次按照中国农历节气编号。本报告属于观澜学社成员内部交流之用，如需转载、引述，以及任何形式的利用，请与相关作者联系。看到本报告的读者，如有兴趣查阅早期报告，可向guanlanxueshe@gmail.com索取。■

目录

资本观察

楼晟：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外汇储备？ 5

聂日明：央地关系再调整 8

边疆观察

王明远：近现代“蒙古问题”简论 14

王明远：青海蒙古四论 25

李永峰：达赖喇嘛注视下的革命——藏传佛教宗派关系的当代流变 33

本土／国际

李靖云：海湾四国访问手记 37

互联网观察

刘舒婷：中国民间字幕组浮沉十五年 44

公民社会观察

李晋、马丽：记忆__逼迫中的信仰 51

資本觀察

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外汇储备？

作者：樓晟

曾几何时，中国经济还在饱受过热之苦，为弱势美元造成的输入性通胀发愁。却不料时过境迁，如今却在为美元储备可能不足而担忧。那么到底是之前的幸福烦恼是假像呢，还是如今的惴惴不安是杞人忧天？

在笔者看来，两者恐怕都称不上理性客观。其实，中国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的够与不够，并不存在统一标准，而是取决于中国决策当局所期望达到的政策目标的多寡。即如果北京短时间内摊子铺的太大，则不论多少外汇储备都不足，毕竟美联储是设在花生屯而不是三里屯。而如果北京愿意收缩战线，有所取舍，那目前这个外储规模可能还嫌太多。

北京迷失在蒙代尔三角中

蒙代尔三角指的是一国政府不可能长期同时保持货币政策自主（利率为主）、固定汇率以及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而当下北京却同时在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经济结构转型以及防止经济增速出现断崖式下跌三项政策。其中经济转型和防止因为转型导致经济增速出现大幅度滑坡之间存在的矛盾就不用赘述了，这意味在蒙代尔三角中，货币政策自主是必保的底线。而如今单是人民币国际化就已是个大麻烦。人民币国际化本身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人民币国际化或者说外汇储备多元化本质上是北京为了对冲之前美元的长期下行趋势所采取的措施，可如今美元至少中期已进入上行通道，还一味推行之前下行趋势中所做的，以与美元体系切割为目标的人民币国际化就显得迂腐。

本来中国经济就处于转型的阵痛期，需要以货币宽松与利率下行来对冲经济增速下降，从而导致国内整体无风险收益率下行，降低内外息差降低。如果人民币此时再与强势中的美元进行切割，那后果自然就是资本项目下的外流加剧，迫使央行释放的流动性难以进入实体经济，而只能用于对冲外流的资本。同时，不论北京自身的构想或对外口径为何。至少在2005年汇改以来，市场形成的共识是人民币是在变相以美元作为货币锚。即便后来因为08年金融危机而产生的一篮子货币构想，但也都因为非美货币的大幅波动、欧债危机等国际金融事件导致的不确定性而举步维艰。所以，在人民币事实上仍以主要以美元为货币锚的现实下，同时要推动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式的国际化、缓解资本外流对国内宏观流动

性造成的冲击以及保住贸易顺差这个经济转型过程的亮点不倒，就成为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

尤其是在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方针主导下，中美之间就不可能建立类似欧债危机期间美联储和六大央行那样的长期货币互换协议，最多只能借道通过与欧洲央行互换来获得美元头寸。这种隔靴搔痒式的做法在平时或许已经够用，但如果是在人民币开启下行重估的时候，那么再多的美元储备在市场眼里也是不够的，市场只有看到确定性，即中国央行有美联储的直接背书，才会放弃单边的做空，人民币的重估之路才能保证不失控。毕竟仅2015年，中国出境游人次就已达1.2亿，只要每人换1万美元就足让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消耗殆尽。而且，即使北京重新希望加强人民币与美元的联系，在操作上也需要美方的配合。且随着美元储备的持续减少，北京将不得不持续抛售其美元资产以支撑汇率和资本外流，这将使其在金融领域对美方的话语权减少。

政策层的取舍或将马上来临

首先，笔者不认为北京会采取诸如一次性贬值到位这样的昏招，原因在上文已经阐述。即在2005年汇改后，任何所谓一次性的贬值到位都不可能由一纸行政命令达成，只能是在中国央行自己设定的每日浮动空间内波动，否则就等于是重新实施了资本项目管制，而这又是与本币国际化这个政策目标相悖。同样的，如果以急速下跌式的方法来快速跌至所谓合理汇率，贬值预期一旦形成，最终中国货币当局依然需要恢复资本管制来抵挡资本流出。

其次，中国目前既处于经济上的转型阵痛，又处于临近十九大这个政治上的敏感期，维稳的重要性正在重新凸显，此次搁置注册制与删除战略创新板即是这种压力的最好体现。因此中国央行将越来越难让其货币政策兼顾维持国内经济金融稳定之外的其他需求。同时汇率在当下又不具备与美元脱钩的条件，那么可被牺牲的就只有人民币国际化。当然，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这种牺牲会被搁置、冻结或暂缓所取代。

但这么做的副作用就是，中国央行除了在货币政策上还留有一定空间外（且是在数量工具上），其余政策手段将会被锁死。北京未来将只能依仗财政手段来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这在2016年的政府预算上已经可以看到迹象，中央财政赤字从2015年的2.4%增加到了3%，同时军费以及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增速却被调降了，说明北京正在试图尽最大可能扩充经济刺激在财政中的占比。不过笔者以为目前北京的思路仍带有明显的平衡预算烙印，潜意识中仍有对通胀的莫名畏惧，3%的赤字率不应该成为财政扩张的阻碍。具体情况应区别对待，遵守财务纪律是其长期必要性，但不应成为教条。

输入性通胀压力难以再现

笔者认为北京应认真考虑在中期上放弃平衡预算，全力实施赤字财政。因为以目前形势，外部有美联储收缩货币、全球热钱回流造成的美元中期上涨的压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难以出现大的反复，不但05-08年那种输入性通胀压力难以再现，反而是在向中国输入通缩。内部又处于转型去产能降增速的过程，本身也要与通缩而非通胀做斗争。此外，中国金融市场建设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金融市场不论从门类还是数量上都缺乏足够多的资产标的。因此，在美联储停止收缩货币前扩大赤字，既可以刺激经济、对企业减税、增加居民消费、对产业转型投资，又可为通缩阴霾下的全球金融市场提供稀缺无风险产品。

全球资产配置荒下连印度国债都成了强手货，收益率跌至三年来最低水平，难道币值更稳定，经济更稳固的中国会不如印度？更进一步，中国如果在国际债券市场站住了脚，取得了客观的份额，一旦未来美元趋势逆转，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契机成熟，那即便北京不推行人民币国家化，人民币也水到渠成的完成国际化了。■

資本觀察

央地关系再调整¹

作者：聂日明

税制改革中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将于今年5月1日全面推开，营改增至此完成收官。增值税是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年征税3万多亿，营业税是地方税种的第一大税种，年征税近2万亿，两者合计为5万亿左右，占中国税收总额的半数。营改增之后，如果增值税收入或由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那么中央和地方分享的增值税总额，与营改增之前基本上差不多。

但增值税分享比例调整只能是一个过渡方案，只是用于理顺中央和地方短期内的收入划分，弥补地方政府因营业税消失带来的税收收入下降。营业税作为地方第一大税种，改为增值税以后，地税的功能基本上可以被国税取代，地方税务局功能的转型成为财税改革下一步的重点，国税与地方合并也没有技术上的障碍了。营改增之后，地方手中再无优势税种。可以预见，营改增之后，要么央地财事权失衡格局将更加恶化，要么地方政府变本加厉、挖空心思去开发新的税种、开设新的政府性基金，如房产税、附加费等。但很显然，这只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一个开始。

分税制对央地关系的重塑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财政关系，包括谁决定征税，谁负责征收，分享比例划分，谁负责事权，支出责任划分等，亦即财权与事权。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公认的分水岭。分税制改革以前，税收呈现“强地方，弱中央”的格局，中央甚至要向地方借钱来应付日常支出。

1980年代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制，尤其是财政收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划分变动，在财政大包干、比例分成等方案中不断的调整。当时全国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征缴，之后再分成、上缴给中央。由于征税由地方负责，中央不掌握主动权，地方政府截留中央财政收入的行为，频频发生。

防止地方截留中央收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财政工作的重点，这种局面，哪怕在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与地方关系重塑以后，仍然持续了好几年。到199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在全国增收节支电视电话会议，还强调地方政府“既要抓好地方收入，又要支持

¹ 本文所有言论与所在机构无关，仅代表个人观点，欢迎批评指正。

国税部门抓好中央收入和共享收入，对故意将中央收入混入地方金库和截留中央财政收入的行为，要严肃处理”。

限于分税制改革以前央地关系不明，各级政府间截留分成收入的情况很多，特别是地方截流中央收入。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央政府也想过很多办法，如由央行经理国库就是对这一现状的回应，1985年《国家金库条例》开始实施，财政部会同央行两次制定实施条例，财政部也多次督促央行履行经理国库的职能，抑制地方政府截留中央收入的现象。当时的财政部的立场是要求强化央行在国库上的经理角色的，这主要是在对抗地方政府。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扭转了中央的弱势角色。首先是税收决定权的上移，以国务院立法的形式，批量设立了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税种，取消原有的工商税。此后中央政府还着力于清理地方的乱收费，将征税的决定权牢牢的把握在中央政府层面。到最近一任政府，楼继伟主持下的财政部，更想清理各地方的税收优惠，形成全国税收一盘棋的局面。

其次，设置国税局，负责征收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保证中央可以掌握一部分税源，有效防止地方截留税款。全国只有上海、西藏两个地方没有独立的国税局。仅国税局负责征收的税收总额就已经达到半数。

再次，中央分享的税种种类不断的扩大，分享比例不断的扩大，基本呈现税种成熟一个，中央分享一个，越成熟，分享比例越高。如个人所得税就从地方独享税种变成央地共享税种，证券交易印花税更是从地方为主要分享部分的税种变成中央独享税种。

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其重要能力雄居国家诸能力之首，1993年，王绍光和胡鞍钢发表了著名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提出国家能力（中央政府）的概念，并认为国家能力包括四种：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力。其中国家汲取财政能力是最重要的国家能力。

这一提法，成为其时开展的分税制改革的一个理论依托，所谓的国家能力建设，最终变成如何强化国家动员能力和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最终的落脚点变成两条：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种直接的目标，也造就了近二十年以来（尤其是近十年），财政增速远高于GDP增速的能力，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高，可以说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及《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的期待完全达到。

与财权扭转对应的是中央与地方在政治权力上的变化。1980年代末，一方面地方财权、人事权（较少的官员区域轮换、空降兵）相对独立，另一方面也是地方官员缺乏进入中央的路径，中央的高级领导人晋升主要来自于中央系统内，这类似于唐朝中期的“边将难入相”，因此部分省级政府有明显的地方主义倾向，广东、山东是其中的典型。1990年

代末封疆大吏入京的通道打开，谢非、姜春云、黄菊等重要省级领导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也越来越多的具有主政过地方的经验，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今天。

最近十年，中央对地方官员的人事任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省级官员，任免权力的渗透已经接近插到底，下探到厅局级干部。形势逆转的政治权力也使得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这个议题上，地方没有任何话语权。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实施时，还需要朱镕基以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的身份飞到地方，与地方亲自谈判。

界定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危机

1994年的分税制只解决了税收的分配问题，没有探讨事权与支出责任，这并非当时的疏忽。20年间，政府事权界定及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问题一直被提起，但始终未解决，在改革的议程上长期虚置。首先，没界定事权是因为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中，政府应承担的职能尚不明确，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存在大量越权与缺位，政府内部及学界对政府职责定位的认识也不是很清楚。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尤其是促进就业方面承担着巨大责任。一旦影响地方政府积极性，将会影响经济发展，而这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是有教训的。于是一直保留着“上下一般粗”的政府间事权划分，即所谓“中央出政策，地方对口执行”。政策出台后，目标向下由各级政府逐级分解，由基层政府落实执行，形成事权下移的局面。

数据上看，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为30.3%，财政支出占比55.7%，中央甚至不得不向地方借钱完成财政支出。最近十年，形势正好颠倒过来，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高达50%以上，但财政支出比重却逐年降低到2013年14.6%。2013年，地方收支差额高达5.07万亿，是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39.3%。这对应的就是中央对地方政府的5万亿转移支付。

其次，事权界定不清是刻意为之。政府承担的事权与政府间事权界定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内容，但目前涉及到的法律文件地位较低，《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基本的财政制度只能由法律决定，但法律层面只有《预算法》第十五、十六条提及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并没有涉及政府间事权的具体界定，实践中多由国务院和部委决定，不仅权威性不足，并且变动随意。

事权界定模糊、没有法治化，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下，地方在事权界定上没有话语权，这种模糊是维持中央集权的一种工具。财事权错配更可能是故意为之。

目前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均衡性转移支付是主体，针对地方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央用转移支付保证全国层

面的均等化目标，其拨款机制一般按人头等因素计算。而专项转移支付具有应急性、救济性和跨区域等特征，如地震、洪水等救灾事务，跨流域污染事务等。

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按人口等刚性指标计算，一旦确定，财税、计划等部委对资金的划拨、支付的权力就会大大缩小。所以近二十年来的转移支付的增量部分大多以专项转移支付的形式体现，也就是一事一议，由地方向中央申请。以2013年为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总额为48019亿，一般性转移支付仅15953亿，其余3.2万亿中的大多数都是专项转移支付，占比67%。

专项为主的转移支付结构，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为此“跑部钱进”。“跑部钱进”看起来是地方政府的问题，究其根源还是中央政府及其部委维持自身对地方政府的控制，用转移支付来维持在各个领域的审批权力。因为中央政府居庙堂之上，对各地实际情况的把握并不细致，维持中央集权的成本就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的低效率。

从根源上讲，事权的界定，本质是政府间关系的法治化，这会极大的消除中央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清晰的界定和好的执行也意味着地方政府会遵守法律而非遵守中央政府的意志，这势必伴随着必要的地方自治，这可能是中央政府没法接受的。

时至今日，中央政府也不敢界定清楚央地之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这在地方政府债务的处置上可以窥见一斑。当前地方政府的债务肇始于2008年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并且持续增长，债务余额从2010年底的10.7万亿上升到2014年底的15.4万亿。2011年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处置进入公共讨论。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地方债务风险本身就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博弈的一个产物。据傅勇的研究，如果金融和财政都高度集权（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则经济得不到快速发展，地方无积极性，中央也没好处。这就是分权的开始。但在财政分权的同时，如果金融也放权，地方政府有更大的操控金融资源的能力，在短期也能促进经济增长，但从全国来讲则会放大宏观风险（通货膨胀），加剧经济波动。这在1988年和1994年两次高速通胀时期表现的很明显。最后结果是：中央要发展经济，同时又要维持社会的稳定，只得通过财政分权发动地方；但越是财政分权（包括经济分权），就越需要保持对金融的控制。因此，财政分权、金融集权的框架是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探索最终确立起来的。

但再细分1994年以后的金融系统，2008年也是一个分水岭，1997年朱镕基主持下的金融体系改革，在2003年前后完成了金融集权，信贷发放等宏观政策尽归中央政府。但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地方政府以融资平台为中介大肆借债，相对1997年-2003年，从融资上看有分权的趋势，这是投资过度与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变大的原因。

2012年的两会，国务院明示将采用市场化的办法处理地方债务，如资产处置、项目转让和股权出售，这实际上让债务的偿付主体推给了地方政府，公益性项目的债务的偿还由中央部分兜底，这实际上是“谁的孩子谁抱走”的思路。

但2015年时，地方债的处置思路截然相反，由财政部主导，让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置换存量其债务，2017年以前的三年内共置换14.7万亿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以“时间换空间”，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结合地方债的利率水平、债券市场刚性兑付的环境，此时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基本上可以视为有中央政府的信用背书，中央变相的为地方的债务兜底。

在垂直管理的金融市场，没有中央政府的协调，界定清晰事权责任，任由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自生自灭，一方面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坐视不理必然会伴随着放权，从现实的处置方案来看，放权是更不可接受的趋势。这也表明金融的指针又再次被拨回到集权的路径上。

未来二十年的央地关系前瞻

当前，新的央地关系调整方向未明，从各个领域趋势来看，未来的央地关系正在处于全面集权的方向上。最明显的迹象是中央政府对各条各线（尤其是地方政府）人事调整的权力日趋高涨，已经是文革以来的高峰。历来中央政府对各条各线的关系调整路线都是先进行人事调整，后进行具体内容调整。在人事调整中，先进行党组织关系的调整，后进行政府职能机构的调整。

以1997年的金融集权路线为例，当时，包括央行的很多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甚至完全处于地方政府的控制下，总部对分支机构失去控制，“为地方政府发展出力”，“在本地吸储、贷款用于本地”成为通行的做法。

1998年以后，朱镕基领导下的国务院开始金融集权，首先，从党务的条线对主要的金融机构收权，实施垂直管理，上收金融机构各分支机构的人事任免权。中共中央通过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金融机构系统党委和中央金融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将央行、证监会、各银行等重要金融机构的干部实行垂直管理，中央金融工委管理深度下沉至分支机构一把手，以此隔绝了地方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影响。

然后进行政府职能机构改革，设立银监会等机构，垂直管理银行业等金融机构，随着2003年中央完成金融集权，中共中央金融工委撤销，金融体系的党委监管权分别下放到各监管机构，被监管金融机构的党组织关系分别设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由他们“代管党的组织关系”。（整体内容见本刊2014年秋季号）

新一屆領導班子上任以來，有兩個明顯的工作思路：第一，反腐成為人事任免和派系調整的重要渠道，同時作用於中央機構與地方政府，至今為止未見明顯消退的趨勢；第二，黨的機構在重大決策中越來越重要，政府的機構有邊緣化的趨勢。從過去六十年的經驗來看，不管這只是過渡狀態，還是成為未來的常規狀態，其結果都是會促進中央的集權。

財政方面在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兩個層面的權力都向財政部集中，而地方政府的融資渠道，以土地出让金為中介，通過融資平台、國有企業向銀行借債的通道被逐步關閉。近几年財政部在轉移支付、地方稅收優惠、稅制改革、地方舉債及借貸等方面逐步收緊，地方騰挪的空間越來越小。

但所有這些恐怕都不是好消息。正如前文所說，所有維持中央集權的措施，大多都是在降低效率，如專項轉移支付、清理稅收優惠、減少地方直接徵收的稅種，當前經濟低迷不振、改革前景乏力或多或少都與此有關。問題只是當前的經濟社會到底能容忍多低的效率，強中央弱地方帶來的執行惰性對經濟有多大的挫傷，這也為我們觀察未來經濟提供了窗口。■

边疆观察

近现代“蒙古问题”简论

作者：王明远

“蒙古问题”在这里指20世纪初以来，中国境内的蒙古族追求独立或自治，对中央“帝国秩序”造成的持续挑战。可以说直到1980年代冷战末期，蒙古问题一直是中央政府所面临的最重要边疆问题：清末民国面临的最重要民族问题是外蒙独立。外蒙独立及唐努乌梁海被俄国侵吞，中国丧地近180万平方公里，也造成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领土危机；80年代以前，西藏问题在国际上还未受到广泛关注，宗教极端主义也未影响新疆，而背靠蒙古国，处于中苏对峙前沿的内蒙古，依然是中央最防范的对象。在“文革”中，内蒙古是唯一被分解的自治区，“内人党”案迫害致死达1.6万人，几乎所有蒙古族精英都受到牵连，成为“文革”中仅次于“刘少奇案”的全国第二大冤案。这反映当时汉民族中心的民族主义革命政治对“蒙古问题”超乎一般的担忧。直至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作为地缘政治结果的“蒙古问题”才逐渐从国家政治生活中消退，“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上升为最紧迫的边疆问题。

内政腐败是“蒙古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把任何民族问题简单归结为外部势力的挑唆或民族分裂分子的煽动，都是极不负责任的“推责”行为。在20世纪初以来民族主义政治语境下，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都缺乏对外蒙独立的检讨，成功将内政不修导致的丧土辱国替换为反帝国耻教育。如果还原历史场景，因蒙古族政治自主权增长及满汉利益集团经济利益不断遭侵蚀，“蒙古问题”实际上是后者的被动反应。

清朝壮大与完成对内亚征服，是满蒙军事合作的结果，在清朝中期以前，蒙古族也被满族统治者同视为帝国的肇造者和统治者。然而，乾嘉以后，清朝的“内亚性”渐次消退，“中原帝国”的属性越来越强烈。清朝统治者开始以华夏自居，而将蒙古视为藩属蛮夷，“以夷制华”逐渐变为“以华制夷”。在对蒙古地区的管制上，清政府由比蒙古王公更积极执行“蒙禁”，转而鼓励汉族在蒙古垦荒、移民、经商，甚至汉蒙通婚禁令也被打破。尤其是清末国家现代化转型中，清政府开始准备剥夺盟旗权力，筹划建省，“改土归流”，力图将清朝与蒙古关系由“国家—部族”向“中央—地方”转变。

清朝促进蒙古地区开发，努力进行现代国家建构，总体来看符合历史潮流，在过程中如能积极保护蒙古族利益，不至于引起强烈反弹。然而，清政府幻想扶持一个汉族利益集团，作为满清统治蒙古赖以持续的基础。另外，满清统治集团也极为腐朽，驻蒙军政官员为官一方，也多以敛财为最重要追求，而精于贿赂而又财力雄厚的汉人地主商人无疑是最佳搭档。因此，蒙古的现代化过程，实质沦为满汉利益集团对蒙古族原有政治自主权和生存利益的系统侵蚀过程，民族矛盾空前激化。

开垦“蒙荒”实质是一场掠夺蒙旗土地的“国有化”运动，在放垦旗帜下，蒙古王公贵族优质土地被转为国有、官有。他们虽然得到一定地租补偿，但土地开垦的利益大多数落入地方官僚和汉族地商手中。这是对蒙古族利益的一次严重掠夺。仅1902年至1908年的放垦，清政府在西二盟就搜刮押荒银272.7万两，在哲理木盟则达386.9万两，（《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一辑，113页）。据不完全统计，清末民国超过一亿亩蒙旗地成为汉族的耕地，俨然是近代中国版的“西进运动”。开垦蒙荒还导致大量蒙古牧民流离失所。自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他们不断掀起反抗运动，包括熟为人知的嘎达梅林起义和独贵龙运动。

以晋商为代表的汉商也大量进入蒙古族地区。汉商虽然促进了草原商业发展和物资流通，但是凭借经验、资本优势，建立起不平等交易体系及高利贷资本体系。由此，蒙古族游牧经济彻底被汉商资本控制。到20世纪初，外蒙古每户牧民的私人债务已高达500到1000两白银，封建王公贵族、上层喇嘛所欠的所谓“公共债务”也高达1100万两之多（蒙古科学委员会等，190页）。喀喇沁右旗王府在1845年向票号借款3000两，到1910年仍然没有还清，本息已达1万又数千两，另外又新借5万两，而此时王府岁入不过2万两左右（汪国钧，101页）。大盛魁一家，每年牧民的债务利息收入，就有羊50万只、马7万匹（《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265页）。为了偿还汉族高利贷，蒙古王公多次向理藩院陈情，要求中央政府出面干涉，暂缓还债或减免部分债务。毫不夸张地说，到二十世纪初，整个内外蒙地区，上至王公活佛，下至牧民，都成为汉商高利贷的奴隶。

强大的满汉利益集团对蒙古族利益的系统掠夺，让蒙古族精英普遍感觉到民族生存的危机，寻求独立以自保的愿望因此萌生。而一些亲身感受到满清政府腐败的蒙古族精英，更对中央政权绝望，开始积极寻求蒙古独立之道。比如喀喇沁右旗的海山，郭尔罗斯前旗的陶克陶，都生长在蒙汉交界地区，对满汉利益集团的贪腐比一般蒙古人更加了解，又都坐过清政府的冤狱，因此对清朝统治深恶痛绝。出狱后，他们成为推动外蒙独立的关键人物。

这种以国家公权侵犯族权和私权为特征的现代化过程，并没有因清王朝的灭亡和外蒙独立而有所检讨、收敛。民国时期，统治蒙古族地区的实力派如张作霖、傅作义、马鸿逵、马步芳，也借“建设省政”的旗号大肆敛财扩权，蒙古族利益受到的侵犯变本加厉。因此，整个民国时期，蒙古族的民族主义运动更是高涨。1930年代，德王领导的自治运动已能吸引内蒙、青海王公广泛参与，1943年反抗陈长捷垦荒的伊盟事件，该盟札萨克、乌审

旗青壯年几乎全部参加。清末民国长期内政不修，利益集团当道，无疑为民族分裂主义提供了持续动力。

“蒙古问题”是东亚地缘政治的核心

从国际因素来看，“蒙古问题”之所以激荡长达一个世纪，与俄日积极介入挑拨不无关系，尤其是长期沦为俄国的地缘政治武器。20世纪上半叶，俄日展开亚洲大陆霸权的争夺，蒙古高原地处内亚中心，是地缘政治的必争地带。俄罗斯为保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安全，一直谋求控制中国长城以北的地区，建立战略缓冲地带。尤其1904年日俄战争结束以后，俄国在满洲的利益几乎丧失殆尽，不得不把战略重点放在蒙古地区，转而积极策划外蒙独立。而日本为谋求建立亚洲霸权，首先目标也是控制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在满洲利益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日本也争取把东蒙古地区纳入势力范围。冷战时期，苏联为压制中国不断上升的亚洲影响力，又鼓动蒙古国反华、排华，还把外蒙作为对中国进行军事威慑的桥头堡，兵锋最前沿离北京仅600余公里。可以说，近代以来内外蒙古的主要民族主义运动背后都有日俄的身影。他们有意向蒙古族宣扬各种色彩的民族主义思想，扶植分离主义势力，不断制造中国的“蒙疆”危机。

作为原宗主国的中国，亦明白蒙古高原对中国的生存意义——它是保障内地安全的最重要屏障，不肯放弃内外蒙古。即便外蒙事实独立35年，中国政府都不愿承认。中日俄三大国在蒙古地区的角逐，使得蒙古地区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东亚地缘政治角逐最激烈的地区，其中既有中俄（苏）外蒙和中东路军事冲突，也有中日热河、察哈尔会战，还有日苏诺门罕战役。蒙古草原上演的“三国演义”，让该地区成为“二战”策源地之一。

蒙古问题的复杂性

近代史上，蒙古地区的历史发展盘根错节，各种内外因素交织，相当混乱不清。就外部因素讲，既有日、俄外国势力插手，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也在蒙古族内部扶持代理人，即便是在国民政府内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对蒙古问题态度大相径庭；就内部讲，蒙古族是一个以盟旗为基本单位的松散民族集团，各盟旗有历史传统、教派、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同一问题上，每个盟旗都有自己的立场。所以，在近代蒙古问题的坐标系上，影响因素是多维度的。而不像近代西藏问题，可以简单归结为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权与中央向背的“线性问题”。

近代以来，先后产生重要影响力的蒙古势力派别和政治运动的就有：外蒙王公活佛的独立运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独立运动，民初的内蒙独立运动，30年代初德王领导的自治运动，国民党扶持的蒙古族民族主义者，日本扶植的伪蒙疆临时政府，苏蒙联军占领下成立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也多达数十位：既有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章嘉呼图克图，又有王公贵族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宾图王、乌泰王、贡桑诺尔布、达理扎雅、云端旺楚克、德穆楚克栋鲁普，又有新崛起的中下层民族主义政治精英海山、李守信、白云梯、吴鹤龄、赵成璧，还有成为最后胜利者的共产主义领袖苏赫巴特尔、乔巴山、乌兰夫、吉雅泰、奎璧、特木尔巴根。

可以说，自从进入民国，整个蒙古地区就没有消停过。各种政治运动、人物让人眼花缭乱，而且政治人物往往立场不定，忽而主张独立，忽而主张统一，忽而投靠日本，又忽而投靠国民党。因此，蒙古问题是近代中国史上最为复杂的课题，只了解个别重要人物、个别事件，不等于了解了蒙古的近现代史。这是蒙古历史的独特之处。

清朝覆亡带来的“法统危机”与蒙古分离主义

1911年辛亥革命是直接激化外蒙独立、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导火索。在蒙古王公看来，他们是清帝国满族皇帝的臣仆，蒙古族之所以留在中华帝国内，就是因为清朝皇帝的存在。从法理上讲，1636年漠南王公将原来属于黄金家族察哈尔部拥有的全蒙古大汗——“博格达车臣汗”授予皇太极，等于开始承认满族首领同时也是蒙古大汗，也正因此皇太极将部族色彩浓厚的国号“金”改为具有普世意义的“清”，并开始称帝。既然，清朝已经灭亡，这意味着中国元首作为蒙古大汗地位的终结，那么中国对蒙古盟旗统治的合法性也就不存在

在京的蒙古土尔扈特帕郡王发表的《帕邸不认共和之声明》是极具代表性的言论，声明称“蒙古自有历史以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故二百数十年来列为藩属，相亲相爱。今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汪炳明，1991）。《声明》表明蒙古对中国的认同以清廷存续为要件，若清廷覆亡，蒙古作为中国一部分的法理纽带则断裂。1911年11月30日，外蒙古独立通电也称：“照得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明万全”。这虽有托词之嫌，但是也道出部分实情，在蒙古族看来，清帝国是满蒙汉藏回组成了“联邦帝国”，既然汉人省份宣布独立，那么蒙古也有资格独立。至1913年，清帝已经退位一年，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盟长至外蒙库伦政府电仍以“大清御前行走”、“乾清门行走”自称，亦可见一斑蒙古王公只认同他们在清帝国统治秩序下的身份地位，而不认同汉人民国对他们的统治。

革命党人以民族革命为号召，作为满蒙统治联合体一部分的蒙古族，自然在“驱逐鞑虏”之列。“恢复中华”在当时语境下是建立汉人国家，顺理成章将也蒙古等少数民族排斥在外。其革命动员，充满狭隘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仇杀言论。如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以黎元洪名义发布的《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公然使用“蕞尔东胡”、“逆胡”等称呼满蒙等族，并赤裸裸地威胁蒙古族：“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蹠足髻歛，与外蒙

响应，军政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革命党长期此类宣传，亦使得蒙古王公对民国充满恐惧，不愿将蒙古留在中国之内。

1911年12月“蒙古王公联合会”二十四位王公通电南方革命党，道出对汉人主张的共和的担忧，称蒙古“只知有君主，不知何所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诸君子所见不远，怀挟部落思想，谓我蒙古去之不足惜……若君一去，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出于对种族安全的考虑，在满蒙王公御前会议上，蒙古王公反对清帝退位的呼声甚至比满族王公还激烈（汪炳明，1991）。

待清帝退位，是以法统绝继，蒙古王公虽表明襄赞共和，但是私下纷纷重新考虑蒙古盟旗出路。部分王公继续认同满族皇帝的法统权威，参加“宗社党”复辟活动。更多的蒙古王公开始认同外蒙哲布尊丹巴作为全蒙古法统，希冀与外蒙“统成一邦，共建一国”，查内蒙49旗，共有36旗致电库伦，表示“归顺”（汪炳明，1996）。更有呼伦贝尔宣布独立，哲理木盟部分王公宣布“东蒙古独立”，并发动武装叛乱。接着1913年，外蒙为吞并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两盟，派遣2.7万军队入境。内外蒙古独立事件，造成伪满洲国成立前的最严重的边疆危机。

外蒙独立及去中国化

外蒙独立，史书多归结为沙俄乃至苏联操纵结果，其主要原因还是中国政府（满清、北洋、国民党）颞预无能。满清官僚贪图利益，幻想依靠满汉权钱结合体统治漠北，搞得外蒙人心背离；北洋政府进退失据，令蒙古王公彻底对中国绝望；国民政府出于一党私利，完全将外蒙权利拱手相让，致使外蒙完成“法理公投”。中国政府一次次丧失机遇，让外蒙独立逐渐成为铁的事实。

如前所述，汉商高利贷不仅使蒙民不聊生，而且使官不聊生，逼得蒙人自思其变。又有记载，1889年库伦最高宗教领袖呼毕勒罕为准备进京，向汉商票号借款2万两白银，因无力偿债，短短几年本息就高达5.3万两（蒙古科学委员会等，182页）。贵族尚且如此，普通阿拉特（牧民）更是不堪忍受债务之苦，1909年土谢图部某旗户均债务达375两，折合市价约250头羊，而阿拉特户均财产不过60头羊（蒙古科学委员会等，192页）。阿拉特发起各种形式反抗高利贷和封建王公的压榨，最著名的是1890年查木藏领导的请愿运动，1905年阿希尤领导的阿拉特运动。1890年的请愿，最后也带动了部分王公参加，给清朝皇帝的请愿书中写道：“若长此以往，蒙古人只好拿起武器。”（兹拉特金，99页）

清末新政中，满族权贵为了从土地开发中收益，又在本来不适宜农耕的外蒙大肆圈地，计划招募汉人开垦蒙荒，这与今天贪官热衷于房地产开发何异。库伦办事大臣计划，从车臣和土谢图两个汗部划出来的屯垦土地将达5500万亩之多，争取吸纳一万户以上的汉人移民。又据估计，在蒙古北部，到1911年被转卖的蒙旗土地达8000万亩（蒙古科学委员

会等，191页）。内蒙放垦引发蒙旗人口流离失所尚历历在目，清政府又在外蒙推行垦务，引起蒙古王公的巨大恐慌。

1910年，为筹备外蒙建省，兵备处、巡防营、木捐总局、卫生总局、车驼捐局、宪政筹备处、交涉司、垦务局、商务调查局、实业调查局、男女小学堂等二十多处机构陆续设立，所需开办经费，全由外蒙方面筹措供给。以仅新设立的“兵备处”为例，建造房屋四百多间，竟然耗银16万两。清朝官员还强拉外蒙牧民入伍当兵，蒙民不堪其扰，纷纷逃走，库伦近郊各蒙旗的牧民逃亡一空（陈崇祖，第一编，第5页）。

外蒙独立的导火索，则为1910年4月发生的蒙汉斗殴事件。自1742年库伦办事大臣获得外蒙司法权，在司法诉讼上向来偏袒汉人。当年，库伦一群喇嘛因购木料之事与德义涌商行汉人发生口角，于是聚众抢劫木厂。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闻讯，带卫队前去弹压，捕拿了三名闹事喇嘛。三多又下令罢免最高僧官商卓特巴，并令沙比衙门赔偿德义涌墨西哥鹰洋1160余元、现银780余两。沙比衙门将这笔钱摊派给库伦的蒙古平民，一时间库伦蒙民人心惶惶（陈崇祖，第一编，3页）。哲布尊丹巴活佛派人去北京控诉，中途被三多的宣化卫队追回，从此拒绝与办事大臣见面，类似于当代地方官处置不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加截访。

待外蒙宣布独立，库伦、恰克图等地有数万汉商、劳工，蒙古地方经济也控制在汉商手中，而此时哲布尊丹巴政府财力困顿，年岁不过33万余两，不及汉商票号资财的零头，旗兵月饷仅9两（蒙古科学委员会等，131页），蒙古兵虽然有4000，有战斗力的不过数百（胡太才，66-67页）。如果三多能组织八旗驻兵及汉商抵抗，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制裁外蒙，等待张家口、归绥城援兵，外蒙危机有化解可能。然而，三多于事发之后四日便逃回内地，不久乌里雅苏台将军也弃城而逃。统治者平时蛮横无理，出事时则贪生怕死，捅出篓子，又放弃最好解决时机。

待内地政局初定，袁世凯开始逐步恢复中国在外蒙的权利，经1913年、1915年中俄蒙三方谈判，可谓有可喜进展。1915年《中俄蒙协约》虽然承认外蒙有自治权，但明确对外蒙主权、外交、内政、司法、财税等做了限定：外蒙无权与外国缔约，外蒙博克多汗接受民国册封，凡集会典礼中国库伦办事大员地位应该高于博克多汗，中国在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等地设办事大员，并可以驻军，中国商品运往外蒙不缴纳关税，在外蒙的中国属民犯罪，应由中国办事处与蒙古专员共同审理（《中俄边境条约集》，126—128页）。中央享有的权力，远远比比今天“一国两制”下面对香港、澳门还多得多。

外蒙内部局势，也渐次对中国有利。迄自治后，王公喇嘛为争夺权益，内部纷争不断，哲布尊丹巴大肆强化喇嘛贵族和寺院利益，而损害盟旗王公的利益，仅其一人供养黑徒就由5.5万上升到8.9万（蒙古科学委员会等，131页）；蒙古独立后为了练军和封赏，阿拉特承担的赋税比清朝统治时期不减反增，加之沙俄残暴无信，也逐渐让蒙古上层失望，因此相当大一部分人复而留恋中国统治，取消自治，回归中国一时成为人心所向。如果能

彻底贯彻库伦办事大员陈毅与外蒙王公达成的优抚外蒙的“六十三条”，则可缓缓挽回人心，徐图经略外蒙。

然而，徐树铮1919年入库，自恃兵强马壮，推翻陈毅“六十三条”，并监禁陈毅，代之制定了大幅剥夺外蒙权力的“新八条”。其言又如清末新政，将外蒙视作中国一个省，并用武力逼迫外蒙政府总理签字，复以强迫哲布尊丹巴率领外蒙高官向民国大总统画像鞠躬，甚至还勒令蒙古王公采用汉名，令蒙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陈崇祖，第三编，第11-18页）。徐树铮还推行军事管制，在关隘路口肆意询查蒙人，凡是有嫌疑的人都被拘捕、拷问，甚至不经法庭就被杀害。徐氏又行反攻倒算政策，宣布蒙古独立之前所欠汉商债务继续有效，并且要支付这些年的利息，还要赔付汉商在蒙古独立中所遭受的损失。仅科布多商人就提出5.5万头骆驼，7.5万匹马，40万头牛及50万只羊的赔偿要求，而此时科布多全部才有3.5万头骆驼，13万匹马，12万只牛和100万只羊（兹拉特金，156页）。徐氏取一时之快，令蒙人倍感受辱，待徐氏一离库就一面派使赴俄引军解围，一面派使赴哈尔滨向日本密购军火。不出数月形势大转，中国军队招架不住，彻底失去外蒙。

1921年新上台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与前期主张独立的王公活佛颇为不同。后者世受国恩，对中国还有传统感情纽带，也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在国家制度设计方面均采用中国官制，沿用汉制年号。今天乌兰巴托重新开放的哲布尊丹巴夏宫，内部也都是中国装饰。而蒙古共产主义者皆出身贫困，自然缺乏与中国传统纽带，又由苏俄一手扶植，一旦掌权就拼命将蒙古“去中国化”，进而“俄罗斯化”。

经济上，1924年9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作出废除汉商所有债务的决定，1928年进而大肆驱逐汉商8000-9000人，没收80余家商号资产，且不计债务。仅大盛魁一家，被没收的货物就达二三百两，在科布多地区一地就有20万只羊、2万匹马、1.5万峰骆驼的债权被收回（贺喜格图雅，2013）。到1937年，汉人在外蒙的经济活动几乎绝迹。在贸易方面，1926年起苏联开始取代中国成为外蒙最大贸易对象，苏联占蒙古进口贸易额的比例从1923年的13.8%，骤增到1928年的85.5%（兹拉特金，231）。苏联又帮助外蒙成立国家银行，发行蒙古货币图格里克作为唯一法定货币，结束了中国票号及银元在蒙古的统治地位。蒙古政府宣称：“把中国及其他外国的商行从共和国排除出去，除了经济意义外，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和政治势力的立足点，以及国内封建神权反动派的积极同盟者也跟这些商行一起消灭了。”（兹拉特金，233页）

与中国有政治渊源或亲华的蒙古高官、贵族，也逐渐被蒙古人民革命党清洗，“与中国军阀勾结”甚至成为蒙古肃反中最常用罪名之一。1924年，副总理兼军事部长丹增被认为是中国汉商代理人被清洗；党务委员会主席丹巴多尔济因亲华远苏，在1928年被撤职。“38个僧俗大封建主”事件影响最大，其成员有尤高济尔呼图克图、额利格登达格巴等。政府宣称，他们派代表前往南京，请求中华民国政府协助他们“消灭人民革命党，以便邀请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活佛和蒙古民众望所归的班禅额尔德尼活佛来蒙”。

事后，这38人都被枪决。此外，外蒙还平息了1930年乌布苏诺尔省勾结“中国新疆军阀”的叛乱，杭爱等东南四省“勾结班禅”的叛乱（兹拉特金，274-276页）。

蒙古人民革命党还消灭喇嘛教，割断了外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纽带。独立前，蒙古是政教合一社会，喇嘛教是其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甚至医疗都是由喇嘛教承担。由于外蒙活佛均从中国转世，喇嘛也奉西藏、五台山和北京为宗教圣地，中国自然对外蒙有居高临下的文化影响力。1924年哲布尊丹巴去世后，外蒙禁止达赖册封的九世哲布尊丹巴进入外蒙，又在30年代逐渐解散寺院，强迫喇嘛还俗。因黄教文化是近代外蒙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意味中国对其宗教文化影响力中断。

总之，独立后的外蒙，迅速摆脱中国影子，把自己从中华文化圈脱离出去，也就彻底消除了重新回到中国的可能性。虽然自1206年以来，外蒙和中国在多数时间是一个国家，北京到乌兰巴托还不及到上海距离远，但它迅速变成中国人最陌生，最有距离感的国家。

“蒙古问题”的消解

作为地缘政治结果的“蒙古问题”，随着“二战”结束，新的地缘平衡产生逐渐降温。40年代中后期，苏联在外蒙的权益以《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形式得到确保，外蒙也实现法律上的独立，外蒙问题也就此消解。

就内蒙而言，苏联在早期内蒙问题上持积极干预态度，苏联以乌兰巴托为基地资助内蒙共产主义者。但是苏联支持内蒙，并不在于促使内外蒙统一，而是用来牵制国民政府和日本。待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战败成定局，内蒙对苏联的地缘政治意义也下降，苏联对内蒙古民族主义者态度骤然冷淡。日本在“二战”战败，完全退出亚洲大陆，内蒙古最强有力的民族主义者德王因为投靠过日本而名誉扫地，内蒙古再也没有出现一支可以直接挑战中央权威的力量。

此时，国民党虽然是中国的形式主宰，但在东北的战略主动权也很快落到中共手里。因此，1946年下半年以后，内蒙的局势已经明朗，所有旧的民族主义势力都被边缘化，以完全听从于中共的乌兰夫为首的蒙古族共产党人，成为主导内蒙民族运动的力量。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标志着王公贵族和列强主导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彻底结束。内蒙古进入一个新历史阶段。

虽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可行性越来越遭受质疑，但对比晚清和民国的同化、分治，它无疑是巨大进步，至少在形式上满足了蒙古族民族主义者的诉求，内蒙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渐渐熄灭。首先，废除绥远、察哈尔和热河三省，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满足了近代蒙古族民族主义者成立一个囊括清朝六盟四部套西二旗的“大内蒙古”的愿望，甚至还包括蒙古族民族主义者没有主张的呼伦贝尔和额济纳。其次，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和多位副主席都是

蒙古族人，也改变了民国时蒙古族人在三省无职无权的状况。另外，中共的土改满足了底层蒙古族人民的土地愿望。新中国成立以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消灭了内蒙流行的性病，蒙古族人口大幅度增殖，消除了蒙古族“种族灭绝”的担忧。总之，蒙古族民族主义不满的根源至少在形式上被消灭了，蒙古族民众看到希望，内蒙古也逐渐安定下来。

新中国也曾经尝试收回外蒙。1949年春，米高扬访华期间，毛泽东表示，当时也是为了革命利益，赞成外蒙古分离，建立革命根据地，但现在革命成功，政权回到人民手中，就考虑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米高扬回应，这样的统一，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沈志华，2011）。言外之意，统一只能是内蒙并入外蒙。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时，再次在外蒙问题上吃了闭门羹。毛泽东回国途中，每路过一地都要下车参观市容，出席地方欢迎仪式，唯独路过蒙古族聚居城市乌兰乌德时拒绝下车，可见他内心对不能收回外蒙的失望（师哲，362页）。1954年，中共乘斯大林去世，再次向赫鲁晓夫提出收回外蒙，又遭拒绝。对此，蒙古表现颇为不满，在中苏交恶后，蒙古官方曾经声讨“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也曾屡次企图把蒙古纳入中国版图，在背后决定我国人民的命运”（蒙古通讯社，1964）。然而，以当时中国国力，确实无力改变苏联主导的内亚国际秩序。1961年蒙古加入联合国，1962年中蒙完成边境划界，外蒙在法理上成为独立国家。外蒙问题彻底不再是中国面临的边疆问题。

未来的外蒙与内蒙

“蒙古问题”虽然在国内外大环境下消解，但它并没有完全消除。蒙古国依然是中国地缘政治中重要一环，并且是最有可能对中国境内蒙古族民族主义起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中国多民族国家统治秩序的力量。

独立的蒙古国未来仍将长期存在。蒙古不同于近代被割让的台湾、香港这些以华人为主的地区，一经丧失就不可能收回。外蒙古经过二三十年代的肃反和排华，完全切断了与中国的文化脐带，加上此后长期的仇华教育，外蒙国民对中国的感情已经十分淡漠，更没有中国人的认同感。外蒙的主流民意甚至就是仇华。再者，蒙古为一个独立国家，是国际社会认可的事实，中国尚无实力挑战“二战”结束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因此，“收回外蒙”只是一些大汉族主义者的天方夜谭。近年来网络流传蒙古大呼拉尔通过决议请求回归中国，更完全是痴人说梦。

蒙古国对中国经济严重依赖，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对蒙古的政治、文化影响力增强。由于俄罗斯衰落，中国重新成为蒙古国最重要的投资来源与经贸伙伴，蒙古国商品92%出口往中国，外蒙外商直接投资（FDI）中40%是中资。出于历史上长期的恐惧感，蒙古国限制中资企业和华人，还推行“第三邻国”政策，积极拉拢日本、欧盟和美国。近年来，中国在蒙古国的投资额比例已经下降了20%，相反日本与韩国有所增长。未来长期，蒙古国与中国的关系既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隔绝，也不会走得太近。

谋求中立的蒙古国，不会对中国安全造成威胁。但蒙古国是影响中国境内蒙古族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换言之，也是间接影响中国领土完整的因素。外蒙的存在，不会导致未来出现追求内外蒙统一的事情，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目前来看，蒙古国对中国境内蒙古族的主要影响体现在文化上，比如我国蒙古族喜欢蒙古国旗帜和西里尔字母蒙文的装饰品、服装，蒙古国近年来的文学艺术，蒙古学研究成果也会影响到境内蒙古族。但是，蒙古国的存在，还不能影响中国蒙古族的国民身份认同，以及社会制度选择。

然而，这种局限在文化上的影响力未必是永恒的，只是当下中蒙之间政治、文化力量均势的结果。蒙古国也有可能在未来产生对中国蒙古族的强大向心力，激发他们追求自主或与外蒙组成一个统一国家的愿望。

蒙古国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

第一，蒙古是否能产生强大的经济吸引力。蒙古铜、金、铁、煤储量居世界前列，如此丰富的资源，如此稀少的人口（280万），意味着蒙古国转型风险小。近年来蒙古国经济以两位数速度增长，有成为下一个澳大利亚的可能，但其管理、财政、金融制度落后，经济活力能否激发也是未知数。

第二，蒙古的是否产生制度吸引力。外蒙古虽然腐败严重，但是采用西方政治制度框架，近年来民主逐渐走向成熟，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的精英，也逐渐掌握国家要职（现任总统即哈佛大学毕业）。如果蒙古国制度对比中国越发民主文明，也日渐会影响我国蒙古族的心理向背。

第三，蒙古文化复兴能走多远。外蒙的文化曾经受到苏联和共产主义体制的严重摧残，自主后极力扶持民族文化的复兴，打造乌兰巴托作为全世界蒙古族文化中心的地位，努力探寻草原文明现代化道路。如果蒙古国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将对中国蒙古族身份产生深远影响。

从中国方面来看，首先，取决于中央对边疆控制力的增减。近期看，这种控制能力，尤其对离政治中心最近的内蒙古控制力不会减弱，即使减弱，也不会达到束手无策的地步，此等风险较小。其次，要看中国蒙古族生存利益能否得到保障。近年得益于土地升值及肉奶需求增加，蒙古族是国内经济状况最好的几个少数民族之一。这也是内蒙古安定的重要因素。

然而，近年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不利因素。一是，内蒙古农业集约化程度增强，很多土地被外来农业资本购买，出现大量蒙古族失地农牧民，土地增值利润转而被大公司占有。二是，内蒙古的个人和公司为了套取国家农业补贴，过度放牧，过度开垦草原，生态

退化愈演愈烈，严重威胁蒙古族农牧民的长远生计。这依旧是清末民国问题的重演，未来危害性值得关注。

内亚历史发展是充满变数的，两千多年来，总会不经意间就出现挑战中国统治秩序的力量。蒙古国崛起，中国发展停滞，或外部强权的介入，都可能打破目前的内亚平衡，重新让蒙古成为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头疼问题。可能性很大，何时到来则是不可预料的。■

参考文献

- 1.陈崇祖：《外蒙近世史》，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
- 2.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苏联科学院编：《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 3.兹拉特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 4.《蒙古人民革命党反华言论》（内部读物），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
- 5.《中俄边境条约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 6.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代史研究所：《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一、二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1991。
- 7.汪国钧：《蒙古纪闻》（1918年著），呼和浩特，内蒙古高人民出版社，2006。
- 8.胡太才：《侦蒙记》（1913年著），选自《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北部边疆卷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 9.汪炳明：《关于民国初年表示归顺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的内蒙古盟旗王公》，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1期。
- 10.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11.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联闻》，2011年《文史参考》杂志社大讲堂第三期，<http://mt.sohu.com/20150714/n416748441.shtml>。
- 12.贺喜格图雅：《19世纪末20世纪初旅蒙商在外蒙古的债务问题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边疆观察

青海蒙古四论

作者：王明远

与今天青海遍地藏族的情形不同，蒙古族也曾经是生活在今天青海的主要民族之一。青海蒙古在鼎盛时期，控制北至阿拉善南至滇北的广阔西部，与今天蒙古族只占青海人口绝对少数（1.8%），聚集在河南、德令哈、乌兰等少数县市的情形，可谓天壤之别。

青海蒙古族在整个蒙古文明史上，乃至中华文明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由于得益于先后统治青海的土默特部和和硕特部的武力保护和宣教，格鲁派（黄教）才能击败藏传佛教其他派系（噶举、宁玛和萨迦），获取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也是由于青海蒙古作为桥梁，格鲁派才被整个蒙古族和满族接受，就传播地域面积上讲，成为在17-20世纪影响大半个中国的宗教文明。

然而，青海蒙古在18世纪后彻底衰落，至民国时期，人口损失85%以上，蒙旗牧场也都被藏族占领。蒙古族在青海的影响力荡然无存。以致于今人忽视青海蒙古曾经重要历史地位，这也是学界蒙古研究被忽视的领域。本文试对青海蒙古兴衰的大体脉络，及重要事件对地缘政治、文明发展的深层影响意义做探讨。

青海蒙古化(1510年代—1630年代)

元代以前，青海生活的部族主要是吐蕃、党项羌和黄头回鹘。蒙古灭西夏后，蒙古族开始进入青海。然而整个元朝，蒙古族并没有大规模进入青海游牧。在青海的蒙古人主要是分封在此的蒙古宗室和少量驻军。他们主要集中在：湟水流域的西宁王、濮阳王及其部众，河曲地带的西平王、镇西武靖王及其部众，海西的宁王及其部众。可以看出他们主要是集中在比较接近内地的青海东北部。其人数规模也很有限，从元代历史记载来看，青海诸王参与平蕃军事行动，出兵规模比较大者不过万人左右，这还包括他们账下的吐蕃、畏吾儿士兵，在青海的蒙古人应该是很少的。

在明灭元的战争中，许多陕甘一带的蒙古部众溃退到今天青海境内，明朝为了安置他们以及本地原有的蒙古驻军，设置了“塞外四卫”统辖他们，分别是安定卫、阿端卫、曲先卫和罕东卫。不过这时，蒙古族仍然是青海人口的少数，呈分散、各自为政的状态存在，对整个河西塞外影响力还是很弱的。

15、16世纪之交，蒙古高原发生了达延汗统一东蒙古的重要事件。这引发了蒙古族西迁进入青海的第一波高潮。这期间进入青海的主要是居住在河套地区的属于右翼三万户的鄂尔多斯部和永谢布部，他们在首领亦不剌、满都来等率领下进入青海。其后，达延汗弟弟卜尔孩因受压迫，也率部进入青海。这次移民潮规模应该在数万人左右，据记载，仅亦不剌率领的部众就有“万余众”。经过这一波西迁潮，蒙古族在青海影响力大大增强。

1530年代后，在鞑靼新首领俺答汗率领下，蒙古族开始第二波西迁高潮。这次与以往不同，是由蒙古首领有组织的行为。从1532年到1578年，俺答汗数次率领土默特部众进入青海，每次规模都比较大，比如1532年率众达5万骑。在俺答汗的影响下，土默特诸部纷纷迁往青海，到万历初年已经达到29支之多，史载“河西五郡...昔年无虏，自俺答抢番...环甘皆虏矣”。有的部落甚至深入到卫藏的那曲、当雄一带。俺答汗在青海建立了历史上所称的“鞑靼土默特”政权，这种局面直到1632年喀尔喀蒙古却图汗部进入青海才结束。

俺答汗在经营青海过程中，最有历史影响的事情就是传播、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1560年后，俺答汗先后在青海建立塔尔寺、仰华寺等，这是青海最早一批黄教寺庙。1578年俺答汗与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在仰华寺会晤，授予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称号，就是“达赖”封号的由来；双方还约定俺答汗统治下的蒙古各部放弃萨满教信仰，改宗黄教。

仰华寺会晤对蒙藏两个民族都是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对于藏族来说，黄教在蒙古武力保护下，开始迅速在青海和蒙古传播，逐渐在教派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对于蒙古族来说，藏传佛教逐渐成为全民族的信仰，成为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以后蒙古族人口减少产生了持续影响。

这也揭开了干涉西藏教派争端的序幕。此后蒙古军队在多次教派争端中进入西藏，甚至第四世达赖就是俺答汗曾孙，反映出蒙古族对黄教的影响力。同时，黄教传播对日后蒙古族的文化和人口衰减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随着土默特的大规模进入，明朝与蒙古在河西的攻守地位发生逆转。蒙古诸部进入青藏高原，南窥康藏，东俯河陇，获取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明朝河西四卫，却处于“海虏”与“套虏”夹击之中，蒙古诸部进出青海都要穿越河西四卫，西部军事压力骤然加大，青海蒙古顿成“关陇心腹之患”，用兵西海成为明末边防重点之一。

总之，16世纪蒙古统一战争带来的部落迁徙，改变了青海地区的民族结构，也由此改变了中国西部的地缘政治结构，揭开了青藏高原历史发展的新序幕。

和硕特进入青海与黄教决定性胜利（1630年代-1720年代）

1630年代，和硕特部进入青海，可以视为蒙古经营青海史的一个分水岭。之前，统治青海的是鞑靼系的土默特部、鄂尔多斯部和喀尔喀部，此后，被瓦剌系（卫拉特）的和硕特部取代。而青海蒙古也在和硕特固始汗及其诸子领导下，创造出历史最辉煌的一章。

和硕特本是游牧在今天北疆的卫拉特四部（其他是准噶尔、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之一，并且在17世纪初，由于准噶尔部的压迫，和硕特逐渐丧失固定牧场，面临生存危机。17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为寻找牧场多次进行长距离迁徙，先后驻牧天山北麓乌鲁木齐、伊犁河流域、额尔齐斯河流域和库拉库木河流域。

这时发生在西藏的教派纷争，为和硕特东迁提供了契机。格鲁派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西藏其他教派的恐惧。尤其是掌握西藏世俗政权的噶举派对格鲁派迫害最甚，1616年四世达赖圆寂之后，甚至不允许再转世新达赖。

由于蒙古各部对西藏的强大地缘影响力，西藏教派之间都有依靠的蒙古军事力量。率先到进入青海的是喀尔喀蒙古却图汗（又称绰克台吉）部。1632年，却图汗进入青海，推翻土默特政权，在青海大肆捣毁黄教寺庙，杀死黄教僧人。1635年，他又派儿子帅兵进军西藏，帮助噶举派镇压格鲁派。

格鲁派不得不求救于卫拉特蒙古，1636年，固始汗借此机会率领和硕特部进入青海。至1642年，固始汗先后消灭青海蒙古却图汗政权（1637年），西康地区的白利土司（1640年），西藏的噶举派藏巴汗政权（1642年），完全控制了青藏高原。

和硕特部进入青藏高原，在政治和文化上都产生了深远意义。在政治上，和硕特部控制了北至阿拉善、南至西双版纳的广大区域，一跃成为四大卫拉特之首。和硕特汗国取得了西藏汗位，由固始汗长子担任，其统治持续到1717年准噶尔部偷袭西藏为止（阿沛·阿旺晋美即为这部蒙古人后裔）；套西蒙古（河套以西，今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也被纳入和硕特统治范围，由固始汗四子及其后代统领；青海本部则由其余八个儿子驻守，称为“青海八台吉”。

在和平的环境中，和硕特部人口大大增加，到康熙末年，连同一起进入青海的辉特、杜尔伯特、绰罗斯等部，部众达到20万以上。史载青藏高原藏族部落“役于厄鲁特（卫拉特别称），纳租错牧，但知有蒙古，不知有中国”，反映出当时蒙古和硕特的强盛情况。

和硕特进入西藏，也对藏传佛教发展产生了根本影响，奠定了今天藏族文明的格局基础：

第一，格鲁派迅速扩张，取得压倒性优势。之前，格鲁派影响力局限在拉萨、日喀则和青海，西藏其他地区噶举派、萨迦派、宁玛派以及苯教都有很强力量，比如阿里地区

的拉达克王朝和康区白利土司都是信仰苯教，此后各教派都受到压制，格鲁派获得一家独大地位。

第二，扶持扎什伦布寺系统，封该寺主持罗桑确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班禅”称谓即由此而来。并且规定达赖管理前藏，班禅管理后藏，这种藏传佛教“双巨头”和前后分治的策略也被沿袭下来。

第三，固始汗将西藏十三万户（虚数，仿忽必烈赠八思巴先例）奉献给达赖，作为“佛法属民”，这样达赖就获取了西藏的世俗统治权。达赖设立“甘丹颇章”（噶厦前身）管理民政，又把民户赐给贵族、寺院，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也由此建立起来。

第四，将西藏宗教、政治中心转移到拉萨，又兴建“白宫”作为达赖起居之所和甘丹颇章驻地，命名为“布达拉宫”，“布达拉宫”称谓也由此而来。

第五，和硕特入藏前，作为西藏最高政权的第悉藏巴政权也只是控制卫藏中心地区，其余地方都是被各教派、土司、吐蕃余部所控制。和硕特部先后灭掉各地割据势力，实现了西藏的统一，之后的黄教传播又大大促进了民族共同认同感的产生。这些都为现代意义上的藏族形成奠定了基础。

清朝平定罗卜藏丹津1723年叛乱的地缘政治意义

满清兴起之后，先后在1630年代和1650年代控制了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但是漠西卫拉特蒙古此时却处于力量上升时期，并且准噶尔部一直有驯服漠南漠北蒙古，觊觎中原的野心。同属卫拉特的青海和硕特部，虽然与准噶尔部矛盾重重，但是二者毕竟同属一部，并保持婚嫁来往（罗卜藏丹津子娶准噶尔汗策零之女，罗卜藏丹津失败之后藏匿于准噶尔达32年之久），二者辅车相依，成为清政府在前期最为忌惮的威胁。

1696年乌兰布统之战清军大败击败准噶尔部，这件事对和硕特蒙古产生极大威慑。此时统治青海的是固始汗幼子达什巴特尔（又译为达什巴图尔、扎什巴图尔）有归附之意，于1697年启程前往北京朝觐康熙帝，并于次年被封为和硕亲王，其余子侄也被授予贝勒、贝子、辅国公衔。这标志者青海蒙古与满清的关系由外藩向内藩转变，和硕特汗与清朝皇帝关系由贡使关系向君臣关系转变。但是，清政府对和硕特部的羁縻，还是远远弱于对漠南和喀尔喀蒙古的束缚。

然而，和硕特部对清朝的优待并不满足，双方的矛盾藉准噶尔入藏事件爆发出来。1717年，准噶尔部趁第五世达赖转世灵通之争的机会，偷袭西藏，杀死拉藏汗，将西藏置于准噶尔部控制之下。事件发生以后，清朝积极介入争端，把其作为进入西藏的契机。康熙帝派其最喜爱的十四子胤禔率军屯驻青海，在和硕特部合作下，终于在1720年把准噶尔部驱逐出西藏。

和硕特虽然协助清军入藏立了大功，但是清军占领西藏后，反而取消了和硕特部在西藏的汗位，继而又留守3000名满汉官兵在拉萨，同时派兵进驻昌都、理塘等地，这无异于剥夺了和硕特对西藏的传统统治权。清政府又册封与罗卜藏丹津有隙的河南部察罕丹津为亲王，敕令与罗卜藏丹津共管青海右翼，制造和硕特部双巨头并存的局面。这些事情引起罗卜藏丹津的强烈不满，1723年，趁康熙皇帝新丧之机发动叛乱。

罗卜藏丹津之乱持续时间并不长，但是它彻底改变了青海蒙古命运，也是改变中国西部政治格局，甚至扭转草原文明兴衰的转折点。

这次叛乱，给青海蒙古人口带来致命打击，战前青海蒙古约20万人，战后仅剩11万人。史载：“降王有三，擒王十有五，斩首八万余人，俘获男女数万口”。年羹尧的征西笔记亦云：“临阵斩获者无算，有虏其全部者，除贼首三人解京正法，余五十以下十五以上皆斩之，所杀者数十万。”并且青壮年多数死于战乱，战后青海蒙古有2.1万户，然而兵丁仅1.6万，这意味着平均每户不到一名青年男子，青海蒙古的武力被彻底削弱。



图一：1720年清朝的疆域

清朝对青藏高原控制彻底稳固，确立了对西藏统治，清朝于1727年设驻藏大臣一职，直接统辖西藏。清朝对西藏的控制确立，也大大方便了用黄教控制蒙古。比如，此后内蒙古的最高宗教领袖章嘉活佛和外蒙最高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都必须由藏区寺庙转世，从而达到“以藏制蒙”的目的。

由于和硕特被彻底驾驭，清政府也得以放手解决准噶尔部问题。虽然之前清政府屡败准噶尔部，但是忌惮和硕特部断其后路，不敢西进，这次和硕特部自取灭亡，使得清朝西进再无后顾之忧。雍正年间，通泊之战和光显寺之战爆发，大伤准噶尔元气。乾隆年间，准噶尔部彻底平定。

因此，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可谓清朝征服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此前，清朝统治范围在长达80年历史中，被阻挡在青藏高原东缘至贺兰山一带。此后经过三十年征战，清朝的疆域又扩大了一半，势力深入到中亚，由此也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政治版图（见图一）。可以说，如果没有平定和硕特，今天青藏高原是否在中国版图，还另当别论。

如果以更深远的文明视角来看，自战国时期农耕与畜牧业彻底分化后，游牧文明一直是中原文明的主要威胁，卫拉特蒙古所建立的准噶尔汗国和和硕特汗国可谓最后的游牧帝国。清朝先后剪灭这两个汗国，也标志游牧文明对中原文明对抗的彻底失败。从此中国再无草原骑卒骚扰，是东亚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时间。

青海蒙古的彻底衰微及青海藏化（1720年代-1940年代）

在清朝中前期，四卫拉特始终是满清的最大的威胁。所以，清朝对待卫拉特四部无一例外都是极尽屠杀、羁縻之事，以致于蒙古族的势力从青海和北疆消失，改变了明代以来形成的民族格局。在青海，具体而言有以下措施。

战后青海蒙古整编为一百一十四个半佐领，29旗。按照惯例，每旗应该有25佐领（内蒙每旗实际平均26佐领），而青海蒙旗平均不到四佐领，其中11个旗只有两个佐领及以下。青海蒙古佐领的规模也低于其他蒙旗，内蒙一佐领300壮丁，而青海每佐领仅150壮丁，青海29旗兵丁加起来也不过折合内蒙两个旗的人数。这显然是清政府有意“分而治之”。

为了防止各旗之间联合，与内蒙古、外蒙古不同，青海蒙古不设盟，各旗会盟由西宁办事大臣处直接负责。著名史学家赵尔巽在《甘宁青史略》中一针见血指出：“蒙古部落必设盟长以统属之，而青海独无，比之伊克昭盟，无乃向隅乎又恐其彼此团结，或有造乱机会也。”

清政府还颁布《禁约青海十二事》，来为蒙古旗部制定了系统的政治约束条令，比如：“朝见进贡，定有限期”；“内地差遣官员，不论品级大小，若捧谕上至日，王公等，俱行跪接。其余相见，俱行宾主礼”；“不准自称盟”，“各部族间，不许相互扰累”；“喀尔喀辉特图尔古特部落，不许青海占为属下”；“恪守分地，不许强占”；“察罕诺门汗喇嘛庙内，不可妄聚议事”，甚至警告“背负恩泽，必行剿灭”。显然，蒙古王公及部落的行动，要受比内属蒙古更严格的约束。

由于清政府一贯秉持“限蒙”、“弱蒙”，到清朝中叶以后，青海蒙古人口锐减，社会凋敝，一片破败景象。1725年，青海29旗有21000户，11万人；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减少至11000户，减少近一半。至清末，人口又减至3万左右。

根据1938年的官方人口统计，较1725年编户情况，青海29旗只有四个旗有所增长，其余25旗都是大幅下跌。比如，北右旗由900户减为40户，前左后旗由2000户减为150户，前左中旗由2000户减为60户，土尔扈特左翼旗由300户减为60户。甚至出现南左次旗因绝嗣被撤销，喀尔喀右翼旗由1015户减至2户的情况。清末民国蒙地曾经流传一个笑话“有一个旗王爷，只有一个属民和一条狗，属民还是自己的弟弟”，可见青海蒙古凋敝到何种程度。虽然清末民初蒙旗困顿是全国普遍现象，但是青海尤甚，已经濒临“亡族灭种”的地步。

与人口锐减相伴是疾病与贫困。喇嘛淫乱导致整个蒙古族性病盛行，前首旗（今河南蒙古自治县）性病发病率达65.5%，妇女不孕率达40-50%。经济情况来讲，前首旗也是青海蒙古最富庶的旗，有一半以上的户数牲畜量在25头一下，又有7%的户数一无所有，为赤贫户。

蒙古族衰微的直接后果是蒙古族大部牧场最终被藏族占领，青海文化的属性由蒙古族性向藏族性转变。雍正年间划界编旗时，蒙古族牧场南界远远超过黄河以南，到达今天的贵德-玛多-曲麻莱一带。随着蒙旗人口凋敝，防御能力减弱，从乾隆年间起，就大量进入黄河北岸，侵占蒙古牧场，到清末，藏族已经遍布环青海湖，蒙古族被压缩在河南和海西少数地方。“河北数千余里尽数旷土，是以野番占住”，形成了今天藏族占据几乎全青海的局面。

处于藏民包围中的青海蒙古族（清末民国藏族人口达40多万，十数倍于蒙古族）在文化上也开始“藏化”：清朝中期，青海大量蒙古语地名已改为藏语地名；藏语开始成为蒙古族主要的教育，甚至日常生活用语；蒙古族取名也多数用藏语人名；蒙古族服饰也开始藏族化，“率穿番子衣帽，毫无区别”。由于蒙古文化的丧失，甚至在好多地方蒙古族人已经丧失原有的民族认同，转而认同是藏人了。

到民国时期，蒙古族在人口、经济、文化上普遍衰落，已经由昔日青海的主宰民族，沦为一个对青海影响力甚微的弱小族群。又加上哈萨克族入侵，蒙古族又丧失了大片海西牧场，导致大量蒙民流离失所，在甘州、肃州等地乞食者不下万余。到新中国成立时，蒙古族人口已经减至2.25万，仅占青海人口比例的1.5%，不仅大大落后于汉族、藏族，比不入其法眼的撒拉族、土族也不及了。

结语

就整个清代而言，蒙古文明在满清羈縻之下衰落，而青海蒙古的衰落是最典型的历史标本，为我们观察草原文明兴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满清羈縻青海蒙古的政策，也彻底改变了青海的文明版图。蒙古族留下的空缺，被藏族填充，藏族再次占领整个青藏高原，奠定了今天西部民族格局的基础。■

边疆观察

达赖喇嘛注视下的革命：藏传佛教宗派关系的当代流变

作者：李永峰

一三九八年，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上书当时统治西藏的阐化王扎巴坚赞，提出“佛教治世”——以戒律范行，以教义治心，造成僧俗大众均安份守己，敬上睦下，既无斗争，更不反抗的局面。近乎三百年之后，一六七九年，第五世达赖喇嘛在清政府支持之下，改革西藏政体，指导他所领导的官员颁布《噶伦办事章程》，规定“官员僧俗并用，僧高于俗；任官俗人必须尊奉格鲁派。”（冉光荣：《中国藏传佛教史》P136）五世达赖也曾在自传中表达出，要让其他宗派全部改宗为格鲁派的意思。虽然这一想法并没有实现，但由格鲁派所领导的西藏佛教治世体制，从五世达赖开始，已然建立。这一体制后来演变成了持续两百多年的以达赖喇嘛为领袖的格鲁派甘丹颇章政权。

藏传佛教宗派关系的变化，其背后跟周边政治势力消长有密切关联。格鲁派占主导地位之前，萨迦派曾因为与元朝朝廷关系密切而统治西藏，在萨迦派内乱之后兴起了帕竹王朝与仁蚌巴时代，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则是崇信噶举派的藏巴王朝崛起。在借助清朝册封和蒙古军队的优势击败藏巴势力，格鲁派开始统治西藏。西藏另一大宗派宁玛派，虽然在后弘期已无力与各派争霸，但前弘期的赞普时代，宁玛派占据统治地位，势力压过苯教和汉地禅宗。

二十世纪以来，西藏周边的政治势力，以及西藏本身的社会基础，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藏传佛教内部的宗派关系，是不是也随之而有了大变化？达赖喇嘛之所以被视为整个藏人的领袖，其核心在于格鲁派的“佛教治世”。在格鲁派的政权基础不复存在以后，其他宗派还会臣服于格鲁派吗？显然不会。

政教分离的世俗化之路

1959年，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六万多人，跨过喜马拉雅山流亡印度。整个藏区开始了共产党主导之下的土地改革运动，对旧有的寺院、宗族、部落势力通通进行改造。无神论的共产党自然无法接受“佛教治世”，整个藏区的政教合一也至此终结。八十年代以来，宗教势力虽然有所恢复，但在政府监督之下，再也没有机会染指政权。格鲁派著名寺院虽然还受政府统战部门礼遇，但是不会再像历史上那般成为政权倚重的统治工具，反而因为达赖喇嘛的流亡，或许格外受猜忌。

这一世俗化之路，不止共产党所控制的西藏本土如此。1959年流亡印度后，达赖喇嘛在印度所建立的流亡藏人社区同样也在经历。1959年12月，达赖喇嘛在印度菩提伽耶宣布，未来的西藏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的政府，并要求人民尽快选出各区的代表组成民选议会。1962年9月2日，第一届西藏流亡政府议会正式宣誓就职。流亡藏人的民主实践经历了五十年发展后，于2011年3月14日，达赖喇嘛致函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表示：“使我因具有达赖喇嘛的名号而产生的一切政治或行政的工作或仪式必须全数取消。”半年之后，并非由达赖喇嘛直接指定的“藏人行政中央”最高行政领导人洛桑森格，也经由选举而上台。藏人流亡政府政体从“君权神授”向“主权在民”的转变，尽管漫长，但一直向前。

在政体转变中，旧有的宗派关系早已发生变化，从1959年开始，就没有再出现“尊奉格鲁派”的明文规定。达赖喇嘛开始尝试用另外的方式将宗派势力纳入政府。第一届藏人流亡议会中，四大教派各有一名代表自动当选议员。这四大教派分别是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和萨迦派。1976年，第六届议会上，新增了苯教代表。议会中，各派名义上政治地位是平等的，但彼此的斗争依然存在。过去十几年中，另一宗派觉囊派，也一直游说流亡政府，希望自己能获得议会席位，但遭到其他派别抵制。2015年9月15日，150多名觉囊派代表在议会会场外请愿，“请愿活动进行至第三天时，请愿者与本届议会九次会议上反对觉囊派享有议席的萨迦派议员格西次仁波发生拉扯、争吵，请愿现场一度出现混乱。”两百多年来，一直享有特权的格鲁派，也对于自己与其他派别降至同等地位而不满。其中的激进势力代表就是“多杰雄天”组织。尽管因为与中国政府关系的原因，“多杰雄天”组织在大众媒体中，已经不在被放置在宗派内部关系中讨论，而是被视为因中共的收买才反达赖喇嘛。但不容抹杀，“多杰雄天”组织对达赖喇嘛的挑战，最初其实是格鲁派激进势力对于达赖喇嘛宽容各宗派的反弹。有研究认为，“多杰雄天”的挑战，直接与十四世达赖喇嘛支持宁玛派所发起的“利美运动”有关。（萧智隆：《利美运动之研究》）

宁玛派与噶举派的扩张

十九世纪后半叶，宁玛派的蒋扬钦哲旺波、蒋贡康楚罗卓泰耶、秋吉林巴三人，深感政治与宗教隔阂对佛教的伤害，重新发掘前弘期的佛教典籍，编辑《五宝藏》，在佛法修炼上打破宗派与师徒藩篱，发起“不分派运动”，也称之为“利美运动”。“利美运动”主张不同宗派求同存异找出彼此最大公约数，“在此基础上给予宗派应有的尊敬”。（萧智隆：《利美运动之研究》）这是对尝试取消其他宗派的格鲁派的反动。从十九世纪开始，以信仰格鲁派护法神“多杰雄天”为主的强硬派，就在反对“利美运动”了。

到了今天，“利美运动”依然受到格鲁派强大的抵制，达赖喇嘛的朋友洛桑嘉措教授据说因此在达赖喇嘛寓所附近被“多杰雄天”一派刺杀。以至于达赖喇嘛下令，禁止支持者信仰“多杰雄天”。不过，借助“利美运动”，宁玛派却在藏人之外找到了广大的新信众，为藏传佛教的传播打开了全新的境界。目前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中上层的汉人群体，对于藏传佛教非常热衷，光北京朝阳区，据说就有“三十万散养的仁波切”。而这些信徒，基本没

有宗派之分，甚至不承认汉传与藏传佛教的区分，只是认为自己在修炼佛法。一些认真的信徒，还会依赖四川色达五明佛学院的教材进行学习。（彭兰闵：《试论当代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原因、特点和发展趋势》P28）

色达五明佛学院由晋美彭措堪布在1980年创立，坚决主张“不分派”，而且教学中广泛吸收汉传、南传佛教教义，是“利美运动”在当代的实践者。色达五明佛学院目前是世界最大的佛学院，也成为整个藏区宁玛派的中心。（李晋：《当代藏汉的佛教交流：色达的民族志对话》）色达五明佛学院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吸收了大量的汉族信徒并且依赖于他们的供养。色达五明佛学院推动藏传佛教东进，并且走向复兴。

如果说，在中国大陆目前因为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原因，宁玛派已经成为新的中心，那么自从1959年之后，在西方世界，则是噶举派占据优势。（郑志明：《藏传佛教在台湾发展的现况与省思》）噶举派的仲巴仁波切，在牛津大学毕业之后，1967年创立苏格兰桑耶林禅坐中心（Samye-Ling），这是藏传佛教在西方的第一座寺庙。当时正逢六十年代学生运动追求个性解放，神秘的藏传佛教迅速成为西方青年追求心灵治疗的重要手段。才华盖世的仲巴仁波切是藏传佛教在西方迅速打开局面的关键，他后来前往美国传法，独特的个性加上惊人的成就和混乱的生活，令他成了世界级明星，这进一步带动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沈卫荣：《酒、色、疯僧和活佛》）除了仲巴仁波切，噶举派的噶鲁活佛、洛珠仁波切、土库仁波切等，也开创了不少寺院和坐禅中心。噶举派势力惊人，宁玛派和萨迦派也有不俗发展，格鲁派则因为与政治关系过于密切而束缚了手脚。

在藏传佛教从一种地方性宗教变为全球范围内的普世性宗教之际，宁玛派与噶举派所吸收的信众，不再受种族与国家限制，而有了大量藏人之外的信众。这促成了藏传佛教新的发展，这也改变了过去藏传佛教所依赖的供养基础，寺院的社会生态也发生变化。这可谓藏传佛教在当代的最大变革。而此时，格鲁派却因为历史包袱，落在了变革大潮的后面。

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的区分

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从西藏出走，在印度达兰萨拉创建流亡政府。因为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二者对藏人的号召力一直挑战中国中央政府对藏区的管治，西藏问题也成为中国当前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自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北京开始不再追求用谈判的方式永久解决西藏问题，而期待达赖喇嘛逝世之后，这一问题自然淡化。如果说，享有达赖喇嘛这一名号的转世者，可以继续统领所有藏人，那么，北京的这一策略不得不说老谋深算。因为下一代达赖喇嘛尽管可以在藏人心目中继续享有观音菩萨转世的法脉，但无法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同样的人格魅力和领袖地位。失去国际政治势力支援，藏人流亡社区能否维持下去都成问题，更别说挑战中国了。但是，当格鲁派衰落，藏传佛教宗派关系乃至藏传佛教发展模式都出现转变，未来统领藏人的已经注定不再是格

鲁派的达赖喇嘛时，这一策略可能也就未必那么高明了。如果跳出格鲁派的局限，达赖喇嘛是否继续转世也没那么关键了。

在宁玛派与噶举派上师（当然其中也包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个人号召力），已经将藏传佛教从地方宗教变成了世界性宗教之际，藏传佛教的信徒遍布世界，包括中国大陆的广大汉族群体，西藏对于他们来说，是他们的圣地，西藏所发生的事都与他们建立了关联。这个时候的西藏问题，不再只与藏人相关，而与所有藏传佛教信徒相关。正如耶路撒冷不止与以色列国民相关，而与全球的犹太人群体相关一样。过去人们所讲的西藏问题，侧重于藏人群体的人权问题，未来的西藏问题将侧重于藏传佛教的宗教问题。藏人作为藏传佛教自然而然的信徒，其人权状况，必然也包含在了整个藏传佛教生存状况的宗教问题之下。这个时候，西藏问题才真正变成了国际问题，而不像过去，只是引发国际关注的藏人问题。

研究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学者认为，“佛学院是在采用一种与拉萨不同的模式对抗着国家”，“当西藏无力依靠自身的资源与国家对抗时，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选择了西方；康巴藏区却利用改革后的机遇成功实现了向东方的结盟”。（李晋：《当代藏汉的佛教交流：色达的民族志对话》）藏族这一称谓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民族识别工作之后，中央给予的称谓，藏人更重要的共同特征在于他们都是藏传佛教信徒。1959年之后，藏人理解中的西藏危机，也是指宗教法脉的危机，宗教问题的重要性超过民族问题。因此，宁玛派的东进和噶举派在西方社会的扩张，等于是西藏对于二十世纪以来所遭遇挑战的另外一种回应。不同于十三世达赖喇嘛一直追求的独立，也不同于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流亡藏人社区所追求的大藏区自治。跳出无力建构民族国家的困境，而将西藏问题推向另一个层面。

藏传佛教各宗派在当代的变化是明显的，格鲁派或许可以继续流亡藏人社区占据优势，并且依靠过去几百年间财富和组织能力的积累，暂时维持统治地位。但在世界范围内，噶举派、宁玛派，以及他们相应的宗教领袖，比如噶举派的第十七世噶玛巴·伍金赤列多吉，正在成为新的藏传佛教代表。他们所追求的西藏理想，或许与藏人流亡政府不同，也与格鲁派旧有势力不同。这种不同，十四世达赖喇嘛心知肚明。甚至，十四世达赖喇嘛本身就是这种不同的推动者，他赞助宁玛派的“利美运动”，压制格鲁派激进势力“多杰雄天”组织，反对达赖喇嘛称号的继续转世等等。他看到了藏传佛教宗派关系的当代流变，也理解自己一直以来所追求的道路的局限，他在寻找新的突破方向。这可谓是一场达赖喇嘛注视下的革命，尽管这场革命首先要打击的，就是自己这一宗派的权势。■

本土／国际

海湾四国访问手记

作者：李靖云

自今年1月2日沙特处死什叶派教士奈米尔之后，整个海湾地区都陷入了连锁效应的区域对抗。首先是伊朗民众冲击沙特大使馆，1月4日，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将教派冲突掩饰下的国家冲突直接摆到桌面。作为海湾合作组织的主导国家，沙特此举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巴林宣布和伊朗断交，阿联酋宣布将与伊朗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科威特和卡塔尔宣布召回驻伊朗大使，几乎一夜之间，整个海湾陷入了一种相对紧张的气氛。而作为世界油气的主要产地，海湾地区也是土豪国家的代名词。去年开始的油价断崖式下跌，海湾国家又是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一方面经济压力巨大，另一方面政治空气紧张，作为欧亚大陆柔软腹部，波斯湾地区是继续走向繁荣与稳定，还是走向对抗，紧张和衰落呢？1月20日到2月4日，笔者走访了处于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海湾四国，总体感到了这一地区确实有某种紧张气氛，总体上的平和安定超过想象。对于这样一个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地区，发展仍然是核心的问题。套用中国人熟悉的那句老话，地区的平和安定更依赖于发展。

逼仄的转型之路

Gulf（海湾），国际社会因历史习惯公其为波斯湾，而阿拉伯国家则坚称其为阿拉伯湾，故而一般国际讨论仅称其地位名称为“海湾”。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命名权的争夺即可知此地区的历史纠缠。仅以民族分布看，海湾的东西两侧目前都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口。但是海峡的西侧从北到南则有七个阿拉伯国家，东侧则是伊朗辖属的几个阿拉伯省份。统一的伊朗和分裂的阿拉伯世界，实际是海湾几千年的政治常态。笔者此番访问的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夹缝中的四个阿拉伯君主国，卡塔尔，巴林，阿联酋，阿曼。得益于石油财富，四国都是全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国家。多哈机场一降落，就能体会到这种“土豪”气息，异常宽大豪华的航站楼，充分体现了“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海湾领导风格。按照卡塔尔的发展计划，多哈机场将占整个城市面积的三分之一，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但对于天然气储量雄踞世界第三的卡塔尔而言，修建超大机场并非是简单的炫富，而君主发展规划。油气是真主赐给穆斯林的礼物，成为世界的中心城市，才是这些君主的转型梦想，而航运中心就是走向世界中心城市的关键一步。海湾国家虽小，但是却集中了卡塔尔航空，伊蒂哈德航空和阿联酋航空，三家世界前十的大航空公司。除了多哈，迪拜和阿布扎比都在修建世界最大的机场。从投资的角度看，这一集中投资反应的是这些国家急于摆脱单一的油气经济的内在焦虑。“全面实现经济多元化”，这是笔者短暂访问中所有最多听到话。甚至

于笔者访问过程中，阿联酋联邦最高委员会在内陆沙漠的酒店召开了特殊国务会议，商讨石油时代结束之后怎么办。虽然政治空气紧张，但至少在表面看来，油价下跌远比与伊朗处理外交关系要重要的多。

但是客观比较，转型道路并非是轻松。今天迪拜常常被当作海湾油气国家经济转型的样本，但事实上迪拜所走过的道路，巴林早已走过。巴林一直都是海湾地区最早实现经济多元化的国家，至今麦纳麦港仍然是海湾唯一的自由港。巴林最早取代贝鲁特成为中东金融中心，作为地区航运中心，巴林的海湾航空曾经是中东最成功的航空公司。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今天阿联酋航空的成功，是挖角海湾航空的基础上。当今迪拜虽然是整个地区商品贸易的中心，但是巴林消费品展仍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贸易展。

如果以GDP估算，油气在巴林GDP占比已经下降到20%以下，这被巴林官方和世界视为经济多元化的成就。但是换个角度看，今天油气收入仍然占到巴林政府收入80%以上。油气收入下降，政府收入大幅度下降，国家对居民到补跌并没有下降。经济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政府收入多元化。作为海湾地区最早开发油气到地方，巴林的油气资源已经下降到每天十万桶（包括沙特的五万桶所谓“共同开发”，实际就是赠予），依旧是维持国家运转的最基本收入。表面上看，海湾各国都是自由经济，政府没有什么税收。但是与其说这是贯彻自由主义经济，不如说这是传统的社会运作的结果。仍然保持一个传统的阿拉伯社会政治机制，政府没有什么成型的税收财政系统，财力有限。受益油气资源的开发，国民在短暂的几十年中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享受了极高的福利待遇。一旦油气收入下降，福利则难以为继。对海湾油气国家而言，经济多元化的不仅意味着经济上多产业发展，保持繁荣。但是挑战则在于政府收入要多元，不能是单一油气收入，这一挑战对人民而言也是成立的，富足的生活不能依靠油气。

旅游度假中心，会展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以这样四个中心为方向的转型，巴林可以说是先驱，迪拜在路上，卡塔尔乃至阿布扎比刚开始。但是目标如此方向如此一致，道路就相应逼仄不少，不仅是激烈竞争，更是恶性竞争，这点在航空业已经显现了。唯一在转型道路的取向不同的是阿曼，作为传统的海上强国，阿曼则是把制造业和航运业发展作为自己的方向。为此，阿曼设立了杜库姆经济特区，这一特区定位是工业制造。不仅给予三十年免征任何税费的优惠条件，甚至为此邀请了在工业园设计运营异常有经验的新加坡团队，对整个经济特区统一管理。但对于没有建立工业传统的国家而言，走制造业的道路则是另外一种艰辛。劳动力体系的搭建，纵深市场的培养，生产链的确立，都不是海湾一个国家能做到的。

和平与发展到发展与和平

笔者回程之后，恰好是中东和东北亚两处都出现了新的紧张气氛，曾有资本市场的资深朋友问我，“和平与发展是否还是时代的主题”？以我对海湾最直接的观察而言，和平

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此判断仍然是成立的。但是可能一定程度上得倒过来，中东必须要确立一条可行的发展模式，才能保证区域相对稳定和平。海湾地区长期的对峙与不稳定，传统上地区的两个重要大国，伊拉克毁于战争，伊朗受制于制裁，实力有短板。沙特作为地区目前的主要力量，但是宗教的原因并不能有效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起到示范作用，同时作为恐怖主义的袭击对象，安全情况也不让人放心。如同世界历史上的普遍规律，地区大国遭遇各种问题，大国对峙夹缝中的小国往往会呈现了经济社会一片繁荣。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以及阿曼，由北到南的这样一片狭长边缘地带，成为动荡地区的繁荣地带，既有油气资源开发的偶然，也有政治环境的必然。

动荡的地区环境，需要一个安定的地区作为缓冲地带。较为开放的市场体系，到比较自由的资本环境；便捷的航运物流，再到和谐的社会环境，还有发达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冲突各方所需要的，而缓冲地带可以争取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黎巴嫩内战，巴林趁机取得了大量集中在贝鲁特的金融业务，走向休闲度假和金融服务中心。两伊战争之后，迪拜乘机成为了对伊朗的贸易港口，海湾战争之后，更进一步取代海湾北部的港口，成为了海湾航运的核心。阿拉伯之春之后，中东的大幅震动，又有大批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等地的富豪来到海湾。地区动荡不断给海湾四国带来了发展机会，其自身的发展意志则支撑起了旋风般的快速发展。

迪拜的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下有一句迪拜埃米尔穆罕默德·本·拉希德原话，“The word impossible is not in leaders' dictionaries”。某种程度上，这体现了海湾国家领导人的执政风格。笔者的老友，阿联酋文化部高级研究员的柴绍锦博士将其概括为，“贝都因风格”。海湾阿拉伯国家，虽然都是一个民族，但是其分支复杂，但是王室家族都是贝都因部落，政治的行为模式和文化标准仍然是贝都因式的。“如同沙漠风暴，来的时候会非常激烈，但是过去之后，可能立刻归于平静，什么都没有改变”。在海湾国家的政治中，领导人的个性都常常会有惊世之举，但是个人的突破未必会带来一个系统的变化。依托于石油财富，海湾国家都有非常强大的发展支持，但是发展更多依赖于领导人意志，并没有深入的发展基础。基本上民众只是享受石油财富带来的巨大收益，对于开眼看世界并没有足够的热情和准备。统治者的雄心和远见，与民众的恬静与安逸正好形成对比。对于民众而言，安享真主赐予的财富，做好一个穆斯林的义务即可。但对于统治者而言，不仅考虑做一个避风港，缓冲地，而是要真正成为区域发展的带动者，唯有此才能保证本国的影响力继续，维持自身的繁荣。显然，天际线不断提高可以引人注目，但是要真正的成为领导者，这需要长期的折冲樽俎。环顾整个大中东地区，埃及长期经济不景气，阿拉伯之春后更是元气大伤，叙利亚和伊拉克长期内战之后基本已经可以放弃。真正地区有能力的大国，则是沙特和伊朗。沙特资源丰富，经济有底气，又拥有伊斯兰圣地，但是政治上封闭，国家受制于宗教约束太多，并不能提供什么发展方向。伊朗地缘影响力较大，但经济被制裁多年，目前实力欠缺。宗教上什叶派和政治伊斯兰共和国模式，导致伊朗无法被普遍接受。相对开放的政治社会态度，积极的推动经济发展，这些都使得海湾小国的发展模式更被世界认可。但是，从被世界认可与到成为本地区发展的样板，两者之间仍然有一个跨度。安

全上要成为美国的伙伴，经济上要成为伊朗的伙伴，政治宗教上要 and 沙特站在同一战线。对于领导人而言，保持之间的微妙关系非常重要。沙特和伊朗直接对抗下，海湾小国基本都是选取了务实态度，除了被迫财政上仰沙特鼻息的巴林宣布断交，最激烈的态度也仅是降低外交关系为代办级，各国都希望保持一种平衡。从长期而言，伊朗解除制裁是本区经济发展最大的利好消息，虽然海湾小国长期以来都是伊朗的借以维持对外金融贸易的通道，但是是否会成为伊朗经济重振的桥梁，这是未来需要证明的。但至少目前看来，从发展模式上，巴林，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都无法提供伊朗一种可以直接借用的模式。

中国和海湾，某种不期而遇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在海湾是无所不在的。有着三十万华人常驻的阿联酋自不必讲，卡塔尔刚刚举行了“中国制造展”，多哈的标志性建筑多哈塔是中国建筑集团承建的，巴林银行业协会专门出了专题“中国经济转型对海湾意味着什么”，阿曼杜库姆经济特区专门建立了中国工业园。既不是传统的反帝反殖的战友埃及，也不是某种有着战略协作关系的伊朗，事实上过去十五年，中国在中东联系最为密切的是海湾国家。这既是一种意外，却也是一种必然。

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迪拜mall，几乎每个门店都有中国导购，黄金装裱的阿布扎比国王酒店，号称世界唯一的八星级酒店，每个房间都专门配有中国管家服务。但这些都是超出中国和海湾国家设想的，可以说是一种意外。过去十多年的石油繁荣，海湾产油国上上下下都握有大量的收益，针对这一人群的消费，才有了迪拜mall的建设和王宫酒店的对外开放，高端而优良的服务，很快吸引了富起来的中国人。性价比优势很快吸引了中国人大量来此消费，进而成为了这些酒店和商场的重要客户。石油和天然气的最大供给者和最大购入者，以终端消费的方式再次相遇了。这一遭遇既说明了中国与海湾实际上有着更深入的经济联系，又表明还可以挖掘的更多的联系。

与随处可见的中国游客相比，中国制造和中国企业则是更密集的出现。华为当仁不让，在海湾已经是中国的代表了，甚至笔者亲见迪拜王室成员也使用华为手机。从石油开发，建筑工程发包，再到电信设施的铺设随处都可以找到中国企业的影子。十五年前，中国在多哈喜来登酒店签订入世协议，过去十五年，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成就，海湾已经可以直接感受到了。但是如果这一联系是否足够强大，中国和海湾现有经济联系机制对企业而言有有力的支持？答案显然不是。比及随处可见的Citibank和HSBC，以及穿梭于高端写字楼的欧美律师，高级经理人和各种专业人士，中国和海湾的关联度显得比较低端。比及占本区域人口一半以上的印巴孟非外劳相比，中国和海湾的联系又是那么单薄，不成系统。海湾国家带有鲜明贝都因风格的崛起，使得中国和海湾快速而热烈的建立了深切关联。但是这种快速和热烈如何维持？把不期而遇变成长期的伙伴，这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从贸易角度看，中国和海湾之间的贸易量非常之大，但是大量是中间品贸易，作为

终端呈现的中国商品并不多。不同于满街的丰田车，随处可见的三菱电机，除了华为、中兴、三一等企业之外，中国企业并未在海湾形成自己的销售网络。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建立自己的品牌已经不易，而要将带品牌商品扬帆出海则更加困难。靠低价打开市场，确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国际贸易过程中的本地化销售代理，法律，会计，保险等相关服务能力的不足，企业不能在销售和订单管理增加附加值，而只能选择“薄利多销”的简单策略。海湾最大的日产销售终端是超市，家乐福随处可见，而能与之抗衡的本土超市LULU则是印度穆斯林商人优素福·阿里，目前排名世界零售的213位，年销售额为42.5亿美元。在日用百货生产制造居于世界第一的中国企业，其销售方式仍然是义务小商品城模式。即或是在商务部引导开发的为中国企业服务的龙城，其运作模式和一般的小商品城并不二致。温州式的小商品销售模式，仍然是中国企业进入海湾市场的主要途径，只是这一模式的边际收益正在加速下滑。可以想象，如果莫迪所谓的“印度制造”的计划实施的比较顺利，印度人在海湾中东的庞大销售终端，会很快把印度制造送到消费者手中。

走出“发展”的困局

笔者访问海湾四小国的时间，正好是习近平以中国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了海湾两个对峙大国沙特和伊朗。中国国家元首的访问，更大程度上被当作一种商机，特别被视为是对伊朗解除制裁之后“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具体布局。笔者见到很多将此作为利好消息的华商，阿拉伯商人，如何加强海湾贸易中转中心，加强对伊朗贸易，乃至讨论在伊朗推动建立龙城。虽然新的机遇就在眼前，但是如何改善目前对中国海湾贸易结构，改进经济联系，对未来满怀信心的从业者，对此忧虑也溢于言表。

无疑，从大周期看，油价大幅度下跌，以及世界总需求下降，中国和海湾都不可避免的走向“新常态”。巴林经济发展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Jarmo Kotilaine为巴林银行家杂志秋季号撰写专文《中国经济转型对海湾合作组织意味着什么？》即这样总结：中国经济发展转入一个新阶段，意味着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关系也将发生变化。从油气和普通商品的贸易转向何种经济关系，对海湾国家而言，这是非常需要答案的问题。油气开发带来了快速致富，但是并未带来经济整合。而油气开采本身带来的贫富差距，对于伊斯兰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对于这些小国而言，油气资源充足的时候，尚还能维持经济活力，但是油气时代结束之后，甚至仅仅是油价断崖的下滑，其后果都不可想象。巴林推动经济多元化本土化多年，但是贫富差距出现之后被不断扩大。本地区政治上长期对抗，经济上小国独富的局面确实难以维持。谋求经济整合，这似乎是海湾国家一致的诉求。海湾合作组织，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但是近年来异常的活跃，则是地区经济整合热情的一个反映。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能带来地区经济的整合发展，就会备受重视。海湾各国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热情，正是这一逻辑下的反映。Jarmo Kotilaine文中即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欧亚基础设施开发，三百多个项目开发，这对于处于亚非欧三大陆十字路口地带的海湾国家而言，有着极大的意义。

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通过基础设施实现区域经济的整合，无疑中国官方提出的这一宏大发展远景，体现的实际是发展中国家的痛点。但是官方方案之外，更为深化的经济联系还需要怎么深化？这显然更是现实的亟需解决的痛点。而中间品贸易的改善又是最为直接的需求。从企业角度而言，品牌产品的销售需的相关服务更多。华为无处不在背后是华为相应的贸易服务无处不在，律师，会计师，审计，代理商等等的相关服务网络的完善，为产品品牌的建立和销售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对中小企业和大量对日常消费品而言，建立这样的服务体系，终端销售体系则是高成本的事情。中国想要进一步扩大深化海外市场，服务体系和销售终端的建立是关键。四处开花的龙城项目，方便了贸易商落地，但是义乌小商品城的运营模式显然对产品相当成熟的中国企业而言远远不够。

贸易的痛点在于相关服务的搭建，但是对中国和海湾的深层经济需求而言，则需要有更深层次的考虑。海湾地区是世界资本最密集的地区，阿布扎比一地的投资基金就有上万亿美元规模，是世界排名第二主权投资基金，大量的油气财富使得这些国家都有充裕的资本四处寻找投资机会。中东地区长期的冲突，以及911后对阿拉伯资本的严厉审查和高门槛准入，又导致了大量的阿拉伯资本集中到相对投资便利的海湾，特别是迪拜。对于资本而言，寻找投资机会是本能需求。无论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布局来讲，还是从现实中国经济真正建立影响力而言，海湾都是中国金融业的机会。作为发展中国家，找到长期的有效的投资机会，深化双方的信任，更多的需要依靠金融家的努力。中国工商银行中东中心的总部即可眺望世界最高楼哈利法塔，卡塔尔标志性的多哈塔里，宇宙行也建立中东第一家人民币清算中心。中国金融和中国制造都走到市场的前台，但是对中国金融而言，更大规模的走出去，有多少机遇，就会有多少挑战。

深化贸易服务，金融市场的参与，可以说是具体的市场贸易的操作。不管是货物市场，服务市场还是资本市场，市场的整合到底还是一种商务活动。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细节的问题从来都要从更大宏观入手。不管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地区安全角度，海湾对中国都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在炮火连天，恐怖袭击四起的中东，海湾地区长期保持了安定。虽然从禀赋条件上讲，海湾四国都不足以成为影响地区发展的决定性大国，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些国家可以成为引导地区发展的关键小国。但是这种引导力量的建立，必须要有相应的外部力量的合作推动。从经济条件来看，这一地区毫无疑问都是最为富裕的国家。但从来没有被视为发达国家，开发油气资源致富，可以成为暴发户的土豪，但并不能带来系统的持续发展能力。这不是海湾油气小国的所面对的挑战，也是整个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的问题。传统国家被拖入现代世界，处处碰壁，无法适应，对中国人而言是熟悉的，对海湾阿拉伯人也不陌生。如何合作探索自身发展的方式，应对“发展”的挑战，这仍然是越来越迫切的问题。相比较周边不稳定的大国而言，“发展”的尝试，小国更有机会。除了迪拜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外，笔者所见阿曼正在开发的杜库姆经济特区对中国而言更有合作开发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未来的趋势。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特区，推动产业更替，从资源开发到人力培养，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国不仅有经验，而且有着本国已经过剩，但是区域比较仍有优势的产能。未来中国却是有着可能，成为进一步推动海湾小国

进一步成为区域发展的关键小国，同时也能进一步完成中国深化市场实际需求。所谓世界潮流，浩浩汤汤，“发展”从短期应对“现代遭遇”到自我形成一种潮流，这样才能算真正走出发展的困局。■

互联网观察

中国民间字幕组浮沉十五年

作者：刘舒婷

近十五年来，内地互联网经历了爆炸式发展。十五年前的2001年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00年12月，中国共有上网计算机约892万台，上网用户数约2250万²；十五年后，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³。在观察近十五年内地互联网发展时，民间字幕组的发展是一个特殊的切入点。自其产生之后，它的发展不仅反映了内地互联网的变化，亦与国家信息网络、文化政策密切相关。本文将尝试从内地民间字幕组形成初期、爆发期、转型期、迷惘期四个时期，观察其与整个互联网发展以及政策变化间的关系。

初期形成：源自爱好的封闭兴趣组（2000年至2005年）

2000年到2002年，中国互联网经历了第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上网用户数三年内激增5000万人。其中，上网用户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网方式不再仅限于拨号上网，专线上网及宽带上网用户增长逾2500万人。网速的增加丰富了在线分享的网络资源，在一些业已形成的论坛中，催生了以日语动漫、英语影视为主的讨论版。对于这些资源的语言本地化，多由内部成员自发翻译并上载分享。随着资源的增多，兴趣组逐渐扩大，一部分从板块附属变为独立板块，另一部分则逐渐改变了原论坛定位。如2001年成立的TLF（The Last Fantasy）字幕组，脱胎于当时的TLF游戏论坛，其第一部完整字幕作品，即是游戏改编的电影《生化危机》（2001）。比它更早一步的是由美剧《老友记》剧迷站发展出来的F6（Friends 6）字幕组，其具体成立时间已不可考，在随后的发展中亦从单一剧集拓展到“美剧总部”。

在随后的几年里，随着内地宽带市场的高速发展，通过P2P等文件传输软件在短时间内容下载影视作品变得容易。加之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独立架设论坛亦不在是难事。于是，众多字幕组在这一阶段兴起并开始运营自己的论坛，其中包括日后被称为四大美剧字幕组的YDY伊甸园（2004年论坛上线）、1000fr风软（2005年论坛上线）、YYets人人影视（2006年论坛上线，前身为影音[YY]工作室下设美剧组）、Ragbear破烂熊（2007年论坛

² 《2000年~2001年互联网大事记》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dzsj/201206/t20120612_27417.htm

³ 《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601/t20160122_53271.htm

上线，其创始团队为因理念不合出走的风软原高层）。至此，一条完整的字幕组“产业链”最终形成，涵盖片源、翻译、时间轴、校对、压制、分流等不同环节，以论坛为平台，通过BT、P2P、FTP等方式分享制作好的字幕及成片。

爆发期：兴于《越狱》，影视文化的“无国界运动”（2006年至2009年）

真正的热浪始于2006年的《越狱》。由于众多字幕组山头林立，所制作的字幕作品重叠度大，“行业竞争”开始出现，拼速度抢首发成为此时期的一大特点。各大字幕组进入高速扩张时代。以YYets人人影视为例，从2006年论坛上线，经过10个月发展，人数从20人左右扩张到200余人，能同步连载译制的新旧剧集高达25部之多，成员遍布陆港台美加澳等地。

2006年《纽约时报》曾刊文《打破文化屏蔽的中国字幕组》⁴，其中就提到了风软字幕组的负责人之一丁承泰。该文还提到，中国网民在快速增加，其中大部分都安装了宽带，而“网上下载的美剧暂时还没有受到限制”，“字幕制作组的成员们都意识到，他们的作品在其它国家可能被认为是侵权。不过根据中国法律，这些作品很可能被认为是学术研究。因为他们既不收费，也不以赢利为目的。”

毫无疑问，因为《越狱》的大热，使得中国字幕组“打破文化屏蔽”，扬名世界。然而，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字幕组也因此暴露在公共视野中，从小众、封闭、偏安一隅，到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还是2006年，当年底，一组名为《〈越狱〉的中国隐秘流行》的报道刊登在了《三联生活周刊》上，它在肯定字幕组在美剧传播中起到核心关键作用的同时，也抛出了一个问题：“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如何深入保护知识产权？”

尽管越来越多的字幕组在制作好的字幕或片源内加上“免责声明”，试图强调“只用作学习交流并非商业用途”。然而，前面已经说到，由于内地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进入Web 2.0时代后，提供在线观看服务的视频网站异军突起，截止到2007年，已有以土豆网、优酷网、六间房、PPS等领军的超过24家视频网站，网络视频广告收入从2006年的1.7亿元锐增至2007年的4.1亿元。在这些视频网站上，字幕组压制好的剧集成片，成为了大热的点击内容。在为网站带来流量的同时，字幕组“间接”为这些网站的流量变现出了一份力。此外，在电视及DVD仍是影音主流传播渠道的内地，不少线下盗版商将字幕组的翻译作品刻录贩售，使得字幕组作品有了网络以外的市场。

同时，对于这种全凭爱好的兼职来说，字幕组成员往往无法承担高额的服务器等费用，因此，从最初的字幕组成员间自发集资，到论坛会员“众筹”，再到出售内部FTP下载账号，再到论坛里越来越多的弹窗广告，筹集论坛站点运营资金的方式亦逐渐踩线。

⁴ 《打破文化屏蔽的中国字幕组》 <http://culture.163.com/06/1204/16/31GV4N7Q00280003.html>

这一时期的字幕组除了在版权的达克莫斯之剑下“偷生”之外，由于其所带来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有着共同爱好的小圈子，且因国外剧集在意识形态及艺术表现上的天然自由，因此，比起受到版权保护的掣肘，字幕组最先迎来的管制却是文化政策上的限制。

由于缺乏监管，互联网视频经过几年的粗放生长，内容良莠不齐。2006年更爆发了“性交易录像带”事件：一内地女演员在某视频网站公布与某几位导演的“潜规则”视频，获得数百万点击。以保护未成年人之名，从2002年以“该剧容易误导青少年”为由停播《流星花园》开始的广电总局，在2006年限制超女等节目并下令黄金时间不可播出境外动画后，再一次将目光移到了互联网。2007年12月27日，央视播出了题为《净化网络视听环境迫在眉睫》的报道，里面一位13岁学生说有些网页“很黄很暴力”。两天后的2007年12月29日，国家广电总局和信息产业部发布《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这是自2003年的第15号令、2004年的第39号令之后，针对互联网影视的更为完整的明文法令，其中除了更为严苛地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许可证申请细则外，内容方面也更加细化，如：“不得含有诱导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和渲染暴力、色情、赌博、恐怖活动等。”⁵

这一规定从最初针对视频网站，逐渐蔓延到了字幕组论坛。回看那几年大热的几部美剧，《越狱》《迷失》《英雄》《绯闻女孩》《广告狂人》《豪斯医生》《别对我说谎》《绝望主妇》……或多或少，其中掺杂了官家不乐见的“禁播”内容：性、暴力，甚至对立的意识形态。自2008年实施该规定后，当年前后几次抽查行动中，F6美剧总部、悠悠鸟影视论坛等赫然在列。而2009年3月30日广电总局公布的《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明文禁止未取得许可证的境外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和理论文献影视片等在互联网上传播⁶。2009年底，广电总局开展了一次严厉的清网行动，以打击淫秽色情传播之名打击盗版，截至当年12月，关停了530多家网站，其中，BTChina被封，VeryCD被无法正常访问，而字幕组如人人影视、伊甸园、猪猪乐园、圣城家园等亦先后遭到关停。

也是在那一年，2009年搜狐牵头联合全国110家互联网视频版权拥有和发行方共同创建的“中国网络视频反盗版联盟”，以抵制网络侵权盗版，推进网络视频正版化进程。2010年9月23日，搜狐引进了热门剧《生活大爆炸》并开始和美国同步网播，而当年它所采用的字幕，就是人人影视翻译的双语字幕。

转型期：“半公开”商业合作，从公开课寻找出路（2010年-2014年）

在2009年那场声势浩大的清网行动前，已经有不少字幕组嗅到政策转变而开始计划转型。人人影视算是其中之一。由于人人影视可算是当时较早意识到差异化发展并开始制作双语字幕的字幕组，自2006年建立论坛后迅速壮大，人人影视组员基本稳定在800至900

⁵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http://www.sarft.gov.cn/art/2007/12/29/art_1583_26307.html

⁶ 《广电总局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 http://www.sarft.gov.cn/art/2009/3/30/art_106_4410.html

人，论坛注册会员超过90万，其翻译制作的美剧也广传于各大视频网站。树大招风，人人影视成为提及“字幕组”时会被人们最先想起来的团队之一，相伴而来的，自然是媒体对其大量“无版权作品”的质疑。2009年初，该字幕组便已经在筹划转型，并且在当年4月曾拍摄并发布一部微电影《左右》，在原创视频上做出尝试。

在2009年12月7日，人人影视对外发布公告称，“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想过要搞视频资源，从一开始都是单纯的制作字幕……人人网将逐步转型只做字幕，彻底放弃视频分享。今后将招募有兴趣的爱好者，慢慢营造创作气氛，写写小说写写剧本，总有一天我们会做出属于人人影视的原创影视作品、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以网络为宣传途径，拍摄剧集，甚至以后拍摄电影。”⁷显然，对于内容的版权之争，人人影视想另辟蹊径，绕过争拗。然而，比原创视频更早一步实现的，却是因为翻译公开课字幕而开始的“商业”合作。

2010年3月底，同样在寻找生存突破口的VeryCD开始筹划翻译海外公开课程并找到了人人影视，提出由VeryCD提供课程资源和发布平台，人人影视字幕组负责翻译的合作方式⁸。两个月后，耶鲁大学教授卡根的《死亡》课程首集上线，点燃了内地网民的激情。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人人影视推出了《聆听音乐》、《古希腊历史简介》、《欧洲文明》、《金融市场》、《心理学导论》等多个公开课。趁着这股热潮，内地的门户网站网易在当年11月推出了“全球名校视频公开课项目”，同样与人人影视展开了合作。据人人影视一份内部公告，截至当年底，人人影视原创翻译了180多节公开课，约300人参与到制作过程中。

当然，这其中不止人人影视一家字幕组在进行公开课翻译，最早制作中文开放课程的台湾MYOOPS、内地的TLF字幕组等也在分头行动。为了不重复浪费人力，实现资源与字幕共享，2011年1月25日，公开课字幕组联盟正式成立，由人人影视、TLF、台湾MYOOPS、oCourse等组成。公开课字幕组联盟强调，“所制作的一切资源，包括字幕文件均免费公开发布，不以此进行商业盈利行为，各组使用共享资源重新发布必须保留原始翻译者名单以及小组信息。”并表示，“与搜狐视频，腾讯视频，新浪视频，优酷视频，建立友好发布关系。”⁹

尽管看上去人人影视的转型颇为有效，不但累计了大量人气，似乎离版权问题的灰色地带也“越来越远”。然而，在这一过程中，2010年8月，人人影视还是经历了一次关停。人人影视挂出公告称“8月19日下午三点因为一些原因网站被某地方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关停，服务器被没收，我们正在积极配合进行处理……预计3-5天后恢复。”并希望筹集

⁷ 《人人影视宣布转型：放弃视频下载只做字幕》 <http://tech.qq.com/a/20091208/000196.htm>

⁸ 《“网课”的幕后译手》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2-01/104821564641_4.shtml

⁹ 《公开课字幕组联盟成立 公开课翻译量全国第一》 <http://www.chinaz.com/news/2011/0125/156580.shtml>

网友捐款来帮助网站租用海外服务器。¹⁰官方并未透露这次关闭的具体原因，而消息人士指，最有可能性的两条罪名其一为“非法翻译”，即未经版权人许可对影视作品进行翻译，侵犯了版权人的翻译权，高校的公开课属于中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未经许可翻译传播的行为均属于违反著作权法的行为；其二为“违反CC协议”——因人人影视在压制后的公开课视频中加入了片头广告等商业元素，而根据知识共享（CC）协议，在公开课页面、视频等刊播广告是不允许的。

无论如何，在网友毫不吝啬地捐助之下，人人影视得以顺利筹到足够的资金重新购置了服务器。而2010年10月，广电总局发放了一份《广播影视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意见》，其中提到实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专项行动，要严厉打击互联网侵权盗版，重点打击影视剧作品侵权盗版行为。¹¹土豆网、PPS、风行网等视频网站上的美剧、韩语，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体消失。

这场拉锯战，似乎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

以人人影视为代表的民间字幕组，在2011年亦做了不少“半公开”商业化尝试，除了拍摄网络原创短片如《天剩我才》等之外，试图转型为专业翻译团队，承接商业翻译工作是他们的另一方向。前面提到的人人影视在公开课视频中加入的片头广告，就是对自己的商业翻译活动的宣传。但据人人影视内部人员透露，真正做成的少，盈利不多。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视频字幕翻译，和获得国外剧集在中国区网络独播权的视频网站合作，制作专供该网站独家使用的字幕。此外，2011年，人人影视曾和惠普联手举办“1000G世界名校公开课任你拷”活动，以此帮助惠普促销硬盘¹²。以上种种，已然构成并不合法的营业性行为。

由于经过当局几轮暴风骤雨式的突击封停，相当一部分字幕组在这一时期走到穷途末路。剩下的字幕组，或收窄论坛注册访问权限，或直接解散，消匿于人海。另一些如人人影视一样和视频网站有合作关系的，还留有一片尚算自由的天地。然而，正是因为和视频网站走的太近，却成了加在字幕组身上的另一道紧箍，一荣则荣，一损则损。

2011至2013年间，内地的视频网站开始洗牌重组，优酷土豆合并，爱奇艺收购PPS，与较早开始购买热门美剧独播权的搜狐视频，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雄厚的资金、技术支持下，三家开始斥巨资购入美、日、韩剧的版权。《行尸走肉》《傲骨贤妻》《海军罪案调查科》等大热美剧通过合法通道在内地实现了与美国“同步播”。可是，美剧在内地互联网的“持版权自由行”，却很快受到了限制。

¹⁰ 《字幕组YYeTs周四下午关停》<http://tech.sina.com.cn/i/2010-08-20/12084569145.shtml>

¹¹ 《《广播影视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意见》http://www.sarft.gov.cn/art/2010/11/17/art_106_4321.html

¹² “惠普USB3.0移动硬盘”联手“人人影视”<http://news.zol.com.cn/239/2396716.html>

随着广电总局进一步对视频网站内容上的管制，2013年，诞生了“中国版权第一案”——北京“思路网”盗版数字高清作品案¹³。而思路网被查封的当天，2013年4月26日，即世界知识产权日，人人影视亦宣布暂时关闭网站，疑受到“思路网”被查的影响。

字幕组及影视网站的寒冬自此到来。

2014年4月26日，《生活大爆炸》《傲骨贤妻》《海军罪案调查处》和《律师本色》等4部美剧突遭下架，只留下一句“因政策等原因暂时无法提供观看服务”的提示。同年，广电总局颁布“升级版”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境外影视剧引进和播出管理的通知》(俗称“限外令”)，新政规定引进剧必须整季内容先审再播，境外剧引进或至少延期半年，大大影响网友在合法渠道与海外同步追剧。对于字幕组来说，一些正在进行的美剧翻译工作被叫停，而另一些，似乎距离开工也遥遥无期。

而影响最大的，是2014年6月中国国家版权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公安部四部门，共同启动的第十次「剑网行动」。这次行动主要针对保护数字版权、规范网络转载、严惩侵权盗版等方面，大批视频网站受到影响，而各大字幕组上载制作完成的字幕作品的平台射手网遭通报罚款。更雪上加霜的是，当年10月，美国电影协会点名批评十大盗版音像制品市场，提供下载资源或下载链接的迅雷、射手网及人人影视位列其中。

2014年10月7日，中国内地成立最早的F6美剧总部，在经历两年间不断的关停重开后，宣布F6论坛正式关闭。

2014年11月21日广电执法部门以“调查未经授权的影视翻译”为由，查封了人人影视5台服务器，并表示“没有引进的片子不允许翻译中文。”“还会继续查封其他字幕组和海外影视资源站。”这次全网清理剑指字幕组。¹⁴人人影视最基本的字幕业务遭受到了致命打击，尽管此后几经波折，年末宣布正式关闭网站。

2014年11月22日，射手网站长沈晟发表了名为“断·舍·离”的文章，宣布射手网正式关闭。

属于字幕组的大航海时代，似乎已悄然转身离去。

迷惘期：回归“小圈子”的暗流（2015年-今）

¹³ “中国版权第一案”思路网总裁拒不认罪遭重判 <http://pic.people.com.cn/n/2014/0516/c1016-25024344.html>

¹⁴ 《人人影视、射手网关闭背后：版权与监管》 http://tech.ifeng.com/a/20141124/40878076_0.shtml

在“后射手网时代”，字幕组该何去何从？

如果现在上网搜索，伊甸园、风软、破烂熊、TLF……这些字幕组的论坛都还在，然而活跃的用户已不比以往，并且多多少少都通过限制新用户注册、设置访问权限等方式“保护”自己的安全，重新回到了小众、封闭、偏安一隅。下载方面，亦借用如百度云盘之类的第三方云存储平台，通过加密手段来进行“小圈子”传播，回归“分享、学习、交流”，以规避日臻完善的法规“追讨”。而诸如F6等字幕组，却永远地消失在了互联网浩瀚地数据海洋中。

在2014年底拿到创新工程天使投资，次年初转型为美剧社区网站“人人美剧”的人人影视，经过不到一年的经营，又拿到了盈动投资数千万人民币A轮融资，并推出了美剧APP¹⁵，主打美剧资讯、追剧等功能——在2012年手机上网用户首次超过台式机后，移动互联网创业早已拥挤不堪，人人影视的移动化，似乎稍稍迟了一些。

虽然几经波折，曾剥离下载业务的人人影视（人人美剧），在去年下半年又重新将美剧资源放回一个“独立”的网站。只不过，对于下载者的要求，更为严苛——注册会员、每日打卡、升到一定等级。这个支持下载视频的网站叫做“Zimuzu”（“字幕组”汉语拼音），从LOGO到中文名“人人影视”，都是曾经那个熟悉的配色和设计。

然而，它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对于“灰色地带”，曾经的“非法翻译”“非法传播”“未经授权以营利为目的在网站挂广告”“卖硬盘并指导买家下载拷贝剧集”等举动依旧存在，拿了融资后在互联网创业红海中如何杀出重围、如何将美剧粉丝变现，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观察。

字幕组不止人人影视一个，但人人影视绝对是字幕组的代表之一。而从论坛一步步发展至APP的字幕组，人人影视走得最远。碍于篇幅，这一阶段的政策、互联网环境变化不再展开叙述，毕竟在与字幕组纠“缠斗”15年后，中国版权保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¹⁵ 《人人影视华丽转型，完成千万A轮融资》 <http://www.chuangxin.com/news/incubator-news/11121.html>

公民社会观察

记忆__逼迫中的信仰

作者：李晋、马丽

共产极权主义下的心灵秩序

Arthur Kleinman曾在他的书中谈及一位中国的严医生，这位严医生经历过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迁，包括战争、政治变革和社会动乱。¹⁶这些经历对他的影响之深，甚至在后来Kleinman采访已经在美国生活的严医生时，严医生依旧认为自己当下的生活中充满着危险和不确定，依旧会恐惧共产党的统治政权，还会担忧自己和子女的安全受到影响。正如严医生一样，许多曾经在共产极权主义下所生活的人，意识形态和惯习性的恐怖已经成为深入到人们心灵的一种秩序。

共产极权主义对于人类社会的塑造，并不是如同其所具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所认为的那样，即通过对于物质生产的改变而去改变社会的生产关系，从而反映在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上层建筑之中。¹⁷事实上相反的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首先改变是一种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等伦理关系。¹⁸换句话说，通过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改造，共产主义运动的确创造出了一套新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¹⁹如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说的，社会生活之所以在历史中成为可能，在于个体之间伦理关系中紧密地联系从而构成他们共同生活的开端。使人们坚守或放弃某种特定的社会秩序的，是人类的宗教和情感，包括友谊、爱和恐惧等。²⁰当社会科学将主观情感从研究中剔除时，特别是将宗教性的情感从理性化的研

¹⁶ Kleinman, Arthur. *What really matters: living a moral life amidst uncertainty and dang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80-119

¹⁷ Karl Marx, "The Grundrisse", *The Marx- Engels Reader*, 2nd ed.,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Norton, 1978), p. 145.

¹⁸ Solomon, Richard H.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p160-247; Schurmann, Franz.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73-104; Hsu, Immanuel CY.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658-659.

¹⁹Mao, Zedong.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in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ume 5,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1. pp. 284-307; Pye, Lucian W.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12-49

²⁰ Simmel, George. *Essays on relig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56-164

究中抽离时，我们就忽视了那些利他主义，无私与友爱，屈从与反抗，以及这些情感之间的张力所创造出的社会秩序，并且这些情感和关系才是组成社会生活最为重要的部分。²¹

与共产主义理论的进步观相反的是，恰恰是1950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中国社会重新建构成了一个封闭体系，一个共产极权主义的标本。这场运动最开始的契机是朝鲜战争，中共当局借此将美国宣传成一个政治敌人，而切断了中国社会与海外的联系，特别是中国教会与海外教会之间的往来。²²随后，联合国将中国的海外资金冻结，更强化了中国与外部环境的隔离，这种明显的界限能够防止其社会成员的离开本国，并且也切断了这个社会的中层组织与外界的广泛交流。而在中国社会内部，共产党政权为强化其政治统治，扩大国家机器、渗透意识形态控制直到农村最基层，动员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²³这按照Theda Skocpol的统计，在晚清时代，国家机器只有4万名官员，到了1948年国民政府时期增加到两百万，而到了1952年，共产党的“国家干部”竟达到331万，到1958年为止接近八百万。党员人数从1953年的610万，到1961年已经增长到1700万。²⁴这种极权主义下生活的人们，面对的是一种全面性的统治、独一政党性的统治，将社会、家庭、个人关系都纳入在一个“全能党”的垄断性权力支配之下。其次，秘密警察制度和群众揭发、批斗运动将恐惧和不信任输入每个人心中，等于是把每个人孤立都隔绝起来。²⁵第三，国有化重组织把所有人的关系吸纳入计划经济的“单位”体制中。一方面他们要服从于单位制而进行生产生活，生活一切的需要都由单位制所供给；另一方面，单位制完成了将个人关系转化为“组织关系”，而这种供审查用的“组织关系”存档，包括个人的出身、政治成分、所属的阶级和单位，其次也记录了个人家庭、婚姻等等信息。总之，在这些制度安排下，对于个体而言，没有任何独立于国家政党之外的意识形态的宗教和组织的存在以及选择。

极权主义通过强制每一个人内心的自由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将所有个体都纳入在国家机器的系统中。鼓励人民做党和国家的“螺丝钉”曾经是中国统治宣传最为重要的口号。²⁶作为“螺丝钉”，每个个体不能持任何不同于极权主义宣传的意识形态。在政党意识

²¹ George. Simmel, *Essays on relig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37-155;p182-199; Bellah, Robert Neelly, ed.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with a new prefa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p3-54.

²² Immanuel C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p660-670

²³ Fairbank argues that “this organ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was far more complete than anything attempted in Chinese history.”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1986, p282.

²⁴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²⁵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p405-509

²⁶ Gay Garland. Reed, "Moral/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rning through role models."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4, no. 2 (1995): 99-111.

形态的垄断性统治之下，因此任何与其竞争的信仰都是非法的、反革命的、危险的。²⁷这种通过暴力强制性的恐惧，在文革中群众运动所进行的全面清洗和监控，使得持有不同信仰的人面对的只能是投入监狱，或被送往劳改营，或经历肉体上的消灭。²⁸哈维尔曾对这种状况论述过，政府迫使人民顺服在统治之下，每一个人日常所作的虚假或真实的事情，都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惯习，而人们不会质疑这种意识形态恐惧的合法性，相反地，大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破坏这些规则和关系的人，都被认为是对人民、国家的背叛。因此，这样的一个权力网络将所有人都牵扯进来，使每个人都成为了极权社会的工具。²⁹于是，恐惧成了一种普遍的奴役和异化。如何在极权主义下生活，这是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要的选择，对于本章中的人物，尽管他们的处境，家庭都各自不同，但是却分享了一个共同点，就是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让他们在极权下寻找到了不妥协的理由，来处理身边的苦难和极权所带来的恐惧。

被改造的教会

从1950开始，基督教信仰和教会组织遭遇到了来自“新政权”的冲击，并且被迫进行改造。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时，其主要组织者是一些自由派基督徒领袖和学者，他们都参与了筹备和控诉签名。³⁰一些反对三自立场、不参加国家组织教会或者不认同其立场的教会和领袖，在共产党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遭受到了打压、枪决和流放。³¹一番暴力清洗之后，没有加入国家组织的教会带领人被官方以“反革命”或者“思想犯”的罪名处决或劳改流放，并且也因此牵连到直系甚至与之有联系的亲友之间的生存和社会地位。³²1956年肃反后，大学录取时都会让填写一栏宗教信仰，作为家庭背景的调查。即使再优秀的高中生，

²⁷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85-106

²⁸ MacFarquhar, Roderick, John K. Fairbank, and Denis Crispin Twitchet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1978).p253-258.

²⁹ Va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Routledge Revival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Routledge, 2009.

³⁰ 42位常务委员，基本上是《三自宣言》等的发起人和倡导者。

³¹ 北京的王明道于1955年6月在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1955年《灵食季刊》夏季号），反对官方对信仰的压制，而他两个月后被以反革命罪逮捕，之后判处无期，直到1980年被释放。上海在1956年1月29日逮捕反对参加三自的聚会处30多位负责人，之后进行了万人公审大会，并且对于其他信徒进行政治学习或判刑劳改。根据一位曾属于“小群”教会的受访者的回忆，曾见到某张弟兄在路上走着，被冲上来的一个陌生妇女抱住，然后被控侮辱妇女，立即枪决。他说，此类事情发生时，政府的宣传是污名化的，“不会说是你信仰的原因，而是会用其他罪名。”（访谈徐经理，20110405）

³² 50年代反抗官方三自运动的北京传道人袁相忱，被投入监狱20多年，他的家人也受到了牵连。他的妻子原本是街道主任，但在他丈夫被捕的那一天，她自己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街道主任的身份工作了。从十九日晚开始，她已经被列为“反革命份子”的家属了，不能再从事这样的工作了。”原本在读六年级的儿子，也在一周后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他在班级上的职务由另一个同学担任了。摘自袁相忱（《主仆袁相忱、梁惠珍的见证》

如果填了基督徒，就不会被录取。我们曾听一位现任大学刘教授的口述他幼年时经历的这种黑身份给他带来的耻辱感，一直伴随他的成长和求学，甚至一度令他厌烦祖传四代的基督教信仰。在五十年代，他母亲因为是基督徒，在农村是黑人口，没有地也没有粮食、工作，饱受乡邻蔑视，因为大队领导认为她是反动、另类、迷信。他回忆说：“对我很羞辱的一件事是，老家人吃饭吃饭都要串门的，拿着饭碗到人家门口去聊天。我母亲到人家门口去，人家都不让她去坐，就都很蔑视她，像对狗一样的。我就非常生气，他们怎么这样蔑视别人，而我母亲都是老老实实的，很本分的人。”全家因母亲的信仰受到牵连，各种社会关系被断绝，连维生都很困难。这些经历深刻地塑造了他的心灵，觉得自己很卑微，无法与别人交往。同时又很怨恨自己的家庭出身。由于恐惧，母亲也不敢把藏在床底下的圣经拿出来给他看，所以他幼年时对基督教信仰是不接受的，甚至很厌弃。但同时作为受歧视的阶层，他也不认可官方所宣传的世界观。这带给他一种寻求的动力，持续到九十年代末出国留学，才再次接触并接受基督教信仰。

在本章中，我们主要通过两位基督徒经历的宗教体验和社会变革，来分析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外在的制度和组织转型之外，还存在一种深层的变革，就是人内在心灵、主观信仰和情感的改变。在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垄断下，宗教信仰所提供给个体的首先是一种在情感张力上的安慰。但是，就深层而言，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和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一种彼此之间伦理秩序的冲突：前者将个体纳入在共产主义的伦理之中来建立一种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后者则是个体在宗教中寻求另外一种超验的、却能够反映在社会关系、个体生活的信仰上面。³³这两者都有力地塑造了个人、家庭、社会和制度。然而，在极权主义下，信仰所展现的伦理以及社会功能，即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在苦难中的安慰，要远远比物质、经济所起到的作用要更大。

本章同时也展示了在极端情况下，人类的历史是如何通过记忆、口述、家庭关系得以保留下来，重新形成一种伦理秩序、组织的过程。在共产党政权下，人们缺乏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空间，不能够真实的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从媒体中获得的信息，很可能只是事物的表象。作为研究者，要看到在极权主义的背景下，群众游行和领袖崇拜背后的那种无声的不服从、沉默的反抗和良心的自由，是非常困难但有意义的工作。从口述历史材料中，我们依旧能够发现，一些人如何在一个动荡、危险的极端环境下生活，并且是靠信仰和心灵来对抗外在秩序的恶，平庸的恶，不被异化为组织性的“螺丝钉”，而成为一个具有个体性的人的存在，这是所有经历过极权主义的人所面临的选择，有些人用信仰记忆来消解这种扎根于个人心中的恐惧，对抗因为恐惧而刻意的遗忘这是我们本章所要涉及的主题。并且，人通过坚持一种不同于极权主义伦理的信仰，这本身就成为一种弱者在极权主义下反抗的武器。

夹边沟的“好消息”

³³ George. Simmel, *Essays on relig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p101-120

我们认识赵医生的时候，他已经是C市的一位名医，也是一个大约有200多人的非官方教会的带领人。他是我们访谈中最长的一个，将近四个小时。等录音笔容量快达到的时候，他还意犹未尽。他说自己是开了40多分钟的车，从郊区赶来见我们的，而且坦诚中甚至有一些想要一吐为快的激动之情。面对我们这两个素未平生的年轻人，六十五岁的他仿佛是要把自己的故事一股脑都倒给我们。用他自己一开场的话说，“有很多那时的社会背景需要年轻人了解，如果不能把这部分给你们，那我们就对不起上帝了。”

1946年出生的赵医生，经历了四五十年代的内战和共产党政权下的主要政治运动。他的父亲原本是小学教师，在1948年左右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参加地下革命，不久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后来他们得知，他父亲在西安策动起义时，被国民党抓到监狱里。但国民党没找到证据，就把他放了，让他在天水政府工作。等中共政权建立以后，他父亲被怀疑与国民党妥协（因为国民党把他从监狱放了），被划为“右派”分子。从此，政治上的歧视开始伴随赵医生的成长、求学以及工作。

“1957年我父亲就被划成“右派”，被开除公职。原因，就是因为国民党放了他，共产党就说，那我就不能放你。因为国民党为什么不放别人，偏要放你呢？所以那年之后，我家生活就陷入一个极大的困难，我刚十岁。除了经济上的困难，政治上的歧视，另外我父亲还有肺结核。所以我从小就习惯了那种受压的状况。之后就我妈妈一个人，把我们全家所有生活问题都承担下来。我妈真的是一个非常贤惠能吃苦耐劳的女性。生活中一直持续到全家挨饿，吃不饱饭。到了1960年，我爸就浮肿了。

我考大学是65年，从64年开始有规定，凡是‘地富反坏右’的儿女，是绝对不让上大学的。65年就宽松了一点，我从天水考到华西医科大学，当年的四川医学院。天水当年考了两个学生，一个黑五类，一个红五类。我当时心里人生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做一番事情，我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要光宗耀祖。结果，进入大学以后，66年开始文革，就停课，停了6年。

在学校里，因为我是右派的儿子，我就躲着不参加所有的运动。武斗很厉害，我躲着不参加，因为我是黑五类。同时又不甘心，就偷偷学中医，因为将来是面向农村，没有设备，西医很难做事情。所有学校的会我都会参加，那时我们这些子女根本抬不起头来，没有说话的资格，我就在《毛语录》上不停地写字，其实写的是中医文献，但大家都看我在学《毛语录》。”

作为“右派”的儿子，政治上被轻视的一类人，赵医生没有资格参与到红卫兵的组织中，这让他与中共极权主义强制灌输的意识形态之前保持了一定距离，使他对于共产主义信仰本能地无法接受。此外，赵医生以及很多人的口述都重现了政治宗教的场景，比如毛崇拜，这一活动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尽管有研究认为文革对于毛的魅力型领袖的崇拜是出于一种理性的选择，他们将自我利益的追求投入对于毛的期待中，因此，对于造反派和保守派而言都是围绕着对于毛的魅力型支配的崇拜所展现出来。³⁴事实上，在极权主义政体下，任何的崇拜都是一种象征性的，因对毛的崇拜集会是在公共场合唯一合法的集合

³⁴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行为，而反对者都已经在反右到文革中被清洗掉了。³⁵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对于文革反思和历史著作中，将林彪之死作为对于毛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群众中出现瓦解的标志。³⁶但是对反右和文革中受到负面影响的人，就是被排除在主流社会关系之外的群体，他们对于毛和整个政体合法性的怀疑，早在林彪事件之前就已经产生了。用赵医生的话说，是当时的这些经历教导他去质疑和思考的：

“在这个环境中，就造就了我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是真理？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们应该怎样看问题？我想，如果我的家庭环境很好，我们会很容易接受社会上的正面思想影响。但正因为家里的情况，心里就有一种抵触，就更能看到现实问题，真的假的就能分辨，所以我很感谢神，如果没有父亲划成右派，全家受苦的经历，绝对没有我认真思考真理的可能性。

对于文革，一开始我还相信中央宣传的，但看了一些事以后，11月份我就明白了这是毛和周之间的斗争。就是通过观察、分析、看了一些大字报，就知道这些了。过后，到了70年，就把我们现在华西医科大学全院师生，全部送去劳动改造，到连队里。全部学生都种苞谷，挖煤，伐木，我呢，被人选出来，去后勤学习做醋。那就轻松多了，人家说你运气好，我给家里人写信说，造化主他恩待我了，让我脱离了那样一个白天顶太阳，晚上开阶级斗争开会的日子。在那个环境中，我不知道上帝，只知道老天爷，或准确地用一个词‘造化主’。”

在国家配给制度的主导之下，身份直接影响到升学、婚姻，甚至食物索取权的获得等。被国家所建构出来的身份秩序，重新建构了一种依附于国家的社会网路关系和信任，而单位制完成了将个人关系转化为“组织关系”，这种“组织关系”在中文的语境中，首先是指个人的身份，出身，政治成分，所属于的阶级和单位，其次也记录了个人家庭、婚姻等等。对于个体的选择而言，常常受到了国家统治和意识形态的左右。赵医生在婚姻问题上不得不面对家庭出身所给他带来的影响。

赵医生下放时，和先前的一个女病人有了一些书信联系，谈起恋爱来。之前他在高中曾经与一个女同学恋爱，但因为他出生于右派家庭，女孩家庭恐惧他的政治成分，害怕受到牵连而告吹。这次的对象不仅家里非常贫穷，双肺都是肺结核，但赵医生考虑到自己的成分和社会地位，也只能配她这样的了，而且欣赏她虽患病却还爱读书。同样，这也遭到了他自己家人的反对，毕竟这是一个可能给未来家庭带来极大拖累的选择。这一期间，赵医生的奶奶也去世，按照传统他需要回家奔丧，他还是将女朋友带回了家，但家人的反对激烈。赵医生无所适从，于是想到了他家乡中学的李老师。用他的话说，每当遇到困难，就会想到他的这位数学老师，他是一位基督徒。

“这种情况下，我就去请教我高中一个李老师。为什么想去找他呢？很奇怪，那几年，我只要回到天水，就一定想要到他家，去了就不想走。遇到这个问题，我又去找他。和他说我恋爱上

³⁵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52-65, and p184-198. and Yang, Xiaokai, and Susan McFadden. *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³⁶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2009.p 324-336

遇到的阻拦。谈了很久以后，我问他，李老师，为什么你经历那么多政治运动，遭受那么大的难处，你总是很喜乐？你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

他和我说了一句话，空口袋是立不住的。

我说，李老师你口袋里装了什么？

他说，我是基督徒。

我心里想，都知道了，你就是因为这个去的夹边沟啊。我觉得挺可笑。但我说，李老师，我毫不在这个事情上歧视你，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我觉得，他是基督徒，和这件事又没有什么关系。

他说，你没搞懂，基督教信仰是一种世界观。

于是他就给我传福音。那是1971年。

一个基督徒向另外一个没有听过基督教信仰的人传福音，这在七十年代的中国是非常危险的事。尽管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基督教会曾经是独立于国家的民间组织，复兴会和露天讲道都是被允许的，而且有过一阵短暂的复兴。³⁷但在1949年以后，因基督教信仰与无神论唯物主义的共产政权的矛盾，天主教和新教教会都经历了很多次冲击。一些教会成员被纳入到官方三自爱国组织中，到文革前也被彻底取缔。在七十年代，这样的举动无疑挑战了当局意识形态的权威，一旦告发就是“反革命”。

这位饱经磨难的基督徒李老师被发送到的夹边沟，也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从1957年开始到1960年左右官方登记大约3070多名右派知识分子和思想政治犯，到1960年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死在劳动改造中。³⁸这一期间出现过多次吃人肉，偷其他劳改人员粮食等事件。1961年夹边沟劳改农场被撤销。³⁹到了七十年代初，这些幸存者陆续被允许回到故乡。

赵医生与李老师促膝长谈了一夜，虽然他觉得自己急需的是如何解决婚姻上的困难，但李老师为他指出一个终极答案，如他所说是“一套世界观”，而这些道理是当时的官方宣传所禁止的。

他说了以后，我才觉得：这才是真理！当时就觉得，那天天喊喊毛泽东思想是真理，哪里是嘛？天天打到这个，打到那个，哪里是真理？他还给我看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我一看，这个话太

³⁷ Song, Tian Zhen. *A Recovered Diary: Extract of a Song in Shangjie's Diary* (灵历集光). Hong Kong: Xuandao Press: 2006.

³⁸根据李景亢的回忆是“1959年甘肃省送往夹边沟劳教人员约2800余人，死亡人数高达近1800余人，生还者约1000人，直到1961年1月全部释放回家后，我去夹边沟亲自领取户口时，原夹边沟干部王志民让我代他抄写死人的名册时，我大略记得了这个数字，而且右派分子死亡原因场部统一规定为“心力衰竭”）《蒙恩历程》，<http://www.jidujiao.com/shuku/files/article/html/0/675/index.html>

³⁹杨显惠. 夹边沟记事. 花城出版社, 2008. 以及高尔泰. 寻找家园. 花城出版社, 2004.

甘甜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再谈到要有审判，我就说，我必须信，如果不信，我所犯的罪，将来审判的时候，我无地自容。

另外，他列了一个公式，因为他是教数学的，就是，无限大分之80等于零。意思是，80就是人生80年的作乐，无限大是地狱的存在，就是永远的痛苦。结果就是，80年的享福作乐等于零。但反过来，80年天天为主的缘故受苦，无限大是到天堂永远的福乐，80年的痛苦，也等于零。因此，80年是痛苦喜乐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无限大。

我听了就接受了，一点挣扎都没有，因为共产党的东西，在我里面早就垮了。我父亲受的挫折，早就垮了。仇恨当然有了。你想想，我家经历的，他被划右派之后，再次送到劳教队去。我和弟弟过两天都要去，给我爸送面条，用一个铝罐子，当时我们好小，一个人提很吃力，就和弟弟用一个棍子抬着，起码走三四公里，送到我爸劳教的山上去。那个过程中，全家人都挨饿，省下来一点就给我父亲送去吃。所以这个过程中，受的折磨歧视，我心里肯定有怨言的。但这不是我信主的原因。我信主，是因为一看人生的意义、价值、审判。那是需要审判的啊！没有审判，那个冤到哪里去招啊？一方面觉得，有审判太好了，我们这么多年受的屈辱。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有审判，我很可怕，我不信耶稣，那个审判我就没法过。因此，我承认我是罪人，我要信耶稣。当时就信了，没有怀疑。

回到家我就告诉我爸，我信耶稣了。感谢主，当时我爸没反对，他说好嘛，信的人还是好，不过要小心。我妈就有点微词，说够麻烦了，你还去信个耶稣，又招些麻烦来怎么办。偷偷地信嘛。信了之后，一个礼拜，我就离开天水了。那时也没有聚会，也没有圣经。就李老师给我做了祷告，说你信了耶稣，你女朋友的病会好。我是医生，知道不可能，但李老师说，圣经上有很多神迹奇事。从那以后，我无论到哪里都会祷告，心里就知道要祷告。在那一个星期里，我每天去见他，李老师给我谈了很多圣经上的内容。

赵医生在成为基督徒的第一周内，在李老师那里听到好读到很多圣经上的内容，但对他而言，那是少有的几次读圣经的机会。在接下来的八年内，他并没有拥有自己的圣经。那个年代持有圣经是非常危险的事，在1949年到1986年间，圣经的印刷和发行在中国也是非法的。基督教信仰在极权主义下的留存，一方面通过幸存下来的基督徒如李老师而得以保留，另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通过长辈对于后代在家庭中的秘密教育使得后代能够将信仰保留下来，通过记忆的口述，重建了信仰。那时的基督徒群体首先面对的是如何在这个政权之下生存，以及如何在极端的逼迫环境下依旧保持并传播信仰。这些具有信仰的人被归入在“牛鬼蛇神”之中，大多数都在监狱和劳改营中被消灭。⁴⁰但基督教信仰毕竟存活了下来。尽管持理性选择理论的社会学家在解释基督教早期殉道者的时候，认为殉道者选择殉道所带来的道德震撼对基督教本身提供了信仰资本和皈依的财富。⁴¹然而，在极权主义下，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恐惧秩序是借着大规模的宣传机器和群众运动，官方通常是通过

⁴⁰ Yang, Xiaokai, and Susan McFadden. *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⁴¹ Rodney Stark,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A sociologist reconsiders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p163-190

污名化，用其他的名义对基督教的领袖进行处决。所以道德震撼之说不适用于极权主义下的教会处境，因为信息完全被阻断、扭曲了。

家中的教会

李老师说没有嘱咐赵医生在自己工作的城市找到一个聚会的地方，因为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文革前，共产党已经关闭了所有享有合法性聚会场所。教会被划分为“四旧”的封建迷信获得。⁴²文革结束后，虽然有一些信徒从劳改农场和监狱中被释放，并开始在家庭内秘密聚会，但这类聚都非常隐蔽，限于信任度高的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这种隐秘性还归于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当时的居民住房都属于单位制监管，极易被发现。在Stark的研究中指出，这种个人对个人的关系见证，使得基督教在中国文革时期的传播中，形成了一种高度忠诚的社会网络。⁴³

赵医生在信仰的头几年中，没有圣经和聚会，但只有祷告。再次遇到很大的困难时，他又会写信给李老师，然后等从回信中再读到一些教导和圣经上的话。

“我说李老师我听了福音就信了，我一直在祷告，我的生活现在变得一个困难得没办法的情况，经济上的困难、工作的劳累、人际关系上的迫害、家里的不和睦，我说我简直是，活不出来。但是我说，我要相信上帝。其实我也怀疑到底有没有上帝，这是必然的嘛，因为没有聚会，也没有圣经，没有任何见证的支持。李老师给我回信说，我没想到你居然一听就信得这么坚定。他说，不要离婚，上帝要祝福你。然后告诉我三句经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的义本于信，以至于信”。“不是倚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这四五年间，我又回过一次天水老家，就和李老师通宵谈。他给我讲见证，讲他对圣经的体会理解。我们聊了一夜没睡，一直谈到天亮。我很享受，很感恩。到那时，他才把他带到夹边沟去的小圣经，一本《新约圣经》，借给我了。那个太珍贵了，是陪他出死入生的嘛。那大约是1973年，我把《圣经》藏起来，也给两个人传了福音。”

赵医生后来接触到教会，是因为工作调动到C市，通过其他人介绍到了刚刚刑满释放的刘本耀牧师。刘牧师1949年前是内地会的牧师，负责成都的学生团契工作。1958年，刘牧师像其他在中国的拒绝加入三自爱国委员会的传道人一样⁴⁴。他在监狱和劳改农场关押21年，1979年被释放。我们在C市进行各个教会访谈时，他被认为是文革后最早恢复家庭聚会的带领人。

这段时间对赵医生是很艰难的，因为他的妻子他向医院的党委领导告发了他是基督徒的身份，对于他所在的单位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基督徒的赵医生并没有

⁴²从1966年开始,毛泽东所领导的政府关闭了学校,神学院,和教堂,目的是要破“四旧”:旧的思想、旧的习惯、旧的风俗、旧的文化。

⁴³ Stark, Rodney, 1996, p191-208

⁴⁴被捕入狱,在其被捕的时候,官方的杂志《天风》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表明群众都控诉刘牧师:“成都同道声讨反革命分子刘本耀”,《天风》1958.10.8

因此与他妻子离婚，这场婚姻一直维持到90年代他太太的去世而终结。夫妻间的政治告密和离婚，这在49年后的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最为著名的如罗荣基和他太太浦熙修彼此的揭发，普通人家也是这样。这种告发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非常普遍，这是一种共产党的文化和社会伦理，也是其社会统治的基础。在很多自传中，都可以发现这种告密文化是社会统治的基础，它提供了一种恐惧的资源来发现可能的反抗和思想犯。⁴⁵

医院的党支部书记院长、政工干部一行四人找我谈话，不过他们很给我面子，不是喊我到医院去谈，而是到我家里来。他们一上来就问我：赵医生，你是不是基督徒？

我从来没有入党，连团都没有资格入。我说，我是。他们几个人一下子脸色就变了，说，党培养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信仰党，而要信仰基督教？

我看机会来了，就给他们传福音。讲到最后，院长耍老油条，把脸一黑，说，“那我现在问你，毛主席现在在天堂还是在地狱？”当时我知道这是一个挑战，我说，“我不知道，我就是天安门上看到过毛主席的画像，我又没和他接触过，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情况呢？”从那次以后，我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他们就一直在各方面给我小鞋穿，欺负得很厉害。

尽管面对妻子的告密和单位人在政治上的排挤，他却被接纳进了一个友爱的教会团体中。赵医生第一次进入教会已经是他认为基督徒相隔了7、8年的时间，在此之前都是通过短波收音机收听国外的福音电台，在当时的中国如果被发现也会成为间谍罪被捕。进入刘牧师的小型的家庭聚会之中，赵医生坦诚告诉我们，是这个小的团契给了他爱，这种彼此的奉献，是他在这个社会动荡、人与人互相斗争的年代中稀有的。

“只要我们去，他们就做很多饭菜，简直是巴不得把所有好吃的都给你吃，但其实那个时候大家经济上都是很困难的。而且我观察到，他们自己是很节省的，而且一家人的和睦，家庭气氛，真是好的不得了。我还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基督徒家庭听在文革中被批斗，让他家的老人坐在前排。她说，当时人家给她难看，她坐在台下，她就有意把头抬起来，满面红光，觉得很光荣，我儿媳为主的缘故受逼迫，我祷告，一点不觉得不好意思，或者很羞辱，而是觉得这是一个荣耀。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另外一个龙伯伯，非常虔诚，待人很好，文化不高。他们对我，简直爱得不得了。他非常困难，孩子多，当时都还没信主，在那个环境当中。有一次我穿的鞋子烂了，想买一双鞋，我妻子知道了就和我闹。我的婚姻一直是个头疼的事。龙伯伯知道，就省吃俭用，给我买了一双皮鞋。这是79年了，一双皮鞋15元啊，我拿了说，不能穿，我没有资格，我不配。我把这双鞋处理了，奉献了，不能穿。”

在赵医生的概念里，“教会”这个词留给他的影响是官方宣传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因为以前没有‘教会’的概念。原来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教会’都是很可恶的，来自政府对天主教和基督教进行妖魔化的宣传。以至于在我的观念里，我虽然信了基督，但教会我是绝对不

⁴⁵ Rae. Yang, *Spider eaters: A memoi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 2013. And Cheng, Nien.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Grove Press, 2010.

去的。但当我与教会一接触，哇，他们的爱心真的很感人。我才意识到，既然党在那么多方面都说谎，我怎么没有意识到，他们说教会的话也是谎言呢？”

从赵医生的口述中，我们了解到刘牧师的经历。像当时很多因信仰被囚禁的基督徒传道人一样，他以个人信仰对抗国家机器。对处于极权主义下的弱者个体而言，虽然行动则是一种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武器，甚至沉默本身也是一种反抗，这种不合作的姿态成为一种颠覆性的象征，与主流的支配成了一种对抗的形式。⁴⁶

刘牧师在狱中21年的时间，没有妥协自己的信仰。但是出狱后，三自官方教会恢复了，刘牧师每周主日都要去坐在三自教会的教堂里。他说，50年代，我是因为不参加三自而下的监狱。现在却要来三自，时代变了，历史背景变了，三自和50年代不一样了。50年代三自是要给你洗脑，让你放弃信仰。改革开放之后的三自，不是要你改变信仰，是要你来，是统一战线。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把我改造了20年，但我今天依然是信主的。我坐在那里一坐，就是见证，不是别的。他后来一直去礼拜堂，家里也开放聚会。”

中国政府从1978年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允许一些外国人入境投资或旅游。但直到1986年之前，中国境内的基督徒很难获得圣经。（即使现在，圣经仍被禁止在三自以外的渠道公开出售。）大多数国外宣教士需要私运圣经入境，比如Open Doors计划等等。恢复聚会的这些基督徒们，成了国外机构的联络网络，这后来成为刘牧师再次入狱、赵医生再次被审查的原因。刘本耀牧师再次进入监狱后，遭受了肉体上的折磨而导致瘫痪，85年底被释放，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当局的做法多是拘留、写检查报告等，但也会用比较长时间、反复盘问、告密和收买来施加压力。

亚洲归主协会的弟兄给我们送来一箱圣经，让我们去拿。那时圣经很不好买。那时我才看到几本完整的圣经，大概是10本，我就通过一个信主的列车员姊妹，把这10多本圣经带回老家带给李老师，他又转了几本给那边的农村教会，那里几十人聚会，没有一本圣经。后来才知道，刘牧师因为这件事又被关进牢里好几年。我被挂在国安的监控对象名单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到了1984年元月，一天一个我很熟悉的民警来找我，让我去，一路上我就知道有事情了。到国安局以后，他们很客气，给我吃饭，有一份有血的，我不吃，他们还说尊重我的信仰。1984年前前后后有八个月是严打的时候，就把我也严打了一下。天天回来上班，写材料，让我妻子交到国安局去。就一直这样折腾了我八个月，让我写了70几页材料。

当时我里面，就开始惧怕。我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都推到刘牧师身上，当时他已经被抓了。坦白讲，我还是畏惧。他们问，那份文件，是你交的，还是刘牧师交的？我就说，是刘牧师交的。写材料写了八个月以后，有一次我就烦了，我说，我告诉你们，如果这些材料你们还不合适的话，我就不知道怎么写了。

他们那次抓人是和传播圣经有关系，也和家庭聚会有关系。过后我才知道，我老家也被抄了，查出我给家里写的信。在信里，我谈到福音的事。他们就一直问了两三个月。

⁴⁶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04-350

赵医生的信仰起步是来自李老师的口述，但后来他成为委身教会组织的一员，而且成长为带领者，是因为刘牧师和一些家庭聚会信徒的牧养。他的家庭出身、恐惧、婚姻等都被编织入他的信仰叙述中。多次政治逼迫并没有让他变成一个怕谈政治的人，反而塑造了他的政治观念。九十年代，当他自己成为一间家庭教会的带领者之后，他很重视讲教会史，以及三自、政府和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后来等他被选为市政协委员，他每年都会提交关于三自腐败、家庭教会信仰合法化的材料。

我还把那一片三自里的腐败、贪污、不讲道，以及很多问题，写了一个材料。我认识一个省政协的一个副秘书长，当时就在全中国宗教视察。我去他开会的地点，我不认识人家，就坐在马路对面祷告。突然出来一班人，我上去说，我要找宗教视察团的领导。他们说，这个是领导。我就简单介绍了一下都江堰的情况，说成都只有5个开放的礼拜堂，信教群众没有敬拜的地方。那个人说，我一听你说，就知道你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不是异端。我们接受你的愿望，你把这些问题写一个材料交给我，给了我一张名片，原来他是一个高级记者。我就连夜写了一篇，呼吁在成都地区落实中央19号6号文件。写好以后打印出来，就接着地址寄过去。一去就没有消息了。另外我寄了一份给全国三自的。我也给成都宗教局寄了一份，郫县政协一份。从这次，就开始了我和政府之间一个长时间的拉锯战。把这个交了以后，过了几个月，据说，成都一个管基督教的处长就换人了。所以我每年都给政府递一个申请要开放，我就把球踢给他。

访谈中，赵医生的一句话总会出现在我们记忆中：“我不可能在政治上是无神论，在信仰上是一神论，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后来我们在另外一个城市也认识了一个与赵医生年龄相仿、经历相仿的基督徒方老师，他也经历过同时代的政治逼迫，后来因为“统战”也成为市的里政协委员。出于存留的恐惧，他不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录音。我们与他闲聊后留下的印象，他忌讳谈及基督徒与政治的关系。

我们和赵医生的访谈从一个步行街附近的家常菜馆开始，饭后又在附近的星巴克咖啡馆继续，最后为了录音质量，又转到一个酒店的大堂。每一个地方都好似成了一个时光通道，带我们回到他生命的各个小站。再回头来看这位老人，让我们更加生出敬意。他虽然在极权主义时期度过自己最好的年华，因信仰也遭受各种政治逼迫以及艰难，但极权下的恐惧并没有对他的生活和信念产生太多消极的影响。

红旗下的白牧师

1950年之后，在极权体制下民间的组织，特别是基督教，面临着两种选择：被强行整合纳入到政治体制中，或者成为面临迫害的非法组织。“三自”作为国家教会不再区分宗派，而是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基督教两会）通过共产党所领导，保留部分信徒其余参加劳动生产，使用统一的诗歌，并规定不能宣言封建迷信，以及一切宗教活动（包括宣教）必须在教堂“定点定时”举行。在1950年代以上海为例，上海教堂数量约200多所，到1958年减少到8所。在广州，由52所减少到一所，北京有66所减少到四所。⁴⁷到了文革时期，即使官方教堂也被取缔。五十年代开始的基督教三自运动和反抗潮流塑造中国的教会形态和

⁴⁷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10.p136-137

中国基督徒的信仰身份。要了解这些历史过程的复杂性，除了官方政策文件和罕见的回忆录之外，没有太多文献可以参考。这是口述历史材料的贡献。从访谈一些三自内部的信徒和牧师中，我们得知，如果说文革前三自成功地区分出服从者和反抗者，到了文革之后，尤其经济改革后，恢复运作的三自组织转向一种柔和的限制策略。到80年代初，不是说在三自聚会的基督徒就一定认同官办教会，这一点我们从刘牧师的见证中可以看出。文革之后的三自不再是一场运动，但这样说并非意味着官方意识形态不再辖制三自机构下的信徒和神职人员，因为三自中高层干部都是国家指派的。但在官方教堂聚会的信徒和神职人员中，出现了很大的分化，具体表现在区域差异和堂会内部差异。在一些政府管控比较严的城市，三自系统和家庭聚会之前仍保持一种界限明显的区隔。但在农村或管制松的中小城市，这一界限比较模糊，很多信徒穿梭于官方教堂和家庭教会之间，也有一些三自的神职人员同时带领家庭聚会的。白牧师是一位C市三自系统的牧师，他的口述可以帮我们深入分析这些社会界限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是在访问一位基督徒企业家张先生时认识白牧师的。他们两位有一个默契的服事，就是结伴去医院探望一些临终病人。张先生告诉我们，白牧师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他愿意陪伴任何遭遇苦难的人，可以随叫随到：“白牧师的一个很大恩赐是他很厚道，特别在我父亲生病时，任何时间给他打电话，他都会来，每次都会为人祷告，陪伴病人。我在心灵上不是很强壮，任何时候找他，他就来陪伴我。”经过介绍，我们有机会听他口述自己的经历。

白牧师出生在云南边缘地区，是少数民族红彝族。从爷爷奶奶开始就受到内地会的影响，成为基督徒，之后全家人都成为基督徒，而奶奶则协助外国宣教士一起传道。到了1949年之后，全家人的命运随着中国政治的变革而改变，不但被划分为“牛鬼蛇神”，又因外公逃避大跃进去到越南，为这家人另外加上一条“理通外国”的罪名。因家庭信仰带来的歧视，他本不愿做传道人，而是立志要学习法律。

当时的红卫兵经常来抄家，给我心里留下一种阴影，感觉我奶奶父母受到了不公。我家不很穷，不是地主富农，但我奶奶父母却被关起来。农村里的红卫兵不断欺负我爸爸，我的气总在肚子里头，我就想总有一天我要说出来。当时我并没有抱怨上帝，但有的是对社会的怨恨，觉得不公平。我觉得我奶奶很好，我爸爸也很好，从来不占别人便宜的。有一天我看到奶奶挨批斗的时候，牙齿被打掉，我就在外面抓着木栏杆，牙齿咬得很紧，立志说，总有一天，我要报复的，他们现在怎么打我奶奶，我要打他们打过来。从小就有一种苦毒，复仇心态很重。我从66年开始懂事了，那之后的历史我都很清楚，也许是借着这些冲击才开始懂事。

我小时候和奶奶睡的，她每天早上5点半到6点就起来大声祷告，我就拿脚踢她，说她太讨厌了，你在心里祷告就行了啊。她说，乖乖，如果没有祷告，我们这个家就撑不下去了，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在上帝那里。祷告从基督徒来讲是与神的一种交流，从人的角度是一种释放。奶奶说，我们可以活下来，白天大生产，晚上批斗会，还要挨吊，红卫兵拿鞋打，奶奶的牙齿就是被打掉的，放下来以后，精神还是蛮好的。在基督徒来看，这些都是上帝允许的。这个当中的历练，不仅是肉体上，而是借着这些患难，让人与上帝更近。

白牧师的家乡是云南的边缘山区，中央政策和政治动员力到达那里，一般都需要一些时间，并且控制也不如城市和内地农村。并且因为彝族基督徒比例很高，所以在1952年至1966年间，三自运动没有太多波及那里的教会，那里的基督徒仍有正常聚会，因为乡邻之间的信任和亲属关系，比较强而极少有告密发生。但是文革之后，就有了一些改变。

我们村子里，文革进来之后搞运动，但因为很多基督徒，搞不起来，因为基督徒讲仁爱嘛。过去曾经有好多新四军驻扎在我们村子里，后来把乡改成大队，后来又改成乡。乡长啊什么都开始二月逆流，很多久开始观望了，批斗啊，跪地啊，玻璃打烂以后就跪在上面，起来以后全部是血，全都是那些干部。受到冲击以后就地富反派右啊，这样就都没逃过。

文革尽管外面是暴风雨，晚上批斗会结束之后，我们就聚会。小时候，七八点的时候，父母让我赶快睡觉，到12点的时候，他们把我叫起来，就要开始聚会了。每天晚上如此。每周我们要圣餐，家庭式的，二三十个人，村子里面的，偷偷摸摸的，所有的门都关起来。

最早生产队长所让大家放下家里的事，到会议室，向毛主席汇报敬礼，背毛主席语录。晚上又要汇报，等到晚上就开始做礼拜。那时连结婚的人也要挂毛主席像，要三鞠躬，要喊口号。我姑姑的婆婆，就感觉到这个是拜偶像，不愿下跪，就抓去坐牢了。其他人只能你们让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没办法啊，大家觉得反正我们是信仰上帝的。不愿意喊的就受到逼迫，这些人就坐牢去了。

白牧师说，从1974年他开始上初中以后，对“牛鬼蛇神”的批斗有减弱的趋势，但学生仍被要求背《毛语录》。从八十年代开始，大量文革受害者被平反，政治身份不再如以前那样成为一种选拔标准。中学毕业而且成绩优秀的他，有机会进入当地电力局下属，做了几年伐木工的工作。没想到1984年当地三自教会的负责人帮他报名参加三自神学院的考试，因为他有家庭信仰的背景。此时官方教会已经被允许恢复聚会，官方控制的神学院也开始招生，当然要先从有家庭信仰的年轻人中录取。我们在S市访谈到一位曾经在九十年代初报考三自神学院的谷先生，他曾因为没有家庭信仰背景，尽管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还是没有被三自录取。就这样，白牧师成了八十年代最早一批三自官方神学院的学生，专科两年。官方控制的三自系统一种有20所神学院。从招生章程上看，这一系统的教育目的首先是“要培养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中国教会的‘三自’方向”，其次才是“在灵性和神学上有一定造诣”等。⁴⁸在文革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目标是进行统战，支持共产党的专政同时限制非官方教会的信仰活动，防止“境外势力颠覆”。神职人员的培训管道还是处于政权意识形态的监督之下。⁴⁹

⁴⁸ 《金陵神学志》第三期，第8页。

⁴⁹ 丁光训“回顾与展望——1980年10月6日于南京在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上的开幕词”《天风》1981年第1期

同时，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基督教、基督徒、神学这些词汇已经从官方和日常的公共话语中完全消失了。共产极权通过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和广播将意识形态化、军事化的语言强加给广大民众，重新塑造了大陆民众的语言生态和语言文化，其影响直延续到今日。⁵⁰虽然1949年前，基督教信仰通过宣教士建立的大学、医院等，在民众中享有较好的声誉，但经过四十年之久的冲击期和空白期，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基督教信仰和身份是陌生的，或者是一种另人反感的反动符号。⁵¹可以说，官方媒体传播的无神论的确成功地塑造了民众对基督教的无知和歧视。白牧师的一次经历可以反映这一点。

有一次我和神学院的同学去市里一个公园，想照个合影，去租相机的时候，别人要工作证。那时我们没有工作证，只有学生证，因为我们是神学院的学生。就递给他看，他看了以为是神学院是关神经病的地方，就不租给我们，还说，你神经发了怎么办。我们怎么说他就是不租。然后我们6个神学生把学生证都放在他那里，说我们都是学生，你租给我们，我们6个人不会同时发神经吧，总有一个是清醒的吧。这样他才愿意租给我们的。”

白牧师后来的经历说明三自系统的神学院的所谓培养系统是非常混乱的。神学生毕业以后一般并没有明确的去处，只能自己通过老师和同学联系一些教会的杂工。和这个时期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他可以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寻找立足的工作，但因为粮食配给制度仍与原籍户口挂钩，他经历了好几年靠别人施舍度日的困境。

后来家里人说，你没有工作，不成家了？他们很着急。我一个同学在昆明的两会，给我打电话说，那里教会办了一个门诊，需要神学生，办个医院。我就去了，医院把我派到第七医院去实习，抓药注射打头皮针护理，我就在每个科室待三个月，学习内科外科儿科等等。后来我同学又给我打电话，说省两会要个扫地的，那是昆明最大的礼拜堂。扫地一年多。那时户口很重要嘛，我户口转到四川，后来我又到了云南，买米面蜂窝煤都买不了，都要粮票。就是弟兄姐妹的爱心养活了我们，每天晚上做礼拜，他们就塑料袋里放一点点米、面。

这样靠朋友自发救助了几年后，白牧师想到要回去重新做伐木工，但那样还是不能解决户口问题，因为他的户籍仍在偏远的农村。⁵²经过神学院老师的鼓励，他觉得再次考取南京三自最好的一家神学院，是他可以改变户口身份而且留在城市的唯一出路。于是他

⁵⁰ George P. Jan, "Radio propaganda in Chinese villages." *Asian Survey* (1967): 305-315; Alitto, Susan Biele. "The language issue in Communist Chinese educ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3, no. 1 (1969): 43-59.;

⁵¹ Yang, Fenggang. *Religion in China: Survival and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p66-84; Bays, Daniel H.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John Wiley & Sons Press, 2011. P158-205.

⁵² A *hukou* refers to a type of residency permit which classifies the individual into either "agricultural" or "non-agricultural" category. *Hukou* or *Huji* status is on a hereditary basis, and th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 1958, and has functioned as one important instrument of central planning of the labor force. The state relaxed *Hukou* control in 1985, allowing peasant mobility into the cities with temporary residence right.

就去参加了考试，全市只有他一个人考，那是1989年5月，正是民众游行示威的时候。⁵³ 报考院校那年也需要生源，而他是唯一报考的，考的成绩也非常好，按理说被录取是没有问题的。但两个月之后，他受到通知说，自己的申请被省两会压住了，不让转户口，说他有“历史问题”。此时，八九民主运动已经被镇压，所谓“历史问题”是一种暗语，指参与或支持八九运动。

实际上我没有参加，但他们想咋说就咋说嘛。我还记得那天K市只有我一个人参加考试，有6个监考老师。我考试的时候，在阳台上看，下面幼儿园老师打出横幅“妈妈我们没错”。我说去看一下，那6个牧师说不行，我说你们6对眼睛看着我嘛，我又跑不掉。后来我找到当时一个统战部的官，开了一个证明，说我是爱国爱教的，没有参加过六四，坚决拥护党中央平息反革命暴乱。他让我寄到南京去，我复印了一大把，原件邮寄出去了，复印件留下来了。当时南京那边都开学了，问我怎么才来。南京神学院陈院长说，没事，你是我们录取的学生，我把你的档案都看过了，你就好好读书，以后的事情不要愁。我就回到南京，读了两年书。当时每天伙食补助只有1块钱，只能吃两餐。

在后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经过平反之后，政治身份的歧视已经削弱了，但另外一种记号成为被官方用来打压的潜在标准：一个人有没有参与或支持过八九运动。⁵⁴这一标准被用在几乎所有官办单位的提升中，任何有“历史问题”的人，不管技术或能力如何，都不得以提升或聘用。可能因为白牧师考试那一天正处在全民被动员去游行的时期，政府就假设他一定参与过其中。

毕业以后，白牧师申请到C市教堂工作，一开始是作为“传道”，等待被按立为牧师一职。但在1995年，他被卷入一场风波之中。最开始是有一个信徒把一些从香港买的118本基督教书籍暂时寄存在他家里，准备以后分给一些家庭教会，而他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书。因为白牧师就住在教堂的院子里，有一次这些包裹书的蛇皮袋子被人注意到而且举报了，说他在散发非法书刊。当天半夜派出所就来人查看这批书，而且把白牧师带走，关了一夜。他们请人鉴定过，确定这不是大陆允许发放的书刊，就在周日白牧师还在教堂的时候把他又带走了。白牧师说，从那以后，他成了公安局和宗教局经常的约谈对象，但不管他怎么解释，这些干部们都认为他是“有政治问题”的。

从那次以后，问题就很多了，对我自己来讲，是再次经历了文革，怎么解释都说不过去。在按立上，三自也有人说我不能当牧师，说我在大是大非上有问题。其实我还不想被他们按立呢。所以我在省三自里是出了名的人物，就是因为这个政治上的问题。不过99年澳门回归之前，对我的审查就解禁了，但是这个事的影响还在。但是信徒觉得你没问题，品格没问题。政府是用放大镜来看你。

⁵³ 这一年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民主运动，5月正是运动发展到全国的时期。

⁵⁴ 我们会在第4章重点分析这一过程。

从圣经到基督教书刊，政府一直严格控制并限制其出版和销售。相比80年代初刘牧师的遭遇，在官方教会中的白牧师可能是一个幸运儿。在九十年代后有很多起教案都带有非法出版物或接受海外出版圣经的罪名。⁵⁵基督教出版受到严格审查和限制，直到2005年以后，出版业的进一步市场化，包括主管出版部门为经济利益而将ISBN书号市场化，才使基督教出版业逐渐解冻，于是出现了很多小规模基督徒出版公司。⁵⁶即使到今天，依旧有人因为藏匿“非法”书籍而被判刑，如2012年太原市将出售合法基督徒书籍的书店的两名负责人分别判刑2年和5年的例子。⁵⁷也许是白牧师在官方教会牧师的身份对于他又了很多的保护。

在共产党统治的环境下，三自官方系统和非官方教会，但其间的分界线在具体场景下是模糊化的。事实上，很多基督徒对自己信仰认同如白牧师一样，但归属却不一定能按照所认信的。他们自己对此有合理化的解释。我们问到白牧师，既然知道政府控制了三自，为什么还继续去官方教会中时，他回答说：

我家的信仰环境并不是三自。现在好多人说三自和家庭教会，我觉得是概念上的错误，教会是基督的，而三自不是教会。实际上我都不承认自己是三自教会的。在我的概念中，有信主和不信主的区别，没有什么三自和家庭的区别，都是人分的。不过，在三自里服事，挣扎是很大的，到处都有，毕竟是在这个国土里，人事权是掌握在政府手里的。现在政府倒对讲章没有审查、限制了，和以往不一样了，但他们经常以别的问题来找你的事。我在讲台上公开说，谁要在C市找家庭教会的信息，你要找我。教会和政府的关系也同样，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比如，能不能在公共场合发福音传单，政府说不可以，但我们是一定要做的。我们不会公开教导去发，这个方法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方法不好也会砸了锅的。

事实上，白牧师在国家政党统治和组织控制下的三自教会中，还是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中。有时候，白牧师对于政治运动和政府的宣传还是用一种消极的不合作来化解他内心的挣扎。在中国基督徒中，有一种三自-家庭或官方-非官方这样的二元对立的观念，但是对于白牧师而言，他自己如同每一个这个社会的普通人一样，在权力的压力下，依旧有自己信仰所提供的伦理原则，他可以在官方的体系中谋得一个生存的职位，也能够将人介绍到非官方教会中得到帮助。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变革的人，我们常常惊讶为什么在89之后，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会如此迅速的消退，也许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在极权权力支配的压力下，人们往往不能够自由表达我们内在的认同，我们也无法知道究竟

⁵⁵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10.p616-625. 2000年以后如北京蔡卓华案等。

⁵⁶ 访谈出版界基督徒P和L，2012年8月。

⁵⁷Radio Free Asia,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ehui/hc-06192013151432.html>

有多少人有多少不同的信念和信仰，正如文革时有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⁵⁸有一些如同白牧师这样的人，尽管在红旗下却能够唱出属于自己的赞美诗。

结论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通过暴力掌握政权后，极权主义支配的垄断性衍生到了社会、家庭的各个层面，建立起了一套新的生活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恐惧”等情感也是这种统治的基础之一。人出于自我的保护，会自我选择遗忘这些感受和经历。在暴力逼迫的极端环境中，人需要其他的伦理秩序和情感价值来取代这种支配，用很多受访者共同的表述来说，就是需要另一套“世界观”。基督教的信仰提供了一套世界观和意义指向，所以在黑暗时愈显珍贵。在经济改革后的中国社会，恐惧仍在政权意识形态强化时，塑造着人们的心灵秩序，从而左右着他们的思想、行为和制度选择。路径依赖理论并没有谈到这一深层原因。⁵⁹基督教信仰作为一种竞争性世界观的兴起，在中国政党意识形态瓦解之处，重建起一种心灵秩序。这种基于有神论的心灵秩序，甚至可以化解或超越极权主义下的恐惧感。社会学家齐美尔论述说，也许信仰有悖于一切理性化的证明，而且似乎在某些方面存在矛盾，但人们仍旧能够矢志不渝，是人类社会维系的最可靠的纽带之一。⁶⁰基于上帝仁爱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性关系，深刻地塑造出逼迫时代另一种心灵秩序和社会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信仰是一种更积极形态的“弱者的武器”，其动力远比消极怠工等更有力（Scott, 1998），并且通过个人的见证和关系能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长久的影响力。在极权主义阴影下的教会的确经历到一点，好像马克思曾说过的，“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同时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里的同情心，是没有灵魂的处境里的灵魂。它是人民的鸦片。”⁶¹ 尽管马克思将宗教比作鸦片是一种负面的评价，然而讽刺的是，他体会到一些和生活在共产主义极权政体下的人相同的情感，那就是，宗教是在这个政体下仅有的能够找到安慰和灵魂的栖息所，并且通过集体性的记忆保留到新的世界中。■

⁵⁸ 反右时的一句政治口号，出处不详。

⁵⁹ 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3-10.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Press. 1981. P3-59

⁶⁰ George.Simmel, *Essays on relig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p101-120

⁶¹ Karl Marx (Joseph O'Malley translation),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Cambridg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3-4

觀瀾

第十二期
觀察報告

2016·大暑

觀瀾學社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前言

这期《观察报告》组稿时间因为正值学社今年年会的准备阶段，所以这期报告相对稿件较少，希望读者理解。作为一个民间学术性刊物，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保持不间断的思考，所以我们仍然把这期大暑号呈现给大家。

这期楼晟的“资本观察”是在一个比往期都更广阔的国际宏观经济的框架下进行分析和预测：核心论点是日前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将经济危机的爆发向后拖延。有些细节文章还需要关注，比如目前持币观望仍然有不小的机会成本：今年年初到目前为止美国大盘指数仍然有6%左右的涨幅。但总体是让我们对目前形势的保持清醒的认识，全球经济实在是正在向下一个深渊滑去。

《新疆少数民族的毒品困境》提出了一个主流媒体关注不多但却触目惊心的现实：大量维吾尔族人在从事毒品行业并深受其害。我们可以从作者的材料中看到，这个现象背后的力量非常复杂。日前这篇文章更多的是提出问题，感觉作者如果能将大的叙述框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维族人生活的冲击，政府政策的副作用，国际力量的介入）和这个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可以解答很多问题，比如：这个毒品问题的起源是什么？哪些人在其中参与最多？受害最多？得益最多？有解决的希望吗？给民族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会给未来的民族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九世班禅流亡内地对内外蒙政局的影响》梳理了一个并不为普通知识人熟知的边疆人物——九世班禅——1924-1937年间流亡内地及内蒙古期间对当时内外蒙古政治的影响。这个工作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根据作者的论述，清楚地看到藏传佛教班禅在蒙古地区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蒙藏宗教政治体系加深认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作者进一步展开对九世班禅的作用和当时汉族地区尤其是中央统治的关系分析，这并不是汉族中心论（作者执意要批评这个立场），而是把多个民族的政治生活放在当时多重政治力量互动的时空中进行展现，这应该更能解释很多历史事实。毕竟，正如作者在其他文章中展现的，蒙藏体系本身就是在和汉族政权互动中产生的。

《泰国的政治、历史与艺术》从三个方面介绍临近中国但对大多数中国人却很陌生的国度——泰国。文章的着重点仍然是（和本期的其他几篇文章一致）泰国和外部势力（包括缅甸、中国、西方、日本）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泰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政治体：从没有被殖民过，兼具君主立宪、军方控制、民粹主义的特点，佛教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泰国在处理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上，有哪些问题的处理值得我们学习？希望作者在以后的文章中能更进一步和我们分享。

“观澜学社”是一个自发、独立、非商业的网络社群。我们关注当代中国历史的展开，我们计划每隔两到三个月公开发布一份《观察报告》，上期《观察报告》的编号是“2016·春分”，以后也将逐次按照中国农历节气编号。本报告属于观澜学社成员内部交流之用，如需转载、引述，以及任何形式的利用，请与相关作者联系。看到本报告的读者，如有兴趣查阅早期报告，可向 guanlanxueshe@gmail.com 索取。■

目录

资本观察

楼晟：刺激无效之后，警惕极端手段 4

边疆观察

王明远：九世班禅流亡内地对内外蒙政局的影响
——兼论边疆历史人物的构建 6

李永峰：新疆少数民族的毒品困境 13

本土/国际

萧敢：泰国的政治、历史与艺术 17

资本观察

刺激无效之后，警惕极端手段

文/楼晟

时间又到年中，有好事者翻出上半年主流媒体和权威机构对重大财经事件的预测，列出的分别是内地熔断机制可稳定市场、国际油价或跌至 10 美元、A 股 70% 机会加入 MSCI、英国留欧机会逾 90% 以及美联储大概率在上半年进行第二次加息。虽然资本市场一向不太把预测当回事，但像今年上半年这样全体“扑街”的情况还是很少发生。辅之以诸如美林时钟被玩成电风扇的调侃，这些让人尴尬的景象其实多多少少都在指向全球央行与政府在刺激拉动经济的手段上已处于黔驴技穷的困境，本质上都是当前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趋于失序无效的结果。而结合近期中国周边陡增的地缘政治压力，已经不能不让人认真思考和面对一旦正常手段穷尽，以战争和冲突为代表的极端手段的可能性。

如今不光欧洲、日本央行实施了负利率，紧随日本之后，德国也拍卖了 10 年期的名义负利率国债（-0.005%），连美联储都在讨论负利率的可行性。这种普遍负利率趋势的实质是什么？真是为了所谓的刺激经济增长嘛？全球经济的根本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美国的金融泡沫破灭导致的坏账与债务，使得全球总需求不足，进而引发全球的去杠杆。而美国的做法是捂住泡沫不破，不想抛售实质性资产来填补坏账，不希望启动实质性改革来威胁它的既得利益，只想着挤兑其他经济体转嫁矛盾。这就直接导致大家都捂泡沫，谁都不想硬着陆后自己的资产变成容纳他国货币和坏账的池子，于是全球都资产虚高而现金流很差。因为虚高的资产本质上是含着隐性坏账的，在坏账没有显性化之前，信用就难以再度扩张，需求自然也就起不来。

而负利率直接来说，就是用牺牲新一代年轻人的未来，来保老一代人的既得利益和资产泡沫。有人或许会说，低利率不是有利于创业有利于企业债务成本降低有利于经济嘛？但这是在经济上升期、也就是信用扩张加杠杆时候的效果。而在经济衰退去杠杆中，虚高的资产价格使得大家都缺乏借钱的抵押物（当前资产价格已经普遍高估，自然难以再抵押出更多的钱），因此降低利率的主要作用只是便于借新还旧维系资产泡沫，希望以时间换空间，让利率和实际通胀之间的利差来慢慢消化资产价格虚高的部分，从而改善现金流，使信用重新扩张。可问题是，低利率和负利率本身也在向市场传递这样一种信号，那就是机会成本很低，时间不值钱。

举例来说，李大霄的 2132 钻石底在绝对价格上肯定不高，之所以钻石底不能算作成功的预测，并非因为之后还有 1849（1849 只是瞬间的绝对低点，市场的真正底部就在 2000），而是提出的时间太早。从 2012 年 1 月初到市场真正启动的 2014 年 7 月底有足足 2 年半，即便是到 1849 的 2013 年 6 月底也几乎是一年半。对同期社会融资成本而言，2 年半至少是 20%，一年半至少是 12%。所以说 2012 年买了钻石底，即便股价不跌拿到 2014 年启动也等于亏了 20%。同样的道理，低利率乃至负利率虽然维系了资产泡沫，却同时压低了持币观望的机会成本甚至还使得持币能有收益，从而让需求更少、经济更差、通胀更低，通胀与利率之间的利差更小，让资产泡沫消化的更慢。甚至不排除极端的情况下，由于资金成本低（且预期还有更低），总债务规模很容易失控，隐性杠杆不降反升，使经济陷入积重难返的境地，稍微一个小的波动就可能致全局性的资产价格总崩溃。

所幸这种极端环境并非现实世界。但现实环境中虽然没有极端环境中的一些风

险，却也多出一些极端环境没有的险恶。不妨想象一下，现实世界中各个主要经济体之间正进行一场吹漏气气球（资产泡沫）的比赛，静态的看，除了最后的赢家，输家最终都会气竭累死，这里比的是谁的肺活量大或谁的气球漏气更少。但如果比赛进行到中途，有人明知自己肯定要先出局了，他会怎么办？他还会老实遵守规则，一丝不苟的吹下去嘛？理性的选择当然是少用点力气在吹气球上，从口袋里掏出锥子，或者没有锥子也至少有指甲留的比较长的手指，试着去戳一下别人的气球。毕竟在这种情况下，铤而走险总好过坐以待毙——比如说这次英国脱欧公投，却让万里之外的日本躺枪，日元暴涨日经暴跌，安倍经济学三年半的努力差点化为泡影。

因此在这场淘汰赛中，任何一方都不可仅以自己的肺活量或气球胶皮厚就掉以轻心。不谈赢得比赛，当下要保证不输就不能把全部力气都用在吹气球上，对于那些手插在口袋里不怀好意靠近的人，必须亮出自己的锥子甚至用指甲不那么长的手指戳戳对方气球的弹性，唯此才能吓阻别人以武犯禁。即战争准备越充分，面对冲突与摩擦表现出的政治意志越坚决，才越能阻止战争的发生。在这里，面对战争的主观政治意志要高于客观上的战争准备，因为战争从来不可能被充分准备，有无充分准备也从来不是战争是否爆发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战争一定会有伤亡，会死人。对于生物来说，死亡无疑是最坏结果。但人同时也是有智慧有情感的生物，如果资产价格崩溃，那么大概率上会发生的是全民陷入生不如死的深渊。曾经的俄罗斯，现在的乌克兰，都是现成的例子。每个有血有肉的人不妨扪心自问，这种体验又会比死亡好多少？■

边疆观察

九世班禅流亡内地对内外蒙政局的影响 ——兼论边疆历史人物的构建

文/王明远

九世班禅是当今学界研究成果最多的西藏历史人物之一，这与他曾经流亡内地（1924年—1937年）有关，使得这位活佛进入“中原政治视野”。九世班禅虽然流亡内地，但是多数时间还是在内蒙古度过的，历史研究中多强调班禅“宣化蒙人”、“翊赞统一”的业绩，把他塑造成为“中原政治谱系”中的一个“边缘”服从者。然而，班禅所出现的时刻，恰好是中央政府边疆控制力大大削弱，班禅作为喇嘛教的最重要两个宗教领袖之一，他出现在同为喇嘛教文明地域的内蒙，自然就是边疆的中心，而非简单的一个“流亡者”或国民政府的“宣化使”。从班禅真正的历史作用来看，班禅虽然在宣化蒙古使其服从中央上予以配合，但是作为活佛的他出现在内蒙古，其实大大增强了蒙古族人民的团结与自信，客观上促成了“蒙古自治运动”。另外，班禅对当时外蒙古的革命党与喇嘛教传统势力的斗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简而把班禅贴上“爱国”、“反对分裂”、“反对帝国主义”的标签，这固然反映了班禅在大局上的立场，但是这种评价带有明显的“汉族中心”色彩，未免浅薄，并没有真正反映班禅在二三十年代边疆政治中的地位，与当时边疆政治的生态与文明秩序。本文拟通过史料挖掘班禅在内蒙的活动，以及对内蒙古、外蒙古政局的影响，揭示真实的边疆政治生态，并且对历史上边疆人物的构建提出一些思考。

班禅流亡起因

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基本是同龄人，达赖仅年长班禅7岁，他们分别于1877年、1888年经过金瓶掣签被确立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历史上达赖与班禅，依据年龄尊长者为师，两大活佛系统形成互为师徒的亲密关系。然而，到19世纪末，英帝国主义开始图谋染指西藏，班禅的领地前藏恰好毗邻英属印度，英国采取了重点拉拢班禅的策略，这使得达赖开始不信任班禅。而这期间又发生达赖因为与驻藏大臣不和两次被革去“达赖喇嘛”封号，并且先后流亡内地和印度的事情，达赖被革职期间，清政府任命班禅代行达赖的职责，虽然班禅力辞，但是这更引起达赖与拉萨噶厦对班禅的敌视。所以，班禅与达赖失和的根源不在二人利益纠纷或品行不端，根本是两个政教领袖夹在两个强权之间被操纵摆布的结果。

班禅出走的直接原因则是达赖的“新政”直接触动了班禅的拉布伦寺系统利益。达赖在印度流亡期间，深受英国近代文明启发，遂回藏后就主持“新政”，其新政的一个目标就是打破旧西藏封建壁垒制度，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现代政府”。这是对1713年以来形成的达赖治理后藏、班禅治理前藏体制的根本触动。1915年起，拉萨噶厦政府开始在后藏设立基宗（相当于内地的行政专员公署），向班禅所属的百姓征收与摊派军粮、税款与乌拉。之后，噶厦又要求拉布伦寺支付土鼠年（1888年）和木龙年（1904年）英属印度两次入侵西藏以及水鼠年（1912年）清驻藏绿营兵与藏军战争，这三次战事军费的四分之一，又要求拉布伦寺以后承担全藏军费的四分之一，即27万克（600多万斤），而拉寺系统人口仅为全藏的十分之一，这显然是班禅无法接受的。1916年班禅写信给达赖，申述扎寺之苦，要求面谈，而达赖宣布要“闭关坐静”三年，期间不见任何人。1923年，噶厦又颁布“水猪年法令”要求扎布伦寺必须

按照 1830 年清册向噶厦缴纳赋税和劳役。班禅派扎寺官员去与噶厦交涉，反被投入监狱。形势至此，班禅感到难以立足于藏。1923 年 11 月 15 日夜，班禅带着侍从人员 15 人化妆逃出日喀则，开始了流亡历程。

班禅流亡最初流亡目的地为外蒙古考

九世班禅临行前，留下囑言给扎布伦寺四大仓活佛及僧俗官员，他说出走的目的是第一是寻求施主布施，募化钱财来偿还拖欠噶厦的债务，第二则是寻求第三方势力来调解与达赖的冲突。至于班禅欲往何处，需求何方势力援助，目前研究基本都肯定回答是中国内地。蒙藏委员会在 1937 年所做的《九世班禅大师事略》也称：“班禅大师为陈述藏情，巩固中藏关系，于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携带堪布等及随从人员取道北路甘藏路线，移锡中土。”（《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以下简称《档案选编》，第 477 页）然而，如果广泛依据内外史料，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线索显示班禅并没有把内地作为首选目标，他一开始可能是计划前往外蒙古。

班禅一行于 1924 年 1 月上旬开始进入青海，如果他以内地为流亡目的地，他的行进路线应该是经格尔木或玉树至西宁、兰州到达内地，而班禅又用两个月的艰苦跋涉，经过柴达木盆地，翻越祁连山到达河西走廊西端的瓜州，这个地方已经接近中蒙边界，而离中国内地越来越远了，这也正是 1905 年十三世达赖流亡库伦的路线。

1930 年代西藏官方与南京国民政府来往公文里面也有诸多班禅流亡库伦的佐证。如西藏驻京办事处给行政院的《为陈述班禅种种谬举吁恳解决并译录三大寺及民众宣言书》，“班禅离藏时所派联络哲布尊丹巴之教珠堪布，至今尚留库伦，任有要职”。（《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以下简称《史料汇编》，第 2620 页）《西藏三大寺僧俗官员及民众全体大会宣言书》亦有言“又有教珠堪布早由库伦以驼马来迎”。（《史料汇编》，第 2626 页）文中所言的“教珠堪布”是哲布尊丹巴经师，与教珠一同来迎接班禅的还有哲布尊丹巴的苏本洛桑图丹等，他们带着大批驼马队而来，班禅一行在 1924 年 1 月中旬与他们相遇，得以摆脱衣食无着的困境，嗣后班禅又于教珠一起来到瓜州，他们于 3 月 20 日分别，按此推测应该是班禅派遣教珠去库伦联络。西藏驻京办事处另一则致行政院呈文则更详细说明班禅流亡过程：“卒于民国十二年改换服装逃奔库伦，拟因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勾结引俄人，复侵西藏。及抵西宁，始闻哲布尊丹巴死，大失所望。又经西宁镇守使马麒力阻其行，不得已折入内地。”（《史料汇编》，第 2636 页）西藏方面所言班禅阴谋去库伦勾结俄人是诋毁之言，但是说班禅闻哲布尊丹巴死，而放弃去库伦计划则是与历史较为吻合。所以，到 1924 年 5 月 13 日他才致信大总统曹锟，这是他第一次与中央政府沟通，这已经距离他离开扎布伦寺半年之久了，如果他真的是当初来内地，应该在 1924 年 1 月到达青海就与中央联络沟通了。

在内蒙作为“精神领袖”出现的班禅

班禅在内地滞留期间，驻锡内蒙古度的时间最长，从 1927 年到 1935 年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内蒙古渡过的。内蒙自从 16 世纪末以来就接受了藏传佛教，到此时已经喇嘛教浸润 300 多年，到清末是喇嘛教已经成为蒙古文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据 1912 年的统计，内蒙古六盟有蒙古族人口 87 万，而喇嘛就占 12.8 万，喇嘛数量约占全部人口的 14%，宗教氛围较浓蒙古西部喇嘛比重更高，1938 年日本人所做的调查，乌兰察布盟喇嘛占成年男子的 44%，察哈尔个别旗甚至达到 80% 以上（张植华，1982）。喇嘛教此外还有大量的土地和属民，很多著名活佛都是王公子弟，所以喇嘛教也拥有极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班禅作为喇嘛教的最为尊崇的两大活佛之一，他来到内蒙自

然成为僧俗两界都捧奉的领袖。

班禅来蒙期间，又正值蒙古社会陷入困顿和迷茫的时期。自满洲兴起以来，清朝统治者逐渐在内蒙地区构建了清朝的政治“道统”与喇嘛教“教统”并行的统治制度，清朝统治者通过赐予蒙古王公爵位，与蒙古王公联姻，大力扶持喇嘛教的方式，清朝政权在蒙古王公心中形成了极强的认同性。而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被推翻，蒙古王公普遍感到失落，对新的“民国”无所适从甚至敌视（蒙古王公在清亡后积极参加“宗社党”的复辟活动，伪满政权成立后，德王等蒙古领袖依然对溥仪行三叩九拜大礼），背后是他们对传统政治秩序的眷恋，与对“汉族主体性”更强的中华民国与共和制度的陌生与不安。班禅作为旧的“道统”与“教统”象征人物的出现，这无疑让蒙古王公找回“文化归宿感”，自然对其亲切而尊崇。而在经济上，汉族军阀变本加厉侵吞蒙旗土地，到 1920 年代末，几乎所有的大兴安岭以南的适宜开垦的牧场都被垦为农田，蒙古族人民流离失所，普遍陷入困顿。总之，蒙古社会在二十年代呈现普遍的溃败，在这蒙古族充满绝望与彷徨的时刻，班禅活佛的降临，的确是全内蒙上至王公、下至平民都倍感兴奋的事情。班禅也成为二三十年代蒙古高原上一个各方都倚重的“中心”。

班禅到达内蒙后，蒙旗王公纷纷来朝见，并争相邀请班禅到旗内驻锡诵经。班禅也会选择一些有影响力的旗前去驻锡。1932 年班禅到达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王所在的达尔罕旗，云王为了迎接班禅，当地文史资料记载：“广福寺负责在森吉图哈喇阿玛河渡口处修建一座木桥，为班禅开辟避暑之地”；“云王在自己的府邸查干胡布为迎请班禅的到来，修建一座楼阁”；“达尔罕贝勒旗旗府向全旗发布文告，要求各苏木、艾玛克提供银元 40 块、羚羊 35 只、牛 1 头、全套帐篷一顶、全套马鞍 2 个、块毡 2 条、四套车 1 辆、侍卫 6 名；全旗准备燃火牛粪 1 力、背篓、奶牛 50 头、挤奶员 10 名”；“用户黄、红、白三色沙土壤边的道路从朝克沁独贡、乌兰拉布楞的大门处一直延伸到庙东，道路两侧还摆放各种宗教装饰品，一路香烟缭绕”。《乌兰察布史略》，第 157-158 页）刚继位的阿拉善亲王也多次邀请班禅，除了宗教上的崇拜外，亦想通过班禅来旗来加强在旗内的权威，1935 年，班禅回藏途中，来到王府所在的定远营，达理札雅亲率旗府所有官吏在城外数十里迎接，九世班禅所经街道一律“禁街”，所行路面皆以黄土铺垫。又因城门楼上被人走踏过，达理札雅认为班禅由城门入城不符和人间至尊的身份，决定用砖茶摆成阶梯，让班禅从城墙上面通过。（《回忆 20 世纪 30 年代阿拉善旗的社会状况》，《阿拉善文史》1986 年）班禅所享受的礼遇之隆重，即使是在曾经来到内蒙的康熙帝的历史记载中也看不到的。

班禅每到蒙旗举办法事活动，则必然引起当地的震动。班禅在内蒙共举办过六次时轮金刚法会，其余普通唪经、摸顶仪式更是不计其数，班禅每当出现，动辄聚集顶礼膜拜信徒多达数万，甚至十几万。1928 年，班禅在科尔沁札萨克图旗（今科尔沁右翼前旗）举办的金刚法会，这次参会的人有 17 万之多：“除了哲里木盟外，锡林郭勒北部、昭乌达盟等地的王公贵族和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不远千里云集而来，使唐格克庙、慧丰寺周围十公里方圆，布满了蒙古包，人人都以能谒见班禅为一生最幸运之事。据当时的目击者记述……当班禅讲经法会开始之际，法号发鼓齐鸣，达官贵族、上层喇嘛跪坐在大殿内外，目不转睛地望着班禅的身影聆听；地主、牧主以及大小随员延伸到大殿院外；而普通百姓则排列到数里之外，竖耳静听远方传来的微弱的音响甚至什么也听不见。特别是班禅举行摸顶仪式时，人们更是争先恐后地接受摸顶洗礼，然后领得一缕红布条（称做“景嘎”）这个吉祥如意的象征物，系在脖子上飘飘然地离去。”（《达尔罕文史》1996 年合订本，第 32 页）1933 年班禅到达包头，“不论贵族、平民、百姓，听到班禅驾临包头，纷纷骑骆驼或步行，携带财物，前来朝拜。到聚德成门口时，即向班禅住所叩等身头（即自己爬在地下等身长，再跪立磕头，头必点地），一

步一头，直磕到班禅的座位前……班禅在这里住了半个月，又到五当召住了7天，朝拜者仍是川流不息。”（《内蒙古文史资料》45辑，第206页）1934年，班禅在启身返藏时，又应伊克昭盟王公的一再邀请来到鄂尔多斯高原，“班禅来到新召(伊克乌苏庙)，轰动整个伊盟，各旗的王公贵族、上层喇嘛都来朝拜，各地信徒也陆续来到新召给班禅磕头祈福……整个新召附近帐篷林立，人马喧嚷，磕头的人川流不息先后大约有10万人左右来磕头拜。”（《内蒙古文史资料》45辑，第207页）笔者曾经在东西蒙多地参观过多个班禅驻锡过的寺庙，班禅的驻锡都被他们视为寺庙最荣耀的历史，班禅所用过的东西也都被当做“圣物”，一直保存在文革“破四旧”。

班禅在内蒙期间活动广泛，从东面的呼伦贝尔到西面的阿拉善都留下了足迹。班禅作为全蒙古人都认可的精神领袖，他无疑成为当时蒙古人得纽带，尤其加强了蒙古王公们的联络，进入民国之后，蒙古会盟制度就废弛，蒙古王公之间更加隔绝，而通过接待班禅，以及组织班禅法会活动，这些蒙古王公之间的交际又热络起来。

班禅此时亦充当了蒙古人利益保护者的角色，他利用与汉族实力派与国民政府关系较为紧密的优势，不断向他们反映对蒙古族人在垦荒逼迫下利益不断丧失的情况，下文是班禅与1930年6月致信辽宁省政府主席反映强垦“辽西荒”的公文：“达尔罕王旗内蒙人所有多数耕地牧场、近被附近县署、将地收归官中、自行耕种，因之蒙人失去住所、甚形困难……务祈详查、秉公处理、善法援助、勿使蒙人寒心、庶收各族感悦倾心之效”。（布音赛仁，2006）他努力扮演着蒙旗与地方当局与中央的调解者，在不伤害与地方当局与中央关系的前提下，尽量为蒙古人说话，这也进一步提高了班禅在蒙古人中的威信。

班禅对“蒙古自治运动”的影响

班禅在内蒙期间，恰好又是蒙古民族主义运动自民初陷入低潮后，再度高涨的阶段。作为此时内蒙“中心”的班禅，历史研究多局限于利用国民政府对班禅的褒扬令，认为他认真履行宣化蒙古的委托，对“蒙古自治”起到了有效抑制作用。然而，班禅的出现强化了蒙古人得团结，班禅对“蒙古自治运动”的兴起起到了客观推动作用，班禅本人也对蒙古人得政治诉求持同情态度，可以说没有班禅就没有“蒙政会”和“蒙古自治运动”，其角色颇似哲布尊丹巴在外蒙自治中的作用，只不过班禅没有主动卷入并且被政治势力左右罢了，这是以往研究“蒙古自治”的学者都忽略的。

班禅到来后，一些有远见的蒙古民族主义者也开始认识到班禅对蒙古人追求民族权益、对抗汉族军阀的价值。在当时内蒙古王公各自为政，互不买账的情况下，作为彼此都异常认可的宗教领袖班禅无疑是最好的动员武器。1929年，刚刚在内蒙政治崭露头角的苏尼特左旗德王在拜见张学良时，遇到曾经领导过呼伦贝尔独立运动，并且担任过外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的郭道甫（墨尔森泰），郭告诉德王：“外蒙古与内蒙古情形大致相同，为什么外蒙古独立成功？是因为有哲布尊丹巴这个宗教领袖，在蒙古民众中形成了中心信仰。反观内蒙多次抗垦或独立运动都归失败，是因为各自为政，形同一盘散沙，没有中心信仰，以致历次运动无一成功。现在听说班禅的堪布们正请中央用武力护送班禅回藏，一时尚恐不能实现。趁此机会，应当联合各旗集资在蒙地为班禅建庙，请班禅留在内蒙，做为宗教领袖，形成中心信仰，对我们进行蒙事，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德穆楚克栋普鲁，第7页）德王也深以为然，遂回锡盟后劝说盟内王公共同集资为班禅建庙，希望班禅能够永久驻锡，借班禅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号召力。

而班禅饱睹蒙民的凋敝，对于蒙古人的遭遇显然是同情。对于蒙古自治运动的态度

度，曾经长期担任德王秘书的著名蒙古学家札奇斯钦曾经说：“另一个赞助者是班禅大师。他认为这种环境下，蒙古人想自救也只有团结自卫一途，可是他碍于自己的立场不能明白表示而已”（札奇斯钦，第96页）。德王现在欲担起维护民族利益的大旗，班禅显然是给予支持。但德王当时年龄尚不足三十，在蒙古王公中属于资历浅的，他担当的职务也仅仅是锡林郭勒盟副盟长，不仅在盟内受盟长索王的轻视，在盟外更受云王等老牌王公的冷遇。班禅帮助德王说服了最重要王公乌兰察布盟长云王和锡林郭勒盟长索王，促使西蒙古各盟旗团结在德王周围。关于班禅说服索王事，此事发生在1933年4月，德王曾经在其回忆录写道：“班禅适由乌兰察布盟百灵庙来我旗……我认为机不可失，遂请班禅帮助我，同他去乌珠穆沁右旗说服索王……到达乌珠穆沁右旗……我不敢同他（索王一引者注）直接谈自治的事，答复他说：‘班禅佛爷也正在此地，何不请求佛爷指示明路。’索王同我去见班禅，请示对策。班禅即答复说：‘前次德王和我说的联络锡、乌、伊三盟会商蒙事很好，现在正是时候了，积极去做就对了。’”（德穆楚克栋普鲁，第7-8页）由于班禅出面，索王自然也改变了态度，立刻写了密令给盟内十旗札萨克（执政官）要求他们支持德王，并且写了一份亲书给云王，让德王去和他面谈一切。

德王在取得锡、乌、伊三盟王公支持后，即着手召开同年9月召开“蒙古自治会议”，然而，这个会议很难被国民政府和直接管辖西蒙的绥远地方军阀所容忍，班禅又利用举办金刚法会为掩护，使得各方蒙古代表相聚议事师出有名。札奇斯钦有忆：“德王首先和云王约好，由百灵庙大寺出头，邀请正在德王本旗苏尼特的班禅前来驻锡，主持时轮会刚 kalachakra 法会。而班禅自然明白其中奥秘，也乐意的接受这项邀请前去诵经。……大师既衷心赞助蒙古人的团结自救，当然会加以晓谕使他们敢于参与。这是当时的高度机密。也是10年后笔者札奇斯钦在锡林郭勒盟充任总务处长之时才由德王亲自说给的，可是那时对这件事还是保持秘密，知道的人不过几个而已。事实上，班禅的驻锡和他的指示，使与会的王公保守分子们这力坚定了信心。”（札奇斯钦，第100-101页）班禅年谱显示，班禅接到蒙古王公的通电后，8月24日就把行辕迁到百灵庙，翌日，来自全蒙古的王公和代表116人就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可见双方配合之默契（丹珠昂奔，第649页）。班禅还通过卜神来激励“保守”的蒙古王公。这些行为，无异让笃信班禅的蒙古王公坚定了参与“自治运动”的信心。

“蒙政会”成立后，其主张的自治范围超出国民政府的预料，开始对“蒙政会”产生怀疑，而班禅又向中央为“蒙政会”说项，认为这委实是践行中山先生扶植弱小民族的政纲的合理合法举动，班禅代表致国民政府信电指出：“内蒙自治，据闻系本孙中山先生五族平等民族自决自治原则，推行地方自治，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以便巩固乌伊锡三盟，及阿拉善等旗共御外侮，不是违背中央，所要求者，在中央指导之下，组织一个强有力地方自治政府，保卫国土，免再沦陷，军事外交仍属中央办理，地方绝不干预，此可证明各王公均能深明大义，报载同人用飞机接德王至长春开会，实无其事，中央如能相机开导，不但无甚问题，同可促西蒙众臻巩固。”（《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4辑，471页）因此，当时内地新闻界多认为班禅是“蒙古自治”背后的主谋，当时的《大公报》社论中提到“此次德王号召蒙人，颇利用班禅之宗教势力”。后来到南京后不得不召开新闻发布会来为自己辩护（《档案汇编》，第72页）。

不过强调班禅同情“蒙古自治运动”，并非意味着他支持蒙古人“独立”，从班禅的思想和经历看，他也并不赞同激烈的民族主义，因此当“蒙政会”受到极端王公怂恿时，他开始出面制止。1933年10月，“蒙政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之际，班禅在百灵庙召见王公，告诫他们：“本人极望诸位少安，以待此次诸位所集讨之自治，以范围无论如何不能超出地方自治以外。此种自治，须受中央之扶持与若干制度之限

制也，然后蒙人方能享到自治真正之益。”（《档案汇编》，第72页）受班禅的影响，此次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组织法》增加了若干约束条款。班禅也提醒德王，要看清日本与苏联真实面目，不要被他们的阴谋所利用：“此次自治运动禁违背拥护中央之则，及提防被日俄之势所利用”，“内蒙应在中央扶助之下，施行自治，可免日俄之窥窃，若用自治之名，行独立之实，则以浑浑噩噩之蒙人，担负外交军事之重责，终必为日俄所欺”。（《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5辑，26页）班禅1934年离开百灵庙回藏，“蒙政会”失去了班禅的约束，也失去了一个与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沟通调解的渠道，在日本威逼和地方军阀的挤压下，德王病急乱投医，最后轻信日本人，成立伪政权，走向不归路。如果班禅留在内蒙，很可能不至于抗战期间出现“蒙疆自治政府”。

班禅对外蒙古政局的影响

班禅大师来到内蒙对外蒙政治的影响亦被现有的研究论文一概所忽略的。外蒙亦是喇嘛教文明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在独立前与内蒙也是奉行着“双权威”的政教二道并行的秩序。在政治上接受清朝的正统，在宗教上接受西藏的正统。并且与内蒙相比，外蒙受清朝政治正统影响更为薄弱，受西藏的宗教正统的影响更强。外蒙最高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自第三世以后也都在西藏转世，并且也逐渐成为蒙古的政治领袖。所以，对外蒙来讲，西藏领袖之一的班禅也是影响他们的“中心”。

班禅大师驻锡内蒙期间，正值外蒙古人民革命党推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新旧势力交锋最激烈的时期。而此时外蒙政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去世，外蒙传统势力群龙无首，作为比哲布尊丹巴地位更高的班禅到达内蒙，对于旧势力而言，“活佛”来到与外蒙比邻的内蒙，无疑给他们一线的安慰和希望，也成为他们反抗行动的一个寄托，对外蒙当局而言，班禅作为旧秩序的代表，无疑是对他们新秩序发展的挑战。由于班禅亦作为外蒙“中心”之一的地位，他不可避免被卷入1930年代外蒙古最重要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第一件是1930年的“38名僧俗封建主叛国案”，外蒙古当局称，这38名贵族联名致信国民政府与班禅，他们派出代表给国民政府和班禅送信过程中，在边境被抓获，外蒙古当局称截获的信件里邀请“请转告大中华民国政府和班禅额尔德尼活佛，请他们协助消灭人民革命党，以便邀请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生佛和蒙古人名众望所归的班禅额尔德尼来蒙”。（兹特拉金，275页）1931年至1932年，外蒙古西部又爆发了蔓延四省的哈尔藏多尔济暴动，外蒙古当局称哈尔藏多尔济是“班禅喇嘛的代理人”，企图暴动成功后“让班禅活佛登上大汗宝座”。1935年又出现了“扎免季布喇嘛事件”，外蒙古当局称扎免季布勾结靠近呼伦贝尔的十七座寺庙，暗中与班禅联系，“准备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恢复革命前的旧制度，由班禅喇嘛上台执政”。外蒙古当局的说法不排除编构的可能。但是这可以说明，如果恢复蒙古旧制度，班禅必定是外蒙古最高政教领袖独一不二的人选，因此在1930年代外蒙政治宣传中，班禅和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外蒙最大的外部敌人。

班禅是否真的去干预外蒙政治依据现在的汉语与藏语资料还不得而知，应该外蒙古的蒙文档案会有记载。根据目前有限的一些资料也可以看到，班禅也曾派遣代表洛桑等去外蒙古为寺庙传经，但是立即被外蒙古人民革命党扣留，并没收了财物（张云，78页）。外蒙“社会主义改造”中有大量喇嘛逃亡来到内蒙，逐渐在班禅周围聚集了一批流亡外蒙活佛，如喀尔喀西部最高活佛嘉亨尊，以及迪鲁瓦活佛，后者在1949年应美国著名内亚学者拉铁摩尔之邀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外语系研究员，成为海外蒙古学史上一个重要人物。

班禅更重视对外蒙流亡难民的抚慰和接济。1930年，有300多外蒙难民流亡到阿

鲁科尔沁旗，班禅于是写信给热河省当局，为这些外蒙人请命，请求妥善安置：“念其至诚，悯其颠沛，欲藉此收外蒙人心。为此肃请，务祈俯念孑遗无告之民，准予在蒙居住，与阿鲁科尔沁旗民一律看待”（丹珠昂奔，第640页）。1931年9月18日，班禅又在海拉尔接见外蒙和苏联逃亡过来的蒙古人，并要求呼伦贝尔当局“飭属收容安置，以示怀柔”（丹珠昂奔，第643页）。1933年，又有大量外蒙难民涌入阿拉善，9月8日，班禅致电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请求给予赈济金20000元、差旅费2000元，又致电蒙藏委员会和参谋本部要求派专员来蒙安置难民（丹珠昂奔，第649页）。

班禅因此引起了外蒙与苏联的忌恨，1931年9月，他们趁班禅在内外蒙边境甘珠庙主持法会的时候，派遣特工鸣枪纵火，制造混乱，阴谋将班禅绑架至外蒙，幸而被海拉尔当局侦知，全力保护，班禅才幸免于难。（张云，78页；班禅行辕秘书长刘家驹《班禅大师全集》亦有记载）至于班禅与外蒙旧势力到底发生了哪些关系，班禅对外蒙政治到底起了什么影响，套用札奇斯钦描写蒙古独立运动之父杭达多尔吉的话说，“至今仍然锁在蒙古和苏联的档案里”，这是蒙古现代史和蒙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结语：跳出中原史观的边疆人物重构

今天意义上的中国，也就是边疆各民族被紧密捆绑在汉族历史主题上同步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不过60余年的历史。历史上虽有“中国”的国家疆域构成，然而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的有机构成部分西藏、西域、蒙古都是在历史进程中独立发展的，其历史人物的主要活动更是基于本民族或本文明的范围内进行，其定位也不能以简单的“爱国”、“叛国”政治脸谱公式加以简单化臧否。这种历史叙事方式，除了早就一个虚无的爱国主义外，更多的是对中国宏大多彩历史的抹杀，对历史遗产的丢弃。诚如本文论述的班禅大师，他在前现代的政治浪潮中，虽然卷入大中华的历史进程，但是他的地位并不是简单的“中原政治体系”中的一个“螺丝钉”，他的历史活动主要组成部分也不是在“中原政治谱系”的中完成的，他的政治活动完全是独立于汉族—中原政治之外的，虽然与中央政府发生着很多的关系。而在这非汉族轴心的政治体系中，班禅俨然是一个中心之一：他是后藏的政教两方面统治者，他是西藏、青海、西康藏族人心目中最重要两位领袖之一，他是外蒙古、内蒙古人民的活佛，他的影响力面积达到600多万平方公里，比中国内地还要大，对于这些地方人民来说，中原的皇帝抑或大总统、主席在他们心中是可有可无的，而班禅活佛却有重要位置。所以他虽流亡内地，西藏政治仍然无法安定下来，他来到内蒙促成了当地力量的分化，并威慑外蒙古政治，这都说明班禅是作为另一个文明体系中“中心”的位置，但这些都妨碍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而存在于历史。■

边疆观察

新疆少数民族的毒品困境

文/李永峰

因为靠近军阀割据、毒枭横行的金三角，位于中国西南的云南省，在人们心目中，与毒品问题深深地纠缠在了一起。这里的社会治安、公共卫生、发展模式、形象声誉等，都深受毒品之负面影响。近年来，第二个省份的毒品问题也日渐浮现，并正在成为“云南第二”？这个省份就是“新疆”。当前挑战新疆社会秩序的，除了地下讲经点、暴力恐怖袭击之外，还有毒品、艾滋病、失业、生态恶化等等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大潮冲击之下，中国多个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转型走向失控，其传统的社会纽带也近乎于解体。其中，以四川凉山的彝族最为典型，“失败的现代化方案”令彝族成了被遗弃的对象，毒品、艾滋病、孤儿成了凉山的常态。近几年，因学者的研究和媒体的报导，彝族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其实，受“失败的现代化方案”困扰的何止是凉山呢？新疆局势的恶化，其背后的根源也同样与此相连。毒品与艾滋病，也在困扰新疆的少数民族社会，特别是维吾尔人社会。

绝望者无力抵抗的诱惑

因为农业的局限与农村的凋敝。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最近几十年来，“剩余”劳动力都在向城市转移。不过，这些少数民族的农民或牧民子弟们，在城市的生活，比汉族农民工更加艰难。如同托克维尔所论述的美洲印第安人，在非母语的环境里，在远比他们更有钱也更有知识的人群中间，他们发现自己是“半开化和没有权力的人”。他们既受现有体制（诸如户籍制度）压制，又受城市“民情”排挤。竭尽所能地付出努力，但依然处于劣势，所以很多人陷入深深的绝望。这时候，面对那些处于道德与法治底线之下的诱惑，很多人内心失去了抵抗力。一些非法勾当吸引着他们，这可以令他们成为另类的成功者。一旦接受诱惑，很容易深陷其中，必将无力自拔。这些诱惑包括贩毒、卖淫、抢劫、盗窃等等。

作为暴利行业的毒品交易，为主流社会所不容，需要高度保密的团队协作。市场选择之下，一些处于社会主流之外的同质化人群，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这类交易的生态链。地处靠近毒源地的弱势少数民族，比如西南靠近金三角地区的彝族、傣族、拉祜族，还有西北靠近金新月地区的新疆维吾尔族、甘肃东乡和广河两县的回族，从过去已经曝光的一些案例来看，很多人成了这一交易链上的牺牲品。

如果说，失败的现代化、绝望的处境，构成了部分属于少数民族的个人卷入贩毒交易的内因。那么，金三角和金新月这两大毒品带所生产的毒品不断向中国输入，暴利的毒品催生了一个庞大的贩毒产业链，这一产业链的存在又去诱惑城市边缘群体，这则构成了他们堕落的外因。要探讨维吾尔社会的毒品困境，需要先去了解金新月毒品带。

金新月毒品的输入

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交界处的三角地带，包括伊朗的锡斯坦省（Sistan and Baluchestan Province）、巴基斯坦的俾路支（Balochistan）和开伯尔-普什图省（Khyber Pakhtunkhwa）以及阿富汗的边境各省，因为这一带在地图上形似弯月，被称之为“金新月”。这里人烟稀少、气候干燥、交通不便，近乎与世隔绝，现在，全球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海洛因都来自“金新月”，这里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种植基地。

追求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曾于2000年在阿富汗下令禁止种植罂粟，但宗教狂热分子仅靠极端教义无力发展经济，五年之后他们中止了这类禁令，并开始追求从鸦片交易中获取利益。阿富汗战争之后，在美军打击之下，塔利班之所以还能够再起，财力上主要靠了鸦片和海洛因的交易。2007年，有一份研究报告称，塔利班70%的收入都与毒品相关（John A. Glaze：《Opium and Afghanistan: Reassessing U.S. Counternarcotics Strategy》）。2013年，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开始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各省罂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这几年，“金新月”地区大麻的种植也在进一步增加。（梁秀波：《“金新月”地区毒品问题发展态势分析》）

金新月的毒品输出主要经过三条路线，分别是经过中亚的“北部路线”、经过伊朗的“西部路线”以及经过巴基斯坦的“南部路线”（廖文义：《阿富汗的毒品问题》）。其中，南线和北线，所输出的毒品都有一部分会进入中国。

阿富汗东北地区，特别是巴达赫尚省（Badakhshan Province），被认为是输往中国毒品的最主要供应源。由于阿富汗与中国接壤处的瓦罕走廊环境恶劣，难以直接渗透。阿富汗毒品一般通过巴基斯坦中转然后进入中国。毒品首先会经过开伯尔山口到达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之后再分两路到新疆：或经中巴边境的苏斯特、红其拉甫口岸由陆路进入新疆；或先贩运到伊斯兰堡或卡拉奇，再通过国际航班到达乌鲁木齐。（傅小强：《南亚恐怖策源地变化对中国反恐斗争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组织和操纵‘金新月’毒品入境的毒枭主要是以巴基斯坦人为主体的外籍犯罪嫌疑人，他们以在新疆设立各类贸易公司为掩护，表面上以经商为名，暗中却与境外毒贩积极谋划，里合外应从事跨国贩毒活动”（张昆：《日益加剧的“金新月”地区毒品渗透态势及对策研究》）。除了新疆之外，西藏和云南，也有可能成为“金新月”毒品入境的通道。2004年的时候，已有报导显示：“‘金新月’地区的毒品经尼泊尔-西藏-四川-广东再到香港。拉萨、成都海关相继破获6起经尼泊尔、印度向中国走私毒品的案件”。

不同于西南的金三角地区，靠近中国西北的金新月地带，毒品经济与当地政治深深地缠绕在了一起，除了阿富汗塔利班依靠毒品维持财政收入之外，中亚的恐怖组织“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是阿富汗毒品通过中亚输往世界的主要实施者，应该对该路线上70%的海洛因负责。（梁秀波：《“金新月”地区毒品问题发展态势分析》）而属于中国维吾尔人的恐怖组织，同样也在依靠毒品筹集资金。这令中亚的禁毒工作变的更为艰难，而中亚毒品所带来的影响也更趋复杂。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以后，在反恐压力之下，东部城市里的维吾尔人受到严格控制，过去所建立的贩毒交易网络，避开了国家政法机构的监控，而且与世界有广泛联系。这一地下交通网络，近年来，或许也在支持大量维吾尔人从中国出走。有俄罗斯官员指出，阿富汗毒品的生产和贩运必须视为对全球的威胁，而不仅仅是对地区的威胁。

这些金新月的毒品入境新疆之后，需要下线继续运输，直至最后进入吸食者手中。这个下线网络究竟是如何构建与运作，目前还无翔实研究。现在已经无法访问的维吾尔在线网站，曾在2009年刊登过一篇文章，侧面指出了这个网络的规模。该文

说：“云南省总共有五千到六千左右的维吾尔人。他们都以做生意为主。一切的生意只围绕一个东西——海洛因”。“做海洛因生意的不仅是以瑞丽为中心的云南省的五六千维吾尔人。在广州，上海，北京和其他内地省份以及新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各个城市里做此生意和后勤工作的维吾尔人的数量在2万到2.5万左右”。“直接或间接受到贩毒生意的影响而患上艾滋病的维吾尔人数目超过20万”。

毒品对于整个族群的伤害

关注公共健康的 NGO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曾在2010年发布过一份《维吾尔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健康、居住及其他人权状况报告》，该报告发现：“很多维族流动人口没有正当工作、没有固定经济来源。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毒品使用人员，以贩养吸成为他们直接获得自己所需毒品的来源和生活经济来源；另一部分人，自己不吸毒，但因为家属中有成瘾者，不得不靠贩卖毒品，获得毒资及金钱，来养家活口，这类人中女性居多，也有部分未成年儿童。毒品使用给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地威胁。在维族社群中，艾滋病传染率较高。艾滋病、结核、肝炎，成为这一人群人常见的病情。”

毒品除了是盈利的材料，也可以成为控制别人的工具。多年来，散布于大城市中的很多新疆少年，有些是维吾尔人、有些是其他民族，甚至也有一些是来自中亚其他国家的难民，只不过由于警方无力对其进行区分，他们也故意不带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所以都被视为新疆少年，他们以偷窃为业。他们造成的滋扰严重连累了整个新疆人群体的声誉。内蒙警方曾发现，这些盗窃团伙，“除了暴力胁迫青少年偷窃以外，还用毒品——大麻控制该团伙底层的青少年。”

2014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事件后，云南发起了“两清”运动（清理穆斯林学校、清理穆斯林教师和学生），聚居于瑞丽等地的维吾尔人早已四处流散。各城市中的维吾尔人贩毒网络可能也受到了致命的破坏。但这并不表示维吾尔人社会的毒品问题已经缓解。2016年4月13日，新疆“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禁毒办主任熊选国说：“‘金新月’毒品渗透活动加剧，堵截‘金新月’毒品走私渗透难度不断增大，大麻违法犯罪问题依然严峻。”高压可以塑造某种秩序，但只要内在的生存压力并没有缓解，对于那些底层的绝望者来说，来自毒品交易的诱惑就依然存在。现在，可能变得更加隐秘而残酷。

因为毒品、艾滋病、偷窃等行为，都为常人所反感，加上暴力恐怖袭击的潜在嫌疑，中国东部地区对维吾尔人的存在更趋恐惧。这酝酿了维吾尔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在城市“民情”中的处境更加恶劣，进一步激化民族问题。如何化解这一矛盾？恐怕将比西南地区的彝族等民族的问题更艰难。

少数民族的普通犯罪问题

中共建政以来，追求普世化的“共产主义”理想，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不同民族的发展阶段，所以不同民族的社会形态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为了让大家共同进入社会主义及至共产主义，需要对旧有社会形态进行改造。这种改造涵盖全部的56个民族。有的民族从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比如西南的拉祜族；有的则是从农奴制到社会主义社会，比如雪域高原的藏族；也有从封建社会或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改造之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共都坚持这一普世理想。胡耀邦主政时代，曾有过“两少一宽”的民族刑事政策。“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思路发生了变化，过去“先进”带“后进”的社会主义改造思路遭到放弃。鼓励个人发展的“资本主义”成为主流，不止人与人、城市与城市、省与省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也为了经济发展而展开竞争。一旦转换思路，将少数民族与汉族放在同一个平台之上，两者是两个主体，那么过去“两少一宽”提法，在汉族社会则成了极为不平等的主张。尽管这一政策在现实社会中未必真正发挥效力，但也成了维护汉族利益者多年来愤怒的对象。

那么，如何定位少数民族呢？这成为当下中国的一个政治哲学难题。少数民族是需要照顾的落后群体？或者弱势群体？汉族的竞争对手？普通公民？因为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模糊、或者说复杂，导致跟少数民族相关的议题，不止由普通的司法机构主管，也会有民族宗教部门介入，有所谓“民族问题无小事”的说法，这很容易令现实中直接面对少数民族普通犯罪问题的执法人员陷入他们所不了解的困境。所以，要么大事化小，因投鼠忌器而将很多问题轻轻放过，这也在鼓励一些少数民族成员铤而走险；要么上纲上线，将普通犯罪问题与民族冲突、国家安全等联系起来。两者都让简单的犯罪问题缠绕上了复杂的民族宗教与政治的重压。

毒品的非法交易是世界性的难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显然要加大打击力度，查毒禁毒。在中国，特别是在云南、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在面对涉及少数民族参与者时，首先恐怕要“去魅化”，让犯罪问题还原成纯粹的司法问题，减轻那些附加的重压。更要重建社会主义之后，中国整体的政治哲学。否则，本已冲突严重的民族宗教矛盾，要变得更加复杂。■

本土/国家

泰国的政治、历史与艺术

文/萧敢

泰国政治现状

泰国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民选的总理了。它到底还是不是一个君主立宪制下的民主国家？虽然泰国一直是中国人旅游的首选地点，直到 2015 年才被韩国超越，但似乎很少人关心它的实际政治、社会情况。报纸上似乎还时常能看到他信、英拉兄妹的新闻，但他们处于什么状况，也是扑朔迷离。

最近一次泰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 2014 年 5 月 7 日，泰国宪法法院裁定当时总理英拉滥用职权，解除总理职务，由军政府接管政治，陆军司令担任临时总理，成立过渡政府或者叫看守政府。这就是一次军事政变，不过泰国自 1932 年来比较严重的军事政变就有 12 次，基本都没有流血，不应把泰国军事政变与外国军事政变混为一谈。在泰语里，这也不叫政变，更接近“清君侧”之类的传统概念。

看守政府总要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清算前领导人的问题，一件事是修宪，然后推行大选，选出新一届总理，还政于民。2014 年 11 月，英拉即被起诉，罪名是执政期间牵涉“高价收购大米案”。具体来说就是，英拉的执政理念一直偏向左翼民粹，因此她上台之后兑现承诺，以显著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农民手中的大米。她这一举措抬高了大米价格，使得泰国大米在出口市场上失去竞争优势，国家囤积了太多大米，经济损失惨重。如果宪法法院宣判罪名成立，英拉面临坐牢十年和天价罚款，同时五年之内不得参政。

但是对英拉的审判还处于繁冗程序和微妙政治考量之中，英拉也还能频繁出国购物。新加坡报纸时常报道她与兄长他信有时会来新加坡，因为是潮州人，喜欢来吃肉骨茶和黑胡椒螃蟹。对英拉的审判无疑是政治审判，但也必须考虑到政治后果。英拉、他信在泰国北部与东北部都有大量铁杆红衫军粉丝。一旦严判英拉，必将引来红衫军反弹。

而普通老百姓关注，为什么还不大选，临时政府宣布的大选路线图一改再改，大选时间一拖再拖，一年多过去了，为什么还不还政于民。临时政府最主要的理由是修宪。泰国政变经验那么丰富，修宪也修了几十次了。每次政变之后，修宪是必须动作，证明政变的合法性。过去的修宪都是小修小补，宪法本身没什么大变动。但这次不同，这次真的要大修宪法。

大修宪法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在宪法文本里，将他信留下的意识形态彻底清除干净，这本身已经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工作。二是调整选举程序。自从 2006 年军事政变将他信赶下台后，经历了好多次大选，他信自己不能参选，但是他的“代理人”总能卷土重来，不断地当选。宪法法院以前试图用打击政党的方法来打击他信，宣布解散他信所领导的“泰爱泰党”，那么所有人就加入“人民力量党”。再宣布“人民力量党”解散，又出来“为泰党”，这一招是没用了。

他信下台后，最先接替他的是人民力量党的沙马。沙马在竞选前公开表示是他信的支持者，将延续他信的政策并为他信洗刷罪名。结果他上台不到一年，因为“在电

视上主持烹饪节目违法宪法”而下台，这个神奇罪名也令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沙马之后，他信的妹夫宋猜（不是英拉的丈夫）作为临时政府领袖而上台。宪法法院赶紧宣判前一年大选时，人民力量党违法，必须解散，人民力量党主席宋猜自动下台。

随后，黄衫军的发起人阿披实终于上台。但他也不敢拖延，2011年重启大选，他信妹妹英拉领导的为泰党不出意料地击败了阿披实，他信政府换了一副面貌再一次上台。这才引发了2014年的军事政变。宪法法院非常清楚，如果不修改选举流程，还是正常民主选举的话，他信和他的代理人一定仍能轻松上台，根本挡不住。泰国的命运，往往不由曼谷决定，而是有北部和东北部那些农民、民工组成的声势浩大的红衫军决定。

这就是泰国民主政治的一面。同时，泰国还有君主立宪制的一面。泰国目前的国王是拉玛九世，自1946年登基，现在已经70年了，第二名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52年登基。我们很熟悉英国王室的很多尴尬，同样适用于泰国王室，而且泰国王室的权势及影响力恐怕比女王在英国的影响力更大。在泰国，国王是半神一样的存在，所有钞票包括纸币硬币上的唯一头像就是国王，市内到处悬挂国王照片，公司里学校里都是，电影院放映电影之前都要集体起来唱国歌祝愿国王身体健康。

国王叫普密蓬·阿杜德，1927年生，已经老得不像样了。他这一生经历了那么多次政变，虽然国王并不直接干政，显然历次政变背后都有他的默许甚至授意，包括2006年对他信的那一次。但国王现在年纪太大，已经有一阵没有出现，甚至有人怀疑他得了帕金森。而国王的接班人一直存在争议。

在一百年前，国王都被认为是神一样的存在，不可见人。随着现代化，国王可以见人了。而四处张贴国王肖像，这都是现在这位国王一手搞出来的事。他在位70年，实在是太长了，所以可以把这些政策推动到这种程度。但他又不是像北韩一样的独裁者，而只是个“名义上”无权势的虚君。很多人都关心国王的真实状况。十年前有个美国学者写了一本国王传记叫《国王从不微笑》(The King never smile)，在西方影响很大，但在泰国立即被列为禁书。有美籍泰国人在美国传播这本书，回到泰国立即被下狱判刑多年。在泰国，法律上规定，攻击国王是重罪。所以大家都不会用报纸包盒饭，怕万一上面有国王照片，惹上侮辱国王罪。

王储叫哇集拉隆功，1952年生，也是唯一的王子，合法继承人。但这个王储的口碑极差，生活作风有问题，不得民心。他有三段婚姻，第一段是与表妹结婚，生一女后离婚；第二段婚姻，长年同居未婚，生了四五个孩子，最终结婚又离婚。离婚也算了，他还把妻子放逐到国外，不许她和孩子们回泰国生活。现在孩子们都在美国，前几年曾写公开信哭诉，希望能回泰国，引起很多外国人同情。第三段婚姻倒没有离婚，也就是和王储妃生活到现在。但大家都知道他们生活糜烂。王储妃据说以前做过脱衣舞女，前一阵还有王储妃的裸照和DVD流传在网上。泰国一直把国王、王后当作半神一样的存在，这又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佛教国家（红灯区是另一回事），怎么能接受未来国王是这样一个人。现状据说要废除王储妃，还有人爆料说王储已经感染了艾滋病。

国王还有一个女儿，很出名，叫诗琳通公主。公主岁数比王储小三岁，学印度文学文字出身，后来又学了中文，还能写中国书法，演奏中国乐器，知书达理，经常访问中国，极受人民爱戴。大家都觉得她的品性远比王储更适合继承国王的位置，民望极高。在泰国文化和法律中，反对女性继承王位。现在看来，法律还不一定是最大问题。诗琳通公主即位的最大阻碍也许就是她缺乏政治野心和进取心。最近几个月，泰

国上下都在致力于重塑王储形象，目前的临时政府也在全力支持王储。

王储即位问题在泰国是个禁忌问题，绝对不能提起，但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个关键问题。

泰国政治发展史

泰国发生那么多次“军事政变”，但是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军人独裁政权”，军人总在稳定政治之后及时退位，还政于民，其中原理是西方政治学家最关心的。大家看多了非洲和拉美的军人政权，一旦上台就会彻底清洗官僚系统，牢牢把持政权，几乎没有轻易退位的。最直接的理由是，交出权力后就有可能性命不保。只有泰国不是这样。

有的学者把泰国政治体制翻译成为“文武体制”，我觉得很形象，把它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文官-武官系统做比较，就能比较容易地理解泰国政治了。

泰国历史总体上不算复杂，有一条核心线性发展线索，即以中部偏北的素可泰为首都的素可泰王朝，时间在宋末元初；然后是以大城为首都的大城王朝崛起，取代素可泰，时间大约是明初到清中期乾隆年间。大城王国的影响力曾经比较大，基本形成现在泰国的地域面貌，最后亡于缅甸入侵；缅甸灭了大城王国，中国攻缅，缅甸撤军，在这个权力真空的背景下，中国人郑信复国，建立吞武里王国，统一暹罗。吞武里王国时间很短，郑信晚年被手下的通銮所害，迁都湄南河畔的曼谷，建立却克里王国，通銮即拉玛一世。却克里王国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的国王是拉玛九世。所以就是素可泰-大城-吞武里-却克里，一共四朝。

历史上比较重要的皇帝是拉玛五世，也就是朱拉隆功大帝，1868-1910年在位。当时正是整个东南亚殖民化非常严重的阶段。朱拉隆功大帝施行改革，类似于日本的明治维新或者中国的洋务运动，避免了泰国的殖民化。二战之后，回顾整个东南亚，只有泰国从未被殖民过。我们现在讲韩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尼、缅甸、越南、柬埔寨的后殖民经验，应当注意到泰国从未被殖民过，从未有殖民经验。

拉玛五世在外交上做的相当不错，极为圆滑，保证了泰国的独立性。继承的拉玛六世也不错，进一步推进泰国的现代化，同时送了很多留学生去法国学习。到了拉玛七世，1932年的时候，正逢世界经济危机，泰国也深受影响，而拉玛六世派出去的那些留学生起作用，发动政变，逼迫拉玛七世把国家体制改为君主立宪制，颁布新宪法。这是泰国君主立宪制的由来。

1930年代末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尤其是日本崛起，占领大片土地。这在周边国家都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尤其马来、印尼等，土地都直接为日本所占领。可对于泰国，并不是一个那么重要的转折点。泰国与日本结盟，主动让出道路，让日本在北大年登录可以直取马来半岛；又给日本让路，让日军登录缅甸，迅速击溃英军。作为收益，泰国只是趁机索取了缅甸、柬埔寨的一些土地。

当时的拉玛八世是现在拉玛九世的兄弟，还很年幼，二战期间一直在瑞士求学。泰国的实际政治权力掌握在銮披汶将军手里。到1946年，拉玛八世才回到泰国，但很快就被暗杀。他的弟弟阿杜德即位，就是今天的国王拉玛九世。拉玛八世一直是个孩子，从未正式即位。而他的被杀也一直是个历史之谜，多年来在泰国禁止公开讨论。有人认为是銮披汶将军派人所为。

泰国外交自拉玛五世以来，一直秉持左右逢源的投机政策。当时泰国政府名言，谁在战争中最后失败。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泰国眼看日本大势已去，就即使调转方向，与盟军站在一起。銮披汶作为替罪羊下台，泰国政府就算洗清罪孽。而且銮披汶并没有真正退出政治，不过休息几年又卷土重来，再一次成为泰国最高领导人。泰国损失了一些在二战期间占到的便宜，也没有因为曾支持轴心国而受到惩罚。1945、46年对于许多国家而言是民族国家的开端，而对泰国而言，只是新国王即位，仅此而已。

1932年开始君主立宪，其中又经历很多次军人干政。泰国的政治、经济却一直发展得比较平稳。虽然它没有像7、80年代的四小龙或者90年代以后的中国一样实现经济起飞，但也长期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它的经济与周边的缅甸、柬埔寨、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相比，都保持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现在它的人均GDP是5700美元。

比较重要的是，泰国经济没有遭受过比较重大的打击，没有比较严重的衰退，虽然不是最好，但从来不好。整个6、70年代，中南半岛上最重要的事情是越战及其后续。泰国仍然非常聪明地置身事外，并且借机发展了包含色情业在内的旅游业。泰国的边境从不太平，北面有著名的金三角，从国民党孤军到毒枭坤沙一直在影响泰国北部，到80年代逐渐被摆平；南部有马共，一直在泰马边境丛林里打游击，一直到80年代末才解决；东部有与柬埔寨的边境争议，西部有与缅甸的争议。但四处都有争议，却没有动摇泰国的核心，这是一个很值得深究的社会文化问题。

很多人都承认，1973年10月的学生运动是泰国民主化的又一个里程碑。军政府一直在压抑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而学生的热情受到越战等周边环境影响，已经积累到很高程度。陆军元帅他依“延迟退休”的决定成为当时学生运动的导火线。当时有超过50万的学生在曼谷市中心集会，与军方发生流血冲突，国王不得不出面干预，于是起草宪法，重新选举。在此之后，军政府的干预就越来越弱，也知道不可能由军方长期掌握政权。

而在政治框架之外，另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经济精英在80年代的崛起，以及他们对政治权利的追逐。泰国贫富差距迅速拉开，中上层精英与底层民众的差距拉开，这是泰国8、90年代最重要的社会趋势，这也是2001年他信选举上台的背景。他信的政策偏向左翼民族主义，在选举中无往不利。不管是2001年他当选那次，还是2005年连任，还包括他被政变夺权后让沙马、英拉去选。只要是选举，他信几乎就不会输。他信是泰国百年历史上第一个连任的总理，也正是如此高的民望才使得皇室、军方、中产阶级都感受到了威胁。

泰国艺术现状

泰国艺术和文化产业非常发达，在东南亚极有影响。从传统来看，泰国艺术主要就是佛教导向的艺术，大量的佛像雕塑，壁画以及寺庙建筑。泰国同时也受到印度教的影响，还有中国的影响。例如泰国最有影响的雕塑是受印度教影响的四面佛，泰国也广泛地烧制瓷器，主要是黑瓷以及基本的青瓷。单纯从制瓷工艺来说，还谈不上一流。

泰国位于缅甸和柬埔寨之间，同属小乘佛教，造像比较接近，可以找到许多共通之处，例如蛇、鸟的装饰。泰国佛像中，莲花元素用得更多一些。而在绘画方面，主

要是寺院壁画和书籍插画。泰国壁画主要是佛教经变故事，插图绘画也是如此，多是平面无透视，这一点与中国、西藏、印度、中东等地的绘画一样，与地中海的绘画则截然不同。泰国绘画中，各元素的大小意味着它的重要性，这一点也与西藏、印度唐卡类似。

泰国艺术一直到 1920 年都还处于非常保守的阶段，还在因循守旧地处理佛教题材。由于泰国并没有被殖民，所以也没有直接地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一直到 1923 年，意大利雕塑家 Corrado Feroci 来到曼谷并住下扎根，他还在泰国创办了 Silpakorn University，这可以被视作泰国当代艺术的起点。

自此之后，泰国当代艺术迅速与西方接轨，在多种形式如装置、影像、行为艺术等等都有突出表现。佛教是泰国最核心的价值观，也仍然是当代艺术中最重要的主题和思想灵感。与之相关的自然、日常生活、女性主义也是常见的泰国艺术主题。

几代泰国艺术家都在努力将西方艺术手法与泰国传统尤其是佛教传统相结合。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 Panya Vijithanasarn。他的融合泰-西的绘画作品在泰国国家美术馆里有很多展示，在佳士得拍卖的价格已经炒高，Montien Boonma 是一个常被提起的泰国艺术家，已经去世，是泰国装置艺术的先驱。他的早期作品比较有批判性，聚焦于不和谐的社会发展。后期更精神化。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已为很多艺评家所肯定。Araya Rasdjarmreansook 是个重要的、女性主义的影像艺术家。

还有大量并非泰国裔的艺术家，但定居在曼谷，也在从另一个方向上调和泰国与西方艺术。他们频频参加各种双年展，所以泰国当代艺术和有泰国特征的艺术作品，已是目前国际上最流行的当代艺术品类之一。■